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全世界無产者,联合起来!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十六卷

人 民 出 版 社

1964年 北京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十六卷

*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陽門大街 320 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 1 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開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張 $29\frac{1}{2}$ · 插頁 9 · 字數 707,000

1964 年 2 月第 1 版

1964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統一書號 1001·570 定價（四）2.90 元

目 录

卡·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	5—14
卡·馬克思。协会临时章程	15—18
卡·馬克思。关于接受工人組織加入国际工人协会 的条件的決議草案	19
卡·馬克思。致美国总統阿伯拉罕·林肯	20—22
卡·馬克思。致“观察家报”編輯部的信	23
卡·馬克思。致斯图加特“观察家报”編輯	24—27
卡·馬克思。論蒲魯东(給約·巴·施韦澤的信)	28—36
弗·恩格斯。提德曼老爷 古代丹麦民歌	37—39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致“社会民主党人报”編 輯部 声明	40
弗·恩格斯。普魯士軍事問題和德国工人政党	41—87
一	46—61
二	62—73
三	74—87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致“社会民主党人报”編 輯部的声明	88
弗·恩格斯。关于小册子“普魯士軍事問題和德国 工人政党”的簡介	89

卡·馬克思。关于巴黎支部中的冲突的決議最初方案	90
卡·馬克思。总委员会关于巴黎支部中的冲突的決議	91—92
卡·馬克思。評弗·恩格斯的小册子“普魯士軍事 問題和德国工人政党”	93—94
卡·馬克思。关于不給“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的原 因的声明	95—98
卡·馬克思。致“柏林改革报”編輯部的声明	99
卡·馬克思。“人类的主席”	100—105
卡·馬克思。更正	106—107
卡·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致約翰遜总统的公开信	108—110
卡·馬克思。工資、价格和利潤	111—169
几点說明	113
1. 生产和工資	114—116
2. 生产、工資、利潤	116—125
3. 工資和貨幣	125—129
4. 供給和需求	130—131
5. 工資和价格	132—134
6. 价值和劳动	134—143
7. 劳动力	143—146
8. 剩余价值的生产	146—148
9. 劳动的价值	149—150
10. 利潤是按照商品的价值出卖商品时获得的	150—151
11. 剩余价值分解成的各个部分	151—154
12. 利潤、工資和价格間的一般关系	155—157
13. 爭取提高工資或反对降低工資的一些最重要場合	157—163
14. 資本和劳动之間的斗争及其結果	163—169

弗·恩格斯。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	170—183
一 致“共和国”周报編輯	170—173
二 致“共和国”周报編輯	174—178
三 民族理論之运用于波兰	179—183
卡·馬克思。警告	184—185
弗·恩格斯。德国战争短評	187—212
一	189—193
二	194—198
三	199—203
四	204—207
五	208—212
卡·馬克思。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問題給代表的 指示	213—223
1. 国际协会的組織	213—214
2. 在协会帮助下实现劳資斗争中的国际联合行动	214—215
3. 工作日的限制	215—216
4. 男女儿童和少年的劳动	216—218
5. 合作劳动	218—219
6. 工会(工联)。它們的过去、現在和未来	219—221
7. 直接稅和間接稅	221—222
8. 国际信貸	222
9. 波兰問題	222—223
10. 軍隊	223
11. 宗教問題	223
卡·馬克思。1867年1月22日在倫敦紀念波兰起 义大会上的演說	224—229

- 卡·馬克思。辟謠230
- 卡·馬克思。关于国际工人协会如何对待和平和自由同盟代表大会的決議草案231
- 弗·恩格斯。卡·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书評——为“未来报”作232—235
- 弗·恩格斯。卡·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书評——为“萊茵报”作236—240
- 弗·恩格斯。卡·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书評——为“爱北斐特日报”作241—242
- 弗·恩格斯。卡·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书評——为“杜塞尔多夫日报”作243—245
- 卡·馬克思。在曼彻斯特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員和国际工人协会246—247
- 卡·馬克思。剽窃者248—253
- 弗·恩格斯。卡·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书評——为“观察家报”作254—256
- 弗·恩格斯。卡·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书評——为“維尔騰堡工商业报”作257—259
- 弗·恩格斯。卡·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书評——为“新巴登报”作260—262
- 弗·恩格斯。卡·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书評——为“民主周报”作263—271
- 一263—267
- 二268—271
- 弗·恩格斯。卡·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提綱273—325

第一章 商品和货币	275—286
一 商品本身	275
二 商品的交换过程	277
三 货币或商品流通	279
A. 价值尺度(假定金为货币)	279
B. 流通手段	280
(a) 商品的形态变化	280
(b) 货币的流通	281
(c) 铸币——价值符号	282
C. 货币	283
(a) 货币贮藏	283
(b) 支付手段	284
(c) 世界货币	286
第二章 货币转化为资本	287—294
一 资本的总公式	287
二 总公式的矛盾	290
三 劳动力的买和卖	292
第三章 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295—305
一 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	295
二 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	297
三 剩余价值率	299
四 工作日	300
五 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	304
第四章 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306—325
一 相对剩余价值的概念	306
二 协作	307
三 分工和工场手工业	311

四 机器和大工业	315
(a) 机器本身	315
(b) 借助机器占有劳动力	317
(c) 工厂整体的典型形态	320
(c') 或 (d) 工人反对工厂制度及机器的斗争	321
(c'') 或 (e) 机器和剩余价值	323
弗·恩格斯。卡·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书評——为 “双周評論”作	326—350
卡·馬克思。关于改变国际 1868 年度代表大会的 集会地点的決議	351
卡·馬克思。总委员会就費·皮阿的演說所作的決議	352
卡·馬克思。我对弗·巴师夏的剽窃	353—355
卡·馬克思。总委员会就不列顛政府对沙皇俄国的 态度所作的声明	356
卡·馬克思。总委员会提交布魯塞尔代表大会的关 于在資本主义制度下使用机器的后果的決議草案	357
卡·馬克思。致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和理事会	358
卡·馬克思。总委员会提交布魯塞尔代表大会的关 于縮短工作日的決議草案	359
卡·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第四年度报告	360—365
弗·恩格斯。致席勒协会理事会	366—367
弗·恩格斯。論拉薩尔派工人联合会的解散	368—371
弗·恩格斯。論拉薩尔派工人联合会的解散(补充)	372—373
卡·馬克思。关于国际工人协会和英国工人組織的 关系	374—376

卡·馬克思。1866年格萊斯頓先生給英格蘭銀行 的信怎样使俄国得到了六百万英鎊的公債	377—379
卡·馬克思。給倫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 的声明	380—381
卡·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和社会主义民主同盟	382—384
弗·恩格斯。关于薩克森煤矿工人行业协会的报告	385—392
卡·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致社会主义民 主同盟中央局	393—394
卡·馬克思。比利时的屠杀	395—400
卡·馬克思。致合众国全国劳工同盟的公开信	401—403
卡·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二版 序言	404—406
弗·恩格斯。卡尔·馬克思	407—413
卡·馬克思。总委员会关于继承权的报告	414—416
卡·馬克思。总委员会向国际工人协会第四次年度 代表大会的报告	417—432
卡·馬克思。总委员会关于不列顛政府对被囚禁的 爱尔兰人的政策的決議草案	433—434
卡·馬克思。总委员会致瑞士罗曼語区联合会委员 会	435—443
卡·馬克思。訃告	444—445
弗·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第二版序言	446—455
卡·馬克思。英国政府和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員	456—462
一	456—460
二	461—462

卡·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致日内瓦的俄国支部委员会委员	463—464
卡·馬克思。机密通知	465—479
卡·馬克思。总委员会关于“蜂房报”的决议草案	480
卡·馬克思。关于对法国各支部的成员的迫害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声明	483—484
卡·馬克思。总委员会关于“在伦敦的法国人联合支部”的决议草案	485
卡·馬克思。总委员会关于在美因兹召开代表大会的决议	486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致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	487—489
卡·馬克思。总委员会关于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的决议	490
卡·馬克思。日内瓦对建筑工人实行的同盟歇业	491—493
卡·馬克思。给各支部的机密通知	494
卡·馬克思。在美因兹召开的国际代表大会的议程	495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遺稿

卡·馬克思。关于爱尔兰问题的未作的发言的提纲	499—505
卡·馬克思。1867年12月16日在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所作关于爱尔兰问题的报告的提纲	506—522
弗·恩格斯。爱尔兰史	523—571
自然条件	525—549
古代的爱尔兰	550—571

- 弗·恩格斯。“爱尔兰史”的片断572—573
- 弗·恩格斯。爱尔兰歌曲集代序574—575

附 录

- 中央委员会告各工人团体书579—580
- 在1865年7月25日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修改和通过的
 常务委员会关于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报告581—583
- 燕妮·马克思1866年1月29日给约·菲·贝克尔的信的
 摘录584—585
- 给“佛尔维耶回声报”的信586—596
- 卡·马克思关于马志尼对国际工人协会的态度发言记录597—598
- 国际工人协会章程和条例599—603
- 卡·马克思在1867年2月28日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
 教育协会纪念会上的演讲记录604—605
- 总委员会关于洛桑代表大会的呼吁书606—609
- 卡·马克思关于新蓝皮书的统计数字的发言记录610—611
- 卡·马克思关于国际工人协会如何对待和平和自由同盟代
 表大会问题的发言记录612—613
-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向1867年洛桑代表大会的报告614—634
- 燕妮·马克思1867年10月5日左右给约·菲·贝克尔的
 信的摘录635—636
- 卡·马克思关于爱尔兰问题的报告的记录(1867年12月16日
 在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所作的报告)637—639
- 卡·马克思关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使用机器的后果的发言
 记录640—642
- 卡·马克思关于缩短工作日的发言记录643
- 告伦敦德国工人书644—645

卡·馬克思关于棉紡織工业中的竞争对法国工人状况的影响 的发言記錄	646
总委员会关于巴塞尔代表大会議程的決議	647
卡·馬克思关于土地所有制的发言記錄	648—649
卡·馬克思关于继承权的发言記錄	650—653
卡·馬克思关于现代社会中的普及教育的发言記錄	654—656
土地和劳动同盟告大不列顛和爱尔兰男女工人书	657—663
卡·馬克思关于不列顛政府对被囚禁的爱尔兰人的政策的 发言記錄	664—669
燕妮·馬克思关于爱尔兰問題的文章	670—700
一	670—672
二	673—676
三	677—681
四	682—686
五	687—691
六	692—694
七	695—697
八	698—700
卡·馬克思关于“蜂房报”的发言記錄	701
卡·馬克思給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的信(轉述)	702
卡·馬克思关于罗曼語区联合会的分裂的发言記錄	703
注釋	707—830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	831—877
人名索引	878—918
期刊索引	919—922
地名索引	923—931

譯后記	932
-----------	-----

插 图

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第一版的扉頁	3
弗·恩格斯的小册子“普魯士軍事問題和德国工人政党”第 一版的扉頁	43
弗·恩格斯的国际工人协会会员证	88—89
1866年普奧战争图	194—195
載于1870年4月15日“人民事业”报上的卡·馬克思給日 內瓦国际俄国支部委员会委員的信	462—463
記錄簿中貼有卡·馬克思“关于对法国各支部的成員的迫害” 手稿的一頁	481
弗·恩格斯“爱尔兰史”手稿的第一頁	527
爱尔兰地图	540—541

卡·馬克思

和

弗·恩格斯

1864年9月—1870年7月

ADDRESS
AND
PROVISIONAL RULES
OF THE
WORKING MEN'S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ESTABLISHED SEPTEMBER 28, 1864,

AT A PUBLIC MEETING HELD AT ST. MARTIN'S
HALL, LONG ACRE, LONDON.

PRICE ONE PENNY.

PRINTED AT THE "BEE-HIVE" NEWSPAPER OFFICE,
10, BOLT COURT, FLEET STREET.

1864.

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第一版的扉页

卡·馬克思

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

协会于 1864 年 9 月 28 日在倫敦朗-爱克街
圣馬丁堂举行的公开大会上成立¹

工人們!

工人群众的貧困在 1848 年到 1864 年間沒有減輕，这是不容爭辯的事实，但是这个时期就工业的发展和貿易的增长來說却是史无前例的。1850 年，不列顛資產階級一家温和的、消息灵通的机关报曾經預言，只要英国的进出口貿易增加 50%，这个国家里的貧困現象就会消灭。其实不然！1864 年 4 月 7 日，財政大臣曾用下面这样的声明取悅他的議会听众：英国进出口貿易总额在 1863 年已經增加“到 443 955 000 英鎊！这个惊人的数额几乎比刚刚过去的 1843 年时代的貿易周轉額多两倍！”虽然如此，財政大臣还是雄辯地讲到了“貧穷”。他喊道：“請想想那些瀕临貧穷深淵的人們”，“那……沒有提高的工資”，“那十有八九都是为生存而掙扎的……人的生活！”²可是他完全沒有提到爱尔兰人民，他們在北部正逐漸被机器所排挤，在南部正逐漸被羊群所排挤；可是羊群在这个不幸的地区也在减少，不过不像人减少得那样快罢了。他沒有重复上层貴族分子在突然发作的恐怖情緒下剛剛脫口說出的話。当“勒杀犯”³所引起的恐慌达到了相当程度时，上院决定要

对流放和苦役情况进行調查，并把調查結果用报告书形式加以公布。真实情况已在1863年的一本厚厚的藍皮书⁴中揭露出来，由官方提供的事实和数字证明，在英格兰和苏格兰，連最坏的刑事犯（苦役犯）也比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农业工人工作輕得多，飲食却好得多。但是还不止于此。当郎卡郡和柴郡的工人因受美国内战影响被抛擲到街头时，同一个上院又派出一个医生到工业区去，任务是查明按最低廉的价格和最簡便的方式来供給，平均至少需要多少碳素和氮素，才剛好能够“防止饥餓病”。当时医务专使斯密斯医生确定，一星期至少需要28 000 喱碳素和1 330 喱氮素，才可以維持一个普通成年人的生命……也就是把他維持在剛好不致发生饥餓病的限界上；其次，他还发现，这个数量大約与棉織工厂的工人在极度貧困压迫下实际上所能够得到的菲薄养料相等。^①但是請注意！同一个博学的医生，不久后又被樞密院卫生視察員派去調查工人階級中更貧困部分的营养状况了。他的調查結果写在今年根据議会命令公布的“第六号公共卫生报告书”⁵內。这位医生发现了什么呢？他发现，絲織工人、縫紉女工、織手套工人、織袜子工人以及其他工人的食物，平均^②比失业的棉織工人的救济口粮还坏，其中甚至沒有包含“剛好能够防止饥餓病”的碳素和氮素。

我們在报告书中讀到：“不仅如此，在調查屬於农业人口的家庭时发现，这些家庭有五分之一以上得不到必需的最低限度的含碳食物，有三分之一以上得不到必需的最低限度的含氮食物，并且在三个郡里（伯克郡、牛津郡和索

① 大概用不着提醒讀者，除水和某些无机物外，碳素和氮素也是人类食物的原料。但是要使人体获得营养，这些簡單化学成分應該以植物或动物的形态供給；例如馬鈴薯主要是含有碳素，而白面包則含有相当分量的碳素和氮素。

② 德文版加有：“每年”。——編者注

美塞特郡),缺乏含氮食物是通常的現象。”官方報告書中補充說:“应当記住,食物的匱乏已經極難忍受,而食物的惡化通常是在其他各種匱乏之後才發生的…… 甚至保持清潔也成為一種費錢或難於辦到的事情;如果由於自尊心而仍然要保持清潔,那末,每一次這樣的企圖都不免要帶來更多的飢餓痛苦。”“這種情形是令人痛心的,特別是當人們想到這裡所談的貧困完全不是因懶惰而應得的懲罰;在一切場合,這都是勞動人民的貧困。實際上,工人為取得這點菲薄食物而支出的勞動,在大多數情況下都是時間非常長久的。”

報告書舉出了一件奇怪和完全出人意料的事實:“在聯合王國各個部分中”——英格蘭、威爾士、蘇格蘭和愛爾蘭——“正是在英格蘭”這個王國最富有的部分,“農業人口吃得最壞”;但是,甚至伯克郡、牛津郡和索美塞特郡的農業工人,也比倫敦東頭大量家庭工業的熟練工人吃得好一些。

這就是官方按照議會命令在 1864 年間,即在自由貿易的黃金時代公布的材料,正是這時財政大臣向下院通知說:

“大不列顛工人的一般狀況已經有了改善,並且應當承認這種改善是絕無仅有的,是任何一個國家和任何一個時代都比不上的。”

同這種官方的贊美詞令形成尖銳矛盾的是官方的公共衛生報告書中這樣一句枯燥的評語:

“一國的公共衛生狀況是指其居民大眾的健康而言,如果這些居民直到最下層在生活上得不到一定的保障,那他們就難以是健康的了。”

財政大臣被“國家進步”的統計數字弄得眼花繚亂,他得意忘形地喊道:

“從 1842 年到 1852 年,國內應該課稅的收入增加了 6%…… 在從 1853 年到 1861 年的八年內,如以 1853 年的收入為基礎,則增加了 20%! 事實令人驚奇得幾乎到了難以置信的程度! …… 財富和實力這樣令人陶醉的增長,”——格萊斯頓先生補充說,——“完全限於有產階級!”⁶

如果你們想知道，这种“完全限于有产階級的財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过去和現在都是由工人階級在怎样的引起健康損坏、道德墮落和智力衰退的条件下造成的，那就請你們看一看最近一次“公共卫生报告书”关于印刷厂和男女服装縫紉厂情况的描繪吧！⁷請你們把这一描繪同 1863 年公布的“童工調查委员会报告书”对照一下，例如，那里有这样一段話：

“陶工这一类人，不論男女，在体力和智力方面都是居民中最退化的部分”，“不健康的儿童，反过来又要成为不健康的父母”，“有增无已的人种退化是不可避免的”，“斯泰福郡的居民，若不是經常有邻近地区的居民流进来，若不是与比較健康的居民群通婚，他們的退化程度是还会更加厉害的。”⁸

請看一看特里門希尔先生的藍皮书“面包房工人的申訴”⁹吧！当人們讀到工厂視察員发表的有官方的出生和死亡統計数字作說明的奇怪声明时，又有誰能不为之渾身战栗呢？据这个声明所說：当郎卡郡的工人依靠少量救济粮維持生活时，他們的健康状况实际上却改进了，因为由于棉荒，他們暂时停止了在棉織工厂做工；儿童死亡率在这个时期也减低了，因为母亲这时終於有可能給他們喂奶，而不是給他們喂安眠的鴉片药水了！

現在讓我們重新来看看事情的另一面吧！1864 年 7 月 20 日向下院提出的关于所得税和財產稅的报告表明，根据收稅員的估計，每年收入在 5 万英鎊以及 5 万英鎊以上的人数，从 1862 年 4 月 5 日到 1863 年 4 月 5 日的一年中增加了 13 人，即从 67 人增加到 80 人。从同一个报告中又可以看到，大約有 3 000 人每年共收入 2 500 万英鎊，这个数目比英格兰和威尔士全体农业工人每年的收入还要大。翻开 1861 年的人口調查表，你們就会看到，英格兰和威尔士两处的男性土地所有者人数已經由 1851 年的 16 934

人，减少到1861年的15 066人；这就是說，土地集中程度在十年中增大了11%。如果英国地产集中于少数人手中的过程今后仍将如此迅速地繼續下去，那末土地問題就将異常簡單化，就像在羅馬帝国有过的情形那样，当时尼祿皇帝听說非洲一省有一半土地屬於六个所有者，就曾露齿狞笑。

我們这样詳細地談到这些“令人惊奇得几乎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的事实”，是因为英国在貿易和工业方面占欧洲第一位^①。請回忆一下，几个月前路易-菲力浦的一个亡命的儿子就曾公开祝賀过英国农业工人，說他們的命运比他們在海峽彼岸的那些較不幸的同伴們好些。的确，在大陆上所有先进的工业国家里，都在重复着英国的情况，只是带有不同的地方色彩和規模較小罢了。从1848年起，在所有这些国家里，工业都有了空前的发展，輸入和輸出都有了梦想不到的扩大。在所有这些国家里，“完全限于有产阶级的財富和实力的增长”确实是“令人陶醉的”。在所有这些国家里，也如在英国一样，实际工資^②对于工人阶级的少数稍微有些提高，但对大多数說来，貨幣工資的提高很少表示福利的实际的增长，正如对于倫敦貧民院或孤儿院的人來說，购买他們的生活必需品在1852年費7英鎊7先令4辨士，到1861年要費9英鎊15先令8辨士，这并不表示他們的生活有了任何改善。工人阶级的广大群众到处都在日益下降，下降的程度至少同那些站在他們头上的阶级沿着社会阶梯上升的程度一样厉害。不論是机器的改进^③，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交通工具的改良，新的殖民地的开辟，向外

① 德文版加有：“并且在世界市場上实际上代表欧洲”。——編者注

② 德文版加有：“也就是用貨幣工資所能买到的生活資料”。——譯者注

③ 德文版加有：“化学上的发现”。——編者注

移民，扩大市場，自由貿易，或者是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都不能消除劳动群众的貧困；在現代这种邪恶的基础上，劳动生产力的任何新的发展，都不可避免地要加深社会对比和加强社会对抗。这在欧洲一切国家里，現在对于每一个沒有偏見的人都已成了十分明显的真理，只有那些一心想使別人沉湎于痴人乐园的人才不会否认这一点。在这种“令人陶醉的”經濟进步时代，在不列顛帝国的首都，餓死几乎已經成为一种常規。这个时代在世界編年史上留下的标志，就是被称为工商业危机的社会瘟疫日益頻繁地重复发生，規模日益扩大，后果日益带有致命性。

在1848年革命失敗后，大陆上工人階級所有的党組織和党的机关报刊都被暴力的铁腕所摧毁，工人階級最先进的子弟在絕望中逃亡到大西洋彼岸的共和国去，短促的解放梦已随着工业狂热发展、道德敗坏和政治反动的时代的到来而破灭了。大陆上的工人階級的失敗，部分是由無論当时或現在都和圣彼得堡的内閣結成兄弟同盟的英国政府的外交所促成，这一失敗很快也就把自己的傳染作用扩展到了海峡的这一边。大陆上的階級弟兄的失敗，把英国工人階級弄得垂头丧气，挫伤了它对自己事业的信心，同时却使土地巨头和金融巨头恢复了他們已經多少动搖了的自信。他們蛮橫地收回了已經宣布过的让步。新的金矿产地的发现，引起了大量的向外移民，結果在不列顛无产階級队伍中造成了不可弥补的缺陷。工人階級中另一部分先前积极的分子，受了暫時增加工作和工資的誘惑而变成了“政治工賊”。維持或革新宪章运动的一切嘗試都遭到了决定性的失敗；工人階級的机关报刊由于群众的漠不关心而相继停刊；的确，英国工人階級过去从来没有像現在这样苟安于政治上的毫无作为。如果說过去在英国工人階級和大

陆上的工人阶级之間沒有过行动上的一致，那末現在至少是有失败上的一致了。

虽然如此，1848年革命以来的这一段时期还是有它的好的方面。我們这里只指出两件重大的事实。

英国工人阶级經過三十年惊人頑强的斗争，利用土地貴族和金融貴族間的暫时的分裂，終於爭得了十小时工作日法案的通过。¹⁰这一法案对于工厂工人在体力、道德和智力方面引起的非常良好的后果，在工厂視察員每半年一次的报告书中都曾指出过，現在已經成为大家公认的事实了。欧洲大陆上的大多数政府都不得不在作了或多或少的修改之后采用了英国的工厂法，而英国議會本身也不得不每年扩大这一法律的应用范围。但是这个对工人的措施的成功，除了有实际的重要性以外，还有另一个重大的意义。资产阶级通过自己最著名的学者如尤尔博士、西尼耳教授及其他同类聪明人的口屡次預言，并且不停地重复說：对于工时的任何立法限制都必然要为不列顛工业敲起丧钟；不列顛工业像吸血鬼一样，只有靠吮吸人血——并且是吮吸儿童的血——才能生存。古时杀害儿童是崇拜摩洛赫神的宗教的神秘仪式，但它只是在一些极隆重的場合下实行，大概一年不过一次；同时摩洛赫神并没有表示专爱吃穷人的儿童。这种圍繞用立法手段限制工时問題而展开的斗争所以更加激烈，撇开利潤貪求者的惊慌，因为这里的问题涉及到一个大的爭論，即构成资产阶级政治經济学实质的供求規律的盲目統治和构成工人阶级政治經济学实质的由社会預見^①指导社会生产之間的爭論。因此，十小时工作日法案不仅是一个重大

^① 德文版为：“由社会認識和社会預見”。——譯者注

的实际的成功，而且是一个原則的胜利；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第一次在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面前公开投降了。

但是，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对财产的政治经济学^①还取得了一个更大的胜利。我們說的是合作运动，特别是由少数勇敢的“手”独力创办起来的合作工厂。对这些偉大的社会試驗的意义不論給予多么高的估价都是不算过分的。工人们不是在口头上，而是用事实证明：大规模的生产，并且是按照现代科学要求进行的生产，在沒有利用雇佣工人阶级劳动的雇主阶级参加的情况下是能够进行的；他們证明：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劳动工具不应当被壟断起来作为統治和掠夺工人的工具；雇佣劳动，也像奴隶劳动和农奴劳动一样，只是一种暫时的和低級的形式^②，它注定要让位于带着兴奋愉快心情自願进行的联合劳动。在英国，合作制的种子是由罗伯特·欧文播下的；大陆上工人进行的試驗，实质上是从那些并非由誰发明而是在1848年大声宣布的理論中得出的实际結論。

同时，1848年到1864年这个时期的經驗毫無疑問地证明，^③不管合作劳动在原則上多么优越，在实际上多么有利，只要它沒有越出个别工人的偶然努力的狹隘范围，它就始終既不能阻止壟断势力按着几何級数增长，也不能解放群众，甚至不能显著地減輕他們的貧困的重担。也許正是由于这种原因，所以那些面善口慧的貴族，资产阶级的慈善空談家，以至机灵的政治经济学家，先前在合作劳动制处于萌芽状态时枉費心机地想要把它鏟除，嘲笑它是

① 德文版不是“财产的政治经济学”，而是“資本的政治经济学”。——編者注

② 德文版为：“低級的社会形式”。——編者注

③ 德文版加有：“就像工人阶级最卓越的領導者們在1851年和1852年談到英国合作运动时已經断言的那样”。——編者注

幻想家的空想，咒罵它是社会主义者的邪說，現在都突然令人发嘔地捧起它的場来了。要解放劳动群众，合作劳动必須在全国范圍内发展，因而也必須依靠全国的財力。但是土地巨头和資本巨头总是要利用他們的政治特权来維持和永久保持他們的經濟壟断的。他們不仅不会贊助劳动解放的事业，而且恰恰相反，会繼續在它的道路上設置种种障碍。請回忆一下帕麦斯顿勋爵在最近一次議會会議上攻击爱尔兰租佃者权利法案維持者的嘲弄口气吧。他大喊道：下院是土地所有者的議院。¹¹

所以，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级的偉大使命。工人们似乎已經了解到这一点，因为英国、德国、意大利和法国都同时活跃起来了，并且同时都在努力从政治上改組工人政党。

工人们已經具备了作为成功因素之一的人数；但是只有当群众組織起来并为知識所指导时，人数才能起决定勝負的作用。过去的經驗证明：忽視在各国工人間应当存在的兄弟团結，忽視那应该鼓励他們在解放斗争中坚定地并肩作战的兄弟团結，就会使他們受到懲罰，——使他們分散的努力遭到共同的失敗。这种認識促使 1864 年 9 月 28 日在圣馬丁堂出席公开大会的各国工人創立了国际协会。

还有一个信念鼓舞着这次大会的参加者。

工人阶级的解放既然要求^①工人们兄弟般的合作，那末当存在着那种为追求罪恶目的而利用民族偏見并在掠夺战争中洒流人民鮮血和浪費人民財富的对外政策时，他們又怎么能完成这个偉大任务呢？使西欧避免了为在大西洋彼岸永久保持和推广奴隶制

① 德文版加有：“各国”。——編者注

进行可耻的十字軍征討冒險的，并不是統治階級的智慧，而是英国工人階級对于他們那种罪恶的瘋狂行为所进行的英勇反抗。¹² 欧洲的上层階級只是以无耻的贊許、假装的同情或白痴般的漠不关心态度来观望俄罗斯怎样侵占高加索的山区要塞和宰割英勇的波兰；这个头在圣彼得堡而在欧洲各国內閣里有其爪牙的野蛮强国所从事的大規模的不曾遇到任何抵抗的侵略，給工人階級指明了他們的責任，要他們洞悉国际政治的秘密，监督本国政府的外交活动，在必要时就用能用的一切办法反抗它；在不可能防止这种活动时就团結起来同时揭露它，努力做到使私人关系間應該遵循的那种简单的道德和正义的准則，成为国际关系中的至高无上的准則。

为这样一种对外政策而进行的斗争，是爭取工人階級解放的总斗争的一部分。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卡·馬克思写于 1864 年 10 月 21 日和 27 日之間

載于 1864 年 11 月在倫敦出版的小册子“1864 年 9 月 28 日在倫敦朗-爱克街圣馬丁堂举行的公开大会上成立的国际工人协会的宣言和临时章程”。原作者的德譯文載于 1864 年 12 月 21 日和 30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2 号和第 3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小册子“1864 年 9 月 28 日在倫敦朗-爱克街圣馬丁堂举行的公开大会上成立的国际工人协会的宣言和临时章程”，并根据“社会民主党人报”校对过

卡·馬克思 协会临时章程¹³

鉴于：

工人階級的解放應該由工人階級自己去爭取；工人階級的解放鬥爭不是要爭取階級特權和壟斷權，而是要爭取平等的權利和義務，並消滅任何階級統治；

勞動者在經濟上受勞動資料即生活源泉的壟斷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即一切社會貧困、精神屈辱和政治依附的基礎；

因而工人階級的經濟解放是一切政治運動都應該作為手段服從於它的偉大目標；

為達到這個偉大目標所做的一切努力至今沒有收到效果，是由於每個國家里各個不同勞動部門的工人彼此間不夠團結，由於各國工人階級彼此間缺乏親密的聯合；

勞動的解放既不是一個地方的問題，也不是一個民族的問題，而是涉及存在有現代社會的一切國家的社會問題，它的解決有賴於最先進各國在實踐上和理論上的合作；

目前歐洲各個最發達的工業國工人階級運動的新的高漲，在鼓起新的希望的同时，也鄭重地警告不要重犯過去的錯誤，要求立

刻把各个仍然分散的运动联合起来；

鉴于上述理由，下面署名的委员会委员，根据 1864 年 9 月 28 日在伦敦圣马丁堂举行的公开大会上所作决议赋予的全权，采取了必要的步骤来创立国际工人协会。

他们宣布，这个国际协会以及加入协会的一切团体和个人，承认真理、正义和道德是他们彼此间和对一切人的关系的基础，而不分肤色、信仰或民族。

他们认为，一个人有责任不仅为自己本人，而且为每一个履行自己义务的人要求人权和公民权。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¹⁴

根据这一切，他们制定国际协会的临时章程如下：

1. 本协会设立的目的，是要成为追求共同目标即追求工人阶级的保护、发展和彻底解放的各国工人团体进行联络和合作的中心。

2. 本会定名为“国际工人协会”。

3. 1865 年将在比利时召开全协会工人代表大会，由当时已经参加国际协会的工人团体派遣代表出席。代表大会的使命是在全欧洲面前宣布工人阶级的共同愿望，最后批准国际协会章程，研究使国际协会能顺利进行活动的方式方法，并任命协会的中央委员会。¹⁵ 全协会代表大会每年召开一次。

4. 中央委员会设于伦敦；它由参加国际协会的各国的工人组成。中央委员会从其委员中选出为处理各种事务所必需的负责人员，即主席、财务委员、总书记、各国通讯书记等。

5. 全协会代表大会在每年的会议上听取中央委员会关于过去一年的活动的公开报告。每年由代表大会任命的中央委员会，有

权增加新的中央委員。在紧急情况下，中央委員會可以早于規定的一年期限召开全协会代表大会。

6. 中央委員會是沟通各种互相合作的团体之間的联系的国际机关，它應該使一国工人能經常知悉所有其他各国工人階級运动的情况；使欧洲各国中的社会状况調查工作能同时并在共同的领导下进行；使一个团体中提出的但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能由一切团体加以討論，并且在需要立刻采取实际措施时，例如在发生国际冲突时，使所有加入协会的团体能同时和一致行动。在一切适当場合，中央委員會应主动向各个全国性团体或地方性团体提出建議。

7. 既然每个国家的工人运动的成功只能靠团結和联合的力量来保证，而国际中央委員會活动的成效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是同少数全国性的工人协会中心还是同許多細小而分散的地方性团体联系，所以，国际协会的會員應該竭力使他們本国的分散的工人团体联合成由全国性中央机关来代表的全国性組織。但是，不言而喻，章程中这一条的运用要取决于每一国家法律的特点，同时不管是否存在法律造成的障碍，并不排斥独立的地方性团体同倫敦的中央委員會发生直接的联系。

8. 在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1864年9月28日选出的委員會作为临时中央委員會进行活动，它应尽力在各国工人組織之間建立联系，在联合王国中征收會員，为召开全协会代表大会进行筹备，并同各全国性和地方性团体一起討論应提交这次代表大会的主要問題。

9. 国际协会的每个會員，在由一个国家迁居另一国家时，應該从加入协会的工人方面得到兄弟般的帮助。

10. 加入国际协会的工人团体,在彼此結成亲密合作的永久联盟的同时,完全保存自己原有的組織。

卡·馬克思写于 1864 年 10 月 21 日和
27 日之間

載于 1864 年 11 月在倫敦出版的小册子
“1864 年 9 月 28 日在倫敦朗-爱克街圣
馬丁堂举行的公开大会上成立的国际工
人协会的宣言和临时章程”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小册子“1864 年
9 月 28 日在倫敦朗-爱克
街圣馬丁堂举行的公开大
会上成立的国际工人协会
的宣言和临时章程”

卡·馬克思
关于接受工人組織加入国际工人
协会的条件的決議草案¹⁶

一

邀請各工人組織作为集体加入协会，它們可以根据自己拥有的經費酌情确定自己繳納会費的数额。

二

加入协会的团体有权各选派代表一名参加中央委员会；委员会保留接納或拒絕这些代表的权利。^①

卡·馬克思于 1864 年 11 月 22 日
提出

載于 1864 年 11 月 26 日“蜂房报”
第 163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总委员会記錄簿，
并根据“蜂房报”校对过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① 在 1864 年 11 月 26 日“蜂房报”第 163 号刊載的关于委员会會議的报道中，第二个決議案是这样写的：“加入协会的倫敦团体有权各选派代表一名参加中央委员会；委员会保留接納或拒絕这些代表的权利。至于倫敦以外的願意加入协会的团体，則有权选派自己的成員一名作为通訊員。”——編者注

卡·馬克思 致美国总統阿伯拉罕·林肯¹⁷

閣下：

我們為您以大多数票再度当选向美国人民表示祝賀。

如果說您在第一次当选时的适中的口号是反抗奴隶主的权势，那末您在第二次当选时的胜利的战斗号召則是：消灭奴隶制！

自从巨大的搏斗在美国一展开，欧洲的工人就本能地感觉到他們阶级的命运是同星条旗連在一起的。难道引出这段壮烈史詩的領土之爭，不正是要决定，那辽阔无垠的处女地是应当由移民的劳动来享用，还是应当遭受奴隶监工的蹂躪嗎？

当 30 万奴隶主的寡头政权敢于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把“奴隶制”这个詞写在武装叛乱的旗帜上的时候，当大約一百年前最先产生了偉大的民主共和国思想的地方，在宣布了第一个人权宣言¹⁸和最先推动了十八世紀的欧洲革命的地方，反革命接連不断地炫耀它已經取消了“旧宪法确立时代的种种观念”，声称“奴隶制是仁慈的制度，确实是解决劳資关系这一重大問題的老办法”，并无耻地宣布人身所有制是“新大厦的基石”的时候，——在这个时候，欧洲的工人阶级立即了解到（甚至在上层阶级为南部同盟派上流人士进行的狂热袒护向工人阶级发出了可怕的警号以前就已經了解到），奴隶主的叛乱将是一次财产对劳动所进行的普遍的十字軍征

討的信号，在大西洋彼岸进行的这一大规模的战争关系着劳动者的命运，关系着他们对未来的期望，甚至关系着他们已经获得的果实。因此，工人阶级到处耐心忍受着棉业危机¹⁹带给他们的困苦，激烈反对有产者当局竭力想采取的有利于奴隶占有制的干涉行动，——而在欧洲的大多数国家里，工人阶级为了正义的事业已经献出了自己的鲜血。

只要作为北部的真正政治力量的工人竟容许奴隶制玷污自己的共和国，只要他们在那些不问是否同意就被买卖的黑人面前夸耀白人享有自己出卖自己和自己选择主人的高贵特权，那他们就既不能取得真正的劳动自由，也不能支援他们欧洲兄弟的解放斗争；不过，这种进步道路上的障碍现在已被内战的血浪扫荡干净了。

欧洲的工人坚信，正如美国独立战争开创了资产阶级取胜的新纪元一样，美国反对奴隶制的战争将开创工人阶级取胜的新纪元。他们认为，由工人阶级忠诚的儿子阿伯拉罕·林肯来领导自己国家进行解放被奴役种族和改造社会制度的史无前例的战斗，是即将到来的时代的先声。

中央委员会代表国际工人协会签署：

勒·吕贝——法国通讯书记；累布钦斯基（波兰）；艾米尔·霍尔托普（波兰）；让·巴·博凯；海·荣克——瑞士通讯书记；莫里索；乔治·威·威勒尔；茹·德努阿尔；P. 博尔达日；勒鲁；塔朗迪埃；茹尔登；杜邦；罗·格雷；多·拉马；塞塔奇；F. 索鲁斯特里；P. 阿耳多夫兰迪；G. 班尼亚加蒂；朱·方塔纳——

意大利通訊書記； 乔·雷克； 詹·巴克萊；
 乔·豪威耳； 約·奧斯本； J. D. 斯坦斯比；
 約·格羅斯密斯； 格·埃卡留斯； 弗里德里
 希·列斯納； 沃尔弗； 卡·考布； 亨利希·博
 勒特； 路德維希·奧托； N. P. 汉森（丹麦）；
 卡尔·普芬德； 格奥尔格·罗赫納； 彼得·彼
 得逊； 卡尔·馬克思——德國通訊書記； 亚·
 迪克； 魯·沃尔弗； J. 惠特洛克； 詹·卡特；
 W. 摩尔根； 威廉·德尔； 約翰·韦斯頓； 彼
 得·福克斯； 罗伯特·肖； 約翰·朗梅德； 罗
 伯特·亨利·賽德； 威廉·沃尔利； 布莱克莫
 尔； 罗·哈特威耳； W. 皮琴； 本·魯克拉夫
 特； 約·奈阿斯；

乔·奥哲尔——委員會主席；

威廉·朗·克里默——名譽總書記

馬克思写于 1864 年 11 月 22 日

和 29 日之間

載于 1865 年 1 月 7 日“蜂房报”

第 169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賀信原稿譯的，

并根据“蜂房报”校对过

卡·馬克思
致“观察家报”編輯部的信²⁰

1864年11月28日于倫敦哈佛斯托克
小山梅特兰公园路莫丹那別墅1号

編輯先生：

随信附上一份有关卡尔·布林德先生的文件^①，請予刊登。

我还把这个声明以同样的方式——即采取致斯图加特“观察家报”編輯部的信的形式——寄給几家普魯士报纸发表，同时我 ditto [还] 要設法使它在这里的德文报纸上登載出来，因此，我对它完全負責。

尊敬您的 卡·馬克思

載于1864年12月3日
“观察家报”第282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观察家报”

① 見下一篇文章。——編者注

卡·馬克思 致斯图加特“观察家报”編輯²¹

閣下：

卡尔·布林德先生通过自己的冒名頂替者、即布莱得弗德的布朗納医生寄給您的那篇东西是卡尔·布林德先生写的，是为了卡尔·布林德先生的利益并且是关于卡尔·布林德先生的，在这篇滑稽可笑的东西中夹杂着这样一句话：

由于反对福格特的傳单“警告”而引起的那場爭論，是已經“通过全面的解釋而得到解决、但又被編輯部重新搬出来的旧爭論”，“在这里我不想回到那場爭論去”。

他“不想回到那場爭論去”！多么寬宏大量啊！

只要提一提我那本反对福格特的著作²²，就足以证明卡尔·布林德先生的过分自信和虛荣往往使卡尔·布林德先生不得不超出純粹可笑的範圍。您和您的讀者会从布林德的回答中得出結論，即这本著作中对于卡尔·布林德先生的責难已經“通过全面的解釋”而被推翻了。而实际上，通常表現有很大写作癖的卡尔·布林德先生，从我的著作发表以后，即在长达四年的時間內，就从来没有敢提起一个字，更不用說“回到旧的爭論去”和作“全面的解釋”了。

相反，卡尔·布林德先生安于被斥責为“可耻的說謊者”（見我

的著作第 66 頁和第 67 頁²³)。卡尔·布林德先生不止一次地公开声明，他不知道是誰写了反对福格特的傳单，“**他与这件事毫无关系**”等等。此外，卡尔·布林德先生还发表了印刷所主人**菲德利奥·霍林格尔**的证詞，并有排字工**維耶**的另一篇证詞作旁证，证詞說傳单不是在霍林格尔的印刷所印的，而且不是来自卡尔·布林德先生。在我的反对福格特的著作中引用了排字工**費格勒**和同一个**維耶**在倫敦弯街治安法庭上的 *affidavits* (与宣过誓的证詞有同等效力的声明)，他們的 *affidavits* 证明，正是这个卡尔·布林德先生写了傳单的手稿，把它送到霍林格尔的印刷所来印刷，**亲手校对了校样**，而且为了反駁这些事实他还**伪造了假证詞**，他答应以霍林格尔的名义付給这篇假证詞以金錢报酬，并在将来以自己的名义答謝，这样便**騙取了排字工維耶的签名**，最后，他把他所伪造的、上面有他亲自騙到維耶的签名的假文件作为一个充滿义憤的证据寄給奧格斯堡的“总汇报”²⁴ 和其他德国报纸，以此证明我的“**恶意捏造**”。

卡尔·布林德先生在丑行被这样揭穿之后不再吭声了。为什么？因为（見我的著作第 69 頁²⁵）他只能用反 *affidavits* 来反駁我发表的 *affidavits*，但是这样一来，他就得“站在令人害怕的英国法庭上”，在那里“**刑事案件可不是随便鬧着玩的**”。

在上面所說的那篇寄到貴报来的东西中还荒唐地談到**卡尔·布林德**先生在美国的功績。为了說明这个問題，請允許我从我在几天以前收到的**約·魏德迈**的信中摘录一段。大概你还記得，**約·魏德迈**曾經和**奧·呂宁**一起在法兰克福編輯“新德意志报”²⁶，他一直是德国工人党的优秀战士之一。美国内战开始后不久，他就加入了联邦主义者的行列。**弗里芒特**請他到圣路易斯，在

那里他最初是工程部队的地区部队中的上尉，后来是炮兵团的中校；而不久，当敌人的侵犯重新威胁密苏里州的时候，他突然接到組織密苏里志願兵第四十一团的命令，现在他是这个团的团长，軍銜是陸軍上校。魏德迈从他的团的所在地、密苏里州的首府圣路易斯报道說：

“你在附件中可以看到我从这里的‘西邮报’²⁷上剪下的一段，文化强盜卡尔·布林德又在这家报纸上以极端傲慢的姿态夸夸其談，似乎是在代表‘德国的共和派’說話。誠然，这里的人們对于他怎样曲解拉薩尔的意图和鼓动相当冷淡：誰讀了拉薩尔的著作，誰才知道应当怎样对待布林德的小丑行为；但是誰不會花費力气去多少了解一下拉薩尔的鼓动，誰就可能輕信地贊揚这个偉大的巴登人、par excellence〔最道地的〕陰謀家、所有秘密团体和未来临时政府的成員的聰明和‘信念的坚定’；他的見解沒有任何意义。而且这里的人現在过分忙于其他事情，因而无暇过問布林德的抗議。但是在故乡无疑地应当狠狠地教訓一下这个妄自尊大的小丑。因此我才把这篇文章寄給你，这只是他以前所写的同类作品中的一个例子。”

約·魏德迈寄給我的那篇从“西邮报”上剪下的文章的标题是“共和派的抗議，1864年9月17日于倫敦”，它是“共和派的抗議”的美国版；又是这同一个卡尔·布林德先生曾經在同一个时候把它用同一个标题刊登在“新法兰克福报”²⁸上，然后以他所固有的螞蟻般的勤劳把它作为轉自“新法兰克福报”的稿件寄給了倫敦的报纸“海尔曼”²⁹。

把布林德的拙劣作品的两个版本加以比較，就可以看出，正是那个在法兰克福和倫敦以忠实的共和派卡托的伤心神色提出抗議的卡尔·布林德先生，在同一个时候在遙远的圣路易斯却肆无忌惮地說出最恶毒的蠢話和进行最无耻的勾当。如果把抗議书的两个版本加以比較（在这里不便于做这样的比較），那末，除此以外，

还可以提供一些新的非常可笑的材料，来弄清布林德伪造信件、通告、抨击性文章、抗議书、警告、辯护文章、号召书、呼吁书以及諸如此类的严肃庄重的政治药方的手法；他离不了这些手法，正像离不了霍洛威先生的药丸或霍夫先生的麦芽精一样。

我不打算向这个除了自己的影子以外一无所有的荒唐的馬志尼-斯嘉本^①說明拉薩尔这样一个人的作用，以及他的鼓动的真正意图。相反，我深信，卡尔·布林德先生凌辱一只死獅，仅仅是执行大自然和伊索赋予他的使命³⁰。

卡尔·馬克思

1864年11月28日于倫敦梅特兰
公园路莫丹那別墅1号

載于1864年12月10日
“北极星”报第287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馬克思夫人燕妮·
馬克思轉抄的并經過作者校
正的手稿副本譯的

① 在“北极星”报上印的不是《*einem grotesken Mazzini-Scapin*》（“荒唐的馬志尼-斯嘉本”），而是《*einem grotesken Clown*》（荒唐的小丑）。——編者注

卡·馬克思 論蒲魯東

(給約·巴·施韋澤的信)³¹

1865年1月24日于倫敦

閣下：

我昨天接到您的信，您在信中要我对蒲魯東作一个詳細的評价。由于時間不够，不能滿足您的願望。此外，我手头沒有他的任何一本著作。但是，为了向您表明我的良好願望，我匆忙地写了一个簡短的概要。以后您可以对它加以充实、补充、删节，总之，您可以随意处理。^①

蒲魯東最初的試笔作品，我已經記不起来了。他那部論“世界語言”³²的幼稚著作，表明他是多么狂妄地敢于解决那些由于缺少最基本的知識而不能解决的問題。

他的第一部著作“什么是財產？”³³无疑是他最好的著作。这一著作如果不是由于內容新穎，至少是由于論述旧东西的那种新的和大胆的风格而起了划时代的作用。在他所知道的法国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著作中，*«propriété»* [“財產”] 当然不仅受到各式各样的批判，而且也空想地被“廢除”了。蒲魯東在他那部著

① 我們认为最好原信照登，不做任何改动。（“社会民主党人报”編輯部注）

作中对圣西門和傅立叶的关系，大致就像費尔巴哈对黑格尔的关系一样。和黑格尔比起来，費尔巴哈是极其貧乏的。但是，他在黑格尔以后起了划时代的作用，因为他強調了为基督教意識所厌恶而对于批判的发展却很重要的某几个論点，而这些論点是被黑格尔留置在神秘的 *clair-obscur* [朦朧状态] 中的。

在蒲魯东的这一著作中，風格方面的强健的筋肉还占优势，——如果可以这样說的話。而且我认为这种風格是这一著作的主要优点。可以看出，蒲魯东甚至把他仅仅重复旧东西的地方也看做独立的发现；他所說的东西，对他自己說来都是新东西而且是被他当做新东西看待的。向經济学中“最神圣的东西”进攻的挑战性的勇气，用来嘲笑庸俗的资产阶級理性的机智的怪論，致命的批判，刻薄的諷刺，对現存制度的丑恶不时流露出来的深刻而真实的激憤，革命的眞誠——“什么是财产？”就是以所有这些特性激动了讀者，并在初次出版时留下了强烈印象的。在政治經济学的严格科学的历史中，这本书几乎是不值得一提的。但是，这种聳人听聞的著作在科学中也像在小說文学中一样起着自己的作用。以馬尔薩斯的著作“人口論”³⁴ 为例。初版时，它不过是一种 *sensational pamphlet* [“聳人听聞的小册子”]，此外，从头到尾都是剽窃。然而，这本詆毀人类的誹謗书曾留下了多么强烈的印象呵！

假如我手头有蒲魯东的这本书，那我就可以輕而易举地用几个例子來說明他早期的手法。在他自己认为是最重要的几节里，他模仿康德(康德是他当时从翻譯中知道的唯一的德国哲学家)对二律背反的处理，并且給人造成一种强烈的印象：和康德一样，对他來說，解决二律背反是人类理性“彼岸”的事情，即他自己的理性所不清楚的事情。

但是，不管表面上如何轰轰烈烈，在“什么是财产？”中已經可以看到一个矛盾：蒲魯东一方面以法国小农的（后来是 *petit bourgeois* [小资产者] 的）立場和眼光来批判社会，另一方面他又用他从社会主义者那里借来的尺度来衡量社会。

这本书的缺点在它的标题上就已經表現出来了。問題提得非常錯誤，甚至无法給它一个正确的回答。古代的“财产关系”在封建的财产关系中沒落了，封建的财产关系又在“资产阶级的”财产关系中沒落了。这样，历史本身就已經对过去的财产关系进行了批判。蒲魯东实际上所談的是現存的現代资产阶级财产。这是什么财产？——对这一問題，只能通过批判地分析“政治经济学”来給予答复，政治经济学不是把财产关系的总和从它們的法律表現上即作为意志关系包括起来，而是从它們的現实形态即作为生产关系包括起来。但是，由于蒲魯东把这些經濟关系的总和同“财产” *«la propriété»* 这个一般的法律概念糾纏在一起，他也就不能超出布里索早在 1789 年以前在类似的著作³⁵ 中用同样的話所作的回答：*«La propriété c'est le vol»* [“财产就是盗窃”]。

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从这里得出結論說，“盗窃”这个资产阶级法律概念也适用于资产者本人的“誠实的”收入。另一方面，由于“盗窃”作为对财产的暴力侵犯，是以财产为前提的，所以蒲魯东就糾纏在連他自己也模模糊糊的关于真正资产阶级财产的种种幻想里面。

1844 年，我居住在巴黎的时候，曾經和蒲魯东有过私人的交往。我在这里提起这件事，是因为我对他的 *«sophistication»*^①（英

① *«Sophistication»* 有“掺假”和“詭辯”两种意思。——譯者注

国人这样称呼伪造商品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也有一部分責任。在長時間的、往往是整夜的爭論中,我使他感染了黑格尔主义,这对他是非常有害的,因为他不懂德文,不能認真地研究黑格尔主义。我被逐出巴黎之后,卡尔·格律恩先生繼續了由我开始的事情。他作为德国哲学的教师,还有一个胜过我的地方,就是他自己一点也不懂德国哲学。

在蒲魯東的第二部重要著作“**貧困的哲学……**”³⁶出版前不久,他自己在一封很詳細的信中把这本书的內容告訴了我,信中附帶說了这样一句話:«*J'attends votre férule critique*»〔“我等待着您的严格的批評”〕。不久以后,我果然对他进行了这样的批評(通过我的著作“**哲学的貧困……**”1847年巴黎版³⁷),其形式的激烈竟使我們的友誼永远結束了。

从这里所說的您可以看出,蒲魯東的“**貧困的哲学或經濟矛盾的体系**”才第一次真正包含了对“**什么是財產?**”这个問題的回答。实际上,他只是在第一部著作出版以后才开始研究經濟学;他發現,他提出的問題不能用咒罵来回答,而只能通过对現代“**政治經濟学**”的分析来回答。同时,他还企图辯证地說明經濟范疇的体系。康德的无法解决的“**二律背反**”現在必須用黑格尔的“**矛盾**”作为闡述方法来代替了。

为了評價他的两卷厚厚的著作,我不得不介紹您看一下我的那部反駁他的著作。在那里,我順便指出了,由于他不是把經濟范疇看做历史的、与物质生产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理論表現,而是荒謬地把它看做历来存在的、永恒的观念,这就表明他对科学辯证法的秘密了解得多么肤淺,另一方面又是多么贊同思辨哲学的幻想,而且,他是如何拐弯抹角地又回到資產階級經

济学的立場上去①。

其次，我还指出，他对他所批判的“政治经济学”的認識是多么不够，有时甚至是幼稚的；他同空想主义者一起追求一种所謂“科学”，以为由此就可以 a priori [先驗地] 构想出一个“解决社会問題”的公式，而不从历史运动的批判的認識中，即不从本身就产生了解放的物质条件的运动的批判的認識中引导出科学。我特別指出，蒲魯东对整个問題的基础——交换价值的理解始終是模糊、錯誤和不彻底的，他还錯誤地把对李嘉图的价值理論的空想主义的解釋看成一种新科学的基础。关于他的一般观点，我是用以下的話概述我的判断的：

“每一种經濟关系都有其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只有在这一点上蒲魯东先生沒有背叛自己。他认为，好的方面由經濟学家来揭示，坏的方面由社会主义者来揭发。他从經濟学家那里借用了永恒經濟关系的必然性这一看法；从社会主义者那里借用了使他們在貧困中只看到貧困的那种錯觉（而不是在貧困中看到将会推翻旧社会的革命的、破坏的一面②）。他对两者都表示贊成，企图拿科学权威当靠山。而科学在他的观念里已成为某种微不足道的科学公式了；他无休止地追逐公式。正因为如此，蒲魯东先生自以为他既批判了政治经济学，也批判了共产主义；其实他远在这两者之下。說他在經濟学家之下，因为他作为一个哲学家，自以为有了神

① “經濟学家所以說現存的关系（資產階級生产关系）是天然的，是想以此說明，这些关系正是使生产财富和发展生产力得以按照自然規律进行的那些关系。因此，这些关系是不受時間影响的自然規律。这是应当永远支配社会的永恒規律。于是，以前是有历史的，現在再沒有历史了。”（見我的著作第113頁³⁸）

② 括弧中的這句話是馬克思在本文中加上去的。——編者注

秘的公式就用不着深入純經濟的細節；說他在社會主義者之下，因為他既缺乏勇氣，也沒有遠見，不能超出（哪怕是思辨地也好）資產者的眼界……

他希望充當科學泰斗，凌駕於資產者和無產者之上，結果只是一個小資產者，經常在資本和勞動、政治經濟學和共產主義之間搖來擺去。”^①

上面這個判決儘管非常嚴厲，我現在仍然擔保每個字都是正確的。但是，同時也不要忘記，當我把蒲魯東的這本書稱作 *petit bourgeois* [小資產者] 社會主義的法典，並從理論上證明了這一點時，政治經濟學家 and 社會主義者還同時把蒲魯東當做極端的革命者加以詛咒。因此，後來我也從來沒有同意過那種說他“背叛”了革命的叫囂。如果說他（他一開始就被別人和自己所誤解）辜負了毫無根據的期望，那末這並不是他的過錯。

同“什麼是財產？”相比，在“貧困的哲學”中，蒲魯東的一切表現方法上的缺點都非常不利地顯示出來了。文筆往往如法國人所說的那樣，是 *ampoulé* [誇張] 的。凡是失去了高盧人的敏銳智慧的地方，冒充德國哲學風格的那種傲慢的思辨的胡言亂語就表現出來了。自矜自夸的、自吹自擂的、大言不慚的語調，特別是極其無聊地胡扯“科學”和錯誤地以“科學”自夸，這類東西真是刺耳極了。充滿了他的第一部著作的真實的熱情，在這裡，在某些地方都已經系統地被虛浮的狂熱代替了。此外，這是自學者炫耀自己學問的極為笨拙而令人討厭的伎倆，這個自學者對自己的獨創思想的那種天生的自豪感已經被挫傷，他作為科學的 *parvenu* [暴发

^① 見我的著作第 119、120 頁³⁹。

戶),觉得必須以自己所沒有的身分和东西来炫耀一番。加之,这还是小資产者的心理,这个小資产者粗暴无礼地——既不尖銳又不深刻,甚至还不正确——攻击卡貝这样一个由于对法国无产階級所采取的实际态度而受到尊敬的人⁴⁰,而对于例如像杜諾瓦耶(無論怎么說,他是“国务参事”)这样一个人却表現得謙恭異常,虽然这个杜諾瓦耶的全部重要性在于,他認真得可笑地用三厚本无聊不堪的书⁴¹来宣傳被爱尔維修描繪为《*On veut que les malheureux soient parfaits*》(向不幸者要求完美)的严肃主义。

二月革命对蒲魯东來說的确来得非常不是时候,因为正好在几星期前他还不容爭辯地证明說,“革命的紀元”已經一去不复返了。他在国民議會中的演說,虽然表明他对当前的情况很少了解,但仍然是值得极力称赞的⁴²。在六月起义以后,这是一个非常勇敢的行动。此外,他的演說还有一个良好的結果,这就是梯也尔先生在反对蒲魯东提案的演說⁴³(后来出了单行本)中向整个欧洲证明了,法国資产階級的这个精神支柱是建立在多么可怜而幼稚的教义問答的基础上。同梯也尔先生相比,蒲魯东的确成了洪水泛濫前的龐然巨物了。

发明《*crédit gratuit*》〔“无息信貸”〕和以这种信貸为基础的“人民銀行”(《*banque du peuple*》)是蒲魯东先生在經济学上的最后的“功績”。在我的著作“政治經济学批判”1859年柏林版第1分册(第59—64頁⁴⁴)中已經证明,他的观点的理論基础产生于对資产階級“政治經济学”中的基本要素即商品对貨币的关系的誤解,而实际的上层建筑不过是更老得多和制定得更好得多的方案的翻版而已。信貸制度,正像它在十八世紀初以及后来又在十九世紀初在英国促进了財產从一个階級手中轉到另一个階級手中一

样，在一定的經濟和政治条件下能加速工人階級的解放，这是毫無疑問的，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想把生息資本看做資本的主要形式，并且想把信貸制度的特殊应用和利息的表面的廢除变为社会改造的基础，这就完全是小市民的幻想了。由此我們可以看到，这种幻想实际上已經由十七世紀英国小資產階級的經濟学上的代言人詳細發揮过了。蒲魯東和巴师夏关于生息資本的論战（1850年）⁴⁵又远不如“貧困的哲学”。他竟弄到甚至让巴师夏击败的地步，而当他的論敌对他施展威力的时候，他就可笑地发出了怪声。

几年前蒲魯東写了一篇論“租稅”⁴⁶的应征論文（我記得是洛桑政府征求的）。在这里，連天才的最后一点痕迹也消失了。剩下的只是 *petit bourgeois tout pur* [一个地地道道的小資產者]。

至于談到蒲魯東的政治和哲学著作，那末所有这些著作都像經濟学著作一样，也暴露出矛盾的、双重的性质。同时，它們的价值只是地方性的，即只限于法国。但是，他对宗教、教会等等的攻击在当时法国的条件下对本国來說是一个巨大的功績，因为那时法国的社会主义者都认为，信仰宗教是他們优越于十八世紀的資產階級伏尔泰主义和十九世紀的德国无神論的地方。如果說，彼得大帝用野蛮制服了俄国的野蛮，那末，蒲魯東就是尽了最大的努力用空談来战胜法国的空談。

他那本关于“政变”⁴⁷的著作应当认为不仅是一部坏的著作，而且簡直是卑鄙，然而却是适合小資產階級观点的卑鄙，他在这里向路易·波拿巴献媚，实际上是竭力把他弄成适合法国工人口味的人物，他那篇反对波兰的最后的著作⁴⁸也是一样，在这里他为了迎合沙皇而表現了愚蠢的厚顏无耻。

人們常常拿蒲魯東和卢梭相比。沒有比这更錯誤的了。他更

像尼·兰盖,不过兰盖的“民法論”⁴⁹是一部很有天才的著作。

蒲魯东是天生地倾向于辯证法的。但是他从来也不懂得真正科学的辯证法,所以他陷入了詭辯的泥坑。实际上这是和他的小资产阶级观点有联系的。小资产者像历史学家劳麦一样,是由“一方面”和“另一方面”构成的。他在自己的經濟利益上是如此,因而在自己的政治上、在自己的宗教观点、科学观点和艺术观点上也是如此。他在自己的道德上是如此, in everything [在一切事情上]都是如此。他是活生生的矛盾。如果他同时还像蒲魯东一样是个有才智的人,那末他很快就会学会玩弄他本身的矛盾,并且根据具体情况把这些矛盾变成出人意外的、大吹大擂的、时而丑恶、时而輝煌的怪論。科学上的招搖撞騙和政治上的投机,都是和这种观点分不开的。对这种人來說,只有一种动力,那就是虛荣心,像一切爱虛荣的人一样,他們所关心的只是眼前的成功、一时的風头。这样,那种例如使卢梭不断避免向現存政权作任何即使是表面上的妥协的简单的道德感,就必然消失了。

也許后人在評論法国历史中最近这一阶段时会說,路易·波拿巴是这一阶段的拿破侖,而蒲魯东是这一阶段的卢梭兼伏尔泰。

这个人剛死不久,您就硬要我来为他作盖棺論定,那末这件事就要由您自己負責了。

尊敬您的 卡尔·馬克思

写于1865年1月24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1865年2月1、3和5日
“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6、17
和18号

俄文譯自“社会民主党人报”,
并根据殘存的手稿校对过

弗·恩格斯 提德曼老爷

古代丹麦民歌⁵⁰

清晨——天色刚刚发亮，——
提德曼老爷就在卧室里穿衣裳，
他穿了一件漂亮的衬衣。

南哈尔德人喜欢这样。

他穿了一件漂亮的衬衣，
又披上绿色的丝绸外衣，
再系好山羊皮靴的带子。

南哈尔德人喜欢这样。

再系好山羊皮靴的带子，
又扣紧镀金的马刺，
他高傲地到南哈尔德去出席司法会议。

南哈尔德人喜欢这样。

他高傲地到南哈尔德去出席司法会议，
一进场就向自由农讨税，

每張犁要繳黑麥七斗。

南哈爾德人喜歡這樣。

每張犁要繳黑麥七斗，

每四頭豬要繳一頭還得是肥的，

這就激怒了一位老人。

南哈爾德人喜歡這樣。

這就激怒了一位老人：

“我們誰也繳不出這樣多捐稅，

要繳，咱們先得算算賬，”——

南哈爾德人喜歡這樣。

“要繳，咱們先得算算賬，

任何人都不得離開會場！

南哈爾德人，緊緊地圍起來！”

南哈爾德人喜歡這樣。

“南哈爾德人，緊緊地圍起來！

不要讓提德曼活着跑掉！”

老人第一個上去給了他一拳，——

南哈爾德人喜歡這樣。

老人第一個上去給了他一拳，

提德曼老爺猛地栽了一個跟頭，

提德曼老爷躺在那里血流满地。

南哈尔德人喜欢这样。

提德曼老爷躺在那里血流满地，
而犁耙自由地在黑土上走来走去，
猪也自由地在森林里吃东西。

南哈尔德人喜欢这样。

中世紀农民战争中的这一段插曲发生在日德兰半島奥尔胡斯城北的南哈尔德（“哈尔德”（Harde）——司法区）。在区的司法會議（Thing）上除了审理司法案件外，也审理稅务的和行政的案件。这首民歌告訴我們，日益强大的貴族怎样反对自由农（Edeling），以及农民通过哪些手段結束了貴族的勒索。这首富有朝气的古代农民歌曲对于德国这样的国家非常适合，因为在德国，有产階級中封建貴族和資产階級一样多；无产階級中农业无产者和工业工人也一样多，或者甚至还要多些。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写于1865年1月27日左右

原文是德文

載于1865年2月5日“社会
民主党人报”第18号

俄文譯自“社会民主党人报”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 致“社会民主党人报”編輯部

声 明⁵¹

在貴报第 16 号上,莫·赫斯先生竟从巴黎对他完全不相識的国际工人协会倫敦中央委員会的法国委員們乱加怀疑,他說:

“的确看不出,即使倫敦的协会也有罗亚尔宮⁵²的一些朋友参加,这又有什么关系,因为协会是公开的,云云。”

在过去的一号上,这位莫·赫斯先生在談論“联合”杂志⁵³时,就曾經对倫敦委員会的巴黎朋友作了类似的誹謗。我們宣布他的誹謗完全是造謠中伤。

不过,使我們感到高兴的是,这个事件证实了我們的信念:巴黎的无产阶级还像过去一样毫不妥协地反对两种形式的波拿巴主义,即土伊勒里宮⁵⁴式的和罗亚尔宮式的;他們从来没有想到为了貪图小便宜而出卖自己的历史荣誉(或者,也許不应当說“自己的历史荣誉”,而应当說“自己的作为革命承担者的历史的长子继承权”吧?)我們把这个榜样介紹給德国工人。

于倫敦和曼彻斯特

卡·馬克思写于 1865 年 2 月 6 日
第一次发表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和卡尔·馬克思 1844 年到 1883 年
通信集” 1913 年斯图加特版第 3 卷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草稿譯的

弗·恩格斯
—
普魯士軍事問題
和
德国工人政党⁵⁵

弗·恩格斯写于 1865 年 1 月底—
2 月 11 日

1865 年 2 月底在汉堡以单行本出版

署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单行本譯的

Die
preussische Militärfrage

und die
deutsche Arbeiterpartei.

Von
Friedrich Engels.

Hamburg.
Otto Meißner.
1865.

弗·恩格斯的小册子“普鲁士军事问题
和德国工人政党”第一版的扉页

关于軍事問題的辯論，迄今只是在一边是政府和封建党派，另一边是自由的激进資產階級之間进行。現在，危机日益迫近，該是工人政党也来发表意見的时候了。

我們只能从現存的实际关系出发来評論这里所談的軍事問題。只要在德国和欧洲还保持着目前的关系，我們便不可能指望普魯士政府的行动不从普魯士的观点出发。我們同样也不能要求資產階級反对派不从自己的資產階級利益的观点出发。

工人政党在所有使反动派和資產階級分裂的問題上都站在直接冲突之外，因此它的优越性在于能够完全冷靜地和公正地討論這些問題。只有工人政党能够科学地、历史地（像对待已經过去的事情那样）解剖式地（像解剖尸体那样）来討論這些問題。

一

关于普魯士軍隊在原先制度下的情况如何，經過 1850 年和 1859 年的动員⁵⁶ 嘗試以后不可能再有两种意見了。从 1815 年起，君主专制受到公开的諾言的約束，它答应不經未来的代議机关事先同意不征收任何新稅，不发行任何公債。要違背這項諾言是不可能的；不經過这种同意，任何公債都不会收到絲毫成效。稅收制度大体上是这样：稅收的进款並沒有按国家財富增长的比例增长。专制制度是貧穷的，是非常貧穷的，1830 年的風暴⁵⁷ 所引起的特別开支足以迫使它厉行節約。正因为这样才开始实行两年制兵役，并在所有軍事管理部門建立節約制度，这一制度使得为进行动員而准备的軍火儲备的数量和质量降到了最低水平。尽管如此，普魯士的大国地位还得保持；要做到这一点，它需要在战争一开始就有尽可能强大的第一类野战軍，这就是为什么把第一类后备軍并入了野战軍⁵⁸。这样一来，人們担心的是，在剛一受到战争威胁时就必須进行动員，而且担心整个大厦会因动員而傾复。这样的事情曾經在 1850 年发生，并以普魯士的慘敗告終。

1850 年只暴露了制度的物质上的缺乏；整个这种情况在精神缺陷显露出来以前就結束了。两个議院表決通过的基金被用来在可能的範圍內消除物质上的缺乏。所以說在可能範圍內，是因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物质方面准备得能够在两星期內就把应征的預备兵装备起来并使他們做好战斗准备，而再过两星期就把

整个第一类后备軍装备起来并使它做好战斗准备。不应忘記，基干部队中最多有三种役齡的适齡人員，而預备队和第一类后备軍中总共有九种。因此，在四个星期內至少要給做好战斗准备的基干部队中的每三个士兵配备七个应征者。正巧发生了 1859 年的意大利战争，于是进行了新的总动员。这一次物质缺乏仍然在很大程度上表現了出来，但是与制度的精神缺陷相比已經是小得多了，这种精神缺陷只是現在，当軍队进行較长時間的动员时才暴露了出来。后备軍絲毫沒有受到重視，这是不容爭辯的；它的步兵营的基干大部分都不存在，这样的基干还有待于建立；現有的軍官中有許多已經不适合于野战勤务。即使情况完全不是这样，事实仍然是：軍官不能不使自己的兵士感到他們完全是外人，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他們自己的軍事素质造成的。他們中間大多数人的軍事素质都非常低，把由这样的軍官指揮的步兵营派去对付經過考驗的軍队是不能令人完全放心的。如果說后备軍的軍官在丹麦战争⁵⁹时打得不錯，那末不应忘記，在基干軍官占 $\frac{4}{5}$ 和后备軍軍官占 $\frac{1}{5}$ 的步兵营同两者比例相反的步兵营之間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此外，还有一个决定性因素。很快就发现，虽然可以用后备軍去作战，即进行保卫自己国家的战争，但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用它去打进攻战，而这是人們能够預料到的事。后备軍在很大程度上是个防御性組織，只有在敌人的入侵被击退的情况下才可能用它去进攻，像在 1814 年和 1815 年那样。后备軍的大部分成員是 26 岁到 32 岁的已婚男子，当每天寄来的家信說，妻子儿女由于发給应征者家屬的补助金非常不足而遭受貧困时，他們是不会同意让自己一連几个月呆在边境上无所事事的。此外，还有以下的情况：兵士不知道他們应当同誰打仗，同法国人还是同奧地利人，要知道，在当时

不論法国人还是奥地利人都沒有使普魯士受到任何損害。能够用这些由于一連数月无事可做而士气沮丧的軍队去进攻組織良好并有作战經驗的軍队嗎？

很明显，早就应当有一个轉变了。普魯士在这样的情况下应当使第一类野战軍拥有比較巩固的組織。这样的組織是怎样形成的呢？

征集的三十六个后备軍步兵团暫時被保留，并被逐漸地改变为新的基干团。騎兵和炮兵的人数也逐漸增加到同步兵部队的这种扩大了編制相适应的程度。最后，要塞炮兵从野战炮兵中分离出来，这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种改进，对普魯士來說更是如此。总而言之，步兵增加了一倍，騎兵和炮兵增加了大約一半。为了維持軍队的这种扩大了編制，曾建議把基干部队的服役期限从五年增加到七年，——三年現役(步兵)，四年在預备队，——相反，把第二类后备軍的兵役义务縮短四年；最后，把每年征集新兵的名額从原先的 40 000 名增加到 63 000 名。可是后备軍却沒有受到任何重視。

步兵营、騎兵連和炮兵連按上述規模进行的扩充，同普魯士人口的增加几乎完全适应，普魯士人口在 1815 年为 1 000 万，到 1861 年已增加到 1 800 万；而由于这个时期普魯士的財富增长得比人口更快，并且由于其他的欧洲大国从 1815 年起都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扩充了自己的軍队，因此軍队的基干部队的这种扩充一点也不过分。同时在所有的兵役負担中，按照計劃只增加最年輕的兵士在預备队中的服役期限，年老的兵士在后备軍中的服役期限則减少一半；第二类后备軍实际上已几乎完全撤銷，因为第一类后备軍現在差不多占据了原先是第二类后备軍的地位。

但是对于这个計劃可以提出如下的反对意見：

普遍义务兵役制——順便提一下，这是在普魯士存在的唯一民主的制度，尽管只是在字面上，——与过去所有的軍事制度相比是一大进步，凡是已經实行了这种制度的地方（即使是不完善的形式），就不可能再长期地把它廢除掉。对于我們目前的軍隊來說只有两个明确的組織原則：或者是募兵制，——但它已經陈旧，只有像在英国这样的特殊場合才可能实行，——或者是普遍义务兵役制。任何征兵制和抽签制⁶⁰都不过是普遍义务兵役制的很不完善的形式。1814年普魯士法律的基本思想是：每个身体合格的国民，在他还能够携带武器的时候，必須亲自保卫国家。这个基本思想显著地高于所有实行征兵制的国家所采取的雇佣代役者的原則，而且这种思想在存在了五十年后，当然就不会成为資產階級进行如法国人所說的“人肉生意”的强烈願望的牺牲品了。

既然普魯士軍事制度是以沒有代役的普遍义务兵役制为基础，那末只有在它的基本原則日益得到实现的情况下，它才能够以自己固有的精神成功地向前发展。現在我們来看一看这方面的情况。

1815年1 000万居民中有40 000人应征，占千分之4。1861年1 800万居民中有63 000人应征，占千分之 $3\frac{1}{2}$ 。可見是后退了一步，虽然这与1859年以前的情况相比是一个进步，那时应征人数只占千分之 $2\frac{2}{9}$ 。如果要重新达到1815年的百分数，就需要征集72 000人。（我們知道，实际上每年参加軍隊的人数接近这个数字，或者甚至超过这个数字。）但是，难道普魯士人民的軍事威力只限于每年从每千个居民中征集四个人嗎？

达姆斯塔德的“軍事总汇报”⁶¹根据德国中部各邦的統計屢次

证明,在应征报到的青年人中整整一半适合服兵役。根据“普鲁士王国统计局杂志”⁶²(1864年3月)的统计,1861年应征报到的青年人共227 005人。这样,每年就可以提供113 500名适合服兵役的新兵。如果我们从这个数字中除去6 500名因公务而暂时不能应征的或道德不合格的人,仍然可以剩下107 000人。为什么他们当中只有63 000人或者最多72 000—75 000人服役呢?

陆军大臣馮·罗昂在1863年议会开会时向众议院的军事委员会报告了关于1861年征兵的材料:

人口总数(1858年登记)	17 758 823	
1861年的20岁的应服兵役者	217 438	
从往年的名单上转移过来的应服兵 役者,关于他们还没有做出最后 的决定	<u>348 364</u>	565 802
其中:		
(1)下落不明者	55 770	
(2)迁居其他地区并且应该在 那个地区应征者	82 216	
(3)没有正当理由而不报到者	10 960	
(4)服役三年的志愿兵	5 025	
(5)有权自愿服役一年者	14 811	
(6)作为宗教界人士而延期服 役或免役者	1 638	
(7)必须在海军中服役者	299	
(8)由于道德不合格而被除名者	596	
(9)由于显著地不合格而被区 委员会免除者	2 489	
(10)由于长期不合格而被区委 委员会免除者	15 238	

(11)編入补充兵 ⁶³ 者:			
(a)經過三次檢驗身高不 滿5英尺者.....	8 998		
(b)經過三次檢驗身高不 滿5英尺1.3英寸者.....	9 553		
(c)經過三次檢驗暂时不 合格者.....	46 761		
(d)經過三次檢驗,由于 家庭情况暫不能服役 者.....	4 213		
(e)經過五次檢驗尙未接 到命令者.....	<u>291</u>	69 816	
(12)除了应征入輜重队者,預 定到輜重队服役者.....		6 774	
(13)延期一年服役者:			
(a)暂时不合格者.....	219 136		
(b)由于家庭情况.....	10 013		
(c)褫夺公民权者和正在 受审者.....	<u>1 087</u>	<u>230 236</u>	<u>495 868</u>
能够应征的.....			69 934
实际上征集到的.....			<u>59 459</u>
尙未接到命令的.....			10 475

尽管这个統計不完善,尽管它在从第1条到第13条的每一条中把1861年的应服兵役的人員同过去两年的适龄人員之中尙未接到命令的人員混淆起来,从而把整个事情弄得模糊不清,但是它仍然包括一些很有价值的供认。

征集到的新兵为59 459名。服役三年的志願兵为5 025人。有权服役一年的为14 811人。众所周知,由于自願服役一年者起不了什么作用,对于他們服役是否合格,檢驗是不大严格的;因此

我們可以假定他們之中至少有一半即 7 400 人實際上加入了軍隊。這是很保守的計算；要知道，那些被推薦服役一年的人，大部分是適于服役的人；而那些顯然不適于服役的人，一般地認為不應當受推薦。我們這裡仍然採用 7 400 這個數字。根據這種計算，1861 年參加軍隊的共有 71 884 人。

我們繼續往下看，作為宗教界人士延期服役或免役者有 1 638 人。為什麼宗教界的先生們不需要服兵役，這是不可理解的。相反，一年的兵役，露天的生活，同外部世界的接觸，對於他們是有益無害的。所以，我們大膽地把他們列入名單；假定那一年的免役者占總數的 $\frac{1}{3}$ ，再假定其中有 $\frac{3}{4}$ 是不合格的，那仍然有 139 人應當列入兵役名單。

18 551 人由於身材不夠高而被免除兵役。我們注意到，他們是被“轉入預備隊”，而不是完全被免除兵役。因此，在戰時他們仍然應當服兵役。他們只是免去了和平時期的閱兵式兵役，因為在這方面他們的外表不夠魁偉。這也就是承認，這些身材矮小的人完全適合於服役，在必要時甚至打算利用他們。這些身材矮小的人能夠成為優秀的兵士這一點，可從法國軍隊得到證明，在法國軍隊中服役的，有些人身高還不足 4 英尺 8 英寸。所以我們無條件地把他們列入國家的軍事資源。上面所舉的那個數字只包括那些經過三次檢驗由於身材不高而被完全取消資格的人；因此這是每年都重複出現的數字。我們從這個數字中扣除一半、即扣除由於其他原因不合格的人，這樣還剩下 9 275 個身材矮的青年，一個有經驗的軍官也許會很快地把他們變成頂呱呱的兵士。

接着我們看到，除了应征入輜重隊者，有 6 774 人預定到輜重隊服役。但是輜重隊也屬於軍隊，十分令人不解，為什麼這些人不

应当到輜重队去履行短短六个月的兵役，这不仅对于他們，而且对于輜重队都会更好一些。

因此，我們看到：

实际上服役的人·····	71 884
宗教界人士·····	139
适合服役，但身高在規定的高度以下的人 ·····	9 275
預定到輜重队的人·····	6 774

共 計····· 88 072 人，

根据罗昂的統計表的自供，如果认真地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每年能有这么多人参加軍隊。

現在我們来看看不合格的人：

由于暂时不合格而延期一年服役者·····	219 136 人
經過三次檢驗，如 ditto〔上面所述〕，	
被編入預备队者·····	46 761 人
由于长期不合格而被除名者只有·····	17 727 人

共 計·····283 624 人

因此，由于真正的生理缺陷而长期不合格者不到所有由于不合格而免服兵役者的 7%，并且不到所有每年到征兵委员会报到者的 4%。有将近 17% 經過三次檢驗而暂时不合格者每年被編入預备队。可見这是些 23 岁的人，也就是說他們正处在人的机体开始彻底发育成熟的年齡。如果我們假定他們之中有三分之一在年滿 25 岁以后完全适合服役，那是一点也不誇張的，而这将有 15 587 人。可以向这些人提出一項最低的要求，即在两年过程中要他們每年在步兵中服役三个月，以便使他們至少可以受到新兵的訓練。这就等于把和平时期的軍隊扩充 3 897 人。

但是普魯士的整个新兵体格檢查制度具有特殊的性质。新兵的人数往往多于能够征集的数目，同时却仍然要保持普遍义务兵役制的招牌。从綽綽有余的人数中挑选最优秀的，而以这种或那种借口宣布其他人不合格，还能有什么做法比这样一种做法更简单呢？在这样的条件下——順便說說，这些条件从 1815 年就在普魯士存在并且直到今天还存在——服役不合格的概念得到了非常不确定的解釋，这一点最好由同德国中部各邦的比較来证明。在中部各邦中有些邦实行征兵制和抽签制，在那里沒有任何理由宣布比真正不合格的人更多的人不合格。这些邦的条件像普魯士的条件一样；在个别的邦，例如在薩克森，条件甚至更坏一些，因为那里工业人口的比例較高。但是，上面已經說过，“軍事总汇报”屡次证明，在德国中部各邦整整一半应征报到的人是合格的；在普魯士情况也应当如此。一旦发生严重的战争，在普魯士关于服役合格的概念中就会发生突然的革命，那时人們就会懂得（不幸已經太迟了），很多合格的人被放过去了。

但是最令人奇怪的是，在 565 802 名应服兵役者（关于他們还没有做出决定）中有：

下落不明者·····	55 770 人
迁居其他地区或者應該在那个地区应征者·····	82 216 人
沒有正当理由而不报到者·····	10 960 人
<hr/>	
共 計·····	148 946 人

因此，尽管有一个享有声誉的普魯士檢查机关，——凡是普魯士的有过服兵役义务的人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每年都有整整 27% 的应服兵役的人不見了。怎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那 82 216 个作为“迁居其他地区或者應該在那个地区应征”而被除

名的人到哪里去了呢？难道現在只要从柏林迁到波茨坦就能免除兵役嗎？我們願意认为，在这里——要知道，荷馬也有睡糊塗的时候——官老爷們干脆是在自己的統計中出了錯誤，他們让这 82 216 人在总人数 565 802 中出現了两次：一次在他們出生的地区，一次在他們迁居的地区。應該把这点弄清楚，——最好能由議会的軍事委员会来做这件事，——因为把应服兵役者的实际人数减少到 483 586 人就会显著地改变所有百分比。但是我們暫且假定这是对的，那末每年仍然有 66 730 人悄悄地溜走，不論普魯士检查机关还是警察当局都不能召他們去服兵役。这些人几乎占应服兵役者的 14%。由此得出結論，在普魯士借口检查应服兵役者而对迁居自由設下的一切障碍都是完全多余的。大家知道，真正从普魯士迁居国外的人是为数很少的，根本不能同溜走的新兵人数相比。在这个数字——約 67 000 人——中远远不是所有的人都从普魯士迁到国外去了。大部分人或者一直留在国内，或者只是短期地到国外去。总的說来，所有預防逃避兵役的措施都是毫无用处的，甚至有时还会促使人們迁往国外。但是絕大多数青年人沒有可能跑到国外去。只要认真地、毫不放松地迫使那些逃避兵役的人服兵役，新兵的人数就会比以前多，根本不需要这些杂乱无章的繁文縟节。

但是为了有充分的把握，我們只把馮·罗昂先生本人統計的数字当做可靠的材料，即除了自願服役一年者以外，每年可以征集 85 000 个青年人。目前和平时期軍隊的人数約为 210 000 人。在实行两年制兵役的情况下，每年 85 000 人，两年累計是 170 000 人；还应当把軍官、士官和超期服役軍人——約 25 000 人到 35 000 人——加进来；这样，总共是 195 000 人到 205 000 人；若把

自願服役一年者計算在內，总共是 202 000 人到 212 000 人。因此，如果在步兵、步炮兵中（騎兵下面再說）实行两年制兵役，改組后的軍队的所有基干——甚至根据政府自己的統計——有可能达到和平时期的滿員。在真正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的情況下，在两年制兵役的情況下，軍队中大概会多出 30 000 人来；因此，为了使人数不超过 200 000 人到 210 000 人，有可能使一部分人在服役一年到一年半后就退役。这种作为对热心服役的奖励而提前退役的做法，对于整个軍队來說，也許要比把兵役期延长六个月更有好处。

軍队战时員額的构成大致如下：

四种役齡的适齡人員——按改組計劃，每种 63 000 人——总共是 252 000 名預备兵。三种役齡的适齡人員——每种 85 000 人——总共是 255 000 名預备兵。可見，其結果确实同改組計劃所規定的同样良好。（因为这里所談的只是数字关系，因此，即使我們完全不去考虑减少預备队的役齡类别，情形还是一样。）

改組計劃的弱点就在这里。它表面上是要回到原来的普遍义务兵役制，——不言而喻，这种制度沒有作为軍队的强大預备队的后备軍是不可能存在的，——实际上却倒向了法奥基干制⁶⁴，从而使普魯士的軍事制度动搖不定，这将招致最严重的后果。不要把两种制度混在一起，不能同时兼有两者的优点。毫無疑問，而且不容爭辯，兵役期和現役期較长的基干制能保证軍队在战争开始时具有很大优越性。人們彼此比較了解；甚至那些每次多半只能得到短期归休的归休兵，在整个归休期間都以兵士自居，并且时刻准备服現役（普魯士的預备兵却不是这样）；因此，毫無疑問，初次参加战斗的步兵营就表现出更为坚韧不拔的精神。但是应当对此提

出不同的意見：如果认为这是最重要的，那末可以同样成功地采取英国的十年現役制；对法国人來說，他們的阿尔及利亚远征、克里木战争和意大利战争⁶⁵确实比长期兵役更有效的多；最后，采取这种制度只能訓練出一部分能携带武器的人，因而远远沒有把国家的全部力量調动起来。此外，經驗证明，德国兵士很容易习惯战斗环境，三次相当成功的大会战，給在其他方面都很良好的步兵营已經带来等于多服整整一年兵役所能得到的成果。对于普魯士这样的国家來說，基于制是不行的。如果实行这样的制度，普魯士可能拥有一支最多 300 000—400 000 人的军队，而在和平时期军队的編制将是 200 000 人。但是为了維持它的大国地位，单是第一类野战军的出征就已經需要这么多的军队，也就是說，为了进行任何严酷的战争，它需要有包括要塞守备部队、补充部队等在內的 500 000—600 000 人。如果 1 800 万普魯士人也像 3 500 万法国人、3 400 万奥地利人和 6 000 万俄国人那样，在战争时要派出如此大量的军队，那末这只有通过普遍义务兵役制，通过期限短的但是紧张的服役和比較长期的后备军兵役才能办到。在这样的制度下往往不得不在军队的战斗准备方面，甚至在战争初期军队的战斗力方面，作出某些牺牲；国家和政策具有中立的、防御的性质；但是也应当記住，基于制的傲慢的进攻战术所带来的結果是从耶拿到提尔西特，而后备军制和普遍义务兵役制的謙虛的防御战术所带来的結果則是从卡茨巴赫到巴黎。⁶⁶ 总之，或者是七八年兵役期的征兵制和代役制，在这段时间中約有一半的时间服現役，而不繼續在后备军中服役；或者是五年、最多六年兵役期的普遍义务兵役制，在这段时间中两年服現役，然后繼續在普魯士型的或瑞士型的后备军⁶⁷中服役。但是要想让人民群众首先承担征兵制的重担，

然后再承担后备軍制的重担，这是任何一个欧洲民族都忍受不住的，甚至連野蛮好战、仍然具有极大忍耐力的土耳其人也忍受不住。問題在于，是实行短期現役和长期預备役訓練大批的人，还是实行长期現役和短期預备役訓練少数人；必須二者擇一。

在威廉·納皮尔看来，当然英国兵士是世界上第一流的，他在自己的比利牛斯半島战争史⁶⁸中說，英国步兵服役三年之后，在各方面都受到了充分的訓練。可是应当知道，本世紀初英国軍队的成員是所有通常能够构成一支軍队的成員中最劣等的人。現在英国軍队的成員已經好得多，但是他們在道德和智力方面仍然远远不如普魯士軍队的成員。难道在普魯士这样一个拥有非常容易接受訓練、一部分已經受到很好訓練、从一开始就有良好道德修养的新兵材料的国家里，不能在两年期間达到英国軍官在三年期間訓練这样一些敗类时所能达到的成績嗎？

当然，現在兵士应当受更多的訓練。但是这种情况从来都沒有被当做重大的理由来反对两年制兵役。人們总是說必須培养**真正的兵士精神**，而这种精神据說只有在第三年兵役期間才能养成。如果这些先生願意說得坦率一些，如果他們不想考虑各个步兵营的上述公认的优良素质，那末与其說这种看法具有軍事性质，不如說它具有政治性质。真正的兵士精神应当更多地表現在对付內部的杜佩尔⁶⁹，而不是表現在对付外部的杜佩尔。我們从来沒有机会看到，普魯士兵士在第三年兵役期間除了学会厌倦生活、勒索新兵的錢买酒以及对自己的长官說些无聊的俏皮話以外还学会了点别的什么。如果我們的大多数軍官哪怕去当一年兵士或士官，他們就不能看不到这一点。經驗证明，带有政治性质的“真正的兵士精神”很快就会化为烏有，而且是一去不复返。而軍人精神在两年

兵役之后仍然存在。

可見，兩年的時間足以教會我們的兵士在步兵中服役。自從野戰炮兵和要塞炮兵分開以後，步炮兵的情況也是這樣；可以通過更大的分工，或者通過本來所希望的簡化野戰炮兵的器材來克服這裡所能遇到的各種困難。同樣，征集更多的超期服役軍人也不會有什麼困難；但是正是這類人，如果他們不勝任士官的職務，在普魯士軍隊中最不受歡迎。這真是反對長期兵役的一個好證據！只有在擁有各種各樣的器材的要塞炮兵中，在具有彼此不能完全分開的各種工作部門的工程部隊中，有經驗的超期服役軍人才是受重視的，儘管這樣的人在這裡也是少見的。騎炮兵需要有和騎兵相同的兵役期。

至於騎兵，凡是從小就習慣騎馬的人，只需要短期服役，而從頭受訓練的人，就必須長期服役。在我們這裡很少有人從小就習慣於騎馬，所以改組計劃中規定的四年兵役期對我們來說無疑是需要的。對騎兵來說唯一真正的戰鬥形式是亮出馬刀在密集的隊形中衝鋒；要進行這樣的衝鋒，必需有最大的勇氣和人們彼此間的完全信任。因此，人們應當知道，他們可以彼此信賴，也可以信賴自己的指揮官。而要做到這一點，就需要長期的服役。如果騎者對於他所騎的馬缺乏信心，那末這樣的騎兵隊也是完全要不得的。人必須善於騎馬，而為了使人相信他自己能駕馭馬匹，也就是說幾乎能駕馭可能分給他的任何馬匹，同樣也需要長期的服役。對於這類部隊來說超期服役軍人無疑是受歡迎的，他們愈成為真正的僱傭兵愈好，只要他們喜愛這個職業。反對派將責難我們說，這意味著建立一支由清一色的、準備參加任何政變的僱傭兵組成的騎兵隊。我們回答說：可能是這樣。但是在現有的條件下騎兵將始

終是反动的(我們可以回忆一下 1849 年的巴登龙騎兵⁷⁰)，正如炮兵將始終是自由主义的。这是事物的本性所决定的。事情不会由于超期服役軍人更多一些或者更少一些而有任何改变。况且在街垒战中騎兵無論如何是不适合的，而大城市中的街垒战，特别是步兵和炮兵在这种战斗中的行动，在目前决定着一切政变的命运。

但是除了增加超期服役軍人的数目以外，在实行短期兵役时还可以采用其他一些手段来提高軍队的战斗力和加强内部的团結。例如訓練兵营就是这样的一种手段，陸軍大臣馮·罗昂本人就曾經把訓練兵营称做补救短期兵役的一种手段。其次是合理地进行訓練，在这方面普魯士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做。有一种偏見，认为在实行短期兵役时，为了弥补其短暫性，有必要強調閱兵行进中的夸張的准确性，在操练时实行“机械式教练”，把腿举得高得引人发笑，“膝盖不打弯地”踢向半空中，——这整套偏見是以明显的夸張为根据的。普魯士軍队中一直在空談这一切的必要性，直到它們最終变成无庸置疑的原理为止。但是，士兵在操枪时如此用力地用枪撞击自己的肩膀，以至于几乎跌倒，而且在整个队伍中发生了一种在任何其他軍队中所看不到的极不威武的战栗；这样做有什么益处呢？最后，应当认为对青年进行良好的体育訓練是弥补縮短兵役期的一种手段，而且是最重要的手段。只是必須注意，要在这方面真正做出成績来。不錯，在所有的乡村学校中都設備了双杠和单杠，但是我們可怜的学校教師們还不大会使用它們。最好在每一个专区指派哪怕一个适合担任体育教师工作的退伍士官，并且委派他来領導体育訓練；要注意使青年学生逐漸学会列队行进，掌握排和連的动作，并且清楚地知道相应的口令。經過六年到八年，这种做法将会收到极大的成效，那时将有更多的新兵，他

們的身体也将更加强壯。

我們已經說过，以上对改組計劃所作的評論仅仅以实际存在的政治条件和軍事条件为出发点。这里还有一种設想，认为在目前情况下法律規定步兵和步炮兵的兵役期为两年已經是最大限度地縮短了兵役期。我們甚至认为，像普魯士这样一个国家，如果它在目前把規定的兵役期再縮短一些，那末，不論是什么政党执政，都会鑄成大錯。現在一方面有法国軍隊，而另一方面是俄国軍隊，并且有可能二者同时配合进犯；因此必須有这样的部队，它們用不着在大敌当前时才去学习初步軍事知識。所以，关于几乎沒有任何兵役期的民兵的幻想，我們絲毫不予以重視；人們所想像的那种形式的民兵，目前对于一个拥有 1 800 万人口而且边境完全沒有設防的国家來說是不行的；即使在另外的条件下，所能实行的也不是这种形式的民兵。

在叙述了这一切之后，也許有人要問：坚持普魯士观点的众議院同意改組計劃的基本点嗎？从軍事和政治方面考虑，我們回答說：在这样的条件下，即**严格地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把服現役两年、在預备队中服役三年、以及 36 岁以下的人在后备軍中服役定为法律制度**，最后，恢复第一类后备軍的基干，它就会同意用已經实行的方式扩充基干，把和平时期的軍隊增加到 180 000—200 000 人，把第一类后备軍改为大規模的預备部队、或第二类野战軍、或要塞守备部队。这些条件能够实现嗎？在关心辯論的人們当中，只有少数人会否认，在“新紀元”⁷¹，也許甚至更迟一些，这是可能的。

資产階級反对派持什么态度呢？

二

普魯士資產階級——它作为整个德国資產階級最发达的部分，当时有权代表德国資產階級——在政治上竟然表现得如此缺乏勇气，甚至在这个并不以勇敢見称的階級的历史中也找不到类似的情形，这也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用当时发生的外部事件来解釋。1848年3月和4月，資產階級曾經是局势的主人。但是，工人階級的独立活动一开始，資產階級立刻就吓得惊慌失措，并轉身投入剛剛被它在工人帮助下战胜的那个官僚制度和封建貴族的怀抱，这一事实的必然結果是出現了曼托伊費尔时期⁷²。最后，“新紀元”到来了，而且是在沒有資產階級反对派的任何帮助下到来的。意外的成功冲昏了資產者的头脑。他們完全忘記了由于他們自己屡次修改宪法、在官僚制度和封建主面前俯首听命（直到恢复封建性的省和专区的等級會議⁷³）、不断地从一个陣地退到另一个陣地而給自己造成的局势。現在他們自以为重新当了局势的主人，而完全忘記了正是他們自己使一切敌对势力得以死灰复燃；这些势力从那时起就日益巩固起来，而且完全同1848年以前一样把国家的实权抓在自己手里。就在这个时候，改組軍隊的問題好像一枚投到他們中間的燃燒彈一样突然出現了。

資產階級只有通过两条道路来取得政权。既然資產階級是一支有官无兵的軍隊并且只能从工人那里找到兵士，那它就应当或者是使自己同工人結成联盟，或者是从在它之上并与它对立的力

量那里、即从王权那里一部分一部分地贖买政权。英国和法国資產階級的历史证明,其他道路是沒有的。

但是普魯士資產階級——确实是毫无根据地——完全丧失了同工人結成真誠联盟的意願。1848年,德国工人政党在它还刚刚开始发展和組織的时候,就打算在代价很低的条件下为資產階級做一点事情,但是資產階級害怕无產階級的最小的独立运动甚于害怕封建貴族和官僚制度。資產階級宁願要用奴役換取的平靜,而不願看到哪怕只是爭取自由的斗争的前景。⁷⁴从那时候起,这种对于工人的神圣恐惧在資產階級那里变成了傳統的东西,直到最后舒尔采-德里奇先生开始他的貯錢箱鼓动⁷⁵为止。这种鼓动是要向工人证明,他們的最大幸福是終生使自己以及自己的后代遭受資產階級的工业剝削,而且工人还应当亲自促进这样的剝削,通过各种工业协会搞点額外收入,从而为資本家提供降低工資的可能性。虽然工业資產階級和驃騎兵中尉一样,无疑是德国民族中最无知的階級,毕竟这样的鼓动在德国人民这样智力发达的人民当中显然沒有获得长久成功的任何希望。資產階級中間比較有远見的人想必也懂得,这不可能得到任何成果,于是,同工人的联盟又一次失败了。

为了用現金——当然是人民口袋里的現金——买来的政权而同政府做的零星交易依然在进行。資產階級在国家中的实际权力仅仅在于对稅收的表决权,而且是非常有限的表决权。可見,本来应当在这里用力,一个如此善于进行交易的階級,一定能在这里得到便宜。

但是情况并非如此!普魯士資產階級反对派——它同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的英国古典資產階級完全相反——竟然以为,它不

出錢就可以賺得政權。

如果从純粹資產階級观点出发，并且充分考虑到提出軍隊改組时的那些条件，那末当时資產階級反对派的正确政策应当是什么呢？如果資產階級反对派考虑到自己的力量，那末它本来应当知道，由于它剛剛被从曼托伊費尔时代所处的屈辱地位提升起来——而它自己确实沒有作任何努力——它当然沒有力量阻止那个已經开始实行的計劃的**实际执行**。它应当知道，随着一次次會議的毫无結果，愈来愈难以消除实际存在的新設施，而政府为征得議会的同意而出的价錢将因之逐年减少。它应当知道，它还远远不能委任或撤銷大臣，因此，冲突拖延得愈久，它所遇到的倾向于妥协的大臣也就愈少。最后，它应当知道，不把事情弄到极端，首先对它自己有利。因为，在德国工人达到了那样的发展水平的情况下，同政府的严重冲突将不可避免地引起独立的工人运动，从而使它在紧急情况下又不得不二者擇一：或是同工人結成联盟——但是現在的有利条件已經比1848年少得多；或是跪在政府面前說：«pater, peccavi!»〔“父亲，我犯了罪！”〕

因此，自由的进步党資產階級⁷⁶应当公正地认真地研究軍隊的改組計劃以及与此密切相联的扩充和平时期員額的問題，那样它也許会获得与我們大致相同的結果。同时它不应忘記，它毕竟沒有能力阻止革新的初步实施（因为計劃包括这样多正确的和需要的东西），而只能延緩革新的最后确定。因此，它首先应当提防不要立即采取与改組直接敌对的立場；相反，它应当利用这次改組和为改組而撥的款項，以使用它在“新紀元”那里为自己买到尽可能多的补偿物，用900万或1000万馬克的新稅換得尽可能多的政權。

这里有多少事情应当去完成啊！这里有曼托伊費尔关于出版和結社权的全部立法；这里有原封不动地从君主专制那里承受来的警察和官吏权力；通过对法院权限的爭論而取消了法院的裁判权；省和专区的等級會議，首先是在曼托伊費尔时代流行的对宪法的解釋，为了与此对抗，需要确立新的宪法实践；这里有官僚制度对城市自治的破坏，以及其他数以千計的东西，任何其他资产階級在类似情况下都会乐意用多向每个居民收半个塔勒的稅为代价来贖回这些东西；如果他們的活動稍微机灵一点，所有这一切本来是可以得到的。但是资产階級反对派有另外的想法。至于說到出版、結社、集会的自由，那末曼托伊費尔的法律恰恰規定了一些使资产者感到安然自得的界限。他們能够不受阻碍地以温和的方式反对政府；自由的增大給他們带来的利益总是比給工人带来的少，因而资产階級宁願忍受政府所施加的更大一些的压迫，也不願使工人得到进行独立运动的自由。对于警察和官吏权力的限制，情况也是如此。资产階級认为，它通过“新紀元”的内閣已經使官僚制度听命于它，并且由于这个官僚制度对工人保持充分的自由行动而感到滿意。它完全忘記了，官僚制度比任何与资产階級友好的内閣更加强大和更富有生命力。因此它以为，随着曼托伊費尔的垮台到来的是资产階級的千年王国，并且以为現在的事情只在于不花一文錢就来收割资产階級专制的成熟了的庄稼。

但是特别是在 1848 年以后的这些年来，已經消耗了那样多的錢，国債增加那样多，稅收提得那样重，怎么能够撥这么多的款呢！亲爱的先生，你們作为世界上最年輕的宪制国家的議員，而不知道宪制是世界上最費錢的統治形式嗎？不知道这种統治形式几乎比波拿巴制度还要費錢，而波拿巴制度—— après moi le déluge! [我

死后哪怕洪水滔天!)——就是用不断征收新稅来抵偿旧稅，因而在十年內耗尽一百年的資源嗎？有限的专制制度的黄金时代——現在你們仍在幻觉中看見的那个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

但是，对宪法中規定的有关繼續征收已經一度通过的稅款的保留条件怎么办呢？誰都知道，“新紀元”在索取錢財方面是多么羞怯。由于改組的費用以正式規定的反让步作为代价被列入經常开支，因此还需要作少許牺牲。問題在于投票表决用以抵偿这笔費用的新稅。在这方面可能有些吝嗇，然而对此不能希望有比“新紀元”內閣更好的內閣。要知道，如果資產階級仍然像早先一样繼續当局勢的主人，它也就会在其他方面掌握权力的新工具。

但是，如果把反动派的主要工具——軍隊——扩充一倍，反动派不是就会更加巩固嗎？在这个問題上进步党資產者陷入完全不可解决的自相冲突中了。他們要求普魯士扮演德国的皮蒙特的角色，但是为此必須有一支强大的、有战斗力的軍隊。他們有一个暗中抱有同样观点的“新紀元”內閣，这是在目前条件下他們所能有的最好的內閣。他們拒絕这个內閣加强軍隊。每天，从早到晚，他們把普魯士的光荣、普魯士的偉大、普魯士的威力的增长挂在嘴边；但是他們拒絕普魯士加强軍隊，虽然这种加强在程度上只是同1814年后其他列强对本国軍隊的加强完全相当。他們究竟为什么这样？因為他們害怕这种加强会仅仅有利于反动派，会使沒落的軍人貴族复兴，会使封建的、专制的官僚政党有机会通过政变埋葬整个宪制。

我們假定，进步党資產者不希望加强反动派的力量做法是正确的，而軍隊是反动派的最可靠的支柱。但是有沒有过比这种改組——正是普魯士在安宁的时候曾經見到的那样一个与資產階

級最友好的內閣所提出的改組——更好的机会使軍隊受議會控制呢？一旦同意在一定的条件下撥款加强軍隊，是不是就不能同时就軍事学校、貴族特权和所有其他有爭議的項目达成協議，并且在增强軍官集团的資產階級性质方面获得保证呢？对于“新紀元”來說只有一点是清楚的：必須加强軍隊。它为了悄悄地实行改組而采取的那些迂迴手段，再好不过地暴露出它良心有愧和对議員們心怀恐惧。应当双手抓住这一点；这是資產階級再等一百年也等不上的好机会。如果进步党資產者办事不像吝啬鬼，而像大生意人，那就沒有什么东西不能从这个內閣那里零星地賺来！

現在就来談談改組对軍官集团本身的实际結果。应当为增加一倍的步兵营找到軍官。軍事学校已經远远不能滿足这种要求了。以前在和平时期从来沒有表現出来的自由主义現在表現出来了；中尉的职务干脆被当做奖品奖給大学生、旁听生和所有受过教育的青年人。凡是在改組后又看到过普魯士軍隊的人，都认不出它的軍官集团了。我們这样讲并不是根据道听途說，而是根据亲眼所見。特殊的軍官行話几乎被排斥得干干净净，年輕軍官說普通的本族語；他們决不是一个閉塞的帮会，而是比 1815 年以来任何时候都更多地代表着一切有教养的階級和全国各个省区。因此，这个障地已經由于事件的自然进程而被夺得；現在問題仅仅在于保持住这个障地，并且加以利用。但是进步党資產者忽視这一切，他們繼續胡說什么所有这些軍官都是高貴的軍校学生。但是从 1815 年以来，在普魯士从来沒有現在这样多軍官来自資產階級。

順便說一下，我們认为普魯士軍官在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戰爭中在敌人面前所表現的英勇行动主要是由于注入了这样的新

鮮血液。光是旧編制中的下級軍官是不敢这样經常地冒生命危險行动的。在这方面政府的看法是不錯的，它认为对这些成就的“輝煌燦爛”起重大作用的是改組；除此以外，改組对丹麦人还造成了什么危險，我們不得而知。

最后是一个主要的問題：政变会由于和平时期軍队的加强而容易实现嗎？軍队是借以实现政变的工具，因此軍队的任何加强都会扩大实现政变的可能性，这完全正确。但是一个大国所需要的軍队数量不取决于实现政变的可能性大些还是小些，而取决于其他大国的軍队的規模。誰走了第一步，也就应当走第二步。誰接受了普魯士議員的委任状并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普魯士的偉大及其在欧洲的权威地位，誰就应当同意把必要的手段建立起来；沒有这样的手段就談不上普魯士的偉大及其权威地位。如果說必須不扩大发生政变的可能性，否則就不能建立这样的手段，那末对于进步党先生們來說也就更加不妙。如果在1848年他們的態度不是那样胆小得可笑和那样笨拙，政变时期也許老早就过去了。但是在目前的条件下，他們归根到底仍得承认以这一或那一形式加强軍队的必要性，而不管自己对政变如何提心吊胆，除此以外他們毫无其他办法。

然而問題还有其他方面。第一，和“新紀元”內閣商談給政变的这个工具撥款的問題，总比和俾斯麦內閣商談好。第二，不言而喻，对真正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所不断采取的每个步驟，都使得普魯士軍队愈来愈不适于作政变的工具。既然全体人民群众都渴求自治，并且理解同所有反对自治的分子进行斗争的必要性，那末20岁到21岁的青年必然也会卷入这个运动；即使他們在封建軍官和专制軍官的指揮下，要借助他們来实行政变也将愈来愈困难。

国内政治发展的水平愈高，应征新兵的情緒就愈不可靠。甚至目前在政府和資產階級之間进行的斗争也已經为这一点提供了证据。

第三，实行两年制兵役足以与軍隊数量的增加相抗衡。扩充軍隊使政府手中用来实行暴力政变的物质手段增加，实行两年制兵役則在同样的程度上使暴力政变的精神手段减少。在兵役的第三年，由于兵士整天死啃专制制度的条令和慣于俯首听命，在一定的時候，而且就在兵役期間，可能带来某些后果。在兵役的第三年，个别兵士在軍事方面几乎已經没有什么可学的了，我們的普遍义务兵役制的服役者在一定程度上已經接近于按照法奥制服长期兵役的兵士。他們具有了职业兵的某些素质，而且作为这样的兵士，在任何情况下都可能比年輕兵士更容易被利用。如果从政变的可能性的观点来看問題，那末从軍隊中解除第三年服役的兵士一定能够与再征集 60 000—80 000 人相抵。

可是在这方面还有一个因素，而且是一个决定性因素。我們不想否认，有可能出現这样的条件，——对于这一点我們非常了解我們的資產階級，——在这些条件下甚至不用动員，单靠和平时期的常备軍，政变仍然可能发生。但是未必真的能够发生。为了实行真正的政变，几乎总是需要进行动員。然而这时事情就轉到了另外一面。和平时期的普魯士軍隊在某种情况下可能成为在国内被政府利用的純粹工具；战争时期的普魯士軍隊則完全不是那样。凡是曾經有机会首先在和平环境而后在战争环境看到同一个步兵营的人，都知道在人們的整个行动上以及在整個集体的性格上前后有多么巨大的差別。人們参加軍隊时几乎还是儿童，現在又回到軍隊时已經是成年人了；他們帶着日积月累的自尊心、自信心、

坚强的性格，这对于整个步兵营是有益的。兵士对军官的态度和军官对兵士的态度立刻变成了另一种样子。步兵营在军事方面大为增强，但是在政治方面——对于专制制度的目的来说——它却变成完全不可靠的了。这种情况在进驻什列斯维希时就已经可以看到，在那里使英国报纸记者感到极大惊奇的是，普鲁士兵士到处公开参加政治游行，并且大胆地说出自己的远非正统的观点。我们把这个结果——被动员起来的军队在政治上不适合于实现专制制度的目的——主要归功于曼托伊费尔时代和“最新的”纪元。在1848年，情况还全然不是这种样子。

无论在改组以前还是在改组以后，普鲁士军事制度的优点之一恰好就在于，在这样的军事制度之下普鲁士既不能进行不受欢迎的战争，也不能实现会是持久的政变。因为，如果连和平时期的军队也允许自己被利用来进行小小的政变，那末第一次动员和第一个战争威胁就足以重新使全部“成果”发生问题。如果没有战争时期军队的批准，和平时期军队在对付“内部杜佩尔”时建立的英勇功绩只能有暂时的意义，而这样的批准将愈来愈难获得。反动派的报纸宣称“军队”与议会相反，是真正的人民代表。显然他们这里所指的仅仅是军官。如果有一天事情弄到这样的地步，即“十字报”⁷⁷的先生们为了实现政变而需要动员起来的军队，那末可以肯定，他们将不能不对这个人民代表大失所望。

但是，归根到底，防止政变的主要保障并不在这里。这种保障在于，没有一个政府能够通过政变来拼凑一个会批准它征收新的赋税和借款的议院，即使它组成了一个准备这样做的议院，在欧洲也没有一个银行家会根据议院的这种批准就向它提供贷款。在大多数欧洲国家中，情况可能不是这样。但是，在1815年的诺言以

后，以及在 1848 年之前多次試圖得到錢而徒勞無益以後，現在普魯士已經享有這樣的聲譽，即沒有議院的合法的和不容置疑的決定，人們連一文錢也不會貸給它。就拿拉法埃爾·馮·埃爾蘭格爾先生本人來說，他甚至貸款給美國南部同盟派⁷⁸，但他未必肯把現金貸給由政變產生出來的普魯士政府。普魯士應當把這一點完全歸功於專制制度的局限性。

資產階級的力量就在於，政府在需要錢的時候——這樣的情況遲早必然發生，——不得不親自去找資產階級要錢，但是在這種情況下已不是去找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機構（這個機構最終會知道自己正是為付款而存在的），而是去找大金融資本家，他們並不反對同政府做筆好生意，他們用衡量任何一個私人的償付能力的尺度來衡量任何政府的償付能力，至於普魯士政府需要的兵士多還是少，對他們是毫不相干的。這些先生只辦理有三方面簽字的期票貼現，如果在期票上簽字的除了政府以外只有貴族院，沒有眾議院，或者是由冒名頂替者組成的眾議院，那末他們就會把這樣的期票當做是一張空頭支票而拒絕成交。

在這裡軍事問題即將結束，憲制問題已經開始。現在資產階級反對派的處境是，它必須或者在軍事問題上取得勝利，或者失去它尚享有的那一點政權殘余；至於它由於什麼錯誤和陰謀詭計而陷入這樣的處境，那是無關緊要的。政府已經對於它表決預算案的全部權利表示懷疑。如果說政府遲早必定要和議院媾和，那末在這個時刻到來之前干脆耐心等待不是最好的政策嗎？

既然衝突已經這樣嚴重，無疑這是最好的政策。在可以被接受的基礎上同現存政府達成協議的可能性是十分可疑的。資產階級由於過高估計自己的力量而陷於這樣的境地：它必須在這個軍

事問題上檢驗一下，它在國家中是決定性的因素，還是微不足道的東西。如果它取得勝利，那末它將同時獲得任免大臣的權力，即獲得英國下院所擁有的那種權力。如果它遭到失敗，那末它永遠不會再經過憲制途徑起任何作用了。

但是只有那些很不了解我們的德國資產者的人，才認為能希望他們這樣沉着。資產階級在政治事務中的勇氣總是同它在這個國家的市民社會中所占的地位完全一致的。在德國，資產階級的社会威力比在英國，甚至比在法國小得多；在德國，資產階級沒有像在英國那樣同舊的貴族結成聯盟，也沒有像在法國那樣借助農民和工人把貴族消滅。德國的封建貴族仍然是與資產階級相敵對的力量，而且是和政府有密切關係的力量。在德國，作為現代資產階級全部社会威力基礎的工廠工業，儘管從1848年以來已有巨大進步，但與法國和英國相比還是很不發達的。大量資本集中在個人手中的現象，在英國，甚至在法國都是屢見不鮮，而在德國却很少有。因此，我們的整個資產階級具有小資產階級的性质。它的生活環境和它自己所能開辟的眼界都很狹小；難怪它的全部思想方式也是如此狹小！在這種情況下怎麼能夠表現出為事業奮鬥到底的勇氣呢？普魯士資產階級很清楚地知道，在它自己的工業活動範圍內是怎樣依賴於政府的。經營權⁷⁹和行政監督像夢魘一樣困惱着它。每當它開辦一個新企業，政府都可以加以阻撓。在政治範圍內尤其如此！當在軍事問題上發生衝突時，資產階級的議院只能表示拒絕，它迫不得已只能進行防禦；而政府的行動卻是侵略性的，它按自己的意圖解釋憲法，迫害自由派官員，取消自由派的城市選舉，發動官僚制度暴力的全部杠桿，以便使資產者懂得必須具有忠心耿耿的觀點，它實際上在一個接着一個地占領陣地，

从而获得了甚至在曼托伊費尔时期都不曾有过的地位。同时，預算以外的財政开支和征稅工作平稳地照常进行，而軍隊改組随着自己一年年的存在而获得了新的力量。簡而言之，远景中的資產階級的彻底胜利一年年地获得更多的革命性质，而政府在各个方面的天天增加的局部胜利愈来愈具有既成事实的形式。此外，发生了完全不依赖于資產階級，也完全不依赖于政府的工人运动，它迫使資產階級或者向工人作出十分不愉快的让步，或者准备在决定性时刻沒有工人的帮助就采取行动。在这种情况下，普魯士資產階級有沒有足够的勇气把自己的意見坚持到底呢？从1848年起它应当有非常大的进步，——就其本来意义說，——但是从本届議會召开时起就不断在进步党中清楚表現出来的妥协渴求，並沒有說明这一点。我們耽心，資產階級在这一次仍然难免自己叛变自己。

三

“工人政党对这次军队改组和由此而引起的政府和资产阶级反对派之间的冲突采取什么态度呢？”

为了充分开展自己的政治活动，工人阶级需要比目前四分五裂的德国的各邦更加广阔得多的舞台。国家的分裂状态将是无产阶级运动的障碍，它在无产阶级心目中永远不会获得存在的权利，并且永远不会是无产阶级认真考虑的对象。德国无产阶级不想理睬帝国宪法、普鲁士领导地位、三位一体⁸⁰和诸如此类的东西，除非是为了把这一切永远清除掉；普鲁士邦需要多少兵士才能勉强维持其大国地位，这个问题在德国无产阶级看来是无关紧要的。军事负担是否由于改组而加重一些，这对于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说，是没有重大意义的。可是，普遍义务兵役制实行得是否彻底，对工人阶级便不是无关紧要了。学会掌握武器的工人愈多愈好。普遍义务兵役制是对普选权的一个必要的和自然的补充；它使选民有可能用手中的武器来实现自己反对发动政变的任何企图的决定。

愈来愈彻底地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是普鲁士军队改组中唯一使德国工人阶级感兴趣的東西。

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是：工人政党在政府和议院之间由此而产生的冲突当中应当采取什么立场？

现代工人，即无产者，是伟大的工业革命的产物，正是这个革

命近百年来在所有文明国家中实现了整个生产方式的彻底变革，起初是在工业方面，后来是在农业方面；由于这个革命的结果，参与生产的只有两个阶级：拥有劳动工具、原料和生活资料的资本家阶级，和既没有劳动工具、原料，也没有生活资料，而必须首先用自己的劳动向资本家购买生活资料的工人阶级。因此，现代无产者仅仅同一个敌视他、剥削他的社会阶级——资本家阶级、资产者——直接发生关系。在这种工业革命彻底实现的国家中，例如在英国，工人实际上只同资本家发生关系，因为农村的大土地租佃者也不外是资本家；贵族仅仅靠自己地产上的地租过日子，它同工人没有任何社会接触点。

在这种工业革命刚刚开始实现的国家中，例如在德国，情况就不同了。在德国还保存有早期的封建关系和后期的封建关系中的许多社会因素，这些因素可以说搅混了社会环境 (medium)，使德国社会制度失去了英国发展时期所具有的那种单纯的、明显的、典型的性质。在德国这个日益现代化的环境里，在完全现代化的资本家和工人当中，还有一批非常令人吃惊的活生生的太古生物：封建老爷、领主裁判所、土容克地主、体罚、参政官、地方官、行会制度、职权范围的冲突、行政处分权等等。而且我们看到，在争夺政权的斗争中，所有这些还活着的古生物都联合起来反对资产阶级，由于自己的财产而成为新时代最强大的阶级的资产阶级，则以新时代的名义向它们要求政治统治。

除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以外，现代大工业还产生了一个站在它们之间的类似中间阶级的东西——小资产阶级。这个小资产阶级是由原先的半中世纪的市民阶级残余和稍稍高出一般水平的工人组成的。小资产阶级较少地参加商品的生产，较多地参加商

品的分配；它的主要业务是零售商业。旧的市民阶级是社会最稳定的阶级，现代小资产阶级却是社会上变化最大的阶级；破产已成为小资产阶级当中的经常现象。小资产阶级由于拥有少量资本，按其生活条件来说接近于资产阶级，但是按其存在的不稳定性来说，则接近于无产阶级的地位。它的政治态度也像它的社会存在一样充满矛盾；一般说来它的最准确的用语是“纯粹民主”。它的政治使命是促进资产阶级反对旧社会残余、特别是反对它本身的软弱和怯懦的斗争，帮助争取出版、结社和集会自由、普选权、地方自治等等；尽管这一切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但是怯懦的资产阶级没有它们也能过得去，而工人没有它们却永远不能为自己争得解放。

在腐朽的旧社会的残余同资产阶级之间进行斗争的过程中，不论何处，迟早都会出现斗争双方向无产阶级寻求支持的情况。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工人阶级自己开始进行活动的时候。衰亡的社会的封建和官僚代表号召工人同他们一起向工人的唯一敌人资本家吸血鬼进攻；而资产者向工人指出，他们共同代表着新的社会时代，因此在对待衰亡的旧社会形式的关系上，他们的利益无论如何是一致的。同时工人阶级也逐渐地意识到它是一个特殊的阶级，它有特殊的利益和特殊的独立的未来；与此同时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在英国、法国和德国都相继顽强地提了出来：工人政党应当对斗争的双方采取什么态度？

这首先取决于工人政党，即工人阶级中那部分已经意识到共同的阶级利益的人，为了阶级利益而力求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据了解，德国的先进工人提出了如下的要求：工人从资本家手中获得解放，其途径就是把属于国家的资本转交给联合起来的工

人，以便在不要資本家的条件下共同地进行生产；而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是通过直接的普选权取得政权。⁸¹

有一点已經很明显：不論是通常被直接称为反动派的封建官僚政党，还是自由的激进資產階級政党都不想自願地向这些要求让步。但是要知道，无产階級自从組織起独立的工人政党时起，就逐漸成为一种力量，而对于力量是不能不重視的。两个敌对的政党都知道这一点，因此在一定的时候它們將願意向工人作一些虛假的或真正的让步。工人能从哪一方获得最大的让步呢？

对反动政党來說，資產者和无产者的存在已經是眼中釘。它的力量取决于現代社会发展是不是再次停頓或者至少減緩速度。否則一切有产階級都会逐漸变成資本家，一切被压迫階級都会逐漸变成无产者，而反动政党也会自然而然地消逝。如果反动派是彻底的，那它当然力求取消无产階級，但是其途徑不是让无产階級向自己的联合前进，而是让它倒退，即让現代无产者重新变为行会帮工和农奴式或半农奴式的依附农民 [bäuerliche Hintersassen]。这样的变化能使我們的无产者滿意嗎？如果这种事情可能发生，那末他們是否願意重新受行会师傅和“仁慈的老爷”的父亲般的监护呢？当然不願意！要知道，正因为工人階級脫离了原先一切虛假的財產和虛假的特权，正因为是在資本和劳动之間形成了公然的对抗，这个統一的、人数众多的、具有共同利益的工人階級的存在，以及工人运动和工人政党的存在才成为可能。再說，这种历史倒退是完全不可能的。蒸汽机、机械化的紡紗机和織布机、蒸汽犁和蒸汽脫粒机、铁路和电报、現代化的蒸汽印刷机使得这种荒唐的倒退已經成为不可能的事情；相反，它們正在逐漸地和坚定不移地消灭封建关系和行会关系的一切殘余，并且把前一时期遺留下来的

一切小的社会矛盾溶解到資本和劳动之間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唯一对抗之中。

資產階級恰恰相反，它沒有任何其他历史任务，它的任务只是把上面所說的現代社会的巨大生产力和交換手段加以全面地发展并提到最高的水平；借助自己的信貸組織把那些世代代流傳下来的生产資料——土地——也攫为己有；借助現代化的劳动工具发展一切生产部門；消灭封建生产和封建关系的一切殘余，从而把整个社会歸結到資本家階級和沒有財產的工人階級之間的單純的对抗中。随着社会的階級矛盾的簡化，資產階級的力量日益增长起来，但是无產階級的力量、它的階級覺悟和取得胜利的能力也在更大程度上增长起来；正是由于資產階級威力的这种扩大，无產階級才逐漸成为多数，成为国家中压倒的多数，就像英国那样，但是德国的情况完全不是这样，在那里，农村的各种各样的农民，城市的小工匠、小商人等等，与无產階級相比还处于优势地位。

因此，反动派的每个胜利都会阻碍社会的发展并且必然推迟工人的胜利。相反，資產階級对反动派的每个胜利在一定程度上同时也是工人的胜利，有助于彻底推翻資本家的統治，能使工人战胜資產階級的日子更快地到来。

現在讓我們把 1848 年德国工人政党的状况同目前的状况比較一下。在德国还有不少老战士，在 1848 年的前夜，当德国工人政党刚开始筹建时，他們就参加了这一工作，革命后，趁当时条件許可的时候，他們又帮助把它建立起来。他們都知道，即使在暴風雨时代，为了发动工人运动，支持这一运动的发展，排除反动的行会分子，不知花費了多大力气，而在过了几年以后，这一切又都沉寂下来。如果說現在工人运动可以說又自然而然地产生了，那末

这是由于什么产生的呢？这是由于从1848年以来资本主义大工业在德国获得了空前的成就，由于它消灭了大量的工匠和其他处于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中间分子，直接把工人群众和资本家对立起来，简单地说是由于它在以前没有无产阶级或者无产阶级人数极少的地方造成了一个相当可观的无产阶级。由于这种工业的发展，工人政党和工人运动就变成了一种必然性。

这并不是说，就不会出现这样一种时刻，即反动派觉得向工人让步似乎对自己有利。但是这永远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让步，这样的让步永远没有政治性质。封建官僚的反动派既不会扩大选举权，也不会给予出版、结社和集会的自由，更不会限制官僚制度的权力。反动派所作的让步，目的总是在于直接反对资产阶级，而且这种让步丝毫不会扩大工人的政治威力。例如在英国曾违反厂主的愿望通过了对工厂工人的十小时工作日法律。在普鲁士可以要求政府认真执行关于工厂工作时间的命令（现在这只不过是一纸空文），更进一步，还可以要求给予工人联合权⁸²等等，而且这也许是能争取到的。然而，不管反动派方面作出什么让步，有一点是不变的：取得这些让步不需要工人作出任何相对的服务；这是公平的，因为反动派已经由于使资产阶级感到烦恼而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工人也就不应当去感谢反动派，而且他们永远也不会感谢反动派。

但是还有一种反动派，它近来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并且在某些人当中非常时髦；这就是那种现在被人们称做波拿巴主义的反动派。波拿巴主义在下面这样的国家中是必然的国家形式，那里的工人阶级在城市中达到了高度的发展水平，但是在农村却被小农在人数上所压倒，它在伟大的革命斗争中被资本家阶级、小资产阶

級和軍隊打敗了。在法國，巴黎工人在 1848 年 6 月的大戰中遭到了失敗，而資產階級由於這次勝利也弄得精疲力竭。它意識到，它不能再經受一次這樣的勝利。名義上它還在統治，但是它的統治又太軟弱無力。軍隊——真正的勝利者——上升到了第一位，它所依靠的是主要為它補充兵員的那個階級，即希望不受城市煽動者攪亂的小農。這種統治的形式當然是軍事獨裁，它的天然的領袖是它的天生的繼承者路易·波拿巴。

波拿巴主義對工人和資本家的態度的特點是：它阻止他們互相攻擊。這就是說它保護資產階級不受工人的暴力進攻，鼓勵兩個階級之間微小的和平衝突，而在所有其餘方面則不准它們有絲毫政權徵兆。既沒有結社權，也沒有集會權，也沒有出版自由；有普選權，然而是在這樣一種官僚制度壓迫下的普選權，反政府的選舉幾乎是不可能的；再就是警察的橫行霸道，這種橫行霸道甚至在警察國家的法國也從來沒有見到過。除此以外還直接收買資產階級當中和工人當中的某一部分人，收買第一種人所使用的手段是大量的貸款欺騙，小資本家的錢由於這樣的欺騙而跑進大資本家的口袋；收買第二種人所使用的手段是大量的國家建設工作，這樣的工作除去集中了天然的、獨立的無產階級以外，還在大城市里集中了人為的、與帝国有聯系的、從屬於政府的無產階級。最後，就是通過假的英勇戰爭使民族自豪感得到滿足，可是這種得到歐洲最高當局許可的戰爭總是为了反對當時共同的替罪羊，並且總是在勝利預先得到保證的條件下進行的。

在這樣的政府統治下，不論工人還是資產階級所能得到的最多不過是：它們在鬥爭中得到喘息機會，工業——在其他有利條件下——猛烈發展，從而為新的更激烈的鬥爭創造因素，在這種喘息

不再需要的时候，斗争将立即爆发。如果希望工人从政府那里能够得到更多的东西，那就最愚蠢不过了，因为这个政府正是为了制止工人反对资产阶级而存在的。

现在来谈我们专门分析的情况。普鲁士反动派能给工人政党提供什么？

这个反动派能不能让工人阶级真正参加政权呢？当然不能。第一，在现代历史上，无论在英国还是在法国，还没有一个反动政府这样做过。第二，在普鲁士当前的斗争中，问题恰好在于，政府是把全部实权集中在自己手里呢，还是说它应当同议会分享权力。的确，政府采用一切手段，剥夺资产阶级权力，并不是仅仅为了以后把这种权力赠送给无产阶级！

即使没有议会代议机关，封建贵族和官僚制度也能保持它们在普鲁士的实权。它们在宫廷、在军队、在官吏中间的傳統地位使它们的这种权力得到保障。它们甚至无须希望有单独的代议机关，因为在曼托伊费尔时期存在过的贵族和官吏的议会，目前在普鲁士要想长期存在还是不可能的。因此它们并不反对让整个议会制度滚蛋。

相反，资产阶级和工人只有通过议会代议机关才能真正有组织地利用政权，而这个议会代议机关只有在得到参加讨论和表决的保证时才有一点价值，换句话说，如果它能掌握“钱柜的钥匙”，它才有一点价值。但是正如俾斯麦自己承认的，他所要阻撓的也正是这一点。我们要问：使这样一个议会丧失一切权力，也就是说使工人自己打算通过争得直接的普选权而参加进去、并且希望有一天能够在其中成为多数的那个议会丧失一切权力，是对工人有利的吗？难道动员一切宣传力量为了加入这样一个归根到底会是

毫无作用的机构，是对工人有利的嗎？当然，不是！

可是，假定政府廢除了現存的选举法并且恩賜直接的普选权呢？好吧，假定这样！假定政府玩弄这种波拿巴主义的把戏，而工人贊同这样的做法，那末他們就是事先认为政府有权力通过新的恩賜再次廢除直接的普选权，只要它願意这样做的话。而在这样的情况下这种直接的普选权还有什么价值呢？

假定政府恩賜了直接的普选权，那末它定会事先用一种保留条件来限制它，使它不再成其为直接的普选权。

至于說到直接的普选权本身，那末只要到法国去一趟就可以相信，当存在着大量头脑迟鈍的农村居民、組織严密的官僚制度、受严格控制的报刊、在很大程度上受警察压制的社团，以及在沒有任何政治集会的情况下，靠这种选举权所能进行的只是多么无害的选举。通过直接的普选权进入法国議会的工人代表多嗎？要知道，法国无产階級比德国无产階級还具有更加优越的条件，它集中得多，而且具有更久的斗争經驗和組織經驗。

这里还发生了另一个問題。在德国，农村居民是城市居民的两倍，也就是說，在德国有 $\frac{2}{3}$ 的人靠农业为生， $\frac{1}{3}$ 靠工业为生。还由于在德国大地产是一种常規，而小农只是一种例外，所以，換句話也就是說，有 $\frac{1}{3}$ 的工人听命于資本家，有 $\frac{2}{3}$ 的工人听命于封建老爷。但願那些經常攻击資本家但是对封建主却不想說一句气憤話的人能够很好地懂得这一点。在德国，封建主比資產階級剝削着数量多一倍的工人；他們同資本家一样，是德国工人的直接敌人。但是这还远不是事情的全部。旧的封建領地上的宗法式的經營方式使雇农或无地农民[Häusler]祖祖輩輩依附于他們的“仁慈的老爷”，这种依附关系大大阻碍了农业无产者参加城市工人的运

动。神甫、农村一貫的愚昧无知、恶劣的学校教育、人們同整个世界的隔絕，則在这方面起了补充作用。农业无产階級是工人階級的这样一个部分，它最难于弄清，而且将比其他部分更迟一些弄清自己本身的利益、自己本身的社会地位；換句話說，这个部分在最长時間內一直是剝削它的特权階級手中的一个无意識的工具。而这是哪个階級呢？在德国这不是資產階級，而是封建貴族階級。但是甚至在法国——那里几乎只有拥有土地的自由农民，封建貴族早已失去了任何政权——普选权也沒有使工人进入議會，而是相反，几乎把他們全部赶出了議會。在封建貴族仍然是实际的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以及农业工人两倍于工业工人的德国，普选权究竟能产生什么結果呢？在德国，反对封建的和官僚的反动派的斗争——这二者在我們这里現在是分不开的——就等于爭取农村无产階級的精神解放和政治解放的斗争；在农村无产階級还没有卷入运动的时候，德国的城市无产階級就不可能得到而且一定得不到絲毫成功，直接的普选权对无产階級來說不是武器，而是陷阱。

也許这种坦率而必要的解釋会鼓励封建主发表有利于直接的普选权的言論。如果是这样，那就更好些。

或者，也許政府限制（如果一般地說在目前情况下还有什么要限制的話）資產階級反对派的出版、結社权和集会权仅仅是为了把自由的出版、自由的結社权和集会权作为礼物贈給工人吧？的确，工人运动不是在安安稳稳地、毫无阻碍地走自己的道路嗎？

这就是問題的关键所在。政府知道，資產階級也知道，目前德国的整个工人运动仅仅是被容忍着，它只是在政府还需要的时候才存在。当这个运动的存在和資產階級反对派的新的独立的敌对者的成长对政府还有利的时候，它就会容忍这个运动。可是一旦

这个运动把工人变成独立的力量，一旦它因此而危及政府，这样的情况就会立即结束。但愿那些为取缔进步党人在出版、结社和集会方面的鼓动而采取的手段能够成为对工人的警告。当时曾经采用过的那些法律、命令和惩罚措施，不定什么时候又可能被用来反对工人并终止他们的鼓动；一旦这种鼓动有危险的时候，它们就一定会被采用。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工人对这个问题要看得很清楚，不要犯资产阶级在“新纪元”时期犯过的错误，那时资产阶级也仅仅是被容忍着，而它却认为自己的地位已很巩固。如果有人设想现在的政府会解除目前对出版、结社权和集会权的束缚，那他就是那种不值得理睬的人。而没有出版自由、结社权和集会权，就不可能有工人运动。

普鲁士现存政府并没有愚蠢到自己切断自己的脖子。一旦反动派真的把某些虚假的政治让步作为诱饵扔给德国无产阶级，那时可以希望，德国无产阶级将用古老的“希尔德布兰德之歌”⁸³中的豪迈辞句来回答它：

Mit gêrû scal man geba infâhan, ort widar orte.

“我们将手端着枪去接受你的礼物，我们的枪冲着前方。”

至于说反动派可能向工人作的那些社会性让步——缩短工厂的工作日、更好地遵守工厂法、承认联合权等等——那末所有国家的经验都证明，反动派这样做并不需要工人给它任何东西作为交换条件。反动派需要工人，而决不是工人需要反动派。因此，当工人自己的独立鼓动中坚持这些要求时，他们就能指望这样的时刻到来，那时反动分子将提出同样要求，其目的仅仅是为了使资产阶级苦恼；工人则通过这样的途径获得对资产阶级的胜利，而一点也用不着感谢反动派。

但是，如果說工人政党除了那些用不着乞求就能得到的微小让步以外，从反动派那里再没有什么可以期待的了，那末它从资产阶级反对派那里能够期待些什么呢？

我們知道，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是新时代的产儿，它們在自己的社会活动中都力求清除旧时代遗留下来的渣滓。的确，它們彼此之間应当进行严重的斗争，但是只有在它們是单独地对立的时候，这一斗争才能进行到底。只有把旧的廢物从船上抛到水里，“船才能投入战斗”，但是区别只在于，这一次不是在两只船之間展开战斗，而是在同一只船上，在軍官和水兵之間。

如果不同时把武器交給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就不能爭得自己的政治統治，不能使这种政治統治在宪法和法律中表現出来。針对着按出身区分的各种旧的等級，它应当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人权；針对着行会制度写上貿易和工业自由；針对着官僚制度的监督写上自由和自治。如果坚决彻底，资产阶级就应当要求直接的普选权、出版、結社和集会自由，廢除反对居民中各个阶级的一切特別法令。然而这也就是无产阶级应当向资产阶级要求的一切。它不能要求资产阶级不再成为资产阶级，但是它毫无疑问能够要求资产阶级彻底实行自己的原則。与此同时，无产阶级也就得到为取得彻底胜利所必需的武器。它借助出版自由、集会和結社权可以为自己爭得普选权，而借助直接的普选权并与上面所說的鼓动手段相結合，就可以爭得其余的一切。

因此，在资产阶级还忠于自己时，支持它同一切反动分子进行斗争，是对工人有利的。资产阶级从反动派那里夺来的每个成果，在这种条件下归根到底是有利于工人阶级的。德国工人也本能地了解这一点。他們在德国各邦都完全正确地投票贊成那些有希望

当选的最激进的候选人。

但是，如果资产阶级背叛了自己，如果它出卖自己本身的阶级利益和由此而产生的原则，那该怎么办呢？

那时工人有两条道路！

一条道路是推动资产阶级违反它的意愿前进，尽可能地迫使它扩大选举权，保障出版、结社和集会自由，从而为无产阶级创造取得运动自由和组织自由的条件。1832年议会改革以来的英国工人、1830年七月革命以来的法国工人都是这样做的，他们正是通过并且借助这一运动——它的最近目的是纯资产阶级性质的——比通过其他途径更多地促进了自己的发展和组织程度。这样的时机必然到来，因为资产阶级在政治勇气不足的情况下随时随地都会背叛自己。

另一条道路是工人完全脱离资产阶级运动，让资产阶级听天由命。这种情况在1848—1850年欧洲工人运动失败后在英国、法国、德国都发生过。这种情况只有在尽了巨大努力而在当时又没有收到效果、阶级需要一个喘息机会时才可能发生。在工人阶级处于健康状况下，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要知道，这会等于在政治上完全弃权，而一个本性如此勇敢的阶级，一个没有什么可以丧失、而且应当获得一切的阶级，决不能长时间这样做。

即使在最严重的情况下，当资产阶级由于害怕工人而躲到反动派的背后，并且为了防御工人而求救于它的敌对分子的时候，——即使在那样的情况下，工人政党也只有继续进行资产阶级背弃了的、违反资产阶级心愿的争取资产阶级自由、出版自由、集会和结社权的鼓动。没有这些自由，工人政党自己就不能获得运动的自由；争取这些自由，同时也就是争取自己本身存在的条件，

爭取自己呼吸所需的空氣。

不言而喻，在所有這些情況下，工人政黨決不會只是當資產階級的尾巴，而會以完全與資產階級不同的獨立政黨的姿態出現。它將在一切問題上提醒資產階級，工人的階級利益同資本家的階級利益是直接對立的，而且工人是了解這一點的。它將保持並發展自己本身的組織來同資產階級的黨的組織相對抗，而且只能像一種力量同另一種力量那樣同資產階級進行談判。它將通過這樣的途徑保證自己有一個受人尊敬的地位，向各個工人解釋他們的階級利益，並且在最近一次革命風暴到來時——這些風暴現在像商業危機、像春分和秋分時的風暴一樣有規律地重復着——準備好採取行動。

由此自然而然地產生出工人政黨在普魯士憲制衝突中的政策：

首先，在目前條件許可的情況下盡量使工人政黨保持為有組織的政黨；

尽可能地迫使進步黨真正地進步；促使它制定一個更加激進的綱領並遵循這個綱領；無情地抨擊和嘲笑它的每個不徹底的步驟和每個弱點；

至於軍事問題本身，讓它按自然的進程發展好了，同時要清楚地意識到，總有一天工人政黨也要進行自己的、德國的“軍隊改組”；

對反動派的虛偽的獻媚要這樣回答：“我們將手端着槍去接受你的禮物，我們的槍衝着前方。”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 致“社会民主党人报” 編輯部的声明⁸⁴

下列签名人曾經答应为“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并允許在撰稿人名单上公布自己的名字，但是有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那就是“社会民主党人报”必須按照向他們宣布的那个簡短綱領的精神进行編輯工作。他們一刻也沒有忽視“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困难处境，因此沒有提出过任何不合柏林时宜的要求。但是他們一再要求至少要像反对进步党人那样勇敢地反对內閣和封建专制政党。“社会民主党人报”所奉行的策略使他們不可能再繼續为它撰稿。下列签名人对普魯士王国政府的社会主义的看法，以及对工人政党对这类欺騙所采取的正确态度的看法，已經在1847年9月12日“德意志—布魯塞尔报”第73号上，在他們回答当时科倫出版的“萊茵观察家”第206号所提出的“无产階級”同“政府”結成反“自由資产階級”联盟的主張的时候詳尽地發揮过了。⁸⁵今天我們仍然认为我們当时的声明中的每一个字都是正确的。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卡尔·馬克思

1865年2月23日于倫敦和曼彻斯特

卡·馬克思写于1865年2月18日
載于1865年3月3日“社会民主党
人报”第29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社会民主党人报”，
并根据手稿校对过



弗·恩格斯的国际工人协会会员证

弗·恩格斯
关于小册子“普魯士軍事問題
和德国工人政党”的簡介⁸⁶

最近汉堡的奥托·迈斯納出版社将出版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写的名为“普魯士軍事問題和德国工人政党”的小册子（定价6銀格罗申）。同最新的“社会民主”党的策略^①相反，作者在这本小册子中再度捍卫了1846—1851年无产階級著作界代表們所坚持的观点，并就目前正在討論的軍事問題和預算問題發揮了这个观点，既反对了反动派，也反对了进步党資產階級。

弗·恩格斯写于1865年2月27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1865年3月3日“柏林改革报”
第53号

俄文譯自“柏林改革报”

① 1865年2月27日恩格斯在給卡·济貝耳的信中所附的关于这一小册子的簡介中这样說明了这个策略的本质：“最新的‘社会民主党’所采取的亲俾斯麦方針使‘新萊茵报’的代表不可能参加这个‘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的工作。”在“杜塞尔多夫日报”上刊登的那篇簡介中有上面这句话。——編者注

卡·馬克思

关于巴黎支部中的冲突的 決議最初方案⁸⁷

(1) 倫敦的中央委員會批准由公民托倫、弗里布尔和利穆津組成的巴黎分部理事会, 并且对他們的热心的活动表示感謝。

(2) 最好能够吸收公民比埃尔·万薩德参加巴黎分部理事会。⁸⁸

(3) 倫敦的中央委員會感謝公民勒弗尔加入国际协会的組織, 并且衷心地希望他以巴黎分部理事会的 *homme de conseil* [顧問] 身分进行合作, 然而中央委員會并不认为自己有权强使公民勒弗尔在巴黎分部理事会中担任任何正式职务。

(4) 委派公民維克多·席利为倫敦中央委員會在巴黎的代表。

作为这样的代表, 他应当只同巴黎分部理事会协同工作。他将行施 *droit de surveillance* [監督权], 而巴黎分部自己也认为必須承认这种監督权是中央委員會的一种由当前政治情况决定的必然屬性。

卡·馬克思写于 1865 年 3 月 4 日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手稿譯的

卡·馬克思

总委员会关于巴黎支部中的 冲突的決議⁸⁹

第一項決議。既然公民托倫屢次申請辭職，而中央委員會又每次都拒絕滿足他的要求，那末委員會現在只好讓公民托倫和巴黎理事會再次討論一下，在當前的形勢下這樣擺脫職務是否適宜。中央委員會事先批准理事會對這個問題所通過的任何決議。⁹⁰

第二項決議。中央委員會考慮到國際工人協會的32個會員於2月24日在巴黎召開的會議上所表示的願望，並忠於人民的主權和自治的基本原則，決定廢除自己關於為法國報刊委派正式辯護人的決定。同時委員會借此機會特向國際工人協會的一位發起人、一位有功績的社會活動家公民勒弗爾表示深切的敬意；⁹¹——其次，委員會堅決反對只有 *ouvrier*〔工人〕才可以被任命為我們協會里的負責人員的原則⁹²。

第三項決議。中央委員會決定批准現有成員組成的理事會，並決定吸收公民萬薩德參加理事會。

第四項決議。中央委員會懇切地建議巴黎理事會同公民勒弗爾和貝律茲達成協議，使他們和他們所代表的那一批工人在理事會中有三名代表。中央委員會雖然表示這樣的願望，但是沒有權利並且也不打算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人。

第五項決議。由于巴黎理事会表示願意承认中央委員會的直接代表，中央委員會特委派公民席利作为自己在巴黎理事会的代表。

席利的个人指示

“中央委員會宣布，如果沒有达成協議，勒弗尔的一派人有权根据我們的章程（見第七條^①）在得到會員卡以后建立协会的地方支部。”

应当把这一点 *in terrorem* [作为一种威胁] 机密地通知弗里布尔及其一伙，以便迫使他們在勒弗尔和貝律茲（人民銀行⁹³的經理）真誠地努力使自己的一派人成为协会会员的条件下作出必要的让步。

卡·馬克思写

1865年3月7日由总委員會批准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手稿譯的

^① 見本卷第17頁。——編者注

卡·馬克思
評弗·恩格斯的小冊子“普魯士
軍事問題和德國工人政黨”⁹⁴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普魯士
軍事問題和德國工人政黨”
(漢堡奧托·邁斯納出版社版)^①

这本极为重要的小冊子共分三章。

在第一章中作者从軍事科学观点批評了普魯士軍隊的改組。他认为主要缺陷在于这个改組計劃“表面上是要回到原来的普遍义务兵役制，——这种制度沒有作为軍隊的强大預备队的后备軍是不可能存在的，——实际上却倒向了法奧基于制”。

在第二章中尖銳地批評了資產階級反对派对軍事問題的态度。作者得出如下的結論：

“現在資產階級反对派的处境是，它必須或者在軍事問題上取得胜利，或者失去它尚享有的那一点政权殘余；至于它由于什么錯誤和陰謀詭計而陷入这样的处境，那是无关紧要的……普魯士資產階級有沒有足够的勇气把自己的意見坚持到底呢？从1848年起它应当有非常大的进步……但是从本屆議會召开时起就不断

① «Die preussische Militärfrage und die deutsche Arbeiterpartei». Von Friedrich Engels (Hamburg, Otto Meissner). — 編者注

在进步党中清楚表現出来的妥协渴求,并没有证明这一点。”^①

在第三章中作者研究了关于“工人政党对这次军队改組”的态度以及“对在这个基础上发生的宪制冲突”的态度的問題。他的回答可以归納如下:

“愈来愈彻底地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是普魯士军队改組中唯一使德国工人阶级感兴趣的東西。”^②

工人阶级在宪制冲突中应当采取的政策是,“首先,在目前条件許可的情况下尽量使工人政党保持为有組織的政党;尽可能地迫使进步党真正地进步……对反动派的虛伪的献媚要这样回答:‘我們將手端着枪去接受你的礼物,我們的枪冲着前方’”^③。

卡·馬克思写于1865年3月13日
左右
載于1865年3月18日“海爾曼”报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海爾曼”报

① 見本卷第71—73頁。——編者注
② 見本卷第74頁。——編者注
③ 見本卷第87頁。——編者注

卡·馬克思

关于不給“社会民主党人报” 撰稿的原因的声明⁹⁵

馮·施韦澤先生在发表呂斯托夫先生和海尔維格先生关于不再作撰稿人的声明(載于“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1号)时写了一篇后記,他在后記中附了一篇从倫敦寄給“新法兰克福报”的文章,想以此证明“馬克思先生和恩格斯先生的行为多么前后不一和本质上多么沒有根据”。他企图捏造事实。因此我們作以下的事实核对。

1864年11月11日馮·施韦澤先生书面通知我关于创办全德工人联合会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事,并且順便作了有关这件事的如下报道:

“我們向大約6—8个經過考驗的党员呼吁,或者至少是向靠近党的人呼吁,希望他們撰稿,而且几乎可以不用怀疑,他們会表示同意。但是我們认为,如果您,德国工人政党的創始人(着重号是馮·施韦澤先生自己加的)^①和它的第一名先进战士能够帮助我們撰稿,那将是一件无比重要的事情。我們希望联合会在严重的斗争中遭到巨大損失之后能够得到您的支持,虽然它的产生間接地归功于您个人的活动。”

随这封邀請信附来一份“作为手稿印行”的綱領。尽管現在馮·施韦澤先生追随着“新法兰克福报”自欺欺人地說这个綱領

^① 本卷引文中凡是在尖括号〈〉內的話或标点符号等都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加的。——譯者注

“是以拉薩尔的口号为基础”，或者說“在旗帜上写着拉薩尔的名字”，而实际上在这个綱領里既沒有拉薩尔的口号，也沒有拉薩尔的名字。綱領只包括三点：“各国人民利益的一致”，“整个强大的德国是統一的自由的人民国家”，“消灭資本的統治”。我和恩格斯就是由于这个綱領才答应撰稿的。

1864年11月19日馮·施韦澤先生来信說：

“如果您还想对綱領的公布提一些意見，請尽快寄来。”

我沒有提任何意見。

接着馮·施韦澤先生問我：

“我們〈編輯部〉希望您时常撰稿，不知我們的希望能否实现，此外，不知您是否允許我們把这点通知我們的讀者？”

我和恩格斯要求首先讓我們能够了解，我們將要在什么样的一伙人当中公开露面。馮·施韦澤先生后来列举了撰稿人的名字，并补充說：

“如果这些先生之中任何一位的参加对您有妨碍，那末希望問題会得到解决，假如您注意到在本报的撰稿人之間根本就不存在严格的一致。”

11月28日馮·施韦澤先生写道：

“您和恩格斯的表示同意，在党内傳开之后引起了极大的欢騰。”

在最初試办的两号报纸中就已經包含着某些引人怀疑的东西。我提出了抗議。而且我順便表明我因下面的事情而感到憤慨：从私人的信（这封信是我得知拉薩尔去世后写給哈茨費尔特伯爵夫人的）中摘录一些吊唁的話，不經我签字同意就发表出来，并且蛮横无理地加以濫用，对拉薩尔敲起奴顏婢膝、阿諛奉承的“祭钟”。12月30日馮·施韦澤先生回答我說：

“閣下：請体諒我們，事情会逐漸就緒，我們的处境非常困难。好事不可能一下子做出来，因此我希望您放心地观察一个时期。”

这时已經是 1864 年 12 月 30 日，当时我手里只有試办的最初几号报纸！

1865 年 1 月初，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最初几号中的一号被沒收后，我向馮·施韦澤先生祝賀这个事件，并且說，他应当公开同內閣决裂。

当蒲魯东去世的消息傳來时，他要求我写一篇关于蒲魯东的文章。我滿足了他的願望，很快就将文章寄了出去，不过我也利用了这个机会，为的是現在在他自己的报纸上来說明，“向現存政权作任何即使是表面上的妥協”都違背“简单的道德感”，而蒲魯东在政变以后向路·波拿巴的献媚是“卑鄙”^①。在同一个时候恩格斯把一首古代丹麦农民歌曲^②的譯文寄給他，想通过对这首歌曲的解釋来暗示“社会民主党人报”的讀者必須同頑固不化的容克地主作斗争。

可是，在同一个 1 月份里我不得不重新向馮·施韦澤的“策略”提出抗議⁹⁶。2 月 4 日他回答我說：

“至于談到我們的策略，請您考虑一下，我們的处境多么困难。我們一定要設法首先站稳脚跟，云云。”

1 月底，“社会民主党人报”上的一篇来自巴黎的通訊中的誹謗，迫使恩格斯和我发表了一篇声明^③，在声明中我們順便談到，使我們高兴的是，我們断定我們的意見得到了证实：“巴黎的无产

① 見本卷第 35 頁。——編者注

② 見本卷第 37—39 頁。——編者注

③ 見本卷第 40 頁。——編者注

階級還像過去一樣毫不妥協地反對兩種形式的波拿巴主義，即土伊勒里宮式的和羅亞爾宮式的；他們從來沒有想到為了貪圖小便宜而出賣自己的作為革命先進戰士的歷史的長子繼承權。”聲明最後說：“我們把這個榜樣介紹給德國工人。”

同時巴黎通訊記者在“社會民主黨人報”第21號上更正了自己過去的报道，這就使我們的聲明失去了直接的理由。因此我們對於馮·施韋澤先生拒絕刊登這篇聲明並沒有提出異議。但是當時我寫信告訴他：“我們將在其他地方詳細說明我們關於工人對普魯士政府應當採取什麼態度的看法。”終於，我作了最後一次嘗試，用实际的例子，用關於聯合的問題向他說明，他的“策略”即令是真正出自純正的動機，也依然有很大缺陷。⁹⁷他在2月15日回答我說：

“如果您願意像在最近的一封信中那樣，向我說明一些理論(!)問題，那我會感激地接受您的這種訓誡。至於當前的策略中的實際問題，那末請您注意，為了要判斷這些情況，必須處在運動的中心。因此，您不論在任何地方和用任何方式表示您對我們的策略的不滿，那對我們都是不公正的。您只有在確切了解情況的時候才能這樣做。另外，請不要忘記，全德工人聯合會是個團結一致的組織，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受自己的傳統的約束。要知道，事物 *in concreto* [實際上] 總是帶有某些複雜性。”

我和恩格斯關於不再做該報撰稿人的正式聲明^①，就是對施韋澤的這個最後通牒的答复。

卡爾·馬克思

1865年3月15日於倫敦

載於1865年3月19日

“柏林改革報”第67號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柏林改革報”

① 見本卷第88頁。——編者注

卡·馬克思

致“柏林改革报”⁹⁸編輯部的声明

我从寄到我这里的“改革报”第 68 号和“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37 号上看出，張皇失措和說謊成性的馮·施韦澤先生企图摆脱他自己制造的“可爱的障碍”^①。Habeat sibi!〔听其自便!〕但是我决不允許他把我 3 月 15 日的声明^②变成关于拉薩尔的声明，在这个声明中我只是使他有可能給他自己作个鉴定而已。保留在我手中的将近十五年来拉薩尔和我的通信，使得施韦澤及其一伙根本沒有可能来歪曲我們的私人关系，或者怀疑我对拉薩尔的鼓动采取中立态度的动机。至于拉薩尔的理论著作对我的著作的态度，那是学术批評的事情，以后可能有机会来分析这一或那一問題。但是在任何情况下，由于对拉薩尔的悼念的尊重，都不允許我把这样的事情变成同造謠中伤者在报纸上进行爭論的題目。

卡尔·馬克思

1865 年 3 月 28 日于扎耳特博默耳

載于 1865 年 4 月 1 日
“柏林改革报”第 78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柏林改革报”，
并根据手稿校对过

① 海涅“新春曲”。序詩。——編者注

② 見本卷第 95—98 頁。——編者注

卡·馬克思 “人类的主席”⁹⁹

正当我从荷兰返回倫敦的时候，“社会民主党人报”在第 39 号上献給我一个由伯恩哈特·貝克尔先生亲手烤制的 Asa fötida¹⁰⁰ 餡餅，它主要是用福格特的誹謗的殘渣做成的，我在 1860 年倫敦出版的“福格特先生”¹⁰¹ 一书中对福格特的捏造进行了有法律根据的反駁。但是“人类的主席”伯恩哈特先生完全違反了自己的习惯，这一次并不限于简单地抄襲。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试图說一点自己的东西。

“人类的主席”說：“不仅如此，馬克思还通过德朗克把手稿典当了 1 000 塔勒，这份手稿被跟踪倫敦流亡者的間諜、普魯士警官施梯伯贖了出来。”

我們的伯恩哈特·貝克尔在他亲自宣讀的主席报告中間曾三次愈来愈匆忙地回到这个“事实”上来。

我在“福格特先生”一书第 124 頁上的注釋¹⁰² 中說：

“我本人于 1850 年在倫敦認識了班迪亚和他当时的一位朋友——現在的图尔將軍。他把科苏特亲自給他弄的证明书給我看，这样他就用簡單的方式打消了我由于他同各色各样的党派——奥尔良派、波拿巴派等等——玩弄騙局，以及同各个‘民族’的警察交往而产生的怀疑。按照这份证明书，他这位早已是克拉普卡手下的科莫恩的临时警察总监，現在被任命为 in partibus〔非现实

的]①警察总监。他作为为革命服务的警察局秘密长官，自然应当有一条‘公开的’門路通向为各邦政府服务的警察局。1852年夏天，我发现他把我托他轉交给一个柏林书商的手稿藏起来，并且把这份手稿交给了一个德意志邦政府。¹⁰³当我把这件事以及这个人的其他一些早已引起我注意的特点写信告诉巴黎的一个匈牙利人（瑟美列），以及班迪亚的謎由于消息相当灵通的第三者的参与而被彻底揭开之后，我便于1853年初给‘紐約刑法报’寄去一篇由我署名的公开揭露他的文章¹⁰⁴。”

可見，“人类的主席”沒有讀过我在十三年前发表在“紐約刑法报”上的那篇詳細揭露班迪亚的文章，当时班迪亚还住在倫敦。要不然，他也許会使自己的捏造多少适合于实际情况。然而他既然这样完全献身于自己的迷人的幻想的游戏，那还有什么东西能比美妙的联想——倫敦和典当——更适合这种游戏呢？但是我可以担保，伯恩哈特·貝克尔从来没有典当过自己的手稿。

“人类的主席”给予了以下的补充：

“当奥地利政府的半官方机关报維也納的‘信使报’出版时，馬克思想找我（即伯恩哈特·貝克尔本人）当这家报纸的記者，而且他避而不談新报纸（据他說这份报纸已寄給他）的半官方性质；相反，他強調說我可以把很尖銳的文章寄到那里去。”

当时伯恩哈特·貝克尔还不是“人类的主席”，并且有一个不变的习惯：为倫敦的“海尔曼”报拙劣地写些“极其平淡的文章”，在他由于某种原因悄悄地从倫敦溜走之前不久，在一个美丽的夜晚（在这以前我只偶尔見過他一两次）他亲自跑到了我的家中。他的

① in partibus infidelium 直譯是：“在異教国家中的”。天主教主教被任命为非基督教国家的純粹有名无实的主教时，在其头衔上添有这种字样。——編者注

出現使我感到惊奇。他在我面前哀哀抱怨自己的不幸命运，并問我能不能給他找一个記者的工作，以救济他的急需。我回答說，几天以前科拉切克先生通知一位政治流亡者、西蒂的商人西·波克罕先生說，在維也納創辦了一家新的、似乎“非常自由的”報紙，他还給他寄了几号試办的報紙并要他代为招聘一个倫敦記者。为了滿足伯恩哈特·貝克尔所表示的热烈願望，我答应为此去找那位总是热心为流亡者效劳的波克罕先生。我記得伯恩哈特·貝克尔甚至写了一篇或几篇試驗性的文章寄到維也納。原来是他想当“信使报”記者而沒有成功这件事证明我同奥地利政府有联系！显然，伯恩哈特·貝克尔先生以为，如果哈茨費尔特伯爵夫人授予他职务，那末上帝就会賜給他担任这个职务的必要智慧！

伯恩哈特·貝克尔接着說：“李卜克內西还經常地影响哈茨費尔特伯爵夫人，想唆使她反对联合会，馬克思也給她打电报和写信。”

伯恩哈特·貝克尔先生以为，我也完全像他自己那样“經常”认真地看待根据遺囑轉交給他的那个高位¹⁰⁵！在拉薩尔死后我写給哈茨費尔特伯爵夫人的信的内容是向她表示慰問，回答她向我提出的有关編写一本論拉薩尔的小册子的各种問題，以及說明关于要求我反击某个誣蔑拉薩尔的人的問題，这一点我已經做了。^①可是，为了避免誤会，我认为有必要在1864年12月22日的信中提醒伯爵夫人，我并不同意拉薩尔的政策。我們的通信就这样結束了，通信中只字未提联合会。¹⁰⁶伯爵夫人还請求我立即写信告訴她，在編好的小册子中附上几張肖像合适不合适。我打电报回答說：不！这唯一的一封电报在同作为詩人和思想家一样偉大的

① 見本卷第24—27頁。——編者注

語言学家伯恩哈特·貝克尔先生那里竟变成了多数。

他說什么，我在这以后还参加过某个反对他的运动。我对这件极端重要的事情所采取的唯一的一步驟是：有人从柏林写信告訴我，某些集团想迫害伯恩哈特·貝克尔，原因是他不願意利用“社会民主党人报”和联合会来宣傳让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加入普魯士的主張。¹⁰⁷ 同时还請求我把这个“阴谋”預先告知在佐林根的林格斯先生——由于我們先前的联系，人們认为我对他会有一些影响——和在日内瓦的菲利浦·貝克尔先生。我这样做了——对前者的預告是通过一个巴門的朋友^①，对后者的預告是通过我在巴黎的朋友席利，同我一样，当时席利以为“人类的主席”总还有点人性，并且他的确做得也还不坏，哪怕只有这一次。而現在他当然会給事实赋予完全相反的意思——簡直是个辯证法家！

但是“人类的主席”不仅是一个偉大的詩人、思想家、語言学家和辯证法家。而且他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病理学家。我患了一年半的痲病，这病碰巧在拉薩尔死后又延續了六个月，他說我这种紫紅色病症是由于“对拉薩尔的偉大的黑色嫉妒”。

他慷慨激昂地补充說：“但是他沒有敢于冒險反对拉薩尔，因为他很清楚，如果他这样做，那人就会用自己的大棒把他打死，就像打死巴师夏—舒尔采那样。”

但是，拉薩尔恰好在他关于“巴师夏—舒尔采”这一最后的著作¹⁰⁸中极度地頌揚 1859 年在柏林出版的“政治經濟学批判”¹⁰⁹，說我的这本书是“划时代”的作品，是“杰作”，并且把它同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著作相提并論。于是，伯恩哈特·貝克尔先生以

① 卡尔·济貝耳。——編者注

他固有的想像力得出結論說，拉薩尔会像把舒尔采—巴师夏置于死地那样，把我也置于死地。但是，拉薩尔对于我的“敢于冒险”也有完全另外一种看法。当我由于某种情况（关于这点没有必要在这里谈）写信告诉他说，我和恩格斯将不得不根据我已援引的理由公开反对他的时候¹¹⁰，他写了一封详细的回信，这封信现在还放在我这里；他在信中先是提出自己的反面论据，后来在结尾时又呼吁说：

“在把事情公开和声张出去之前，请考虑一下这一切。况且我们之间的分歧和分裂对于我们这个本来就不大并且具有特别性质的党来说，将是值得惋惜的事情！”¹¹¹

伯恩哈特·貝克尔先生认为全部矛盾在于，我关于某个衰落的国际协会¹¹²（他、伯恩哈特·貝克尔曾是它的成员）什么都不想知道，同时却最积极地参加去年9月由伦敦各工联的领袖所成立的国际协会。

显然，伯恩哈特·貝克尔先生的辨别能力并不比他的推理能力逊色。他吹嘘说，他的协会在最繁荣的时候发展到整整“400人”；而我们的协会却如此不知谦虚，以至于现在单单在英国就已经拥有10 000个会员。背着“人类的主席”作出这类事情，实在是不可容忍！

考虑到所有这一切，特别是考虑到我只是非常粗略指出的伯恩哈特·貝克尔先生的那许多才能，恐怕不能认为他的抱怨是公正的。他抱怨说人们要他这样一个人一下子担起过多的职务；不仅把专制君主的角色这样一个重要的职位赏给了他，而且“附带地”赏给他“为家里买鸡蛋和黄油”这样一个不重要的职务¹¹³。不过，在他的这个双重职能方面大概可以定出更好的家庭规章。将

来可以把“为家里买鸡蛋和黄油”做为他的主要职业，而让他只是完全“附带地”当人类的主席。

卡尔·馬克思

1865年4月8日于倫敦

載于 1865 年 4 月 13 日
“柏林改革报”第 88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柏林改革报”

卡·馬克思 更 正¹¹⁴

貴報第 30 号曾报道說，在 3 月 1 日于倫敦举行的紀念波兰起义大会上，通过了比耳斯先生和利弗尔逊先生的兩項建議。但是，在通过这两項建議之后，彼得·福克斯先生（英国人）代表国际工人协会还提出了一項建議：

“应当承认：完整而独立的波兰是民主欧洲存在的必要条件；只要这一条件不存在，大陆上的革命胜利就只能是反革命长期統治的短暫前奏。”

彼·福克斯先生对于欧洲因波兰丧失自由和俄国采取侵略政策而遭到的种种災难作了簡要的历史概述，然后指出，在这个問題上，自由党的立場和民主的协会（他是代表它說話的）的立場不一致。保守的欧洲的口号是：被奴役的欧洲要以被奴役的波兰为基础。相反，国际工人协会的口号是：自由欧洲的基石是自由和独立的波兰。

埃卡留斯先生（德国工人，国际工人协会副主席）支持這項建議，并詳細地闡述了普魯士几次参与瓜分波兰的情况。他用下面这句话结束了自己的演說：“普魯士君主政体的灭亡，是建立德国和恢复波兰的 *conditio sine qua non* [必要条件]。”

国际工人协会的法国会員勒·呂貝先生也发言拥护這項建議。這項建議在整个大会表示贊同的經久不息的欢呼中一致

通过。

“每日新聞”和其他一些“自由党的”倫敦報紙不乐意国际工人协会取得的成就，所以刪掉了这一部分报道；順便提一句，如果没有国际工人协会的促进，圣馬丁堂的紀念波兰起义的大会根本就开不成。我代表国际工人协会請貴报刊登这个更正。

国际工人协会瑞士通訊書記 海·荣克

……于倫敦

卡·馬克思写于 1865 年 4 月 13 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 1865 年 4 月 22 日“白鷹报”

俄文是按手稿譯的

第 48 号，刊載时略有改动

BEE-HIVE NEWSPAPER.

A JOURNAL OF GENERAL INTELLIGENCE, ADVOCATING INDUSTRIAL INTERESTS

No. 152

(PUBLISHED FOR THE PROPRIETOR)

LONDON, SATURDAY, MAY 29, 1944

Price Two pence

卡·馬克思 国际工人协会致約翰遜总统 的公开信¹¹⁵

美国总统安得魯·約翰遜

閣下：

南部为維持“特殊秩序”¹¹⁶的統治发动了武装叛乱，这个“特殊秩序”的恶魔不会让它的信徒們在公开的战斗中光荣死去。它既然以叛逆开始，就必然以无耻告終。正如菲力浦二世維持宗教裁判所的战争出了一个热拉尔一样，杰弗逊·戴維斯維持奴隶占有制的战争也出了一个蒲斯。

当旧大陆和新大陆都群情激憤的时候，我們的任务不是要傾泻悲痛和憤怒的言辞。就連那些被雇用的誹謗者，他們成年累月地、不辞劳苦地、息息法斯式地对阿伯拉罕·林肯和他所領導的偉大共和国进行了精神上的暗杀，現在也在人民的这种憤懣情緒的总爆发面前吓得目瞪口呆，爭先恐后地将辞令的花朵撒滿他的陵墓。他們現在終於明白了：这是一个不会被困难所吓倒，不会为成功所迷惑的人；他不屈不撓地迈向自己的偉大目标，而从不輕举妄动，他稳步向前，而从不倒退；他既不因人民的热烈拥护而冲昏头

腦，也不因人民的情緒低落而灰心喪氣；他用仁慈心靈的光輝緩和嚴峻的行動，用幽默的微笑照亮為熱情所蒙蔽的事態；他謙虛地、質樸地進行自己宏偉的工作，決不像那些天生的統治者們那樣做一點點小事就大吹大擂。總之，他是一位達到了偉大境界而仍然保持自己優良品質的罕有的人物。這位出類拔萃和道德高尚的人竟是那樣謙虛，以致只有在他成為殉難者倒下去之後，全世界才發現他是一位英雄。

光榮屬於同這樣一位領袖一起被刺的、成為奴隸占有制惡魔第二個犧牲者的西華德先生。難道他不是在大眾還猶豫不決的時刻就敏銳地預見到並勇敢地預言了“不可制止的衝突”¹¹⁷嗎？難道不是他在这场鬥爭的最陰暗的時刻顯示出羅馬人那樣的對自己的職責忠貞不渝，對共和國和它的命運堅信不疑嗎？我們衷心希望他和他的兒子在比“九十天”¹¹⁸更短的日子裡恢復健康，重新回到社會活動中來，並獲得應有的尊敬。

如果我們注意到這場驚心動魄的國內戰爭的規模之大、範圍之廣，並把它和舊大陸的百年戰爭、三十年戰爭和二十三年戰爭¹¹⁹作比較的話，恐怕就很難說它是持續九十天的戰爭；在这场戰爭結束之後，閣下，您的任務就是借助法律來根除那些曾用刀劍砍倒的東西，領導政治改革和社會復興的艱巨工作。深刻地意識到您的偉大使命，將使您在嚴肅的職責面前不作任何妥協。您將永遠不會忘記，美國人民在開創勞動解放的新紀元中曾把領導的責任付托給兩位勞動的人：一位是阿伯拉罕·林肯，另一位是安得魯·約翰遜。

1865年5月13日中央委員會代表國際工人協會簽署於倫敦：

卡尔·考布；爱得文·柯耳森；弗·列斯納；
卡尔·普芬德；N. P. 汉森；卡尔·沙佩尔；
威廉·德尔；格奥尔格·罗赫納；格奥尔格·
埃卡留斯；約翰·奧斯本；彼·彼得逊；A. 詹
克斯；克利莫什；約翰·韦斯頓；亨·博勒特；
本·魯克拉夫特；詹·巴克萊；彼得·福克
斯；納·薩耳瓦特拉；乔治·豪威耳；博尔达
日；A. 瓦耳蒂耶；罗伯特·肖；約·朗梅德；
W. 摩尔根；乔·威·威勒尔；約·D. 奈阿
斯；威·沃尔利；D. 斯坦斯比；F. 德·拉薩
西；詹·卡特；波兰書記——艾米尔·霍尔
托普；德国書記——卡尔·馬克思；瑞士书
記——海·荣克；法国書記——欧·杜邦；財
务書記——J. 惠特洛克；主席——乔·奥哲
尔；名誉总書記——威·朗·克里默

卡·馬克思写于 1865 年 5 月 2 日
和 9 日之間

載于 1865 年 5 月 20 日“蜂房报”
第 188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蜂房报”

卡·馬克思

工資、价格和利潤¹²⁰

卡·馬克思写于 1865 年 5 月底—
6 月 27 日
1898 年第一次以单行本在倫敦发表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手稿譯的

几点說明

公民們！

在沒有談到本題之前，請允許我先作几点說明。

目前大陸上正流行着一種真正的罷工流行病，增加工資的要求已成為普遍的要求。這個問題將要在我們的大會上提出討論^①。你們是國際協會的領導，對這個極重要的問題應當有確定的見解。因此，我認為有責任把這個問題徹底分析一下，即使這樣做會冒着使你們很不耐煩的危險。

我要先說明的第二點，是關於公民韋斯頓的。他不僅向你們說明了他分明知道是極不受工人階級歡迎的觀點，而且公開為這些觀點進行辯護，並且認為這樣做對工人階級有利。他所表現的這種道義上的勇氣，是我們每個人都應深表尊敬的。雖然我這篇報告措詞激烈，但我希望，在這報告結束後公民韋斯頓會發覺到，我同意據我看來是構成他的論綱基礎的那種思想，不過我認為他的論綱就其現有的形式來講，在理論上是不正確的，在實踐中是危險的。

現在我就來談我們所關心的問題。

^① 見本卷第 582—583 頁。——編者注

1. 生产和工資

公民韦斯頓的論证,实际上是根据两个前提:

(1)国民产品量是一种不变的东西,或者像数学家所說的那样,是一个常量或常数;

(2)实际工資总额,即依能够用以购买的商品的数量来測定的工資总额,是一个不变額,一个常数。

他的前一个論断显然是錯誤的。你們可以看到,产品的价值和数量在逐年增加,国民劳动的生产力在逐年扩大,而用来流通这种日益增加的产品所必需的貨幣数量也不断地发生变化。凡是对全年来說或对各年相互比較來說是正确的,对一年中的每一天平均來說也是正确的。国民产品的数或量总是不断地发生变化。这不是一个常数,而是一个变数,并且即令把人口数方面的变化撇开不說,它也由于資本积累和劳动生产力方面的不断变化而必然是一个变数。如果一旦发生了工資水平的普遍提高,那末,这种提高本身,无论其后果如何,决不会直接引起产品量的变化,这点是完全正确的。这种提高最初会是在当时现实情况的基础上发生的。但是,如果說在工資提高之前国民产品是一个变数而不是一个常数,那末,在工資提高之后,它仍然是一个变数而不是一个常数。

但是,就假定国民产品量不是一个变数,而是一个常数吧。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們的朋友韦斯頓所当做邏輯結論的东西也仍然只是一种武断。如果我們有一个假定为8的定数,那末这个数的絕對界限并不妨碍它的各部分改变其相对界限。如果利潤为

6，工資为 2，那末工資也可以增加至 6，利潤减少至 2，而总数仍然是 8。因此，产品量不变的事实，无论如何也不能证明工資总额也应该是不变的。那末，我們的朋友韦斯頓究竟怎样证明工資总额是一成不变的呢？他不过是断定如此罢了。

但是，即使是同意他的这个論断，那这个論断也应当在两方面都适用，然而公民韦斯頓却使它只适用于一方面。如果工資总额是一个常数，那末，它就既不能增加，也不能减少。因此，如果說工人爭取暂时增加工資的做法是愚蠢的，那末資本家爭取暂时降低工資的做法也是愚蠢的。我們的朋友韦斯頓并不否认，工人在一定的情况下能够迫使資本家增加工資；但是，由于他觉得工資总额是天然的常数，所以在他看来，工資增加之后，必然接着有一个反作用。但是，另一方面，他又知道資本家能够强使工資降低，并且資本家确实是經常企图这样做。依照工資不变的原則，在这种場合，也应当像在前一种場合一样，接着来一个反作用。因此，工人对降低工資的企图或对事实上已把工資降低的現象进行反抗，是做得正确的。所以，他們力求增加工資，也是做得正确的，因为任何一种反抗降低工資的行动都是一种爭取增加工資的行动。因此，依照公民韦斯頓自己提出的工資不变原則，工人也应当在一定情况下联合起来，为增加工資而斗争。

如果公民韦斯頓否认这个結論，他就必須放棄这个結論所据以产生的那个前提。在这种情况下，他就不應該說工資总额是一个常数，而應該說工資总额虽然不可能并且不應該提高，但在資本想要把它减少时，它就可能并且應該降低。如果資本家不願意用肉而用馬鈴薯，不願意用小麦而用燕麦来养活你們，你們也必須把他的意志看做政治經濟学的規律而唯命是从。如果一个国家的工

資水平比另一个国家的高，例如美国比英国高，那末，你們就应当以美国資本家和英国資本家願望的不同来解釋这种工資水平的不同。这种方法自然不仅会使研究經濟現象的工作異常簡化，而且也会使研究其他一切現象的工作都极其簡化了。

不过，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們也可以問：为什么美国資本家的願望同英国資本家的願望不一样呢？为了回答这个問題，我們就得超出願望的範圍。牧师可以說：上帝願意法国是一个样，而願意英国是另一个样。如果我要求他向我說明为什么有这种願望的两重性，他会厚顏无耻地回答說，上帝高兴在法国抱一种願望，在英国抱另一种願望。但是，我們的朋友韦斯頓当然不会去作这种完全否定一切合理推論的論证。

誠然，資本家是願意获取尽量多的东西的。但是，我們的任务不是要談論他的願望，而是要研究他的力量，研究这种力量的界限以及这些界限的性质。

2. 生产、工資、利潤

公民韦斯頓向我們所做的报告的内容，可以装进一顆核桃壳。

他的全部推論可以归結如下：如果工人階級强迫資本家階級以貨幣工資形式付給他的是 5 先令，而不是 4 先令，那末，資本家以商品形式归还給工人的就会是价值 4 先令的东西，而不是价值 5 先令的东西。在这种情形下，工人階級在工資增加之前用 4 先令所能买到的东西，現在就不得不用 5 先令去买了。但是，怎么会发生这种情形呢？为什么資本家卖价值 4 先令的商品时索取 5 先令呢？因为工資額是不变的。但是为什么工資額是由价值 4 先令

的商品来决定呢？为什么不是由价值 3 先令或 2 先令，或其他数目的商品来决定呢？如果工資額的界限是由一种既不依資本家的意志又不依工人的意志为轉移的經濟規律来决定，那末，公民韦斯頓就应当首先闡述这一規律，并证明这一規律。其次，他还应当证明，在每一一定的时期內，实际上所支付的工資額，总是完全符合于必要的工資額而始終沒有出入。另一方面，如果工資額的一定界限只是取决于資本家的意志或其貪欲的界限，那末，这种界限就是随意的，没有什么必要性，它們可以依照資本家的意志而改变，因此也可以違反他的意志而改变。

公民韦斯頓用下面的例子來說明他的理論。他說，如果一个盆盛着一定量的湯，供給一定数量的人分食，那末，这一定量的湯决不会因为湯匙子的增大而增多起来。我觉得这个例子实在有点庸俗^①。这个例子頗使我想起来梅涅尼·阿格利巴用过的一个比喻。当羅馬平民起来反对羅馬貴族时，貴族阿格利巴對他們說，貴族的肚子养活着国家軀体上的平民的四肢。但是，阿格利巴沒有能够证明，用食物填滿一个人的肚子就可以养活另一个人的四肢。公民韦斯頓則忘記了，在工人从其中取湯喝的盆里盛着国民劳动的全部产品，妨碍他們从湯盆里取出較多湯来喝的，并不是湯盆容量狹小，也不是湯盆里盛的东西少，而只是他們的湯匙子太小了。

資本家是用什么詭計来把价值 4 先令的东西卖 5 先令的呢？就是靠抬高他所出卖的的商品的价格的办法。但是商品价格的提高或者——更广泛些說——商品价格的变动，以及商品价格本身，是否仅仅取决于資本家的意志呢？或者相反，为了實現这个意志

① 双关語：《spoon》——“匙子”、“笨汉”，《spoony》——“愚蠢的”、“庸俗的”。

——編者注

还需要有一定的条件呢？如果不需要这些条件，那末市場价格的漲落及其不断的变动，就成为一个不可解答的哑謎了。

既然我們假定，無論在劳动生产力中，無論在所使用的資本和劳动的数量中，亦無論在用来估量产品价值的貨幣价值中，都沒有发生任何变化，而发生了变化的只是工資水平，那末这种工資的提高怎样能够影响到商品的价格呢？它影响到商品的价格，仅仅是因为它影响这些商品的实际供求关系。

工人階級，就其全体來說，把自己的收入耗費在并且不得不耗費在购买日用必需品上，这完全是确实的。所以工資水平的普遍提高总要引起对日用必需品的需求的提高，从而引起日用必需品市場价格的提高。对于生产这些必需品的資本家說来，他們所支付的工資提高了，他們就靠提高他們的商品的市場价格来求得补偿。但是那些不生产日用必需品的資本家又怎样呢？不要以为这种資本家的人数很少。你們如果注意到国民产品的三分之二是由五分之一的人口所消費，——而有一个下院議員不久前甚至断言这部分产品只由七分之一的人口所消費，——那你們就会知道，該有多么巨大的一部分国民产品要作为奢侈品来生产或用来交換奢侈品，該有多么大量的日用必需品要浪費在豢养僕役、馬匹、猫等等上面；我們凭經驗知道，这种浪費在日用必需品价格提高时总是要大大受到限制的。

那末，不生产日用必需品的那些資本家所处的境况究竟会怎样呢？他們不可能用抬高自己商品价格的办法来补偿因普遍增加工資而引起的利潤率下降，因为对这些商品的需求不会增加起来。他們的收入会减少，并且他們还不免要从这种业已减少的收入中支付更多的錢去买同样数量的漲了价的日用必需品。不仅如此。

由于他們的收入减少，他們还不得不縮減用于奢侈品的支出，因此他們彼此間对于他們自己商品的需求也要縮減。由于需求額的这样縮減，他們所出產的商品的价格就要降低。所以，这些工业部門中的利潤率的下降，不仅是由于工資水平普遍提高的影响，而且是由于工資普遍提高、必需品价格上升和奢侈品价格下降的共同作用的影响。

那末，投在各个不同工业部門中的資本的这种利潤率上的差别又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当然，其后果也同各个生产部門中的平均利潤率因某种原因而产生差别时一样。資本和劳动就会从获利較少的部門轉移到获利較多的部門中去，而資本和劳动的这种轉移过程，一直要继续到一些工业部門中的供給量增加到符合于增长了的需求量，而其他工业部門中的供給量縮減到符合于縮減了的需求量时才会停止下来。只有經過这种变化，各个不同的工业部門中的利潤率才会重新趋于平衡。既然所有这种轉移的发生，最初只是起因于各种商品供求关系的变动，那末，当这个原因一旦消失之后，这个原因所发生的作用也就会停止，价格就要回复到原来的水平和平衡状态。因工資提高而引起的利潤率的下降，决不会局限于单个的工业部門，而会成为一种普遍的現象。按照我們的假定，劳动生产力沒有变化，产品总量也沒有变化，而有所变化的是这一定量产品的形式。現在大部分产品将以日用必需品的形式存在，小部分产品将以奢侈品的形式存在，或者——实际上結果是一样——小部分产品用来交換外国奢侈品，并以其原来的形式消費掉；或者——实际上結果也还是一样——大部分本国产品不是用去交換外国奢侈品，而是用去交換外国日用必需品。因此，工資水平的普遍提高在市場价格暫時混乱之后只会引起利潤

率的普遍下降，不会引起商品价格稍許长期的变动。

如果有人說，我在上述論证中是从假定全部工資增加数都用于日用必需品这点出发，那末我就会回答說，我作的这个假定最有利于公民韦斯頓的观点。如果工資增加数是花費在从前不屬於工人消費範圍的物品上面，那末，工人购买力的实际提高就会无需乎证明了。可是，既然他們购买力的这种提高仅仅是工資增加的结果，那末，这种提高的限度就应当恰巧符合于資本家购买力降低的限度。因此，对商品需求的总量不会增加，而可能有所变更的是这种需求的各个构成部分。一方需求的增加会由另一方需求的减少来抵銷。既然总的需求量因此仍旧不变，那末商品的市場价格也不会有任何的变动。

这样，我們就要从两种情况中作出选择：或者是工資增加数均等地耗費于一切消費品，这样，工人阶级方面的需求的扩大就要由資本家阶级方面的需求的縮小来抵偿；或者是工資增加数只耗費于某几种市場价格暫時上漲的物品，这样，由此而引起的某些工业部門中的利潤率的上升，以及与之相应的其他某些工业部門中的利潤率的下降，就会引起資本和劳动分配上的变化，这种变化必将繼續下去，直到一些工业部門中的供給量增加到符合于增长了的需求量，而另一些工业部門的供給量降低到符合于减少了的需求量时为止。在前一种假定下，商品的价格不会发生任何变动；在后一种假定下，商品的交换价值經過市場价格的某些变动之后，又会降低到原先的水平。在前后两种假定下，工資水平的普遍提高，除了引起利潤率的普遍下降之外，終归不会引起任何别的后果。

公民韦斯頓为了推动你們的想像力，就建議你們想一想英国农业工人的工資普遍从 9 先令增加到 18 先令时所要引起的种种

困难。他高喊道，你們只要想一想对日用必需品的需求的大量增加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日用必需品价格的惊人上漲的情景吧。但是，你們都知道，美国农业工人的平均工資比英国农业工人的平均工資多一倍以上，虽然美国农产品的价格比英国低，虽然美国的劳动与資本的整个关系同英国一样，虽然美国产品的年产量比英国少得多。我們的朋友为什么要敲警钟呢？只不过是為了要迴避真正摆在我們面前的問題罢了。工資忽然从9先令增加到了18先令，就是說工資忽然增加了百分之百。不过，我們現在决不是要討論英国普遍的工資水平能不能突然提高百分之百的問題。我們根本用不着去談論工資提高的数量，因为在每一个具体場合下，工資提高的数量都要以一定的情况为轉移，并且要适应于这种情况。我們只是要弄清楚这样一个問題，即工資水平的普遍提高，即使不超过百分之一，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总之，我把我們的朋友韦斯頓关于工資提高百分之百的幻想撇开不談，而請你們注意英国在1849年至1859年时期內确实有过的工資提高的情形。

你們都知道，1848年实行了十小时工作日法令，或者說得更正确点，十小时半工作日法令。这是我們亲眼見过的极大的經濟改革之一。实行这一法令，意味着并不是在某些地方性的企业中，而是在英国賴以統治世界市場的主要工业部門中突然和强制地提高工資。这是在特別不利的情况下提高工資。尤尔博士、西尼耳教授以及資產階級經濟学的其他所有的官方代表都曾证明說——而且我應該指出，他們所根据的理由远胜过我們的朋友韦斯頓——这一法令是为英国工业敲丧钟。他們证明說，这里問題不在于簡單的工資增加，而在于工資的这种增加起因于所使用的劳动量的

减少并且以这种减少为基础。他們断言，人們想从資本家手里夺去的第十二小时，正好是資本家賴以获得利潤的唯一的一个小时。他們危言聳听，說这会使积累减少，价格提高，市場喪失，生产縮小，从而会引起工資降低，弄得彻底破产。他們甚至声称，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比尔的最大限度法令¹²¹与这个法令比較起来是微不足道的；他們在某种意义上是說得有理。但是，結果怎样呢？結果是：工作日虽然縮短了，工厂工人所領的貨幣工資却提高了；工厂中的在业工人数目大大增加了；工厂产品的价格不断地降低了；工厂工人的劳动生产力惊人地发展了；工厂产品的銷售市場空前地日益扩大了。1861年在曼彻斯特科学促进协会的會議上，我亲自听到紐曼先生承认說，他本人、尤尔博士、西尼耳以及經濟科学的其他所有的官方代表都錯了，而人民的直觉是正确的。我所說的不是弗兰西斯·紐曼教授，而是威廉·紐曼先生¹²²，他在經濟科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因为他是托馬斯·图克先生的“价格史”一书的合著者和出版者，这是一部追溯了1793年至1856年的价格史的佳作¹²³。如果我們的朋友韦斯頓的固定不变的观点，即关于不变的工資总额，不变的产品量，不变的劳动生产力水平，不变的資本家的意志，以及他的其他各种固定不变論和最終完成論都是正确的話，那末西尼耳教授的悲观的預言也将是正确的，而罗伯特·欧文却是不正确的了，欧文早在1815年便已宣布說，普遍限制工作日是解放工人階級的第一个准备步驟¹²⁴，并且他不惜違反一般人的成見，独自在自己开办于新拉納克的棉織工厂里真正实行了这种限制工作日的办法。

在十小时法令頒布实行并从而引起工資提高的时候，大不列顛农业工人的工資也由于某些不必在此列举的原因而有过普遍的

提高。

为了使你們不致发生誤会，我要在这里預先說明几句，虽然这样做对于我的直接目的并沒有有什么必要。

如果一个人每星期的工資是 2 先令，后来他的工資提高到 4 先令，那末**工資水平**就提高了 100%。若从**工資水平**提高的观点来看工資的这种提高，那末这种提高可以說是很大的，但**工資的实际数額**——每星期 4 先令——仍然是极其微小而不能糊口的一种施舍。所以不应当为**工資水平**提高的动听的百分比所迷惑。我們必須經常这样問：**原来的工資数是多少？**

其次，也不难了解，如果 10 个工人每星期各得 2 先令，5 个工人每星期各得 5 先令，还有 5 个工人每星期各得 11 先令，那末这 20 个人每星期总共收入 100 先令或 5 英鎊。如果后来他們每星期的**工資总数**有了增加，假定为 20%，那末就是从 5 英鎊增加到了 6 英鎊。就平均数来看，可以說**工資的总的水平**增加了 20%，尽管实际上其中 10 个工人的工資并沒有变，5 个工人的工資每人从 5 先令增加到 6 先令，另外 5 个工人的工資总额則从 55 先令增加到 70 先令。其中半数工人的状况絲毫沒有改善，四分之一工人的状况改善得很少，只有剩下的四分之一才真正得到了改善。然而，如果以**平均数字**來說，那末这 20 个工人的**工資总数**是增加了 20%，同时既然問題涉及到雇这些工人的全部資本以及他們所生产的商品的价格，所以这里的情形与工資的平均提高同等地涉及到所有工人的情况完全一样。关于上面所談的那些农业工人的例子，由于他們的工資水平在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各个郡中极不相同，所以工資的提高對他們所发生的影响也很不平衡。

末了，在这次工資提高的时期中，有許多因素，如对俄战争所

引起的新的稅賦，农业工人住宅的大批毀坏¹²⁵ 等等，曾起过相反的作用。

在預先作了这些說明之后，現在我再来談大不列顛农业工人的平均工資水平在 1849 年至 1859 年时期大約提高了 40% 这一事实。为了证明这点，我可以举出大量的和詳細的材料，但是，就面前的目的來說，我认为只要請你們去看看已故的約翰·查·摩尔頓先生 1859 年在倫敦艺术和手工业协会宣讀的那篇題为“用在农业中的力量”¹²⁶ 的批判性的誠实报告，也就够了。摩尔頓先生所引用的材料，是他从苏格兰 12 个郡和英格兰 35 个郡內大約 100 个农場主的賬簿和其他真实文据中搜集来的。

按照我們的朋友韦斯頓的意見，特別是如果注意到工厂工人工資同时提高的情形，农产品的价格在 1849—1859 年間應該有惊人的提高。但实际情形又怎样呢？虽然发生了对俄战争，而且 1854—1856 年間有好几次歉收，但英国主要农产品小麦的平均价格在 1838—1848 年間是每一夸特約为 3 英鎊，而在 1849—1859 年間則降到每一夸特約为 2 英鎊 10 先令了。这就是說，在农业工人的平均工資提高了 40% 的同时，小麦的价格却降低了 16% 以上。在同一时期中，如果把它的末期同它的初期比較一下，即把 1859 年同 1849 年比較一下，則正式登記的貧民已从 934 419 人减到 860 470 人，即减少了 73 949 人。我承认，减少的数目确实很小，并且这种减少在以后几年中又沒有了，但无论如何总是减少了。

人們可以說，由于廢除了谷物法¹²⁷，英国在 1849 年至 1859 年間从国外輸入的谷物比 1838—1848 年間增加了一倍以上。但結果怎样呢？如果从公民韦斯頓的观点出发，那末国外市場上突然发生的这种巨大的和不断增长的需求，一定会使农产品的价格大

大提高，因为不論这种增长的需求是发生在国外或国内，其影响都是相同的。但实际情形又是怎样呢？在这个时期中，法国除了几个歉收的年份外，經常有人抱怨谷物价格惨跌，美国人不得不屡次将他們多余的农产品焚毀，而俄国，如果相信烏尔卡尔特先生的話，則鼓励了美国的內战，因为美国人的竞争曾破坏了俄国农产品向欧洲市場的輸出。

如果把公民韦斯頓的論证化为抽象的形式，那就是这样：需求的任何提高都是在一定的产品量基础上发生的。因此，需求的提高永远也不能增加所需商品的供給，而只能提高这些商品的貨幣价格。可是，甚至最普通的观察也可以表明，需求的提高在某些場合完全不改变商品的市場价格，在另一些場合也只会使市場价格暫時提高，接着就会是供給的增加。这种供給的增加又必然使价格重新降到原先的水平，在某些場合还会使它低于原先的水平。至于需求的提高是由于工資的增加或是由于其他什么原因，这絲毫不能使問題有所改变。从公民韦斯頓的观点来看，这个一般的現象，也像那些在特別情况下，即在工資提高的情况下所发生的現象一样，是难于解釋的。所以，他的論证在我們所討論的問題上絲毫也不能证明出什么东西。这种論证只是表明，公民韦斯頓弄不清那些使需求的提高会引起供給的增加，而并不一定会引起市場价格的提高的規律。

3. 工資和貨幣

在討論的第二天，我們的朋友韦斯頓已經給自己的旧論断套上了新的形式。他說：在貨幣工資普遍提高的情況下，要支付这些

工資就需要有更多的現金。如果貨幣的數量是固定不變的，那又怎能用這種數量不變的貨幣去支付增加了的貨幣工資呢？以前的困難是：雖然工人的貨幣工資增加了，而工人所能得到的商品數量仍然沒有變；現在的困難是：雖然商品數量沒有變，而貨幣工資却增加了。當然，如果你們不承認公民韋斯頓原先的教條，由此而產生的困難也就消滅了。

可是我要向大家指出，這個關於貨幣的問題和我們現在所研究的問題沒有任何關係。

在你們的國家里，支付機構比歐洲的任何一個國家都要完善得多。由於有了廣泛的和集中的銀行系統，為了周轉同樣數目的價值或進行同樣的或數量更大的交易所需要的貨幣就少得多了。例如工資的情形就是這樣：英國工廠工人每星期把自己的工錢付給商店老板，商店老板每星期把這些錢送交銀行家，銀行家每星期把這些錢交還給工廠主，工廠主再把这些錢付給自己的工人，如此循環不已。由於有這樣的機構，一個工人每年的工資假定為 52 英鎊，只要用一個每星期照樣周轉一次的索維林^①便足夠支付了。但是，這種機構甚至在英格蘭也不如在蘇格蘭那樣完善；而且它並不是到處都一樣完善，所以我們看到，例如有些農業區域和純工業區域比較起來，為了周轉少得多的價值額卻需要多得多的現金。

你們如果渡過海峽，就可以看到，大陸上的貨幣工資比英國的低得多，然而在德國、意大利、瑞士和法國，為了支付這些工資卻需要大得多的貨幣額。在那裡，每一個索維林都不能那樣快地為銀行家取得，也不能那樣快地回到工業資本家的手中，所以，如果

^① 索維林是英國的一種金幣，同英鎊價值相等。——編者注

在英国只需要一个索維林就可以在一年內流通中代替 52 英鎊的話，那末，在大陸上，为了在一年內支付 25 英鎊的貨幣工資，也許就需要 3 个索維林。因此，如把大陸各國和英國加以比較，你們立刻就可以看出，低額的貨幣工資可能比高額的貨幣工資需要更多的現金，而實際上這純粹是個技術問題，同我們所考察的問題毫無關係。

据我知道的最確切的計算，英國工人階級每年的收入可以估計為 25 000 萬英鎊。這個龐大的數目大約是用 300 萬英鎊來流通的。假定工資增加 50%，支付這筆工資所需要的貨幣就不是 300 萬英鎊，而是 450 萬英鎊。由於工人每日開支有很大一部分是用銀幣和銅幣，即普通的鑄幣（這些鑄幣對於金子的相對價值，和不兌換的紙幣一樣，是由法律任意規定的），所以貨幣工資提高 50%，至多只需要 100 萬索維林的補充貨幣加入流通。於是，以金條或鑄幣形式儲藏在英格蘭銀行或私人銀行家錢庫里的 100 萬英鎊就會進入流通。然而，因鑄造這 100 萬補充鑄幣或因其在流通中的損耗所引起的少量費用甚至也可以節省下來，而這些費用在增加流通手段會引起某些困難時也確實是節省下來的。你們都知道英國的流通貨幣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各種銀行券，在商人彼此進行交易以及在消費者與商人彼此進行比較大宗的支付時都採用這種銀行券。另一類為金屬貨幣，在零售貿易中流通。這兩種流通貨幣雖然種類不同，但它們卻是交錯使用的。例如，甚至在比較大宗的支付中，使用金幣來支付 5 英鎊以下的零數是極為廣泛的。如果明天發行 4 英鎊、3 英鎊、或 2 英鎊的銀行券，那末充滿這些流通渠道的金幣立刻就要被排擠，並流到那些因貨幣工資增加而需要它們的地方去。這樣一來，因貨幣工資增加 50% 所需要的 100 萬

补充額，无須增加一个索維林也可以得到了。增大期票的流通而不另发銀行券也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例如在郎卡郡这个方法就实行了很久。

如果工資水平的普遍提高——就像公民韦斯頓对于农业工人工資所假設的那样增加 100%，——会引起日用必需品价格的大漲，并且依照公民韦斯頓的观点，需要有一笔无法得到的补充貨幣額，那末，工資的普遍下降，就会在同样的程度上——不过是朝着相反的方向——引起同样的后果。好极了！你們都知道，1858—1860 年是棉織工业最繁荣的时期，特别是 1860 年在这方面是商业史上空前未有的一年，其他一切工业部門在这时期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1860 年棉織工业工人以及与其有关的一切其他部門工人的工資，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高。但是美国危机一发生后，所有这些工人的工資都忽然降低到大約为过去工資的 $\frac{1}{4}$ 。如果朝着相反的方向变动，那就該是增加 300%。如果工資从 5 提高到 20，我們便說工資增加了 300%；如果工資从 20 降到 5，我們便說工資减少了 75%。但是在一种場合增加的数目和在另一种場合减少的数目是相同的，即 15 先令。所以，这是工資水平的一种突然的、从未有过的变动，如果我們不仅計算那些直接在棉織工业中做工的工人，而且还計算那些間接依靠于棉織工业的工人，那末这种变动所涉及的工人数目，就要比农业工人的数目多 $\frac{1}{2}$ 。但小麦的价格降低了沒有呢？沒有，它已由 1858—1860 年三年中每一夸特年平均价格 47 先令 8 辨士提高到 1861—1863 年三年中每一夸特年平均价格 55 先令 10 辨士。至于說到貨幣，那末 1861 年造币厂所鑄的幣額数为 8 673 232 英鎊，而 1860 年所鑄的只有 3 378 102 英鎊。換句話說，1861 年所鑄的鑄幣比 1860 年所鑄的多 5 295 130 英鎊。

誠然，1861年流通的銀行券比1860年少了1 319 000英鎊。但我們減去這個數目，1861年所用的流通貨幣和1860年這個繁榮的年度相比較，仍然要多出3 976 130英鎊，即約多400萬英鎊；而英格蘭銀行所儲存的金子在這個時期却有縮減，雖然不是在同樣大的比例上，但却是在近似的比例上縮減了。

現在把1862年和1842年比較一下。1862年在英格蘭和威爾士，除了流通中的商品的价值和數量有極大的增加以外，單是用于定期支付股票、債券等等的資本、用于定期支付鐵路用費的資本就達32 000萬英鎊，這個數目如在1842年是會令人難以置信的。雖然如此，1862年和1842年流通中的貨幣總額還是幾乎相等的。並且你們一般還可以看出，當不僅商品价值，而且一般貨幣交易价值都在大量增加的時候，流通的貨幣却有逐步縮減的趨勢。從我們的朋友韋斯頓的觀點看來，這是一個不可解答的謎。

如果他對問題比較深入地考察一下，他就會發現：即使把工資完全撇開不談，並假定工資固定不變，流通中的商品的价值和數量以及一般貨幣交易的數額，都是每天變化的；所發行的銀行券的數量是每天變化的；不以貨幣作媒介而專借期票、支票、轉賬信貸和票據交換實現的支付的數額是每天變化的；由于需要實在的金屬貨幣，市面上流通的鑄幣的數量與儲存的或藏在銀行倉庫中的鑄幣和金條的數量間的比例是每天變化的；國內流通所吸收的金子的數量和被送到國外供國際流通的金子的數量是每天變化的；那時他就會了解到：他的關於貨幣總額彷彿是固定不變的教條，是一種和日常生活矛盾的荒謬絕倫的錯誤。公民韋斯頓不應該把自己對於貨幣流通規律的無知變成反對提高工資的論據，而應該去研究使貨幣流通能適應不斷變化着的條件的那些規律。

4. 供給和 demand

我們的朋友韋斯頓確信一句拉丁諺語：「*repetitio est mater studiorum*」（復習是學業之母）。所以他又一次用新的方式來重述他原來的教條，硬說因工資提高而引起的貨幣緊縮，定將使資本減少等等。既然我們已經講過他的關於貨幣的奇談，所以我認為再來詳細地研究那些在他看來應從他所臆造的貨幣流通難關中產生的虛構後果，就完全是多餘的了。我最好還是直接來試圖把他的那個教條——仍然是原來的那個教條，不過他用各種不同的形式把它反復陳述出來罷了——化為它的最簡單的理論形式。

他論述自己的命題時所採取的那種非批判的態度，只要指出一點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他反對提高工資，或是反對因工資提高而產生的高工資。現在我要問他：究竟什麼是高工資，什麼是低工資呢？例如，為什麼每星期 5 先令就是低工資，而每星期 20 先令就是高工資呢？如果說 5 與 20 相比算是低工資，那末 20 與 200 相比就更低了。如果某人在作關於寒暑表的講演時，大談什麼高溫和低溫度，那他並不能告訴誰以任何知識。他首先應該談冰點和沸點是怎樣確定的，應該告訴別人這兩個標準點是由自然規律所決定的，而並不是由出賣或製造寒暑表的人隨便規定的。然而公民韋斯頓在談到工資和利潤的時候，不僅沒有從經濟規律中推演出這樣的標準點，而且甚至不覺得有尋找它們的必要。儘管非常明顯：工資只有和一種測量其大小的標準相比較時，才能夠談高或低，但他卻滿足於關於高低的一種流行的庸俗的說法，好像這種說法具有什麼固定的意義。

他不能向我說明，为什么一定量的劳动要用一定量的貨幣来支付。如果他回答我說，这是由供求規律决定的，那我就立刻要問他，供給和需求本身又是由什么規律調节的呢？于是他的那种回答就立刻会使他受窘。劳动的供求关系經常在变化，随着这种变化劳动的市場价格也在不断变化。如果需求超过供給，工資就要上漲；如果供給超过需求，工資就要下降，虽然在这种情形下，可能仍有必要例如用罢工或別的方法去探測需求和供給的实际情况。但是，如果你們承认供給和需求是調节工資的規律，那末声言表示反对提高工資便是一种幼稚和无謂的举动，因为按照你們所凭借的那个至高无上的規律，工資的周期性的上漲，也和工資的周期性的下降一样，是必要的和合理的。如果你們不承认供給和需求是調节工資的規律，那我就要重新提出自己的問題：为什么一定量的劳动要用一定量的貨幣来支付呢？

但是，讓我們从更广的方面来研究一下問題：你們如果以为劳动和其他任何一种商品的价值归根到底仿佛是由供給和需求决定的，那你們就完全錯了。供給和需求只調节着市場价格一时的变动。供給和需求可以說明为什么一种商品的市場价格会漲到它的价值以上或降到它的价值以下，但决不能說明这个价值本身。假定說，供給和需求是相互平衡，或如經濟学者所說，是相互抵銷的。当这两个相反的力量相等的时候，它們就相互抑制而停止发生任何一方面的作用。当供給和需求相互平衡而停止发生作用的时候，商品的市場价格就会同它的实在价值一致，就会同它的市場价格繞之变动的标准价格一致。所以在研究这个价值的本质时，我們完全不用談供給和需求对市場价格发生的那种一时的影响。这点無論对于工資來說，或对于其他一切商品的价格來說，都是一样的。

5. 工資和价格

我們的朋友所持的一切論据，如果用最簡單的理論形式表达出来，只能歸結成下面这样一个教条：“商品的价格是由工資来决定或調节的”。

我可以举出实际的經驗来駁斥这种已被駁倒的陈腐謬論。我可以告訴你們，英国工厂工人、矿工、造船工人等等的劳动的价格虽然比較高，但他們的产品却比其他所有国家的同类产品卖得便宜；同时，英国农业工人的劳动的价格虽然比較低，但他們的产品几乎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同类产品都要貴。我可以比較同一个国家的不同产品或不同国家的各种商品的办法来证明，除掉一些与其說是本质上的不如說是表面上的例外情形，平均說来，价格高的劳动生产价格低的商品，而价格低的劳动生产价格高的商品。这当然絕對不是证明，一种場合下的劳动价格高和另一种場合下的劳动价格低，每次都是造成这絕對相反結果的原因，但这無論如何证明，商品的价格不是由劳动的价格来决定。不过我們完全不必采用这种經驗主义的方法。

但是，也許有人会否认公民韦斯頓曾提出过“商品的价格是由工資来决定或調节的”这个教条。的确，他一次也沒有下过这样的定义。甚至相反，他曾說利潤和地租也是商品价格的构成部分，因为不仅工人的工資，而且資本家的利潤和土地所有者的地租，也非从商品的价格中支付不可。但是，照他的意見，价格是由什么构成的呢？首先是由工資构成的。然后再加上給資本家的百分之几，給土地所有者的百分之几。現在假定生产一种商品时所耗費的劳

动的報酬为 10；如果利潤率与支出的工資相比是 100%，那末資本家就要加上 10；如果地租率与工資相比也是 100%，那末就要再加上 10；于是商品的全部价格就是 30。但是，这样决定价格不过意味着价格是由工資决定罢了。如果在上述場合，工資漲到 20，那末商品的价格就要漲到 60，其余类推。因此，提出价格由工資来調节的这一教条的所有旧政治經濟学作家們，都企图用利潤和地租只是加在工資上的百分数的說法来证明这一点。当然，他們中間沒有一個人能把这些增加的百分数的限度归結为某种經濟規律。相反，他們大概认为利潤是由傳統、風俗和資本家的意志决定的，或者是由別种同样臆造的和不可解釋的方式决定的。他們断言利潤决定于資本家之間的竞争，但这种說法絲毫也沒有說明什么问题。誠然，这种竞争无疑会拉平不同生产部門的不同利潤率，即把这些利潤率引到一个平均的水平，但它却絕對不能决定这个水平本身或一般利潤率。

我們說商品的价格是由工資决定的，这是什么意思呢？既然工資是劳动价格的一种称呼，那我們就是說，商品的价格是由劳动的价格来調节的。既然“价格”是交換价值，——而我讲到价值时，总是指交換价值而言，——即用貨幣来表現的交換价值，于是这一原理就归結为“商品的价值是由劳动的价值来决定的”，或“劳动的价值是价值的一般尺度”。

但是，这样一来，“劳动的价值”本身又是怎样决定的呢？我們在这里陷入了窘境。自然，如果我們想依照邏輯从事推論，那我們就一定要陷入窘境。可是，这个教条的維護者是不大关心邏輯的。例如以我們的朋友韦斯頓來說吧。起初他告訴我們，商品的价格由工資来决定，所以当工資增加的时候，价格也要提高。随后

他又向我們證明，相反，工資的增加不會有任何好處，因為商品的价格也要隨之提高起來，因為工資實際上是由工資所能買來的那些商品的价格來測量的。總之，我們開始時聲明說商品的价值由劳动的价值來決定，末尾卻又聲明說劳动的价值由商品的价值來決定了。這樣一來，我們真是在瞎兜圈子，始終得不出任何結論。

總的說來，如果我們把一種商品的价值，例如劳动、谷物或其他某種商品的价值作為价值的一般尺度和調節器，那我們顯然只是在躲避困難，因為我們是用一種其本身又需要被決定的价值來決定另一種价值。

“商品的价格是由工資決定的”這一教條，如果用它的最抽象的說法來表示，就是說“价值是由价值決定的”，而這種同義反復只是表明我們實際上對价值一竅不通。如果接受這個前提，那末所有關於政治經濟學一般規律的推論都變成了空洞的噯語。所以，李嘉圖的偉大功績，就在於他在1817年出版的自己那部“政治經濟學原理”中，把那種認為“价格由工資來決定”的流行已久的陳舊不堪的虛偽學說完全粉碎了¹²⁸。亞當·斯密和他的那些法國老前輩在自己著作中真正科學的部分駁斥過這種虛偽學說，但是他們在自己著作中比較肤淺和庸俗的章節里，卻又把這種虛偽學說再現了出來。

6. 价值和劳动

公民們，現在我必須來實際地闡明我們所研究的問題了。我不能保證我能完全令人滿意地做到這點，因為要做到這點，我就

不能不涉及政治經濟学的全部領域。我只能如法国人所說的那樣 «effleurer la question», 即只能涉及一些基本問題。

我們所要提出的第一個問題, 就是: 什么是商品的价值? 它是由什么决定的?

初看起来, 似乎商品的价值是一种完全相对的东西, 如果不研究某一个商品和其他一切商品之間的关系, 那就不能确定它的价值。的确, 讲到价值时, 讲到某一个商品的交换价值时, 我們指的是这一个商品与其他一切商品交换时的数量上的比例。但是这时又会发生一个問題: 商品相互交换的比例又是怎样决定的呢?

我們根据經驗知道, 这些比例是无限地不同的。如果我們拿某种商品, 例如拿小麦來說, 那我們就会发现, 一夸特小麦同其他各种商品相交换差不多有无数不同的比例。但因为小麦的价值在所有这些場合都依然是一样的, 不管它是表现在絲綢上也好, 表现在金子或其他某种商品上也好; 所以这个价值就应当是一种不同于它与其他商品交换的那些不同比例的东西, 是与这些比例毫不相干的独立的东西。一定有可能用一种极不同的形式来表现不同商品間的这些不同的等量关系。

其次, 假如我說一夸特小麦按一定的比例与铁相交换, 或者說一夸特小麦的价值表现为一定数量的铁, 那我也就是說, 小麦的价值和它那个表现为铁的等价物等于既不是小麦又不是铁的某个第三种东西, 因为我的出发点是: 小麦和铁以两种不同的形态来表现同一的数量。所以, 这两种商品中的每一种, 不論是小麦或铁, 都一定能不依赖于另一种而化成这个第三种东西, 即化成作为它們的共同尺度的东西。

我要用一个十分簡單的几何学的例子來說明这一点。當我們

要比較形狀不同和大小不同的三角形面積，或是比較三角形面積與矩形或其他某種直綫形面積時，我們是怎樣着手的呢？這時，我們就把任何一個三角形的面積還原為全然不同於它的外形的一種表現形式。既然我們根據三角形的特性知道三角形的面積等於它的底乘高的一半，於是我們就能把各種三角形的大小以及一切直綫形的大小相互加以比較，因為每一種直綫形都可以分解為一定數量的三角形。

在計算商品價值時，也應當使用這種方法。我們應當有可能把一切商品化為一種它們所共有的表現形式，只是按照它們所含有的同一尺度的比例去區別它們。

既然商品的**交換價值**不過是這些東西的**社會職能**而與它們的**自然屬性**毫無共同的地方，所以我們首先就要問，所有商品共同的**社會實體**是什麼呢？這就是**勞動**。為要生產一個商品，就必須在這個商品上耗費或投入一定量的**勞動**。並且我不是簡單說**勞動**，而是說**社會勞動**。如果一個人生產一個物品是為了滿足自己的直接需要，是為了供自己消費，那他所創造的就是**產品**而不是**商品**。他作為一個為自己工作的生產者，與社會沒有任何關係。但是，一個人為要生產一個**商品**，他就不僅要生產能滿足某種**社會需要**的物品，並且他的**勞動**本身也應該是構成社會所耗費的**勞動總額**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的**勞動**應該服從於**社會內部的分工**。沒有其他部分的**勞動**，這種**勞動**就不能存在，而這種**勞動**之所以必需，又是為了**補充**其他部分的**勞動**。

當我們把**商品**看作**價值**時，我們是只把它們看作**體現了的、凝固了的或所謂結晶了的社會勞動**。從這個觀點來看，它們所以能夠互相**區別**，只是由於它們代表着較多或較少的**勞動量**。例如生

产一条絲手巾也許比生产一块磚所耗費的劳动量要多。但是**劳动量**是由什么来測量的呢？是由**劳动所經歷的时间**，如小时、日等等来測量的。为了能够用这种尺度来測量劳动，就必须把各种劳动化为平均的或簡單的劳动，作为它們的单位。

于是我們便得出下面的結論：商品具有**价值**，是因为它是**社会劳动的結晶**。商品的**价值的大小**或它的**相对价值**，取决于商品所含的**社会实体量**的大小，即取决于生产这个商品所必需的**相对劳动量**。所以各商品的**相对价值**，是由耗費于、体现于、凝固于各該商品中的**相应的劳动量或劳动額**来决定的。凡生产商品中所需要的**劳动時間相同**，則商品中所含的**相当数量**也相同。或者說：一个商品的价值对另一个商品的价值**的关系**，相当于一个商品中凝固的劳动量对另一个商品中凝固的劳动量的**关系**。

我料想你們中有許多人一定要問：商品价值由**工資**来决定与商品价值由生产該商品所必需的**相对劳动量**来决定，这两种論断之間是否真正有很大的区别或确实有什么区别呢？但你們应当知道，**劳动报酬**同**劳动数量**是完全不相同的东西。假定說，例如一夸特小麦和一盎斯金子包含了**同等数量的劳动**。我举这个例子，是因为**本杰明·富兰克林**在他的第一部著作里曾引用过它，这部著作于1729年出版，題为“**关于紙币本质和必要性的初步研究**”¹²⁹，他是首先发现价值的真正实质的人中的一个。总之，我們已假定，一夸特小麦和一盎斯金子是**同等的价值或等价物**，因为它們都是凝結于它們本身中的若干工作日或若干工作周的**同等数量的平均劳动的結晶**。我們这样来决定金子和谷物的相对价值，是否多少要依据农业工人和矿工的**工資**呢？一点也不。关于究竟怎样支付他們每天或每周的劳动的問題，以及甚至关于是否采用雇佣劳动

的問題，我們把它当作一个完全沒有确定的問題而遺留下来。如果采用了雇佣劳动，那末这两个工人的工資可能是完全不相等的。一个把劳动体現在一夸特小麦上的工人可能只获得两蒲式耳小麦的工資，而那个开矿的工人却可能获得半盎斯金子的报酬。或者，如果假定他們的工資是相等的，那末，这种工資也可能在极不相同的比例上背离他們所生产的商品的价值。这种工資可能等于一夸特小麦或一盎斯金子的 $\frac{1}{2}$ 、 $\frac{1}{3}$ 、 $\frac{1}{4}$ 、 $\frac{1}{5}$ 或其他某种份量。他們的工資当然不能高于他們所生产的商品的价值，不能多于这个价值，但它却可能少于这个价值，并且是在极不相同的程度上少于这个价值。他們的工資要受产品的价值的限制，但是他們的产品的价值却絲毫不受工資的限制。而最主要的是，例如谷物和金子的价值，相对价值，完全不依所用劳动的价值来規定，即不依工資来規定。因此，以商品中凝固的相对劳动量去决定商品价值，与那种以劳动的价值或工資去决定商品价值的同义反复的方法全然不同。不过，这一点我們在以后的探討过程中还要进一步加以闡明。

我們計算一个商品的交换价值时，必須把預先用在這個商品原料中的劳动量以及消耗在实现这种劳动所必需的装备、工具、机器和房屋的劳动，加到生产的最后阶段所費的劳动量上去。例如，一定量棉紗的价值，是若干劳动量的結晶，即在紡織过程中加在棉花上的劳动量，預先体现于棉花本身的劳动量，体现于煤炭、油料及其他各种生产輔助材料的劳动量以及用于蒸汽机、紗錠、厂房等等的劳动量的結晶。本来意义上的生产工具，如工具、机器和厂房，可以在輾轉重复的生产过程中服务一个或长或短的时期。如果它們像原料一样是一下子就消耗完了，那末它們的全部价值也会一下子就轉移到那些用它們生产出来的商品上去。但是，因为

例如紗錠只能逐漸消耗完，所以就要作出一种平均計算，而以紗錠的平均生存寿命和它在一定時間內，譬如在一天內的平均消耗程度作为这种計算的基础。这样我們就可以計算出紗錠价值中哪一部分是轉移到每天紡出的棉紗上，因而也就可以計算出，例如一磅棉紗所費的全部劳动量中，有哪一部分是預先体现于紗錠的劳动。就我們現有的目的而論，对于这个问题没有什么必要作更加詳細的說明了。

也許会有人这样认为，既然一个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它所耗費的劳动量来决定，那末一个人愈懶或愈笨，他所生产的商品的价值就愈大，因为他制造这个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時間愈多。然而，如果作出这样的結論，那就是一种可悲的錯誤。你們記得我曾經用过“社会劳动”这个用語，而“社会”这个用語的意义是非常大的。我們說一个商品的价值是由耗費于或結晶于这个商品中的劳动量来决定，我們所指的是在一定的社会状态中，在一定的社会平均生产条件下，在所用劳动强度和技巧的一定社会平均水平下，生产这个商品所必需的劳动量。在英国，当蒸汽織机开始和手織机相竞争时，为了把一定量的紗轉化为一碼布或一碼呢子，只需要原先劳动時間的一半。誠然，可怜的手織机織工現在已不是像从前那样每天劳动 9 小时或 10 小时，而是每天要劳动 17 至 18 小时了。但是，在他劳动 20 小时的产品中現在只包含有 10 小时的社会劳动，或 10 小时为了把一定量的紗轉化成布所必須耗費的社会必要劳动。因此，他現在劳动 20 小时的产品所包含的价值，并不比他从前劳动 10 小时的产品所包含的价值多。

总之，如果說各个商品的交换价值是由体现在各該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量来决定，那末，凡是生产某一个商品所需要的劳动

量增加,这个商品的价值就必定增加,而凡是生产它所需要的劳动量减少,它的价值就必定减少。

如果說为生产一定商品所必需的劳动量是固定不变的,那末这些商品的相对价值也是固定不变的。但是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生产一个商品所必需的劳动量,是随着所用劳动的生产力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劳动的生产力愈高,則在一定的劳动時間內所制成的产品也愈多;劳动的生产力愈低,則在同一時間內所制成的产品也愈少。举例說,如果由于人口增加而必須耕种肥沃程度較低的土地,为要获得与先前同量的产品,就必须耗費較大的劳动量,农产品的价值也就会因而提高。另一方面,如果一个紡紗工人运用現代生产資料在一个工作日內能比他从前运用手紡車在同一時間內把多几千倍的棉花紡成紗,那末,每一磅棉花所吸收的紡紗工人的劳动,就显然只有以前的几千分之一,因而在紡紗过程中所加于每一磅棉花上的价值也显然只有从前的几千分之一。于是棉紗的价值也要相应地减少。

如果把不同的人的天然特性和他們的生产技能上的区别撇开不談,那末劳动生产力主要应当取决于:

(1)劳动的自然条件,如土地的肥沃程度、矿山的丰富程度等等;

(2)劳动的社会力量的日益改进,这种改进是由以下各种因素引起的,即大規模的生产,資本的集中,劳动的联合,分工,机器,生产方法的改良,化学及其他自然因素的应用,靠利用交通和运输工具而达到的時間和空間的縮短,以及其他各种发明,科学就是靠这些发明来驅使自然力为劳动服务,并且劳动的社会性质或协作性质也是由于这些发明而得以发展起来。劳动生产力愈高,消耗

在一定量产品上的劳动就愈少，因而产品的价值也愈小。劳动生产力愈低，消耗在同量产品上的劳动就愈多，因而产品的价值也愈高。因此，我們可以把下面这一点确定为一般的規律：

商品的价值与生产这些商品所耗費的劳动時間成正比，而与所耗費的劳动的生产力成反比。

上面我們所說的都是关于价值的問題，現在我要就价格的問題，即价值所采取的特殊形式的問題补充几句。

价格本身不过是价值的貨幣表現罢了。例如，一切商品的价值在英国是用金的价格來表現，而在欧洲大陆則主要是用銀的价格來表現。金或銀的价值，和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一样，都是由开采它們所必需的劳动量來決定的。你們会用你們国内的一定量产品，即用你們国内一定量劳动凝結在里面的产品，去交換那些出产金銀的国家的產品，即交換有它們一定量劳动凝結在里面的产品。人們正是这样，即实际上是通过商品交換商品來逐漸学会用金和銀表現一切商品的价值，即生产各該商品所消耗的劳动量。只要仔細看看这种价值的貨幣表現，亦即价值向价格的轉化，你們就会发现这里談的是一个过程，而一切商品的价值都是經由这个过程获得独立的和一致的形式，換句話說，一切商品的价值都經由这个过程表現为同一的社会劳动量。既然价格只是价值的貨幣表現，所以亚当·斯密就称之为**自然价格**，而法国的重农学派則称之为“**必要价格**”。

那末，价值和市場价格間的关系或自然价格和市場价格間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你們都知道，無論各个生产者的生产条件如何不同，一切同类商品的**市場价格**却总是一样。市場价格只是表現平均的生产条件下为供給市場以一定数量的一定产品所必需的

平均社会劳动量。市場价格是依据該种商品的总額来計算的。在这个範圍內,商品的**市場价格**是和它的**价值**相符的。另一方面,市場价格有时高于价值或自然价格和有时低于价值或自然价格的这种变动,是以供給和需求的变动为轉移。市場价格背离价值的情形經常都可以看見,但是正如**亚当·斯密**所說:

“自然价格好像是一种中心价格,一切商品的价格都趋向于这一中心价格。各种偶然的情况可能有时把商品的价格保持在大大超过自然价格的水平上,有时又使商品的价格低于这个水平。但是不管有怎样的障碍使价格背离这个稳定的中心,商品的价格总是經常趋向于这个中心”¹³⁰。

我現在不能来仔細地分析这个問題。这里只需要指出下面一点:**如果供給和需求互相平衡,則商品的市場价格相当于它們的自然价格,即相当于由生产它們所必需的劳动量来决定的它們的价值。**但供給和需求**必定要經常趋向于相互平衡**,虽然这种平衡只能靠一个变动补偿另一个变动,以下落补偿上漲来实现,或者 vice versa [相反]。如果你們不是只考察每天的变动,而是分析較长时期里的市場价格的运动,例如像图克先生在他的“**价格史**”里面做过的那樣,那末你們就会发现,市場价格的变动,市場价格的背离价值,市場价格的上漲和下落,都是互相抵銷和互相补偿的;所以,如果把壟断組織的影响及其他某些变更撇开不說,——关于这些,我現在不能詳細談到,——那末一切种类的商品,平均說来总是按它們各自的**价值**,即它們的自然价格出售的。市場价格的变动达到互相补偿所要經歷的平均时期,对于不同种类的商品來說是不相同的,因为供給适合于需求这一点对某种商品來說比較容易,而对另一种商品來說則比較困难。

由此可見,既然一般說来一切种类的商品在較长时期內都是

按自己的价值出售，那末，假設利潤——不是指个别場合，而是指各个工业部門中經常的和普通的利潤——是来源于額外提高商品价格或者是由于商品按超过其价值的价格出卖，就未免太荒謬了。如果我們把这种假設綜合起来，那它的荒謬性质就非常清楚了。凡是一个人作为卖者經常赢得的东西，他总是不免要作为买者丧失掉。即使指出有些人是买者而不同时又是卖者，是消費者而不同时又是生产者，那也无济于事。这些人付給生产者的东西，是他們起先應該从生产者那里无代价地获得的。如果一个人起先拿了你的錢，然后在购买你的商品时将錢还給你，那你就是按过高的价格把你的商品卖給他，你也永远不会发财致富。这种交易可能减少亏损，但是决不能产生利潤。

所以，你們如想說明利潤的一般本质，就應該从这样一个原理出发，即商品平均說来是按自己的实际价值出卖的，利潤是从商品按其价值出卖得来的，也就是从商品按其所体现的劳动量的比例出卖得来的。如果你們不能根据这种假定來說明利潤，那你們就根本不能說明利潤。这好像是不近情理，好像是与日常經驗相抵触。但是，地球圍繞太阳运行以及水由两种易燃气体所构成，也好像是不近情理。日常經驗只能抓住事物誘人的外观，如果根据这种經驗来判断問題，那末科学的真理就会总是显得不近情理了。

7. 劳动力

當我們在如此簡略的敘述中尽可能地分析了价值的本质，分析了任何商品的价值的本质以后，我們就应当集中注意力来研究

特別的**劳动的价值**。这里我又要用一种在你們看来好像是不近情理的論断来使你們驚訝了。你們都相信，你們每天所出卖的是自己的劳动，因而劳动是有价格的，并且，既然商品的价格只是它的价值的貨幣表現，那就一定存在有一种作为**劳动的价值**的东西。但是，作为**劳动的价值**的东西，就其通常意义來說，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我們已經說过，凝結在商品里的必要劳动量构成商品的价值。現在我們来应用这个价值的概念，又怎能确定比如說十小时工作日的价值呢？这个工作日里包含有多少劳动呢？十小时劳动。如果我們說十小时工作日的价值等于十小时的劳动，或等于这个工作日所包含的劳动量，那无非是同义反复，甚至是毫无意义。显然，當我們发现“**劳动的价值**”一語所包含的真实而隱藏的意义以后，我們就能够說明对于价值的这种不合理和似乎是不可能的用法了，也好像我們認識了天体的实际运行情形以后，就能够說明我們所看到的天体运行情形一样。

工人所出卖的不直接是他的**劳动**，而是他暫時轉让給資本家支配的他的**劳动力**。情况确实是这样，連法律也規定了——我不知道英国的法律究竟怎样，但至少大陆上的一些国家的法律規定了——允許出卖自己**劳动力**的**最大期限**。如果允許无限期地出卖**劳动力**，那就会使奴隶制立刻恢复起来。如果这种出卖包括一个工人的一生，那就会立刻把他变成他的雇主的終身奴隶。

英国最老的經濟学家和最独特的哲学家之一**托馬斯·霍布斯**，在他的著作“**利維坦**”中，已本能地发觉了他所有的那些继承者都沒有觉察到的这件事实。他說：

“一个人的价值或所值，像其他一切东西的价值或所值一样，就是他的价格，即他的能力被人使用时应获得的报酬”¹³¹。

如果我們从这一原理出发，那我們就能像确定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一样来确定**劳动的价值**。

但是在这样作以前，我們应当問：怎样产生了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市場上一方面有一种人是买者，他們占有土地、机器、原料和生活資料，即占有那些除掉原始状态的土地以外的尽是**劳动的产品**的东西，另一方面有一种人是卖者，他們除掉自己的劳动力，除掉劳动的手和头，再沒有別的东西可卖了；前者經常买进是为了吸取利潤和发财致富，后者經常卖出則是为了謀生。要研究这个问题，就得研究被經濟学家称作**先期积累**或**原始积累**、实际上应该称作**原始剝夺**的东西。我們就会发现，这种所謂**原始积累**不过是使劳动者与其劳动資料間**原先存在过的統一**归于破坏的一連串历史过程。可是，这样来研究，就会超出目前这个题目的范围。劳动者脱离劳动資料的现象一旦成为事实，它就会繼續保持下去，并且要以不断扩大的規模再产生出来，直到有一种新的和根本的生产方式方面的革命把这种现象消灭，并在新的历史形态中把原先存在过的統一恢复为止。

那末，**劳动力的价值**究竟是什么呢？

也如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一样，劳动力的价值由生产它所必需的劳动量来决定。一个人的劳动力只有当他活着的时候才存在。一个人要成长和維持生活，就必须消費一定量的生活資料。但是，一个人也和一部机器一样是不免要损坏的，所以必須用另一个人来代替他。工人除了維持自己生活所必需的一定量生活資料以外，还需要有一定量的生活資料来养育子女，因为他們将在劳动市場上代替他，并且还要延續工人的种族。此外，还需要花費一定数量的价值，使工人能够发展自己的劳动力和获得一定的技能。

就我們的目的而論，只需要考察一下中等劳动，这种劳动的教育和訓練的費用是很小的。但是，我必須順便指出，既然各种不同质量的劳动力的生产費用各不相同，所以各种不同生产部門所用劳动力的价值也一定各不相同。因此，对平等工資的要求是基于一种錯誤，是一种永远不能實現的妄想。这种要求乃是承认前提而企图避开結論的那种虛妄和肤淺的激进主义的产物。在雇佣劳动制的基础上，劳动力的价值也像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那样来确定；既然各种不同的劳动力具有不同的价值，即它們的生产需要有不同的劳动量，所以在劳动市場上，它們也就应当按不同的价格来支付。在雇佣劳动制基础上要求平等的报酬或仅仅是公平的报酬，就犹如在奴隶制基础上要求自由一样。什么东西你們认为是公道的和公平的，这与問題毫无关系。問題在于在一定的生产制度下什么东西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

由此可見，劳动力的价值，是由生产、发展、維持和延續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价值来决定的。

8. 剩余价值的生产

現在我們假定，一个工人每天必需的生活資料的平均量需要6小时的平均劳动才能生产出来。同时我們又假定，这6小时的平均劳动也体現在等于3先令的金的数量上。那末3先令就是这个工人劳动力一天价值的价格或其貨幣表現。如果他每天工作6小时，那他每天所生产的价值就足以使他获得他每天平均必需的生活資料量，即維持他这个工人的生存。

但是这个人是个雇佣工人。因此，他必須把自己的劳动力卖

給資本家。如果他把自己的劳动力每天卖 3 先令或每周卖 18 先令，他就是按劳动力的价值出卖的。假定他是一个紡紗工人。如果他每天工作 6 小时，那末他每天加到棉花上去的价值就是 3 先令。他每天加到棉花上去的这个价值就是他的工資的确切的等价，也就是他每天所得到的他的劳动力的价格的等价。可是，在这种場合，資本家就得不到任何的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了。于是，我們在这里就遇到真正的困难了。

資本家购买了工人的劳动力并支付了这劳动力的价值，就像所有其他买主一样，获得了消費或使用他所买的这个商品的权利。迫使一个人去工作以消費或使用他的劳动力，就像开动一架机器以消費或使用这架机器一样。資本家支付了工人劳动力的一天或一周的价值，从而获得了在整天或整周内使用这个劳动力或迫使它去工作的权利。工作日或工作周自然也有一定的界限，可是这点我們留待以后再詳細談。

現在我希望你們注意一个关键問題。

劳动力的价值是由維持或再生产这个劳动力所必需的劳动量决定的，而对这劳动力的使用則只受工人工作能力和体力的限制。劳动力的一天或一周的价值同劳动力的每天或每周的消耗全然不同，犹如一匹馬所需要的飼料同它能供人乘騎的时间完全不是一回事一样。限定工人劳动力价值的劳动量，并不构成工人劳动力所能完成的劳动量的界限。我們以我們的紡紗工人为例來說吧。我們已經知道，为要保證自己劳动力每天的再生产，他必須每天再生产 3 先令的价值，而这是他每天工作 6 小时就可以作到的。但是这并不妨碍他能每天工作 10 小时，12 小时或更多的小时。然而資本家在支付了這個紡紗工人的一天或一周的劳动力价值之后，

就获得了在**整天或整周**內使用这个劳动力的权利。这样，資本家就迫使这个紡紗工人，例如說，一天工作 12 小时。紡紗工人除了必須工作 6 小时以补偿他的工資或他的劳动力价值以外，还必须額外工作 6 小时，这 6 小时我称之为**剩余劳动時間**，并且这个剩余劳动将体現在**剩余价值和剩余产品**上面。假如我們这个紡紗工人每天工作 6 小时就在棉花上加 3 先令的价值，即加构成他所得工資的确切等价的价值，那末，他在 12 小时內就要在棉花上加 6 先令的价值，生产出**相应的剩余数量的棉紗**。既然他已把自己的劳动力卖給了資本家，于是他所創造的全部价值或他所創造的全部产品，便都屬於資本家，屬於他的劳动力的 *pro tempore*〔暫時〕所有者。于是資本家預付 3 先令，結果却實現出 6 先令的价值，因为他預付的是 6 小时劳动結晶的价值，而他取得的却是 12 小时劳动結晶的价值。資本家每天重复这一过程，他每天都預付 3 先令和每天取得 6 先令，这 6 先令中有一半又拿去支付工資，另一半則构成資本家不付任何等价而白白获得的**剩余价值**。資本主义的生产或雇佣劳动制度，正是以**資本和劳动之間的这种交換**为基础，同时这种交換必然經常使工人作为工人再生产出来，使資本家作为資本家再生产出来。

在其他一切条件相等的情况下，**剩余价值率**取决于再生产劳动力价值所必需的那部分工作日和专为資本家服务的**剩余時間或剩余劳动**之間的比。所以，剩余价值率是依**工作日在多大程度上超过工人只再生产其劳动力价值或补偿其工資所費的劳动時間**为轉移的。

9. 劳动的价值

現在我們应当回过头来談談“劳动的价值或价格”这个用語了。

我們已經知道，实际上，劳动的价值无非是由維持劳动力所必需的那些商品的价值来測量的劳动力的价值。但是，因为工人領得工資是在自己的劳动完毕以后，并且因为工人知道他实际上让給資本家的正是他自己的劳动，所以他必然以为他的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就是自己劳动本身的价格或价值。如果他的劳动力的价格等于体现 6 小时劳动的 3 先令，而他又是每日工作 12 小时，那末他就必然要把这 3 先令看成是 12 小时劳动的价值或价格，虽然这 12 小时的劳动是体现在 6 先令的价值中。由此就得出两个結論：

第一，虽然严格說来，劳动的价值或价格是个无意义的名詞，但是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却具有劳动本身的价格或价值的外观。

第二，虽然工人每天的劳动只有一部分是有償的，而另一部分是无償的；虽然正是这一无償的或剩余的劳动构成产生剩余价值或利潤的基础，但是从表面看来，仿佛全部劳动都是有償的劳动。

这种虛假的外观，就是雇佣劳动和其他历史形态的劳动不同的地方。在雇佣劳动制度的基础上，甚至无償的劳动也好像是有償的劳动；反之，奴隶的那部分有償的劳动，却好像是无償的劳动。奴隶为要工作，自然必須生活，他的工作日的一部分就得用来抵償他自己維持生活的价值；但是，由于奴隶和奴隶主之間沒有訂立任何交易合同，由于双方又沒有什么买卖行为，所以奴隶的全部劳动

似乎都是无报酬的。

另一方面，再以农奴为例。可以说，农奴在整个东欧直到昨天还存在着。农奴在自己的或分给他使用的田地上为自己劳动 3 天，其余 3 天则在自己主人的领地上从事强迫的无报酬的劳动。所以，这里劳动中的有偿部分和无偿部分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显然分开了的，于是我们的自由主义者就义愤填膺地认为强迫人白干活的思想是荒谬的。

其实，一个人无论是一周中在他自己的田地上为自己劳动 3 天，再在自己主人领地上无报酬地劳动 3 天，或是一天里在工厂或作坊中替自己劳动 6 小时，再为他的雇主劳动 6 小时，结果都一样，不过在后一场合，劳动的有偿部分和无偿部分是不可分割地混在一起了，整个交易的实质都因有合同存在和周末支领工资而完全被掩饰了。这种无报酬的劳动在一种场合似乎是自愿的，而在另一种场合则似乎是强迫的。全部区别就在于此。

如果我将使用“劳动价值”这一用语，那不过是把它作为表示“劳动力价值”的通常流行的名词罢了。

10. 利润是按照商品的价值 出卖商品时获得的

假定 1 小时的平均劳动体现为等于 6 辨士的价值，或 12 小时的平均劳动体现为 6 先令。又假定劳动的价值等于 3 先令或 6 小时劳动的产品。其次，如果商品生产过程中所耗去的原料和所消耗的机器等等体现了 24 小时的平均劳动，那末这些生产资料的价值就等于 12 先令。此外，如果资本家所雇的工人再把 12 小时自

己的劳动加到这些生产資料上去，这 12 小时就創造出 6 先令的附加价值。所以产品的价值总额共为 36 小时的物化劳动，即等于 18 先令。但是，既然劳动的价值或付給工人的工資只等于 3 先令，那末，資本家对于由工人所耗費并体現在商品价值里的 6 小时剩余劳动，就沒有支付任何等价。这样，当資本家把这个商品按其价值出卖为 18 先令时，就把他沒有付出任何等价的 3 先令的价值一并实现了。这 3 先令就是他装进自己口袋里的剩余价值或利潤。可見，資本家实现这 3 先令的利潤，并不是由于他按照超过商品价值的价格出卖自己的商品，而是由于他按照商品的实在价值出卖这个商品。

商品的价值是由該商品所包含的**全部劳动量**决定的。但是，这劳动量有一部分体现为用工資形式付过等价的**价值**，另一部分則体现为沒有付过任何等价的**价值**。商品中所含的劳动，一部分是**有偿劳动**，另一部分是**无偿劳动**。所以，資本家按照商品的价值出卖商品，即出卖耗費在該商品上的**全部劳动量**的結晶，是一定要获得利潤的。資本家出卖的不仅有他支付过等价的東西，而且还有他分文未付的**東西**，虽然这東西曾費去了他所雇的工人的劳动。資本家在商品上費去的，和商品实在費去的，是两件不同的事情。总之，我重复說一遍，正常的和平均的利潤，不是由于超过商品实在价值出卖商品得来的，而是按商品实在价值出卖商品得来的。

11. 剩余价值分解成的各个部分

剩余价值，或商品全部价值中体现着工人**剩余劳动**或**无偿劳动**的那一部分，我称之为**利潤**。这种利潤并不是全部都归企业資

本家占有。土地所有者壟斷土地——不管这土地是用于农业，用于建筑，用于铁路还是用于其他某种生产目的，——就有可能以地租名义取得剩余价值中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企业資本家拥有劳动資料，就有可能生产剩余价值，亦即占有一定量的无偿劳动；所以，凡是全部或部分地把劳动資料貸給企业資本家的劳动資料所有者，簡言之，就是放債的資本家，也有可能以收取利息的名义要求取得这剩余价值中的另一部分。这样，留归企业資本家本身的，就只有称为产业利潤或商业利潤的那一部分了。

至于上述三种人这样瓜分全部剩余价值究竟由什么規律来調节的問題，与本題毫无关系。但从以上所述中可以得出下面的結論：

地租、利息和产业利潤不过是商品的剩余价值或商品中所含无偿劳动不同部分的不同名称罢了，它們都是同样从这个泉源并且只是从这一个泉源产生的。它們不是由土地本身和資本本身产生出来的，但是土地和資本使其所有者可能从企业資本家压榨工人所得来的剩余价值中各分得一份。对于工人來說，究竟企业資本家是把这剩余价值——工人剩余劳动或无偿劳动的产物——全部占为己有，或是不得不将其中某些部分以地租和利息的名义分給第三者，这是一个次要的問題。假定說，一个企业資本家只使用自己的資本，并且他本人又是其所需土地的所有者。在这种場合，剩余价值就要完全归他所有了。

直接向工人榨取这剩余价值的正是企业資本家，不論最終他能把这剩余价值中的哪一部分留归自己。所以，整个雇佣劳动制度，整个現代生产制度，正是建立在企业資本家和雇佣工人間的这种关系上面。因此，有几位参加我們討論的公民要想模糊事情的

真相，把企业資本家和工人間的这种根本关系看作一个次要的問題，是不正确的。虽然他們断定，在一定情况下，价格的上漲对企业資本家、土地所有者、貨幣資本家以至征稅者影响的程度极不相同，是正确的。

从以上所述中还可以得出一个結論。

商品价值中只代表原料和机器的价值的那一部分，即只代表消耗了的生产資料的价值的这一部分，絕不会构成收入，只是补偿資本罢了。但是，即使把这个問題撇开不談，如果說商品价值中的另一部分，即构成收入或可能以工資、利潤、地租、利息的形式花費掉的那一部分，是由工資的价值、地租的价值和利潤的价值等等所构成，那也是不正确的。我們先把工資除开不說，只来研究产业利潤、利息和地租。我們剛才說过，商品中所包含的**剩余价值**或商品价值中体现**无偿劳动**的这一部分价值，其本身分解成不同名称的三个部分。可是，如果說商品中的这一部分价值是由这三个組成部分各自独立的**价值相加而构成或形成的**，那就大錯特錯了。

如果一小时的劳动体现为 6 辨士的价值，如果工人的一个工作日为 12 小时，如果这段时间有一半是**无偿劳动**，那末这种**剩余劳动**就在商品上加 3 先令的**剩余价值**，即沒有付过任何等价的**价值**。这 3 先令的**剩余价值**，就是企业資本家可以按任何比例去同土地所有者及放債人瓜分的**全部基金**。这 3 先令的价值，构成他們能够彼此瓜分的那个**价值的限度**。但无论如何也不能說，企业資本家在商品的**价值上任意加上一份价值**作为自己的**利潤**，然后再加上另一份价值給土地所有者等等，从而这商品的**总价值**是由这些任意規定的**价值形成的**。这样，你們可以看出，下面这种流行的观点，即把**一定量的价值分解为三部分**同这**一定量的价值**由三

种独立价值相加形成这二者混淆起来,因而把地租、利潤和利息所产生的总和和价值变成一种随意的定量,該是如何荒謬了。

假定一个資本家所实现的全部利潤等于 100 英鎊,我們把利潤的这个数量看作一个絕對量而称之为利潤量。如果我們計算这 100 英鎊对于預付資本的比,我們就把这个相对量称为利潤率。显然,这个利潤率可以用两种方式来表示。

假定預付在工資上的資本为 100 英鎊。如果所創造出的剩余价值也是 100 英鎊,那就表明这工人的工作日一半是无償劳动,并且——如果我們用預付在工資上的資本价值去測量这个利潤的話——我們就可以說,利潤率等于 100%,因为預付的价值为 100,而所实现的价值則为 200。

另一方面,如果我們不是只看到預付在工資上的資本,而是看到全部預付的資本,即假定为 500 英鎊,其中有 400 英鎊代表原料、机器等等的价值,那末我們就看到,利潤率只等于 20%,因为这 100 英鎊的利潤只为全部預付資本的 $\frac{1}{5}$ 。

前一种表示利潤率的方式,是表明有償劳动和无償劳动間的实在对比关系,即对劳动进行 exploitation [剝削] (請允許我用这个法文字)的实在程度的唯一方式;后一种表示方式是通常习惯用的,并且它确实也适用于某几种目的,至少是非常便于掩飾資本家榨取工人无償劳动的程度。

在我以后的說明中,我将使用利潤一語来标明資本家所榨取的剩余价值总量,不管这剩余价值在不同人群間如何分配;而我在使用利潤率一語时,則总是用利潤对預付在工資上的資本价值的比率来測量利潤。

12. 利潤、工資和价格間的一般关系

如果从商品的价值中除去补偿原料和耗費在商品上的其他生产資料的价值，即除去代表商品中包含的过去劳动的价值，那末，这商品价值的其余部分就是工人在最后一次生产过程中所加的劳动量。如果这个工人每天工作 12 小时，而 12 小时的平均劳动結晶为 6 先令的金量，那末这加的 6 先令价值就是他的劳动所創造的唯一价值。这种由工作時間所决定的一定的价值，就是工人和資本家双方都从中各分一份的唯一基金，即分为工資和利潤的唯一价值。显然，这两方面虽然可以按各种不同比例来分配这一价值，但是这一价值本身是不会变化的。假如不是以一个工人而是以全体工人人数計算，或者不是以一个工作日而是例如以 1 200 万个工作日計算，也同样不会有什么变化。

因为資本家和工人所能分配的仅仅是这个有限的价值，亦即由工人全部劳动所测量的价值，所以一方面分得的愈多，他方面分得的就愈少，*vice versa* [反之亦然]。假如有一个一定的数，則这个数中一部分所增加的，总是另一部分所减少的。假如工資变动，利潤就要朝相反的方向变动。假如工資下降，利潤就要上漲；假如工資上漲，利潤就要下降。如果按照上面的假設，工人得 3 先令，即等于他所創造的价值的一半，換句話說，如果他的整个工作日一半是有偿劳动，一半是无偿劳动，利潤率就是 100%，因为資本家所得的也是 3 先令。假如工人只得 2 先令，或者說他在一个工作日中只有 $\frac{1}{3}$ 的时间是为自己工作，資本家得到的就是 4 先令，利潤率就是 200%。如果工人得到的是 4 先令，資本家只得 2 先令，

利潤率就降至 50%。但是所有这一切变动都不会影响到商品的价值。可見，工資的普遍提高只会引起一般利潤率的降低，而不会影响到商品的价值。

虽然各商品的市場价格归根到底应当由各商品的价值来調节，各商品的价值又唯一由凝結在商品中的劳动总量来决定，而与各該劳动量分为有偿劳动和无偿劳动毫无关系，但是决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例如在 12 小时內所生产的个别或成批商品的价值会是固定不变的。在一定的劳动時間內或由一定的劳动量所生产的商品的数或量，取决于所用劳动的生产力，而不取决于这劳动的時間上的伸延或长度。例如，一个紡紗工人在一个 12 小时的工作日內，在一种劳动生产力的水平下能生产 12 磅棉紗，而在一种較低的劳动生产力水平下只能生产 2 磅棉紗。这就是說，如果 12 小时的平均劳动体現在价值上为 6 先令，那末，在前一場合是 12 磅棉紗值 6 先令，而在后一場合是 2 磅棉紗也值 6 先令。这样一来，在前一場合一磅棉紗只值 6 辨士，在后一場合一磅棉紗竟值 3 先令。这种价格上的差異，就是所用劳动的生产力有差異的結果。当生产力較高时，1 磅棉紗体现 1 小时劳动；当生产力較低时，1 磅棉紗則体现 6 小时劳动。在前一場合，1 磅棉紗的价格只等于 6 辨士，尽管工資較高而利潤率較低，在后一場合，1 磅棉紗的价格則等于 3 先令，尽管工資較低而利潤率較高。其所以这样，是因为 1 磅棉紗的价格是由耗費在这磅棉紗里面的全部劳动量来决定的，而不是由这个劳动量分为有偿劳动和无偿劳动的比例来决定的。于是，我前面所提到的那个事实，即支付得高的劳动可能生产出低廉的商品，而支付得低的劳动可能生产出昂貴的商品这一事实，也就仿佛不再是不近情理的了。这一事实只是反映一个一般的規律，即商品的

价值由消耗在商品中的劳动量来决定，而且这个劳动量完全依所用劳动的生产力为轉移；因而也随劳动生产率的每一变化而变化。

13. 爭取提高工資或反对降低 工資的一些最重要場合

現在讓我們来十分认真地研究一下爭取提高工資或反对降低工資的一些最重要場合。

(1) 我們已經知道，**劳动力的价值**或——用較为流行的說法来表示——**劳动的价值**，是由生活資料的价值或生产这些生活資料所必需的劳动量来决定的。因此，假如在一国里，一个工人平均每天所消費的生活資料的价值为 6 小时的劳动并表现为 3 先令，那末这个工人为生产出他一天的生活費用的等价，就必须每天工作 6 小时。如果整个工作日为 12 小时，那末資本家付給他 3 先令，便偿付了他的劳动的价值。工作日有一半是无偿劳动，利潤率等于 100%。但是現在假定，由于生产率的降低，例如为了生产同量的农产品需要用更多的劳动，于是一个工人每天平均所消費的生活資料量的价格就从 3 先令提高到 4 先令。在这种場合，劳动的价值就增加 $\frac{1}{3}$ ，或增加 $33\frac{1}{3}\%$ 。为要依照工人原来的生活水平生产出他一天生活費用的等价，便需要用 8 小时的劳动；所以，剩余劳动就要由 6 小时减到 4 小时，利潤率就由 100% 降到 50%。但是，工人要求提高工資，不过是要求把他的劳动的增长了的价值付給他，就好像其他所有的商品出卖人在其商品成本費增加时，力求使其商品已經提高的价值得到报酬一样。如果工資沒有提高或提高得不够补偿生活資料已經增长的价值，那末劳动的价格就会

降到劳动的价值以下，而工人的生活水平就会下降。

但变化也可能朝相反的方向发生。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一个工人每天平均所消費的同一数量的生活資料，可能从 3 先令减到 2 先令，換句話說，为要再生产出每天消費的生活資料的价值的等价，就不是需要工作日的 6 小时，而只是需要 4 小时了。現在工人用 2 先令就可以买到从前用 3 先令买到的生活資料了。劳动的价值确实会降低，但在劳动的价值这样减少的情况下，工人仍能买到和从前一样多的商品。在这种場合，利潤就会从 3 先令提高到 4 先令，利潤率也会从 100% 提高到 200%。虽然工人的生活的绝对水平依然照旧，但他的相对工資以及他的相对社会地位，即他与資本家相比較的地位，却会下降。工人反抗这种降低其相对工資的情形，不过是要求在他的已經增长的劳动生产力所生产出的总額中获得应有的一份，并且不过是力求保持他在社会阶梯上的以前的相对地位罢了。例如，英国的工厂主在谷物法廢除后，卑鄙地背棄了他們在鼓动反对谷物法时所作的庄严諾言，把工資普遍降低了 10%。工人的反抗在起初一个时期遭受了失敗，但是后来由于某些情况的影响，——这些情况我此刻不能詳細說明，——原来失去的 10% 又重新被夺回来了。

(2) 生活資料的价值，从而劳动的价值，可能仍旧不变，但是由于貨币的价值已經发生变化，这些生活資料的貨币价格也可能发生变化。

由于发现了更丰富的矿山以及类似的原因，生产例如 2 盎斯金，可能并不比从前生产 1 盎斯金所費的劳动多。在这种場合，金的价值就会降低一半或 50%。劳动的价值，也像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一样，現在就要表現在比以前大一倍的貨币价格上。从前表

現为 6 先令的 12 小时劳动，現在就会表现为 12 先令了。如果工人的工資仍是 3 先令而沒有提高到 6 先令，那末，他的劳动的貨幣价格現在就只等于他的劳动的价值的一半，他的生活水平也就大大降低。在工資虽有提高但却不完全相当于金价值下降程度的場合，这种情况也会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发生。在我們所考察的这个实例中，無論是劳动生产力，無論是供給和需求，也無論是商品的价值，都沒有絲毫变化。除了这些价值的貨幣名称以外，什么也沒有变。如果說，在这样的場合工人不应当爭取工資的相应提高，那就等于說，当他得到的报酬不是实物而是名称时，他也应当心滿意足。过去的整个历史证明，每当发生这样的貨幣貶值时，資本家总是急忙利用这种良机来欺騙工人。但是，許多派別的經濟学家断定說，由于新发现一些产金地、改进銀矿开采和水銀供給較廉的結果，貴重金屬的价值又重新降低了。这也許可以說明为什么大陆上普遍地同时产生了提高工資的要求。

(3) 我們以前都假定**工作日**有一定的界限。但是工作日本身是沒有固定界限的。資本的經常趋向是要极力把工作日延长到体力可能达到的极限，因为随着工作日长度的增加，剩余劳动，从而这劳动所創造的利潤也同样增长起来。資本愈把工作日延长，它占有他人的劳动量也愈多。在十七世紀，甚至在十八世紀的前三分之二的時間里，全英国的正常工作日都是 10 小时。在反雅各宾战争¹³² 时期，——这一战争实际上是不列顛貴族反对不列顛劳动群众的战争，——資本常常庆祝自己的胜利，并把工作日从 10 小时延长到 12 小时，14 小时，18 小时。馬尔薩斯决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但他在 1815 年左右出版的一本小册子中宣称，如果这种情形再繼續下去，民族的生命就会被根本摧毀¹³³。在普遍应用新

发明的机器前几年即1765年左右,英国出了一本題为“論工业”¹³⁴的小册子。匿名的作者是工人阶级的死敌,他硬說必須扩大工作日的界限。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提議,除了采取其他手段之外,要建立一种习艺所,这种习艺所按他的話說,应该是“恐怖所”。他給这种“恐怖所”規定的工作日是多长呢? 12小时,——这恰好是1832年資本家、經濟学家和內閣大臣們所宣布的、对于12岁以下的儿童不仅是已經在实行,而且也是必要的工作時間¹³⁵。

工人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而在現代制度下他是不得不这样做的,——就是把这个劳动力让給資本家来消費,但是要在一定的合理的界限內消費。他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是为了保持这个劳动力,——这里我們且把它的自然損耗撇开不說,——而不是为了毁灭这个劳动力。工人在按劳动力每天或每周的价值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时有一个前提,就是这个劳动力在一天或一周內不应受到两天或两周內受到的那样大的損耗。現在举一架价值1000英鎊的机器为例。如果这架机器能用10年,它在它所参与生产的商品的价值上每年将加100英鎊。如果这架机器能用5年,它每年在这些商品的价值上将加200英鎊。換句話說,它每年所損耗的价值和它所能使用的期限成反比。但这正好是一个工人和一架机器不同的地方。机器的損耗并不完全同它的使用期限相适应。而人的情况却相反,他的衰老程度要比单凭延长其工作的数字材料所能設想的程度大得多。

当工人为爭取把工作日减到原先的合理界限而斗争时,或是当他們不能达到由法律規定出一种正常的工作日,而不得不力求用提高工資的办法,使工資提高得不仅和从他們身上榨取的剩余時間成比例,而且还要超过这一時間的办法,来防止过度劳动时,

他們不过是在履行他們对自己和自己种族的一种义务罢了。他們不过是对資本的橫暴掠奪加些限制罢了。時間是人类发展的空間。一个人如果没有一分钟自由的時間，他的一生如果除睡眠飲食等純生理上的需要所引起的間断以外，都是替資本家服务，那末，他就連一个載重的牲口还不如。他身体疲憊，精神麻木，不过是一架为別人生产財富的机器。同时，現代工业的全部历史都表明，如果不对資本加以限制，它就会不顾一切和毫不留情地力求把整个工人階級弄到这种极端退化的絕境。

資本家延长工作日，可能付出較高的工資，但同时仍会降低劳动的价值。如果工資的提高同加强榨取工人劳动量的程度，以及同因此而加速的劳动力的損耗程度不相适应，这种情形是可能发生的。資本家也能用別种方法达到这点。例如英国資產階級統計学家会告訴你們，在郎卡郡工厂里工作的工人家庭的平均工資增加了。他們却忘記补充說，現在投在資本的札格納特車輪¹³⁶下的，除了作为家长的成年男子，还有他的妻子，也許还有三四个小孩，而他們工資總額的增加同从工人家庭榨取出来的剩余劳动的总量的增加是不相称的。

甚至在工作日有一定界限的情况下，即在現今一切服从工厂立法的工业部門中存在这种界限的情况下，仅仅为了把劳动价值保持在原有水平上，提高工資也是必要的。劳动强度的提高可能迫使一个人在一小时内耗費他从前在两小时内耗費的生命力。在服从工厂立法的那些生产部門，由于机器动作速度的加强和每个人管理的工作机数量的加多，这种情形已經在某种程度上出現了。如果劳动强度的提高或一小时内所費劳动量的增大与工作日的縮短保持应有的比例，那末这种縮短还能让工人得到好处。如果这

个限度被破坏了，工人在一种形式下得到的好处就会在另一种形式下丧失掉，而 10 小时的劳动就可能造成像从前 12 小时那样大的破坏影响。工人通过争取把工资提高到相当于劳动强度提高的程度来制止资本的这种倾向，不过是反对使自己的劳动跌价和自己的种族退化罢了。

(4) 你们都知道，由于某些原因，——对于这些原因，现在没有说明的必要，——资本主义的生产要经过一定的周期性的循环。它要经过消沉、逐渐活跃、繁荣、生产过剩、危机和停滞等阶段。商品的市場价格和市場利潤率，都随着这些阶段而变化，有时低于自己的平均水平，有时高于自己的平均水平。你们考察一下这整个周期就会发现，市場价格的一种偏差是由别种偏差来补偿的，而在整个周期范围内，平均说来，商品的市場价格是由商品的价值来调节的。在市場价格下跌的阶段，以及在危机和停滞的阶段，工人即使不被从生产中完全抛出去，他的工资也一定会被降低。为了不致受騙起见，他甚至在市場价格这样下降的时候，也应当在工资究竟该降低多少的问题上同资本家进行斗争。如果工人在资本家获得特别高的利潤的繁荣阶段不争取提高工资，那末他在整个工业周期内，平均说来甚至会得不到自己的平均工资或自己劳动的价值。工人的工资在周期中的不顺利阶段是必然要下降的，因此，如果要求工人在顺利的阶段拒绝争取补偿自己的损失，那就未免太愚蠢了。一般说来，一切商品的价值，只是由于不断变动的市場价格趋于平衡才能够实现，而这种趋于平衡又是供給和需求不断变动的结果。在现代制度的基础上，劳动不过是一种商品，是一种和其他商品一样的商品。这就是说，劳动也必然要经历同样的变动，而且只是由于这些变动的结果，才能够获得与其价值相适应的平

均价格。如果一方面把劳动看做一种商品，另一方面却把劳动放在那些調节商品价格的規律之外，那就很荒謬了。奴隶能得到經常的和定量的生活資料，雇佣工人却不是这样。雇佣工人应当爭取自己工資的提高，即使只是为了补偿它在別种場合的降低。如果工人馴服地接受資本家的意志，接受資本家的命令，并把它当作最高的經濟規律，他就一定要挨受奴隶所受的一切苦痛，而又得不到奴隶所享有的生存保障。

(5)在我所考察过的一切場合——它們是一百个中的九十九个——我們已經看見，提高工資的斗爭只不过是跟随先前的变化而来的，是由于生产的規模、劳动的生产力、劳动的价值、貨幣的价值、被榨取的劳动长度或强度、为供給和需求的升降所决定并与工业周期的各阶段相适应的市場价格漲落等方面发生变化所必然产生的結果；簡言之，这一斗爭就是劳动对資本先前行动所表示的一种反抗行动。如果撇开这些情况来考察爭取提高工資的斗爭，只看到工資的变动而忽視制約这些变动的其他一切变动，那你們就是根据一个錯誤的前提去得出錯誤的結論了。

14. 資本和劳动之間的斗爭及其結果

(1)我已經指出，工人周期地反抗降低工資以及他們周期地力图提高工資，同雇佣劳动制度有密切的联系，并且也正是受下面这一事实所制約，即劳动既然等同于商品，因而也就受那些支配着一般价格变动的規律的支配。其次，我又已經指出，工資的普遍提高会引起一般利潤率的降低，但却不会影响到商品的平均价格，也不会影响到商品的价值。現在終於发生了一个問題：在資本和劳

动之間的这场不断的斗争中,后者能取得多大的成功呢?

我可以概括地回答说,劳动的**市场价格**,如同其他一切商品的市场价格一样,在长时期里会与它的价值相适应;因此,不论怎样涨跌,也不论工人如何行动,他所得到的,平均起来只会是自己劳动的价值,亦即由维持和再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来决定的劳动力的价值,而这生活资料的价值又是由生产这生活资料所必需的劳动量来决定的。

但是, **劳动力的价值或劳动的价值**由于某些特点而与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不同。劳动力的价值由两种要素所构成:一种是纯生理的要素,另一种是历史的或社会的要素。劳动力价值的**最低界限**由生理的要素来决定。这就是说,工人阶级为要保持和再生产自己,为要延续自己肉体的生存,就必须获得自己生活和繁殖所绝对必需的生活资料。所以这些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就构成**劳动的价值**的最低界限。另一方面,工作日的长度也有自己的极限,虽然伸缩性很大。它的最高限度决定于工人的体力。如果工人生命力每天的消耗超过一定限度,他就没有可能来每天重复这样紧张的工作。可是,我已经说过,这种界限的伸缩性是很大的。身体弱和寿命短的工人一代一代迅速地更替,也可以像身体强和寿命长的工人那样,使劳动市场得到保证。

除了这种纯粹生理的要素以外,劳动的价值还取决于每个国家的**传统生活水平**。这种生活水平不仅包括满足生理上的需要,而且包括满足由人们赖以生息教养的那些社会条件所产生的一定需要。英国人的生活水平可能降到爱尔兰人的生活水平;德国农民的生活水平可能降到里窝尼亚农民的生活水平。关于历史传统和社会风俗在这方面起的巨大作用,你们可以从桑顿先生著的“人

口过剩論”¹³⁷一書里看出，該書作者指出，英國各農業區的平均工資，至今還由於這些區域在脫離農奴狀態時所處條件的好壞程度不同而多少有些不同。

包含於勞動價值中的這一歷史的或社會的要素可能擴大，也可能縮小，甚至可能完全消失，以至除了生理上的限界以外什麼也不會剩下。在反雅各賓戰爭時期（正如那位不可救藥的吞食賦稅者兼尸位素餐者的老喬治·羅斯經常說的那樣，這個戰爭是為挽救我們神聖宗教的福利免遭瀆神的法國人的侵犯而發動的），仁慈的英國農場主（我們在先前某次會議上曾好意地談過他們），竟把農業工人的工資甚至降低到這種純粹生理上的最低界限以下；而對於為保持工人的肉體生存並延續其種族所必需的生活資料方面的缺額，他們則根據濟貧法¹³⁸用救濟金來填補。這是把僱傭工人變成奴隸，把莎士比亞的驕傲自由民變成貧民的一種高明手法。

如果你們把各個不同國家內或同一國家各個不同歷史時代內的工資水平或勞動的價值水平比較一下，你們就會發現，勞動的價值本身不是一個常數，而是一個變數，它甚至在其他一切商品的價值仍舊不變的條件下也是一個變數。

這種比較也可以表明：不僅市場利潤率是變動的，而且平均利潤率也是變動的。

然而對於利潤來說，並不存在任何一種可以決定其最低限度的規律。我們不能說，利潤降低的極限是怎樣的。為什麼我們不能夠確定這個限度呢？因為我們雖能確定工資的最低限度，我們卻不能夠確定工資的最高限度。我們只能說，如果工作日的界限是一定的，利潤的最高限度就與生理上所容許的工資的最低限度相適應；如果工資是一定的，利潤的最高限度就與工人體力所能容

許的工作日延長程度相適應。所以利潤的最高限度受生理上所能容許的工資的最低限度和生理上所能容許的工作日的最高限度的限制。顯然，在最高利潤率的這兩個界限之間可能有許多變化。利潤率的實際水平只是通過資本與勞動之間的不斷鬥爭來確定，資本家經常力圖把工資降低到生理上所能容許的最低限度，把工作日延長到生理上所能容許的最高限度，而工人則經常在相反的方向上進行抵抗。

歸根到底，這是鬥爭雙方力量對比的問題。

(2) 至於談到**限制工作日**，無論在英國或其他各國，這種限制從來都是依靠立法上的干涉，而這種干涉如果沒有工人方面的經常壓力，是永遠也不會出現的。無論如何，工作日的限制決不可能通過工人和資本家之間的私人協商來達到。這種採取**普遍政治行動**的必要性本身就證明了，資本在其純粹經濟的行動上是比較強有力的一方。

至於談到**勞動價值的界限**，那末，這種界限的實際確定總是依供給和需求為轉移。我所說的是資本方面對勞動的需求和工人方面對勞動的供給。在殖民地國家里，供求規律有利於工人。因此，美國的工資水平是比較高的。在那裡，資本用盡一切辦法，也不能制止勞動市場往往因僱傭工人經常轉化為獨立自耕農而陷於空虛的情況。對於很大一部分美國人民說來，當僱傭工人僅僅是一種過渡狀態，他們希望遲早總能脫離這種狀態。為了糾正殖民地的這種情況，父母為懷的不列顛政府不久前就開始奉行一種所謂現代殖民學說，其內容是對殖民地的土地人為地規定一種高價，借以阻止僱傭工人過分迅速地轉化為獨立農民。

現在我們來談談資本支配全部生產過程的那些古老的文明國

家。例如拿英国农业工人的工資在 1849 年至 1859 年时期提高的情形來說吧。由于这种提高而产生的后果怎样呢？农場主沒有能够——正如我們的朋友韦斯頓会劝告他們的那样——提高小麦的价值；他們甚至沒有能够提高小麦的市場价格。相反，他們不得不听任这种市場价格下降。但在这十一年中，他們采用了各种机器，开始掌握各种更科学的方法，把一部分耕地变成了牧場，增大了农場的規模，同时也扩大了生产的規模，并且由于采取了这些以及其他各种提高劳动生产力的措施而减少了对劳动的需求后，又使得农村人口相对过剩起来了。資本在各个早已住有居民的古老国家內用来或快或慢地对付提高工資的方法，一般都是如此。李嘉图正确地說过，机器經常跟劳动相竞争，并且往往只有在劳动价格已达到某种高度的条件下才可能被采用¹³⁹；然而采用机器不过是提高劳动生产力的許多方法之一罢了。同一发展过程，一方面使简单劳动成为相对过剩，另一方面又使熟练劳动簡單化，因而也就使其价值降低。

这同一規律还以另一种形式来实现。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即使工資的水平相当高，資本的积累也是愈来愈快。由此可以作出結論，——正如**亚当·斯密**（在他生活的时代，近代工业还处于幼年时期）所作过的那样，——資本的这种加速积累，由于能保证对工人劳动的需求日益增长而必然会使情况对工人有利。現代許多著作家都同意这种观点，所以对于最近二十年来英国資本的增加比人口的增加迅速得多，而工資却沒有相应地大量提高一事，感到詫異。但是随着积累的进展，**資本的构成**也发生愈来愈大的变化。資本中由不变資本即由机器、原料和各种生产資料等所构成的这一部分，比耗費在支付工資或购买劳动上的那一部分日益

增多起来。这一規律已由巴頓、李嘉图、西斯蒙第、理查·琼斯教授、拉姆賽教授、舍尔比利埃及其他等人多少确切地闡明过了。

如果資本中这两个构成部分原来的比例是一比一，那末它在工业进一步发展的情况下将成为五比一，等等。如果总資本为600，其中300是用在工具和原料等上面，其余300是用在工資上面，那末要造成对600工人而不是对300工人的需求，就需要使总資本增加一倍。但是如果总資本600中有500是用在机器和原料等上面，只有100是用在工資上，那末要造成对600工人而不是对300工人的需求，这同一資本就要从600增至3600。因此，在工业发展的进程中，对劳动的需求总是赶不上資本的积累。不錯，这一需求是增加的，但它是在和总資本的增加比較起来日益递减的比例上增加的。

上面这些不多的解釋足以表明，現代工业的发展本身定会愈来愈有利于資本家而有害于工人，所以資本主义生产的总趋势不是使平均工資水平提高，而是使它降低，也就是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使劳动的价值降低到它的最低限度。但是，既然現代制度下的实际情况有着这种趋势，那末，这是不是說，工人阶级应当放棄对資本的掠夺行为进行斗争，并应当停止利用偶然的有利机会来暂时改善自己状况的尝试呢？如果工人这样做，他們就会淪为一群听天由命的、不可挽救的可怜虫。我想我已經說明：工人为工資水平进行的斗争，同整个雇佣劳动制度有密切的联系；工人为提高工資的努力，在一百回中有九十九回都只是力求維持劳动的現有价值；工人为劳动价格而与資本家斗争的必要性，是根源于工人所处的被迫把自己当作商品出卖的地位。如果工人在和資本的日常冲突中表示畏縮让步，他們就决不能开展任何規模較大的运动。

同时，即使把工人所处的那种和雇佣劳动制度相連的一般奴役地位完全撇开不談，工人阶级也不应夸大这一日常斗争的最終結果。它不应当忘記：它在这种日常斗争中只是在反对結果，而不是在反对产生这种結果的原因；只是在阻撓这种下降的趋势，而不是改变这一趋势的方向；只是在用止痛剂，而不是在除病根。所以工人不应当只局限于这些由于資本的永不停止的进攻或市場的各种变动而必然經常出現的游击式的搏斗。他們应当懂得：現代制度除了带来一切貧困外，同时还造成对社会进行經濟改造所必需的种种物质条件和社会形式。工人应当摒棄“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資！”这种保守的格言，而要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革命的口号：“消灭雇佣劳动制度！”

为了闡明基本問題，我不得不作这样一个冗长的，恐怕是令人厌倦的說明，現在我提出下面的決議案来結束我的报告：

(1) 工資水平的普遍提高，会引起一般利潤率的降低，但整个說来并不影响到商品的价格。

(2) 資本主义生产的总趋势不是引起工資平均水平的提高，而是引起这个水平的降低。

(3) 工联作为抵抗資本进攻的中心，行动得頗有成效。它們遭到失敗，部分是由于不正确地使用自己的力量。然而一般說来，它們遭到失敗則是因为它們只限于进行游击式的斗争以反对現存制度所产生的結果，而不同时力求改变这个制度，不运用自己有組織的力量作为杠杆来最終解放工人阶级，也就是最終消灭雇佣劳动制度。

THE COMMONWEALTH

REGISTERED FOR TRANSMISSION ABROAD

No. 159.

SATURDAY, MARCH 24, 1866.

Price One Penny.

弗·恩格斯 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¹⁴⁰

致“共和国”周报编辑

阁下：

凡是工人阶级独立参加政治运动的地方，他们的对外政策一开始就用不多的几个字——恢复波兰表达出来。整个宪章运动时期的情形是如此；法国工人在1848年前很久，以及在值得缅怀的1848年是如此，他们在1848年5月15日走向制宪议会的时候曾经高呼«Vive la Pologne!»——波兰万岁！¹⁴¹ 德国的情形也是如此，1848年和1849年德国工人阶级的好几家机关报都曾要求对俄作战以恢复波兰。¹⁴² 就是现在，除了下面将要详细谈到的一个仅有的例外，情形也是如此。欧洲工人一致宣称恢复波兰是自己政治纲领的不可分割的部分，是最能表达他们对外政策的一种要求。诚然，资产阶级也曾“同情过”，而且现在也还“同情”波兰人，但是，这种同情并不妨碍他们在1831年、1846年和1863年让波兰人陷于灾难，甚至也不妨碍他们一面在口头上维护波兰的利益，一面却放纵波兰最凶恶的敌人如帕麦斯顿勋爵之流（这些人实际

上是俄国的帮凶)去为非作歹。工人階級的态度却迥然不同。他們要过問,而不是不过問;他們要对俄作战,因为俄国干涉波兰的事务;而且每当波兰人起来反对自己的压迫者的时候,他們都证明了这一点。就在不久以前,国际工人协会更充分地表达了它所代表的階級的这种共同的本能的感情,在自己的旗帜上写道:“抵抗俄国对欧洲的威胁——恢复波兰!”¹⁴³

西欧工人和中欧工人对外政策的这一綱領,得到了这个綱領被提給的那个階級的一致承认,不过,正如上面已經指出的,这里只有一个例外。在法国工人中間,有一小部分是已故的比·約·蒲魯东的学派的追随者。这一学派 in toto [完全]与大多数先进的有思想的工人背道而馳;它把他們称之为愚笨的大老粗,在大多数問題上都与他們持完全对立的意見。它对他們的对外政策也是抱这种态度。蒲魯东主义者充当被压迫的波兰的审判官,像斯泰里布雷芝的陪审員一样,宣判波兰是“罪有应得”。他們称赞俄国是未来的偉大国家,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强国,像美国那样微不足道的国家甚至不值得和它并提。他們責备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說它抄襲了波拿巴主义的民族原則(Principle of nationalities)^①,宣布慷慨的俄国民族(people)不在文明欧洲范围以內,而这是違反世界民主和各民族友好原則的严重恶行。这就是他們的責难。¹⁴⁴如果把他們的民主辭句丢在一边,那就立刻可以看出:他

① 恩格斯在这篇文章里用了 nation (нация)、nationality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ь) 和 people (народ) 三个詞。这三个詞一般都譯“民族”,我們在这里同样也譯“民族”。但在本文中这三个詞的含义是有区别的。为了不致混淆起見,凡原文用 nationality 和 people 的地方,我們都附上原文;凡不附原文的地方,則原文都是用 nation。——譯者注

們是在怎样逐字逐句地重复各国极端保守派关于波兰和俄国的言論。諸如此类的責难是不值一駁的；但是，既然这些話是出自工人階級一部分人之口（尽管是很小一部分人），那就应当再一次考察一下俄波問題，論证一下今后我們可以称作已联合起来的欧洲工人的对外政策的那种东西。

可是，为什么在談到波兰的时候，我們总是只提一个俄国呢？难道奥地利和普魯士这两个德意志人的强国不也是参加了对波兰的掠夺嗎？难道它們不也是奴役着波兰的一部分領土并同俄国一起鎮压波兰的任何民族运动嗎？

大家很清楚，奥地利如何持續不变地力求站在波兰事务之外，如何长期地反对俄国和普魯士策划的瓜分計劃。波兰曾是奥地利反对俄国的天然同盟者。自从俄国成为威胁力量的那一刻起，最符合奥地利利益的，莫过于在奥地利和一个新兴的强大帝国之間保持一个不受侵犯的波兰。奥地利只是在看到波兰的命运已經决定，不管有沒有它参加，另外两个强国都决心要消灭波兰的时候，才出于自卫感而加入它們一伙，以便也能拿到一份領土。但是，早在1815年它就主張恢复独立的波兰；1831年和1863年，它曾准备在英法同意支持它时为此而战，并放棄自己占据的一部分波兰領土。克里木战争时期的情形也是如此。談論这一切，并不是为奥地利政府的总的政策进行辯护。奥地利經常都在证明：压迫更弱小的民族，是奥地利統治者习以为常的事情。不过，在波兰問題上，自卫的本能比对新的領土的貪婪和統治者的习惯都更加强烈罢了。这就是目前不必談奥地利的的原因所在。

至于談到普魯士，屬於它的那一部分波兰領土很小，沒有多大意义。它的朋友和盟国俄国居然把它在三次瓜分中所得到的弄

走了十分之九。而留在它手上的这一点点东西，却像梦魇一样纏得它透不过气来。这就把它拴在俄国的凱旋車上，使得它的政府竟然在 1863 年和 1864 年能够毫无阻碍地在普屬波兰，以后更进而在全国所有其他地方，破坏法律，侵犯人身自由、集会权利和出版自由；这就完全弄坏了資產階級的自由主义运动，資產階級由于担心在东方边界上失去若干平方英里的領土，曾允許政府把波兰人置于法律保障之外。不仅是普魯士的工人，而且整个德国的工人，都比任何其他国家的工人更关心波兰的恢复，而且在每次革命运动中他們都表明自己已經意識到这一点。對他們來說，恢复波兰就意味着使他們自己的国家摆脱对俄国的臣服地位。因此，我們觉得：普魯士也不是罪魁。当俄国的工人階級（如果在这个国家里有像西欧所理解的那种意义上的工人階級的話）提出自己的政治綱領，而这个綱領又包含有解放波兰的要求的时候，——到那个时候，也只有到那个时候，問題才不会涉及俄罗斯这个民族，而要受到譴責的就只是沙皇政府了。

二

致“共和国”周报編輯

有人說，要求波兰独立似乎就意味着承认“民族原則”，而民族原則是为支持法国的拿破侖专制所搞出来的一种波拿巴主义的发明。这个“民族原則”究竟是什么呢？

根据 1815 年的条約划定的欧洲各国的疆界，只符合于外交的要求，主要是符合于当时最强大的大陆国家——俄国的要求。无论是居民的意願、利益，或者民族区分，都沒有加以考虑。于是，波兰被瓜分了，德国被分裂了，意大利被分裂了，至于居住在东南欧的当时还很少为人知道的許多更小的民族 (nationalities)，就更不用說了。因此，对于波兰、德国和意大利來說，力求恢复民族統一就成了一切政治运动的第一步，因为沒有民族統一，民族生存只不过是一个幻影。当 1821—1823 年意大利和西班牙的革命尝试被镇压下去以后，以及又在 1830 年法国七月革命以后，文明欧洲大部分地区的激进的政治活动家彼此建立了联系，并试图制定一种类似共同綱領的东西，解放和統一被压迫和被分裂的民族，便成了他們的共同口号。¹⁴⁵ 1848 年的情形也是如此，那时，被压迫民族中又增加了一个，这就是匈牙利。关于欧洲每一个大的民族构成体在一切内部事务上有权支配自己的命运而不管它的邻邦这一点，当然不会有两种意見，因为这并不妨害他人的自由。这一权利确实是所有民族内部自由的基本条件之一。例如，当德国还在帮

助奥地利直接地、或者通过自己的附庸去奴役意大利的时候，它能不能达到自由和统一呢？要知道奥地利王朝的彻底摧毁是德国统一的最首要的条件！

这种为欧洲民主派所承认的欧洲各个大的民族构成体对政治独立的权利，当然不能不得到特别是工人阶级方面的同样承认。实际上，这也就是承认其他生命力显然很强的大的民族具有那种正是各国工人自己所要求的独立的民族生存权利。不过，这种承认和对民族愿望的同情，只是同欧洲那些大的、历史上清楚确定了民族有关；这就是意大利、波兰、德意志和匈牙利。而法国、西班牙、英国和斯堪的那维亚，它们没有被分裂，也没有处在外国的统治之下，所以它们只是间接地同这件事有关；至于说到俄国，它只能说是大量脏物的占有者，到清算那一天，它必须退还这些脏物。

路易-拿破侖，这个“上奉天命、下承民意”的皇帝，于1851年 coup d'état [政变] 以后，不得不为自己的对外政策发明一种民主化了的、通俗的名称。于是就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民族原则”——还有什么能比这更好呢？每一个民族(nationality)都应当是自己命运的主宰；任何一个民族(nationality)的每一个单独部分都应当被允许与自己的伟大祖国合并，——还有什么能比这更自由主义呢？不过，请注意，——现在说的已经不是 *Nations*，而是 *Nationalities* 了。

欧洲没有一个国家不是一个政府管辖好几个不同的民族(nationalities)。苏格兰山区的凯尔特人和威尔士人，按其民族(nationality)来说，无疑地有别于英格兰人，然而，谁也不把这些早已消失了的民族(peoples)的残余叫做民族，同样，谁也不会把法国

布列塔尼的凯尔特居民叫做民族。此外，沒有一条国家分界綫是与民族 (nationalites) 的自然分界綫，即語言的分界綫相吻合的。法国境外有許多入，他們自己的語言是法語，同样，德国境外也有許多人，他們說的是德語，这种情形大概还会繼續存在下去。欧洲最近一千年来所經歷的复杂而緩慢的历史发展的自然結果是，差不多每一个大的民族都同自己机体的某些末梢部分分离，这些部分脱离了本民族的民族生活，多半参加了其他某一民族 (people) 的民族生活，已經不想再和本民族的主体合并了。瑞士和亚尔薩斯的德意志人不願再合并于德国，同样，比利时和瑞士的法兰西人也不願在政治上再合并于法国。而这种情况最終会带来不小的好处：政治上形成的不同的民族往往包含有某些異族成分，这些異族成分同它們的邻人建立联系，使过于单一的民族性格具有多样性。

这样一来，我們可以看出，在“民族原則”同民主派和工人阶级关于欧洲各个大的民族有分离的独立的生存权利的旧論点之間，是有差别的。“民族原則”完全不触及欧洲历史上的一些民族 (peoples) 的民族生存权利这个大問題，如果說它也触及的話，那也只是为了混淆問題。民族原則提出了这样两类問題：第一是关于这些历史上的大的民族 (peoples) 之間的分界綫問題；第二是关于一些民族 (peoples) 的为数众多的細小殘余的民族独立生存权利問題，这些民族 (peoples) 在历史舞台上曾經或长或短地存在过一个时期，但后来却成为某一个更有生命力因而也能克服更大困难的較强大的民族的組成部分。一个民族 (people) 在欧洲的重要性，它的生命力，从民族原則的观点看来，是算不了什么的；在它看来，从来沒有历史、也沒有創造历史所必需的精力的瓦拉几亚的罗

馬尼亞人，同具有两千年历史并具有坚韧不拔的民族生命力的意大利人，具有同等重要意义；威尔士人和曼恩島居民，只要他們願意，他們就能像英格兰人一样地享有独立的政治生存权利，而似乎这不是什么荒謬的看法。¹⁴⁶ 但所有这些都是絕頂荒謬的，它被套上一种通俗的形式，好用来迷惑輕信者；所有这些不过是一句便当的空話，需要时利用利用，不需要时就一脚踢开。

不管这种发明多么空洞，但是要把它想出来，却需要比路易-拿破侖的头脑更加聪明的头脑。民族原則决不是波拿巴主义者为了恢复波兰所搞出来的发明，而只是俄国人为了灭亡波兰所臆造出来的发明。正如下面我們就会看到的，俄国在遵守民族原則的借口下吞并了旧波兰的大部分領土。这种思想已經存在有一百多年了，而現在，俄国正在經常地利用它。泛斯拉夫主义不就是俄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把民族原則应用于塞爾維亞人、克罗地亚人、卢西人¹⁴⁷、斯洛伐克人、捷克人以及其他在土耳其、匈牙利和德国境內的昔日的斯拉夫民族 (peoples) 的殘余嗎？甚至就在現在，俄国政府还有許多代理人奔走于挪威北部和瑞典的拉伯兰人中間，为的是在这些游牧的野蛮人当中鼓吹“大芬兰民族 (nationality)”的思想，說在欧洲的极北地区应当恢复大芬兰民族，当然，是在俄国的庇护之下。被压迫的拉伯兰人的“絕望的哭声”在俄国报刊上响得很厉害，但这哭声不是出自被压迫的游牧人自身，而是出自俄国的代理人，——要知道，强迫这些可怜的拉伯兰人不只是說他們的野蛮的半爱斯基摩方言，还要他們学文明的挪威語或瑞典語，这的确是一种惊人的压迫啊！只有在东欧，民族原則才能够真正被发明出来，在那里，一千年来亚洲人入侵的浪潮一个接一个涌来，把一大堆一大堆混杂的民族碎片留在岸上，直到現在民族学家也只

能勉强把它们区分开来；在那里，十分混乱地杂居着土耳其人、操芬兰语的马扎尔人、罗马尼亚人、犹太人以及近一打斯拉夫部落。这就是制造民族原则的基础，而俄国是怎样把它制造出来的，我们现在来看看波兰的例子。

三

民族理論 (Doctrine of nationality)
之运用于波兰

在波兰，也同差不多所有其他欧洲国家一样，居住着各种不同民族 (nationalities) 的人。波兰的大多数居民即它的基本核心，无疑是操波兰語的本地波兰人。可是，自 1390 年起，波兰本土就已经与立陶宛大公国合并¹⁴⁸，后者在 1794 年最后一次瓜分以前曾是波兰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这个立陶宛大公国境内，曾經居住过許多不同的部落。波罗的海沿岸的北部省份由立陶宛人自己管轄，这是一种与他們的斯拉夫邻人操不同語言的民族 (people)；这些立陶宛人很大一部分曾被日耳曼移民所征服，而日耳曼移民反过来又吃力地防預着立陶宛的大公。其次，在現今的波兰王国的南部和东部，住着白俄罗斯人，他們的語言介乎波兰語和俄罗斯語之間，而更接近于俄罗斯語；最后，在南部地区还住着所謂的小俄罗斯人，大多数权威人士认为，他們現在的語言与我們通常称之为俄罗斯語的大俄罗斯語完全不同。所以，如果有人說，要求恢复波兰就意味着訴諸民族原則，那只能证明他們不懂他們究竟說了些什么，因为恢复波兰，就是恢复至少由四个不同民族 (nationalities) 組成的国家。

当旧的波兰国家由于同立陶宛合并而組成时，俄国的情形是怎样的呢？那时，它还处在蒙古征服者的铁蹄之下，而在这以前一

百五十年，波兰人和日耳曼人就已經共同努力把蒙古征服者赶回东方，赶过德涅泊河去了。莫斯科的大公們却只是在长期斗争之后，才终于摆脱了蒙古人的羈絆，开始把大俄罗斯的許多公国联合成一个統一的国家。然而，这一成就看来只是助长了他們的野心。当君士坦丁堡剛落入土耳其人之手，莫斯科大公就把拜占庭皇帝的双头鷹添进了自己的国徽，从而宣称自己是他們未来的继承人和复仇者；大家都知道，从那时起俄国人就力求占領沙皇格勒即沙皇城（他們在自己的語言中是这样称呼君士坦丁堡的）。后来小俄罗斯的富饒平原又引起了他們的吞并欲望；可是，波兰人从来就是驍勇的，而且在当时还是一个强大的民族（people），他們不仅善于保卫自己的国家，而且还能进攻別的国家；十七世紀初，他們甚至把莫斯科占領了好几年¹⁴⁹。

当政的貴族的逐漸腐化，資產階級賴以发展的力量不足，以及耗尽国家元气的連年战争，终于摧毁了波兰的威力。一个頑固地保持着封建社会制度不受侵犯的国家，当它的所有邻邦都在进步，形成了自己的資產階級，发展了貿易和工业，建立了許多大城市的时候，——这样的国家就注定要衰落。貴族确实使波兰衰落了，完完全全衰落了。而在把它弄到这步田地之后，貴族又互相責难，并把自己和自己的国家出卖給外国人。1700年至1772年的波兰历史，不过是俄国人在波兰篡夺政权的編年史，而这种篡夺之所以可能，就是由于貴族的出卖。俄国兵差不多不断地占領着这个国家，波兰国王即使自己并不想做卖国賊，但也愈来愈成为俄国大使手中的玩物。这种把戏耍得那样成功，繼續得那样长久，以至于到波兰最后被灭亡的时候，整个欧洲都沒有提出一声抗議，而大家感到惊奇的只是：为什么俄国那样慷慨地把那么大一块領土让給了奥

地利和普魯士。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实现这次瓜分的方式。当时在欧洲已經存在着一种文明的“輿論”。虽然“泰晤士报”¹⁵⁰当时还没有着手去制造这种商品，但是已經有这样一种在狄德罗、伏尔泰、卢梭以及十八世紀法国其他作家的巨大影响下形成的輿論。俄国向来就知道尽可能使社会輿論站在自己一边有多么重要，而且它也沒有忘記去爭取这种輿論。叶卡特林娜二世的宮廷变成了当时有教养的人士、特别是法国人集聚的大本营；这位女皇和她的宮廷声明信奉最文明的原則，她竟然能够把輿論引入这样的迷途，以致伏尔泰和其他許多人都歌頌“北方的塞米拉米达^①”，宣揚俄国是世界上最进步的国家，是自由主义原則的祖国，是信教自由的維護者。

信教自由——这就是为了消灭波兰所需要的字眼。波兰在宗教問題上从来就是非常自由的；下述事实就是证明：当犹太人在欧洲所有其他国家遭到迫害时，他們在这里却找到了避难所。东部各省的大部分居民信奉正教，而波兰人則是天主教徒。这些正教徒中有很很大一部分人在十六世紀时被迫承认羅馬教皇的最高权力，因而被叫作东方礼天主教徒，不过他們当中有很多人在各方面仍然保持原先的正教信仰。这主要是农奴，而他們的高貴主人差不多全都是天主教徒；这些农奴按民族（nationality）來說都是小俄罗斯人。可是俄国政府在自己的国家里，除正教而外，不容忍其他任何宗教，它把叛教当作罪行严加惩罚，它征服别的民族，吞并左右邻邦的領土，同时不断加强对俄罗斯农奴的束縛，——就是这个俄国政府，却很快对波兰大肆攻击起来，它借口信教自由，說什

^① 塞米拉米达是傳說中的亚述女王。据希腊历史家說，她在巴比倫建筑了一座被称为“世界七大奇景”之一的“空中花园”。——譯者注

么因为波兰压迫正教徒；借口要维护民族原则，因为东部地区的居民是小俄罗斯人，需要把他们合并到大俄罗斯里去；并且借口革命权利，武装农奴去反对他们的主人。俄国是完全不择手段的。人们在谈到阶级对阶级的战争时，总是把它看做一种非常革命的东西；但是，俄国大约还在一百年以前就在波兰开始了这样的战争，而这是阶级战争的绝妙样品，当时，俄国的士兵和小俄罗斯的农奴一起前进，焚烧波兰贵族的城堡，但只是为了给俄国的吞并作准备；一旦吞并实现，还是那些俄国士兵就又把农奴拖回他们主人的枷锁之下。

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信教自由的名义下进行的，因为民族原则当时在西欧还不是时髦的东西。不过，那时已有人在小俄罗斯农民面前摆弄这一原则了，而从那时起，它在波兰事务中就开始起着重要的作用。俄国首先的和主要的贪求，就是把所有的俄罗斯部落都统一到沙皇的政权之下，沙皇自称为全俄罗斯其中也包括白俄罗斯和小俄罗斯的专制君主(Samodergetz vseckh Rossyiskikh)。为了证明它的贪求仅止于此，它在三次瓜分的时候都竭力表示自己只关心白俄罗斯地区和小俄罗斯地区合并于俄罗斯的问题，而把居住着波兰人的地方，甚至把小俄罗斯的一部分（东加里西亚）留给自己的同谋者。可是，现在的情形怎样呢？1793年和1794年被奥地利和普鲁士吞并的大部地区，现在却以波兰王国这个名称而处于俄国的控制之下，并且在波兰人中间逐渐唤起一种希望：好像只要他们服从俄国的最高权威，放弃对昔日立陶宛地区的一切要求，他们就可以期望把所有其余的波兰地区统一起来，在以俄国沙皇为国王的条件下恢复波兰。如果在目前情况下普鲁士和奥地利对打起来，那末非常可能是这样一场战争：归根到底将不是使什

列斯維希—霍尔施坦归并于普魯士或威尼斯归并于意大利，而是把奥地利所占領的波兰部分，和至少是把普魯士所占領的波兰部分归并于俄国。

这就是民族原則运用于波兰事务的情形。

弗·恩格斯写于 1866 年 1 月底—
4 月 6 日

原文是英文

載于 1866 年 3 月 24、31 日和 5 月
5 日“共和国”周报第 159、160
和 165 号

俄文譯自“共和国”周报

署名：弗·恩格斯

卡·馬克思 警 告¹⁵¹

不久以前，倫敦的裁縫幫工們為了堅持自己的要求，對抗大部分是大資本家的倫敦裁縫師傅，成立了一個全行業工會¹⁵²。問題不僅是要使工資同消費品上漲的價格相適應，而且要結束對這個工業部門中的工人們的極其惡劣的待遇。師傅們企圖主要從比利時、法國和瑞士招募裁縫幫工來破壞這個計劃。針對這一點，國際工人協會中央委員會的書記們在比利時、法國和瑞士的報紙上提出了警告，警告收到了圓滿的效果。¹⁵³ 倫敦裁縫師傅的詭計破產了，他們不得不放下武器，並滿足工人的正當要求。

師傅們在英格蘭遭到失敗後，現在又企圖從蘇格蘭開始進行反撲。正是由於倫敦事件，他們在愛丁堡也不得不先同意提高工資 15%。但是背地裡他們卻派代理人到德國（包括漢諾威和梅克倫堡的農村）去招募裁縫幫工，把他們運到愛丁堡來。第一批裁縫幫工已經取道水路動身了。這種輸入的目的同把印度的^① coolies（苦力）輸入牙買加一樣，就是要使奴隸制度永遠保存下去。如果愛丁堡的師傅們利用從德國輸入勞動力的辦法而得以取消他們已經作出的讓步，那末這也必然會影響到英國。結果，吃虧最大的會

① 手稿上是“亞洲的”。——編者注

是德国工人自己，因为他們在大不列顛的人数比所有其他大陆国家的工人都要多。而新运来的工人在異邦又将完全孤立无援，很快就会淪落到賤民的地位。

此外，对于德国工人來說，向国外证明，他們也像自己的法国、比利时和瑞士兄弟們一样，能够維護本階級的共同利益，而不会同意在資本反对劳动的斗争中充当資本的順从的雇佣兵，乃是有关他們荣誉的事情。

受国际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①的委托

卡尔·馬克思

1866年5月4日于倫敦

德国裁縫帮工如果想得到有关英国情况的較詳細的材料，請寄信給倫敦裁縫工会德国分会委员会，收信人的地址和姓名如下：
倫敦瑞琴特街海登巷王冠飯店，阿尔伯特·弗·豪費。

載于1866年5月15日
“上萊茵信使报”第113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上萊茵信使报”，
并根据手稿校对过

^① 手稿上是“总委员会”。——編者注

弗·恩格斯
——
德国战争短评¹⁵⁴

弗·恩格斯写于 1866 年 6 月 19 日
和 7 月 5 日之間

載于 1866 年 6 月 20、25 和 28 日，
7 月 3 日和 6 日“曼彻斯特卫报”
第 6190、6194、6197、6201 和 6204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曼彻斯特卫报”

这里将陆续发表的几篇短评的目的在于纯粹从军事观点对现在的战争事件进行公正的评述，并尽可能地指出这些事件对于当前的军事行动可能产生的影响。

最先受到决定性打击的地区必将是萨克森和波希米亚边境。意大利的战争在四边形要塞区¹⁵⁵被攻占以前恐怕不会带来什么重大的战果，而攻占四边形要塞区则需要较长时间的战斗。在西德意志可能会有不少军事冲突，但是从那里的作战军队的数量看来，所有这些冲突的结局与波希米亚边境上的事件相比较，仅具有次要的意义。因此，我们将暂时把我们的全部注意力转向波希米亚地区。

想要判断交战双方军队的力量，实际上只计算步兵就够了，不过我们应当注意到，奥普两军骑兵数量的比例是3比2。两军炮兵的比例大约和步兵相同，每1000人平均约有3门炮。

普鲁士步兵包括253个基干营、83 $\frac{1}{2}$ 个后备营和后备军（年龄为27—32岁的第一类后备军）的116个营。后备营和后备军的营组成要塞的警备部队，此外还准备用来对德意志诸小邦作战，而基干部队则集中于萨克森及其周围以对付奥地利北部的军队。除了占领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15个步兵营以及原先担任拉施塔特、美因兹和法兰克福警备部队而现在集中在维茨拉尔¹⁵⁶的15个步兵营以外，留作主力军的约有220个步兵营。连同骑兵、炮兵以

及可由邻近要塞调来的后备军部队，这支军队约有 30 万人，编成 9 个军。

奥地利北部的军队有 7 个军，每一个军的兵力都要比普鲁士的军大得多。目前，关于它们的人员和编制我们知道得很少，但我们有一切根据来假定，它们约有 32—35 万人。因此，数量上的优势看来是在奥军方面。

普鲁士军队的总指挥将是普鲁士国王^①，也就是说，一位阅兵场上的英雄。他充其量也不过是个平庸的人，性格软弱，但又十分顽固。在他周围的首先将是毛奇——一位优秀的将军——为首的总参谋部，其次是由国王的宠臣组成的“军事枢密室”，再其次则是那些可能被他召来作随员而无固定职务的将官们。在大本营本身确保军队打败仗的做法中，再也没有比这更有效的了。在这里，在军队参谋部和国王枢密室之间从一开始便自然会产生勾心斗角，双方都要争夺最高的权力，都要制订并坚持自己得意的作战计划。单由于这一点，就几乎不可能有任何统一的目的和一致的行动。这以后就是召开无穷尽的军事会议，这些会议十次有九次是以采取某种折衷办法而结束的，而这在作战当中是最坏不过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今天的命令常常同昨天的相矛盾，而当情况复杂或变得危急时，却又发不下任何命令，而让一切听天由命。正像拿破仑常说的：«Ordre, contre-ordre, désordre» [“朝令夕改，一片混乱”]。没有一个人负责，因为不负责的国王将一切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于是没有直接的命令，任何人便什么事都不做。这个国王的父亲^②在 1806 年的战争中便是以同样的方法来进行指挥的，

① 威廉一世。——编者注

②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编者注

結果是耶拿和奧埃爾施太特的失敗以及普魯士軍隊在三個星期之內全軍覆沒¹⁵⁶。沒有理由認為現在的國王比他的父親更有魄力；同時，如果說他已找到俾斯麥伯爵這樣一個在政治方面可以絕對信賴的人，那末在軍隊里還沒有這樣一位有足夠聲望的人可以同樣地擔負指揮作戰的全責。

奧地利軍隊由貝奈德克將軍絕對指揮，他是一位有經驗的指揮官，至少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因此，最高指揮方面的優勢無疑是在奧軍方面。

普魯士軍隊分為兩個“軍團”，第一軍團，在弗里德里希-卡爾親王指揮之下，由第一、二、三、四、七、八軍組成；第二軍團，在王儲^①指揮之下，由第五、六兩軍組成。作為總預備隊的近衛軍大概將合併於第一軍團內。這種編制不僅破壞指揮的統一，而且常常會使這兩個軍團沿不同的作戰綫運動，需要彼此協調地行軍，並在敵人行動範圍內規定會合地點；也就是說，當它們應當盡可能在一起行動的時候，這種編制卻促使它們分散行動。普魯士軍隊在1806年和奧地利軍隊在1859年¹⁵⁷都是在極相似的情況之下由於採取同樣的做法而被擊敗的。至於這兩位指揮官，王儲以軍人而論是個未知數，而弗里德里希-卡爾親王在丹麥戰爭¹⁵⁸中則確實沒有表現出一個偉大統帥的才幹。

奧地利軍隊不是採取這樣的編制；各軍軍長直接隸屬於貝奈德克將軍。因此，在軍隊的組織方面，奧軍也優於自己的敵人。

普魯士兵士，特別是預備兵以及用來補充常備軍的缺額的後備軍兵士（他們的數目相當大），是迫不得已來作戰的；奧軍則相

① 弗里德里希-威廉。——編者注

反，他們早已希望与普魯士一战，并且焦急地等待着出发的命令。因此，他們在士气方面也同样占着优势。

普魯士已有 50 年沒有进行过大規模的战争；它的军队整个說来是一支和平时期的军队，因而具有一切和平时期的军队所特有的那种拘泥形式和墨守成規的缺点。毫无疑问，在最近时期，特别是自 1859 年以来，他們曾經多方努力摆脱这些缺点；但是 40 年来所养成的习惯并不是那样容易根絕的，特别是在最重要的职位上，也就是在校級指揮人員当中，仍然有大量迂腐的庸才。但是奥軍在经历了 1859 年的战争后，現在已經根本克服了这个缺陷，而且最充分地利用了自己以很高的代价所换取的經驗。因此无疑地，在具体的組織方面、对战争的适应性和經驗方面，奥軍也同样优于普軍。

除了俄国军队以外，現在只有普魯士军队才把密集的长纵队作为自己的标准战斗队形。試設想一下，如果把英国步兵营的 8 个連排成纵队，各連之間的距离縮短四分之三，正面不是 1 个連，而是 2 个連，那末，这样的一个由四列（每列 2 个連）組成的营纵队，就是“普魯士式的攻击纵队”。对綫膛武器來說，这是再好不过的靶子了，由于綫膛炮可以从 2 000 碼的距离对它进行射击，所以它几乎不可能接近敌人。只要有一发炮弹在这一大群人中間爆炸，这个营在这一天当中恐怕就不能做什么事情了。

奥地利军队采用了法国式的疏开的纵队。把它叫做纵队，还不如叫做距离为 20—30 碼的两列或三列橫队。这样的队形是不会比展开的橫队遭受更大的炮火杀伤的。因此，战斗队形方面的优势也在奥軍方面。

普軍只有两个因素能与奥軍的所有这些优势相抗衡。他們的

軍需机构无疑是比較好的，因此他們軍队的給养会比较好些。奧軍的軍需机构也和奧地利一切行政机构一样，是行賄受賂和营私舞弊的巢穴，它未必比俄国的好些。甚至現在我們就听說，前綫的軍队的給养很坏并且供应不經常，而在要塞里就更糟了，因此对于四边区要塞区的要塞來說，奧地利行政机构可能是比意大利炮兵更为危險的敌人。

普軍的第二个优点是他們的武器比較好。虽然他們的綫膛炮无疑比奧軍的好，但是这个优点在野战中起不了很大的作用。普軍和奧軍步枪的射程、彈道和射击精度几乎是相等的，但是普軍的步枪是后装枪，因此他們能在队列里以每分钟至少四发的速度进行不间断的准确的射击。这种枪的巨大优越性已在丹麦战争中被证明了，而奧軍对这一点无疑会體驗得更深刻。如果奧軍不用很長時間进行射击，而是立刻进行刺刀冲鋒(据說貝奈德克曾指示他們这样做)，那末他們便会遭受很大的損失。在丹麦战争中，普軍的損失从未超过丹麦軍队的損失的四分之一，有时甚至仅及十分之一；就像不久以前“泰晤士报”的一位軍事記者所完全正确指出的那样，丹麦軍队几乎到处都为兵力少得多的敵軍所击败¹⁵⁹。

然而不管普軍的針发枪如何，优势仍然不在他們方面；如果他們希望不致因奧軍在指揮、組織、战斗队形和士气方面的优势，以及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的)不致因本軍的指揮官而在第一次大的会战中就被击败，那末他們就必须表現出一种为了一支处于和平状态达 50 年之久的軍队所不大可能有的英勇精神。

二

人們开始对波希米亚边境上的两大军队显然的无所作为表示焦急。但是这种迟滞是有許多原因的。奥軍和普軍都很清楚地認識到可能决定整个战局勝負的当前这一次冲突的重要性。双方都匆匆地向前綫增調所能动用的一切兵力；奥軍派出新編成的一部分部队（各步兵团的第四和第五营），普軍則派出最初仅准备担任警备勤务的后备軍部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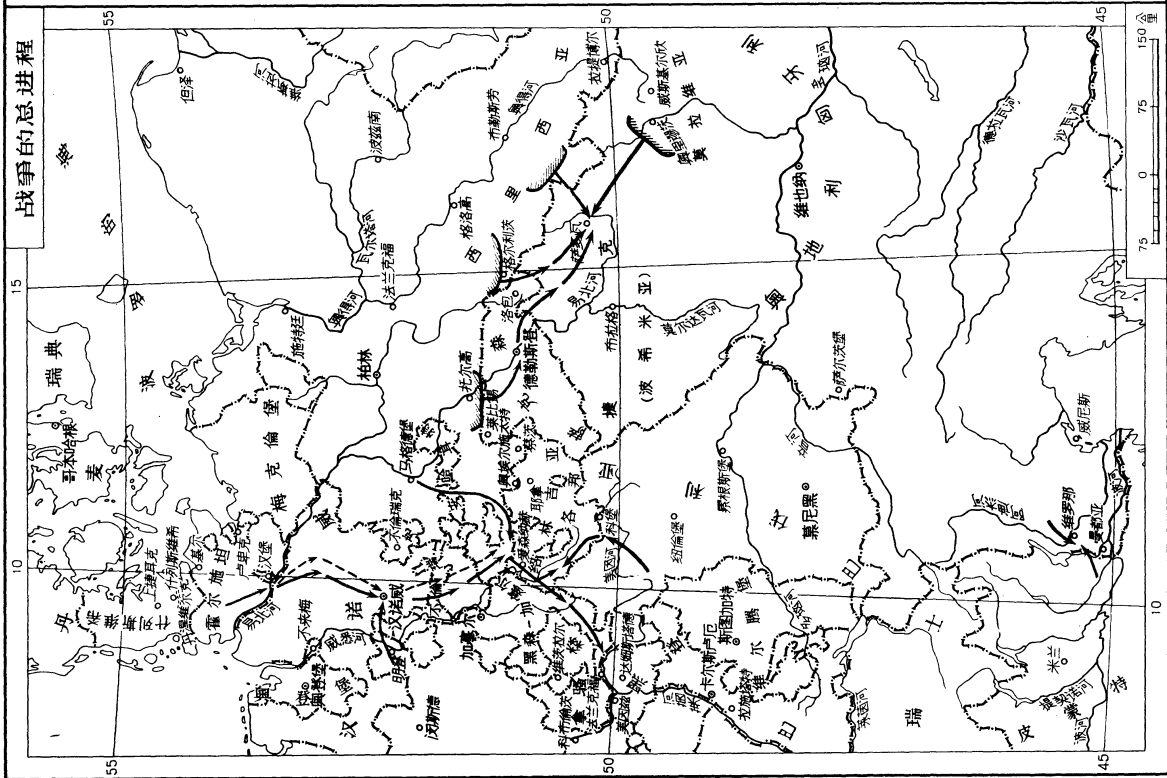
同时，无论哪一方都似乎企图进行机动，以便造成比对方有利的态势，而使自己能在最有利的战略条件下开战。为了了解这个问题，我們必須翻閱一下地图，研究一下两軍配置的地区。

假定柏林和維也納是两軍当然的退却点，因而奥軍将力图占領柏林，普軍則力图占領維也納；这时就有三条路綫可供双方行动。一支人数众多的軍队在行軍中需要有一个相当大的地区，以便能利用这个地区的資源維持生存，同时为了迅速前进，它不能不分成几个纵队沿数条平行的道路行軍；因此軍队的正面的宽度根据敌人的远近和道路間的距离的大小可能为16—60英里。这一点应当考虑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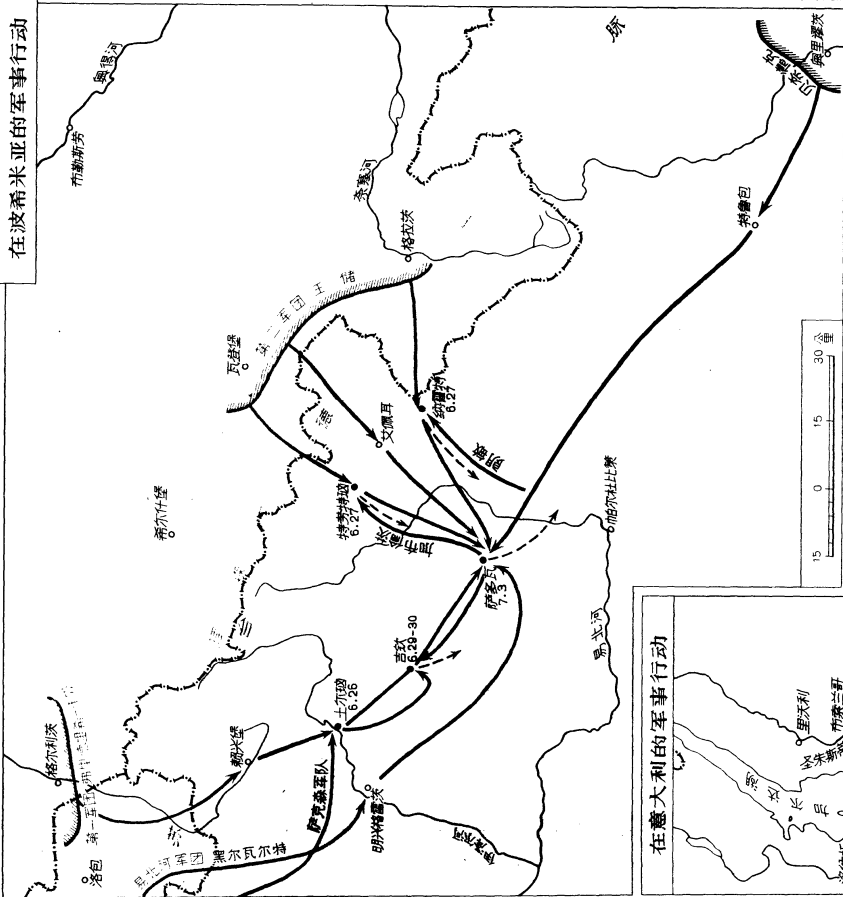
沿易北河和莫尔达瓦河左岸經過萊比錫和布拉格的道路可以作为第一条路綫。很显然，在这一条道路上交战双方的任何一方都必須两次渡河，并且第二次是在敌前渡河。假使某一方軍队沿这条道路前进，企图迂迴对方的翼側，那末后者就会沿比較直因而

普奥战争 (1866年)

战争的总进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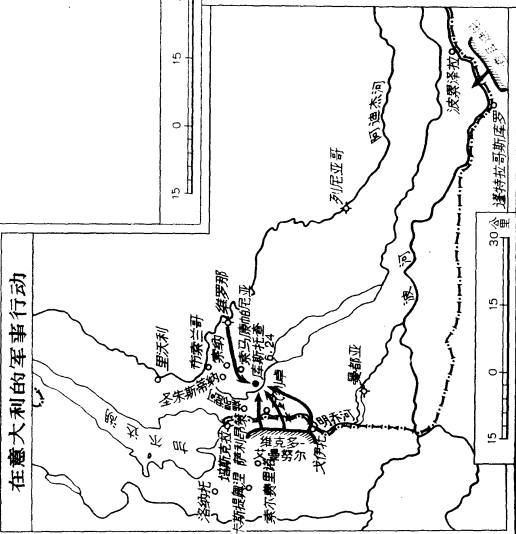


在波希米亚的军事行动



- 普鲁士
- 奥地利的盟国
- 普军及其盟军的部署和移动
- 奥地利的盟国
- 普军及其盟军的部署和移动
- 主要会战的地点和日期

在意大利的军事行动



比較短的道路行軍，因而能在河綫上超过敌人的迂迴部队，同时如果他能将迂迴的部队击退，他便可以直驅敌人的首都。既然这条路綫对于双方同样不利，因此可以不去考虑它。

第二条路綫沿易北河右岸，在該河与苏台德山脉（西里西亚同波希米亚及莫拉維亚交界处的山脉）之間。它几乎与柏林到維也納的直綫相吻合。在目前位于两軍之間的那一段路綫上，有一条由洛包到帕尔杜比策的铁路綫，这条铁路綫橫貫在南、西两面以易北河为界而东北面以山为界的那一部分波希米亚地区。在这个地区有許多良好的道路，如果两軍彼此相向运动，那末冲突可能就在这里发生。

第三条是通过布勒斯劳，再通过苏台德山脉的路綫。这个山脉在莫拉維亚边境一带并不很高，有几条很好的道路可以通过，但在波希米亚边境的理森山則变得高聳而又險峻了。这里道路很少；在特劳特瑙与賴兴堡之間 40 英里內，山脉的整个东北部沒有一条可作軍用的道路穿过。在那里仅有的一条道路，由希尔什堡通向伊澤尔河谷，在奥地利边境突然中断。由此可見，长 40 英里的这一道障碍至少对携带无数輜重的大軍來說是不可克服的；必須在理森山西南翻越山岭，才能向布勒斯劳或經由布勒斯劳进攻。

两軍如果在这条路上展开战斗，他們的交通綫将怎样呢？

普軍如由布勒斯劳向南进攻，便会暴露他們通往柏林的交通綫。如果奧軍强大到对胜利有絕对的把握，他們就可以让普軍前进到奥里繆茨营垒，在那里普軍的推进会被阻擋住，而在这个时候他們自己却可以向柏林挺进，以取得决定性胜利来恢复暂时被破坏的交通綫；或者他們可以在普軍各纵队下山的时候将其各个击破，并乘胜把他們击退到格洛高和波茲南，这样一来柏林和大部分

普魯士省份就会任他們摆布了。因此，普軍只有在数量上占很大优势时，取道布勒斯劳进攻才是适当的。

奧軍的地位則大不相同。他們有这样的优点，那就是他們帝国的大部分領土位于布勒斯劳东南，也就是在由柏林到布勒斯劳这一綫的**延长綫**上。他們只要在維也納附近的多瑙河北岸构筑工事以保证首都不致遭到突然襲击，那末他們便可以暫時甚至較长期地放棄他們与維也納之間**的直接交通綫**而从匈牙利得到人員和物資的补充。这样一来，他們在洛包方向和布勒斯劳方向上，在山北或者在山南，都可以同样安全地行动；他們具有比較他們的敌人远为广泛的机动自由。

但是还有更多的原因使得普軍不得不慎重从事。由波希米亚北部边境到柏林的距离大約比到維也納近一半；柏林所处的地位要危險得多。維也納有多瑙河作为屏障（被击败的軍隊可以得到河的掩护），还有該河北岸的工事和奧里繆茨营垒的护卫。如果奧軍主力在战败后退守奧里繆茨，普軍想要安然地通过是不可能的。但柏林除开野战軍以外却沒有任何的屏障。在这种情况下以及在我们第一篇文章所詳述的那些条件之下，普軍所应当做的，看来显然是只能进行防御。

同样的情况以及政治上的迫切需要几乎使奥地利不能不采取攻势。只要一次胜利就可以使它获得很大的战果，而失败却不会使它失去抵抗的力量。

这次战局的战略計劃从基本的特点来看必然是极其简单的。無論誰首先发起进攻，他都要在这二者之間選擇：或者向理森山西北佯动而实际上向理森山东南进攻，或者 vice versa [相反]。长达 40 英里的障碍是戰場上的一个极重要的特点，双方軍隊的行

动都必然要在它的周围展开。我们将会听到关于在这个障碍的两端上进行战斗的情况，而在此后数日内便可以看出进攻的真实方向，还可能看出第一个战局的命运。但我们仍然认为：对于这样两个彼此对峙而行动笨拙的军队来说，最直接的道路也就是最安全的道路；如此大量的军队分成独立纵队沿不同的道路通过难行的山地，这当中是有困难和危险的，因此这两支交战的军队大概一定会沿洛包—帕尔杜比策的道路行动。

到目前为止，军队的实际调动情况如下。在6月的第一个星期内，普军在蔡茨到格尔利茨的这一段萨克森边境上集中了萨克森军团，在希尔什堡到奈塞河之间集中了西里西亚军团。到6月10日前，这两个军团彼此靠近，其右翼在托尔高附近的易北河上，极左翼则在瓦登堡附近。这以后，从12日到16日，由第一、五、六军及近卫军编成的西里西亚军团重新向东扩展，这次扩展到拉提博尔，也就是到了西里西亚的最东南角上。这似乎是佯动，特别是据估计经常与主力共同行动的近卫军的运动更像佯动。如果这不纯粹是佯动，如果不设法在最短期间迅速地把这4个军调回格尔利茨的话，那末把这12万多人置于辽远的角落里显然是一个错误；他们的一切退路会被切断，并且无疑地会失去与其余军队的一切联系。

关于奥军，除了知道他们已集中在奥里缪茨周围这一事实以外，我们便知道得很少了。在奥军兵营的“泰晤士报”记者报道，有4万人的第六军在19日由威斯威尔欣到达奥里缪茨，这证明他们在向西运动。他又补充说：21日，大本营将转移到莫拉维亚与波希米亚边境上的特鲁包。如果这一报道不像是故意传至伦敦以便再用电报转至普鲁士大本营而使其陷入迷惑的这样一种“谣言”的

話，这个轉移也許就是說明一种向同一方向的前进。但是像貝奈德克那样严守軍事秘密而且对新聞記者又是那样反感的一位將軍，除非有特殊的原因，恐怕是不会在19日便告訴記者說21日他的大本营将在什么地方。

在結束本文以前，我們再簡單地談談在西北德意志的軍事行动。普軍在那里的軍隊比我們原来知道的还要多。他們把15个营配置在霍尔施坦，12个营配置在明登，18个营配置在維茨拉尔。由于他們进行迅速的分进合击运动（在运动中部队表现出他們有坚持强行軍的意外的能力），他們在两日內便占領了由科布倫茨到爱森納赫一綫以北的全部地区和王国东部和西部省份之間的全部交通綫。約7 000人的黑森軍逃脫了，但1万或12 000人的汉諾威軍沿直綫向法兰克福退却的道路已被切断，并且早在17日，普魯士第七軍的余部計12个营連同2个科堡营就已由易北河到达了爱森納赫。因此，汉諾威軍几乎已被团团圍住了，只有在普軍犯了奇迹般的愚蠢的过失的情况下，他們才能够有救。等他們的命运决定以后，50个普魯士营的兵力便馬上可以用来进攻达姆斯塔德亲王亚历山大在法兰克福編成的盟軍。这支盟軍包括約23 000名維尔騰堡人、1万名达姆斯塔德人、6 000名拿騷人、13 000名巴登人（剛剛被动员来的）、7 000名黑森人和12 000名奥地利人（已从薩尔茨堡出发），总共約65 000人，他們还可能得到1万到2万名巴伐利亚人的增援。据称，这些軍隊約6万人已在法兰克福集中完毕，亚历山大亲王在22日重新占領黑森后，已决心轉为攻势。但这是沒有多大意义的。普軍在沒有集中好足够的兵力以前是不会向他进攻的，但在集中好兵力以后，拥有各种部队7万人同时又占有武器上的优势的普軍，一定会把这支杂牌軍隊迅速收拾掉的。

三

第一次大规模的会战不是发生在波希米亚，而是发生在意大利。四边形的要塞区又给了意大利人一个战略教训。这个著名阵地的威力，和一切比较重要的筑垒阵地的威力一样，与其说在于它的四个要塞的高度防御力，不如说由于这些要塞位于在军事上有其突出特点的地形上，就使得进攻的军队几乎总是自动地、有时则是被迫地分兵在两个不同的方向上进攻，而防御的军队却可以用他们所有的互相配合的力量来对付某一路进攻军队，以优势的兵力粉碎它，然后转过来对付另一路进攻军队。意大利军队就犯了这种错误。他们的国王率 11 个师在明乔河附近行动，而查耳迪尼则率 5 个师在波河下游蓬特拉哥斯库罗和波累泽拉附近行动。一个意大利师有 17 个营，每营 700 人。因此，维克多-艾曼努尔的兵力，连同骑兵和炮兵在内，至少有 120 000—125 000 人，而查耳迪尼约有这个数目的一半。当国王于 6 月 23 日渡过明乔河时，查耳迪尼则应在下游渡过波河而插入奥军后方行动。但是直到现在还没有接到关于这后一个行动的任何可靠的消息。查耳迪尼率领的 6 万人可能、也许已经在上星期日扭转了库斯托查会战¹⁶⁰ 的局势，但无论如何直到现在还没有造成足以弥补大规模会战中所受的损失的任何优势。

加尔达湖位于阿尔卑斯山的两条支脉之间，这两条支脉在加尔达湖以南形成两片丘陵地，明乔河即取道其间而流入曼都亚的

淺水湖。这两片丘陵地在軍事上形成了坚固的障地；丘陵地的南坡俯視着倫巴第平原，而且在火炮射程內瞰制着这一平原。它們在战史上是很出名的。培斯克拉和洛納托之間西面丘陵地曾經是1796年卡斯提奧涅和洛納托会战以及1859年索尔費里諾会战的戰場¹⁶¹。在培斯克拉和維罗那之間东面丘陵地，在1848年曾进行了三天的爭夺战¹⁶²；上星期日的会战所爭夺的也是这一块丘陵地。

东面这片丘陵地一方面朝明乔河谷方向逐漸向下傾斜，到瓦列卓附近的平原为止，另一方面又面向东南成长弧形朝阿迪杰河方向逐漸向下傾斜，直到布索兰哥附近的河岸为止。在从北往南的这个方向上，它被一个深谷分成两个几乎相等的部分，提昂涅河即由这个深谷中流过。因此，由明乔河前进的軍隊首先要强行渡河，并且紧接着就要碰到这个深谷的阻碍。在平原附近的坡地边缘，在深谷以东，从南往北，有下列村庄：庫斯托查，索馬康帕尼亚，索納和圣朱斯蒂納。由培斯克拉到維罗那的铁路在索馬康帕尼亚附近穿过丘陵地，而公路則在索納附近穿过丘陵地。

1848年，皮蒙特軍隊在夺取培斯克拉后，便封鎖了曼都亚并以中路軍占領了东面这片丘陵地，把軍隊配置綫由曼都亚扩展到加尔达湖畔的里沃利。7月23日，拉德茨基由維罗那率7个旅向前运动，在中央突破了敌人拉得过长的防綫后，占領了这片丘陵地。7月24日和25日，皮蒙特軍隊企图夺回这个障地，但在7月25日他們遭到决定性的失敗后，便立刻經過米兰退到了提契諾河西岸。这第一次庫斯托查会战便决定了1848年战局的結局。

意大利大本营发布的关于上星期日所发生的会战的电訊矛盾百出，但是我們参照了另一方面的电訊后，对于会战的經過就可以

得出一个非常清晰的概念。維克多-艾曼努尔命令他的第一軍(杜兰多將軍率領,有4个师,共68个营)在培斯克克拉与維罗那之間占領陣地,以便掩护对培斯克克拉的圍攻。这个陣地无疑地应当是索納和索馬康帕尼亚。第二軍(庫克基亚里將軍率領,有3个师,共51个营)和第三軍(德拉·罗卡將軍率領,兵力与第二軍相同)应同时渡过明乔河以掩护第一軍作战。第一軍一定是在薩利昂策附近或以南渡河并立刻朝丘陵地方向运动的;第二軍似乎是在瓦列卓附近而第三軍則似乎是在戈伊托附近渡河并向平原前进的。所有这些都发生在星期六即6月23日。奧軍在明乔河附近执行警戒勤务的由普耳茨指揮的旅,緩慢地向維罗那退却。在星期日,也就是索尔費里諾会战紀念日,全部奧軍由維罗那出发迎击敌人。他們似乎在意軍未到达前便占領了索納和索馬康帕尼亚的高地以及提昂涅深谷的东緣。以后的战斗主要是搶占通过深谷的隘路。在深谷南緣附近平原上进攻的意大利的两个軍能够同占領丘陵地的意大利第一軍配合行动,因此庫斯托查便落入他們手中。平原上的意軍漸漸地向維罗那方向逼进,企图攻击奧軍的翼側和后方;奧軍則派出部队迎击他們。因此两軍的战綫最初是东西相对峙的,而現在則轉了90度,奧軍面向南,意軍面向北。但是因为丘陵地由庫斯托查延向东北,所以意大利第二軍和第三軍在翼側上的运动不能对占領这片丘陵地的第一軍起直接的影响,因为他們如果要前进到足够远的距离,他們这些側击部队本身就会遭到危險。因此,奧軍似乎仅仅用了足以击退第一次攻击的部队来对付意大利第二軍和第三軍,而以他們所能够使用的全部兵力向第一軍攻击并借其数量上的优势粉碎了它。他們取得了全胜。第一軍經過激战后被击退了,奧軍攻占了庫斯托查。这样一来,越过庫斯托查

向东和向东北前进的意軍右翼就遭到了严重的威胁；于是又发生了爭夺这个村庄的新的战斗。在这次战斗中，意軍的被截断的联络一定又恢复了，同时奥軍从庫斯托查方面的进攻也停止了。但是，村庄仍在他們手中，当夜意軍便不得不回头渡过明乔河。

我們对会战所作的这个概述，不能看做是一种历史的記述（因为作为历史的記述來說还缺少很多的細节），而只能看做是根据手中的地图和根据軍事常識使有关这一事件的各种不同的电訊彼此符合一致的一种企图而已。同时我們相信：如果这些电訊多少还是正确和全面的話，那末我們的叙述也不会与会战的一般情况有太大的出入。

奥軍被俘約 600 人，意軍被俘約 2 000 人，并損失了几門火炮。这說明会战并不是什么毀灭，而只是一种敗北而已。双方兵力應該說是大約相等的，虽然很可能奥軍投入战斗的部队要比他們的敌人少。意軍有充分理由为自己庆幸，因为他們还没有被赶到明乔河以西；但是配置在河流与深谷之間寬 2—4 英里地段上的第一軍，面对着敌人的优势兵力，其处境是十分危险的。輕視有决定意义的制高地而把主力派往平原，这无疑是錯誤的。但正像我們在上面所已經指出的，把軍隊分散开，让查耳迪尼率領 6 万人留在波河下游，而仅以其余的兵力进攻，这是最大的錯誤。如果意軍能坚决以全部兵力互相配合地进行机动，那末查耳迪尼就能协助其他部队在維罗那获得胜利，然后再回师波河下游并且可以更容易得多地渡河。但是看来他却留在头一天他所在的地点，而現在則可能遇到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强大的敌人。其实这一次意大利人应当懂得，跟他們打交道的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对手。在索尔費里諾会战中，貝奈德克率領 26 000 名奥軍曾在整整一日內抵擋

了人数比他多一倍的皮蒙特军队，一直到他由于另一个军被法军击败而奉命退却时为止。当时的皮蒙特军队比现在的意大利军队好得多，他们受过较好的训练，比较一律，同时有比较精干的指挥人员。目前的意大利军队是不久以前才编成的，因此必然存在这类新编军队所特有的一切缺点，然而奥地利军队现在却比1859年优越得多。虽然民族热忱对战斗有巨大的意义，但是如果缺乏训练和组织而仅凭热忱，任何人都不能打胜仗。甚至加里波第的“千人志士”也不仅仅是一群热心的爱国者，他们是些受过军事训练并且在1859年学会了如何服从命令和沉着应战的人们。我们希望意大利军队的参谋部为了自己的利益，不要轻率地对待奥地利的这支军队，因为这支军队虽然在数量上居于劣势，但在实质上却是比意军强大的，况且他们还占领着欧洲最坚固的障地之一。

四

假設有一位普魯士步兵或騎兵的年輕的見習軍官在應尉官考試時被問道：什麼是普魯士軍隊侵入波希米亞的最安全的計劃？假定我們年輕的軍官這樣回答：“最好的方法是把軍隊分為大致相等的兩路，派出其中的一路向理森山以東迂迴，而另外一路向西迂迴，讓它們在吉欽會合。”那末主考官對於這一答案會說些什麼呢？他會告訴這位年輕人說，這個計劃違反了戰略上的兩個基本原則：第一，絕不能把自己的軍隊這樣分隔開，以致它們彼此不能互相支援，而是相反，應當使它們在一起行動；第二，在沿不同的道路前進時，各縱隊應在敵軍活動範圍以外的地點會合；因此答案中的計劃是一切計劃中最壞的；這樣的計劃只有在波希米亞完全沒有敵軍的情況下才能加以考慮，因此提出這樣計劃的人甚至不配晉升為尉官。

但是聰明而博學的普軍參謀部採用的正是這樣的一個計劃。這幾乎很難令人相信，但事實卻是如此。意軍在庫斯托查曾為之付出代價的那種錯誤，普軍又重復了，並且由於當時的條件而使得這種錯誤更嚴重十倍。意軍至少知道他們有 10 個師，因此在數量上超過了敵人。普軍則應當知道：他們全部 9 個軍加在一起，至多也只是在數量上與貝奈德克的 8 個軍相等，而分兵兩路後，就使這兩路部隊注定要被敵軍優勢兵力各個粉碎。要不是國王威廉作統帥，那末像這樣的計劃居然被一群無疑是很精通本行業務的、組成

普軍參謀部的軍官們加以討論甚至加以採納，這就是完全不可理解的。但是誰都沒有想到，最高指揮權落在國王和親王們手中所引起的惡果竟來得這樣快和這樣猛。普軍官兵目前在波希米亞進行着決死的戰鬥。如果兩路普軍在吉欽或者在其附近的會合受阻，如果其中每一路在遭受失敗後將被迫由波希米亞退却，而在退却中兩軍相距將更遠時，那末就可以說這一戰局實際上是結束了。那時，貝奈德克對於王儲率領的軍團向布勒斯勞的退却可置之不顧，而以他所有的兵力追擊弗里德里希-卡爾親王率領的軍團，後者難免要全軍覆沒。

問題在於，奧軍是否能夠阻止這個會合。一直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沒有得到關於在星期五即6月29日傍晚以後戰事進展的消息。普軍在6月28日被埃德爾斯海姆將軍趕出吉欽（這個地名波希米亞人讀做伊欽）後，在29日重新攻擊該城，這就是我們所得到的最後消息。會合在那時還沒有成功；有至少4個奧地利軍和一部分薩克森軍當時曾與5個或6個普魯士軍進行戰鬥。

當王儲軍團的各個縱隊翻山進入波希米亞這邊的谷地時，他們便遭到了奧軍的迎擊，奧軍在谷地中比較開闊的地方佔領了有利的陣地，因而能在比較寬的正面上抗擊普軍縱隊，並阻止普軍展開；普軍這時就派出部隊穿過兩側可以通行的谷地，襲擊敵人的翼側和後方。這種情形在山地戰中是常常發生的，而且這也是在山地戰中所以常常能夠捕捉大量俘虜的原因。但另一方面，弗里德里希-卡爾親王的軍團和黑爾瓦爾特·馮·比滕費爾德將軍的軍團好像幾乎沒有遇到任何抵抗就通過了山口；最初的戰鬥發生在伊澤爾河一綫，也就是幾乎發生在兩軍出發地的中途。企圖把最近三四天內接到的極端矛盾而又常常完全不可靠的電訊整理出一

个头緒，使它們一致起来，那只能是白費力气。

战斗的結果不能不是变化不定的；随着生力軍的补充，胜利有时倾向这方面，有时倾向那方面。但是，直到星期五为止，一般的結果似乎是有利于普軍的。如果他們能坚守住吉欽，那末无疑地也許在星期六或星期日就能会合，那时，他們就度过了最大的危險。在普軍爭取会合的最后战斗中，双方大概都要集中大量的兵力，这一战斗至少能够决定最近一段時間內的战局的进程。如果普軍成了胜利者，那末他們便立刻解脫了自身造成的困难，但是他們本来可以不遭受这种不必要的危險而取得同样的、甚至更大的优势。

战斗似乎很激烈。最先同普軍交鋒的是奥地利“黑黃”旅，該旅在什列斯維希曾在从丹涅維尔克撤退的前一天攻击上捷耳克附近的科尼斯堡。“黑黃”旅的名称是根据編成該旅的两团兵士的領章、衣領和折袖的顏色而取的，这个旅始終被认为是最精銳的旅之一。但是它被針发枪击败了，并且其中一个团（由馬尔提尼指揮）在連續五次攻击普軍战綫失利后已約有 500 人被俘。在这以后的战斗中，德国騎士团第三营的軍旗也被夺走了。該团兵士完全是在維也納补充入伍的，它被认为是全軍中最好的一个团。这样看来，最精銳的部队都已加入战斗了。对于普軍这样一支长期处于和平状态的軍隊來說，这一次的确打得很漂亮。当实际宣战后，普軍士气大振，这主要是因为西北德意志各邦的一小撮君主都被驅逐出去了¹⁶³。这使軍隊产生了这样的思想，——無論这是否正确，我們只指出这是事实，——认为他們这一次是为了德意志的統一而战，先前忧郁不乐的預备兵和后备軍兵士高声欢呼着进入了奥地利国境。这是他們所以能打得这样好的主要原因。但同时我們

应当把他們取得的胜利，多半归功于他們的后装枪；如果說他們終于摆脱了由于他們的將軍的荒唐而造成的困难，那末他們就不能不感謝这种針发枪。关于这种枪大大优越于前装枪的报道，这一次又是異口同声的。一个被俘的馬尔提尼团的下士向“科倫日报”¹⁶⁴ 記者說道：

“我們确实做到了一个勇敢的兵士所能做的一切，但誰都經受不住这样急速的射击。”

如果奧軍被打敗了，那末与其归罪于貝奈德克將軍或朗敏將軍，还不如归罪于“探条”將軍^①。

在西北方面，曼托伊費尔將軍的前卫在弗利斯將軍指揮下向汉諾威軍隊发起了坚决的进攻。汉諾威軍隊冷靜地考虑了自己的处境后，便投降了。因此，普軍的 59 个营便可以用来对盟軍作战。現在正是时候，普魯士应当趁巴伐利亚尚未完全作好战争准备的时机做到这一点，否則，为了征服西南德意志，就需要調动更多的軍隊。大家都知道，巴伐利亚一向行动迟緩并且不能及时作好战争准备，但是一完成了这些准备以后，它便可以出动 6 万到 8 万精銳部队。也許不久我們将会听到普軍迅速集中在美因河并积极进攻黑森—达姆斯塔德亲王亚历山大及其軍隊的消息。

① 俏皮話：Ramming 是姓，«ramrod» 是前装枪裝彈用的探条。——編者注

五

普軍在战局的初期犯了极重大的战略錯誤，但后来它在战术上作了惊人的奋勇努力，結果在整整 8 天之內便把这个战局胜利地結束了。

在前一篇短評里我們曾經說过：普軍以理森山为界分兵两路侵入波希米亚的这种計劃，只有在波希米亚境內沒有敵軍的場合才能被认为是正确的。貝奈德克將軍那种不可思議的計劃似乎主要地正是在于造成这样一种形勢。在波希米亚西北部，也就是我們一开始會估計那里会展开决战的地方，全部只有两个奧地利軍——第一軍（克拉姆-加拉斯指揮）和第六軍（朗敏指揮）。如果这样做是为了引誘普軍陷入圈套的話，那末貝奈德克竟做得这样好，以致自己反而陷入圈套了。普軍分兵两路前进，其間有寬达 40—50 英里的难以通行的地区，会合点距离出发点又有整整两日行程，而且还位于敌人战綫內，無論如何这是一种极其危險的机动，如果不是貝奈德克的行动迟緩得出奇而且普軍进行了奇襲和使用了后装枪，那末这样一种机动会使普軍遭到惨敗。

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率領 3 个軍（第三軍、第四軍和第二軍，第二軍为預备队）在难以通行的高山以北，經過賴兴堡进攻，黑尔瓦尔特將軍則在高山以南率領一个半軍（第八軍和第七軍的 1 个师）进攻。同时，王儲又率領第一軍、第五軍和第六軍以及近卫軍在格拉茨附近的山地中行动。这样，一个軍隊被分成了三个纵

队——45 000 人在右，9 万人居中，12 万人在左，并且这三个纵队中没有一个可以支援另外一个，至少在几天以内是这样的。这时，对于一个统率着至少与普军兵力相等的军队的将军来说，要比任何时候都更易于各个击破敌人。但是看来却什么事也没有做。6 月 26 日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在土尔瑙附近与奥地利第一军的一个旅发生了第一次激烈的战斗，由于这次战斗的结果他便和黑尔瓦尔特取得了联络；27 日，后者占领明兴格雷茨，同时王储军团的第一个纵队——第五军——向纳霍特进发，击溃了奥地利第六军（朗敏指挥）；6 月 28 日是对普军稍为不利的唯一的一天，在这一天，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的前卫占领了吉钦，但是又被埃德尔斯海姆将军的骑兵赶了出来；同时，王储军团的第一军受到一些损失，被奥地利第十军（加布伦茨指挥）阻止在特劳特瑙附近，当近卫军沿第一军和第五军中间的道路向艾佩耳前进以后，它才得以摆脱敌人。6 月 29 日，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攻击吉钦，王储军团则彻底击溃了奥地利第六军、第八军和第十军。6 月 30 日，贝奈德克再次企图以第一军和萨克森军队的兵力夺回吉钦，但是完全失败了，此后，普鲁士两个军团便会合了。奥军至少损失一个半军，而普军的损失还不到这个数量的四分之一。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6 月 27 日，在战场上奥军只有 2 个军，每个军约有 33 000 人；28 日有 3 个，29 日有 4 个，如果普军一则电讯确实，那末还有另一个军（第四军）的一部分；萨克森军只是在 30 日才来增援的。由此看来，在整个这个期间内，奥军有 2 个或 3 个军未上战场，而普军则把所有的兵力都集中在波希米亚了。事实上，到 6 月 29 日傍晚以前，奥军在战场上的总数也许没有超过普鲁士两个军团中的任何一个，同时奥军部队是分批加入战斗

的，而援軍又是在已進入戰鬥的部隊失敗以後才來到的，所以結果遭到了慘敗。

據稱，曾在庫斯托查地區作過戰的第三軍（恩斯特大公指揮），在這次戰鬥後不久，便由鐵路調往北面；在某些報道中稱，它已編入了貝奈德克指揮的作戰部隊。這一個軍編入後全部奧軍連薩克森軍隊在內已有 9 個軍，但這一個軍沒有適時到達，因而未能參加 6 月最後幾天的戰鬥。

無論普軍作戰計劃有多麼大的錯誤，這些錯誤已經被普軍迅速而有力的行動所彌補了。他們兩個軍團中的任何一個在作戰上都是沒有錯誤的。它們的突擊敏捷、有力而且堅決，因而得到了全勝。在這兩個軍團會合後，他們的奮戰精神並未衰減；他們繼續向前運動，7 月 3 日，全部普魯士軍隊就已經和貝奈德克的聯合部隊遭遇，給了他們以最後的致命打擊¹⁶⁵。

很難設想，貝奈德克這一次是自願應戰的。無疑地，普軍迅速的追擊使他不得不率領全部軍隊扼守堅固陣地，以便重新部署兵力，并把退却部隊的輜重提前一天撤走；他希望在白天不遭到大規模的攻擊，並且能够在夜間撤退。如果有可能安全退却的話，任何人處於他這樣的地位——有 4 個軍完全被擊潰，而且又遭受如此嚴重的損失——都是不可能決心再進行決戰的。但是普軍逼使他應戰，結果便造成了奧軍的全敗。如果不締結停戰協定的話，奧軍現在將會企圖在極端不利的條件下退到奧里繆茨或維也納，因為普軍稍許運動以迂迴他們的右翼，便會切斷大量部隊的直通的退却路綫而把他們趕到格拉茨丘陵地，在那里將他們俘虜。“北方軍團”在 10 天以前還是歐洲的一支聲名赫赫的軍隊，現在已不復存在了。

无疑地，速射的針发枪起了很大的作用。沒有这种武器，普魯士两个軍团的会合就未必能成功，并且可以完全肯定地說，如果沒有这样的火力优势，普軍是不会取得这样巨大而又迅速的胜利的，因为奥軍一向不像大部分欧洲軍队那样容易陷入惊慌失措。但是还有其他的情况促成了这个胜利。我們已經指出普魯士两个軍团从进入波希米亚后的那种优势的地位和坚决的行动。我們还可以补充說明，在这次战局中，普軍放棄了纵队而在进攻中主要采用了展开的橫队，因此可以發揮每一支枪的作用，并且使兵士避免敌人炮火的杀伤。我們应当承认，被 50 年的和平生活锈蝕了的軍队和指揮机构在行軍和接敌时的行动竟然那样有秩序和准确，这几乎是誰都不能意料到的。最后，全世界对于这支沒有經驗的軍队毫无例外地在每一次战斗中表現出来的那种勇猛精神，都一定感到惊奇。虽然可以說这是后装枪造成的，但是这些枪自己是不会动的，需要有勇敢的心和强有力的手来使用它們。普軍常常对数量上占优势的敌人作战，并且几乎每次都是进攻者，因此奥軍有选择陣地的机会。而在对坚固的陣地和对設有街垒的城市进攻时，后装枪的优点便几乎消失了，这时就要用刺刀进行战斗，而普軍的刺刀这一次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此外，騎兵也是以同样勇猛的精神作战的；騎兵冲锋只能依靠冷兵器和战馬的速度。法国人說普軍騎兵首先用馬枪（后装枪或是别的什么枪）的火力乱射敌人，然后才用馬刀砍杀；这样的謊言只能出現在这样的一个国家；它自己的騎兵常常耍这样的詭計并且常常因此而受到惩罚，即被勇猛冲锋的敌人所粉碎。确确实实，普軍在一个星期以內便使自己占居了以往从未有过的这样高的地位，并且現在充滿了这样的信心：他們将可以和任何敌人較量。除开以耶拿会战为中心的战局（在这一

战局中，当时的普鲁士军队全军覆没）和以滑铁卢会战为中心的战局（如果不算利尼会战¹⁶⁶的失败）以外，历史上还从未有过一次战局能在这样短的期间内，在未遭到任何大的挫折的情况下，取得这样巨大的胜利。

THE INTERNATIONAL COURIER

ENGLISH PART
Published every Wednesday.

No. 6 & 7 Vol. IV. (Registered for transmission abroad.)

LONDON, FEBRUARY 20, 1867

ONE PENNY

卡·馬克思 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問題 給代表的指示¹⁶⁷

1. 国际协会的組織

临时中央委员会建議大体上采納临时章程中所闡述的組織計劃。两年来的經驗证明了这一計劃的正确性，并证明易于把它应用于不同国家而不致使行动的統一受到損害。我們建議下一年中央委员会仍設在倫敦，因为大陆的情况看来不利于作任何的改变。

中央委员会委員自然应由代表大会选出（临时章程第五条）；中央委员会有权加聘委員。

总書記应在代表大会上选出，任期一年，是协会中唯一領取薪金的負責人。我們建議每星期付給他两英鎊。^①

协会每个个人會員的統一年度会費規定为半辨士（或一辨士）。會員卡(证)的費用另付。

① 在法文和德文版里，下面紧接着这样一段話：“常务委员会实际上是中央委员会的执行机构，应由代表大会选出；各个委員的职权由中央委员会确定。”——

編者注

我們号召协会會員組織互助会，并彼此建立国际联系，同时，我們把这一問題(組織互助会；从道义上和物质上帮助协会會員的孤儿)的动議权留給瑞士人，因为他們在去年9月的代表會議上曾提出这项建議。

2. 在协会帮助下实现劳資 斗争中的国际联合行动

(a)一般說来，这一問題包括国际协会的全部活动，因为协会的目的就在于把至今仍然分散的各国工人阶级爭取自身解放的斗争联合起来，把它納入共同的軌道。

(b)我們协会至今成功地执行着的一个特殊职能，就是反对資本家在工人罢工和同盟歇业时随时准备利用外国工人作为工具来对付本国工人的阴谋。协会的偉大目的之一就是要尽力使各国工人在爭取自身解放的統一大軍中不仅有兄弟和同志那样的感情，而且像兄弟和同志那样地行动。

(c)由工人阶级自己所进行的对各国工人阶级状况的統計調查将是“国际联合行动”的偉大范例。为了行动起来有些把握，應該熟悉所要涉及的資料。工人一旦开始这项巨大的劳动，就会证明：他們能够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因此，我們建議：

在設有本协会分部的每个地区，应立即开始工作，按下述調查大綱所示各点收集实际資料。

代表大会号召欧洲和美国的全体工人参加收集关于工人阶级情况的統計材料的工作；报告和实际資料应寄給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将根据这些材料編写总报告，把实际資料作为报告的附录。

这项报告将同附录一起提交每年的例行代表大会，經大会批准后，由协会出资刊印。

調查大綱(当然每个地区均可有所改动)

1. 生产部門的名称。
2. 該生产部門从业工人的年龄和性別。
3. 該生产部門从业工人的人数。
4. 工資：(a) 学徒工資；(b) 計日工資或計件工資；中間人所付的工資額。平均周工資、平均年工資。
5. (a) 工厂中工作日的长短。(b) 如有小企业和家庭生产，則調查其中的工作日长短。(c) 夜工和日工。
6. 吃飯的时间和对工人的态度。
7. 对工場和劳动条件的評定：房屋拥挤，通風不良，光綫不足，采用瓦斯照明，清洁条件等等。
8. 工种。
9. 劳动对身体的影响。
10. 道德状况。教育。
11. 生产情况。是季节性的生产还是全年內开工比較均衡，是否經常发生很大的波动，是否遭到国外的竞争，它主要是为国内市場服务还是为国外市場服务，等等。¹⁶⁸

3. 工作日的限制

限制工作日是一个先决条件，沒有这个条件，一切进一步謀求改善工人状况和工人解放的尝试，都将遭到失敗。

它不仅对于恢复构成每个民族骨干的工人阶级的健康和体力是必需的,而且对于保证工人有机会来发展智力,进行社交活动以及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也是必需的。

我們建議通过立法手續把工作日限制为 8 小时。这种限制是美国工人的共同要求; 169 代表大会的决定将使它成为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共同行动綱領。

为了提起大陆上那些在工厂法方面經驗較少的协会会员的注意,我們还要补充說明: 如果不精确指明这 8 小时劳动安排在一天中的哪些時間里, 則任何法定的限制都不能达到目的, 而会遭到資本的破坏。这一時間的长短应規定为劳动 8 小时, 外加吃飯的时间。例如, 各次吃飯的时间共占 1 小时, 法定的一天時間就應該是 9 小时, 比如說, 从上午 7 时到下午 4 时或从上午 8 时到下午 5 时, 等等。夜工只能在法律上明文規定的生产行业或生产部門中当做一种例外。必須力爭完全廢除夜工。

这一节只涉及成年男女的情况; 必須絕對禁止妇女从事任何夜工, 也禁止她們从事对妇女較弱的身体有害的, 以及可能使她們受到有毒物质及其他有害物质影响的各种劳动。所謂成年是指年滿 18 岁的人。

4. 男女儿童和少年的劳动

我們认为, 現代工业吸引男女儿童和少年来参加偉大的社会生产事业, 是一种进步的、健康的和合乎規律的趋势, 虽然在資本主义制度下它是畸形的。在合理的社会制度下, 每个儿童从 9 岁起都应当像每个有劳动能力的成人那样成为生产工作者, 应当服

从普遍的自然规律，这个规律就是：为了吃饭，他必须劳动，不仅用脑劳动，而且用双手劳动。但目前我们的任务只是关怀工人阶级的儿童和少年。

我们认为必须根据生理状况把男女儿童和少年分为三类，分别对待：第一类包括9—12岁的儿童，第二类包括13—15岁，第三类包括16—17岁。我们建议法律把他们在任何工场或家庭里的每日劳动时间限制如下：第一类2小时，第二类4小时，第三类6小时。第三类至少应当有1小时吃饭或休息的间歇时间。

也许，小学教育最好不到9岁就开始；不过我们这里所谈的只是一种最必要的抗毒素，它被用来抵制下述社会制度的各种趋势，这种制度把工人降低为积累资本的简单工具，把那些被贫困压得喘不过气来的父母变成出卖亲生儿女的奴隶主。儿童和少年的权利应当得到保护。他们自己没有能力保护自己。因此社会有责任保护他们。

如果资产阶级和贵族忽视它们对自己后代应尽的责任，那是它们的事。享有这些阶级的特权的孩子们却不免要由于它们的偏见而遭殃。

对工人阶级来说，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工人的行动不自由。他们在很多场合甚至十分无知，不能理解自己孩子的真正利益或人类发展的正常条件。但不管怎样，最先进的工人完全了解，他们阶级的未来，从而也是人类的未来，完全取决于正在成长的工人一代的教育。他们知道，首先应当使工作的儿童和少年不受现代制度破坏作用的危害。这只有通过变社会意识为社会力量的途径才能办到，而在目前条件下，只有通过国家政权施行的普遍法律才能办到。工人阶级要求施行这种法律，决不是巩固政府的权力。相

反，工人階級正在把目前被用来反对他們的政权变为自己的武器。工人階級通过普遍的立法行为能够得到靠許多分散的个人努力所无法得到的东西。

从这一点出发，我們說，如果不把儿童和少年的劳动和教育結合起来，那無論如何也不能允許父母和企业主使用这种劳动。

我們把教育理解为以下三件事：

第一：**智育**。

第二：**体育**，即体育学校和軍事訓練所教授的那种东西。

第三：**技术教育**，这种教育要使儿童和少年了解生产各个过程的基本原理，同时使他們获得运用各种生产的最簡單的工具的技能。

对儿童和少年工人应当按不同的年齡循序漸进地授以智育、体育和技术教育課程。技术学校的部分开支应当靠出售这些学校的产品来补偿。

把有报酬的生产劳动、智育、体育和綜合技术教育結合起来，就会把工人階級提高到比貴族和資產階級高得多的水平。

不言而喻，法律应当严格禁止9—17岁(包括17岁在內)的人在夜間和在一切有害健康的生产部門劳动。

5. 合作劳动

国际工人协会的目的在于把工人階級的**自发运动**联合起来，把它納入共同的軌道，但是决不指使或强迫它接受任何空論主义的制度。因此代表大会不應該宣布任何特殊的合作制度，而只應該闡明若干总的原則。

(a) 我们认为，合作运动是改造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现代社会各种力量之一。这个运动的重大功绩在于：它用事实证明那种专制的、产生赤贫现象的、使劳动附属于资本的现代制度将被共和的、带来繁荣的、自由平等的生产者联合的制度所代替的可能性。

(b) 但是，合作制度限于单个的雇佣劳动奴隶通过自己的努力所能创造的这种狭小形式，决不能改造资本主义社会。为了把社会生产变为一种广泛的、和谐的自由合作劳动的制度，必须进行**全面的社会变革，社会制度基础的变革**，而这种变革只有把社会的有组织的力量即国家政权从资本家和大地主手中转移到生产者本人的手中才能实现。

(c) 我们建议工人们与其从事合作贸易，不如从事合作生产。前者只触及现代经济制度的表面，而后者却动摇它的基础。

(d) 建议一切合作社把自己总收入的一部分作为从行动和言论两方面来宣传自己的原则的基金，也就是说，除了传播自己的学说，还要促使建立新的生产合作社。

(e) 为了避免使合作社蜕化为通常的资产阶级的股份公司 (sociétés par actions)，每个企业的工人，不管他们是不是股东，都应当从收入中得到同样的份额。我们同意让股东得到少量的利息这种纯粹临时性的措施。

6. 工会(工联)。它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a) 它们的过去

资本是一种集中的社会力量，而工人只拥有自己的劳动力。因此，劳资之间永远不可能在公平的条件下来缔结协定，即使在物质

生活資料和劳动資料的所有权同活的生产力相对抗的社会看来的公平条件下也不可能。工人的社会力量仅在于他們的数量。然而，数量上的优势被他們的分散状态所破坏。工人的分散状态之所以造成并繼續存在，是由于**他們之間的不可避免的競爭**。

工会的产生，最初是由于工人們**自发地**企图消除或至少削弱这种競爭，以便在协定中爭取到哪怕是能使他們摆脱純粹奴隶状态的一些条件。因此，工会的直接任务仅仅是适应日常的需要，力图阻止資本的不断进攻，一句話，仅仅是解决工資和劳动時間的問題。工会的这种活动不仅是合法的，而且是必要的。只要还存在着現代生产方式，就不能沒有这种活动。不仅如此，这种活动还应当通过各国工会的建立和联合而普遍地开展起来。另一方面，工会已經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工人階級的**組織中心**，正如同中世紀的市政局和公社是資產階級的組織中心一样。如果說工会对于进行勞資之間的游击式的斗争是必需的，那末它們作为**消灭雇佣劳动制度本身和消灭資本权力的一种有組織的力量**就更为重要了。

(b) 它們的現在

工会过多地与資本只是进行地方的直接的斗争，它們还没有充分意識到它們是反对雇佣奴隶制度本身的一种多么大的力量。因此它們几乎完全不过問一般的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最近看来它們总算是意識到^① 它們的偉大历史使命了。下面的例子可以证明这一点：它們参加了英国目前的政治运动，¹⁷⁰ 更多地理解了它們在美国的作用，¹⁷¹ 以及不久以前在設菲尔德举行的盛大的工联代表會議上通过了如下的決議：

① 德文版加有：“至少在英国”。——編者注

“这次代表会议恰当地估计了国际协会在把各国工人联合为统一的兄弟般的联盟方面的活动，并郑重地建议出席这次会议的各个团体参加这个协会，认为它能真正促进全体劳动者的进步与繁荣。”¹⁷²

(c) 它们的未来

不管工会的最初目的如何，现在它们必须学会作为工人阶级的组织中心而自觉地进行活动，把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作为自己的伟大任务。工会应当支持这方面的任何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它们承认自己是并且以实际行动表现出自己是整个工人阶级的代表和为工人阶级利益而斗争的战士，因而有义务把没有组织起来的工人吸引到自己的队伍中来。它们应该特别关怀那些报酬最少的生产部门的工人的利益，例如农业工人，他们由于不利的条件而处于完全孤立无援的境地^①。工会应当向全世界证明，它们绝不是为了狭隘的利己主义的利益，而是为了千百万被压迫者的解放进行斗争。

7. 直接税和间接税

(a) 无论怎样改变征税的形式，都不能使劳资之间的关系发生根本的变化。

(b) 但是，如果需要在两种征税制度间进行选择，我们则建议完全废除间接税而普遍代之以直接税；

因为，间接税提高商品的价格，这是由于商人不仅把间接税的总数，而且把为交纳间接税所预先垫支的资本的利息和利润也加

^① 法文版中不是“处于完全孤立无援的境地”，而是“不能进行有组织的反抗”。

——编者注

在这些价格上来了；

因为，間接稅使每个人都不知道他向国家究竟繳納了多少钱，而直接稅則什么也隱瞞不了，它是公开征收的，甚至最无知的人也能一目了然。所以，直接稅促使每个人监督政府，而間接稅則压制人們对自治的任何企求。

8. 国际信貸

应当让法国人去提出动議。

9. 波兰問題^①

(a)为什么欧洲工人要把这个問題提出来呢？首先是因为资产阶级作家和鼓动家們約好了对这个問題保持沉默，尽管他們也庇护大陆上的所有民族，甚至也庇护爱尔兰。他們保持沉默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无论貴族或资产者都把那个居于幕后的黑暗的亚洲强国当做抵擋日益高漲的工人运动浪潮的最后堡垒。只要在民主的基础上恢复波兰，就会使这个强国真正被摧毁。

(b)在目前欧洲中部特别是德国的状况发生了变化的情况下，民主的波兰的存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了。沒有民主的波兰，德国就一定会变成神圣同盟的前哨，有了民主的波兰，德国就会同共和制的法国进行合作。在这个重要的欧洲問題沒有解决以前，工人运动总会遇到障碍，遭受失敗，发展也将延緩。

① 法文版的标题是：“关于通过实现民族自决权并在民主和社会的基础上恢复波兰的途径来消灭俄国在欧洲的影响的必要性”。——編者注

(c) 德国工人阶级特别有责任在这个问题上提出动议，因为德国是瓜分波兰的参加者之一。

10. 军队^①

(a) 在各种名目的资产阶级代表大会上，即和平的、经济的、统计学的、慈善事业的和社会学的代表大会上，庞大的常备军对生产的毁灭性影响，已经得到充分的证明。因此我们认为，谈论这个题目完全是多余的。

(b) 我们建议普遍武装人民并进行使用武器的普遍训练。

(c) 作为一种临时的必要措施，我们允许保存一支不大的常备军，它可以充当训练民兵指挥人员的学校；每一个男性公民都应当在极短的时期内到这种常备军中服役。

11. 宗教问题^②

应当让法国人去提出动议。

卡·马克思写于 1866 年 8 月底

载于 1867 年 2 月 20 日英文版“国际信使”第 6—7 期、3 月 13 日第 8—10 期，1867 年 3 月 9 日和 16 日法文版“国际信使”第 10 期和第 11 期，以及 1866 年 10 月和 11 月“先驱”杂志第 10 期和第 11 期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英文版“国际信使”，并根据法文版“国际信使”和“先驱”杂志校对过

① 法文版的标题是：“常备军及其对生产的关系”。——编者注

② 法文版的标题是：“宗教思想；它对社会、政治和理智发展的影响”。——编者注

卡·馬克思
1867年1月22日在倫敦紀念
波兰起义大会上的演說¹⁷³

女士們！先生們！^①

三十多年前在法国爆发了革命。这是剛同查理十世簽訂了一項改善欧洲行政管理和地理安排的密約的圣彼得堡沒有料到的事件。接到这个破坏了全部計劃的消息之后，沙皇尼古拉召集了近卫軍軍官，对他們作了簡短的杀气騰騰的演說，最后一句話是：“先生們，备馬吧！”这并不是空洞的威吓。帕斯凱維奇被派到柏林，为的是在那里准备入侵法国的計劃。几个月功夫一切都已准备停当。普魯士人应当在萊茵河集結，波兰軍队应当进駐普魯士，而俄国佬^②則应跟在他們后面。然而那时，正如拉斐德在法国众議院所說的，“前卫軍把武器調轉来对准了主力部队”¹⁷⁴。华沙的起义把欧洲从再一次的反雅各宾战争拯救了出来。

过了十八年，又有一座新的革命火山爆发了，或者更确切地

① “自由之声”报所刊載的馬克思的演說詞，前面有这样一句話：“德国人馬克思博士首先提出了一項簡短有力的決議案：‘沒有波兰的独立，欧洲的自由就不能确立。’”——編者注

② 馬克思用“俄国佬”一詞指沙皇专制政府的反动政策的卫道者（并見本卷第594頁）。——編者注

說，又发生了一次震撼整个大陆的地震。甚至連德国也显得不安宁了，虽然自从所謂的爭取独立的战争以来俄国就一直把它当做幼儿一样地看管起来。但是，最令人惊奇的是：維也納在所有的德国城市中第一个嘗試筑起街垒，并且順利地筑成了。这一次——看来这是历史上破天荒的一次——俄国失去了自制。沙皇尼古拉不再向近卫軍发表演說，而向他的人民頒布詔书，詔书中說道：法国的瘟疫甚至傳染上德国了，它已逼近了帝国的边界，瘋狂的革命把自己狂热的視綫轉向了神圣的罗斯。“没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他喊道。要知道就是这个德国許多年来都是无神論的策源地。褻瀆神明的哲学的潰瘍已經損伤了这个表面上看来如此仪表堂堂的民族的生命中樞。最后他用对德国人的号召結束了他的詔书：

“上帝和我們同在！放明白些吧，異教徒，降服吧，因为上帝和我們同在！”¹⁷⁵

在这以后，他立即通过自己的忠实奴僕涅謝尔罗迭交給德国人另外一封对这个異教民族充滿溫情的照会¹⁷⁶。怎么会有这样的轉变呢？事情是这样的：柏林人不仅完成了革命，而且揚言要恢复波兰，而普屬波兰人則被人民的热情引入迷途，也开始在波茲南修建兵营。沙皇因此才摆出了这副殷勤的姿态。又是波兰人民、这个欧洲的不死的勇士迫使蒙古人退却了。只是当波兰人被德国人、尤其是被法兰克福国民議会出卖之后，俄国才惊魂初定，并准备了足够的兵力，以便对 1848 年革命的最后一个掩蔽部——匈牙利进行打击，然而，就是在这里，同俄国人战斗的最后一个勇士仍然是波兰人貝姆將軍。

現在还有一些十分天真的人，他們认为所有这一切都变了。

像一位法国作家說的，波兰已不再是“必要的民族”，它只是感伤的回忆而已。可是，你們知道，無論是感情还是回忆，在交易所里都沒有行情。当俄国的关于廢除波兰王国的最后几道命令在英国傳开了的时候，大財主們的机关报¹⁷⁷就規劝波兰人当俄国佬。即使是为了让英国資本家剛剛借給沙皇的600万英鎊的利息更有保证，它不是也应该这样做嗎？“泰晤士报”写道：在最坏的情况下，就让俄国占領君士坦丁堡好了，只要它答应英国占領埃及，并保证英国通向广大的印度市場的道路就行！換句話說，如果俄国寬宏大量地答应英国把埃及从法国手里夺过来，那就让英国把君士坦丁堡給俄国吧。“泰晤士报”說，俄国佬喜欢向英国借錢，同时也很好地偿还。他喜欢英国錢。实实在在喜欢。然而他怎样喜欢英国人呢——关于这一点，1851年12月的“莫斯科新聞”¹⁷⁸对你們說得再清楚不过了：

“不，最后一定輪到不讲信义的阿尔比昂^①，过些时候我們只会在加尔各答同这个民族簽訂条約。”

我要問你們，有什么东西变了呢？来自俄国的危險减弱了嗎？沒有。只是欧洲統治階級的理智昏聩到了极点。首先，根据俄国官方历史学家卡拉姆津的供认，俄国的政策並沒有改变。¹⁷⁹它的方法、它的策略、它的手段可能改变，但是这一政策的主旨——世界霸权是不会改变的。只有統治着一群野蛮人的善于随机应变的政府才能在目前想出类似的計劃来。正如近代最大的俄国外交家波茨措-迪-博尔哥在維也納會議期間写給亚历山大一世的信中关于这一点所談到的那样：波兰是实现俄国对世界霸权的貪欲的最重

① 阿尔比昂是不列顛群島的古称。——譯者注

要的工具，然而当受尽欧洲不断变节的折磨的波兰人还没有变成俄国佬手中可怕的鞭子之前，它仍将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那么，撇开波兰人民的情绪不谈，請問，是否出现了什么东西妨碍俄国实现它的计划或遏止它的行动呢？

我不必提醒你们：俄国的侵略政策在亚洲正获得接二连三的成功。我不必提醒你们：所谓的英法对俄战争把高加索的山地要塞、黑海的统治权，以及叶卡特林娜二世、保罗和亚历山大一世曾经枉费心机地想从英国手里夺去的海上权利交给了俄国。铁路正在把俄国分布很广的兵力连接起来和集中起来。俄国在会议桌上的波兰¹⁸⁰（它构成俄国在欧洲的强固营垒）的物质资源不可思议地增长了。华沙、莫德林、伊万城——拿破仑第一选定的各个据点——的工事控制着整个维斯拉河，并且是向北、向西和向南进攻的有威胁性的桥头堡。泛斯拉夫主义的宣传随着奥地利和土耳其的衰落而一步跟一步地前进。而泛斯拉夫主义的宣传意味着什么呢，你们可以从1848—1849年的经验中弄清楚，当时曾在耶拉契奇、文迪施格雷茨和拉德茨基麾下作战的斯拉夫人，侵入了匈牙利，破坏了维也纳，摧毁了意大利。除了这一切以外，英国对爱尔兰的罪行也给了俄国一个在大西洋彼岸的新的强大的同盟者。

彼得一世有一次曾经感叹，在征服世界方面，俄国佬所缺少的只是士气。^① 俄国所需要的旺盛士气只有在吞噬波兰人之后才能进入它的躯体。那时你们把什么东西投到天秤的另一端呢？人们

① 在“社会主义报”上刊登的马克思的演说词中，这句话是这样的：“俄国政策的着眼点并没有改变；从1848年起实现它的手段大大增多了，不过，只是有一点对它说来到现在还是达不到的，彼得一世也曾经提到这个弱点，他曾经感叹，在征服世界方面，俄国佬所缺少的只是士气。”——编者注

会根据不同的观点来回答这个问题。有些人说，俄国由于解放了农民而进入了文明民族的大家庭。另一些人断言，不久前聚集在普鲁士人手里的德国实力能够抵擋亚洲人的一切打击。而某些更激进的人却把他们的希望寄托在西欧的内部社会改造上。^①

那末，谈到第一种意见，即俄国农奴的解放，只能说它使最高政权摆脱了贵族可能对其中集权活动所起的反作用。它为招募自己的队伍创造了广泛的条件，它破坏了俄国农民的村社所有制，分离了农民，巩固了他们对沙皇爷爷的信仰。它没有清除掉他们的亚细亚的野蛮性，因为文明是要用好些世纪来建立的。任何提高他们道德水平的尝试都被当做罪行受到惩罚。只要提醒你们关于政府对戒酒协会的惩罚就够了，那些戒酒协会力图把俄国佬从费尔巴哈称之为俄国佬的宗教的物质实体的东西、即伏特加酒中拯救出来。农民的解放在将来会引起什么后果还不知道，不过它增加了沙皇现有的实力这一点，在今天已看得很清楚了。

现在来谈谈普鲁士。这个波兰从前的附庸只是在俄国的庇护下并且靠瓜分波兰才变成头等强国的。如果普鲁士明天失去了它在波兰猎获的东西，它就会溶合在德国里面，而不是把它吞并。它要作为德国内部的一个特殊的强国而存在，就一定要依靠俄国佬。不久前它的统治的扩张不仅没有削弱这种关系，反而使这种关系变得如胶似漆，并加强了同法国和奥地利的对抗。同时俄国是霍

① 在“社会主义报”上，这一段的末尾是这样的：“从大陆来的欧洲人可能回答我说：俄国由于解放了农奴，进入了文明民族的大家庭；不久前聚集在普鲁士人手里的德国实力能够抵擋亚洲人的一切打击；最后，西欧的社会革命将消除‘国际冲突’的危险。只看‘泰晤士报’的英国人可能反驳我说：在最坏的情况下，如果俄国占领了君士坦丁堡，英国就会占领埃及，并从而保证通向广大的印度市场的道路。”——编者注

亨索倫王朝及其封建諸侯建立它們无限权力的支柱。它是它們用来对付人民的不滿的盾牌。因此，普魯士并不是对抗俄国的堡垒，而是俄国准备用来入侵法国和征服德国的工具。

至于談到社会革命，它不是階級斗争又是什么呢？工人与資本家之間的斗争比当时英国和法国的封建領主与資本家之間的斗争，可能不那样殘酷，可能血流得少一些。但願能够如此。可是无论如何，这种社会危机，尽管能加强西欧各国人民的力量，还是会和任何的內部冲突一样，将同时引起外来的侵犯。它将又一次使俄国扮演它在反雅各宾战争期間和自从神圣同盟产生以来所扮演的角色——天定的秩序救主。俄国将会把欧洲所有的特权階級招募到它的队伍里。在二月革命的时候就已經不止一个蒙塔朗貝尔伯爵把耳朵貼在地上，聆听哥薩克的馬蹄声是否动地而来。¹⁸¹已經有不止一批忠实的普魯士僕从在德国的代表會議上对沙皇称“父”称“君”。在所有的欧洲交易所里，俄国人的每一次胜利，都使证券的行情上漲，而每一次失敗又会使它下跌。

总之，对欧洲來說只能有一种选择：要么是以俄国佬为首的亞細亞的野蛮势力像雪崩一样压到它的头上；要么它就应当恢复波兰，从而以2000万英雄为屏障把自己和亚洲隔开，以便贏得時間来完成本身的社会改造。

卡·馬克思写于1867年1月22日左右

載于1867年2月10日“自由之声”报第130号和1908年3月15日“社会主义报”第18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波兰文“自由之声”报，并根据“社会主义报”校对过

卡·馬克思
辟 謠¹⁸²

敬請“北德報”編輯部將下面的辟謠聲明刊出。

致深切的敬意

卡尔·馬克思

致“北德報”編輯部

在貴報第 5522 号上，想必是由于疏忽，刊載了如下一則簡訊：

“寓居倫敦的馬克思博士……聞將周游大陸各國，其目的就是為此事（在波蘭“即將爆發的起義”）進行宣傳。”

顯然，這只是警察當局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而編造出來的謊言。

卡尔·馬克思

1867 年 2 月 18 日于倫敦

第一次發表于 1901 年“新時代”
雜誌第 3 期（第 2 卷）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路·庫格曼所抄的
卡·馬克思的手稿副本譯的

卡·馬克思
关于国际工人协会如何对待
和平和自由同盟代表大会的
決議草案¹⁸³

建議总委员会的代表不正式参加和平同盟的代表大会，并在工人协会代表大会上反对任何主張正式参加的建議。

卡·馬克思于1867年8月13日
提出

載于1867年8月17日“蜂房报”
第305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总委员会記錄簿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
卡·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書評
——為“未來報”作¹⁸⁴

卡尔·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
1867年漢堡邁斯納出版社版 共784頁八開本^①

我們这个出思想家的民族，直到現在为止，在政治經濟学方面貢獻如此少，这对于每一个德国人都是可悲的事实。这方面我們大名鼎鼎的人物，充其量不过是像劳和罗雪尔那样的編纂者，如果人們也会讀到什么創見的話，那我們就会碰到像李斯特那样的保护關稅論者（其实他是从一个法国人¹⁸⁵那里抄襲来的），或者是像洛貝尔图斯和馬克思那样的社会主义者。显然，我們御用的政治經濟学事实上是要把任何认真地研究經濟科学的人，都推到社会主义的怀抱里去。要知道我們大家都經歷了这一事实：整个御用的政治經濟学敢于在反对拉薩尔的斗争中，否认久已聞名和公认的決定工資的規律；由拉薩尔来保卫李嘉图这样的人，使之不受舒尔采-德里奇等的攻击。遺憾的是，无疑地这些先生們在科学方面甚至不能对付拉薩尔，并且不管他們的实践的努力如何值得

① *Karl Marx*. Das Kapital. Erster Band. Hamburg, Meissner, 1867, 784 Seiten. 8°. ——編者注

承認，他們都應遭到如下的非難：他們的全部科學都在於傳播巴師夏的掩飾一切矛盾和困難的協調論。承認巴師夏為權威，否認李嘉圖——現時德國御用政治經濟學的情形就是如此。的確，還能怎樣呢？很遺憾，政治經濟學在我們這裡是一個在科學上誰也不感興趣的領域：它或者是為通過國家考試而必修的科目之一，或者是為進行政治鼓動而極其膚淺地學習的補助手段。這是我們國家分散狀態的過錯，是我們可惜還這樣不發達的工業的過錯，還是在這個科學部門內我們傳統的對外國的依賴的過錯？

在這種情況下，讀到像我們所評論的這本書是十分愉快的，在這部書中作者怀着憤怒的心情，把現在流行的鄙俗的政治經濟學，或者像他極其恰當地稱為的“庸俗經濟學”，與它的古典的先驅者（到李嘉圖和西斯蒙第止）對立起來，並且對古典派也採取批判的態度，同時始終力圖不離開嚴格科學研究的道路。馬克思先前的著作，特別是 1859 年柏林敦克爾出版社出版的關於貨幣的著作¹⁸⁶，已經以其嚴格的科學性和无情的批判而出類拔萃，就我們所知，到現在為止，我們整個御用政治經濟學還沒有什麼東西與之相對抗。既然它不能反駁那部著作，那它對現在這部有 49 印張的論資本的書還能做什麼呢？我們希望人們正確地理解我們。我們不是說這本書的結論是無可反駁的，說馬克思已經充分提出了自己的證明；我們只是說：我們並不認為我們全體經濟學家中間有哪一個人能把這些結論駁倒。這本書中所進行的研究，有極大的科學確切性。我們首先舉出全書整個巧妙的辯證的結構，舉出在商品的概念中貨幣如何已經作為自在地存在的東西被表述出來，貨幣如何轉化成資本。我們承認：我們認為新介紹的剩餘價值的範疇是前進的一步；我們沒有看出有什麼東西可以反駁這

个論断：不是**劳动**，而是**劳动力**在市場上作为商品出現；我們认为修改李嘉图的利潤率規律（即應該提出剩余价值以代替利潤），是完全正确的。貫串于全书的历史的見解，使作者不把經濟規律看做永恒的真理，而仅仅看做某种暫时的社会状态的存在条件的表述，我們應該承认，这种历史的見解我們是很滿意的。而遺憾的是：在我們御用經濟学家那里，我們要找尋这本书里用来描写社会不同的历史状态及其存在条件的那种淵博和精細的理解力，是徒劳无益的。像关于奴隶制的經濟条件和規律，农奴制和人身依附的各种不同形态，自由工人的起源等这样的研究，对于我們那些專門經濟学家，到現在为止还是完全陌生的。这本书里关于协作、分工和工場手工业、机器和大工业的历史的和經濟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研究，我們也想听听这些先生們的意見；这些先生們無論如何在这里可以知道好些新的东西。尤其是关于那些与自由竞争的一切傳統理論直接相抵触的、但是在这本书里根据官方的事实材料已經证明了的事情：虽然在英国这个自由竞争的祖国，現在几乎每一个劳动部門的工作日都是借国家干涉而严格規定着的，都是有工厂視察員注視着的，可是随着工作时间的限制，不仅发生个别工业部門的高漲，而且个别工人在减少了的时间中比原来較长時間中生产更多的产品，——关于这种事情他們会說什么呢？

遺憾的是，作者談到**德国御用經濟学家**时所用的那种声色俱厉的語調，不可否认是有其理由的。这些經濟学家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屬於“庸俗經濟学”的；他們为了眼前的声誉，拿自己的科学作卖淫的勾当，背棄了科学的古典大师。他們高談“協調”，而糾纏在最平庸的矛盾中。让这本书給他們的严厉教訓，促使他們从昏睡

中醒來，提醒他們，政治經濟學不是供給我們牛奶的奶牛，而是需要認真、熱心為它工作的科學。

弗·恩格斯寫於 1867 年 10 月 12 日

原文是德文

載於 1867 年 10 月 30 日“未來報”
第 254 號附刊

俄文是按手稿譯的

弗·恩格斯
卡·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書評
——為“萊茵報”作¹⁸⁷

卡爾·馬克思“資本論。政治經濟學批判”

第一卷 資本的生產過程

1867年漢堡奧·邁斯納出版社版^①

普選權給我們到現在為止已有的議會政黨，增添了一個新的政黨，即社會民主黨。在北德意志聯邦國會最近的選舉中，社會民主黨在大多數大城市里和所有工廠區里，提出了自己的候選人，並且選出了6個或8個代表。與以前的選舉比較，它顯示出更大得多的力量，因此我們可以認為，至少現在它還處在增長的過程中。在一個由於普選權而使人數最多、最貧窮的階級作出最後決定的國家中，要繼續用高貴的沉默來對待這個政黨的存在、活動和理論，便是愚蠢的了。

無論少數社會民主黨議員之間有多大的分歧，我們還是可以肯定地說：這個政黨的一切黨團，都將歡迎這部書，把它看做自己理論的聖經，看做一個武庫，他們將從這個武庫中取得自己的最重

① *Karl Marx*. 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I. Band. Der Produktionsprozess des Kapitals. Hamburg, O. Meissner, 1867.

——編者注

要的論据。单是这个原因，这本书就值得特別注意。但就是照它的内容来看，也是引人注目的。拉薩尔的主要論据——拉薩尔在政治經濟学方面仅仅是馬克思的学生——限于不断重复所謂李嘉图的工資律，而这里放在我們面前的这部著作的作者，却以无可爭辯的罕見的博学，在与整个經濟科学的联系中，考察了資本与劳动之間的全部关系，把“揭示現代社会的經濟运动規律”作为自己的終极目的，并且根据以无可怀疑的知識所作的絕對認真的研究，得出了这个結論：整个“資本主义生产方式”必定要被消灭。其次，我們还想使人們特別注意的是，除了这部著作的最后結論，作者在其整个篇幅中以全新的观点陈述了政治經濟学上許多重要之点，并在純科学的問題上得出了一些結果，这种結果大大不同于一切先前公认的政治經濟学，并且使一些学院的經濟学家如果不願自己先前的学說遭受复沒，不得不予以严厉的批評和作科学上的反駁。为了科学的利益，希望在專門书刊上，尽快地圍繞这些重要之点展开論战。

馬克思从闡述商品和貨幣的关系开始；其中最重要之点，早已在一部单独的著作¹⁸⁸中发表过了。然后他轉到資本上，而这里我們立刻就接近到本书的中心点了。資本是什么？是一宗貨幣，这宗貨幣变成商品，以便从商品再变成比原先数量更多的貨幣。我用100塔勒买棉花，以110塔勒把它卖出，我就证实了我的100塔勒是資本，是自行增殖的价值。于是就发生了一个問題：在这个过程中我所賺的10塔勒是从哪里来的呢？經過两次簡單的交换，100塔勒怎样就变成110塔勒的呢？要知道政治經濟学恰巧假定：在任何交换中都是等价交换。于是馬克思分析了一切可能的情形（商品价格的漲落等等），证明在政治經濟学当做出发点的前提下，

由原来的 100 塔勒形成 10 塔勒的剩余价值是不可能的。但是这种过程每天都在发生，而经济学家们却始终没有向我们加以解释。马克思对这件事做了如下的说明：这个谜只有这样才能解开，即我们在市场上找到一种非常特殊的商品，这种商品的使用价值在于创造交换价值。这种商品是存在的，这就是**劳动力**。资本家在市场上购买劳动力，并且迫使这种劳动力为自己工作，以便把它的产品卖出去。所以我们必须首先研究劳动力。

什么是劳动力的价值？根据众所周知的规律来说，这就是依照该国和该时代在历史上形成的水平，工人维持生存和延续后代所必要的那些生活资料的价值。我们假定工人得到自己劳动力的全部价值。其次，我们假定，这个价值表现在每天 6 小时的劳动上，或半个工作日上。可是资本家硬说他购买了**整个工作日的**劳动力，于是迫使工人工作 12 小时或 12 小时以上。因此，在 12 小时的劳动下，他无偿地获得了 6 小时劳动的产品。马克思由此得出结论说：**任何剩余价值**，——无论它如何分摊，是作为资本家的利润、作为地租或赋税等等，——都是**无偿劳动**。

由于工厂主所关心的是每天尽可能榨取更多的无偿劳动，而工人的利益则相反，这样就发生了关于工作日长度的斗争。在值得特别注意的将近 100 页篇幅的例解部分中，马克思描写了英国大工业内这个斗争的历史；这个斗争不管主张自由贸易的工厂主的反对，去年春天以下述结果而告结束：不仅全部工厂工业，而且全部小企业，甚至全部家庭工业，都纳入了工厂法的范围内；按照这个工厂法，规定在最重要的工业部门内，妇女和 18 岁以下的儿童（从而也间接地规定了男子）每天最高限度的劳动时间为 10 小时半。¹⁸⁹ 马克思同时也说明，为什么英国工业不仅不因此而受到

損失，反而得到好處，因為每一單個人的勞動，都因強度的提高超過時間的縮短而增加了。

可是除了把勞動時間延長到超過生產必需的生活資料或生活資料價值所需要的时间之外，剩餘價值還可用另外的方法來增加。在一定的工作日中，比如說 12 小時的工作日中，按照我們先前的假定，包含 6 小時必要勞動和 6 小時用來生產剩餘價值的勞動。如果能用某種方法把必要勞動時間縮短為 5 小時，那末就余下 7 小時用來生產剩餘價值了。這可以用縮短生產必要的生活資料所需要的勞動時間來達到，換句話說，就是可以用減低生活資料價值的方法來達到，而後者又可以用改進生產的方法來達到。對於這一點馬克思又作了詳細的說明，他考察和研究了三個可以實現這種改進的主要方法：（一）**協作**，或由於許多人同時有計劃地合作而產生的力量的增強；（二）**分工**，即在真正的工場手工業時期（大約在 1770 年以前）發展起來的那種分工，最後，（三）**機器**，大工業借助於機器從那時起就發展起來。這些研究也很有意義，並且顯示出對於所研究的問題的驚人知識，一直到工藝學上的細節……①

我們不能更詳細地論述關於剩餘價值和工資的研究，為了避免誤解起見，我們只想指出一點：正如馬克思用許多引證所指出的，即使學院經濟學也并非不知道這個事實，即工資少於全部勞動產品。我們應該希望，這部書將給那些教授先生們有機會至少向我們更詳細地說明這個奇異之點。應該特別贊揚的是：馬克思所引證的一切事實材料，都取自最可靠的來源，大部分是取自正式的議會報告。關於這一點，我們支持作者在他序言里間接提出的這

① 手稿缺少一頁；該頁大概是分析關於剩餘價值和工資的問題，沒有保留下來。

——編者注

个建議：在德国也通过政府的專員，——但这些專員不应是怀有成見的官僚，——对各种不同工业部門內的工人的状况进行切实的調查，并向議會和公众提出报告。

第一卷以研究資本的积累結束。关于这个問題，人們已經写过很多文章，可是我們必須承认，这里也提供了很多新的东西，而旧的东西也从新的方面来闡明了。这里最特出的是令人信服地证明，与資本的积聚和积累同时并进地也发生了工人过剩人口的积累，而这两个过程归根到底一方面造成了社会变革的必要，另一方面造成了社会变革的可能。

無論讀者对于作者的社会主义观点抱什么态度，我們相信上述一切还是可以向他指出：讀者在这里所讀到的是远远高出于現今一般社会民主主义书刊的一部著作。我們还要指出：除了开头40頁有些困难的辯证法的东西外，虽然有极严格的科学性，这部书还是容易理解的，并且由于作者对誰也不寬恕的諷刺的文笔，甚至是有趣的。

弗·恩格斯写于1867年10月12日

原文是德文

第一次发表于“馬克思恩格斯文庫”
1927年版第2卷

俄文是按手稿譯的

弗·恩格斯
卡·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書評
——為“愛北斐特日報”作¹⁹⁰

卡尔·馬克思“資本論”
(1867年漢堡奧托·邁斯納出版社版第一卷)

这部 50 印張的学术著作，其目的是为了证明：我們的銀行家、商人、工厂主和大土地占有者的全部資本，不外是工人階級的积累起来的无偿劳动！我們回忆一下，1849 年“新萊茵报”以西里西亚农民的名义，提出了“西里西亚的十亿”¹⁹¹ 的要求。該报确定，在廢除农奴制和封建賦稅时，单是从西里西亚农民非法地夺去而落到大土地占有者口袋里的，总額就有 10 亿塔勒，因此該报要求归还这个总額。可是早就被封閉的“新萊茵报”的先生們，正如圣西維拉及其占語集一样：給他們的越少，他們要求得就越多。10 亿塔勒与現在以全体工人階級的名义所提出的那个巨大要求比起来算得什么呢，因為我們正應該这样来了解这件事啊！既然有产階級全部积累起来的資本不外是“无偿劳动”，那末显然从这里應該直接得出結論說：这种劳动應該在事后得到偿付，就是說，这里所指的全部資本應該交給劳动。也許那时就應該預先談談，到底是誰有权获得这种資本。可是把玩笑丢在一边吧！虽然所論述的这本书对事业抱有激进社会主义的态度，虽然它在各方面以极其严酷无情的态度反对被认为有权威的人，我們还是應該承认，这本书是追求最严格的科学性的高度学术性著作。报刊上已不止一次地談到，

馬克思打算以批判迄今存在过的全部政治經濟学的形式，总结自己多年研究的結果，并以此为社会主义的意图，奠定直到現在为止无论傅立叶和蒲魯东，亦无论拉薩尔，都不能为它奠定的科学基础。关于这部著作，在报刊上很早就有报道，并且常常有。1859年柏林敦克尔出版社曾出版“第一分册”¹⁹²，可是其中所談的事物沒有直接的实际的意义，因此很少引起过注意。以后几分册沒有問世，新的社会主义科学似乎忍受不了产痛。人們对这个新发现的諷刺是多么尖刻：关于它的消息是如此經常地向世界宣告，而似乎又永远不能問世！可是好了，我們面前终于出現了“第一卷”，——如已經說过的，有50印張，——并且誰也不能否认，它包含着充分的、并且非常充分的勇敢而大胆的新东西，所有这一切都是以完全科学的形式呈献出来的。这一次馬克思拿他的不平常的原理，不是向公众，而是向科学界人士請教的。科学界人士应该保卫他們那些在这里被从根本上駁斥的經濟理論的規律，他們应该证明，資本固然是积累起来的劳动，但不是积累起来的**无償劳动**。拉薩尔是实际的鼓动家，所以可以限于用实际鼓动性质的言論在日报上、在集会上来反对他。可是这里涉及的是系統的科学理論，这里日报就解决不了問題，这里只有科学可以做出决断。应该期望像罗雪尔、劳、麦克斯·維尔特等人不要放过机会保卫到现在为止公认的政治經濟学的正确性，来反对这个无疑地不能輕視的新的进攻。社会民主主义的种籽在青年一代和工人居民中間已經在很多地方长出芽来了，所以他們也会在这本书中找到充分的新的养料。

弗·恩格斯写于1867年10月22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1867年11月2日“爱北斐特日报”第302号

俄文譯自“爱北斐特日报”

弗·恩格斯
卡·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書評
——為“杜塞尔多夫日報”作¹⁹³

卡尔·馬克思“資本論。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一卷
1867年漢堡邁斯納出版社版^①

這本書會使某些讀者很失望。在某些圈子內已經有好幾年談到它的出版了。書里畢竟應該揭示出真正社會主義的秘密學說和萬應藥方，而另一些讀者在終於看到關於它出版的消息後，可能會以為他從這本書里會知道共產主義的千年王國看來到底是什麼樣子。誰期望得到這種愉快，誰就大錯特錯了。不過他會知道，事情不是這樣的，而且這一點在784頁的篇幅上會向他說得非常清楚明白的，誰有眼睛，誰就會看到：這裡社會革命的要求是足夠清楚地提出來了。這裡所指的不是像已故的拉薩爾所說的擁有國家資本的工人協會，這裡所指的是根本消滅資本。

馬克思現在是，而且將來仍然是始終如一的革命家，並且在科學著作中沒有人像他那樣毫不掩蓋自己的這些觀點。可是關於社會變革後將怎樣，他只是最一般地談到。我們將知道，大工業“使生產過程的資本主義形式的矛盾和對抗成熟起來，從而也使形成

^① *Karl Marx. 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Erster Band. Hamburg, Meissner, 1867.*——編者注

新社会的因素和变革旧社会的因素成熟起来”，其次，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消灭，“恢复了个体所有制，但这是以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为基础的，就是说，是以自由劳动者的协作以及他们对土地和他们自己劳动所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公有为基础的”。¹⁹⁴

这一点我们应该感到满足，并且照已出版的这一卷来判断，这部著作所约许的第二卷和第三卷关于这个有意义的问题也将给我们提供很少的东西。可是这一回我们应该满足于这部“政治经济学批判”，其中展现出非常广阔的天地。我们在这里当然不能对这部卷帙庞大的书中所做的详细结论作科学的评价，我们甚至不能简略地转述那里所提出的一些基本原理。大家多少知道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原理归结为一点：在现代社会中工人并没有得到他的劳动产品的全部价值。这个原理像红线一样也贯穿着所评论的这本书全部，只是在这里它比从前表述得远为明确，更彻底地贯彻到它的一切结论中，更紧密地与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联系起来，或者更直接地同它们处于对立地位。著作的这一部分由于力图达到严格的科学性而比我们所知的一切先前的类似著作出色得多，并且可以看到，作者不仅仅是对自己的理论，而且对整个科学是抱着认真的态度。

在这本书中特别引我们注目的是下面这一点：作者不是像通常所做的那样，把政治经济学的原理看做永远有效的真理，而是看做一定历史发展的结果。甚至当自然科学越来越变成历史的科学时，——只要提到拉普拉斯的天文学理论，整个地质学和达尔文的著作就够了，——政治经济学到现在为止却还是像数学一样是如此抽象的和普遍的科学。这本书的其他一些论断无论遭到怎样的命运，我们认为马克思的不可抹煞的功绩，是他结束了这种局限的

观念。例如，在这本著作出現以后，已不可能把奴隶劳动、农奴劳动和自由的雇佣劳动在經濟上等量齐观了；不可能把对于以自由竞争为特征的現代大工业有效的規律，直截了当地搬到古代的关系或中世紀的行会上去，或者当这些現代的規律不适合于先前的关系时，简单地宣布后者为異端。所有一切民族中，德国人是最具有（而且也許差不多是唯一具有）历史观念的，因此正又是德国人在政治經濟学領域中也发现了历史的联系，这是完全合乎情理的。

弗·恩格斯写于 1867 年 11 月 3 日和
8 日之間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杜塞尔多夫日报”

載于 1867 年 11 月 17 日“杜塞尔多夫
日报”第 316 号

卡·馬克思
在曼彻斯特被囚禁的芬尼亚社
社員和国际工人协会¹⁹⁵

星期三晚間在西区东城堡街 16 号总委员会駐在地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非常會議，通过了如下的意見书：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意見书。

謹致尊敬的陛下大臣格桑-哈第。

在本意見书上签名的欧洲各国工人組織的代表声明：

处决在曼彻斯特被判处死刑的爱尔兰犯人，将会給英国在欧洲大陆的道义影响造成很大損失。根据虛假的证詞和錯誤的判決（赦免馬瓜伊尔这一事实正式证实了这一点）处决四名犯人，将是一种政治报复，而不是司法行为。即使曼彻斯特陪審法庭的判決和判決所依据的证詞沒有被不列顛政府自己所污損，不列顛政府現在也应当在旧欧洲的血腥做法和大西洋彼岸的年輕共和国的寬大仁慈¹⁹⁶之間有所選擇。

我們要求減輕判刑。減輕判刑将不仅是一种正义的举动，而且是一种政治上的明智举动。

受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委托：

执行主席 約翰·韦斯頓

美国書記 罗·肖

法国書記 欧仁·杜邦
德国書記 卡尔·馬克思
瑞士書記 海尔曼·荣克
西班牙書記 保·拉法格
波兰書記 扎比茨基
荷兰書記 德金德兰
比利时書記 貝森
总書記 格·埃卡留斯”

1867年11月20日

卡·馬克思写

載于 1867 年 11 月 24 日
“法兰西信使报”第 163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馬克思夫人
燕妮·馬克思所抄的
手稿副本譯的

卡·馬克思 剽窃者¹⁹⁷

11月29日“社会民主党人报”。
全德工人联合会大会

卡尔·馬克思“資本論。政治
經濟学批判”1867年版。“工作
日”这一章

关于工作日的討論

馮·霍夫施泰滕(“社会民
主党人报”的发行人)說:

(1)“劳动力在我們的时代是商品……任何物品的〈应当說:商品的〉购买价格〈应当說:价值〉是由生产它所必需的劳动時間决定的。工人必須工作一定的小时数,来再生产他付出自己的劳动力时得到的价值;这是工作日的必要部分,但决不是工作日本身。为了确定工作日,必須〈为什么?〉加上不定部分;虽然这个部分是不定的,但它終究有自己的必要界限。”

(1)“我們的出发点是假定劳动力按照它的价值买卖。与其他各种商品的价值一样,它的价值是由生产它所必需的劳动時間决定的。如果生产工人平均每天所消費的生活資料需要6小时,那末他平均每天就要工作6小时来生产他一天的劳动力,或者說,再生产出他出卖劳动力时得到的价值。在这种場合下,他的工作日的必要部分就是6小时,因此,在其

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它是一个定量。但是这并不能确定工作日本身的长度……

固然，它的一部分是由工人本身不断再生产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决定的，但是它的总长度随着剩余劳动的长短而变化……虽然工作日不是固定量，而是流动量，但是它只能在一定的界限内变动。”（第198、199页）¹⁹⁸〔第260、261页〕^①

（2）“一个〈界限〉，即最高界限以生理上的可能性为依据〈界限怎么能以可能性为依据！〉，也就是以人能工作的时间长度为依据，因为他要维持自身的生存，就必须睡觉、休息、穿衣、保持清洁。最低界限取决于那些由每一时代的文化状况决定的要求。依照这种文化状况和现存立法，工作日和剩余劳动的时间也就不同。与此相应，就有8小时、10小时、16小时，甚至18小时的工作日。”

（2）“不过它（工作日）的最低界限是无法确定的。当然，如果我们假定……剩余劳动 = 0，那末就可以得出它的最低界限，也就是工人为了维持本身的生存所必须工作的那段时间。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必要劳动始终只是工作日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工作日决不会缩短到这个最低界限。可是工作日有一个最高界限。它不能超出一定限度。这

^① 本文中六角括号内的页码是“资本论”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的页码。译文有改动。——译者注

个最高界限取决于两点。第一是**劳动力的生理界限**。人在一昼夜(它的自然长度等于24小时)内只能支出一定量的生命力,而这种生理上的能量消耗的限度就成为他在生理上可能支出的劳动时间的限度。一匹馬天天工作,每天也只能工作8小时。人每天必須有一定时间休息、睡觉,也必須有一定时间滿足其他的生理需要,如吃饭、穿衣、保持清洁等等。除了这种**純生理界限**之外,工作日的延长还会遇到**道德界限**:工人必須有时间滿足精神的和社会的需要,这种需要的范围和数量由一般的文化状况决定……但是这两个界限(即最高的生理界限和道德界限)都有极大的伸縮性,可以使工作日发生很大的变化。例如我們就看到有8小时、10小时、12小时、14小时、16小时、18小时的工作日。”(第199頁)
〔第261—262頁〕

馮·霍夫施泰滕先生进行剽窃以后，就把他所抄襲的段落变成无稽之談。例如，在馮·霍夫施泰滕先生看来，工作日的最高界限是由純生理界限决定的，而它的最低界限是由道德界限决定的，而这是他在事先鸚鵡般地重复了我的下面这句话之后說的：工作日的必要部分，也就是它的絕對最低界限，是由維持劳动力所必需的劳动時間决定的。

(3)“英国的經驗表明，較短的工作日可以获得同样大的剩余劳动，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大大强化了。”

(4)“可見，資本家力图以尽量延长工作日为目的。〈何等荒唐！力图以……为目的！〉但是工人只有一种商品，即他的劳动力，如果超过了劳动力中的一点〈什么叫超过劳动力中的一点？〉，那末他就应当說：我被用尽了〈！〉，我被杀害了。〈妙极！在他被杀害之后，他还应当这么說！〉因此〈因为他应当这么說！〉劳动的尺度应当按照工人的利益而規定下来，使劳动力这一商品能够尽可能久地保持下来得到使用。这样，他只要求履行他的正当权利。〈他剛抱怨他被用尽了，而現在又要求他被使用的正当权利！〉”

(3)关于在英国用法律上强制地縮短工作日的办法来使劳动强化和取得同样大的或更大的“剩余劳动”。見第401—409頁〔第495—507頁〕

(4)“資本家行使他买主的权利，尽量地延长工作日，如果可能，他就要使一个工作日成为两个工作日。但是，这个出售的商品的特性却給它的买主造成使用界限，而且工人也要行使他卖主的权利，尽可能把工作日限制在一定的标准時間之內…… 我願意（他說）保持我唯一的財富——劳动力…… 使用我的劳动力和盜窃我的劳动力完全是两回事…… 你使用三天的劳动力，只付給我一天的代价。这

(5)“在英国〈工作日的〉这个量由法律規定为 10 小时〈!〉,那里由工厂視察員向內閣报告这一法律的遵守情况。在許多国家也有限制童工劳动的法律:在奥地利、瑞士、美国和比利时〈!〉正在拟定类似的法律〈!〉。在普魯士也有这类法律,但是它們只存在于紙上,从来没有得到遵守。在美国,在以奴隶的解放为結果的战争結束以后,甚至提出过八小时工作日的要求。1866 年‘国际工人协会代表大会’也建議实行八小时工作日。”

是違反我們的合同和商品交換規律的。总之,我要求**标准长度**的工作日……”(第 202、201 頁)〔第 265、264 頁〕

(5)“1850 年制定的現在还通行的**工厂法**(不是在英国,而是在馬克思所举出的联合王国的个别工业区中)規定,一周平均的工作日为 10 小时…… 为了監督法律的执行,設置了專門的**工厂視察員**,他們直屬內务部,他們的报告每半年由議會公布一次。”(第 207 頁)〔第 271—272 頁〕

……在北美合众国的一些州不是准备而是实行限制幼年工的工作日(第 244 頁)〔第 314 頁〕,在法国全面限制工作日(第 251 頁)〔第 321 頁〕,在瑞士的一些州(第 251 頁)〔第 322 頁〕、在奥地利(第 252 頁)〔第 322 頁〕对儿童全面限制工作日,而在比利时并没有类似的法律。(同上)如果馮·海特、曼托伊費尔等人的指令得到执

行，那末它們是值得称道的。
(同上)“在北美合众国, 只要共和国的一部分仍被奴隶制度玷污, 任何独立的工人运动都难展开…… 但是随着奴隶制度的死亡, 立刻就诞生了新生命。内战的第一个果实就是: 八小时工作日运动…… 同时, 国际工人协会代表大会提出…… ‘我們建議以 8 小时为工作日的法定界限’。”(第 279—280 頁)[第 353 頁]

像馮·霍夫施泰滕先生一样, 那位在他之后的演說家, 汉堡的盖布先生同样地歪曲馬克思所叙述的英国工厂立法史。他們两人都竭力掩盖自己的智慧的来源。

卡·馬克思写于 1867 年 12 月 6 日

載于 1867 年 12 月 12 日“未来报”

第 291 号附刊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未来报”

弗·恩格斯
卡·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書評
——為“觀察家報”作¹⁹⁹

卡爾·馬克思“資本論。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一卷
1867年漢堡邁斯納出版社版^①

對本書的傾向無論抱什麼態度，我們還是認為有權說：它是屬於那種使德國精神獲得榮譽的著作之列的。值得注意的是，雖然作者也是普魯士人，可是是萊茵省的普魯士人，而萊茵省的普魯士人不久之前還愛把自己叫做“不得已的普魯士人”；而且作者在最近幾十年內是在遠離普魯士的放逐中度過的。普魯士本身早已不再是任何科學首倡的國土，特別是在歷史、政治或社會領域中，這種首倡在那里是不可能的。關於普魯士，不如說它是俄國精神而不是德國精神的代表。

至於這本書本身，那末應該確切地區分其中兩個非常不同的部分：第一，對於論題的切實的正面的敘述；第二，作者從其中所得出的結論的傾向。前者大部分是直接豐富了科學。作者在那里用完全新的唯物主義的自然歷史的方法考察了經濟關係。可以作為例子的是對於貨幣問題的敘述，以及對下面這個問題的詳細的、非

① *Karl Marx*. 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Erster Band. Hamburg, Meissner, 1867. ——編者注

常內行的論證：各個不同的相互接續的工業生產形式，——在這裡是協作、分工以及狹義的工場手工業，以至機器、大工業和與它相適應的社會聯系和關係，——如何自然而然地一個接着一個發展出來。

至於作者的傾向，那我們在其中也可以分別出雙重的趨向。因為他極力證明，現代社會，從經濟上來考察，孕育着另一個更高的社會形態，所以他力圖在社會關係方面作為規律確立的，只是達爾文在自然史方面所確立的同一個逐漸變革的過程。這種逐漸的變化實際上到現在為止在社會關係方面也在發生着，從古代起，經過中世紀到我們現在為止；而就我們所知，在科學上從來沒有任何一個人認真地斷定說，亞當·斯密和李嘉圖已經對於現代社會的未來發展做出了結論。反之，自由主義的關於進步的學說，也包括着社會方面的進步，而那些只是傾向於虛飾的奇談怪論的所謂的社會主義者們，把事情說成這樣：似乎他們包辦了社會的進步。應該承認，馬克思與通常社會主義者比較起來的功績是：他指出，甚至在現代條件的極端片面發展伴随着直接的恐懼的後果的地方也存在着進步。這一點在描寫由整個工廠制度而來的貧富等對比時到處都可以看到。正由於對論題的這種批評的觀點，作者提供了——無疑地是違反着自己的意志的——反對任何專門家的社會主義 [Sozialismus von Fach] 的最有力的論據。

談到作者的傾向、主觀結論和他怎樣設想和表述現代社會發展過程的最後結果，事情就完全不同了。它們與我們稱為本書的正面部分沒有共同之處。如果篇幅許可的話，那也許可以指出，他的這些主觀的幻想，是被他自己的客觀的敘述所駁斥掉了。

拉薩爾的全部社會主義在於辱罵資本家，而向落後的普魯士

容克献媚，在这里我們看到的情况則恰恰相反。馬克思先生明白地指出了資本主义生产方式(他对現在社会阶段就是这样称呼的)的历史必然性，也同样明白地指出了那些仅仅消費的占有土地的容克階級的多余性。拉薩尔脑中充滿了幻想，以为俾斯麦能承担实行社会主义千年王国的任务，馬克思先生則极其明白地否认自己的不肖学生。他不仅确定地說，他与一切“普魯士王国政府的社会主义”沒有共同之处，而且还在 762 頁及以下几頁上說：現在在法国和普魯士占統治地位的制度，如果不及时制止的話，很快就会导致俄国的鞭子对欧洲的統治。

最后我們要指出：我們在这里能够注意的仅仅是这部龐大卷帙的基本特征；在詳細地分析时，还可以指出許多我們在这里必須省略的东西。可是，有很多专门杂志正是为这个目的而存在，它們当然会詳細地論述这部无論如何是十分出色的著作的。

弗·恩格斯写于 1867 年 12 月

12—13 日

載于 1867 年 12 月 27 日

“观察家报”第 303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接手稿譯的

弗·恩格斯
卡·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書評
——为“維尔騰堡工商业报”作²⁰⁰

卡尔·馬克思“資本論。政治經濟学批判”第一卷
1867年汉堡迈斯納出版社版^①

我們注意这本书，完全不是为了作者在序言中就已經公开表示出来的特殊的社会主义傾向。

我們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这本书，不管它的傾向如何，包含着值得所有的人注意的科学研究和实际材料。我們也不在这里研究科学部分，因为这不在我們的目的之內，我們仅仅限于事实方面。

我們并不认为有任何别的著作，德文的或外文的，像本书第302—495頁上的3章——协作、工場手工业和大工业——那样，如此明白而完全地分析了从中世紀起到現在为止的近代工业史的基本特征。工业进步的每一个方面，这里都按貢獻給予应有的地位，即使有些地方露出了特殊的傾向，我們还是應該为作者主持公道：他沒有一个地方以事实去迁就自己的理論，相反地，他力图把自己的理論表现为事实的結果。这些事实他总是取自最好的来

^① *Karl Marx. 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Erster Band. Hamburg, Meissner, 1867. —編者注*

源，而涉及現代的情况时，則取自真实的可是現在德国还不知道的来源，即英国議会的报告。那些不仅从日常赢利的眼光来看自己的工业，而且把它看做各国全部巨大的現代工业发展中的重要环节，因此也关心同自己的部門沒有直接关系的事情的德国实业界人士，在这里会找到丰富的可資借鉴的泉源，并将感謝我們促使他們注意这一点。要知道每一个經濟部門个别地、安靜地独自存在的时代早已过去了，現在它們全都互相依賴，既依賴最遙远的国家的进步，也依賴紧邻的国家的进步以及变动着的世界市場的行情。如果关税同盟的新条約²⁰¹ 很快就会造成先前的保护稅的减低（这是可以預期的），那末大体上熟悉一下現代工业史，以便預先知道在这样的变动中如何行动，对于我們所有一切工厂主就成为必要的了。尽管有政治上的分散，到現在为止常常挽救我們德国人的高度的修养，在这个問題上也是最好的武器，我們可以用它来反对那些粗俗的实利主义的英国人。

这把我们引到另一个問題上。在关税同盟新的立法下，这样的时刻很快就会到来，那时在加入同盟的各国中，工厂主自己要求同样地調整各工厂中的劳动時間。如果在一个国家里，劳动時間，特别是妇女和儿童的劳动時間，完全由工厂主决定，而在另一个国家里則大大受到限制，这显然是不公平的。在这一方面，特别是在保护关税确实将降低时，如果没有关于共同标准的協議，未必可以行得通。可是在这一方面我們德国具有的經驗是很不够的，也許甚至可以說沒有任何經驗，所以我們不得不完全依靠从其他国家的立法特别是英国的立法及其后果中可以吸取的那些教訓。而这里作者对德国工业作了巨大貢獻的地方，是他根据官方的报告，极其詳細地論述了英国工厂立法及其結果的历史（參看第

207—281、399—496 頁〔第 272—355、495—620 頁〕^① 及其后某些地方)。英国工业史的这一方面，德国几乎一无所知，而讀者将惊奇地知道：在今年的議会法令把不下于 150 万工人置于政府的监督之下以后，現在不仅差不多全部工业劳动，而且大部分家庭工业劳动，以及一部分农业劳动，在英国都置于官吏的監視下了，而且劳动時間受到直接或間接的限制。我們号召我們的工厂主不要害怕本书的傾向，特别是本书的这一部分要認真研究；无疑地，你們迟早一定会面临这同一个問題的。

弗·恩格斯写于 1867 年 12 月
12—13 日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譯的

載于 1867 年 12 月 27 日“維尔
騰堡工商业报”第 306 号

① 本文中六角括号內的頁碼是“資本論”1953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1 卷的頁碼。

——譯者注

弗·恩格斯
卡·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書評
——为“新巴登报”作²⁰²

卡尔·馬克思“資本論。政治經濟学批判”第一卷
1867年汉堡迈斯納出版社版^①

我們让別人去研究这部著作的理論部分和严格的科学部分，批評作者对于資本起源的新看法。可是我們不能不注意，他同时向我們提供了大量极有价值的历史材料和統計材料，这些材料几乎毫无例外地全部是从各种調查委员会向英国議会所做的正式报告中拿来的。他不无根据地着重指出这种調查委员会对于研究任何国家内部社会状况的重要性。这样的委员会，——当然，如果有合适的人在里面，——对于人民來說，是認識自己的最好的手段；而馬克思先生說，在德国进行类似的調查，将得出一定会使我們自己感到吃惊的結果，他是未必不对的。要知道在进行这类調查以前，任何英国人都不知道他国内的最貧穷的階級是如何生活的！当然，沒有这一类的調查，任何社会立法（像現在在巴伐利亚所称的），都只能是十分幼稚的，并且常常是愚昧无知的。德国政府机关的所謂“登記”和“調查”，其价值远远赶不上这些委员会的材料。

① *Karl Marx*. 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Erster Band. Hamburg, Meissner, 1867. — 編者注

官僚主义的老一套我們知道得太清楚了：分发一些表格，随便怎样把它填满拿回来就满足了；而这些表格所据以填写的情报，又常常恰巧是向那些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掩蔽真相的人征集的。与此相反，請拿英国的委员会的調查，例如关于各工业部門劳动条件的調查来看看。这里所听取的，不仅仅是工厂主和工头，而且还有工人，連小姑娘都包括在內；并且所詢問的不仅仅是他們，而且还有医生、治安法官、神甫、教师以及凡是能够提供一些关于这个問題的情况的人。而且每一个問題和每一个回答都用速記记录下来，逐字地刊印出来，全部材料附以委员会据此而写的带有結論和建議的报告。这样，报告及其材料一起具体地表明了委员会的成員是否履行了和怎样履行了自己的义务，这就使委员会个别成員的偏私的态度大大地发生困难。讀者可以从上述这本书里讀到詳細的情况以及无数的例子。这里我們只想着重指出一点：在英国，随着工商业自由的扩展，妇女和儿童的劳动時間受法律限制的情况也就更加普遍，从而几乎所有一切的工业部門都在政府的監視之下。馬克思先生給我們做了关于这种发展的詳細的历史的叙述，他指出，最初如何在紡織企业中从 1833 年起每天的劳动時間被这种方式限制为 12 小时；如何在工厂主和工人之間經過长期的斗争之后，劳动時間終於規定为 10 小时半，儿童为 6 小时半，以及如何从 1850 年起，工业部門一个接着一个服从于这个工厂法：最初是印花布工厂（从 1845 年起就已如此），然后从 1860 年起是染房和漂白坊，从 1861 年起是花边工厂和織袜工厂，从 1863 年起是陶器工厂、壁紙工厂等等，最后至 1867 年几乎全部其余稍大的工业部門。关于 1867 年这最后一項法令的意义，可以由下面这一点来判断：这项法令把不下于 150 万的妇女和儿童的劳动置于法律的保

护和监督之下。我們所以特別着重指出这一点,很遺憾,是因为我們德国在这一方面整个事情是很恶劣的,我們應該感謝作者如此詳尽无遺地考察了这个問題,并且他第一个使它为德国公众易于了解。每一个人道的人,無論他对于馬克思先生的理論原理持何種态度,都会有这样的意見。

关于工农业史的其余珍貴材料,篇幅不容許我們来加以考察了,可是在我們看来,任何对政治經济学、工业、工人状况、文化史和社会立法感兴趣的人,無論他抱什么观点,都不能不讀这本书。

弗·恩格斯写于1868年1月上半月

原文是德文

載于1868年1月21日“新巴登报”

俄文譯自“新巴登报”

第20号

Demokratisches Wochenblatt.

Organ der deutschen Volkspartei.

No. 12.

Leipzig, den 21. März.

1868.

弗·恩格斯
卡·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書評
——為“民主周報”作²⁰³

馬克思“資本論”^①

—

自地球上有了資本家和工人以來，沒有一本書像我們面前這本書那樣，對於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義。資本和勞動的關係，是我們現代全部社會體系所依以旋轉的軸心，這種關係在這裡第一次作了科學的說明，而這種說明之透徹和精辟，只有一個德國人才能做得到。歐文、聖西門、傅立葉的著作是有價值的，並且將來也是有價值的，可是要攀登最高點把現代社會關係的全部領域看得明白而且一覽無遺，就像一個觀察者站在最高的山巔觀賞下面的山景那樣，這只有待諸一個德國人。

① 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von Karl Marx. Erster Band. Der Produktionsprozeß des Kapitals. Hamburg, O. Meissner, 1867.

以往的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泉源，是一切价值的尺度，所以两件物品在生产上花费了同样的劳动时间，就具有同样的价值，而且因为一般说来，只有相等的价值才能互相交换，所以这两件物品就应当能够互相交换。但在同时，它又告诉我们，有一种特别的积蓄的劳动存在，它把这种劳动叫做资本；它认为，资本这种东西，因为里面包含有辅助的资源，可以使活劳动的生产率增加几百倍、几千倍，因此要求一定的报偿，这种报偿叫做利润。我们大家知道，事实上情况是这样：积蓄的死的劳动的利润，变得越来越大，资本家的资本也变得越来越大，而活劳动的工资，却变得越来越少，只靠工资为生的工人也就越来越多，越来越穷。这个矛盾怎样解决呢？如果工人加在他的产品上的劳动的全部价值都得到补偿，那末，资本家能从哪里去得到利润呢？并且既然只有相等的价值可以互相交换，在这个场合情形也应当是这样。从另一方面来说，既然如许多经济学家所承认的，产品是在工人与资本家之间分配的，相等的价值的交换怎样可能呢？工人又怎能领得他的产品的全部价值呢？在这个矛盾面前，以往的经济学家束手无策，只是写一些或说一些毫无意义的词句。甚至以往从社会主义立场来批评经济学的人，也只能提出这一矛盾而已；在马克思以前，谁也不能解决这个矛盾，只有马克思才探寻和揭示了利润发生的整个过程，一直追溯到它的根源，把一切都弄明白了。

在阐述资本时，马克思从简单的众所周知的事实出发，这就是资本家通过交换而增殖了他的资本的价值；他用他的货币去购买商品，后来又把商品卖出去，使其所得的货币，多于开始时他所投入的。例如某个资本家以1000塔勒购买棉花，后来以1100塔勒卖出，这样一来，他就“赚了”100塔勒。这个超过原有资本的100

塔勒的余額，馬克思稱為**剩餘價值**。這種剩餘價值是從哪里產生的呢？依照經濟學家的假設，只有相等的價值才能互相交換，從抽象的理論的觀點來看，這一假設是正確的。因此，買進棉花，再把它賣出去，是同一個銀塔勒兌換成 30 個銀格羅申和這些輔幣再兌換成一個銀塔勒一樣，不能產生任何剩餘價值。這種兌換既不能使人變富，也不能使人變窮。同樣，剩餘價值是不能由賣者在商品價值以上賣出商品或買者在商品價值以下買進商品產生出來的，因為他們每一個人，依次作為買者和賣者，這樣也就相互抵消了。剩餘價值也不能由買者和賣者互相欺騙而產生，因為互相欺騙不會創造任何新價值或剩餘價值，只不過使已經存在的資本在資本家之間的分配有所不同而已。儘管資本家依照價值購買商品，並且依照價值賣出商品，但他所獲得的價值仍然比他投入的多一些。這是怎樣一回事呢？

在現代社會關係下，資本家在商品市場上找到了一種商品，這種商品具有特別的性質，這就是，它的**使用是新價值的泉源，是新價值的創造**。這個商品，就是**勞動力**。

勞動力的價值是什麼呢？每一個商品的價值，都是由生產該商品所必需的勞動來測量的。勞動力以活的工人的形式存在着。工人為維持他自己的生存並維持他的家庭（這保證在他死后勞動力繼續存在），需要一定量的生活資料。因此，生產這些生活資料所必需的勞動時間就代表了勞動力的價值。資本家按周支付勞動力的價值，並由此購買到工人一周勞動的使用權。關於勞動力價值的問題，就以上各點來說，經濟學家先生們的意見和我們的意見大體上是一致的。

現在，資本家就使他的工人去工作了。經一段時間後，工人支

出的一定的劳动量会与他一周工资所代表的劳动相等。假设一个工人一周的工资代表3个工作日，那末，这个工人从星期一开始工作，到星期三晚上，就把资本家所付的工资的全部价值偿还了。他就在这个时候停止他的工作吗？不，决不是的。资本家已经购买了工人一周的劳动，所以工人在剩下的3天中也必须继续工作。工人这种超过补偿工资所必要的时间以外的**剩余劳动**，便是**剩余价值、利润的泉源**，是资本继续不断增殖的泉源。

我们不能说这是一种随意的假定：工人在3天之内再生产他所得到的工资，其余3天为资本家工作。他是用3天、2天或者4天的时间去为补偿工资而工作，在这里当然是无关紧要的，那是随情况而变化的。在这里，主要之点，是资本家在有偿劳动以外，还榨取了**无偿劳动**。这决不是一个随意的假定，因为如果有一天资本家从工人所取得的劳动总是与他所支付的工资相等，那时，他一定会关闭自己的工厂。因为如果是这样，他的利润便落空了。

在这里，我们就解决了上述一切矛盾。现在，剩余价值（资本家的利润是它的一个重要部分）的起源，是十分明白而自然了。劳动力的价值是被支付了，但是这个价值比资本家从劳动力榨取出来的少得多。正是这两者之间的差额，即**无偿劳动**，构成资本家所得的部分，更准确些说，构成资本家阶级所得的部分。拿我们前面的例子来说，因为棉花商人由棉花所赚得的利润，在棉花价格不提高时，仍然要由无偿劳动构成。商人把棉花卖给一个纺织厂主，这个厂主，会在上述100塔勒之外，从他的产品中为自己抽取出利润，因此，他是把他所攫取的无偿劳动拿来和商人共分。社会上一切不劳动的分子，都是依靠这种无偿劳动维持生活的。资本家阶级负担的国税和地方税，土地所有者的地租等等，都是由无偿劳动

支付的。全部現存的社会制度，都是建立在这种无偿劳动之上的。

另一方面，如果认为无偿劳动只有在現在这种关系下，即在生产一方面由資本家一方面由雇佣工人进行的情形之下，才能产生出来，那是荒謬的。正相反，在一切时代，被压迫階級都必須提供无偿劳动。有一个很长的时期，奴隶制度是劳动組織的支配形态，奴隶被迫做的劳动，比以生活資料的形式所还給他們的劳动，要多得多。在农奴制度下，直到农民徭役劳动廢除为止，情形也是这样。不过，在这里，农民为維持自身生活而工作的時間和为地主工作的剩余劳动之間的区别是极清楚的，因为后者和前者是分开的。現在，形态已經变化了，不过本质依然是一样的。只要“社会上的一部分人壟断了生产資料，劳动者，不管是自由的还是不自由的，总要在他们維持本身生活所必要的劳动時間以外，再加一部分劳动時間，来为生产資料的所有者生产生活資料”（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202頁〔第265—266頁〕^①）。

① 本文中六角括号內的頁碼是“資本論”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的頁碼。譯文有改动。——譯者注

二

我們在前一篇文章里已經知道，資本家所僱用的每一個工人都在做兩種勞動。他的工作時間的一部分用來償還資本家所墊支給他的工資，這一部分勞動，馬克思稱為**必要勞動**。但在此之後，他必須繼續工作，而在這段時間內，他為資本家生產**剩餘價值**。利潤便是它的一個重要部分。這一部分勞動，叫做**剩餘勞動**。

我們假定每星期中，工人要做3天的工來償還他的工資，再做3天的工，為資本家生產剩餘價值。換句話說，這便是在每天12小時的勞動中，他要做6小時的工，生產他的工資，6小時的工，生產剩餘價值。在每一個星期中，人們只能工作6天，就是把星期日算入，至多也只能工作7天。可是在每一個工作日中，可以抽取6小時，8小時，10小時，12小時，15小時，甚至更多的勞動時間。為了一天的工資，工人已經把這一個工作日賣給資本家了。然而，**什麼是一個工作日呢？**是8小時呢？還是18小時呢？

資本家想盡量延長工作日。工作日越長，生產的剩餘價值也就越多。而工人則正確地感覺到，超過償還工資的每1小時勞動，都是不合理地從他身上榨取的；他親身體驗到工作過度意味着什麼。資本家為自己的利潤而鬥爭，工人為自己的健康，為每天幾小時的休息而鬥爭，以便在工作、睡眠和飲食之外，還能人一樣地從事別種活動。我們順便指出，個別資本家是否願意加入這一鬥爭，並不取決於他們的善意，因為競爭會迫使其中最慈善的人和他

的同行合作，而把工作時間拉得同他們一樣長。

為規定工作日的鬥爭，從自由工人在歷史上最初出現的時候起，一直延續到現在。在各種不同的行業中，流行着各種不同的傳統的工作日；可是實際上，遵守的並不多。只有在那些由法律規定工作日，並且其遵守受到監督的地方，才能夠說，在那兒，存在着標準的工作日。但是直到現在，幾乎只有在英國的工廠區才是這種情況。在這裡，法律規定一切婦女和13歲至18歲的兒童每日只許勞動10小時（每星期前五天每天做工10小時半，星期六只做工7小時半）。同時，因為男子沒有女工童工就不能勞動，所以，他們的工作時間每天也就變為10小時了。英國的工廠工人獲得這一法律，是由於多年的堅持，是由於與工廠主作過最激烈最堅決的鬥爭，是由於出版自由，集會結社的權利，並且由於巧妙地利用統治階級內部的分裂。這個法律成了英國工人的保護者。它逐漸推廣到一切大工業部門，去年，差不多推廣到整個工業，至少推廣到一切雇用婦女和兒童的部門中來了。關於英國由法律規定工作日的歷史，本書包含着極其詳盡的材料。下一屆“北德意志聯邦國會”也將討論工廠管理法的問題，因而也將討論到工廠勞動管理法的問題。我們希望德國工人所選舉出來的議員，在討論這種法規之前，沒有一個不熟悉馬克思的著作。在那裡將獲得很多東西。德國統治階級內部的分裂，對於勞動者說來，比從前英國發生同樣情況時，更為有利，因為普選權會強迫統治階級對工人表示好意。在這種情形之下，無產階級的四五個代表便是一種力量，如果他們知道利用他們的地位，如果他們首先能夠知道資產者所不知道的爭論問題所在的話。關於這一點，馬克思這本書，把預備好了的一切材料，提供給他們。

我們將放過一系列更具有理論意義的極其精細的研究，而來談一談討論資本積累的那最後一章。在這裡，首先說明了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即一方面有資本家，另一方面有僱傭工人存在的生產方式——不但繼續不斷地再生產資本家的資本，而且同時還繼續不斷地再生產工人的窮困。因此，存在着這種情況：一方面經常存在着資本家，他們是一切生活資料、一切原料和勞動工具的所有者；另一方面經常存在着廣大的工人羣眾，他們被迫把他們的勞動力出賣給資本家，以換得一定量的生活資料，這些生活資料，最多只能維持工人的勞動能力，並養活新的一代有勞動能力的無產者。但是資本不僅再生產它本身而已；它會不斷地增加和增殖起來，因此，它對於無產的工人階級的權力，也跟着增大起來。而且，像它會以不斷擴大的規模再生產它自身一樣，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也以不斷增加的規模，以不斷增加的人數再生產無產的工人階級。“資本的積累以擴大的規模再生產資本關係，那就是在一端再生產出更多的資本家或更大的資本家，在另一端再生產出更多的僱傭工人……所以，資本的積累就是無產階級的增加。”（“資本論”第1卷第600頁〔第771頁〕）可是，由於機器生產的發展、農業的改良等等，生產同樣數量產品所必需的工人越加減少了，這種完善，也就是這種使工人過剩的現象，甚至比資本的增加更要快得多。這種不斷地增加的工人人數將招致什麼結果呢？他們形成產業後備軍，這種產業後備軍，在營業狀況衰落或平常的時候，是在勞動價值以下付予報酬的，而且就業不經常，或者要靠公共慈善機關的救濟為生。但在營業特別活躍的時期，它對於資本家階級是必不可少的，這一點從英國的例子看得很清楚。可是，在所有的情況下，這種產業後備軍卻會破壞經常在業的工人的抵抗

力量，使他們的工資保持在低下的水平上。“社會的財富越大，……則相對剩餘人口（多餘人口）或產業後備軍也就越大。但是與現役（經常在業的）勞動軍相比，產業後備軍越大，則經常的過剩人口，或者說，其窮困與其勞動的痛苦成反比例的工人階級也就越大。最後，工人階級的貧苦階級和產業後備軍越擴大，則官方正式認為應予救恤的貧民也就越多。這就是資本主義積累的絕對的普遍規律。”（“資本論”第 1 卷第 631 頁〔第 811—812 頁〕）

這些在科學上嚴格地證明了的規律，是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的一些主要規律，而御用的經濟學者甚至避而不敢去試圖駁倒它們。但是，難道到此一切事情就講完了嗎？不，決不。正像馬克思尖銳地、着重地指出資本主義生產的壞的方面一樣，同時他也明白地證明這一社會形態是使社會生產力發展到這樣高度的水平所必需的：在這個水平上，社會全體成員的同樣的、合乎人所應有的發展，才有可能。要達到這一點，以前一切社會形態都太薄弱了。資本主義的生產才第一次創造出為達到這一點所必需的財富和生產力，但是它同時又創造出一個社會階級，那就是被壓迫的工人群眾。他們越來越被迫起來要求利用這種財富和生產力來為全社會服務，以代替現在為一個壟斷者階級服務的狀況。

弗·恩格斯寫於 1868 年 3 月 2 日
和 13 日之間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民主週報”

載於 1868 年 3 月 21 日和 28 日
“民主週報”第 12 號和第 13 號

弗·恩格斯

卡·馬克思“資本論”
第一卷提綱²⁰⁴

卡·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
第一冊 資本的生产过程

弗·恩格斯写于 1868 年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馬克思恩格斯
文庫” 1929 年版第 4 卷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譯的

第一章 商品和貨幣²⁰⁵

一、商品本身

在資本主義生產占統治的社會里，財富是由商品構成的。商品是具有**使用價值**的物；使用價值存在於一切社會形態下，但是在資本主義社會里，使用價值同時是**交換價值**的物質承擔者。

交換價值必須先有一個用以衡量它的 *tertium comparationis* ①；即勞動這種交換價值的共同社會實體，亦即物化在其中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

正如商品具有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的二重性一樣，商品中包含的勞動也具有二重性：一方面，作為一定的生產活動，如織工的勞動、裁縫的勞動等等，是**有用勞動**；另一方面，作為人類勞動力的**單純支出**，是**凝結的抽象勞動**。前者生產使用價值，後者生產交換價值，只有後者才能在量上作比較（熟練勞動和非熟練勞動的差別，複雜勞動和簡單勞動的差別，**證實了這一點**）。

因此，交換價值的實體是抽象勞動，交換價值的量是抽象勞動時間的長度。現在讓我們再來考察交換價值的形式。

(1) x 量商品 $a = y$ 量商品 b ；一個商品的價值表現在另一

① 直譯是：作比較用的第三者；這裡的意思是：尺度。——編者注

个商品的使用价值上,是它的**相对价值**。两个商品等价的表现,是简单的相对价值形式。在上述等式中, y 量商品 b 是等价物。在它身上, x 量商品 a 获得了与商品的自然形式相对立的自己的价值形式,而 y 量商品 b 虽然是在自己的自然形式中,却同时获得了可以直接交换的属性。商品的交换价值是由于一定的历史条件而表现在商品的使用价值上的,因此,商品不能把交换价值表现在自己的使用价值上,而只能表现在另一个商品的使用价值上。只有两个具体的劳动产品彼此相等,包含在两者之中的具体劳动作为抽象人类劳动的属性才会显现出来,这就是说,商品不能把它本身包含的具体劳动,而能把别种商品包含的具体劳动,当做抽象劳动的单纯的实现形式。

x 量商品 $a = y$ 量商品 b 这一等式本身,必然推论出: x 量商品 a 也能表现在其他的商品上;因此:

(2) x 量商品 $a = y$ 量商品 $b = z$ 量商品 $c = v$ 量商品 $d = u$ 量商品 $e =$ 其他等等。这是**扩大的相对价值形式**。在这里, x 量商品 a 已经不仅仅是把一个商品,而是把**一切商品**,作为体现在它本身中的劳动的单纯表现形式。但是只要颠倒一下,这种形式就会成为:

(3) 倒转过来的第二种相对价值形式:

y 量商品 $b = x$ 量商品 a

v 量商品 $c = x$ 量商品 a

u 量商品 $d = x$ 量商品 a

t 量商品 $e = x$ 量商品 a

等等。

在这里,这些商品获得了一般的相对价值形式。在这种形式

上,所有这些商品都抽去了它們的使用价值,并作为抽象劳动的化身与 x 量商品 a 相等。 x 量商品 a 便成为一切其他商品的等价物的种屬形式;这便是它們的一般等价物;物化在其中的劳动直接成为抽象劳动的实现,成为一般劳动。可是,現在:

(4)这个系列中的每一个商品都能担任一般等价物的角色,但在同一时候,只能有其中的一个商品担任这种角色,因为,如果一切商品都是一般等价物,那末,每一个商品都会排斥其余的商品去担任这一角色。第三种形式并不是由 x 量商品 a 建立起来的,而是由其他商品客观地建立起来的。因此,某一商品必須担任这种角色,——随着時間的演变,这一商品可能变换,——而且只因如此,商品才完全变成商品。这个特殊的商品,即一般等价形式与其自然形式結合在一起的商品,就是货币。

理解商品的困难在于:商品像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切范疇一样,表現一种在物的外壳掩盖下的人与人之間的关系。生产者使他們的不同种类的劳动作为一般人类劳动互相发生关系,是通过使他們的产品作为商品互相发生关系;沒有物这种中介,他們便不能这样做。这样一来,人的关系便表现为物的关系了。

对商品生产占統治的社会来說,基督教,特别是新教,乃是合适的宗教。

二、商品的交换过程

商品在交换中才证明它是商品。两个商品的所有者必須願意互相交换他們的商品,因此,必須彼此承认对方是私有者。这种具有契約形式的法权关系,不外是一种反映經濟关系的意志关系。

这种法权关系或意志关系的内容是由经济关系本身赋予的。(第45頁)

商品对于它的非所有者是使用价值，对于它的所有者是非使用价值。因此产生交换的需要。但是，每一个商品所有者要交换的，是他需要的特殊的使用价值，就这一点說，交换是个人的过程。另一方面，他想把他的商品当做价值来实现，就是說，通过任何一个商品来实现，而不管他的商品对于其他商品的所有者是否是使用价值，就这一点說，交换对于他是一般的社会的过程。但是，同一个过程对于一切商品所有者，不能同时是个人的过程又是一般的社会的过程。对每个商品所有者來說，他的商品是一般等价物，而一切其他商品都是他的商品的許多特殊等价物。由于一切商品所有者都这样做，所以沒有一种商品是一般等价物，从而也沒有一种商品具有一般的相对价值形式，可以使它們作为价值而相等，作为价值量而相比較。因此，它們彼此并不是作为商品对立着，而只是作为产品对立着。(第47頁)

商品只有与另一种作为一般等价物的商品相对立，才能作为价值、从而作为商品彼此发生关系。但是只有社会行为才能使某一商品成为一般等价物——貨幣。

商品的內在矛盾，即商品作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直接統一，作为有用的私人劳动产品……和作为抽象人类劳动的直接社会化身，——这种矛盾是无休止的，直到它采取商品分化为商品和貨幣的形式。(第48頁)

因为一切其他商品只是貨幣的特殊等价物，而貨幣是它們的一般等价物，所以，它們是作为特殊商品而与作为一般商品的貨幣发生关系。(第51頁)交换过程給予轉化为貨幣的商品的，不是它

的价值，而只是它的价值形式。（第 51 頁）拜物教就是：好像某一商品之成为貨幣，不是因为其他商品全面地通过它来表现自己的价值，相反，好像其他一切商品之所以通过它来表现自己的价值，乃因为它是貨幣。

三、貨幣或商品流通

A. 价值尺度(假定金为貨幣)

貨幣作为价值尺度，是商品內在的价值尺度——劳动時間的必然表现形式。商品在貨幣上的简单的相对价值表现， x 量商品 $a = y$ 量貨幣，就是商品的价格。（第 55 頁）

商品的价格，商品的貨幣形式，是表现在想像的貨幣上；因此，貨幣充当价值尺度时只是观念的貨幣。（第 57 頁）

价值一旦轉化为价格，在技术上就有必要把价值尺度进一步发展成为价格标准；就是說，要規定一定的金量，去衡量不同的金量。这与价值尺度是完全不同的，因为价值尺度本身取决于金的价值，而金的价值同价格标准是无关的。（第 59 頁）

当价格用金的計算名称来表现时，貨幣就成为計算貨幣。

价格作为商品价值量的指数，同时又是該商品与貨幣的交换比例的指数，但不能由此得出相反的結論，說商品与貨幣的交换比例的指数，必然是商品价值量的指数。例如，环境許可或者强迫商品以高于或低于它的价值来出售，那末，这些出售价格就不符合于它的价值，但它們仍然是商品的价格，因为：（1）它們是商品的价值形式即貨幣；（2）它們是商品与貨幣的交换比例的指数。

因此，价格和价值量在量上不一致的可能性……已經包含在

价格形式本身中。这并不是这种形式的缺点，相反地却使这种形式适合于这样一种生产方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下，規則只能作为无規則的盲目起作用的平均数規律来貫徹。价格形式……还能包藏一个质的矛盾，以致价格可以完全不是价值的表現……良心、名誉等等也可以……由于它們的价格而取得商品形式。（第 61 頁）

用貨幣衡量价值，即价格形式，包含着让渡的必要性，观念上的定价，包含着实际上的定价。由此就产生了流通。

B. 流通手段

(a) 商品的形态变化

简单的形式是： $W-G-W$ ，其物质内容 = $W-W$ 。让出交换价值而占有使用价值。

(α) 第一阶段： $W-G$ ，即卖，其中有两个人参加，因此，有可能失敗，也就是，如果商品的社会价值发生变动，商品就要低于其价值出卖，或者甚至低于生产費用出卖。“分工使劳动产品变为商品，因而使它向貨幣的轉化成为必然”。同时分工又使这种轉化能否成功，成为偶然。（第 67 頁）不过，在这里应当考察純粹的現象。 $W-G$ 的前提是， G 的所有者（除非他是金的生产者）事先必然用别的 W 换得了 G ；因此，这一交易对于买者來說不仅是相反的行为，即 $G-W$ ，而且意味着，他事前必然进行了卖等等，这样一来，便有一个无穷尽的买和卖的系列。

(β) 在第二阶段 $G-W$ 即买时，情形相同，因为买对于另一个参加者來說同时就是卖。

(γ) 因此，整个过程是买和卖的循环。商品的流通。它与产品的直接交换是截然不同的：一方面，打破了产品直接交换的个人

的和地方的限制，促进了人类劳动的物质变换；另一方面，又可以看到，整个过程是依存于社会的自然联系，而这种联系是不以当事人为转移的。（第 72 頁）简单交换只有一个交换行为便告结束，每个人都把非使用价值交换成使用价值；而商品流通则无限地继续下去。（第 73 頁）

这里有一个错误的经济学教条：**商品流通包含着买和卖的必然平衡，因为每一次买都同时是卖，*vice versa* [反之亦然]，这就是说，每一个卖者会把他的买者带到市場上来。**（1）买和卖，一方面，是两极对立的两个人的同一行为；另一方面，是同一个人的两极对立的行爲。因此，买和卖的同一包含着这样一点：如果商品卖不出去，它就是沒用的，而且这样的事情是可能遇到的。（2）W—G，作为局部过程来看，同时是一个独立的过程，并且包含着这样一点：获得了 G 的人，可以选择再把 G 换成 W 的时机。他可以等待。W—G 和 G—W 这两个独立过程的内在统一，由于这两个过程的独立性，而在外在的对立中运动，当这两个互相依赖的过程的独立化达到一定限度时，它们的统一就要靠危机来实现。因此，在这里危机的可能性已经存在了。

货币作为商品流通的媒介，就是流通手段。

（b）货币的流通

货币是每个人的商品进入和退出流通的媒介；它本身总是留在流通中。因此，虽然货币流通仅仅是商品流通的表现，但商品流通看起来却是货币流通的结果。货币既然总是留在流通领域中，于是发生了一个问题：究竟在流通中有多少货币呢？

流通中的货币量决定于商品价格总额（假定货币价值保持不

变),而商品价格总额则决定于流通中的商品量。假定商品量是一定的,那末,流通的货币量就随着商品价格的波动而波动。但因为同一货币在一定的时期内总是接连充当好几宗交易的媒介,所以对一定的时期来说, $\frac{\text{商品价格总额}}{\text{同一货币流通的次数}} = \text{起流通手段作用的货币量}$ 。(第80页)

因此,如果把纸币投入已经饱和的流通中,它就可以把金币排挤出来。

因为货币流通只是反映商品流通过程,所以,货币流通的迅速反映出商品形态变化的迅速,货币流通的迟缓反映出买和卖的分离,反映出社会物质变换的迟缓。因此从流通本身当然看不出为什么会发生这种迟缓,流通所显示的只是现象本身。庸人以为这种现象是由于流通手段量不足引起的。(第81页)

因此:(1)商品的价格不变时,如果流通的商品量增加,或者货币流通速度减慢,流通的货币量就会增加;vice versa [相反],它就会减少。

(2)商品价格普遍提高时,如果商品量以同一比例减少,或者流通速度以同一比例加快,流通的货币量依然不变。

(3)商品价格普遍降低时,和第(2)项相反。

一般说来,流通的货币量有着相当稳定的平均水平,几乎只是由于危机才会发生显著的偏离。

(c)铸币——价值符号

价格标准由国家规定,一定金块即铸币的命名和铸造,也由国家承担。在世界市场上这种国家制服就又脱下来了(在这里且不谈铸币税),因此,铸币和金銀铸块只有形式上的差别。但是铸币

在流通中會逐漸磨損，作為流通手段的金與作為價格標準的金就不同了。鑄幣越來越變成自己法定內容的象徵。

由此便潛伏了這樣一種可能性，即金屬貨幣可以由符號或象徵來代替。因此便產生了：（1）由銅符號和銀符號充當的輔幣，由於限制它們成為法定貨幣的數量，它們受到阻礙，不能固定下來代替真正的金幣。它們的金屬含量，完全是由法律任意規定的，因而它們的鑄幣職能同它們的價值完全無關。因此，就有可能進一步採用完全沒有價值的符號；（2）紙幣，即強制通用的國家紙幣（信用貨幣暫不在此考察）。既然紙幣在實際上是代替金幣而流通，它們就受金幣流通規律的支配。只有紙幣代替金的那個比例，才受一個特殊規律支配，這個規律就是：紙幣的發行額應當限於它所代替的金的实际流通量。當然，流通領域的飽和程度是不斷波動的，但是到處都存在著一個由經驗確定的最低限度，它決不會降低到這個限度以下。這個最低限度是可以發行紙幣的量。如果發行量超過這個限度，那末當飽和程度降到這個限度時，一部分紙幣馬上就會成為多餘的。在這種情形下，商品世界中的紙幣總量仍只能代表由其內在規律決定的那個金量，即它們只能代表的那個金量。

所以，如果紙幣的量超過它所代表的金幣量一倍，那末，每一張紙幣就要跌落到它的名義價值的一半。這正像金在充當價格尺度的職能時，它的價值發生了變動一樣。（第 89 頁）

C. 貨 幣

（a）貨幣貯藏

隨著商品流通的最初發展，就產生了把 W—G 的結果即 G 保留起來的必要和欲望。這種形式變換不再是物質變換的單純媒

介，而成了目的本身。貨幣硬化為貯藏貨幣，商品出賣者變成了貨幣貯藏者。（第 91 頁）

這種形式在商品流通的初期占優勢。如在亞洲。隨着商品流通更進一步的發展，每一個商品生產者都必須掌握 *nexus rerum* [物的神經]，掌握社會公認的抵押品——貨幣。於是，到處都發生了貨幣貯藏。商品流通的發展，加強了貨幣這個財富的隨時可用的絕對社會形式的權力。（第 92 頁）貯藏貨幣的欲望按其本性說是無止境的。從質方面說，或者從它的形式方面說，貨幣是無限的，也就是說，它是物質財富的一般代表，因為它能直接轉化為任何商品。但從量方面說，每一個現實的貨幣額又是有限的，因而只是力量有限的購買手段。這種矛盾驅使貨幣貯藏者不斷從事息息法斯^①式的積累工作。

此外，金和銀還可以 *in plate* [用金銀製品的形式] 積累起來，這就為這些金屬造成一個新市場，又為貨幣開辟了一個潛伏的來源。

在流通領域的飽和程度不斷波動的情況下，貨幣貯藏對於流通的貨幣起着泄水道和引水道的作用。（第 95 頁）

(b) 支付手段

隨着商品流通的擴展，又產生了新的關係：商品的讓渡在時間上可以同價格的實現分離。各種商品所需要的生產時間不同，生產季節不同，有一些商品必需送到遙遠的市場上去，等等。所以，A 能夠在買者 B 有能力支付之前成為賣者。實踐形成的支付條件

^① 息息法斯是希臘神話中科林斯王，被謫在冥府中搬運巨石至山頂，而巨石每次推上又一定滾下來。——譯者注

是：A 成为**債權人**，B 成为**債務人**，貨幣則成为**支付手段**。这样一来，**債權人和債務人**的关系就更加对抗了（債權人和債務人关系的产生可以与商品流通无关，如在古代和中世紀）。（第 97 頁）

在这种关系中，貨幣的职能是：（1）充当价值尺度，决定被卖商品的价格；（2）充当观念的购买手段。在貯藏貨幣的場合，G 退出流通，而在这里作为支付手段，G 則进入流通，但这只是在 W 已經退出流通之后。变成債務人的买者現在售卖，是为了能够**支付**，否則他的財產就会被拍卖。因此在这里，由于流通过程本身的关系所引起的一种社会必要，G 成了**卖的目的本身**。（第 97—98 頁）

产生貨幣支付手段职能的买和卖在時間上的不一致，同时又造成了流通手段的节省，使支付集中于一定地点，中世紀里昂的 Virements [轉賬处] 就是某种 clearing house [票據交換所]，在那里，要支付的只是債務互相抵銷后的余額。（第 98 頁）

在各种支付互相抵銷时，貨幣只是在观念上起**計算貨幣**或价值尺度的作用。在实行真正的支付时，它并非充当流通手段，并非仅仅充当物质变换的瞬息間的媒介形式，而是社会劳动的单个化身，是交换价值的独立存在，是**絕對商品**。这个直接的矛盾，会在生产危机和商业危机中称为**貨幣危机**的时刻明显地暴露出来。这种貨幣危机只有在支付的連鎖与人为的結算制度十分发达的地方才会发生。当这个机构整个被扰乱的时候，不管它的原因如何，貨幣就要突然而直接地从它的仅仅是观念的**計算貨幣**形态一变而为**硬幣**；平凡的商品是不能代替它的。（第 99 頁）

信用貨幣是从貨幣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产生出来的；**債券**本身因**債權轉移**而流通。随着信用的发展，貨幣作为支付手段的职

能也在扩大；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取得了它自己的存在形式，并以这些形式占据了大宗贸易的领域，而铸币则主要被排挤到小额贸易的领域去了。（第 101 页）

商品生产发展到相当水平和范围以后，货币充当支付手段的职能就会越出商品流通领域。货币成了契约上的一般商品。地租、赋税等等由缴纳实物变为支付货币。参看路易十四统治下的法国情况（布阿吉尔贝尔和沃邦）。在亚洲、土耳其、日本等地，情况则相反。（第 102 页）

货币发展成为支付手段，使得在支付期到来前必须积累货币。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当作致富的独立形式的货币贮藏消失了，而当作支付手段准备金的那种货币贮藏却又发展起来了。（第 103 页）

(c) 世界货币

在世界交往中，货币便抛掉了铸币、辅币、价值符号等地方形式，它只有以金银条块形式才能充当世界货币。只有在世界市场上，货币才充分地作为这样一种商品起作用，这种商品的自然形式同时就是 *in abstracto* [抽象] 人类劳动的直接社会实现形式。货币的存在方式才和它的概念相符合。（第 104 页；详见第 105 页）

第二章 貨幣轉化為資本

一、資本的總公式

商品流通是資本的起點。商品生產，商品流通及其發展，即商業，總是資本產生的歷史前提。資本的現代生活史，是從十六世紀現代世界貿易和世界市場出現的時候開始的。（第 106 頁）

如果我們只考察商品流通所產生的經濟形式，那末，它的最終產物是貨幣，而貨幣正是資本的最初的表現形式。資本在歷史上起初總是作為貨幣財產，作為商業資本或高利貸資本，與土地所有權相對立。就是現在，一切新資本也是以貨幣形態登上舞台，貨幣經過一定的過程，就轉化為資本。

作為貨幣的貨幣和作為資本的貨幣之間的區別，最初只在於流通形式不同。除 $W-G-W$ 之外，還有 $G-W-G$ 的形式，即為賣而買。在運動中表現這種流通形式的貨幣就成為資本，本身（即按它的規定）已經是資本了。

$G-W-G$ 的結果，是 $G-G$ ，即貨幣間接地交換貨幣。我用 100 鎊購買棉花，而以 110 鎊賣出，結果我是用 100 鎊換 110 鎊，是貨幣換貨幣。

如果這個過程最終得到的貨幣價值和原來投入的相等，即 100 鎊換 100 鎊，那末這個過程是荒謬的。但不論商人從他的 100

鎊實現了 100 鎊, 110 鎊, 或者只是 50 鎊, 他的這項貨幣總是經歷了一個獨特的、根本不同於商品流通 $W-G-W$ 的運動。考察一下這個運動和 $W-G-W$ 之間的形式上的差別, 也就可以發現它們內容上的差別。

這個過程的兩個階段的每一個和 $W-G-W$ 中的每個階段相同。但是, 整個過程之間卻有着很大的區別。在 $W-G-W$ 中, 貨幣是中介, 商品是起點和終點; 而在 $G-W-G$ 中, 商品是中介, 貨幣是起點和終點。在 $W-G-W$ 中, 貨幣是永遠花掉了; 在 $G-W-G$ 中, 貨幣只是預付, 最後還要收回來。貨幣回到它的出發點, ——因此, 這裡已經存在着貨幣作為貨幣的流通與貨幣作為資本的流通之間的明顯區別。

在 $W-G-W$ 中, 貨幣只有借助全部過程的重复, 借助售賣新的商品, 才能回到它的出發點。因此, 貨幣的流回是同過程本身無關的。相反, 在 $G-W-G$ 中, 貨幣的流回一開始就是由過程本身性質決定的, 如果貨幣流不回來, 過程就是不完整的。(第 110 頁)

$W-G-W$ 的最終目的是使用價值, 而 $G-W-G$ 的最終目的是交換價值本身。

在 $W-G-W$ 中, 兩端都有同樣的經濟形式規定性。兩端都是商品, 而且具有相等的價值量。但它們同時是質上不同的使用價值, 這個過程的內容是社會的物質變換。在 $G-W-G$ 中, 乍看起來, 行動似乎是同義反復的, 是毫無意義的。用 100 鎊交換 100 鎊, 還要兜一個圈子, 好像是荒謬的。一個貨幣額和另一個貨幣額只能在量上不同; 因此, $G-W-G$ 只是由於兩端具有量的區別才有內容。從流通中取出的貨幣要多於投入的貨幣。例如, 以 100 鎊

购得的棉花，又以 100 鎊 + 10 鎊卖出去；这个过程就得到下列的公式： $G-W-G'$ ，在这里， $G' = G + \Delta G$ 。这个 ΔG ，这个增殖額就是剩余价值。原来預付的价值不仅在流通中保存下来，而且加上了剩余价值，它增殖了，正是这一运动使貨幣轉化为資本。

在 $W-G-W$ 中，也会有两端价值不同的情形。但是对这种流通形式來說，这純粹是偶然的。如果两端价值相等， $W-G-W$ 也不会失去意义，相反，这倒是过程正常进行的条件。

$W-G-W$ 的重复，以达到过程之外的最終目的为限，即以消費，以滿足一定的需要为限。相反，在 $G-W-G$ 中，开始和終結是一样的，都是貨幣，就因为这样，这个运动已是永无止境的了。当然， $G + \Delta G$ 在量上不同于 G ，但是，它也只是一个有限的貨幣額；如果把它花掉，它就不再成为資本；如果把它从流通中取出，它就固定为貯藏貨幣。既然需要的是价值增殖，那末 G' 同 G 一样，都需要增殖，資本的运动是永无止境的，因为在过程的終了同在开始一样，它的目的沒有达到。（第 111、112 頁）作为这个过程的承担者，貨幣的所有者就成了資本家。

在商品流通中，交换价值至多成长为一种独立形式，同商品的使用价值相对立，而在这里，它却突然表现为过程中的、自行运动的实体，商品和貨幣只是这一实体的形式。而且，它把自己作为原价值同自己本身作为剩余价值区别开来。它成为过程中的貨幣，从而成为資本。（第 116 頁）

誠然， $G-W-G'$ 似乎只是商业資本所独有的形式。但是，工业資本也是这样一种貨幣，它轉化为商品，通过商品的出售又重新轉化为更多的貨幣。在流通領域以外，在买和卖的間隙完成的行为，絲毫不会改变这一点。最后，就生息資本來說，这个过程直接

表現为 $G-G'$ ，可以說是比它本身更大的价值。(第 117 頁)

二、总公式的矛盾

貨幣借以变为資本的流通形式，是同以前所說的关于商品、价值、貨幣和流通本身的性质的規律相矛盾的。只是次序相反这种純粹形式上的区别，能否造成这种情形呢？

此外，只有对交易上的三个当事人中的一个來說，次序才是顛倒了。作为資本家，我从 A 手里购买商品，然后把商品卖给 B。A 和 B 是以商品的單純的买者和卖者身分出現的。在这两种場合，我对他們只是單純的貨幣所有者或商品所有者，对前者，我是作为买者或貨幣，对后者，則是作为卖者或商品。無論对哪一个，都不是作为資本家，或作为貨幣或商品以外的什么东西的代表出場的。对于 A，交易是以卖开始的，对于 B，交易是以买結束的，因此，这完全像在商品流通中一样。如果我把次序顛倒就有权取得剩余价值，那末 A 也可以直接卖给 B，这样，获取剩余价值的机会也就消失了。

假定 A 和 B 相互直接购买。就使用价值來說，双方都可以得到好处。甚至 A 生产自己的商品能比 B 在同一時間內生产得多，*vice versa* [反之亦然]，因此，双方都得到好处。但是，就交換价值來說，情形就不同了。在这里，即使貨幣作为流通手段插在中間，双方交換的也是等量的价值。(第 119 頁)

抽象地考察起来，在簡單的商品流通中，除了一种使用价值被另一种使用价值代替而外，发生的只是商品的形式变换。既然簡單的商品流通只包含它的交換价值的形式变换，那末就現象的純

粹形态來說，它就只包含等价物的交換。不錯，商品能按背离价值的价格出售，但这就違背了商品交換的規律。就純粹形态來說，商品交換只能是等价物的交換，因此不是致富的手段。（第 120 頁）

因此，一切想在商品流通中得出剩余价值的企图都是錯誤的。孔狄亚克（第 121 頁），紐曼（第 122 頁）。

我們假定，交換不是純粹形态的交換，而是非等价物交換。我們假定，每个卖者都按照比商品价值高 10% 的价格出售商品。这时一切照旧；每个人作为卖者时所获得的，作为买者时又会失掉。这同货币的价值发生了 10% 的变化完全一样。如果买者都按照比价值低 10% 的价格购买一切，情况也是一样（第 123 頁）（托倫斯）。

有人假定剩余价值是从提高价格产生的，但这先要假定有一个只买不卖，就是說只消費不生产的階級存在，货币能白白地源源不断地流到这个階級手里。以超过价值的价格把商品出售給这个階級，只不过是收回白白交出的货币的一部分（如小亚細亚和羅馬之間）。可是，卖者总是被騙者，不会因此而变富，不会产生剩余价值。

我們假定发生欺騙行为。A 把价值 40 鎊的酒卖給 B，換得价值 50 鎊的谷物。A 賺了 10 鎊。但是 A+B 仍然只有 90 鎊。A 有 50 鎊，B 只有 40 鎊；价值是轉移了，但是沒有增殖。一国的整个資本家階級，是不能靠欺騙自己来发财的。（第 126 頁）

因此，是等价物交換，不会产生剩余价值，不是等价物交換，也不会产生剩余价值。商品流通不創造新价值。

因此，在这里不考察最古老最常见的資本形式，即商业資本和高利貸資本。如果在說明商业資本的增殖时，不以單純的欺騙来解釋，那就需要許多中間环节，而这些环节在这里还是不存在的。

对于高利貸和生息資本來說更是这样。以后將說明，这两种都是派生的形式，以及为什么它們在历史上会出现于現代資本以前。

因此，剩余价值不能从流通中产生。那末在流通之外呢？在流通之外，商品所有者只是他的商品的生产者，商品的价值取决于按一定的社会規律衡量的在商品中包含的他自己的劳动量；这个价值表现为計算貨幣，例如表现为价格 10 鎊。但是，这个价值不能同时是 11 鎊的价值。他的劳动創造价值，但没有創造自行增殖的价值。它能給原有价值添加更多的价值，不过这只是靠添加更多的劳动才能做到。可見，商品生产者在流通領域之外，不同其他的商品所有者接触，就不能生产剩余价值。

資本必須在商品流通中产生，同时又不在流通中产生。（第 128 頁）

总之：貨幣轉化为資本，应当根据商品交換的內在規律來說明，所以，等价物的交換应当是出发点。我們这位还只是資本家幼虫的貨幣所有者，必須按商品的价值购买商品，按商品的价值出卖商品，但他在这个过程終了时毕竟取得比他投入的价值更大的价值。他从幼虫变成蝴蝶，必須既在流通領域內，又不在流通領域內。这就是問題的条件。Hic Rhodus, hic salta! ①（第 129 頁）

三、劳动力的买和卖

要轉化为資本的貨幣，其价值变化不可能发生在貨幣本身。因为在购买时，貨幣只是实现商品的价格。另一方面，在它仍然是

① 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吧！（这是对伊索寓言“說大話的人”的主人公讲的話，他硬說自己曾在罗陀斯島跳得很远。）——編者注

貨幣的時候，它的價值量並不改變；在售賣時，它也只是將商品從它的自然形式變為它的貨幣形式。因此，這種變化必定發生在G—W—G 這個公式中的商品上；但不是發生在它的交換價值上，因為是等價物的交換；這種變化只能來自使用價值本身，即來自商品的使用。為此就需要這樣一種商品，它的使用價值具有成為交換價值源泉的屬性——這種商品是有的，就是勞動力。（第 130 頁）

但是，貨幣所有者要在市場上找到作為商品的勞動力，勞動力就必須是由它的所有者出售，也就是說，必須是自由的勞動力。因為買者和賣者作為締約的雙方是在法律上平等的人，所以勞動力必須只出賣一個時期，如果一次 en bloc^① 出賣，賣者就不再是賣者，而本身成為商品了。另一方面，勞動力所有者已沒有可能出賣把他的勞動物化在內的商品，他只有把他自己的勞動力當作商品來出賣。（第 131 頁）

可見，貨幣所有者要把貨幣轉化為資本，必須在商品市場上找到自由的工人。這裡的自由具有雙重意義：一方面，作為一個自由人，他能夠把他的勞動力當作他的商品來處理；另一方面，他沒有別的商品可以出賣，自由得一無所有，沒有實現他的勞動力所必需的一切東西。（第 132 頁）

附帶說說，貨幣所有者和勞動力所有者的關係，不是自然關係，也不是一切時代所共有的社會關係，而是一種歷史的關係，是許多經濟變革的產物。以上考察的經濟範疇，也都同樣帶有歷史的印記。要成為商品，產品必須不再是作為直接的生存資料來生產。只有在一定的生產方式即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大量的產品才會

① 全部；這裡的意思是：永遠。——編者注

采取商品的形式,虽然在大量产品还从来不是商品的地方,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也会发生。货币 ditto [同样地] 能够存在于商品流通已经达到一定水平的一切时期中;货币的特殊形式,从简单的等价物到世界货币,以不同的发展阶段为前提;不过,很不发达的商品流通也能产生上述一切形式。相反,资本只有在上面所说的条件下才会发生,而这个条件已经包含了一部世界史。(第 133 页)

劳动力有交换价值,它的交换价值和一切其他商品的交换价值一样,是由生产、亦即再生产这个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的。劳动力的价值,就是维持劳动力所有者的生活即维持他的正常的工作能力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这些必要的生活资料以气候、自然条件等等,以及一个国家历史上形成的一定的 standard of life [生活水平] 为转移。它们是变动的,但是,在一定的国家,一定的时期,它们是一定的。其次,它们还要包括接班人即儿童的生活资料在内,只有这样,这种特殊的商品所有者的种族才能延续下去;再次,对于熟练劳动来说,还要包括教育费在内。(第 135 页)

劳动力价值的最低限度,是生理上必不可少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如果劳动力的价格跌到这个最低限度,就是跌到它的价值以下,因为后者是以劳动力的正常的质量为前提,而不是以萎缩的质量为前提。(第 136 页)

劳动的性质意味着,劳动力只有在締結契約以后才被使用,因为货币对于这种商品多半是充当支付手段,所以在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中,只有在劳动力发挥作用以后,才付给报酬。因此,到处都是工人借给资本家。(第 137、138 页)

劳动力的消费过程,同时是商品和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这种消费是在流通领域之外进行的。(第 140 页)

第三章 絕對剩余价值的生产

一、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

劳动力购买者消費劳动力，迫使劳动力出卖者劳动。这种劳动要体现在商品中，首先就必须体现在使用价值中。从这种性质說来，它同資本家和劳动者之間的特殊关系无关。对于劳动过程本身的叙述——見第 141—149 頁。

在資本主义基础上的劳动过程有两个特点：（1）工人在資本家的监督下做工。（2）产品归資本家所有，因为劳动过程現在只是資本家购买的两个物即劳动力和生产資料之間的过程。（第 150 頁）

但是，資本家并不要生产使用价值本身，而只是把它作为交换价值的承担者、特别是剩余价值的承担者。劳动在这种条件下——在这里，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統一——成了生产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統一。（第 151 頁）

这样，就必须研究物化在产品中的劳动量。

試以棉紗为例。假定制造棉紗需棉花 10 磅，值 10 先令，劳动資料在紡紗过程中必要的損耗（为簡單起見，在此以錠子的損耗計算）为 2 先令。这样，在产品中就含有价值 12 先令的生产資料。这以下列情况为条件：一，产品已成为实际的使用价值，在我們所

举的例中已成为棉紗；二，这些劳动資料中只是体现社会必要劳动時間。那末，紡紗者的劳动在商品中加进了多少呢？

因此，在这里是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来考察劳动过程。在产品的价值中，棉花种植者、錠子制造者和紡紗者等人的劳动都是可通約的部分——都是作为一般的、人类必要的、形成价值的劳动而在质上相等，——因此只能在量上加以区别，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能用時間的长短在量上加以比較。假定这是社会必要劳动時間，因为只有这种時間形成价值。

假定劳动力一天的价值 = 3 先令，代表 6 工作小时，每小时制造 $1\frac{2}{3}$ 磅的棉紗，因此，在 6 小时中，用 10 磅棉花制造了 10 磅棉紗(如上面所說)；这样，在 6 小时內，就加进了 3 先令的价值，产品值 15 先令 (10 先令 + 2 先令 + 3 先令)，或者說，每磅棉紗值 1 先令 6 辨士。

但是，在这里沒有剩余价值。这沒有滿足資本家的要求。(庸俗經濟学的詭辯……第 157 頁)

我們假定劳动力一天的价值是 3 先令，因为物化在其中的是半个工作日或 6 小时。但是，仅仅半个工作日就是維持工人 24 小时生活所必需的時間这个事实，并不能阻止他劳动一整天。劳动力的价值和劳动力創造的价值，是两个不同的量。劳动力的有用性质不过是 *conditio sine qua non* [必要条件]，具有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劳动力的特殊的使用价值，它是創造較它本身原有的交換价值更多的交換价值的源泉。(第 159 頁)

工人劳动 12 小时，紡了 20 磅棉花 = 20 先令，再加上价值 4 先令的錠子和 3 先令的劳动 = 27 先令。但在产品中物化的是，表现为錠子和棉花的 4 个工作日，再加上紡紗工人的 1 个工作日 =

5日，每日以6先令計 = 产品价值30先令。这里就有了3先令的剩余价值：货币轉化为資本了。（第160頁）問題的一切条件都履行了。（詳細說明見第160頁）

作为价值形成过程的劳动过程，当它延长到超过为劳动力的有偿价值提供单纯等价物的限度时，就是价值增殖过程。

价值形成过程和单纯劳动过程的区别在于：后者是从质的方面来考察，而前者是从量的方面来考察，而且只是在它所包含的是社会必要劳动的限度内来考察。（第161頁。詳細說明見第162頁）

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的統一，生产过程是商品的生产；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統一，它是資本主义的商品生产过程。（第163頁）

复杂劳动化为简单劳动。（第163—165頁）

二、不变資本和可变資本

劳动过程把新价值加到劳动对象上，同时把劳动对象的价值轉移到产品中，因而通过单纯的加进新价值而把价值保存下来。这个双重結果是这样获得的：劳动的特殊有用的、质的性质，把一种使用价值变成另一种使用价值，从而保存价值；而劳动的形成价值的、抽象一般的量的性质，則加进价值。（第166頁）

例如，紡紗劳动的生产率增加为6倍。作为有用的（质的）劳动，它在同一时期内，保存等于过去6倍的劳动資料。但是，它只是加进和过去一样的新价值，也就是說，在每磅棉紗中，只含有过去加进的新价值的 $\frac{1}{6}$ 。作为形成价值的劳动，它并没有創造比从

前更多的东西（第 167 頁）。如果紡紗劳动的生产率不变，而劳动資料的价值提高了，結果就相反。（第 168 頁）

劳动資料只是把它本身所丧失的价值轉移到产品中（第 169 頁）。但轉移的程度各不相同。煤、机油等完全消失了。原料取得了新的形态。工具、机器等只是慢慢地、部分地轉移价值，它們的損耗是根据經驗来計算的（第 169—170 頁）。此外，工具在劳动过程中始終是完整的。所以，同一个工具是**整个地**参加劳动过程，而只是部分地参加**价值增殖过程**。这样，这两个过程的区别，在这里就反映在物质因素上（第 171 頁）。相反，原料是会有廢料的，它是**整个地**加入价值增殖过程，而只是部分地加入劳动过程，因为它在产品中出現时要减掉廢料。（第 171 頁）

但無論如何，劳动資料不能提供比它本身**更多的**交换价值，——它在劳动过程中只充当使用价值，因此只能提供它原有的交换价值。（第 172 頁）

这种价值保存，对資本家很有价值，而且不費他分文。（第 173、174 頁）

保存的价值，只不过是**再現**而已，它本来就存在。只有劳动过程才加进新价值。在資本主义生产下就是**剩余价值**，即产品价值超过制造产品时所消耗的要素（生产資料和劳动力）的价值而形成的**余額**。（第 175、176 頁）

这也就說明了原資本价值在拋棄貨幣形式、轉化为劳动过程的要素时采取的存在形式：**（1）**购买**劳动資料**时采取的存在形式，**（2）**购买**劳动力**时采取的存在形式。

投入劳动資料的資本在生产过程中不变更其价值量，我們把它叫做**不变資本**。

投入劳动力的資本部分变更其价值,它生产:(1)它自身的价值,(2)剩余价值。我們把它叫做可变資本。(第 176 頁)

(資本之成为不变資本,只是就它对特定的生产过程的关系而言,在这个生产过程中,它是不变的。它包括的劳动資料可能时多时少,所购买的劳动資料的价值可能或漲或落。但是,这并不影响它們同生产过程的关系(第 177 頁)。同样,一定的資本分为不变資本和可变資本的百分比,虽然会变动,但在每一場合, c 仍然是不变資本, v 仍然是可变資本。)(第 178 頁)

三、剩余价值率

$C = 500$ 鎊 $= \overset{c}{410} + \overset{v}{90}$ 。劳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v 轉化为劳动力——終了时,得到 $\overset{c}{410} + \overset{v}{90} + \overset{m}{90} = 590$ 鎊。我們假定 c 中有原料 312 鎊,輔助材料 44 鎊和机器損耗 54 鎊 $= 410$ 鎊。假定机器的全部价值是 1 054 鎊。如果把机器的全部价值都算进去,那末,两边的 c 都是 1 410 鎊;而剩余价值仍和以前一样,是 90。(第 179 頁)

因为 c 的价值只是再現在产品中,所以我們得到的产品价值和在过程中新創造的价值,是不同的;后者不是 $= c + v + m$, 而是 $= v + m$ 。因此 c 的量,对于价值增殖过程是无关的,也就是說, $c = 0$ (第 180 頁)。在实际中也是这样做,把商业計算方法撇开不用,例如,在計算一国从工业得到的收入时,就是把进口的原料除掉的。(第 181 頁)关于剩余价值同总資本的比,将在第三册作必要的說明²⁰⁶。

因此,剩余价值率 $= m : v$, 在上述的例子中,就是 90 : 90

= 100%。

工人再生产他的劳动力价值的劳动时间——不論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或是在其他条件下——是**必要劳动**，超过了这个界限而替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是**剩余劳动**（第 183、184 頁）。剩余价值是凝結了的剩余劳动。使各种不同的社会形态区别开来的，就是**剩余劳动的榨取形式**。

錯誤地把 c 也計算在內的例子，見第 185—196 頁（西尼耳）。

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总和 = 工作日。

四、工作日

必要劳动时间是一定的。剩余劳动是可变的，但有一定的限度。它从来不会 = 0，因为那时资本主义生产就会停止。由于生理的原因，它也从来不会达到 24 小时；此外，最高界限还始終要受道德原因的影响。但是，这些界限具有很大的伸縮性。經濟上的要求是：工作日不能长过工人的标准的消耗，可是，什么叫做**标准**的呢？在这里发生了二律背反，只有靠力量来决定。由此就发生了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之間爭取**标准工作日**的斗争。（第 198—202 頁）

以前社会时代的剩余劳动。在交换价值的重要性还没有超过使用价值以前，剩余劳动是較少的，如在古代；那时只有在直接生产交换价值，即生产金銀的地方，剩余劳动才是惊人的。（第 203 頁）美国奴隶制各州，在尚未大量生产出口的棉花以前，情况就是如此。此外，在实行徭役劳动的地方，如羅馬尼亚，也是如此。

徭役劳动是用来同资本主义剝削作比較的最好例子。因为

前者确定并表明剩余劳动是专门提供的劳动時間。瓦拉几亚的 *Règlement organique*²⁰⁷。(第 204—206 頁)

这是对剩余劳动的貪欲的正面表現,英国的 *Factory acts* [工厂法]則是这种貪欲的反面表現。

Factory acts。1850 年的法律(第 207 頁)規定平日是 10¹/₂ 小时,星期六是 7¹/₂ 小时,总計每周 60 小时。工厂主由逃避工厂法而取得的利潤。(第 208—211 頁)

不受法律限制的或直到后来才受限制的产业部門中的剝削:花边业(第 212 頁);陶器业(第 213 頁);火柴业(第 214 頁);壁紙业(第 214—217 頁);面包业(第 217—222 頁);铁路員工(第 223 頁);女裁縫工人(第 223—225 頁);铁匠(第 226 頁)。日夜換班制的工人: a. 冶金业和金屬加工业(第 227—235 頁)。

这些事实证明,資本把工人只是看作劳动力。只要有可能,他們的全部時間就都成为劳动時間,至于劳动力生命的长短,資本家是不关心的。(第 236—238 頁)难道这不是也違背資本家的利益嗎? 迅速消耗的工人如何来补偿呢? 美国有組織的奴隶貿易,已使奴隶的迅速消耗成为經濟的原則,在欧洲,由农业区等地供給工人,起着同样的作用。(第 239 頁) *Poorhouse-supply* [由貧民习艺所供給劳动力] (第 240 頁)。資本家只看到随时可用的过剩人口,并且加以使用。工人的种族灭絕問題,他是不管的。——*après moi le déluge!* [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 資本是不关心工人的健康和寿命的,除非社会迫使它去关心。在自由竞争中,資本主义生产的內在規律是作为外在的强制規律对各个資本家发生作用的。(第 243 頁)

規定标准工作日,是資本家和工人几世紀来斗争的結果。

起初，制定法律是为了延长劳动時間，現在却是为了縮短劳动時間(第 244 頁)。最初的 Statute of labourers [劳工法](爱德华三世第二十二年即 1349 年制定)以鼠疫减少了人口为借口，要每个人必須更多地工作。因此，法律規定了工資的最高額和工作日的界限。1496 年，在亨利七世統治下，規定了农业劳动者和所有手艺人(artificers)的工作日，在夏季，自 3 月至 9 月，是从早晨 5 时到晚上 7—8 时，其中休息時間为 1 小时、1 1/2 小时和 1/2 小时 = 3 小时。在冬季，是从早晨 5 时到天黑为止。这个劳工法始終沒有严格地实行。在十八世紀，資本还不能支配工人整个星期的劳动(农业工人除外)。見当时的爭論(第 248—251 頁)。直到大工业出現后，資本才做到这点；不但如此，大工业更进而冲破了一切界限，极端无耻地剝削工人。无产階級一旦觉醒，立即反抗。1802—1833 年間的 5 个劳工法只是紙上空文，因为沒有視察員。只有 1833 年的法律，在 4 种紡織业中建立了标准工作日：从早晨 5 点半钟起，到晚上 8 点半钟止。在这个時間內，13 岁到 18 岁的 young persons [少年] 只准劳动 12 小时，其中还要有 1 1/2 小时的休息，9 岁到 13 岁的儿童，只准劳动 8 小时，禁止儿童和少年做夜工。(第 253—255 頁)

Relaissystem [換班制度] 以及为了逃避实行而濫用这种制度(第 256 頁)。最后，1844 年的法律对各种年龄的妇女实行了同少年一样的規定。儿童劳动限制为 6 1/2 小时，換班制度受到限制。但另一方面，却允許 8 岁以上的儿童做工。在 1847 年，終於通过了妇女和少年的十小时工作日法案(第 259 頁)。資本家們力图反对(第 260—268 頁)。1847 年法律的缺点，引起了妥协的 1850 年法律(第 269 頁)。这项法律把妇女和少年的工作日規定为每周有

5 天各为 $10\frac{1}{2}$ 小时,有一天为 $7\frac{1}{2}$ 小时 = 每周 60 小时,并且規定劳动時間在早上 6 点至晚上 6 点之間。此外,1847 年的法律对儿童劳动依然有效。絲业是个例外(第 270 頁)。1853 年,儿童的劳动時間,也限制在早上 6 点到晚上 6 点之間。(第 272 頁)

1845 年的 Printworks-Act [印花厂法],几乎什么都沒有限制,妇女和儿童可以工作 16 小时!

漂白工厂和染色工厂在 1860 年施行了工厂法,花边工厂是在 1861 年,陶器业和許多其他部門是在 1863 年(同年,露天漂白业和面包业施行了特別法)。(第 274 頁)

这样,在大工业中首先有了限制劳动時間的必要,但是后来发现,这种过度劳动也逐漸侵入了其他一切部門。(第 277 頁)

其次,历史表明,特別是在实行妇女和儿童的劳动后,单个的“自由”工人对資本家是无力抵抗的,只有屈服。由此也就展开了工人和資本家之間的階級斗争。(第 278 頁)

法国只是在 1848 年,才在一切劳动部門施行了对一切年齡的工人通用的十二小时工作日法。(見第 253 頁关于 1841 年法国童工法的脚注。这项法律直到 1853 年才实际施行,而且只是在諾尔省施行。)比利时完全的“劳动自由”。美国爭取八小时工作制的运动。(第 279 頁)

这样,工人从生产过程中出来时,已和他进入时完全不同了。劳动契約对他來說并非生产的自由**当事人**的契約。他自由出卖劳动力的時間,乃是他被迫出卖劳动力的時間。工人只有进行**群众性**的反抗,才能爭取到**国家的法律**,以保障自己不再因和資本訂立自願契約,而把自己和自己的后代出卖,淪于死亡和奴隶的境地。工厂法的朴素 Magna Charta [大宪章],代替了关于不可出卖的

人权的华丽条目。(第 280、281 頁)

五、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

已知剩余价值率，同时也就知道剩余价值量。如果一个劳动力每日的价值是 3 先令，剩余价值率 = 100%，則每日的剩余价值量 = 每个工人 3 先令。

一、因为可变资本是一个资本家同时雇用的全部劳动力价值的货币表现，所以他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 = 可变资本乘剩余价值率。这两个因素，都会变动，因此会有各种不同的结合。如果剩余价值率提高，也就是工作日延长，那末，即使可变资本减少，剩余价值量也能增加。(第 282 頁)

二、剩余价值率的这种提高，有它的绝对界限，就是工作日决不能延长到 24 小时，所以，一个工人每日的产品的总价值决不能等于 24 小时劳动的价值。因此，只有在这个界限内，才可以由劳动剥削程度的提高来补偿可变资本，以取得等量的剩余价值。这对于说明从资本的矛盾趋势所产生的各种现象是重要的。这种矛盾的趋势是：(1) 减少可变资本和所雇用的工人数目；(2) 可是仍要生产尽量多的剩余价值量。(第 283、284 頁)

三、在劳动力的价值不变和劳动力所受剥削的程度相同的情况下，不同的资本所生产的价值量和剩余价值量同这些资本的可变部分的量成正比。(第 285 頁)这好像同种种事实是矛盾的。

就一定的社会和一定的工作日来說，要增加剩余价值，只有增加工人的数目，即增加人口；如果工人的数目不变，則只有延长工作日。但是这只适用于绝对剩余价值。

現在可以看出，並不是每一貨幣額都能轉化為資本，必需有一個最低額：即一個勞動力和必要的勞動資料的生產費用。資本家為了自身能夠過工人一樣的生活，在剩餘價值率為 50% 時，他就得要有兩個工人，而且在這種情況下還沒有儲蓄。甚至他有 8 個工人，他也只是一個小業主。因此，中世紀是靠限制每個師傅雇用的幫工數目，來強制地防止手工業師傅變為資本家。成為一個真正資本家所必需的財富最低額，在不同的時期和不同的部門是不同的。（第 288 頁）

資本發展成了對勞動的指揮權，它進行監督，要工人守規矩地緊張地工作。其次，它強制工人超過維持自己生活的需要而從事更多的勞動。在榨取剩餘價值上，它超過了過去任何以直接強制勞動為基礎的生產制度。

資本是在一定的技術條件下支配勞動的，最初它並未改變這些條件。因此，如果把生產過程作為**勞動過程**來看，工人並不把生產資料當做資本，而是把它當做他自己有目的的活動的手段。但是，如果把生產過程作為**價值增殖**過程來看，情形就不同了。生產資料成了吸取他人勞動的手段。於是**不再是工人使用生產資料，而是生產資料使用工人**。（第 289 頁）不是工人把生產資料……消費，而是**生產資料把工人**當作它們自身生活過程的酵母來消費；而資本的生活過程只是資本作為**自行增殖的價值**的運動……單是貨幣轉化為生產資料，就使生產資料轉化為取得**他人勞動和剩餘勞動的合法權**和強制權。

第四章 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一、相对剩余价值的概念

在工作日不变时，要增加剩余劳动，只有减少必要劳动，必要劳动的减少——撇开把工资压低到价值以下不谈——又只有靠降低劳动力的价值，也就是说，靠降低必要生活资料的价格。（第 291—293 页）而要达到这一点，又只有靠提高劳动生产力，靠生产方式本身的变革。

由延长工作日而生产的剩余价值，是绝对剩余价值，由缩短必要劳动时间而生产的剩余价值，是相对剩余价值。（第 295 页）

为使劳动力的价值降低，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必须普及于其产品决定劳动力价值的那些工业部门——生产日常生活资料、它们的代用品和它们的原料等等的部门。证明竞争如何使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表现为商品价格的降低。（第 296—299 页）

商品的价值与劳动生产力成反比，劳动力的价值也是如此，因为它是由商品价值决定的。相反，相对剩余价值与劳动生产力成正比。（第 299 页）

资本家感兴趣的并不是商品的绝对价值，而只是包含在商品中的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的实现也就包含着预付的价值得到补偿。根据第 299 页所说，既然同一个提高生产力的过程，一方面降

低商品的价值,另一方面又增加商品內含的剩余价值,就很明显地可以知道,为什么只关心交换价值的生产的資本家,总是力求降低商品的交换价值。(参看魁奈的話,第 300 頁)

因此,在資本主义生产中,由发展劳动生产力而节省劳动,目的决不是为了縮短工作日。工作日甚至还会延长。所以在麦克庫洛赫、尤尔、西尼耳 *tutti quanti* [之流] 的經濟学家的著作中,在前一頁上讀到,工人应当感謝資本发展了生产力,在下一頁上接着就会讀到,工人为了表示感謝,必須每日工作 15 小时,以代替过去的 10 小时。这种生产力发展的目的,只是为了縮短必要劳动,并延长为資本家的劳动。(第 301 頁)

二、协 作

第 228 頁上說,資本主义生产必須有一个足以同时雇用相当数量工人的个人資本。只有在本人完全不必劳动时,这个雇用劳动的人才成为真正的資本家。許多工人在同一時間、同一工作場所、为了生产同种商品、在同一資本家指揮下活动,在历史上和邏輯上都是資本主义生产的起点。(第 302 頁)

因此,首先,同以前一个雇主雇用少数工人比較起来,只有量的差別。但是,馬上就发生了一种变化。大量的工人本身就能保证雇用劳动的人真正获得平均劳动。而小业主的情形却不是这样,可是他必須支付劳动力的平均价值。在小生产下,这种差異就社会來說是可以抵消的,但就个别小业主來說却不能抵消。因此,价值增殖規律对于个别生产者來說,只有当他作为資本家来从事生产,同时雇用許多工人时,即一开始就运用社会平均劳动时,才会

完全实现。(第 303—304 頁)

其次,生产資料单单由于大規模生产而来的节省,轉移到单位产品上的不变資本部分的减少,这只是来源于許多人在劳动过程中共同使用生产資料。因此,劳动資料在劳动过程取得社会性质之前(到此为止,只是同种过程的并存)就取得了社会性质。(第 305 頁)

在这里,生产資料的节省只是从它使商品便宜,因而使劳动力的价值下降这方面来考察。关于它如何改变剩余价值与全部預付資本($c+v$)的比,要在第三卷中才加以考察²⁰⁸。这样分开来考察,是符合資本主义生产的精神的;因为在資本主义生产中,劳动条件作为独立的东西而与工人相对立,所以劳动条件的节省是一种和工人无关的特殊事情,因此同資本所消費的劳动力的生产率提高的方法沒有联系。

許多人在同一生产过程或相互关联的生产过程中,有計劃地并肩和协同工作,这种劳动形式叫做协作。(第 306 頁)(Concours des forces [力量的結合]——德斯杜特·德·特拉西語)

单个工人的力量的机械总和,与許多人同时共同完成同一不可分割的操作(抬重物等等)时所發揮的机械力,在质上是不同的。协作直接創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实质上是集体力。

其次,在大多数生产劳动中,单是社会接触就会引起竞争,这会提高每个工人的个人生产效率;因此,12个工人在144小时的一个共同工作日中所生产的東西,比12个工人在12个单独工作日中,或一个工人在連續12个工作日中所生产的東西要多。(第 307 頁)

虽然許多人完成同一或同种劳动,但各个工人的个人劳动仍

可代表劳动过程的不同阶段(一队人傳遞东西),在这里,协作又能节省劳动。一座建筑物同时从各方面开始修建,也是一样。結合的工人或整体的工人等于前前后后都有手有眼,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万能的了。(第 308 頁)

在复杂的劳动过程中,协作能把各个过程加以分配,使之同时进行,这样便縮短了生产整个产品的劳动時間。(第 308 頁)

許多生产部門中都有紧急时期,需要許多工人(如收割,捕鯡魚等),这时只有靠协作。(第 309 頁)

一方面,协作能扩大生产場地,因此对那些具有工作場地的巨大空間連續性的工作來說(排水、筑路、修堤等),协作是必要的。另一方面,协作能把工人集中在一个地点,縮小生产場地,从而减少費用。(第 310 頁)

在所有这些形式中,协作是結合的工作日的特殊生产力,是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来源于协作本身。工人有計劃地与他人合作,就打破了他个人的限制,發揮了他种屬的能力。

然而,雇佣工人之所以能够共同工作,只是由于同一个資本家同时雇用他們,支付給他們工資,供給他們劳动資料。因此,协作的規模要看一个資本家有多少資本而定。一个所有主必須有一定数量的資本,才能成为資本家,这个条件,現在成为把許多分散的独立的个人劳动,变成一个結合的社会劳动过程的物质条件。

同样,資本对劳动的指揮,以前只是資本家和工人之間的关系的形式上的結果,現在成了劳动过程本身的**必要条件**;正是資本家代表着劳动过程中的結合。在协作中,对劳动过程的管理,成了**資本的职能**,这种管理作为这种职能取得了特殊的性质。(第 312 頁)

按照資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尽可能使資本自行增殖),这种管

理同时也是尽量剥削社会劳动过程的职能，因此它是由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必然的对抗所决定的。其次，是监督劳动资料的正当使用。最后，各个工人的职能的联系，存在于他们外部，存在于资本中，所以，他们自己的统一，是作为资本家的权威，作为外人的意志而同他们相对立。因此，资本主义的管理是二重的（1. 生产产品的社会劳动过程，2. 资本增殖过程），就其形式来说是专制的。这种专制现在发展了自己的特殊形式：资本家刚刚自己摆脱了劳动，现在又把监督的职能转交给了有组织的整队军官和军士，而这些人本身也是资本的雇佣工人。经济学家曾把奴隶制度下的这种监督费用看作 *faux frais* [非生产费用]。但在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时，他们却把由剥削所决定的管理和由社会劳动过程的性质本身引起的管理职能混为一谈。（第 313、314 页）

工业上的最高权力成了资本的属性，正像在封建时代，战争上和审判上的最高权力是土地所有权的属性一样。（第 314 页）

资本家购买 100 个单个劳动力，他所得到的的是 100 个工人的结合的劳动力。但他并不对 100 个工人的结合的劳动力支付报酬。工人一旦进入了结合的劳动过程，他们就不再属于自己，而已经归并在资本内了。这样，劳动的社会生产力，就表现为资本内在的生产力。（第 315 页）

古代埃及人等等协作的例子。（第 316 页）

在文明初期，狩猎民族、游牧民族或印度公社的原始协作，是建立在下列的基础上：（1）共同占有生产条件，（2）个人自然地同部落和原始公社紧密联结在一起。在古代世界，在中世纪，在近代殖民地，偶然的协作是建立在直接统治和暴力，大多是奴隶制度的基础上。相反，资本主义的协作是以自由的雇佣工人为前提。从

历史上看，它是同农民經濟和独立的手工业生产（不論有沒有行会形式）直接对立的，就这方面說，它是資本主义生产过程固有的并表示其特征的历史形式。这是劳动过程由于从屬於資本而經歷的第一个变化。因此，立即得出：（1）資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劳动过程轉化为社会过程的历史必然性，（2）劳动过程的这个社会形式，也是資本提高劳动生产力来实现更有利的剝削的一种方法。（第 317 頁）

以上考察的簡單形式的协作，是和大規模生产相符合的，但并不是資本主义生产这一特殊时代的固定的特有的形式。这种形式的协作現在仍然存在于那些大規模运用資本而分工和机器还不占重要地位的地方。因此，虽然协作是整个資本主义生产的基本形式，但它的簡單形式本身，或者說它作为特殊形式，仍同它的更发达的形式一起出現。（第 318 頁）

三、分工和工場手工业

工場手工业是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的典型形式。它大約从 1550 年到 1770 年占統治地位。

它是这样发生的：

（1）或者是把各种不同的手工业联合起来，其中每一种手工业做一种局部操作（例如制造馬車），这样，每个单个手工业者很快就失去了从事他的**全部**手工业的能力，而他做的局部操作則完善了；这样，整个过程就变成把全部操作划分为它的各个組成部分。（第 318、319 頁）

（2）或者是把做同一或同种工作的手工业者联合在同一个工

場中，各項操作逐漸地不再由一個工人依次做下去，而是分開來，由不同的工人同時去做（制針等）。產品不再是一個手工業者的產物，而是一組手工業者的產物，每個人只完成一種局部操作。（第 319、320 頁）

在這兩種情況下，工場手工業的結果是：一個以人為器官的生產機構。生產仍然是手工業性質；產品所經過的每一局部過程都是用手工勞動完成的，因而，不可能對生產過程作任何真正科學的分析。正因為勞動的手工業性質，每個單個工人都被完全束縛在一個局部職能上。（第 321 頁）

由於這種情形，同手工業者相比，勞動節省了。再加上技藝世代相傳，勞動就更節省了。因此，工場手工業的分工符合從前社會的如下趨勢：使手工業成為世襲的職業；種姓制度，行會制度。（第 322 頁）

工具因適用於各種局部操作而分細了，北明翰有 500 種錘子。（第 323—324 頁）

從工場手工業的整個機構來考察，它有兩個方面：或者只是把獨立的局部產品機械地結合起來（如制表），或者是把一連串互相關聯的過程聯合在一個作坊內（如制針）。

在工場手工業中，每一組工人供給另一組工人以原料。因此，基本條件是：每一組在一定的時間內生產一定的量；這樣，就形成了和在協作中完全不同的連續性、規則性、劃一性和勞動強度。因此，在這裡，勞動是社會必要勞動這一點，已經成了生產過程的工藝規律。（第 329 頁）

各種操作所需的時間不同，因此也要求不同組的工人具有不同的編制和數目（在鑄字業中：4 個鑄造工人，2 個分切工人，需

要有 1 个磨字工人)。这样,工場手工业就为总体工人的各个器官的数量大小創立了一个数学上固定的比例,只有成倍地雇用整組的新工人,才能扩大生产。此外,要使某些职能——如监督、搬运产品等等——独立起来,只有在生产达到一定水平时方才有利。(第 329、330 頁)

还有一种情形是把各种工場手工业联合为一个統一的工場手工业,可是,其中始終缺乏真正的工艺的統一,这种統一只有在采用机器时才能实现。(第 331 頁)

工場手工业中早就有了机器——間或的——如磨、搗碎机等,但只是当作輔助的东西。工場手工业的主要机器是結合的总体工人,他們比旧时的单个手工业工人完善得多,局部工人往往必然发展起来的一切不完善的東西,都表现为完善的東西(第 333 頁)。工場手工业造成了这些局部工人之間、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之間的差別,甚至造成了工人的真正等級制。(第 334 頁)

分工:(1)是一般的分工(农业、工业、航运业等等);(2)是特殊的分工(种和亚种);(3)是个别的分工(在作坊內)。社会分工也是从不同的起点发展起来的:(1)在家庭和氏族內部,存在着按照性別和年齡的自然分工,加上对邻近部落使用暴力而造成的奴隶,更把这种分工扩大了(第 335 頁);(2)不同的公社因地域、气候、文明程度不同而生产不同的产品,在这些公社相互接触的地方,它們就相互进行交換(第 49 頁)。同别的公社进行交換,由于使自然分工进一步发展,所以是破坏本公社內部自然联系的主要手段之一。(第 336 頁)

因此,一方面,工場手工业的分工是以社会分工的一定程度的发展为前提,另一方面,前者又把后者向前推进。——地域的分工

也是如此(第 337、338 頁)。

不过，社会的分工和工場手工业的分工之間总是存在这样的差别：前者必然生产商品，而后者的局部工人并不生产商品。因此，后者是集中的、有組織的，前者是分散的、具有竞争的混乱的。(第 339、341 頁)

关于早期的印度公社的組織(第 341、342 頁)。关于行会(第 343、344 頁)。在所有这些場合，都存在着社会內部的分工，而工場手工业的分工却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有的創造**。

在工場手工业中也像在协作中一样，发挥职能的劳动体是**資本的存在形式**。因此，各种劳动的結合所发生的生产力表现为**資本的生产力**。协作整个說来沒有改变单个工人的劳动方式，而工場手工业却使它发生了革命，工場手工业使工人**畸形发展**；工人不能生产独立的产品，他只是資本家作坊的**附屬品**。劳动的智力，在許多人那里消逝，而在个別人那里扩大了范围。工場手工业的分工使劳动过程的智力作为别人的财产和統治工人的力量而同工人**相对立**。这个分离的过程从协作开始，在工場手工业中得到发展，在大工业中完成，大工业使科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能力而同劳动分开，并使它为資本服务。(第 346 頁)

引語²⁰⁹。(第 347 頁)

工場手工业一方面是一定的社会劳动組織，另一方面只是**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的一种特殊方法。(第 350 頁)它的历史意义就在于此。

工場手工业的发展甚至在它的典型时期都遇到障碍：受过训练的工人占优势，因此限制了未受过训练的工人数目；男子的反抗，限制了女工和童工的使用；人們始終坚持 laws of apprentice-

ship [学徒法]，甚至在这已成为不必要的地方；工人經常不服从，因为总体工人还没有不依賴工人而独立的骨架；工人迁居国外。（第 353、354 頁）

而且，工場手工业本身不能改革全部社会生产，或者甚至不能包括全部社会生产。工場手工业的狹隘的技术基础，同它自身創造的生产需要相矛盾。机器成为必要的了，工場手工业也已經学会制造机器了。（第 355 頁）

四、机器和大工业

(a) 机器本身

生产方式的变革，在工場手工业中是从劳动力开始，而在这里是从劳动資料开始。

一切发达的机器装置都由三部分組成：(1) 发动机，(2) 傳动装置，(3) 工具机（第 357 頁）。十八世紀的产业革命是从工具机开始的。工具机的特点是：工具或多或少地改变了形式，从人轉到机器上，由机器的作用来推动。至于动力是人还是自然力，暂时是无关紧要的。其特殊的区别在于，人只能使用他自己的器官，而机器在一定限度內可以需要多少工具就使用多少工具（紡車是 1 个錠子；珍妮机^① 是 12—18 个錠子）。在紡車上，产业革命涉及的不是踏板、动力，而是錠子，——最初，人到处还同时执行动力和看管者的职能。相反地，工具机的革命，才产生出改善蒸汽机的要求，而且后来也实现了这个要求。（第 359—360 頁以及第 361—362 頁）

① 一种紡机。——編者注

大工业中的机器有两类：或者是，（1）同种机器的协作（机器織机，信封制造机，这种机器把各种工具结合起来，完成一系列局部工人的工作），在这种场合，已经由于传动装置和动力而有了工艺上的统一；或者是，（2）机器体系，即各种局部工作机的结合（紡紗）。工場手工业中的分工是机器体系的自然基础。但是这里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在工場手工业中，每一个局部过程必需适应工人；而在大工业中，已经沒有这种必要了：劳动过程能够客观地分解为各个组成部分，如何完成每一局部过程是由科学或是由基于科学的实际經驗借助机器来解决的。在这里，各組工人之間的数量上的比例是作为各組机器之間的比例而重現出来。（第 363—366 頁）

在这两种场合，工厂构成了一个大自动机（而且只是到了最近，才完善到这个阶段），而这就是它的适当的形式（第 367 頁）。它的最完善的形式就是能制造机器的自动机，这种自动机消灭了大工业的手工业和工場手工业基础，从而使机器生产第一次具备了完善的形式。（第 369、372 頁）

各个部門的变革直到交通工具的变革之間的联系。（第 371 頁）

在工場手工业中，工人的结合是主观的，而在这里，却有一个客观的机械的生产机体，它現成地出现在工人面前，它只有在共同的工人的手里才发生作用。劳动过程的协作性质，现在已成为工艺上的必要了。（第 372 頁）

由协作和分工产生的生产力，不費資本分文；自然力，如蒸汽、水，也不費資本分文。科学所发现的力，也是这样。但是，这种力只有借助花費許多錢制造的相应机械，才能加以利用。同样，工作

机要比从前的工具昂貴得多。但是，这种机器的寿命比工具长得多，机器的生产范围比工具大得多，因此相应地轉移到产品中去的价值比工具小得多。因此，机器的**无偿服务**（这种服务并不再現在产品的价值中）要比工具大得多。（第 374、375—376 頁）

大工业由于生产集中而使产品便宜的程度，大大超过了工場手工业。（第 375 頁）

成品的价格表明，机器使产品便宜了許多。由劳动資料轉移过来的价值部分，相对地說是增大了，絕對地說是减少了。机器的生产率，是以它代替人类劳动力的程度来衡量的。例证（第 377—379 頁）。

假設一个蒸汽犁代替了 150 个工人，这些工人一年的工資是 3 000 鎊。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全年工資数并不代表他們所做的全部劳动，而只代表必要劳动；可是，除此而外，他們还做了剩余劳动。如果蒸汽犁值 3 000 鎊，这就是蒸汽犁所包含的全部劳动的貨幣表現。可見，即使机器的价錢和它所代替的劳动力的价錢一样多，物化在机器內的人类劳动总要比它所代替的劳动少得多。（第 380 頁）

机器作为使产品便宜的手段，它所費的劳动必須少于它所代替的劳动。但是对于資本來說，它的价值必須少于它所代替的劳动力的价值。因此，在英国无利可图的机器，也許在美国有利可图（如碎石机）。而由于某些法律限制的結果，那些原来对資本无利的机器，也会突然被起用。（第 380—381 頁）

（b）借助机器占有劳动力

因为机器本身包含了推动自己的力量，所以肌肉力的价值跌

落了。女工和童工，雇佣工人的数目由于吸收以前不从事雇佣劳动的家庭成员而迅速增加。这样，男劳动力的价值就分到全家劳动力上了，也就是说，它贬值了。要维持一家人的生活，现在必须全家4口人不仅为资本提供劳动，而且要提供剩余劳动，而从前只需要1个人这样做。可见，在扩大剥削材料的同时，也增加了剥削的程度。（第383页）

在以前，劳动力的买卖是自由人之间的关系；现在则是购买儿童和少年；工人现在是出卖妻子儿女，他成了奴隶贩卖者。（例证见第384—385页）

身体摧残。工人儿童的死亡率（第386页）。在农业的工业经营中也是这样（Gang system〔队工制〕）（第387页）。

精神摧残（第388页）。工厂法中关于教育的条文以及工厂主的反抗（第390页）。

妇女和儿童进入工厂，终于破坏了男工对资本专制的反抗（第391页）。

机器缩短生产一种物品的必要劳动时间，但在资本手中，它却成了把工作日延长到远远超过它的标准限度的最有力的手段。机器一方面创造了使资本能够这样做的新条件，另一方面又创造了这样做的新动机。

机器能够不断地运动，它只受协助它的人类劳动力的虚弱和局限性的限制。一架每日工作20小时、在7½年内磨损的机器，可以和另一架每日工作10小时、在15年内磨损的机器一样，替资本家取得同量的剩余劳动，不过前者只需要后者一半的时间。（第393页）

在这种情况下，机器无形损耗——by superseding〔由以新换

旧造成}——的危險更少。(第 394 頁)

而且,不必增加建筑物和机器上的投資,就可以吸收更大量的劳动。因此,延长工作日,不仅能增加剩余价值,还能相对地减少获得这项剩余价值所需要的投資。在大工业中,固定資本部分愈占优势,这个办法也就愈加重要。(第 395 頁)

在采用机器的初期,当机器具有壟断性时,利潤頗大,因此渴望更多地、无限制地延长工作日。在机器普遍采用后,这项壟断利潤就不存在了。而下面这个規律就生效了:剩余价值不是产生于为机器所代替的劳动,而是产生于它所使用的劳动,也就是产生于可变資本。但在机器生产的場合下,可变資本必然会因投資龐大而减少。因此,机器的資本主义使用,存在着內在的矛盾:在資本量不变时,机器是靠减少剩余价值的一个因素来增加剩余价值的另一因素,即靠减少工人的数目来增加剩余价值率。每当机器生产的商品的价值成为这类商品的起决定作用的社会价值时,这个矛盾就表現出来,并重新推动人們去延长工作日。(第 397 頁)

同时,机器由于使被排挤的工人遭到失业,并由于吸收妇女和儿童,就造成了过剩的劳动人口,使他們被迫听命于資本所定下的法律。因此,它打破了工作日的一切道德界限和自然界限。由此就产生了一种反常的現象:縮短劳动時間的最有力的手段,竟成为把工人及其家庭的全部生活時間变成可以增殖資本价值的劳动時間的最可靠的手段。(第 398 頁)

我們已經看到,社会的反应怎样表現为要求确立标准的工作日;而現在,在这个基础上又发展起来了劳动的强化。(第 399 頁)

在开始时,随着机器运轉的加快,劳动强度的增加是和劳动時間的延长同时并进的。但不久,就达到二者相互排斥的地步。在

限制工作日时，情况就不同了。现在可以增加强度了；在 10 小时内所做的劳动量，可以等于过去在 12 小时或更多的时间所做的劳动量，现在强度高的工作日是作为**倍加**的工作日来计算的。劳动不单以时间长短来计量，还以它的强度来计量（第 400 页）。这样，5 小时必要劳动和 5 小时剩余劳动所取得的剩余价值，也可以和强度较低的 6 小时必要劳动和 6 小时剩余劳动所取得的一样多。（第 400 页）

劳动是怎样强化的呢？在**工場手工业**中已经证明（见注 159），例如在陶器业等等中，只是**缩短工作日**，就大大提高了生产率。在**机器劳动**中，这就大可怀疑了。但可参阅罗·加德纳的例证（第 401—402 页）。

一旦缩短工作日成了法律，机器就成了从工人身上榨取强度更高的劳动的手段，其方法或者是加快速度，或者是与机器相对而言减少人手。例证（第 403—407 页）。与此同时，工厂日益致富和扩大。证明（第 407—409 页）。

(c) 工厂整体的典型形态

在工厂中，**机器**保证工具合乎目的的使用；因此**工場手工业**中发展起来的劳动的质的差别，在这里消失了。劳动愈来愈拉平，工人之间至多只有年龄和性别的差别。分工在这里就是把**工人分配在各种专门机器上**。这里只划分为真正在工具机旁操作的主要工人和 feeders [助手]（这适用于走锭精纺机，不太适用于翼锭精纺机，更不适用于改良机器织机），此外，还有监工、工程师、司炉、机械师、细木工等等，这些只是表面上算在工厂内的阶层。（第 411—412 页）

工人必須适应自动机的連續的运动，这就要求工人从小受訓練。但是，这并不需要像在工場手工业中那样，使工人一生束縛在某一局部职能上。同一架机器上可以更換人員(換班制)。由于学习起来容易，工人可以从一种机器調到另一种机器上去。助手的工作，或者是很簡單，或者是愈来愈由机器担任。可是，工場手工业的分工最初由于傳統关系繼續存在着，后来它就成了資本的更大的剝削手段。工人終生变成局部机器的一部分。(第 413 頁)

一切資本主义生产不仅是劳动过程，而且是資本的增殖过程，因此都有这样的共同点：不是工人使用劳动条件，相反，是劳动条件使用工人；只有在机器生产下，这种顛倒关系才有了工艺上明显的现实性。劳动資料由于变为自动机，所以在劳动过程中是作为資本，作为支配活劳动力和吸取活劳动力的死劳动而同工人相对立。同样，生产过程的智力成了資本支配劳动的权力……变得空虚了的个别机器工人的局部技巧，在机器体系所体现的科学、龐大的自然力和社会群众性劳动面前，作为微不足道的附屬品而消失了。(第 414—415 頁)

工厂中兵营般的紀律，工厂法典(第 416 頁)。

工厂的物质条件(第 417—418 頁)。

(c')或(d)工人反对工厂制度及机器的斗争

这个斗争从資本主义关系建立时起，就已开始，在这里最初是反抗机器这种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物质基础的暴动。織带机(第 419 頁)。魯德分子²¹⁰(第 420 頁)。直到后来，工人才把物质生产資料和使用物质生产資料的社会形式区别开来。

在工場手工业中，改善了的分工不过是潜在地代替工人的一

种手段(第 421 頁)。(順便談到农业方面。排挤。第 422 頁)。而在机器生产中,工人是**实际地被排挤**,机器直接和工人竞争。手工織工(第 423 頁)。印度的情形也是一样(第 424 頁)。这种作用是长期的,因为机器不断地侵入新的生产領域。随着机器的出現,资本主义生产造成的劳动資料同工人的脱离和独立,发展成为完全的对立。因此,工人現在首先起来反抗劳动工具。(第 424 頁)

机器排挤工人的詳細情形(第 425、426 頁)。机器排挤工人,成为破坏工人反抗資本的工具(第 427、428 頁)。

自由主义的經濟学认为,机器排挤工人的同时,会騰出資本来,再去雇用这些工人。但事实正相反:每次采用机器,都**束縛資本**,减少資本的可变部分,增加資本的不变部分。因此,它只会限制資本雇用工人的能力。事实上——上述的辯护論者也是这样认为——并不是这样騰出資本,而是騰出被排挤的工人的生活資料,这里是工人騰出生活資料,可是辯护論者却說成:**机器为工人騰出生活資料**。(第 429—430 頁)

关于这一点的进一步發揮(这对“双周評論”是很好的^①) (第 431—432 頁)。同机器的资本主义使用不可分离的那种对抗,对于辯护論者來說是不存在的,因为这种对抗不是来自机器本身,而是来自机器的资本主义使用。(第 432 頁)

机器直接和間接地扩大生产,从而有可能增加工人的数目:矿工、植棉各州的奴隶等等。另一方面,建立毛紡織厂的結果,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农民被羊排挤了。(第 433、434 頁)

机器生产比工場手工业大大地加强了社会分工(第 435 頁)。

① 見本卷第 326—350 頁。——編者注

(c'')或(e)機器和剩餘價值

采用機器的第一個結果是，增加了剩餘價值，同時也增加了體現剩餘價值並為資本家階級及其僕從們消費的產品，因而也就增加了資本家的數目；新的奢侈欲望和滿足這些欲望的手段。奢侈品的生產增長起來。交通工具也發展起來（但在發達的國家中，它只吸收很少的勞動力；例證見第 436 頁）。最後，僕役階級，即現代家庭奴隸，也增加起來。現代家庭奴隸材料是靠機器騰出工人來供給的（第 437 頁）。統計表。

經濟矛盾（第 437 頁）。

在一個生產部門中，由於采用機器而使勞動絕對增加的可能性，以及這個過程的形式（第 439—440 頁）。

大工業有巨大的彈性，它能突然地跳躍式地擴展到高度發展階段（第 441 頁）。對生產原料的國家的影響。由於工人被排擠而造成的移民。工業國和農業國之間的國際分工。危機和繁榮的周期性（第 442 頁）。在這個擴展的過程中，工人的被排斥和被吸引（第 444 頁）。

關於這點的歷史資料（第 445—449 頁）。

同樣，關於機器排擠協作和工場手工業（和各中間階段，第 450—451 頁）。關於未采用工廠經營方式但具有大工業精神的工業部門的變更。家內勞動成為工廠的廠外分支（第 452 頁）。在家內勞動和現代工場手工業中，剝削的情形比在真正的工廠中更加無恥（第 453 頁）。例證。倫敦的印刷廠（第 453 頁），裝訂業，揀選襪布業（第 454 頁），燒磚業（第 455 頁），一般現代工場手工業（第 456 頁）。家內勞動：花邊編織業（第 457—459 頁），草辦業（第 460

頁)。剝削达到极限后，即轉变为工厂經營：采用縫紉机制造穿着物（第 462—466 頁）。这个轉变的加速，是由于推行强制的工厂法，廢止了以无限制的剝削为基础的旧制度（第 466 頁）。例证：陶器业（第 467 頁），火柴业（第 468 頁）。其次，工厂法对于因工人被迫閑散和季节时尚关系而造成的不規則工作的影响（第 470 頁）。在家內劳动和工場手工业中，由于季节关系造成的过度劳动和无事可做并存的情形（第 471 頁）。

工厂法的卫生条款（第 473 頁）。教育条款（第 476 頁）。

工人被解雇，仅仅因为达到一定年齡，不再适合原来的工作，不能再靠童工的工資生活，同时又沒有学习新行业（第 477 頁）。

大工业消灭了工場手工业和手工业的 *mysteries* [秘密] 和傳統的凝固性，它把生产过程变为对自然力的有意識的应用。因此，和以前的一切形式相比，只有大工业是革命的（第 479 頁）。但是，它作为資本主义的形式，仍然使工人保持凝固了的分工。而由于它每天变革着分工的基础，所以使工人陷于毀灭的境地。另一方面，正是由于同一个工人有改变活动的必要，就要求工人必須尽可能多方面发展，并且有了社会革命的可能。（第 480、481 頁）

把工厂立法推行于一切非工厂方式經營的部門的必要（第 482 頁及以下各頁）。1867 年的法律（第 485 頁）。矿业（注釋，第 486 頁及以下各頁）。

工厂法的集中影响，工厂經營的普遍化，資本主义生产的典型形态的普遍化，資本主义生产的固有矛盾的尖銳化，推翻旧社会的因素和建立新社会的因素成熟起来。（第 488—493 頁）

农业。在这里机器排挤工人的情形更为剧烈。雇佣工人代替农民。农村家庭制造业的消灭。城乡对立的尖銳化。农村工人分

散和軟弱，而城市工人集中，因此，农业工人的工資降到最低限度。同时掠夺土地——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高峰，破坏一切財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第 493—496 頁）。^①

^① 在手稿上，还有下一章的标题：“第五章。剩余价值生产的进一步研究”。手稿随后中断。——編者注

弗·恩格斯
卡·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書評
——為“雙周評論”作²¹¹

卡尔·馬克思“資本論”^①

托馬斯·图克先生在研究流通手段时，指出这一事实：貨幣作為資本發揮职能时要流回它的起点，但是貨幣只是作為流通手段發揮职能时就不是这样²¹²。这种区别（其实，这一点早就由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肯定了），只是被图克先生当做一个論据，用来反对«currency»〔“通貨”〕論者关于紙币发行額影响商品价格的論断²¹³。反之，我們的作者把这一区别当做研究資本本身的性质，特别是研究下述問題的出发点：貨幣，这种价值存在的独立形式，怎样轉化为資本？

杜尔哥說，所有的商人都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为卖而买**，他們的买只是一种垫款，这笔款以后又回到他們手中²¹⁴。

为卖而买实际上是这样一种交易，在这种交易中，貨幣作為資本發揮职能，并且必須回到它原来的起点；**为买而卖**則不同，在这种过程中貨幣只能作為流通手段發揮职能。因此，我們看到，卖和买相接續的不同次序，賦予貨幣两种不同的流通形式。为了說明

① Das Kapital. Von Karl Marx. Erster Band. Hamburg, Meissner, 1867.

這兩種過程，我們的作者提出下面的公式：

為買而賣：商品 W 換成貨幣 G ，貨幣 G 再換成另外一種商品 W ，即 $W-G-W$ 。

為賣而買：貨幣換成商品，商品再換成貨幣，即 $G-W-G$ 。

$W-G-W$ 的公式代表簡單的商品流通，在這裡，貨幣作為流通手段、作為 currency 發揮職能。這一公式在原書第一章²¹⁵ 中得到了分析，這一章還提出了一種新穎而又十分明白的價值和貨幣理論，這從科學上說是很有意義的。但在這裡我們不談它，因為整個說來，它和我們所認為的馬克思先生關於資本的見解的基本點關係不大。

另一方面， $G-W-G$ 的公式則代表這樣一種流通形式，在這裡，貨幣本身已轉化為資本。

為賣而買的過程 $G-W-G$ ，顯然可以簡化為 $G-G$ ；這是貨幣間接地交換貨幣。假定我以 1 000 鎊購買棉花，以 1 100 鎊賣出；結局我是以 1 000 鎊換 1 100 鎊，是貨幣換貨幣。

如果這種過程完結時，回到我手中的貨幣額總是和我預付的貨幣額相等，這顯然是荒唐的。但是預付了 1 000 鎊的商人，不管換得 1 100 鎊，1 000 鎊，甚至只換得 900 鎊，他的貨幣經過了一個運動，這個運動同 $W-G-W$ 公式所代表的運動有本質的不同；後者表示為買而賣，賣出你所不需要的，以便能夠買進你所需要的。現在來比較一下這兩個公式。

每一過程都由兩個階段或行為構成，並且這兩種行為在這兩個公式中是完全相同的；但是在這兩種過程本身之間卻有着很大的差別。在 $W-G-W$ 中，貨幣只是中介；商品，使用價值，構成起點和終點。在 $G-W-G$ 中，商品是中間環節，而貨幣構成起點和

終点。在 $W-G-W$ 中，貨幣是永远花掉了；在 $G-W-G$ 中，貨幣只是預付，目的是要把它收回来；它要回到它的起点，而这正是貨幣作为貨幣的流通同貨幣作为資本的流通之間的第一个明显的区别。

在为买而卖的过程 $W-G-W$ 中，貨幣只有借助全部过程的重复，借助售卖新的商品，才能回到它的起点。因此，貨幣的流回同过程本身无关。但是在 $G-W-G$ 的过程中，这种流回是一件必然的事情，是在开始时就預計到的；如果没有流回，那一定是在某个地方遇到了障碍，而过程就没有完成。

为买而卖，其目的是为了取得**使用价值**；为卖而买，其目的是为了取得**交换价值**。

在公式 $W-G-W$ 中，按經濟学的說法，两端是相同的。它們两者都是商品；而且，它們具有等量的价值。因为全部价值学說的前提是：通常只有等价物才能相交换。同时， $W-W$ 这两端是两种在质上不同的使用价值，正因为如此，它們才互相交换。在 $G-W-G$ 的过程中，乍看起来整个行动是毫无意义的。用 100 鎊交换 100 鎊，而且还要兜一个圈子，这好像是荒謬的。一个貨幣額和另一个貨幣額只能在量上不同。因此， $G-W-G$ 只有当它的两端具有量的差别时才有意义。从流通中取出的貨幣，必須多于先前投入的貨幣。用 1 000 鎊购买棉花，卖 1 100 鎊 = 1 000 鎊 + 100 鎊；表现这一过程的公式，这样一来就变成 $G-W-G'$ 了。在这里， $G' = G + \Delta G$ ，即 G 加上一个增殖額。这个 ΔG ，这个增殖額，馬克思称之为**剩余价值**①。原来預付的价值不仅保存下来，而且

① 本文中凡是提到“价值”而不加定語时，都是指交换价值。

在自身上合併一個增殖額，它增殖了，而正是這個過程使貨幣轉化為資本。

在 $W-G-W$ 這一流通公式中，兩端當然也可能在價值上發生差異，不過這種情形在這裡是毫無意義的；即使兩端是等價物，公式也不會失去意義。相反，這倒是這一公式的正常性質的條件。

$W-G-W$ 能否反復進行，要受交換過程本身以外的情況限制，即受消費需要的限制。但是在 $G-W-G$ 中，起點和終點在質上是相同的，正是由於這一事實，這一運動才是或者才可以是永不停息的。 $G + \Delta G$ 在量上不同於 G ，這是沒有疑問的；可是它畢竟是一個有限的貨幣額。如果把它花掉，它就不再成為資本；如果把它從流通中取出，它就固定為儲藏貨幣。既然所需要的是價值增殖，那末 G' 同 G 一樣，都需要增殖。資本的運動變成永不停息、永無止境的了，因為每一次過程的結局同開始時一樣，並沒有達到目的。貨幣所有者由於執行這種永無止境的過程，就變成資本家。

最初一看， $G-W-G$ 公式似乎只適用於商業資本。可是產業資本也是以貨幣換商品，然後再換更多的貨幣。當然，這裡在買賣之間插入一些在流通領域之外進行的行動；但是它們絲毫不會改變這一過程的性質。另一方面，我們看到，在借貸資本中，這同一個過程變得最簡短了。在這裡，公式縮減成 $G-G'$ ，可以說是比它自身更大的價值。

G 的這一增殖額，這種剩餘價值，是從哪裡來的呢？我們在前面對於商品、價值、貨幣和流通本身的性質的研究，不僅沒有說明這種來源，甚至看來排除了任何產生剩餘價值之類東西的流通形

式。商品流通(W—G—W)和作为资本的货币的流通(G—W—G)之间的全部差别,好像只在于过程的次序的颠倒;但这种次序的不同怎么竟产生这样一种奇怪的结果呢?

此外,只有对参加这一过程的三者中的一方,次序才是颠倒了。我作为资本家,从A手里购买商品,然后把商品卖给B。A和B是作为商品的单纯的买者和卖者而出现的。我在从A的手里购买商品时,只是作为货币所有者,在卖给B时,只是作为商品所有者;但是,不管在哪一次交易中,我都不是作为资本家、都不是作为货币或商品以外的什么东西的代表。在A看来交易是以卖开始,在B看来是以买开始。从我的角度来看,W—G—W公式的次序在这里是颠倒过来了,但从他们的角度看,并不是这样。而且,没有任何东西会妨碍A不经我的手把商品卖给B,但如果真的不经我的手,那任何剩余价值都无从取得了。

假定,A和B彼此直接从对方手里购买他们所必需的东西。就使用价值来说,双方都可以得到好处。A生产他那种特定的商品可能比B在同一时间内生产得多些,以及vice versa〔相反的情况〕;在这种情形下,他们双方都可以得到好处。但是就交换价值来说,情形就不同了。在后一场合,不管有没有货币作为媒介,相交换的都是等量的价值。

抽象地考察起来,就是说,把一切不是从简单商品流通的内在规律中产生的情况撇开不谈,那末,在这种简单的流通中,除了一种使用价值被另一种使用价值代替而外,发生的只是商品的形式变换。商品所有者手中所有的,始终是同一的交换价值,是物化的等量社会劳动,而不管它采取的是商品形式,或者是出卖这一商品而取得的货币形式,或者是用这一货币所购得的另一种商品的形式

式。這種形式變換，不會在價值量上引起變化，正像用一張 5 鎊的鈔票去換 5 個索維林一樣。既然這裡發生的只是交換價值的形式變換，那就必須是等價物的交換，至少在這一過程純粹地、正常地進行的情況下，應當是這樣。商品也可能按高於或低於其價值的價格賣出，但如果是這樣，就違背了商品交換的規律。因此，純粹的和正常的情況下的商品交換，不是創造剩餘價值的手段。因此，所有企圖從商品交換中得出剩餘價值的經濟學家，便都犯了錯誤。孔狄亞克就是一個例子。

但是我們假定，這個過程不是在正常條件下進行的，相交換的不是等價物。例如，每個賣者出賣自己的商品都高於其價值 10%。Caeteris paribus [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他們每個人作為賣者賺得的东西，現在作為買者又失掉了。這就像貨幣的價值跌落了 10% 一樣。如果一切買者購買商品都低於其價值 10%，情形則剛好相反，可是結果仍然一樣。我們假定每個商品所有者作為生產者按高於商品價值的價格出賣商品，作為消費者按高於商品價值的價格購買商品，這絲毫無助於問題的解決。

有一種錯覺，認為剩餘價值是來源於商品名義上的加價。一貫堅持這種錯覺的人，總是假定存在着一個只買不賣，只消費不生產的階級。在我們研究的現階段上，還不知道有這樣一個階級。就假定有這樣一個階級吧。這個階級從哪里獲得它用以購買的貨幣呢？顯然是從商品生產者那里——不管是合法地還是使用暴力，反正不是通過交換。把商品高於其價值賣給這樣一個階級，不過等於收回一部分曾白白交出的貨幣罷了。例如，小亞細亞諸城市向羅馬人繳納貢款，然後用在貿易中欺騙羅馬人的辦法撈回一部分；但是最終還是這些城市吃虧。可見，這不是創造剩餘價值的

办法。

我們再假定发生欺騙行为。A 把价值 40 鎊的酒卖给 B, 换得价值 50 鎊的谷物。A 赚了 10 鎊, B 損失了 10 鎊, 可是两者加在一起仍是 90 鎊。价值轉移了, 但是并没有被創造出来。一国的整个資本家阶级, 不能靠互相欺騙来增加他們的总財富。

所以, 是等价物交换, 不会产生剩余价值, 不是等价物交换, 也不会产生剩余价值。商品流通不創造新价值。因此, 我們在这里不考察两个最古老的最常见的資本形式, 即商业資本和生息資本。要說明这两种資本形式攫取的剩余价值不是单纯欺騙的结果, 就要列举一系列中間环节, 但这些环节在我們研究的現阶段上是不存在的。以后我們会看到, 它們两者不过是派生的形式, 并且会弄明白, 为什么它們出现在历史上比現代資本早得多。

可見, 剩余价值不能从商品流通中产生。但是, 它能不能在流通之外产生呢? 在流通之外, 商品所有者只是商品生产者, 他的商品的价值是由包含在商品中的并按一定社会規律衡量的他自己的劳动的量决定的。这个价值表现为計算货币, 例如表现为价格 10 鎊, 但这 10 鎊的价格, 不能同时又是 11 鎊的价格; 包含在商品中的劳动創造价值, 但没有創造增殖新价值的价值; 劳动可以给現有价值添加新价值, 但这只能通过追加新劳动的办法。既然如此, 商品所有者在流通領域之外, 不同其他商品所有者接触, 怎能产生出剩余价值呢? 換句話說, 怎能把商品或货币变成資本呢?

“总之, 資本既不能从流通中产生, 又不能不从流通中产生。它必須既在流通中产生, 又不在流通中产生。货币轉化为資本应当根据商品交换的內在規律来說明, 所以, 等价物交换应当是出

發點。我們這位還只是資本家幼蟲的貨幣所有者，必須按商品的价值购买商品，按商品的价值出卖商品，但他在这个過程終了時畢竟取得比他投入的价值更大的价值。他從幼蟲變成蝴蝶，必須既在流通領域內，又不在流通領域內。這就是問題的條件。Hic Rhodus, hic salta! [這裡是羅陀斯，就在這裡跳吧！]”〔第174—175頁〕^①

現在看一下問題是怎樣解決的。

“要轉化為資本的貨幣，其价值變化不可能發生在這個貨幣本身，因為貨幣作為購買手段和支付手段，只是實現它所購買的或所支付的商品的價格，而它如果凝固在本來的形式上，那就變成不變的价值的化石。同樣，這種變化也不能來自流通的第二個行為，即商品的轉賣，因為這一行為只是把商品的自然形式再轉化為貨幣形式。所以，這種變化必定發生在第一個行為G—W所購買的商品上，但不是發生在這個商品的价值上，因為相交換的是等價物，商品是按照它的价值支付的。可見，這種變化只能來自商品的使用价值本身，即來自商品的使用。但要想從商品的使用中取得价值，我們的貨幣所有者就得在流通領域內，也就是說，在市場上，幸運地發現這樣一種商品，它的使用价值本身具有一種成為交換价值泉源的独特屬性，它的實際使用本身就是勞動的物化，從而就是价值的創造。貨幣所有者在市場上找到了這種特殊商品，這就是勞動能力即勞動力。

所謂勞動力或勞動能力，就是體力和腦力的總和，它存在於人的機體即活生生的人身中，每當人生產某種使用价值時就運用它。

^① 本文中六角括號內的頁碼是“資本論”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的頁碼。譯文有改動。——譯者注

但是,要使货币所有者在市場上找到作为商品的劳动力,必须具备种种条件。商品交换本身除了它自身性质所产生的依附关系以外,不包含任何其他依附关系。在这个前提下,劳动力只有被它的所有者即有劳动力的人自己拿来求售或出卖时,而且只有在这个限度內,才能当做商品出现在市場上。而劳动力所有者要把劳动力当做商品出卖,就必须有可能支配它,必须是自己的劳动能力、自己的人身的自由所有者。他和货币所有者在市場上相遇,彼此作为平等的商品所有者发生关系,所不同的,只在于一个是买者,一个是卖者……要使这种关系保持下去,劳动力所有者就必须总是把劳动力只出卖一定时期,因为他要是把劳动力一次卖完,他同时也就出卖了自己,就从自由人变成奴隶,从商品所有者变成商品……货币所有者要在市場上找到劳动力这种商品的第二个基本条件,就是劳动力的所有者沒有可能出卖物化着他本人劳动的商品,相反,他不得不把那种只存在于他的活的机体中的劳动力本身当做商品出卖。

一个人要想出卖不同于他的劳动力的商品,当然必须占有生产资料,如原料、劳动工具等等。沒有皮子,他就不能做皮鞋。此外,他还要有生活资料。任何人也不能靠未来的产品过活,不能靠尚未生产出来的使用价值过活;而且人类自从出现在地球上的第一天起,每一天,不管是在生产以前和在生产期間,都要消費。产品如果当做商品生产,生产出来以后就必须卖出去,而且只有卖了以后,生产者的需要才能得到滿足。生产時間还要加上出售所需要的时间。

可見,货币所有者要把货币轉化为資本,必须在商品市場上找到自由的工人。这里所謂的自由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作为自由

人，這個工人能夠把自己的勞動力當做自己的商品來處理；另一方面，他根本沒有別的商品可以出賣，他自由得一無所有，沒有實現他的勞動力所必需的任何東西。

為什麼這個自由工人在流通領域中同貨幣所有者相對立，這個問題貨幣所有者不感興趣，他認為勞動市場就是商品市場的一個特殊部分。同樣我們對這個問題目前也不感興趣。正像貨幣所有者在實踐上把握着這個事實一樣，我們是在理論上把握着這個事實。但是，有一點很清楚。自然界不會造成一方面是貨幣或商品的所有者，另一方面是只有勞動力的人。這種關係既不是自然史的關係，也不是一切歷史時代所共有的社會關係。它顯然是以往歷史發展的結果，是許多次經濟變革的產物，是社會生產的一系列陳舊形態滅亡的產物。

我們在前面所考察的經濟範疇，也都帶有各自歷史的痕跡。產品以商品的形式存在，要以一定的歷史條件為前提。要成為商品，產品必須不是當做生產者自己的直接生活資料來生產。如果我們進一步研究下去，看看在什麼樣的條件下全部產品或至少大部分產品採取商品形式，我們就會發現，這種情況只有在極特殊的生產方式即**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礎上才會發生。但是這種研究超出了商品分析的範圍。即使絕大部分產品直接用來滿足生產者自己的需要，沒有變成商品，從而社會的生產過程還遠沒有全部受交換價值的控制，即使是在這樣的時候，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仍然是可能發生的…… 如果我們觀察一下貨幣，就會發現，它是**以商品交換的一定發展水平為前提**。貨幣的各種特殊的**形式**，如單純的商品等價物、流通手段、支付手段、貯藏貨幣或世界貨幣，依照它們這種或那種**職能**應用的範圍以及**相對占優勢**的情況，表示着社

会生产过程的各个极不相同的阶段。但是經驗表明，在商品流通不很发达的情况下，这各种形式也足以形成。資本則不然。对于資本存在的历史条件來說，单有商品流通和貨幣流通是根本不够的。只有在生产資料和生活資料的所有者能在市場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資本才会产生，而单是这一历史条件就包含一整部世界史。因此，資本一产生就在社会生产过程中开辟一个特殊的时代。”〔第 176—180 頁〕

現在我們来考察一下这个特殊商品——劳动力。像所有其他商品一样，劳动力也有交换价值；这种价值也和所有其他商品的价值一样，是由生产和再生产这个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時間决定的。劳动力的价值，就是維持劳动力所有者的正常工作能力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价值。这些生活資料由气候、其他自然条件以及各国历史地形成的生活水平調节着。它們是变动的，但是在一定的国家，在一定的时期，是一定的。此外，它們要包括衰頹工人的替身即工人子女的生活資料，只有这样，这种特殊商品所有者才能延續下去。最后，它們还要包括培养熟练劳动的教育費。

劳动力价值的最低限度，是生理上不可缺少的生活資料的价值。如果劳动力的价格跌到这个最低限度，那就跌到它的价值以下了，因为后者是按正常质量的劳动力来計算，而不是按低劣质量的劳动力来計算的。

劳动的性质表明，劳动力只有在它出卖以后才被使用，而在資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統治的一切国家里，劳动只是在它实现以后才被支付。因此，在任何地方，工人都是借貸給資本家。馬克思先生从議會文件中摘引了这方面的一些有趣例子；不过这些例子还是让讀者到原书中去讀好了。

勞動力的購買者消費勞動力時，同時生產出商品和剩餘價值，為了考察這一過程，我們必須離開流通領域而進入生產領域。

在這裡，我們首先發現勞動過程具有兩重性。一方面，它單純是使用價值的生產過程；作為這樣一種過程，它在社會存在的一切歷史形式下都會存在而且必須存在。另一方面，像前面所說的，它是在資本主義生產的特殊的條件下進行的。這一點是我們現在要考察的。

在資本主義的基礎上，勞動過程有兩個特點。首先，工人是在資本家的監督下做工，資本家這樣做是為了不致發生任何浪費，為了在每一個別產品上所消耗的勞動都不超過社會必要的勞動量。其次，產品歸資本家所有，因為勞動過程是在勞動力和勞動資料這兩種都歸資本家所有的東西之間進行的。

資本家只是在使用價值是交換價值特別是剩餘價值的體現的限度內，才關心使用價值。他的目的是要生產這樣的商品，這種商品的价值大於生產該商品所投入的價值的總和。但是怎樣才能做到這一點呢？

我們拿一種商品例如棉紗來看，並考察一下其中包含的勞動量。假定生產 10 磅棉紗需要價值 10 先令的 10 磅棉花（損耗不計在內）。此外，還需要一定的勞動資料：蒸汽機、梳棉機和其他機器、煤、潤滑油等等。為了簡便起見，我們用“紗錠”來代表這一切並且假定生產 10 磅棉紗所必需的機器磨損和煤炭等為 2 先令。這樣，棉花 10 先令 + 紗錠 2 先令 = 12 先令。如果 12 先令代表 24 個工作小時即兩個工作日的產品，則棉花和紗錠就在棉紗中體現了兩個工作日。但在紡的過程中加進了多少價值呢？

假定勞動力 per diem [一日的] 價值是 3 先令，而這 3 先令體

現 6 小时的劳动。其次，假定一个工人紡 10 磅棉紗需要 6 小时。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在产品上加进 3 先令；10 磅棉紗价值是 15 先令，或者說，每磅值 1 先令 6 辨士。

这个过程是再簡單不过了，但是它並沒有带来剩余价值。而且它也不可能带来剩余价值，因为在資本主义生产下，事情并不是如此簡單地进行的。

“我們来更仔細地看一下。劳动力 per diem 价值是 3 先令，因为物化在劳动力中的是半个工作日…… 要維持一个工人 24 小时的生活，需要半个工作日，但这种情况絲毫不妨碍工人整日去做工。因此，劳动力的价值和劳动力在使用过程中形成的价值，是两个不同的量。資本家购买劳动力正是看中了这种价值差額。劳动力的有用性，它生产棉紗或皮鞋的能力，只是一个 *conditio sine qua non* [不可缺少的条件]，因为劳动必須以有用的形式消耗，才能形成价值。但是有决定意义的是这个商品的特殊的使用价值，是它成为价值泉源并且是比它原来价值更大的价值的泉源的屬性。这就是資本家期望这个商品提供的特殊‘服务’。同时，他是按照商品交换的永恒規律行动的。事实上，劳动力的卖者也和其他一切商品的卖者一样，他实现劳动力的交换价值，让出它的使用价值。他不交出后者，就不能取得前者。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即劳动本身不归它的卖者所有，正如已售出的油的使用价值不归油商所有一样。貨幣所有者支付了劳动力的日价值；因此，劳动力一日的使用即一日的劳动是归他所有。劳动力一日的維持費只值半个工作日，而劳动力却可以活动、工作一整日，因此，劳动力使用一日所形成的价值比劳动力的日价值大一倍。这种情况对买者是一种特殊的幸运，对卖者也是沒有什么不公平的。

于是，工人劳动 12 小时，紡出 20 磅棉紗，其中体现着 20 先令棉花，4 先令紗錠等等，而他的劳动值 3 先令，总计是 27 先令。如果 10 磅棉花吸收 6 个工作小时，20 磅棉花就吸收了 12 个工作小时，值 6 先令。现在，物化在这 20 磅棉紗中的是 5 个工作日，其中 4 个工作日物化在消耗了的棉花和紗錠中，1 个工作日在紡紗过程中被棉花吸收。5 个工作日的货币表现是 30 先令。因而这也就是 20 磅棉紗的价格。1 磅棉紗仍旧值 1 先令 6 辨士。但是，投入这一过程的商品的价值总和是 27 先令。产品的价值比在产品生产上预付的价值大 $\frac{1}{9}$ 。这样，27 先令变成了 30 先令，带来了 3 先令的剩余价值。戏法终于变成了。货币转化为资本。

問題的一切条件都遵守了，商品交换的规律丝毫没有遭到破坏。等价物交换等价物。资本家作为买者是按照商品价值支付棉花、紗錠和劳动力等各种商品的。然后他做了每一个商品购买者所做的事情。他消费它们的使用价值。劳动力的消费过程同时就是商品的生产过程，它提供的产品是 20 磅棉紗，值 30 先令。现在，资本家又回到市場上出售商品，他每磅棉紗卖 1 先令 6 辨士，既不比它的价值贵一分，也不比它的价值贱一分。但是，他从流通中取得的货币比原来投入流通的多 3 先令。他的货币转化为资本的这一整个过程，是在流通领域中发生的，又不是在流通领域中发生的。它要借助于流通，因为在商品市場上购买劳动力是它的条件。它又不在流通中发生，因为流通只是价值增殖过程的先导，而这个过程是在生产领域中实现的。可見，*«tout est pour le mieux dans le meilleur des mondes possibles.»* [“在这美好的世界上，一切都十全十美。”（伏尔泰：“老实人”）]” [第 212—214 頁]

馬克思先生說明了生产剩余价值的方法后，就来分析剩余价

值。从以上的說明中我們知道，在投入生产企业的資本中，只有一部分直接参与剩余价值的生产，这就是为购买劳动力而預付的那部分資本。只有这部分資本产生新的价值；投在机器、原料、煤等等上面的資本，固然在产品的价值上 *pro tanto* [相应地] 再現出来，被保存和再生产出来，但是并没有产生剩余价值。这一事实使馬克思先生提出新的資本分类法，即把資本分为**不变資本**和**可变資本**。前者是投在机器、原料以及劳动过程所必需的一切其他要素上的那一部分資本，它只是被再生产出来；后者是用来购买劳动力即支付工資的那一部分資本，它不仅被再生产出来，同时还是剩余价值的直接泉源。由此可見，不变資本在剩余价值的生产上不管多么必要，但是它并不直接参与这种生产，而且，投入生产的不变資本量絲毫不会影响該部門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①。因此，在确定剩余价值率时，无須考虑不变資本。只有把剩余价值量同直接参与創造剩余价值的資本量即可变資本量加以比較，才能确定剩余价值率。因此，馬克思先生认为，剩余价值率只是剩余价值同可变資本的比：假定劳动的日价格是 3 先令，每日創造的剩余价值也是 3 先令，則剩余价值率为 100%。如果像通常那样，认为不变資本是生产剩余价值的一个积极因素，那会落到多么可笑的地步。这一点我們从納·威·西尼耳先生的例子就可以看到。这个例子，是这位“以經濟知識和优美文体著称的牛津大学教授，在 1836 年从他讲授政治經濟学的牛津大学被召往曼彻斯特去学习政治經濟学(向紡紗厂主学习)”的时期提供的〔第 251 頁〕。

馬克思先生把工人再生产他的劳动力价值的劳动時間叫做

① 这里应当指出，剩余价值和利潤决不是同一个东西。

“必要勞動”；他把超過這一時間而用來生產剩餘價值的時間叫做“剩餘勞動”。必要勞動和剩餘勞動加在一起構成“工作日”。

在一個工作日中，必要勞動時間是一定的；但是從事剩餘勞動的時間並不為任何經濟規律所規定；它在一定的界限內可能長些或短些。它永遠不能等於零，因為那時資本家雇用勞動的動因也就消失了；同時，工作日的總長度由於生理原因決不能達到 24 小時。但是在比如說 6 小時的工作日和 24 小時的工作日之間，會有很多中間的梯級。商品交換的規律，要求工作日的長度不致超過與工人的正常消耗相適合的程度。然而什麼是正常消耗呢？每天勞動幾小時才符合正常的消耗呢？在這裡，資本家的見解同工人的見解是大不相同的，但是因為這方面沒有更高的權威，所以問題是靠力量來解決的。規定工作日長度的歷史，就是全體資本家和全體工人，資本家階級和工人階級為工作日的界限而鬥爭的歷史。

“前面已經說過，資本並沒有發明剩餘勞動。凡是在社會上一部分人壟斷生產資料的地方，勞動者，不管是自由的還是不自由的，總要在維持本身生活所必要的勞動時間以外再加一部分勞動時間，來為生產資料的所有者生產生活資料，無論這些生產資料的所有者是雅典的 *καλὸς κἀγαθὸς* [貴族]，伊特刺斯坎的僧侶，*civis romanus* [羅馬的市民]，諾曼的男爵，美國的奴隸主，瓦拉几亞的領主，現代的大地主或資本家。”〔第 265—266 頁〕

但是很明顯，在產品的使用價值比產品的交換價值具有更重意義的一切社會中，剩餘勞動受到比較狹窄的社會需求範圍的限制，在這種情況下不一定存在着為剩餘勞動而追求剩餘勞動的慾望。例如，在古典的古代，極度的、累死人的剩餘勞動幾乎只發生在金礦銀礦中，在那裡，交換價值是在其獨立的形式上即作為貨

而被生产着。

“但是那些在奴隶劳动、徭役劳动等較低級的形式上从事生产的民族，一經卷入資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統治的世界市場，而这种市場使他們的产品的外銷成为主要利益时，就会在奴隶制、农奴制等等野蛮的災禍之外，再加上过度劳动的文明災禍。因此，在美国南部各州，当生产的目的是直接滿足本身需要时，黑人劳动还带有温和的家长制的性质。但是随着棉花輸出成为这些州的切身利益，黑人所从事的有时在七年內就把生命耗尽的过度劳动，就日益成为那个事事都要加以盘算的制度的因素了…… 多瑙河各公国的徭役劳动也是这样。”〔第 266—267 頁〕

在这里，把徭役劳动同資本主义生产比較一下，是很有趣的，因为在徭役劳动下，剩余劳动具有独立的明显的形式。

“假定工作日由 6 小时必要劳动和 6 小时剩余劳动組成。这样，自由工人每周为資本家提供 36 小时剩余劳动。这和他每周为自己劳动 3 天，又为資本家劳动 3 天，完全一样。但劳动時間的这种划分是觉察不出来的。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融合在一起了。因此，我也可以用另外的說法来表示同样的关系，例如說，工人在每分钟內为自己劳动 30 秒，为資本家劳动 30 秒。徭役劳动則不同。例如瓦拉几亚的农民为維持自身生存所花的必要劳动同他为領主所花的剩余劳动在空間上是分开的。必要劳动是在自己的地里进行的，剩余劳动是在主人的領地里进行的。这两部分劳动時間因此是独立存在的。在徭役劳动的形式下，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是截然分开的。”〔第 267—268 頁〕

馬克思先生还从多瑙河各公国的現代社会史中举出其他一些有趣的例子，說明那里的領主在俄罗斯干涉者的帮助下善于像任

何資本主義企業主那樣巧妙地榨取剩餘勞動。不過這些例子我們不再往下引述了。如果說俄國基謝廖夫將軍為了授予領主對農民勞動的幾乎無限的權力而制定的 *Règlement organique*〔組織規程〕，是一種正面表現，那末英國的工廠法則是反面表現。

“這種法律通過國家並且是資本家和大地主所統治的國家強制限制工作日的辦法，來節制資本無限制地壓榨勞動力的欲望。即使撇開一天比一天更帶威脅性地高漲着的工人運動不說，限制工廠勞動也是必要的，這正像用海鳥糞去加肥英國田地是必要的一樣。同是盲目的濫用，在後一種情況下使地力枯竭，而在前一種情況下使國家的有生力量遭到根本的摧殘。周期復發的流行病和德法兩國士兵身長的降低，同樣都是這一點的有力說明。”〔第 271 頁〕

為了證明資本力求把工作日延長到超出一切合理限度的趨向，馬克思先生廣泛地引用了工廠視察員報告、童工調查委員會報告、公共衛生報告以及議會的其他文件，並且歸納出下面的結論：

“‘什麼是工作日呢？’資本支付勞動力的日價值後，可以使用勞動力的時間有多長呢？在劳动力本身的再生產所需要的勞動時間外，可以把工作日延長到什麼程度呢？我們知道，資本對這些問題的回答是：工作日就是一晝夜 24 小時，減去幾小時休息時間，沒有這種時間，劳动力根本不能重新工作。同時不言而喻，工人終生不外都是劳动力，因此他的全部可利用的時間，按照自然和法律，都是勞動時間，因而應當用於資本價值的自我增殖……資本由於它對剩餘勞動的無限的盲目的追求，由於它對剩餘勞動的狼一樣的貪欲，它不僅把工作日的精神極限突破了，甚至把工作日的純生理極限也突破了……資本不管劳动力壽命的長短……資本

主义生产使劳动力本身过早地衰竭和死亡。它用縮短工人寿命的办法来在一定期限内延长工人的生产时间。”〔第305—307頁〕

但是，这不是在反对資本本身的利益嗎？随着时间的进程，資本不是也要补偿这种过度消耗的代价嗎？从理論上說可能是这样。但是在实际上，由于美国南部各州內的有組織的奴隶貿易，在七年內就耗尽奴隶劳动力已經成了那里公认的經濟原則；在实际上，英国的資本家是指望农业区供給工人。

“經驗总地向資本家表明：有一个过剩人口，即同資本当前增殖需要相比較而言的过剩人口，經常存在着，虽然这些人代代身体虛弱、未老先衰、寿命短促、中道夭折。另一方面，經驗向善于思索的观察者表明：資本主义生产从历史的观点看来虽然昨天才誕生，但是它已多么迅速多么深刻地摧毀了人民的生命力；工业人口的衰退，只是由于不断从农村吸收自然生长的生命要素，才得以緩慢下来；甚至农业工人也已經开始衰退了，虽然他們可以呼吸新鮮空气，虽然他們中間自然选择規律起着无限的作用，只有最强壮的人才能生存下来。有如此‘充分的理由’否认自己周圍工人的苦难的資本，在自己的实际活动中根本不理睬人类将会退化、将会不可避免地終于灭种的前途，就像它根本不理睬地球和太阳相撞的預言一样。在每次证券投机中，每个人都知道暴風雨有一天会到来，但是每个人都希望暴風雨是在自己发了大財把錢藏好以后，落到邻人的头上。Après moi le déluge!〔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这就是所有資本家和資本家国家的口号。因此，資本是根本不关心工人的健康和寿命的，除非社会迫使它去关心……但是一般地說，这并不取决于个别資本家的善意或恶意。在自由竞争中，資本主义生产的內在規律是作为外在的强制規律对各个資本家发生作

用的。”〔第 311—312 頁〕

標準工作日的規定，是企業主和工人幾世紀鬥爭的結果。考察一下這種鬥爭中的兩個對立的傾向，是很有意思的。起初，立法的目的是要強制地延長工人的勞動時間；從第一批勞工法（愛德華三世第 23 年即 1349 年的法律）直到十八世紀，統治階級始終未能從工人身上把可能的勞動量全部榨取出來。但是隨着蒸汽和新式機器的應用，情況就改變了。女工和童工的使用迅速打破了勞動時間的一切傳統的界限，以致在十九世紀一開始，過度勞動制度就盛行起來並達到人類史上空前未有的程度，結果迫使立法機關不得不在 1803 年做出限制工作日的規定。馬克思先生對直到 1867 年工廠法為止的英國工廠立法史，作了詳盡的敘述，並得出以下結論：

（1）機器和蒸汽首先在使用它們的工業部門中引起過度勞動，因此，法律上的限制首先在這些部門中施行；但後來，我們看到，這種過度勞動制度蔓延到幾乎一切生產部門，甚至包括根本不使用機器或仍然保持最原始的生產方式的部門（見童工調查委員會的報告）。

（2）隨着女工和童工在工廠中的使用，單個的“自由”工人失去了反抗資本進攻的能力，被迫無條件地服從。而這種情況迫使工人進行集體的反抗：開始了階級對階級的鬥爭，全體工人對全體資本家的鬥爭。

現在我們如果回顧一下我們假定“自由的”和“平等的”工人同資本家訂立契約的那一時刻，我們就會發現，在生產過程中許多東西都變得大不相同了。從工人方面來看，這種契約並不是自願的。他每天自由出賣勞動力的時間是他被迫出賣勞動力的時間；

工人只有进行群众性的反抗,才能争取实施一种国家法律,以保障自己不再因“自愿”契约而把自己和自己的后代出卖,淪于死亡和奴隶的境地。“从法律上限制工作日的朴素的 Magna Charta [大宪章],代替了关于‘不可出卖的人权’的华丽条目。”〔第 355 頁〕

現在我們要分析剩余价值率和它同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的关系。我們在这种研究上像以前一样,假定劳动力的价值是一个一定的不变量。

在这种假定下,剩余价值率同时又决定着一个工人在一定時間內为资本家提供的剩余价值量。假定劳动力的日价值是 3 先令,代表 6 小时劳动,剩余价值率是 100%,那末,3 先令的可变资本每天就产生 3 先令的剩余价值,或者说,工人每天提供 6 小时剩余劳动。

可变资本是资本家同时使用的全部劳动力的货币表现,因此劳动力所生产的剩余价值总量等于可变资本乘以剩余价值率;换句话说,它是由同时使用的劳动力的数目同剥削程度之间的关系决定的。这两个因素都是可变的,所以一个因素的减少可以由另一个因素的增加来抵消。雇用 100 个工人所需要的可变资本,以 50% 的剩余价值率(比如说,每天 3 小时剩余劳动)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并不比这笔可变资本的一半雇用 50 个工人以 100% 的剩余价值率(比如说,每天 6 小时剩余劳动)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多些。所以,在一定情况和一定限度內,资本所支配的劳动量,可以不取决于当时工人的数量。

但是靠提高剩余价值率来增加剩余价值,有一个绝对界限。不管劳动力的价值是多少,不管必要劳动时间是 2 小时还是 10 小

時，一個工人每天生產的總價值始終不會達到有 24 小時勞動體現在其中的價值。只有在這個界限以內，才可以由工作日的延長來補償可變資本，用這種辦法取得同量的剩餘價值。這種情況對於說明資本的下述兩種對立的趨勢所產生的許多現象將是十分重要的。這兩種趨勢是：（1）減少所雇用的工人人數即可變資本量；（2）仍要取得盡量多的剩餘勞動量。

其次：“在勞動力的價值不變和勞動力所受剝削的程度相同的情況下，不同的資本所生產的價值量和剩餘價值量同這些資本的可變部分……的量成正比。這一規律顯然是和以表面現象為根據的全部經驗相矛盾的。每一個人都知道……紡紗廠主使用的不變資本較多，可變資本較少，而麵包房老板使用的可變資本較多，不變資本較少，但前者並不因此就獲得較少的利潤或剩餘價值。要解決這個表面的矛盾，還需要有許多中項，就像在初等代數中需要有許多中項才能理解 $\frac{0}{0}$ 可以代表一個實在的量一樣。”〔第 361 頁〕

在一個國家中，如果工作日的長度已定，要增加剩餘價值就只能靠增加工人人數即增加人口；這種人口的增加是一國總資本生產剩餘價值的數學界限。另一方面，如果工人人數已定，這個界限就由工作日可能延長的程度來決定。往後我們會看到，這個規律只適用於我們在上面所考察的剩餘價值形式。

在研究的現階段上，我們看到，並不是任何一個貨幣額都可以轉化為資本，要實現這種轉化，就需要有一個最低額，這個最低額就是購買一個勞動力 and 為了使這一勞動力動作起來而必需的勞動資料的費用。假定剩餘價值率是 50%，這樣，我們的初生的資本家必須雇用兩個工人，才能維持像工人一樣的生活。但在這種情

况下他不可能有什么积蓄；然而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不仅仅是保存财富，而主要是增加财富。

“为了维持比一般工人只不过好一倍的生活，并且把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一半再转化为资本，他就得把预付资本的最低额和工人人数都增加为 8 倍。当然，他自己也可以像他的工人那样，直接参与生产过程，这时他便成了介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一种中间人物，成了‘小业主’。资本主义生产要发展到一定水平，就需要资本家能把他作为资本家即作为人格化的资本而发挥职能的全部时间，都用在占有别人的劳动上，因而也就是用在监督别人的劳动以及出卖这种劳动的产品上。中世纪的行会曾力图用强制的办法防止手工业师傅变为资本家，规定每个师傅使用的工人不得超过一个极小的最高额。货币或商品的所有者，只有当他在生产上预付的最低额远远超过中世纪的最高额时，才真正变为资本家。在这里，如同在自然科学上一样，证实了黑格尔在他的‘逻辑学’中所发现的规律的正确性，这个规律就是：单纯的量变到一定程度就转化为质的区别。”〔第 363—364 页〕

货币或商品的所有者要变为资本家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价值额，在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不同阶段上是不同的，而在同一发展阶段上又因生产部门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在前面已经详细考察过的生产过程中，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大大改变了。首先，资本已经发展成为对劳动即工人本身的指挥权。人格化的资本即资本家监视工人去正常地、尽力地、以应有的强度进行工作。

“其次，资本发展成为一种强制关系，迫使工人阶级超过他们自身生活需要的狭小范围的要求而去完成更多的劳动。资本作为

別人勤勞的發生器、剩餘勞動的吸收器和勞動力的壓榨器，它在精力、貪婪和效率上遠遠超過以往一切以直接強制勞動為基礎的生產制度。

資本一開始是依靠它在歷史上所遇到的技術條件來征服勞動的。因此，它不是馬上就改變生產方式。所以我們上面所考察的那種單純靠延長工作日來生產剩餘價值的形式，好像和生產方式本身的任何變化無關。在這種剩餘價值的生產上，舊式麵包業並不比近代棉紡業差些。

如果我們從勞動過程的觀點來看生產過程，那末工人不是把生產資料看做資本，而只是看做自己有目的的生產活動的手段和材料。例如在制革廠，工人只是把皮革當做自己的勞動對象。他鞣制的並不是資本家的皮。但是從價值增殖過程的觀點來看生產過程，情形就不同了。生產資料立刻就變成吸收別人勞動的手段。於是不再是工人使用生產資料，而是生產資料使用工人。不是工人把生產資料當做自己生產活動的物質要素來消費，而是生產資料把工人當做它們自身生活過程的酵母來消費；而資本的生活過程只是資本作為自我增殖的價值的運動。熔爐和生產建築物如果在夜間停工而不去吸收活勞動，這對資本家來說是一種‘純粹的損失’。因此熔爐和生產建築物造成一種要勞動力‘做夜工的貪求’（見“童工調查委員會報告。1865年第四次報告”第79—85頁）單是由于貨幣轉化為生產過程的物質要素，轉化為生產資料，就使生產資料轉化為取得別人勞動和剩餘勞動的合法權和強制權。”〔第365—366頁〕

但是剩餘價值還有另一種形式。工作日的長度一旦達到極限，資本家還可以用另一種方法增加剩餘勞動，這就是用提高勞動

生产率的办法来降低劳动力价值，从而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剩余价值的这种形式，将在下一篇文章中考察。

弗·恩格斯写于 1868 年 5 月 22 日—
7 月 1 日左右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第一次发表在 1926 年“马克思主义
年鉴”杂志第 1 期上

卡·馬克思
关于改变国际 1868 年度代表
大会的集会地点的決議²¹⁶

鉴于：

(1) 比利时議會剛剛把一項法律的有效期延长三年，根据該項法律，任何一个外国人都可以被比利时行政当局驅逐出境；

(2) 国际工人协会的尊严不容許在使它处于当地警察支配之下的地方召开代表大会；

(3) 国际工人协会章程第三条授权总委员会在必要时可以改变代表大会的集会地点；

总委员会决定于 1868 年 9 月 5 日在倫敦召开国际工人协会代表大会。

1868 年 6 月 2 日提出

載于 1868 年 6 月 6 日“蜂房報”
第 347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总委员会記錄簿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卡·馬克思
总委员会就費·皮阿的演說
所作的決議²¹⁷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布对費里克斯·皮阿在克利夫兰大厅的公众集会上所发表的演說不負任何責任；費·皮阿与本协会沒有任何关系。

卡·馬克思于1868年7月7日
提出

載于1868年7月12日“自由报”
第55号和1868年7月26日
“人民論壇报”第7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总委员会記錄簿

卡·馬克思

我对弗·巴师夏的剽窃²¹⁸

在……^①上,巴师夏的一位信徒有一个发现,说什么我用生产商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确定商品的价值量,这是从弗·巴师夏那儿偷来的,而且我还作了歪曲。本来,我也可以不去理会这个 qui pro quo [誤解]。可是,如果说这位第一号巴师夏分子发现我的价值定义实质上 and 巴师夏的定义相同,那末,几乎在同时,又有一位第二号巴师夏分子在……^②的萊比錫“中央文学报”上宣称……^③

这样一来,第一号巴师夏分子加第二号巴师夏分子,得出的结果是:整个巴师夏分子的大軍現在都应该投到我的陣营中来,并且完全接受我对資本的全部观点。不言而喻,只是在經過激烈的内心斗争之后,我才下决心拒絕这种兼并所能給予我的愉快。

在我的著作“資本論”(1867年版)中关于价值的定义,早在二

① 手稿上留出空白以备填写刊物的名称——“国民經济和文化史季刊”。——編者注

② 手稿上留出空白以备填写日期——1868年7月4日。——編者注

③ 手稿上留出空白以备填写以下的引文:“駁倒价值理論是反对馬克思的人的唯一任务,因为如果同意这个定理,那就必然要承认馬克思以铁的邏輯所做出的差不多全部結論。”——編者注

十年前我写的反对蒲魯东的著作“**哲学的貧困**”（1847年巴黎版）中就已經有了（第49頁及以下各頁）²¹⁹。而巴师夏的关于价值的宏論，是在几年之后才出世的。²²⁰因此，我不可能抄襲巴师夏，而巴师夏看来倒是可能抄襲我的。然而，巴师夏实际上並沒有对价值进行任何分析。他只是反复咀嚼空洞的概念，借以愜意地证明“世界充滿了偉大的、美妙的、有益的服务”²²¹。

大家都知道，德国的巴师夏分子全都是民族自由主义者，因此，現在我也来給他們提供一种“偉大的、美妙的服务”，指出巴师夏的种种絕妙发现的**独特的普魯士的来源**。施馬尔茨老头曾做过普魯士的政府顧問，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他甚至还做过普魯士的政府樞密顧問。除此以外，他还具有善于嗅出**蠱惑者**²²²的特別灵敏的嗅觉。总之，就是这个老施馬尔茨于**1818年在柏林**发表了“**政治經濟学研究指南**”。他的指南的法譯本于1826年在巴黎出現，书名叫“**政治經濟学**”²²³。在扉頁上，这本书的譯者昂利·茹弗魯瓦的大名也冠了“普魯士政府顧問”的头銜。下面这段引文，不仅在实质上，而且在字句上提供了巴师夏的价值观念的精髓：

“一般地說，他人的劳动，無論什么时候都仅仅是为我們提供**時間的節約**；而这時間的節約就是构成它的价值和它的价格的全部东西。譬如說，木匠为我做桌子，僕役把我的信件送到邮局去，把我的衣服刷干淨或者把我不需要的东西送給我，他們两个人对我的**服务**完全是同样的性质：两个人都是替我**節約了時間**，就中既有我亲自去做这些事所不得不花費的**時間**，也有我为了学会做好这些事所必需的技能和本領而不得不花費的**時間**。”（引自“施馬尔茨文集”第1卷第304頁）

这样，我們就看到了，巴师夏是从哪儿弄到他的脂油

的，更确切点应该說，是从哪儿弄到他的施馬尔茨 [Schmalz] 的①。

卡·馬克思写于 1868 年 7 月 11 日
左右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譯的

第一次发表于“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36 年俄文第 1 版第 13 卷第 1 册

① 施馬尔茨(Schmalz)也有“炼成的脂油”的意思。——譯者注

卡·馬克思
总委员会就不列颠政府对沙皇
俄国的态度所作的声明²²⁴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谴责不列颠政府对俄国的又一次奴颜婢膝的表现，——在俄国政府颁布命令废除波兰这一名称一个月之后，不列颠政府就取消了预算案中“流亡者”一词前面的“波兰的”这一形容词。

卡·馬克思于1868年7月14日
提出

载于1868年7月18日“蜂房报”
第352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总委员会记录簿

卡·馬克思
总委员会提交布魯塞尔代表大会的
关于在資本主义制度下使用
机器的后果的決議草案²²⁵

一方面，机器成了資本家阶级用来实行专制和进行勒索的最有力的工具，另一方面，机器生产的发展为用真正社会的生产制度代替雇佣劳动制度創造必要的物质条件。

卡·馬克思于1868年8月11日提出
載于小册子“国际工人协会。1866年
日内瓦代表大会和1868年布魯塞尔
代表大会決議”1868年倫敦版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总委员会記錄簿

卡·馬克思 致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和理事会²²⁶

1868年8月18日于倫敦

为了結束布魯塞爾代表大會的准备工作，已定于8月22日召开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执行委员会²²⁷會議，8月25日召开总委员会全体會議。因为我受委托在这两次會議上作报告，所以我无法接受你們盛情的邀請，前去参加在漢堡举行的全德工人联合会代表大会。

我滿意地看到，你們的代表大會的議程列入了那些确实应当成为任何严肃的工人运动的出发点的問題：展开爭取完全的政治自由的鼓动；規定标准工作日；工人階級在实现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偉大任务（工人階級應該为整个社会解决这一任务）的事业中有計劃地进行国际合作。祝工作顺利！

致民主的敬礼

卡尔·馬克思

載于1868年8月28日“社会
民主党人报”第100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社会民主党人报”

卡·馬克思
总委员会提交布魯塞尔
代表大会的关于縮短工作日
的決議草案²²⁸

鉴于 1866 年日内瓦代表大会一致通过的一项決議中早已指明，从法律上限制工作日是今后任何一种社会改革所不可缺少的先决条件，因此总委员会认为，現在已經是根据該項決議做出实际結論的时候，国际工人协会所有分部务必根据有协会組織存在的各个国家的实际情况着手討論这个問題。

卡·馬克思于 1868 年 8 月 25 日
提出

載于 1868 年 8 月 29 日“蜂房报”
第 359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总委员会記錄簿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卡·馬克思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

第四年度报告²²⁹

1867—1868年构成国际工人协会历史上的一个时代。在平稳发展的时期之后，它的影响大大增强，以致引起了统治阶级的恶毒诽谤和各国政府的迫害^①。协会进入了斗争阶段。

不用说，法国政府在各国外政府反对工人阶级的反动活动中是一马当先。我们在去年就不得不揭露它的某些敌对手法——秘密扣留信件、没收我们的章程、在法国边境抢走日内瓦代表大会的文件^②。我们在巴黎为要求归还这些文件交涉了很久，但都无结果，最后只是由于英国外交大臣斯坦利勋爵从官方施加压力，这些文件才交还了我们。

可是今年，帝国完全抛弃了假面具。它公然企图借助它的警察^③和法庭来消灭国际工人协会。十二月二日王朝的诞生应当归功于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的最伟大的表现就是1848年的六月起义，因此这个王朝就不得不轮流地扮演资产阶级的救星和无产阶级的慈父般的保护人。当国际工人协会日益增长的威力在亚

① 英文版中不是“迫害”，而是“敌视”。——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615页。——编者注

③ 英文版中不是“它的警察”，而是«Coups de police»(警察袭击)。——编者注

眠、魯貝、巴黎、日內瓦等地的罢工²³⁰ 中刚刚清楚地显示出来，自封的工人保护人就只好要么把我们的协会抓在自己手里，要么就把它消灭。最初提出的要求还不那么高。巴黎代表向日內瓦代表大会（1866年）宣读的并于次年在布鲁塞尔出版的宣言²³¹ 在法国边境被没收了。为了回答我们的巴黎委员会对采取这种暴力措施的原因提出的质问，魯艾大臣邀请了委员会的一位委员进行私人谈话。在随后举行的会谈中，他先是要求缓和并修改宣言中的某些地方。等遭到拒绝以后，他就提出：

“如果你们能加进哪怕是几个感恩皇上的字眼，那就还有可能达成协议。要知道，皇上曾经为工人阶级做了许多事情。”

皇上的亲信魯艾的这种微妙的暗示并没有得到预期的反应。从此以后，十二月二日政府就只有等待某种借口以使用暴力来除掉协会。我们的法国会员们在普奥战争以后进行的反沙文主义鼓动，使它更为恼怒。不久，芬尼亚社社员的密谋在英国引起的慌乱达到了顶点，这时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向英国政府提出请愿书，揭露对三位曼彻斯特蒙难者即将执行的死刑是一种法律暗杀行为^①。同时，我们在伦敦举行了维护爱尔兰权利的群众大会。一向渴望巴结英国的法国政府认为从拉芒什海峡两岸夹攻国际工人协会的良机到了。于是警察在深夜闯进了我们巴黎委员会委员的住宅，搜查他们的私人信件，并在英国报刊上大肆叫嚣，说什么芬尼亚社密谋的中心终于被破获了，其主要机关之一似乎就是国际工人协会。²³² 许多叫嚣都是无中生有！在法院尽一切努力进行调查

① 英文版中不是“揭露对三位曼彻斯特蒙难者即将执行的死刑是一种法律暗杀行为”，而是“要求减轻对三位曼彻斯特蒙难者的判决，并揭露对他们判处绞刑是一种政治报复行为”（呼吁书全文见本卷第246—247页）。——编者注

的时候,連一点 *corpus delicti*〔犯罪构成〕的影子也沒有找到。^①在把国际工人协会誣陷为密謀家的秘密团体的企图遭到了这样可耻的失敗之后,又施展了另一种詭計。巴黎委员会被当做一个超过20人的非法团体²³³而遭到迫害。受过帝国训练的法国法官当然不用长時間考虑就宣布解散协会,并对委员会委員处以罰金和監禁。^②不过法院在判决书的开头部分有两个地方是談得天真坦率的——一方面承认国际工人协会的力量日益增长,另一方面則宣称十二月二日帝国的存在同真誠地把真理、正义和道德作为自己指导原則的工人团体的存在是不相容的。这些迫害很快就在省里发生了作用,自从巴黎判决之后省长們就开始經常为一些小事进行无端指摘。但是政府的这些无端指摘根本沒有消灭国际工人协会,而只是給了它以新的生命力^③。协会终于迫使十二月二日政府公开同工人阶级决裂,这一情况无比地加强了协会在法国的影响。

在比利时,我們的协会取得了很大胜利。沙勒罗瓦矿区的矿主經常迫害矿工,引起他們暴动,接着又用武力去对付手无寸铁的群众。在这样造成的慌乱情况下,协会的比利时分部把矿工的事情承担起来了,通过报刊和在群众大会上揭示了他們經濟上的貧困处境,帮助伤亡者家屬,并为被捕者提供法律辯护。陪审法庭终于宣告所有被捕者无罪。²³⁴在沙勒罗瓦事件后,国际在比利时的胜利就得到了保证。当时,司法大臣茹尔·巴拉在比利时下院非难

① 英文版中不是“連一点 *corpus delicti* 的影子也沒有找到”,而是“絲毫沒有得出什么結果。連檢察官本人也反感地拒絕支持控告”。——編者注

② 英文版中不是“宣布解散协会,并对委员会委員处以罰金和監禁”,而是“作出解散协会和逮捕巴黎委员会委員的判決”。——編者注

③ 英文版中沒有本段最后一句話,而是在“生命力”后面加进“迫使帝国停止对工人阶级施展籠絡人心的伎倆”。——編者注

国际工人协会，以它的存在作为恢复外侨法的主要借口。他甚至威胁要禁止代表大会在布鲁塞尔召开。比利时政府毕竟应当懂得，小国在欧洲存在的基础只有一个，那就是它应当成为自由的避难所。

在意大利，协会自門塔納大屠杀²³⁵以后被反动势力削弱了。其直接后果之一就是警察当局限制了結社和集会的权利。但是我們广泛的通信表明，意大利的工人阶级正在日益摆脱一切旧政党的影响而取得完全的独立。

在普魯士，由于法律禁止普魯士的工人团体同外国团体有任何接触，²³⁶ 国际不能合法存在。而且，普魯士政府还可怜地重复波拿巴的政策，例如对**全德工人联合会**进行无端的指摘。各个軍国主义政府尽管經常都准备着彼此厮杀一場，但在对自己的共同敌人——工人阶级进行十字軍征討时，却总是一致的。

不过，尽管有种种法律上的障碍，在我們的日内瓦委员会的周圍却早已团結了一批規模不大的、遍布德国各地的分部。²³⁷

主要分布在德国北部的全德工人联合会，最近在汉堡举行的代表大会上决定同国际工人协会采取一致行动，²³⁸ 虽然根据法律它也被剥夺了正式加入国际工人协会的可能。即将召开的紐倫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将有主要是德国中部和南部的約 100 个工人联合会的代表参加）把关于直接加入国际工人协会的問題列入了議程。根据它的指导委员会的愿望，我們已派出一名代表前往紐倫堡。²³⁹

在奥地利，工人运动日益具有明确的性质^①。已經决定 9 月初在維也納举行代表大会，目的是使帝国境内各民族的工人兄弟般地联合起来。同时还发表了給英国人和法国人的邀請书，在邀請

① 英文版中不是“明确的性质”，而是“革命的性质”。——編者注

书中宣布了国际工人协会的原則。你們的总委员会已經指定了一位代表前往維也納；²⁴⁰但是在封建反动势力打击下已經动搖的奥地利本届自由派內閣，看来是非常有远見，它居然禁止召开工人代表大会，从而使工人也成为他的敌人。

日内瓦建筑工人的斗争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国际在瑞士存在的問題。建筑业主本来提出要工人退出国际，以此作为达成任何協議的先决条件。但是工人坚决拒絕这种要求。他們由于在瑞士本土以及通过国际从法国、英国、德国和比利时得到了支援，终于争取到了縮短工作日^①和提高工資^②。在这以后，早已在瑞士深深地扎下根的国际，开始迅速而广泛地发展起来。比如，有50个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可能是欧洲最老的协会）去年秋天在諾恩堡举行的代表大会上就一致决定加入国际。²⁴¹

在英国，政治运动^③、旧政党的瓦解和即将到来的竞选的准备工作占用了我們許多优秀力量，因而阻碍了我們的宣傳工作。尽管如此，我們还是同各地的工联建立了經常不断的通訊联系。这些工联中有一部分已經宣布加入国际工人协会。在倫敦新加入国际的团体中，会员人数占第一位的是西蒂区皮匠和鞋匠工联。

你們的总委员会同美国全国劳工同盟保持着經常的联系。該同盟在1867年8月举行的最近一次代表大会上决定今年派一名代表出席布魯塞尔代表大会，但由于時間关系，沒有来得及采取必要措施来实现这一决定。²⁴²

北美工人階級的潜在威力从下述情况中可以看出：法律已規

① 英文版中，在“工作日”后面还有“1小时”。——編者注

② 英文版中，在“工資”后面还有“10%”。——編者注

③ 英文版中不是“政治运动”，而是“政治形势的动蕩”。——編者注

定在联邦政府的公营工厂中实行八小时工作日，在联邦的八九个州内已颁布八小时工作日的共同法律。但是目前美国工人阶级，例如在纽约，正在同顽抗的资本作激烈的斗争，因为资本正利用它所有的一切强有力的手段来亟力阻挠八小时工作日法律的实行。这一事实表明，即使在最有利的政治条件下，工人阶级要取得任何重大的胜利，都有赖于培养和集中工人阶级力量的那个组织的成熟程度。

一国范围内的工人阶级的组织甚至也可能由于其他国家工人阶级的组织性不强而遭到挫败，因为所有的国家都在世界市场上进行竞争，从而彼此互相影响。只有工人阶级的国际性的联盟才能保证工人阶级的最终胜利。正是由于这种需要，才产生了国际工人协会。国际工人协会并不是某一个宗派或某一种理论的人为的产物。它是无产阶级运动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无产阶级运动又是由现代社会自然的和不可抗拒的趋势所产生的。国际工人协会深知自己所负使命的伟大意义，它既不容许别人恫吓自己，也不容许离开正确的道路。今后，它的命运将同人类复兴所系的那个阶级的历史发展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

受总委员会的委托：

执行主席 罗伯特·肖

总书记 约·格奥尔格·埃卡留斯

1868年9月1日于伦敦

卡·马克思写

载于1868年9月9日“泰晤士报”，1868年9月“先驱”杂志第9期和“比利时人民报”附刊：“国际工人协会第三次代表大会。正式报告”1868年布鲁塞尔版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马克思夫人燕妮·马克思所抄的手稿副本译的，并根据“泰晤士报”校对过

弗·恩格斯 致席勒协会理事会²⁴³

1868年9月16日于曼彻斯特

戴維逊先生通知我說，理事会在9月7日的會議上通过了一項决定，要邀請卡尔·福格特先生来协会作讲演。

我深感遺憾的是，這項决定使我必須辞去协会主席和理事会理事的职务。

这里无须去談那些事务本身的理由，根据这些理由，如果当时我出席會議的話，我是会投票反对這項决定的。迫使我决定这样做的不是这些原因。

我要辞职仅仅是由于一些同协会毫无关系的原因。在1859年和1860年，我的政治上的朋友們和我本人曾对福格特先生提出过严厉的政治性的指責，这种指責都有真凭实据（見卡尔·馬克思“福格特先生”1860年倫敦版²⁴⁴）。对于这种指責，福格特先生迄今未作任何回答，尽管从那时以来，又有其他人一再对他提出这种指責。

整个这件事情，以及当时为此而展开的論战，大概理事会的其他理事都不知道，或許他們都忘却了。他們完全有权不去注意福格特先生的政治面目，而把他仅仅看做是一个比較时髦的、把別人在自然科学方面的发现加以通俗化的人。但我是不能这样做的。

如果我在上述决定作出以后仍然留在理事会里，那我就是背棄自己的全部政治上的过去，背棄自己政治上的朋友。那我就是对这样一个人投信任票，这个人我认为已經有证据可以证实，他在1859年曾經当过波拿巴的領津貼的暗探。

正是这样一种絕对的必要性，才能够促使我辞去我的职务，而在过去存在种种困难（現在这些困难已經順利克服了）²⁴⁵的情况下，我一直都认为繼續担任这个职务是我的責任。

衷心感謝理事会各位理事先生曾經如此慷慨地对我表示信任，在分手之际，我希望我們彼此之間能永远保持友好的感情。

致深切的敬意

弗·恩·

写于1868年9月16日

第一次发表于1950年“阿姆斯特丹国际
社会历史研究院公报”杂志第2期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草稿譯的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

論拉薩尔派工人联合会的解散²⁴⁶

“政府知道，資產階級也知道，目前德国的整个工人运动仅仅是被容忍着，它只是在政府还需要的时候才存在。当这个运动的存在和資產階級反对派的新的独立的敌对者的成长对政府还有利的时候，它就会容忍这个运动。可是一旦这个运动把工人变成独立的力量，一旦它因此而危及政府，这样的情况就会立即結束。但願那些为取締进步党人在出版、結社和集会方面的鼓动而采取的手段能够成为对工人的警告。当时曾經采用过的那些法律、命令和惩罚措施，不定什么时候又可能被用来反对工人并終止他們的鼓动；一旦这种鼓动有危險的时候，它們就一定会被采用。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工人对这个問題要看得很清楚，不要犯資產階級在“新紀元”时期犯过的錯誤，那时資產階級也仅仅是被容忍着，而它却认为自己的地位已很巩固。如果有人設想现在的政府会解除目前对出版、結社权和集会权的束縛，那他就是那种不值得理睬的人。而沒有出版自由、結社权和集会权，就不可能有工人运动。”

这段话是在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小册子“普魯士軍事問題和德国工人政党”^① 1865年汉堡版第50—51頁上。当时有人企图

① 見本卷第41—87頁。——編者注

把全德工人联合会——那时候这是德国社会民主派工人的唯一有組織的联合——置于俾斯麦內閣的监护之下，同时要工人相信，政府会賜予普选权。要知道，拉薩尔曾把“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选举权”当作工人階級夺取政权的唯一的和絕對正确的手段来加以鼓吹；如果說当时人們对出版自由、結社权和集会权这些本来也是資產階級所贊成或者至少說过贊成的如此次要的东西采取藐視态度，那又有什么奇怪呢？既然資產階級对这些东西感兴趣，难道这不正是工人对宣傳这些东西表示冷淡的理由嗎？上面所說的那本小册子反对这样的观点。全德工人联合会的領袖們认为他們不需要什么教导，而小册子的作者感到滿意的只是他的故乡巴門市的拉薩尔分子同他本人和他的朋友們断絕了关系。

而現在情况怎样呢？“普遍的、直接的、平等的选举权”已經存在了两年。已經进行了两次国会的选举。工人沒有能够执掌政权并按照拉薩尔的方案頒布关于“国家帮助”的命令，而是勉勉强强地把半打左右的代表选进国会。俾斯麦当了联邦首相，而**全德工人联合会**被解散了。

但是为什么普选权沒有給工人带来許諾过的千年王国，——对于这个问题，他們也可以在恩格斯那里找到答复。上述小册子第48頁上^①写道：

“至于說到直接的普选权本身，那末只要到法国去一趟就可以相信，当存在着大量头脑迟鈍的农村居民、組織严密的官僚制度、受严格控制的报刊、在很大程度上受警察压制的社团，以及在沒有任何政治集会的情况下，靠这种选举权所能进行的只是多么无害

^① 見本卷第82—83頁。——編者注

的选举。通过直接的选举权进入法国議会的工人代表多嗎？要知道，法国无产階級比德国无产階級还具有更加优越的条件，它集中得多，而且具有更久的斗争經驗和組織經驗。

这里还发生了另一个問題。在德国，农村居民是城市居民的两倍，也就是說，在德国有 $\frac{2}{3}$ 的人靠农业为生， $\frac{1}{3}$ 靠工业为生。还由于在德国大地产是一种常規，而小农只是一种例外，所以，換句話也就是說，有 $\frac{1}{3}$ 的工人听命于資本家，有 $\frac{2}{3}$ 的工人听命于封建老爷。但願那些經常攻击資本家但是对封建主却不想說一句气憤話的人能够很好地懂得这一点。在德国，封建主比資產階級剝削着数量多一倍的工人……但是这还远不是事情的全部。旧的封建領地上的宗法式的經營方式使雇农或无地农民 [Häusler] 祖祖輩輩依附于他們的‘仁慈的老爷’，这种依附关系大大阻碍了农业无产者参加城市工人的运动。神甫、农村一貫的愚昧无知、恶劣的学校教育、人們同整个世界的隔絕，則在这方面起了补充作用。农业无产階級是工人階級的这样一个部分，它最难于弄清，而且将比其他部分更迟一些弄清自己本身的利益、自己本身的社会地位；換句話說，这个部分在最长時間內一直是剝削它的特权階級手中的一个无意識的工具。而这是哪个階級呢？在德国这不是資產階級，而是封建貴族階級。但是甚至在法国——那里几乎只有拥有土地的自由农民，封建貴族早已失去了任何政权，——普选权也沒有使工人进入議会，而是相反，几乎把他們全部赶出了議会。在封建貴族仍然是实际的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以及农业工人两倍于工业工人的德国，普选权究竟能产生什么結果呢？在德国，反对封建的和官僚的反动派的斗争——这二者在我們这里現在是分不开的——就等于爭取农村无产階級的精神解放和政治解放的斗争；在农村

无产阶级还没有卷入运动的时候，德国的城市无产阶级就不可能得到而且一定得不到丝毫成功，直接的普选权对无产阶级来说不是武器，而是陷阱。

也许这种坦率而必要的解释会鼓励封建主发表有利于直接的普选权的言论。如果是这样，那就更好些。”

全德工人联合会被解散不仅是在普选权普遍实行的时候，而且正是因为普选权的普遍实行。恩格斯早就预告过联合会：一旦它变成危险的东西，它就会遭到破坏。联合会在其最后一次大会²⁴⁷上通过决议：（1）赞成争取彻底的政治自由；（2）同国际工人协会采取一致行动。这两项决议都含有同联合会的全部过去彻底决裂的因素。这样一来，联合会就离开它以前所坚持的宗派立场，走上了大规模工人运动的广阔道路。但是在上层当中也许有人认为这是什么和协议相矛盾的。在其他时候这一点也许不会受到这样大的重视，但是自从有了普选权，情况就不同了，这时不得不警惕地防备农村的和中小城市的无产阶级接受这类叛乱图谋的影响！普选权是钉在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棺材上的最后一根钉子。

联合会正是由于同目光短浅的拉萨尔主义决裂而灭亡，这是联合会的光荣。因此，代替它的不论是个什么样的组织，都会建立在比那些经常重复的拉萨尔主义关于国家帮助的空话更加普遍的原则性基础上。自从被解散了的联合会的成员开始用思考来代替信从，在通向全体德国社会民主派工人汇合成一个大党的道路上的最后障碍就消失了。

弗·恩格斯写于1868年9月底

载于1868年10月3日“民主周报”
第40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民主周报”

弗·恩格斯

論拉薩尔派工人联合会的解散²⁴⁸

(补 充)

在用上面这一标题发表的文章中(見前一号报纸)曾引用了恩格斯的小册子里面关于普选权的一段話^①, 在这段引文的末尾, 应当补充上这样的注解:

联合会从拉薩尔那里继承来的那个“人类的主席”伯恩哈特·貝克尔, 曾經对“馬克思派”, 也就是对馬克思、恩格斯和李卜克內西进行最卑鄙的侮辱。^② 現在同一个貝克尔在其卑劣的抨击性文章“揭穿斐迪南·拉薩尔的悲惨逝世的内幕”中(这篇文章暴露了他本人的卑賤人格, 而且只是由于其中发表了一些盜窃来的文献才使人感到兴趣)又这样来“修正”恩格斯了:

“但是为什么不进行爭取結社、集会和出版的絕對自由的鼓动呢? 为什么工人不設法抛掉反动时期套在他們身上的枷鎖呢?(第133頁)…… 只有通过进一步发展民主主义基础才能使拉薩尔主义复活, 并使它变成純粹的社会主义。而要做到这一点, 除了其他办法以外, 必須不再吝惜容克地主或

① 見前一篇文章。——編者注

② 現在哈茨費尔特伯爵夫人——全德工人联合会的費尔斯特林格——門德式的滑稽模拟品²⁴⁹的“母亲”——在繼續从事这种高尚的事业。

富足地主的利益，必須补充和推广社会主义理論，把它运用于在普魯士人数远远超过城市人口的广大农村工人。”(第 134 頁)

讀者可以看出，上述小册子的作者(弗·恩格斯)可以对他所給予自己的敌人的影响感到滿意。

弗·恩格斯写于 1868 年 10 月初。

原文是德文

載于 1868 年 10 月 10 日“民主周报”
第 41 号

俄文譯自“民主周报”

卡·馬克思

关于国际工人协会和英国工人 組織的关系²⁵⁰

英国的报刊、尤其是倫敦的报刊以異常严肃认真的态度談論国际工人协会和它的布魯塞尔代表大会（单是“泰晤士报”就为此刊登了4篇社論），这种态度在德国資产階級报刊中引起了真正的瘋狂叫囂。德国报刊教訓英国报刊，說后者的錯誤在于相信国际工人协会在英国的作用！它們发现英国工联同国际工人协会完全无关！尽管英国工联曾經通过这个国际工人协会以大量金錢对于进行反对資本斗争的巴黎工人、日內瓦工人和比利时工人进行了援助。²⁵¹

有人从倫敦給我們写信說：“所有这一切，看来都是出于某个麦·希尔施^①的論断，他是舒尔采-德里奇專門派到英国去的，目的是要掀起这场叫囂。要知道这是麦·希尔施說的，而麦·希尔施是个值得尊敬的人！可尊敬的希尔施[Ehren-Hirsch]在倫敦的工联主义者（各工联、工会的成員）看来却是形迹可疑的人，因为他沒有国际工人协会开的任何介紹信！人們干脆把他愚弄了一番。

① 指麦克斯·希尔施博士，敦克尔的“人民报”²⁵²的“著名”經濟学家。在他未到 he 不知道的英国地区去考察以前，倫敦对这位現代的社会救主的存在似乎毫无所聞。

因此希尔施做了傻事是不足为奇的。如果人們认真地对待他的話，那是用不着抱有什么特殊的坦率願望就可以告訴他全倫敦都知道的事，这就是設在倫敦的工联全国理事会²⁵³ 由 6 人或 7 人組成，其中 3 人同时又是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員會的委員；这 3 人是**奥哲尔**(全国理事会書記兼鞋匠代表)、**罗·阿普耳加思**(联合起来的木工和細木工的代表)、**豪威尔**(泥水匠代表兼改革同盟²⁵⁴ 書記)。其次，他会知道，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員會里还有 5 位委員代表其余的加入协会的工联(不算外地的工联，单在倫敦一个地方就大約有 50 个)，这 5 位委員是**罗·肖**、**巴克莱**、**柯恩**、**黑尔斯**和**莫里斯**，此外，每个工联有权而且是照例在特殊情况下派代表参加总委員會。再次，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員會里代表英国人的还有：

各合作团体，它們派了 3 个代表参加布魯塞尔代表大会，——**威廉·韦斯顿**^① 和**威廉斯**；

改革同盟，——**德尔**、**考威尔·斯特普尼**和**魯克拉夫特**；3 人都是改革同盟执行委員會委員；

全国改革联合会²⁵⁵，它是已故的鼓动家**布朗特尔·奥勃莱恩**創建的，由自己的主席**阿·阿·华尔頓**和**米尔納**代表；

最后，**无神論的民間鼓动**，由著名的演說家**哈里埃特·罗女士**和**柯普兰**先生代表。

由此可見，沒有一个稍具規模的不列顛无产階級的組織不是直接由它們自己的領袖作为代表参加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員會的。最后，**乔治·波特**主持的英国工联的正式机关报‘蜂房报’，同时也是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員會的正式机关报，它每周都报道总委員

① 看来是指約翰·韦斯顿。——編者注

会會議的情况。

可尊敬的希尔施的发现以及随之而来的德国资产阶级报刊的吹呼，又给‘威塞尔报’的伦敦记者和以△为代号发表文章的‘奥格斯堡女人’²⁵⁶的伦敦记者提供了所希求的食料。这个人——因为两家报纸都是一个人在搞鬼——由于他自己知道得最清楚的原因，住在离伦敦要坐好几个钟头车才能到的偏僻角落。在那里，他从‘泰晤士报’、‘晨星报’和‘星期六评论’²⁵⁷中摘出一些叫人害臊的东西，再照自己读者的口味加点美学味精。有时，譬如说这一次吧，这个人也一再重复德国报纸上的谣言，把它们假造一个日期登在‘威塞尔报’和‘奥格斯堡女人’上。前面提到的‘威塞尔报’和‘奥格斯堡女人’的记者不是别人，正是臭名远扬的文化流氓无产者埃拉尔特·比斯康普。这个倒霉的人早就被赶出了一切像样的团体的门外，经常用酒来治疗那由于普鲁士吞并了他的祖国库尔黑森和他的朋友埃德加尔·鲍威尔²⁵⁸而带给他的心灵上的创伤。”

卡·馬克思写于1868年10月4日

載于1868年10月17日“民主周报”
第42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民主周报”

卡·馬克思
1866年格萊斯頓先生給
英格蘭銀行的信怎樣使俄國得到了
六百萬英鎊的公債²⁵⁹

1866年5月11日格萊斯頓先生的信在下述條件下使1844年銀行法令暫停生效：

(1)最低貼現率應當提高到10%。

(2)如果英格蘭銀行超過銀行券發行的法定限額，則這次超額發行的利潤應當由該銀行轉歸政府。²⁶⁰

於是英格蘭銀行將最低貼現率提高到10%（這就是說，對於普通工商業者來說，最低貼現率被提高到15%和20%），並且不違反1844年法令有關發行銀行券的規定的字面意義。每天晚上，從同英格蘭銀行有聯系的各個營業所和西蒂區的其他主顧那裡把銀行券收集到一起，然後在第二天早晨又把这些銀行券放出去。然而，卻違反了法令的精神，因為遵照政府的那封信就是讓銀行的準備金降到零，而按1844年法令的原意，這筆準備金是銀行掌握的、用來保證其銀行部負債的唯一資產。

因此，格萊斯頓先生的信是通過保持、甚至人為地加強了皮爾法令的最糟糕的結果而使皮爾法令暫停生效的。無論對1857年喬·康·路易斯先生的信，還是對1847年約翰·羅素勳爵的

信²⁶¹，都不能加以類似的責難。

銀行保持 10% 的最低貼現率達三個多月之久。在歐洲，這樣的貼現率被看做危險的徵兆。

接着，在格萊斯頓先生這一着造成了對英國支付能力不信任的極不正常的气氛之後，克拉倫登勳爵，這位巴黎會議上的英雄²⁶²，又出場了，並且在“泰晤士報”上刊登了一封給英國駐大陸各國使館的解釋信。他直截了當地告訴大陸說，**英格蘭銀行沒有破產**（儘管實際上按照 1844 年法令來說，情況正是這樣），但是英國的工商業却在相當程度上破產了。他的信的直接影響不是英國居民向銀行“擠兌”，而是歐洲各國的（索還債款的）索單向英國“擠兌”（當時華金先生在下院正是用了這一說法）。在英國貿易史上這完全是聞所未聞的事。當官定最低貼現率在倫敦是 10%，而在巴黎是 3 1/2% 到 3% 的時候，黃金却由倫敦流向法國。這證明黃金外流不是通常的商業交易。它僅僅是克拉倫登勳爵的信的結果。

當 10% 的最低貼現率這樣持續了三個多月之後，接踵而來的是必然的反作用。最低貼現率由 10% 跳躍式地猛跌到 2%，並且這個 2% 直到最近還仍然是銀行的官定貼現率。然而所有的英國有價證券、鐵路股票、銀行股票、采礦工業股票和各種國內投資已經跌得一錢不值，人人都爭着把它們脫手。甚至統一公債也失掉了信譽（在恐慌期間，有一回銀行會拒絕支付統一公債抵押貸款）。隨後就響起了**貨幣外流**的鐘聲。外國政府的公債在最有利的條件下在倫敦市場上銷售一空。最先到來的是 600 萬英鎊的俄國公債。這筆俄國公債幾個月前還十分可憐地僵在巴黎交易所，而今在倫敦交易所却大走紅運。就在上星期，俄國又發行了 400 萬英鎊的新公債。俄國在 1866 年也曾經和現在（1868 年 11 月 9 日）一

樣，在財政困難的重壓下幾乎一命嗚呼，這種財政困難由於它所經歷的土地改革而帶有十分危險的性質。

但是，皮爾法令向俄國開放英國金融市場，還只是對它的最起碼的效勞。這個法令使英國這個世界上最富的國家完全仰仗於俄國佬的政府的恩惠，而俄國佬的政府卻是所有的歐洲政府中支付能力最差的債務人。

我們假定，俄國政府在 1866 年 5 月初以德國的或希臘的某個私人商號的名義把 100 萬到 150 萬英鎊存入英格蘭銀行的銀行部。這樣，縱令發行部擁有 1 300 萬英鎊以上的黃金，如果俄國政府突如其來地提取這筆款子，也能迫使銀行部立即停止支付。因此，從聖彼得堡拍來的一封電報就可能引起英格蘭銀行的破產。

假使皮爾法令不廢除的話，俄國在 1866 年未能做到的事，也許它在 1876 年就能夠做出來。

卡·馬克思寫於 1868 年 11 月 9 日

原文是英文

載於 1868 年 12 月 2 日“外交評論”
雜誌

俄文譯自“外交評論”雜誌

卡·馬克思
給倫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
教育协会的声明²⁶³

1868年11月23日于倫敦哈佛斯托克
小山梅特兰公园路莫丹那別墅1号

致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秘书卡·施佩耶尔先生

尊敬的朋友：

我得到通知說，协会决定致函德国工人，这样做的动机，据說是在9月26日的柏林代表大会²⁶⁴以后，南德意志和北德意志的德国工人已普遍联合起来”。

鉴于这种情况，我不得不声明退出工人协会。

显然，发出这样的信件的目的，就是表明，或者說是等于表明，倫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公开站在施韦澤和他的組織一边，而反对遍及南德意志大部地区以及北德意志一些地区的紐倫堡代表大会的組織。在德国，大家都知道我是协会的會員——而我确实是它最早的會員之一——，因此，不管我怎样反对，采取这一步驟的責任还是会落在我的身上。

当然，你們一定也会同意：我决不能承担这种責任。

第一，当以李卜克内西、倍倍尔等人为代表的紐倫堡組織和以

施韦澤为代表的柏林組織之間发生爭論的时候，他們双方都向我作过书面申訴。我当时回答道，作为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員會的德国書記，我应当采取**中立态度**。我对他們双方都劝告說，如果他們不能够也不願意溶合为一个整体的話，那就寻求某种途徑和方式，以便和陸地**并肩**为共同的目标工作。

第二，我在給馮·施韦澤先生的回信中，詳盡地向他說明了，为什么我無論是对召集柏林代表大会的方式，或对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章程，都不能表示贊同。²⁶⁵

第三，紐倫堡代表大会直接加入了国际工人协会。但是，汉堡代表大会（柏林代表大会是它的繼續）借口普魯士法律所造成的障碍，只是**間接**加入，即对我們的活动表示同情。而不久以前成立的屬於紐倫堡組織的柏林民主工人联合会²⁶⁶，却不顧这些障碍，公开和正式地加入了国际工人协会。

我重說一遍，在这种情况下，协会的决定使我除了声明退出协会以外，再沒有其他选择的余地了。請劳神将此信內容告知协会。

忠实于您的 卡尔·馬克思

写于1868年11月23日

原文是德文

第一次載于“約·菲·貝克尔、約·狄慈根、弗·恩格斯、卡·馬克思等致弗·阿·左尔格等书信选集”1906年斯图加特版

俄文是按手稿譯的

卡·馬克思

国际工人协会和社会主义 民主同盟²⁶⁷

約一个月以前，一些公民在日内瓦成立了一个名为“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新的国际性团体的中央发起委员会，这个团体宣布“自己的特殊使命是根据偉大的平等原則研究政治問題和哲学問題”，云云。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只是在它12月15日的會議上才得知由該发起委员会印发的綱領和章程。根据这两个文件，上述的“国际同盟完全溶化在国际工人协会中”，但同时又完全成立于該协会之外。

根据发起委员会的章程，除了由日内瓦代表大会、洛桑代表大会和布魯塞尔代表大会选出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之外，在日内瓦还将存在另外一个自己任命自己的中央委员会。除了国际协会的地方組織之外，还将存在国际同盟的地方組織，后者“将通过”活动于国际协会的各个全国局之外的“它們自己的民族局向同盟中央局提出請求加入国际工人协会”；这样，同盟中央委员会就授予自己接納加入国际协会的权利。此外，国际协会的全协会代表大会也将有一个孿生兄弟——国际同盟的全同盟代表大会，因为根据发起委员会的条例，

“在每年一次的工人代表大会期間，作为国际工人协会的一个分部的社

会主义民主同盟的代表团，将在单独的会场内举行自己的公开会议”。

鉴于：

既在国际工人协会之内，又在該协会之外进行活动的第二个国际性組織的存在，必将使协会陷于瓦解；

任何地方的任何别的一伙人都可以仿效日内瓦发起小组的做法，以各种冠冕堂皇的借口把負有别的“特殊使命”的其他国际性协会引到国际工人协会里来；

这样，国际工人协会很快就会变成任何一个种族和民族的阴谋家手中的玩物；

此外，根据国际工人协会章程，許可加入国际的只能是地方性的和全国性的支部（見章程第一条和第六条）；

国际协会的各个支部不得規定同国际协会的共同章程和組織条例相抵触的章程和組織条例（見組織条例²⁶⁸第十二条）；

国际协会的章程和組織条例只能由全协会的代表大会进行修改，但須有出席代表的三分之二贊成修改（見組織条例第十三条）；^①

国际协会总委员会在1868年12月22日的会议上一致决定：

（1）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章程中規定它同国际工人协会关

① 在1868年12月22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討論決議草案时，根据杜邦的建議对決議的引言部分作了如下补充（这些补充显然也是由馬克思最后定稿的）：

“这个問題在布鲁塞尔全协会代表大会一致通过的反对和平同盟的決議中已預先得到解决²⁶⁹；

代表大会在这个決議中声明，和平同盟沒有任何理由存在，因为根据它不久以前发表的声明，其宗旨和原則与国际工人协会的宗旨和原則完全相同；

日内瓦发起小组的某些成員作为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代表曾投票贊成这项決議。”——編者注

系的所有条文一律宣布廢除和无效；

(2) 不接納**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作为一个分部加入**国际工人协会**；

(3) 本決議在有**国际工人协会**組織存在的所有国家里公布。^①

受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委托

1868年12月22日于倫敦

卡·馬克思写

載于小册子“所謂国际內部的分裂”
1872年日内瓦版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手稿譯的, 并根据
各种副本和小册子“所謂国
际內部的分裂”校对过

① 第3点沒有被載入決議的最后定本。——編者注

弗·恩格斯
关于薩克森煤矿工人行业
协会的报告²⁷⁰

随便拿一份这里的**工資条例**，例如下維尔施尼茨公司的工資条例，它都可以向我们表明厄尔士山区煤矿工人的一般状况。成年矿工的每周工資，从 2 塔勒到 3 塔勒 12 銀格罗申 6 分尼；少年矿工則从 1 塔勒 10 銀格罗申到 1 塔勒 20 銀格罗申。矿工平均每周工資約为 2 塔勒 20 銀格罗申。遇有必要，工人必須从事計件劳动。而在制定**工資条例**时已注意到使計件工資不能显著地超过通常的日工資。每一个工人要放棄契約所規定的工作，必須在前一个月，并且要在每月 1 日預先报告。因此，他如果拒絕按照規定的条件从事計件劳动，他仍要被迫繼續工作至少 4 星期至 8 星期。在这种情形下，空談什么根据双方協議調整計件工資，空談什么工人与資本家之間的自由契約，那实在令人可笑！

工資分两次支付：每月 22 日預支一部分；下月 8 日支付上月工資的余額。这样，資本家就把**應該付給自己工人的工資**平均拖欠了整整三个星期——这是雇主得到的一笔强迫借款，由于借錢可以不付利息，这对雇主就更加愜意。

工人換班通常是每 12 小时一次。上面所說的周工資是按六個十二小时工作日計算的。在十二小时的工作日中，包括两小时

(两个半小时和1个整小时)的吃饭时间,或者叫做休息时间。遇有紧急工作,每8小时换班一次(就是说,每个工人在48小时内上班3次),中间有半小时的吃饭时间。有时甚至每6小时换班一次。在最后一场合,“没有规定任何休息时间”。

上面所说的,已经显示出这些矿工状况的一幅阴暗图景。但是要清楚地了解他们所处的真正农奴般的地位,还需要仔细考察一下矿工协会的章程。我们拿下列几家煤矿所实行的章程作例子: I. 著名的实力雄厚的申堡公爵的煤矿; II. 下维尔施尼茨公司的煤矿; III. 下维尔施尼茨—基尔希堡公司的煤矿; IV. 鲁高联合公司的煤矿。

矿工协会的收入包括下列两项:(1)工人缴纳的入会费和会费、罚金和无人领取的工资等等;(2)资本家缴纳的款项。工人缴纳的为其工资的3%或4%,雇主缴纳的,各矿不同:在I矿,每月为每一个缴纳会费的矿工缴7银格罗申6分尼;在II矿,每卖煤1塞费尔^①,缴1分尼;在III矿,在矿工协会储金会成立时缴500塔勒作为第一次缴款,以后缴款与工人一样;在IV矿,与II矿相同,不过每一家参加联合公司的公司需缴100塔勒的创办费。

难道这里资本和劳动之间极其友爱和谐景象不使我们大吃一惊吗?谁还敢胡说什么劳资利益对立呢?然而,正如德国伟大思想家汉泽曼所说的:

“在金钱问题上是没有温情可言的!”²⁷¹

因而,这里就产生一个问题:工人究竟是用怎样的代价来换得这些“高贵矿主”的宽宏大量呢?让我们来看一看吧!

^① 1塞费尔 = 1/3吨。——编者注

資本家先生們只有在一种場合(III 矿)繳款与工人相同,而在其余各种場合都比工人少得多。可是他們却由此要求对协会的儲金享有下列所有权:

在 I 矿,协会儲金的所有权不屬於矿工协会会员,因此,他們除了按照章程規定可以在一定場合下領取補助外,不得对儲金会有更多要求,尤其不能要求解散儲金会和分配其現款,即使在某一企业停工时亦不許可。

“如果申堡公爵在埃耳斯尼茨的煤矿全部停工”,在清償了現有的債務以后,“余款的支配权归公爵——矿主。”

在 II 矿,“如果下維尔施尼茨煤矿公司停办,矿工协会的儲金会应同时宣告結束…… 所余現金的支配权归經理部。”

矿工协会会员对协会的儲金沒有任何所有权。

在 III 矿,与 II 矿相同。

在 IV 矿,“协会的儲金被认为是現有的和将来繼續加入的全体会员的一种不可让渡的財產…… 只有在参加联合公司的所有煤矿完全停办,因而矿工协会亦将随之解散的意外情况下”——在这种意外情况下,也許可以期望工人們将能分到一些剩余的現金了吧。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在这种情况下,“最后停办的联合公司的經理們将向王国地方行政官署提出自己的建議。只有后者可以决定这些款項的命运。”

換句話說,工人向协会儲金会繳納了大部分儲金,而資本家則把这种儲金的所有权攫为己有。看来,似乎是資本家贈送礼品給他們的工人。实际上是工人被迫将礼品奉送給他們的資本家。跟所有权一起,对儲金的管理权自然也落到資本家手中了。

儲金会理事会的主席是煤矿經理。他是儲金会的主管人,他有权处理一切疑難問題,規定罰金数目等等。在他下面,有一个矿

工协会秘书，这个秘书同时兼任出納員。这个人或者是由資本家任命，或者是由工人选举产生，如是选举产生便需由資本家批准。再下面是理事会的普通理事。这些理事通常是由工人选举产生的，但在 III 矿，資本家可指定三个这样的理事。“理事会”究竟是做什麼的，这可以从章程的条文看出来：“它每年至少要开会一次”。实际上是主席支配一切，理事們只不过是給他当助手。

这位主席先生，也就是煤矿經理，在所有其他方面也是一位强有力的主人。他可以縮短工人的試用期限，发給特別补助金，甚至可以开除他认为不順眼的工人（在 III 矿），而且他随时可以向資本家先生申訴，后者对矿工协会一切事务所做的决定都是最后的决定。所以，申堡公爵和股份公司的經理們，可以修改矿工协会的章程，增加工人的会費，减少病人津貼和撫恤金的数額，設立各种新的障碍和手續来阻撓向儲金会申請补助——简单地說，他們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置工人的金錢，只是有一个保留条件，那就是要得到政府当局的批准，而这个政府当局，到目前为止，从来没有表示过哪怕是去了解工人的处境和需要的意願。在 III 矿，經理們甚至有权将任何一个被他們向法院告发、而法院宣判无罪的工人驅逐出矿工协会！

矿工們到底为了些什么福利，竟然讓他們自己的事情这样盲目地听凭他人蛮橫地支配呢？我們看一看吧！

(1)工人在患病时可以得到医疗，每周还可領到补助金：在 I 矿为其工資的 $\frac{1}{3}$ ；在 III 矿为其工資的 $\frac{1}{2}$ ；在 II 矿和 IV 矿亦为工資的 $\frac{1}{2}$ ，如果疾病是由工作中的不幸事故引起的，則相应为工資的 $\frac{2}{3}$ 和 $\frac{3}{4}$ 。(2)殘廢者可以得到撫恤金，数目多少依工龄而定，也就是說，按照他們向协会儲金会繳納会費的多少而有所不同，从

最后所得工資的 $\frac{1}{20}$ 到 $\frac{1}{2}$ 。(3) 在會員死亡时, 死者的妻子可以得到丈夫应得的撫恤金的 $\frac{1}{5}$ 到 $\frac{1}{3}$ 作为补助金, 他的幼儿幼女每周可以得到少許調济。(4) 家屬死亡时可以得到喪葬补助金。

制定了这些章程的圣明的公爵和开明的資本家們, 以及那个批准章程的慈父般的政府, 应当答复这样一个問題: 如果矿工每周平均得到 $2\frac{2}{3}$ 塔勒的全部工資, 尚不免过半饥半飽的生活, 那末, 他們依靠相当于这一工資的 $\frac{1}{20}$ 的撫恤金, 譬如說, 每周 4 銀格罗申, 又怎么能够活下去呢?

章程对于資本的利益照顾得无微不至, 这在处理矿井的不幸事故上表現得十分明显。除开 II 矿与 IV 矿, 在其他各矿, 即使疾病或死亡是由于“执行任务”时发生不幸事故引起的, 也不发給任何特別的补助金。如果由于矿井中发生不幸事故而成为殘廢, 無論哪一个章程也都沒有規定要增加撫恤金。原因很簡單。这一項会大大增加儲金会的支出, 并且会很快让那些最近視的人也能看得出資本家先生的礼品的实质。

薩克森資本家欽定的章程跟路易·波拿巴欽定的宪法不同之点在于, 后者还有待于最后加冕, 而前者已經十分完备, 所有章程都有这样一項共同的条文:

“每一个离职的工人不論是自願离职还是被迫离职, 那他同时也就脫离了矿工协会, 并且失去了他对协会儲金会以及他向儲金会交納的現金的一切权利。”

因此, 一个人, 即使他在某一煤矿工作了三十年, 并向协会儲金会按期繳納了会費, 只要資本家任意把他解雇, 那他就失去了用如此昂貴的代价所換得的領取撫恤金的一切权利! 这一条文将雇佣工人变成了农奴, 把他束縛在一个地方, 使他备受虐待。如果他

不喜欢受人家拳打脚踢，如果他反对把他的工资降低到饥饿的水平，如果他拒绝缴纳任意决定的罚款，如果他敢于要求公家检验尺碼和磅秤，那他都会照例得到同样的回答：滚你的蛋吧，不过你向儲金会缴纳的会費和所享有的权利可不会跟你走！

对于处于如此卑賤的地位的人，如果还期待他們表现出堂堂大丈夫的独立气概和自尊心，那似乎是一件怪事。可是，这些矿工却光荣地站在德意志工人阶级先进战士的行列里。因此，他們的雇主开始感到有些不安了，尽管目前的矿工协会这个組織是他們的巨大支柱。矿工协会章程当中一个最新的，也是最卑鄙的章程（1862年III矿制定的章程），对于罢工和結社規定了如下駭人听闻的附带条件：

“每一个矿工协会的会员，对于依据工资条例給他規定的工资，应当永远滿意，任何时候都不得参加集体行动，要求提高工资，更不用说煽动自己的同伴这样做。”

为什么下維尔施尼茨—基尔希堡煤矿股份公司的萊喀古士立法者們 B. 克吕格尔、F. W. 施瓦姆克魯格和 F. W. 李希特尔諸先生不索性規定，从現在起，每一个煤炭购买者“应当永远滿意于”他們欽定的煤炭价格呢？这的确是馮·罗霍夫先生的“有限的臣民智慧”所难以理解的了。²⁷²

由于在矿工中間进行鼓动的結果，不久以前公布了一个旨在把所有薩克森煤矿矿工协会联合起来的临时章程草案（1869年茨威考版）。它是在 J. G. 丁特尔先生主持下的一个工人委员会拟定的。草案的主要内容如下：（1）把所有协会联合成一个总联合会；（2）会员只要在德国居住并缴纳会費，就保有自己的权利；（3）全体成年会员大会为最高权力机关，它选举执行委员会，等等；（4）

雇主向协会儲金会繳納的款項应为工人繳納的半数。

这个草案并不代表最觉悟的薩克森矿工的观点。它倒不如說是想在資本家的許可下进行改良的那一部分人的主張。草案还含有不切实际的地方。的确，以为一向对矿工协会拥有无限权力的資本家会把自己的权力让給民主的工人全体大会，而同时还要繳納款項，这是多么天真的想法呵！

最糟糕的正是在于資本家一般都繳納款項。只要这种情形繼續下去，就无法从他們那里夺回对儲金会和矿工协会的支配权。矿工协会要成为真正的工人团体，它就应当依靠純粹是由工人繳納的会費。只有这样，它才能够成为保护各个工人不受各个雇主的任意摆布的工会。資本家繳納的款項只能提供微不足道的而且是大可怀疑的好处，工人却因而被資本家拋入农奴般的境地，这是不是合算呢？薩克森矿工要永远記住：資本家向协会儲金会繳納多少錢，他們就会在工資上省下同样多的以至更多的錢。这样一种联合会具有一种独特的作用，那就是，它們能够使供求規律完全为了資本家的利益而停止发生作用。換句話說：它們能够使資本家对单个的工人具有異乎寻常的权力，从而就能把工資降低到通常的平均水平以下。

但是，工人是不是要把現有的儲金——当然是在既得权利得到滿足之后——奉送給資本家呢？这个問題只有通过法律手續才能解决。虽然这些章程得到了王国官厅的批准，但是章程中的一些条文却严重違反了民事契約法的一般通用的原則。然而，在任何情况下，把工人的金錢与資本家的金錢分开，却是矿工协会进行任何改革所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

薩克森煤矿矿主向协会儲金会繳納款項，这說明他們无意之

中承认：資本对于雇佣工人在工作时遭到造成殘廢或死亡的一切不幸事故負有一定的責任。但是工人們不应当像現在所发生的情形那样，让这种責任成为扩大資本的专横权力的一种借口，而应当爭取把这种責任在法律上明文規定下来。

弗·恩格斯写于1869年2月17日
和21日之間

載于1869年3月20日“民主周报”
第12号附刊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德文“民主周报”

卡·馬克思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致
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中央局²⁷³

1869年3月9日于倫敦

公民們！

根据我們的章程第一条，国际工人协会接受

“追求共同目标即追求工人階級的保护、发展和彻底解放的一切工人团体”。

由于每个国家工人階級的各种队伍和不同国家的工人階級所处的发展条件极不相同，它們目前所达到的发展阶段也不一样，因此它們反映实际运动的理論观点也必然各不相同。

但是，国际工人协会所确定的行动一致，由各个全国性支部的机关报刊所促进的思想交流，以及在全协会代表大会上进行的直接的討論，应当逐步导致一个共同的理論綱領的形成。

因此，批判地审查同盟的綱領并不屬於总委员会的职权范围。研究这个綱領是不是如实地反映了无产阶级运动并不是我們的任务。对于我們來說，重要的只是要了解，它同我們协会的总的方向即工人階級彻底解放有沒有什么相抵触的地方。

在你們的綱領中，有一句話是不符合这个要求的。你們綱領的第二条写道：

“它〈同盟〉首先力求实现各階級在政治、經濟和社会方面的平等。”274

各階級的平等，照字面上理解，就是資產階級社会主义者所拚命鼓吹的“資本和劳动的协调”。不是各階級的平等——这是謬論，实际上是做不到的——相反地是消灭階級，这才是无产階級运动的真正秘密，也是国际工人协会的偉大目标。

但是，如果看一下“各階級的平等”这句话的上下文，那末这个地方似乎純粹是一个被忽略的笔誤，总委员会相信，你們不会拒絕从你們的綱領中删去这个可能引起如此危险的誤解的詞句的。

我們协会根据自己的原則允許每个支部在不違背协会的总方向的情况下自由制定它的理論綱領。因此，沒有任何障碍会阻擋同盟各支部变成国际工人协会的支部。

如果解散同盟以及同盟各支部加入国际工人协会的問題最后决定了，那末，根据我們的条例，必須把每一个新支部的所在地及其人数通知总委员会。

受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委托

卡·馬克思写于1869年3月9日

第一次載于小册子“所謂国际內部的分裂”1872年日内瓦版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手稿譯的

卡·馬克思 比利时的屠杀²⁷⁵

致欧洲和美国工人

在英国，难得有一个星期沒有罢工，而且是規模很大的罢工。如果政府在这种場合唆使它的士兵去屠杀工人阶级，这个罢工之国就会变成屠杀之国；但是不会很长久。因为这个政府在經過几次这样的采用暴力之后，就不会再繼續存在了。在美国，最近几年罢工的次数也越来越多，罢工的規模也越来越大，有时甚至伴随着騷乱。但是並沒有流血。在欧洲大陆的几个武力强盛的国家里，罢工的紀元可以說是在美国內战結束时开始的。可是在这里也沒有流血。在文明世界里只有一个国家，在那里每一次罢工都馬上被人迫不及待地变成公开屠杀工人阶级的借口。这一片乐土就是比利时——这个大陆上的典范的立宪国家，这个与世严密隔絕的地主、資本家和神甫的舒适小天堂。比利时政府每年都要制造屠杀工人的惨案，其准确性并不比地球每年都要环繞太阳公轉一次的准确性逊色。今年的屠杀不同于去年²⁷⁶的地方只在于：受害者的人数更加駭人听闻，在其他方面令人发笑的軍队的殘忍更加令人发指，教权派和資本家的报刊更加拍手叫好，官方屠夫們提出的借口更加荒謬无耻。

現在，連資本家的报刊无意中透露的证据也证明了：塞兰考

克利尔铁工厂的攪铁工人所举行的完全合法的罢工之所以轉为騷动，只是因为大队的騎兵和宪兵突然被派到出事地点，激怒了人民。从4月9日到12日，这批勇气十足的軍人不仅勇猛地用馬刀和刺刀攻击手无寸铁的工人，而且不分青紅皂白地打死打伤和平的行人，强行闖入私人住宅，甚至一再对旅客构筑了防柵的塞兰車站大楼发起瘋狂的突襲，以此来互相取乐。当这些恐怖的日子过去以后，傳开一种流言，說塞兰市长康普先生是考克利尔股份公司的代理人，說比利时內务大臣、一个叫做皮尔美先生的，同时又是邻近一家矿場的大股东，而那个矿場也发生了罢工，还說弗兰德亲王殿下在考克利尔的企业里投資了150万法郎。²⁷⁷ 由此人們就做出了一个欠考虑的、十分奇怪的結論，仿佛塞兰屠杀是股份公司的某种 coup d'état [政变]，而考克利尔公司和比利时內务大臣秘密安排的这一政变仅仅是为了吓唬一下它的心怀不滿的臣民。但是，这种謠傳很快就被接着在博里納日煤矿区发生的事件輕而易举地駁倒了，比利时的內务大臣，即上面提到的皮尔美先生，看来并不是这里的一个大資本家。当这一矿区所有的矿工几乎都卷入了罢工的时候，那里集中了人数很多的軍隊，他們在弗腊默里以火枪射击开始了軍事行动；結果9名矿工被打死，20名矿工受重伤；在这段短短的開場白之后就宣布了騷乱治罪法，——法文十分独特地叫做 «les sommations préalables»²⁷⁸ ——然后又开始了屠杀。

有一些政治家用高尚的爱国主义的动机来解釋这些不可思議的功勛。他們說，正当同自己的邻邦法国就若干微妙的問題进行談判²⁷⁹ 的时候，比利时政府应当显示它的軍隊的英雄气概。于是完全按照科学的規則配置了武装力量：起初是在塞兰显示比利时

騎兵的迅雷不及掩耳的神速行动，后来又在弗腊默里显示比利时步兵的不可摧毀的威力。为了使外国人害怕起見，还能找到比这种无需耽心吃敗仗的輕而易举的战斗更可靠的办法嗎？还能找到比本国的戰場更妥当的地方嗎？在那里，成百个被打死、打伤和被捕的工人使那些沒有受到任何伤害的无敌軍人得到了多么輝煌的荣誉呵！

另一些政治家正相反，他們怀疑，比利时的內閣大臣全被土伊勒里宮收买了，說他們周期地演出这种可怕的內战丑剧为的是使路易·波拿巴得到一个借口，好使他成为比利时的社会救主，正如他是法国的社会救主一样。但是，难道有誰在什么时候譴責过在牙买加島屠杀黑人的前任总督埃尔，說他图謀使这个島脱离英国而把它轉到美国手里去嗎？²⁸⁰无可爭辯，比利时的內閣大臣們是同埃尔一样的杰出的爱国者。正如埃尔是西印度种植場主的恬不知耻的工具一样，他們是比利时資本家的恬不知耻的工具。

比利时的資本家由于对他所謂的**劳动自由**(la liberté du travail)的偏爱而名揚全球。他是那样热爱赋予他的工人(不論其性別和年齡)的为他工作一辈子的自由，因而总是忿懣地把一切工厂法都当作破坏这种自由的东西給頂了回去。当他想到一个普通工人是如此缺乏道德，竟然要追求比使自己主人、天然的支配者发財致富的天职更崇高的天职时，他是不寒而栗的。他不仅要他的工人仍然是一个为了微不足道的工資而过度工作的可怜的奴隶，他也同所有的奴隶主一样，要进一步把他的工人变成阿諛奉承、奴顏婢膝、服服貼貼、老老实实、恭恭敬敬俯首听命的奴隶。他对罢工的瘋狂仇恨就是从这里来的。在他看来，罢工是瀆神的行为，是奴隶的暴动，是社会浩劫的預兆。如果像在比利时那样，把政权交給

那些由于胆小如鼠而凶殘狠毒的人們去掌握，完全听任他們独断独行而毫不加以监督，那你們就不要奇怪：在这样的国家里，馬刀、刺刀和火枪都会用来作为降低工資、提高利潤的合法的、正常的工具。說实在的，比利时的軍队还能为什么別的目的服务呢？当按照正統欧洲的命令宣布比利时为**中立国**²⁸¹的时候，不言而喻，應該禁止它拥有像軍队那样造成沉重負擔的奢侈品，也許为了补充宮廷警卫和为国王举行娱乐式的閱兵典礼，可以保留少数的士兵。但是，領土只有 536 平方里約^①的比利时却拥有一支比联合王国或合众国的軍队人数更多的軍队。于是这支中立化的軍队的战績就注定要以它对工人阶级所发动的**强盜式的襲击**的次数来衡量了。

国际工人协会在比利时不是受欢迎的客人，这是容易理解的。它受神甫們咒罵，被可敬的报刊恣意誹謗，很快就同政府展开了斗争。政府想尽办法要赶走协会，把 1867—1868 年沙勒罗瓦煤矿工人罢工的责任加到协会的头上，而这次罢工按照比利时的一成不变的慣例，又是以公开的屠杀告終，接着就是对受害者进行法律上的迫害。这个阴谋不仅沒有得逞，而且由于协会采取了一些积极步骤，使得沙勒罗瓦的矿工被宣告**无罪**，被宣告**有罪**的倒是政府本身。被这次失败惹得老羞成怒的比利时內閣大臣們，在下院讲坛上暴跳如雷地非难**国际工人协会**以解其心中之恨，他們神气十足地宣称，任何时候都不允許协会在布魯塞尔召开**代表大会**。尽管他們这样恫吓，代表大会还是在布魯塞尔举行了。可是現在，**国际**最后还是注定要败于这个有 536 平方里約的万能的比利时。

① 一里約等于四公里半。——譯者注

它在最近发生的事件中的同謀罪行被认为证据确凿。比利时布魯塞尔中央委员会的特使和某些地方委员会的委员被揭发参与多起严重犯罪事件。首先，他们极力使激动的罢工工人冷静下来，并警告他们不要中了政府的圈套。在若干地区，他们确实防止了流血。最后的（当然不是按重要性来说）一次流血，这些图謀不軌的特使竟到出事地点进行调查，通过目击者的供述核实了、仔细记录了，并且公开揭露了秩序的维护者们的血腥暴行。于是，靠监禁这个简单的办法，他们马上由原告变成了被告。接着，布魯塞尔委员会委员们的住宅遭到粗暴的袭击，他们的文件全部被没收，有些委员被逮捕，罪名是：他们属于“目的在于侵犯私人的生命和财产”的协会。换句话说，他们被控属于某个名叫国际工人协会的薩格²⁸²帮会。为教权派报刊的荒謬謾言和资本家报刊的瘋狂号叫所纵恣，这个厚顏无耻的侏儒政府刚从血海中沐浴出来，就又不顾一切地钻进嘲笑的泥潭中了。

布魯塞尔的比利时中央委员会已经声明打算对塞兰屠杀和博里納日屠杀进行彻底的调查，然后把调查结果公布出来。我们也打算把这些揭发传播到全世界，好让大家睁开眼睛看看比利时资本家的驕傲自大，他们惯用的格言是：La liberté, pour faire le tour du monde, n'a pas besoin de passer par ici (la Belgique)——如果自由想走遍全世界，它用不着经过比利时²⁸³。

也许比利时政府以为，假如它现在卖力地扮演资本反对劳动的宪兵这一角色，它就能再次逃脱迫在眉睫的危险，正如它曾由于充当欧洲大陆一切反动政府的警探而使自己在1848—1849年革命之后获得一个喘息时期一样。但是，这一次却大錯特錯了。比利时政府不但不能把灾难推迟，反而只能加速它的到来。它既然

已經把比利时的名字变成一个普通名詞和全世界人民群众的笑柄，那它就会消除掉那仍然阻碍着暴君們从欧洲地图上抹去这个国家的名称的最后一道障碍。

因此，为了減輕比利时受难者的妻儿的痛苦，为了补偿在法庭上为被捕工人进行辯护以及布魯塞尔委员会着手进行的調查方面的开支，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号召欧洲和美国的工人发起募捐。

受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委托：

执行主席 罗·阿普耳加思；美国書記 罗·肖；
比利时書記 貝尔納；法国書記 欧仁·杜邦；德
国書記 卡尔·馬克思；意大利書記 茹尔·若昂
納尔；波兰書記 安·扎比茨基；瑞士書記 海·
荣克；财务委員 考威尔·斯特普尼；
总委员会書記 約·格·埃卡留斯

1869年5月4日于倫敦

捐給比利时历次屠杀的受难者的所有捐款应寄总委员会，地址如下：倫敦西中央区海-霍耳博恩街 256 号。

卡·馬克思写

1869年5月印成傳单“比利时的屠杀。致欧洲和美国工人”，并載于1869年5月15日“国际报”第18号和1869年5月22日“民主周报”第21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傳单“比利时的屠杀。致欧洲和美国工人”譯的

卡·馬克思

致合众国全国劳工同盟的公开信²⁸⁴

工人朋友們！

在我們的协会的成立宣言里我們說过：“使西欧避免了为在大西洋彼岸永远保持和推广奴隶制进行可耻的十字軍征討冒險的，并不是統治階級的智慧，而是英国工人階級对于他們那种罪恶的愚蠢行为所进行的英勇反抗。”^① 現在輪到你們来阻止战争了，因为这个战争的直接結果将使大西洋两岸正在兴起的工人运动倒退若干年。

也許用不着向你們說明：有一些欧洲强国，它們正迫不及待地想挑起美国对英国的战争。看一下商业統計的数字，我們就会相信：直到国内战争使天秤两端的比重发生变化的时候，俄国原料的出口（俄国再沒有別的东西可以出口）都是竞争不过美国的。把美国的犁鏵改鑄成刀劍，在目前恰恰意味着使一个被你們的賢明共和党大政治家們选为心腹顧問的专制强国免遭迫在眉睫的破产。但是，即使不談对这个或那个政府有什么特殊利益，难道用一場战争来破坏迅速扩展着的国际合作运动，不正是为了我們的压迫者的普遍利益嗎？

^① 見本卷第 14 頁。——編者注

我們在林肯先生再度当选总统时給他的賀信中表示过，我們确信，美国的国内战争对于工人阶级的发展，同美国独立战争对于资产阶级的發展，具有同样巨大的意义。^①的确，反对奴隶占有制的战争的胜利結束已在工人阶级的历史上开创了一个新时代。从这个时候起，美国也产生了独立的工人运动，旧党派及其职业政客都对它冷眼相看。但是，要使这个运动产生效果，还需要多年的和平；而要扑灭这个运动，美国 and 英国之间的战争則是最可靠的办法。

国内战争的直接的可以触及到的結果，当然是美国工人境况的恶化。不論在美国或欧洲，国債的重担总是被一手轉一手，最后压到工人阶级的肩上。你們的一位国家活动家說，从1860年以来，日用必需品的价格上涨了78%，而非熟练工人的工資只提高了50%，熟练工人的工資只提高了60%。

他抱怨道：“目前在美国，赤貧比人口增长得更快。”

况且，工人阶级的苦难同金融貴族、暴发戶貴族²⁸⁵和其他因战争而出現的寄生虫的穷奢极欲形成鮮明的对比。但是無論如何，国内战争总还有好的結果，那就是奴隶的解放以及因此而對你們本身的阶级运动所起的刺激作用。可是，沒有崇高目的和社会需要的、跟旧世界历次战争一样的另一次战争，其結果将不是粉碎奴隶的鎖鏈，而是为自由的工人鍛造新的鐐铐。新战争所带来的貧困的增长，馬上会給你們的資本家找到借口和手段，好用常备軍的无情的刀劍来迫使工人阶级放棄他們勇敢的和正义的願望。

因此，一个光荣的任务落在你們的肩上，那就是要向世界证明：現在，工人阶级終于不再作为一个馴服的追随者，而是作为一

^① 見本卷第21頁。——編者注

支独立的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他們已經意識到自己的責任，并能在他們的所謂的主人們叫嚷战争的地方卫护和平。

代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

英国人：罗·阿普耳加思，木工；馬·詹·布恩，机械工；詹·巴克莱，彩画匠；約·黑尔斯，彈性紡織品織工；哈里埃特·罗；本·魯克拉夫特，細木工；乔·米尔納，裁縫；乔·奥哲尔，鞋匠；J. 罗斯，鞋匠；罗·肖，彩画匠；考威尔·斯特普尼；J. 沃倫，皮箱匠；約·韦斯頓，制造扶手的技师

法国人：欧·杜邦，乐器工；茹尔·若昂納尔，石印工人；保尔·拉法格

德国人：格·埃卡留斯，裁縫；弗·列斯納，裁縫；W. 利姆堡，鞋匠；卡尔·馬克思

瑞士人：海·荣克，钟表匠；安·弥勒，钟表匠

比利时人：P. 貝尔納，彩画匠

丹麦人：詹·柯恩，雪茄烟工人

波兰人：扎比茨基，排字工人

执行主席 本·魯克拉夫特

财务委員 考威尔·斯特普尼

总书記 約·格奥尔格·埃卡留斯

1869年5月12日于倫敦

卡·馬克思写

1869年在倫敦印成傳单“致合众国全国劳工同盟的公开信”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傳单“致合众国全国劳工同盟的公开信”譯的

卡·馬克思
“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
第二版序言²⁸⁶

我的不幸早逝的朋友約瑟夫·魏德迈^①，曾打算从1852年1月1日起在紐約出版一个政治周刊。他曾請求我給这个刊物写一篇 coup d'état〔政变〕史。根据这个請求，我直到2月中为止每周都为他撰写論文，总标题是“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这时，魏德迈原来的計劃遭到了失敗。但他在1852年春季却开始出版名为“革命”的月刊，月刊第一期的內容就是我的“霧月十八日”。²⁸⁷这一著作有数百份那时已深入德国境内，不过沒有在真正的书籍市場上出售过。当我向一个自命极端激进的德国书商建議銷售我这本书的时候，他带着真正的道义上的恐惧拒絕了这种“不合时宜的企图”。

从上述事实中就可看出，本书是根据对于事变的直接观感写成的，其中所研究的历史材料只是截至1852年2月止。現在把它再版发行，一方面是由于书籍市場上的需求，另一方面是由于我那些在德国的朋友們的坚持。

在与我这部著作差不多同时出現的、論述同一問題的著作中，

① 魏德迈在美国内战时期担任过圣路易斯区軍事长官职务。

值得注意的只有两部：維克多·雨果著的“小拿破侖”和蒲魯东著的“政变”²⁸⁸。

維克多·雨果只是对政变的負責发动人作了一些尖刻的和俏皮的攻击。事变本身在他笔下却被描繪成了晴天的霹靂。他认为这个事变只是一个人的暴力行为。他没有觉察到，当他說这个人表现了世界历史上空前强大的个人主动作用时，他就不是把这个人写成小人而是写成偉人了。蒲魯东呢，他想把政变描述成以往历史发展的結果。但是，他对这次政变所作的历史的說明，却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对政变主人公所作的历史的辯护。这样，他就陷入了我們的那些所謂客观历史家所犯的錯誤。相反，我則是說明法国階級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条件和局势，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

现在如果对本书加以修改，就会使它失掉自己的特色。因此，我只限于改正勘誤，并去掉那些現在已經是不能理解的暗語。

我这部著作的結語：“但是，如果皇袍終於落在路易·波拿巴身上，拿破侖的銅像就将从旺多姆圓柱頂上被推下来”²⁸⁹——这句话已經實現了。

沙尔腊斯上校在他論 1815 年远征的著作²⁹⁰中，开始了对崇拜拿破侖偶像的攻击。从那时起，特別是在最近几年中，法国的出版物借助历史研究、批評、諷刺和談諧等等武器彻底打破了关于拿破侖的奇談。在法国境外，这个一反傳統的民众信仰的激烈轉变，这个巨大的精神革命，很少使人注意，更不大为人所理解。

最后，我希望，我这部著作对于清除那种流行的——特別是現今在德国流行的——关于所謂凱撒主义的书生用語，将会有所帮助。在作这种肤淺的历史对比时，人們忘記了最主要的一点，即在

古代的羅馬，階級鬥爭只是在享有特權的少數人內部進行，只是在自由富人与自由窮人之間進行，而從事生產的廣大民眾，即奴隸，則不過為這些鬥士充當消極的舞台台柱。人們忘記了西斯蒙第所說的一句中肯的評語：羅馬的無產階級依靠社會過活，現代社會則依靠無產階級過活²⁹¹。由於古代階級鬥爭同現代階級鬥爭在物質經濟條件方面有這樣的根本區別，在由這種鬥爭所產生的政治人物之間，也就不能比坎特伯雷大主教與祭司長撒母耳之間有更多的共同點了。

卡爾·馬克思

1869年6月23日於倫敦

載于卡·馬克思“路易·波拿巴
的霧月十八日”1869年7月漢堡
第2版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1869年版本譯的

弗·恩格斯 卡尔·馬克思²⁹²

在德国，人們曾經习惯于把斐迪南·拉薩尔看做是德国工人运动的創始人。可是，再沒有比这种看法更錯誤的了。如果說六七年前，在所有工厂区，在所有大城市和工人居民中心，无产階級成群結队地圍聚在他的身边，如果說他的旅行往往成为連君主們也会羨慕不已的凱旅游行，——那末，这难道不是由于早先已經不声不响地准备好了使果实能够如此迅速地成熟的土壤嗎？如果說工人們兴高采烈地欢迎他所讲的話，那末，这是因为他的話是他們聞所未聞的呢，还是因为这些話是觉悟的工人們早已多少听到过的呢？

現在的这一代人，生活忙碌而且健忘。在1848年革命中达到頂点、又随着1849—1852年的反动而宣告結束的四十年代的运动，已經連同它的政治的和社会主义的文献一起被遺忘了。因此就有必要提醒一下：在1848年革命之前以及在革命期間，在工人当中，特別是在德国西部，曾經有过一个組織得很好的社会主义政党²⁹³，它虽然在科倫共产党人案件之后已經瓦解，可是它的各个单独的成員仍然繼續不声不响地准备着那后来为拉薩尔所利用的土壤。此外，还有必要提醒一下：曾經有过这样一个人，他除了把組織这个政党作为自己的終生事业，还把对所謂社会問題的科學

研究，即对政治經濟学的批判作为自己的終生事业；他还在1860年以前就已经发表了自己重要的研究成果²⁹⁴。拉薩尔具有非凡的才能和淵博的学識，这是一个精力充沛而且簡直是无限灵活[Versatilität]的人；他可以說生来就是为了在一切場合扮演政治角色。但是，他既不是德国工人运动的第一个倡导者，也不是有独创見解的思想家。他的著作的全部內容都是抄襲来的，而且在抄襲时还作了歪曲；他有一个先驅者，一个在智力上远远超过他的人，他一面把这个人的著作庸俗化，同时却对这个人的存在只字不提；这个人的名字就是卡尔·馬克思。

卡尔·馬克思于1818年5月5日生于特利尔，他在这里讀完了中学。他先后在波恩和柏林研究法学，不过在柏林他很快就把自己的注意力从研究法学轉向了研究哲学。在这个“理性之都”住了五年之后，他于1841年回到波恩，打算在那里的大学里任教。当时，普魯士正处于第一个“新紀元”²⁹⁵。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声明，他欢迎能提出适当主張的反对派，因此在有些地方就有人試圖組織这样的反对派。这样，在科倫就創辦了“萊茵报”。在这个报纸上，馬克思以当时罕見的胆量著文批評萊茵省議会的辯論，这些文章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²⁹⁶。1842年年底，馬克思負責編輯“萊茵报”；他使书报檢查机关大为苦恼，因而不得不給他以特殊的荣幸——从柏林給“萊茵报”派来一个專門的檢查官。当这样做也无济于事的时候，又給該报規定了双重的檢查，即它每出一号，除普通檢查之外，还要呈交科倫行政区长官进行复查。但是，这个办法也还是絲毫无助于制止“萊茵报”的“根深蒂固的恶念”，于是內閣就在1843年初勒令“萊茵报”于第一季度末停刊。当时，报纸的股東們曾經試圖謀求和解，因此馬克思立即辞去了編輯职务，但这

也沒有收到任何效果，報紙最后还是停刊了。

对萊茵省議會辯論的批評，迫使馬克思着手研究有关物质利益的問題，在这方面他获得了一些無論法学或哲学都不曾提供的新观点。馬克思从黑格尔的法哲学出发，得出这样一种見解：要获得理解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鎖钥，不应当到被黑格尔描繪成“大厦之頂”的国家中去寻找，而应当到黑格尔所那样蔑視的“市民社会”中去寻找。但关于市民社会的科学，也就是政治經濟学，而当时要切实地研究这門科学，在德国是不可能的，只有在英国或法国才有可能。

馬克思在同特利尔樞密顧問馮·威斯特华倫的女儿（后来的普魯士內务大臣馮·威斯特华倫的妹妹）結婚之后，于1843年夏迁居巴黎。在巴黎，馬克思主要致力于政治經濟学和法国大革命历史的研究。同时，他和卢格一起开始出版“德法年鉴”杂志²⁹⁷，但該杂志只出版一期即告停刊。1845年，馬克思被基佐驅逐出法国而移居布魯塞尔，在那里他繼續研究上述的問題，直到二月革命爆发。他对当时流行的那种即使是在形式上力求具有科学性的社会主义也极不贊同，这一点可以从他对蒲魯东的长篇著作“貧困的哲学”的批判，即1847年在布魯塞尔和巴黎发表的“哲学的貧困”²⁹⁸一书得到证明。在这部著作中已經包含了他的在目前得到詳尽發揮的理論的許多重要原理。二月革命前写成并由在倫敦召开的工人代表大会通过的“共产党宣言”（1848年在倫敦出版），基本上也是他的著作²⁹⁹。

接着，馬克思又被对二月革命深感恐慌的比利时政府驅逐出境，在这之后，馬克思应法国临时政府的邀請重新回到巴黎。汹涌的革命浪潮使一切科学研究工作都退居次要地位；当时必須积极

投身到运动中去。在最初那些动荡的日子里，馬克思同一批要在法国組織德国工人志願队以便把德国变成共和国的鼓动家的荒謬企图进行了斗争，然后，他就和一些朋友一起出发到科倫去，并在那里創辦了“新萊茵报”³⁰⁰；該报一直存在到1849年6月，在萊茵省，人們现在还深深地銘記着它。也許，在別的任何地方，都沒有能够像这家在普魯士的一个堡垒的中心出版的报纸这样成功地利用了1848年的出版自由。政府企图通过向法院起訴的办法迫使“新萊茵报”停刊而未能得逞——馬克思曾經两次被控違反出版法和煽动抗稅而被陪审法庭傳訊，但他两次都被宣判无罪。此后，“新萊茵报”在1849年五月起义时期终于被迫停刊了，政府这次采取的手段是借口馬克思已經丧失了普魯士的国籍而将他驅逐出德国，并且用类似的借口把其余的編輯也驅逐出境。因此，馬克思只得再次回到巴黎，但在那里他又遭到驅逐，而于1849年夏迁到了他現在的住处倫敦。

当时大陆各国流亡者的所有 *fine fleur* [精华] 都聚集在倫敦。在这里建立了各种各样的革命委员会、联合会、*in partibus infidelium* [非现实的，在異国的]^① 临时政府，发生了种种的爭执和糾紛。当时曾参与其事的各位先生們，現在回想起这个时期，想必会把它看做是一生中最不幸的时期。而馬克思却始終沒有参与所有这些阴谋傾軋。他曾經在一段时期內以評論性月刊形式繼續出版“新萊茵报”(1850年在汉堡出版)³⁰¹，此后，他就独自埋头于英国博物館，着手对收藏在它那龐大的、大部分藏书尚未为人所知的圖書館中的国民經济学著作进行研究。同时，他还定期向“紐

① 直譯是：“不信教国家中的”。天主教主教被任命为非基督教国家的純粹名义上的主教时，其头衔上添有这种字样。——編者注

約論壇报”³⁰² 投寄通訊稿；一直到美国內战爆发之前，馬克思可以說是这个最好的英美报纸的欧洲政治問題方面的編輯。

十二月二日政变促使馬克思写成一本小册子“**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2年在紐約出版）；現在該书剛好出版了新的版本（在漢堡，由迈斯納发行），它将大大有助于我們了解这个波拿巴現在所处的搖搖欲墜的地位。正是在这本书里，这位政变英雄被不加修飾地按他的本来面目加以描繪，而沒有带上他那瞬間的成功使他享有的虛榮。有一种庸人把自己的拿破侖第三看成是当代最偉大的人物，因而不能理解为何这位非凡的天才竟会出人意外地連遭失敗，屢犯政治錯誤，——这种庸人讀一讀馬克思的这一著作就会明白了。

虽然在居住倫敦的整个期間馬克思都不想引起別人对他的注意，然而卡尔·福格特却迫使他在1859年意大利战争以后投入一場論战，为此他写了“福格特先生”一书（1860年在倫敦出版）³⁰³，从而結束了這場論战。与此同时，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学研究的第一个成果——“政治經濟学批判”的第一分册于1859年在柏林出版。这一分册仅包含貨幣理論，但是馬克思用完全新的观点作了論述；續篇之所以暫時未能出版，是因为作者当时发现了許多新的材料，认为有必要进一步加以研究。

最后，1867年終於在漢堡出版了“**資本論。政治經濟学批判**”第一卷。这部著作是整个一生科学研究的成果。它是工人階級政治經濟学的科学表述。这里所涉及的^①不是鼓动性的詞句，而是严密的科学結論。任何人，不管他对社会主义采取什么态度，都不

① 手稿中“涉及的”之后还有“不是政治宣傳”。——編者注

能不承认，社会主义在这里第一次得到科学的论述，而且正是德国终于有机会也在这方面作出这种贡献。现在谁还要想同社会主义作斗争，那他就必须对付马克思；而假如他能够做到这一点，那自然也就无需再提到 *dii minorum gentium* ① 了。

马克思这本书从另一方面看也是值得注意的。它是第一部全面而透彻地描绘了以在英国所具有的那种古典形式存在于劳资之间的实际关系的著作。议会的调查对此提供了有关几乎所有工业部门的工人状况，有关女工和童工劳动，有关夜班工作等等的丰富资料，这些资料所涉及的时间差不多有四十年之久，而且即使在英国也很少有人知道³⁰⁴；这一切在这本书里才第一次为读者所了解。其次，该书叙述了英国工厂法的历史，——从1802年的第一个法令这一微小的开端起，到现在几乎在工厂工业和家庭工业的一切部门都对工作时间作了限制：女工及未满18岁的少年工人每星期工作不得超过60小时，未满13岁的童工每星期工作不得超过39小时。从这方面来看，马克思的这本书将会引起所有与工业有关的人的极大兴趣。

多年以来，马克思无疑是受诽谤最多的一位德国著作家；而谁都不会否认，马克思勇敢地进行了斗争，他的所有打击都能准确地命中目标。但是，他如此“耗费精力”去进行的论战，对他来说，本质上毕竟只是一种被迫采取的自卫行动。而实际上，他所始终感到兴趣的，归根到底还是他二十五年中以无比的严肃认真的态度进行研究和探讨的科学；这种极其严肃认真的态度，使他在自己对自己的结论在形式和内容上尚未满意之前，在自己尚未确信已经

① 直译是：“小神”；转意是：“二流人物”。——编者注

沒有一本书他未曾讀过,沒有一个反对意見未被他考虑过,每一个問題他都完全解釋清楚之前,決不以系統的形式发表自己的結論。在我們这个模仿者的时代,有独創見解的思想家实在太少了;因此,如果有这样一个人,他不仅是有独創見解的思想家,而且在他的領域里具有无比淵博的學識,那他就应当加倍地受到贊許。

除了科学研究之外,当然,馬克思还从事工人运动。他是国际工人协会的創始人之一。最近时期,国际工人协会已成为人們談論的中心,它已經在欧洲許多地方显示了自己的力量。我們认为,我們是可以这样說的:在这个无論如何是标志着工人运动中的一个时代的組織里,德国人正是由于馬克思的功劳,也占有一个应有的重要地位。

弗·恩格斯写于 1869 年 7 月 28 日

左右

載于 1869 年 8 月 2 日“未来报”

第 185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未来报”,并根据
手稿校对过

卡·馬克思

总委员会关于继承权的报告³⁰⁵

1. 继承权之所以具有社会意义，只是由于它給继承人以死者生前所有的权利，即借助自己的财产以攫取他人劳动成果的权利。例如，土地使所有者在生前有权以地租形式毫无抵偿地攫取他人劳动的果实。资本使所有者有权以利润和利息的形式获得同样的果实。国家有价证券所有权使所有者能够不劳而获地专靠他人的劳动果实过活等等。

继承并不产生这种把一个人的劳动果实轉移到别人口袋里的权利——它只涉及到具有这种权利的人的更換問題。同所有一般的民法一样，继承法并不是一种原因，而是一种結果，是从現存社会經濟組織中得出的法律結論，这种經濟組織是以生产資料即土地、原料、机器等的私有制为基础的。这正如继承奴隶的权利并不是奴隶制度的原因，恰恰相反，奴隶制度才是继承奴隶的原因。

2. 我們应当同原因而不是同結果作斗争，同經濟基础而不是同它的法律的上层建筑作斗争。假定生产資料从私有财产轉变为公有财产，那时继承权（既然它具有某种社会意义）就会自行消亡，因为一个人死后留下的只能是他生前所有的东西。因此我們的偉大目标应当是消灭那些使某些人**生前**具有攫取許多人的劳动果实的經濟权力的制度。在社会处于相当的发展水平而工人阶级又拥

有足够力量来廢除这种制度的地方，工人阶级就应当用直接的手段来达到这一点。例如，廢除国债，自然就能同时避免国家有价证券的继承。另一方面，如果工人阶级没有足够的权力来廢除国债，那末，要想廢除对国家有价证券的继承权，就是愚蠢。

继承权的消亡将是廢除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改造的自然结果；但是**廢除继承权**决不可能成为这种社会改造的起点。

3. 大约 40 年前圣西门的信徒们所犯的重大错误之一，就在于他们不把**继承权**看做法律后果，而把它看做现今社会组织的经济原因。³⁰⁶ 这丝毫没有妨碍他们在自己的社会制度中把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永世保存下来。他们认为，可以有挑选出来的终身所有者，就好像曾经有过挑选出来的国王一样。

承认**廢除继承权**是社会革命的起点，只能意味着引诱工人阶级离开那实行攻击现代社会真正应持的障地。这同既要廢除买主和卖主之间的契约法，同时又要保存目前的商品交换制度一样是荒谬的。

这在理論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反动的。

4. 我们在考察继承法时，必然要假定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继续存在。如果私有财产在人们生前已经不存在，那末它就不会被人转让，同时也不会人在死后从死者那里传给别人。因此，有关继承权的一切措施，只能适用于社会的过渡状态，那时，一方面，社会目前的经济基础尚未得到改造，另一方面，工人群众已经积蓄了足够的力量来**强迫采取**旨在最终实现社会的彻底改造的**过渡性措施**。

从这方面来考虑继承法的修改，只是所有导致同一目的的其他许多过渡性措施中的一种。

在继承方面这样的过渡性措施只可能是：

(1)更广泛地征收在許多国家中业已存在的遺產稅，把这样得来的資金用于社会解放的目的；

(2)限制遺囑繼承權，这种繼承權不同于沒有遺囑的繼承權或家屬繼承權，它甚至是私有制原則本身的恣意的和迷信的誇張。

卡·馬克思写于1869年8月2—3日

載于小册子“在瑞士巴塞尔举行的
国际工人协会第四次年度代表大
会的报告”1869年倫敦版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小册子“在瑞
士巴塞尔举行的国际工
人协会第四次年度代表
大会的报告”

卡·馬克思

总委员会向国际工人协会
第四次年度代表大会的报告³⁰⁷

各个支部的代表将向你们详细报告我们协会在他们国家取得的成就。你们的总委员会的报告主要是谈一谈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游击战——我们指的是过去一年中震荡欧洲大陆的罢工。关于这些罢工，有人说不是工人的贫困引起的，也不是资本家的横暴引起的，而是我们协会的阴谋诡计引起的。

在我们上一次代表大会闭幕后，过了几个星期就在巴塞尔爆发了织带工人和染丝工人的值得纪念的罢工。巴塞尔直到今天，一直保持着中世纪城市的许多特点，如它的地方传统，狭隘的偏见，妄自尊大的豪绅，雇主和工人之间的宗法关系。几年之前，有一个巴塞尔的厂主就曾向英国大使馆的秘书吹嘘说：

“在我们这里业主和工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比在英国好得多”，“在瑞士，一个工人如果为了更高的工资而离开他的好业主，他的同事就会看不起他”，“我们比英国优越的地方主要在于工作时间和工资低”。

由此可见，那些由于现代影响而改变了自己形式的宗法制度就表现在：业主好而工资却很糟，工人有中世纪附庸的情感，同时却作为现代雇佣奴隶遭受剥削。

这种宗法制度，也可以根据瑞士当局对工厂童工劳动和初等

国民学校状况的調查材料来判断。材料上写道：

“巴塞爾的学校里的空气比任何地方都污浊，如果說在露天空气中只有万分之四的碳酸气，在室內碳酸气一般也不超过万分之十，那末在巴塞爾的普通学校里，碳酸气的数量在上午是万分之二十到八十一，在下午是万分之五十三到九十四。”

关于这一点，巴塞爾大会議的議員图尔奈森先生无动于衷地說：

“没有什么可怕的！長輩們也在像現在这样坏的校舍里讀过书，可是他們也没有怎么样。”

現在就会理解到，为什么巴塞爾工人的經濟斗争的爆发标志着瑞士社会历史的一个时代。再没有什么东西能比这个运动的起点更具有代表性了！按照旧的風俗，巴塞爾的工人在米迦勒节比平日提早四分之一个工作日下工。可是在1868年11月9日，当德巴里父子織带工厂中的工人要求习惯上的优待时，有一个厂主就用粗暴的声調和命令的手势向他們宣布：

“誰要是离开工厂而不繼續工作，就立刻并且永远解雇他。”

經過几次无效的抗議之后，172个織工中有104人离开了工厂，可是他們并不相信自己当真会被解雇，因为根据双方的书面協定，离开工作或者解雇，都应当在两星期前通知对方。第二天早晨他們来上工时，发现工厂已經被宪兵包圍，并且不許鬧事者走近它。那些头一天沒有提前下工的織工現在也拒絕上工。总的口号是：“全体上工，不然誰也不上工。”

这样出其不意被解雇的織工和他們的家屬一起，立刻从他們租自己厂主的房屋里被赶了出去。不仅如此，厂主們还写信通知肉商、面包商和食品杂货店主，請求他們不賒給鬧事者任何食品。

这样展开的斗争从1868年11月9日延续到1869年春天。我们的报告的篇幅不允许我们更详尽地叙述这件事。这里只再指出一点：由于资本主义专横制度的凶恶表现——残酷的同盟歇业——而发生的这场斗争，演成了一系列的罢工，这些罢工由于有时取得妥协和厂主们一再破坏这种妥协而时断时续；当巴塞尔的崇高可敬的大会议枉然企图用军事措施和类似戒严的手段来恫吓工人的时候，斗争达到了高度紧张的状态。

在这场斗争进行的时候，国际工人协会支援了工人。按照企业主的说法，这个团体第一次把现代的反抗精神送到了善良而古老的帝国城市巴塞尔。因此，他们最关心的事情就是把这位不速之客重新从巴塞尔赶出去。他们企图迫使自己的下属退出协会，以此作为媾和条件，但是白费力气。由于在反对国际的战争中遭到接二连三的失败，他们便企图采取荒唐的手段来发泄自己的愤恨。这些共和主义者同时又是在巴登边界上离巴塞尔不远的一个小地方寥拉赫的一些大工厂的所有者，他们驱使当地的地方长官^①解散了那里的国际支部；可是这个措施很快就被巴登政府废除了。当奥格斯堡的“总汇报”大胆地刊登了关于巴塞尔事件的公正报道时³⁰⁸，这些“可敬的先生”就在愚蠢可笑的信中以停止订阅该报相威胁。他们特地派了一个代理人到伦敦，这个人的奇妙的使命是查明国际的主要存款的数额。如果这些正统的基督徒生活在基督教萌芽的时代，那他们首先会去看看使徒保罗在罗马的活期存款了。

由于他们这些野蛮而愚蠢的行为，日内瓦的资本家曾好好譏

① 英文版中不是“地方长官”，而是“大公国的官员”。——编者注

笑了他們一頓。但是过了几个月，粗野的巴塞尔老憨就加倍地报答了日内瓦雅士們的恭維。

3月里在日内瓦爆发了两次罢工——建筑工人的罢工和排字工人的罢工；这两个工人团体都建立了**国际**的支部。建筑工人的罢工是由于业主們破坏了一年前同工人們郑重簽訂的合同而引起的。排字工人的罢工只不过是已經延續了十年的冲突的結尾，工人曾试图在先后成立的五个委员会中使这种冲突得到和解，但总是徒劳无益。如同在巴塞尔一样，业主們立即把同自己工人的局部冲突变为国家权力对**国际工人协会**的十字軍征討。

日内瓦的政务會議派警察到火車站去迎接业主們从远处运来的工人，使他們不能同罢工者有任何接触。它纵容日内瓦的带着左輪手枪的 *jeunesse dorée* ① 在大街上和其他公共場所襲击工人和女工。它以各种借口唆使它的警察局的雇佣劊子手去迫害工人，例如在5月24日，它就在日内瓦以較小規模重演了在巴黎演过的被拉斯拜尔痛斥为 «Les orgies infernales des casse-têtes»³¹⁰ 的場面。

当日內瓦的工人在公开的集会上通过致政务會議的呼吁书，要它对这些“殘暴的警察逞凶”进行調查时，政务會議粗暴地拒絕了他們的請求。有人显然是想逼使日内瓦工人起义，然后再用武力来鎮压这次起义，把**国际**从瑞士土地上清除掉，使无产者屈服于和十二月二日制度相似的制度。由于我們的瑞士联合会委员会的坚决行动和遏止作用，計劃遭到了破坏。³¹¹ 业主們終於被迫让步。

現在請仔細听一听日内瓦的資本家及其报界的狐群狗党对**国**

① 英文版中在 «jeunesse dorée» (“花花公子”) 这个詞后面补充有：“«La jeune Suisse»³⁰⁹ 的有前途的二流子”。——編者注

际的一些責难吧！他們在公开的集会上通过了致政务會議的呼吁书，其中有这样一句話：

“他們听从倫敦和巴黎的命令，正在破坏日內瓦州，他們想要消灭这里的一切工业和一切劳动。”

一家瑞士报纸断言，国际的領袖們是

“拿破侖皇帝的密探，他們在适当的时机就会作为社会起訴人来反对我們小小的瑞士”。

說这种話的正是那些热衷于把十二月二日制度移植到瑞士国土上的先生們，正是那些在日內瓦和其他瑞士城市掌握大权的金融巨头們，全欧洲都知道，他們早已从瑞士共和国的公民变成《Crédit Mobilier》³¹² 和其他国际性欺詐組織的僕从了！

比利时政府在4月間为了对付塞兰的攪铁工人和博里納日的采煤工人的罢工而制造的几次慘案，已在总委员会致欧洲和美国工人的呼吁书中得到了詳細的說明。^① 我們认为发出这样的呼吁书是非常必要的，这特別因为在比利时这个典范的立宪国家里，这样大批地屠杀工人并不是偶然事件，而是成为一种常規了。在演了恐怖的战争悲剧之后，紧跟着就是法院的滑稽剧。在对我們設在布魯塞尔的比利时总委员会进行搜查的时候（委员会的房舍被警察毁坏得很厉害，有一部分委員被捕），法院偵查員发现了一个工人的一封信，信中請求送来“五百国际”；他立即断定，向出事的地方一定派去了五百名工人战斗队。其实这“五百国际”只不过是五百份布魯塞尔委员会的机关刊物“国际报”。后来他搜查出^② 一

① 見本卷第395—400頁。——編者注

② 原文是《stiebert》，这个詞来自《Stieber》——“警犬”，“密探”；暗指普魯士警察局长施梯伯(Stieber)。——編者注

封打給巴黎的电报，电报要求一些“火药”。經過長時間的偵查，在布魯塞尔終於发现了这种危險物。原来它是用来消灭昆虫的药粉^①。最后，比利时警察当局十分得意的是它自认为发现了那个很难找到、而又鬧得大陆上的資本家不得安宁的宝庫，这个宝庫的大部分据說是藏在倫敦，协会在大陆上的一切主要分部都依靠这个宝庫供給經費。比利时的偵查員认为，这个宝庫被藏在一个保險箱里，而这个保險箱被藏在一个僻靜的地方。他的密探們猛攻箱子，砸毀鎖一看，发现里面是几块煤炭。也許，国际的純金經過警察的手一摸，就馬上变成了煤炭。

1868年12月在法国各棉紡織区爆发的罢工中，最有名的是索特維耳-勒-卢昂的罢工。在这以前不久，松姆省的厂主們在亚眠聚会，目的是要解决这样一个問題：他們怎样才能在英国市場上更廉价地出售（undersell）自己的商品，从而打敗他們的英国竞争者。全体同意，除了保护关税政策以外，正是較低的工資水平使法国至今不受英国棉織品的侵犯；由此他們自然地得出結論說，如果在法国把工資降得更低一些，就会使法国的棉織品充斥英国。他們絲毫也不怀疑，法国的棉紡織工人会自豪地承担起他們的业主以极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决定在拉芒什海峽对岸进行的那場侵略战争的費用。此后不久就傳出消息說，卢昂及其近郊的厂主們在秘密會議上已經商量好要实行这样的政策。紧接着在索特維耳-勒-卢昂突然宣布要大大地降低工資，于是諾曼底的紡織工人第一次起来反抗資本的进攻了。他們是在时局的影响下行动起来。在这以前，他們既沒有工会，也沒有任何的反抗手段。貧困迫使他們

① 《pulwer》一詞有“火药”和“药粉”两个意思。——編者注

向国际的卢昂委员会请求援助，委员会立即使他們得到了卢昂及其近郊的工人和巴黎工人的一些支援。大約在 12 月底，卢昂委员会向总委员会发出呼吁，这正是英国棉紡織区极端困难的时期，倫敦空前貧困，一切工业部門都处于普遍停滯状态。这种情况在英国一直延續到現在。尽管情况极度不利，总委员会认为，卢昂冲突的特殊性定会促使英国工人鼓起自己的一切力量。这是一个非常适当的时机来向資本家表明，他們通过降低工資的办法时而在这个国家时而在那个国家进行的国际工业战争，最終将因工人阶级的国际团结而无法繼續进行。英国工人响应我們的号召，立即为卢昂募集了第一批捐款，工联倫敦理事会决定在首都同总委员会一起召开一次 *monstre meeting* [大規模的群众集会] 来声援諾曼底的工人弟兄。这些措施后来由于得到索特維耳的罢工突然停止的消息而中断。

这场經濟斗争虽然失败了，可是它的精神影响却使这种失败得到了广泛的补偿。这场斗争把諾曼底的棉紡織工人吸引到了革命的劳动大軍的队伍中来；它使卢昂、埃耳伯夫、达尔訥塔耳和其他地方成立了工会，并且重新巩固了英国工人阶级和法国工人阶级之間的兄弟联盟。1868 年冬季和 1869 年春季，我們在法国的宣傳工作陷入了瘫痪状态，这是因为 1868 年我們的巴黎委员会被迫解散、警察在各省无端寻衅以及法国的議會大选成了注意的中心。

选举刚一結束，就在卢瓦尔的采矿工业区、在里昂和其他許多地方爆发了許多起罢工。在資本家和工人之間的这场斗争中暴露出来的經濟事实面前，那些把第二帝国庇护下的工人阶级描绘成一片繁荣景象的鮮艳誘人图景已經烟消云散。工人提出的要求是

那样的微薄和那样的无可争辩，以至于在受到一些有时是蛮横无理抗拒之后，不得不全被接受下来。这些罢工的唯一奇怪的特点是在表面的平静之后突然爆发，而且是那样迅速地一个紧跟着一个。可是这一切现象的原因是简单而明显的。在选举时工人在反对全体人民的暴君的斗争中成功地试用了自己的力量。当然，他们决心在选举后试用自己的力量去反对他们自己的暴君。

选举促进了精神力量的觉醒。一家靠伪造事实领取报酬的政府报纸很自然地把一切事件都说成是受了伦敦总委员会的秘密指示，似乎总委员会派了自己的密使到处奔波，为了向早先完全满意自己命运的法国工人揭示一个秘密：工作过度，报酬低微，受到粗暴对待——全是些不愉快的事情。在伦敦出版的一家法国警察小报“国际报”³¹³，就曾经在8月3日那一号上大发慈悲地向世界揭示我们的有害活动的秘密动机。

上面写道：“最奇怪的是硬要在贫困还远远没有被人感觉到的那样一些国家中发动罢工。这些突然的爆发对于法国的一些首先应该担心战争的邻国来说是再适时不过的了，这些爆发迫使许多人寻思：这些罢工是不是按照某个善于博得这个万能协会的好感的外国的马基雅弗里的要求进行的呢？”

正当这家法国警察小报指责我们，说我们为了使俾斯麦伯爵摆脱外部战争而利用罢工来给法国政府制造内部困难的时候，一家莱茵普鲁士报纸、工厂主的机关报却指责我们说，我们用罢工震撼北德意志联邦³¹⁴的基础，目的是要使德国的工业瘫痪，以利于外国的工厂主。

国际和法国罢工的关系可以用两个典型的事件来说明。关于第一个事件，即在圣亚田发生的罢工以及随后在里卡马里发生的大屠杀，甚至法国政府自己也已经不敢说国际和这些罢工有任何

关系了。

至于說里昂事件，那并不是国际把工人推向罢工，相反，却是罢工把工人推向国际的队伍。

圣亚田、里夫-德-紀埃和菲尔米尼的矿工鎮靜而坚决地要求矿业公司的經理修改工資条例，縮短长达 12 小时的井下繁重劳动的工作日。由于和平解决糾紛的意图沒有收到成效，他們才在 6 月 11 日举行了罢工。当然，对于他們來說，最迫切的問題就是保证自己得到那些还在繼續工作的同志的支援。为了阻止这一点，各矿业公司的經理向卢瓦尔省省长要求派遣軍隊，并且得到了滿足。6 月 12 日罢工者发现矿井上加强了武装戒备。矿业公司为了保证政府派来的士兵对它們尽心竭力，每天付給每个士兵 1 法郎的报酬。士兵为了表达他們对公司的感謝，拘捕了将近 60 个企图偷偷溜到矿井上的同伴那儿去的矿工。被拘捕的矿工在当天下午就被第四基干团的 150 名士兵押送去圣亚田。在这些勇士出发之前，多利安公司的一个工程师分发給他們 60 瓶酒，并且恳切地囑咐他們一路上要机警地監視被捕者：他說，这些矿工都是些未开化的野人和逃亡的苦役犯。酒和这样一番訓导准备好了一场流血冲突。在队伍后面紧跟着一群矿工和他們的妻儿，他們在里卡馬里附近的蒙塞耳高地的一条狹谷把队伍包圍起来，要求釋放被捕者。士兵拒絕他們的要求，于是石块向士兵投来；这时士兵預先沒有警告就突然向人群的最稠密处乱放起枪来，打死了 15 人，其中有两个妇女和一个吃奶的嬰兒，許多人受了重伤。受伤者忍受了极大的痛苦；他們之中有一个 12 岁的貧苦的女孩燕妮·佩蒂；她的名字将永远留在工人階級蒙难者的历史上。她是被从后面来的两颗子彈打伤的：一颗子彈打在腿上，另一颗穿过了背部，打断了胳膊，

从右肩穿出来。《Les chassepots avaient encore fait merveille》³¹⁵。

可是，这一次政府很快就意識到，它不仅犯下了罪行，而且大大失策了。资产階級并不欢迎它这样的社会救主。圣亚田的整个市議會提出辞职，它在自己的声明中指出大兵們的殘无人道，并且坚决要求軍隊撤出这个城市。法国报刊掀起一陣极大的喧嚷。甚至那些保守的报纸，如“总汇通报”³¹⁶，也为蒙难者征集捐款。政府不得不把这个可恨的团从圣亚田調走。

在这样的困难情勢下，突然想出了一条妙計：用**国际工人协会**作为替罪的羔羊来祭奠公憤。在审讯的时候，起诉书把这些所謂的造反者分成十类，而且非常精細地勾画出罪行的不同程度。第一类塗着最濃的色彩，包括5个工人，他們特別被怀疑是听从了外来的、即**国际**的秘密指令。罪证当然是多得很，关于这一点可以用一家法国司法报上的一小段話來說明：

“对見证人的訊問没有能够确凿地证明国际协会参与此事。見证人仅仅证实有几个身穿白短衫头戴便帽的陌生人站在暴徒的最前列。但是这些陌生人一个也没有被捉住，而且也没有一个坐在被告席上。有一个見证人被問道：你相信国际协会干与此事嗎？他回答說：‘我相信，但是我没有任何证据。’”

在里卡馬里大屠杀以后，里昂的繅絲工（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很快就开始了一系列的經濟战斗。貧困迫使他們向国际請求援助，国际主要是通过自己在法国和瑞士的會員帮助他們取得了胜利。想以警察手段恫吓他們的一切嘗試都沒有用，他們公开宣布要加入我們的协会，并且向总委員會按章交納会費后正式地加入了协会。在里昂，也像以前在卢昂一样，**女工**起了崇高的卓越的作用。

里昂的其他工业部門都紛紛仿效繅絲工的榜样。因此，在数星期之内，我們的协会就在这些英雄的居民中找到了一万多个新的同道者，早在三十多年前，这些英雄的居民就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了現代无产阶级的口号：«Vivre en travaillant ou mourir en combattant!»（“不能劳动而生，勿宁战斗而死！”）³¹⁷

可是法国政府繼續吹毛求疵地迫害国际。在馬賽它禁止我們的會員集会选举出席巴塞尔代表大会的代表。在其他城市也重演了这种卑鄙的勾当，但是欧洲以及其他地方的工人終於开始懂得，夺取自己的天赋权利的最可靠的办法是：不待他人的許可，每人奋不顾身地自动来行使这种权利。

奧地利的工人，特別是維也納的工人，虽然是在1866年事件³¹⁸以后才参加到运动中来，但是他們已經占据了有利的地位。他們很快就团结在社会主义和国际的旗帜下，現在他們通过自己派往不久前召开的愛森納赫代表大会³¹⁹的代表集体参加了国际。在奧地利，自由资产阶级比在任何地方都更明显地表现了它的利己的本能、智慧的貧乏和对工人阶级的切齿痛恨。它的內閣眼看着种族糾紛和民族糾紛使帝国陷于分裂并使帝国的存在受到威胁，却仍然对唯一宣布一切种族和民族团结起来的工人进行迫害。资产阶级并不是以自己的英勇而只是由于奧軍的失敗才取得了新的地位³²⁰，它自己也明明知道，它未必能够保住既得的东西，使之不受王朝、貴族和教会的侵犯；但是，这个资产阶级却不惜耗費自己的精力，卑鄙地企图剝夺工人阶级的結社、集会和出版自由的权利。

在奧地利，也像在欧洲大陆的所有其他国家一样，国际代替了升天了的“赤色幽灵”。当7月13日在莫拉維亞的棉紡織业中心

布隆对工人进行小規模的屠杀时，这一事件被归咎于国际的暗中唆使，說它的代理人戴着隱身帽藏在幕后。当維也納人民的某些领导人到法庭受审时；檢察官辱罵他們是外国的代理人。这位檢察官知識淵博的程度可以用他犯的一个小小差錯來說明：他連伯尔尼的資產階級的和平和自由同盟和无產階級的国际都分不清。

如果說工人运动在息斯萊达尼亚的奥地利³²¹ 遭到的是这样一种迫害，那末它在匈牙利遭到的却是公开的而且是蛮橫无理的戕害。关于这件事，总委员会收到了来自佩斯和普勒斯堡的最可靠的消息。举一个例子就足以說明当局对匈牙利工人的态度。

匈牙利王国内务大臣馮·文克海姆先生湊巧随匈牙利代表团到了維也納。在几天以前，普勒斯堡的工人派了一个工人小组，其中包括著名的鼓动家涅姆契克，到維也納去向內务大臣先生訴苦，因为他們在很长时期內被禁止举行集会，甚至为了募款成立患病职工补助会而举行游艺会也遭到禁止。費了許多周折，总算見到了这位高貴的大臣，然而，当工人走进大臣的办公室的时候，他們受到了这位大臣极不礼貌的接待。

大臣一边吸着雪茄烟一边問道：“你們是工人嗎？你們是在勤勤恳恳地工作嗎？不要多管閑事。不要搞什么同盟；如果你們硬要过問政治，我們會采取适当的手段对付你們。我不能为你們做任何事情，工人要发牢騷就尽量地发吧！”

那末，是不是仍旧让当局为所欲为呢？大臣在回答这个問題时說：

“是的，这由我負責。”

經過了長時間的但是毫无結果的辯論，工人离开了大臣，并在临走时向他声明說：

“因为国家大事影响到工人的状况，工人当然要过问政治，而且一定要过问政治。”

在普鲁士和德国的其他地方，去年一年最值得庆贺的就是在全国组织了工会。在不久前召开的爱森纳赫代表大会上，代表着德国本部、奥地利和瑞士的 15 万多名德国工人的代表们成立了新的社会民主党，它的纲领逐字逐句地采纳了我们的章程的基本原则。因为法律禁止他们成立合法的国际协会支部，他们决定请求总委员会发给个人会员卡。^①

在那不勒斯、西班牙和荷兰成立了协会的新支部。在巴塞罗纳和阿姆斯特丹出版了我们协会的机关周刊。³²³

比利时政府在塞兰和弗腊默里的光荣战场上搜集来的桂冠，看来使列强有点不能安宁。因此毫不奇怪，在这一年连英国也能夸耀它对工人的屠杀了。登比郡的谋耳德附近的利斯伍德大矿井的威尔士矿工，突然接到了矿井主管人关于降低工资的通知，这个主管人是他们早就痛恨的穷凶极恶的暴君。他们把附近矿井上的人们召集起来，把主管人赶出家门，并且把他的家具都运到附近的火车站去。这些不幸的人像孩子一样天真地以为，这样就能够永远不再受他的压迫了。^② 5 月 28 日有两个主犯将在国王陛下的第四步兵团的警戒下由警察押送到谋耳德的法庭。一群矿工企图在中途把被捕者解救出来，但是遇到了警察和士兵的抵抗，于是就纷

① 英文版中紧接着还有这样一句话：“全德工人联合会 在自己的巴门代表大会³²²上也确认它同意我们协会的原则，同时宣称，普鲁士法律禁止它加入我们的协会。”——编者注

② 英文版中紧接着还有这样一句话：“自然，法院就对这些暴动者开始进行侦讯，但是他们之中有一个被成千人的群众解救出来，并被带出了这个城市。”——编者注

紛向他們投擲石块；士兵不預先警告就用他們的后装枪^①射出雨点般的枪彈来回击雨点般的石块。5人被打死，其中有两个妇女和一个小孩，很多人受伤。到这时为止，謀耳德的大屠杀和里卡馬里的大屠杀有許多共同之处，但是往后这种相似之处就消失了。在法国，士兵只对自己的指揮官負責。在英国，他們必須在陪審員面前受偵查員的詰問；但是这个偵查員是一个耳聾和有些糊塗的老头子，他必須通过助听筒来听取見证人的供詞，而威尔士的陪審員們則是一个冷酷无情的、充滿偏見的階級法庭。他們认为这次大屠杀是“在可以原諒的情况下进行的杀人行为”。在法国，暴动者被判处3个月到18个月的徒刑，而且在判决后很快就被赦免。在英国，他們却被判处了10年的苦役。

在法国，一切报刊都一致憤怒地譴責士兵。在英国，报刊却热烈地贊許士兵，并且对受害者表示不滿。然而英国工人的收获很大，他們摆脱了一个大的而且是危險的幻想。在这以前他們以为，由于有了騷扰取締令³²⁴的手續，以及由于軍隊受民政当局的管轄，他們的生命或多或少会得到保护。現在他們长了見識。內务大臣自由党人普魯斯先生在下院宣布：第一，任何官員，任何猎狐爱好者或神甫，都有权不預先宣讀騷扰取締令就命令軍隊向人群开枪，只要他认为这是一群暴动者；第二，士兵有权借口自卫而首先开枪射击。自由党人大臣忘記补充一句：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卫自己不受士兵的襲击，每个人都應該由国家用后装枪武装起来。

8月30日在北明翰举行的工联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如下的

① 英文版加有：“(斯奈德式步枪)”。——編者注

決議：

“鉴于地方工人組織几乎到处都让位給全国范围的組織；自由貿易原則的推广在資本家之間引起了如此激烈的竞争，在这样的竞争下，工人的利益完全被忽視，并且被当做国际竞争的瘋狂斗争的牺牲品；工人組織应当日益扩大并成为国际性的組織；而且鉴于**国际工人协会**的宗旨在于保卫工人阶级到处都相同的共同利益，本届大会热烈地建議联合王国的工人，特别是所有工人組織，支持这个协会，并且恳切地希望它們加入协会。大会还相信，国际的原則的实现将导致各国人民之間的持久和平。”³²⁵

今年5月，美国和英国之間看来要不可避免地爆发战争。因此，我們的总委员会曾寄給美国全国劳工同盟主席西耳維斯先生一封公开信，呼吁美国工人在統治阶级叫囂战争的时候要维护和平。^①

由于为我們的共同事业而斗争的英勇战士西耳維斯先生突然逝世，我們认为，为了表示对他的尊敬和怀念，最好在結束我們的报告时把他的复信引在这里：

“1869年5月26日于費拉得尔菲亚

昨天收到了你們5月12日的公开信。对我來說，收到大洋对岸我們的工人同志的祝賀是极大的幸福。我們的事业是共同的事业。貧富之間正在进行着战争。劳动到处都同样地受到压迫，而資本在世界的任何角落都同样是暴君。正因为这样，我說我們的事业是共同的事业。我以美国工人阶级的名义向你們，并通过你們向你們所代表的一切人，向欧洲的全体被侮辱和被剝削的男女劳动者伸出同志的手。把你們所从事的有益的事业向前推进，直到你們的努力获得完全的胜利。这就是我們的心願。由于上一次的战争，在我們这里形成了世界上最卑鄙的金融貴族。这种金融权势在迅速吞食人民的有生力量。我們已向它宣战，并且打算战胜它。如果有可能，我們想通过选

① 見本卷第401—403頁。——編者注

举投票箱获得胜利；如果不可能，就采取更强硬的手段。在万不得已的时候，往往必须流一点血。”

受总委员会的委托：

执行主席 罗伯特·阿普耳加思

财务委员 考威尔·斯特普尼

总书记 约·格奥尔格·埃卡留斯

1869年9月1日于伦敦

通讯处：西中央区海-霍耳博恩街 256 号

卡·馬克思写

1869年9月以单行本的形式在巴塞尔出版，并载于小册子“在瑞士巴塞尔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第四次年度代表大会的报告”1869年伦敦英文版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巴塞尔出版的
德文版单行本

卡·馬克思
 总委员会关于不列颠政府
 对被囚禁的爱尔兰人的
 政策的決議草案³²⁶

决定：

格萊斯頓先生在答复爱尔兰人要求釋放被囚禁的爱尔兰爱国分子时(这一答复見格萊斯頓先生給奧謝先生等的信^①)有意地侮辱了爱尔兰民族；

他提出的实行政治大赦的条件，無論对于坏政府手下的牺牲者或对于这些牺牲者所代表的人民，都同样是一种侮辱；

格萊斯頓身为政府官吏，曾經公开而郑重地表示欢迎美国奴隶主的暴动³²⁷，而現在却向爱尔兰人民宣傳消极服从的学說；

格萊斯頓先生对爱尔兰人大赦問題的全部政策，十足地、彻底地表現了他先前曾慷慨激昂地加以揭露因而推翻了他的政敌托利党的內閣的那种“征服政策”³²⁸；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对爱尔兰人民勇敢坚决而高尚地要求大赦的运动表示敬佩；

① 在总委员会的記錄簿中，这句话是这样：“这一答复見格萊斯頓先生1869年10月18日給奧謝先生的信和1869年10月23日給伊薩克·巴特先生的信。”

——編者注

本決議應通知歐美各國的**國際工人協會**的所有支部以及所有同它有聯系的工人組織。

卡·馬克思于 1869 年 11 月 16 日
提出

載于 1869 年 11 月 21 日“雷諾新聞”，1869 年 11 月 27 日“人民國家報”第 17 號，1869 年 12 月 12 日“國際報”第 48 號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手稿譯的，并根據
總委員會的記錄校對過

卡·馬克思
 总委员会致瑞士罗曼語区
 联合会委员会³²⁹

总委员会在1870年1月1日的非常會議上决定：

1. 在1869年12月11日的“平等报”上我們讀到这样一段話：

“毫无疑义，它〈总委员会〉輕視极其重要的事情…… 我們援引条例的第一条来提醒它注意它們〈总委员会的职責〉，这一条規定：‘总委员会必須执行代表大会的決議……’ 我們本来可以向总委员会提出大量的問題，这些問題的答案足以构成一份冗长的文件。稍后我們將这样做…… 而現在……”

总委员会無論在章程或条例中都找不到这样一条規定，即它必須同“平等报”通信或辯論，或者“回答”任何報紙提出的“問題”。总委员会认为，只有瑞士罗曼語区联合会委员会才是瑞士罗曼語区各支部的代表者。如果罗曼語区联合会委员会通过唯一合法的途徑，即通过自己的書記向我們提出質問或指責，那末总委员会随时都准备回答它。但是，罗曼語区联合会委员会既无权放棄自己的职責，把它轉让給“平等报”和“进步报”³³⁰的編輯部，也无权让这两家報紙篡夺它的职責。一般地說，如果把总委员会同各个全国性的和地方性的委员会的来往信件公布出来，那就会使协会的总的利益遭到巨大的損害。的确，如果国际的其他机关报仿效“进

步报”和“平等报”，那末，总委员会就不得不二者擇其一：或者保持緘默而使自己在輿論面前喪失威信，或者違背自己的職責而公開作答^①。

“平等报”同“进步报”（这家报纸并不寄給总委员会）一起动員“劳动报”³³¹（一家巴黎报纸，它还没有宣称自己是国际的机关报，并且同样也不寄給总委员会）从自己方面要求总委员会进行解釋^②。多么像个公共福利同盟！³³²

2. 暫且假定“平等报”提出的这些問題是来自罗曼語区联合会委员会，因此我們將回答这些問題，但是必須有一个条件，就是今后不再以这种方式向我們提这类的問題。

3. 关于通报的問題。

載入条例的日内瓦代表大会決議規定，各个全国性的委员会應該把有关无产阶级运动的文献資料寄給总委员会，以便总委员会“在其經費許可的情況下尽量經常地用各种文字出版通报”（*As often as its means permit, the General Council shall publish a report etc.*）。

因此，总委员会所承担的责任是同那些沒有实现的条件有連

① 手稿上在“公开作答”之后，馬克思刪去了这样一句話：“‘进步报’（这家报纸并不寄給总委员会）不顾全协会代表大会三次通过了相应的決議，竟然开始篡夺联合会委员会的职权。”——編者注

② 手稿上在这句話后面划去了如下一段：“那些很晚才加入我們协会的人去年一入会后就提出了一个危险的計劃：在国际工人协会内部建立另一个受他們个人支配的国际团体，这个团体的所在地在日内瓦；的确，这些人看来又回到这个計劃了，而且迄今还相信，他們的特殊使命就是篡夺国际协会的上层领导。总委员会提醒罗曼語区联合会委员会注意，它有責任领导‘平等报’和‘进步报’。”——編者注

带关系的。甚至連章程上規定的統計調查工作也沒有进行，虽然关于这件事在前后召开的許多次全协会代表大会上都做出了決議，而且总委员会每年都要求进行这项工作。但总委员会沒有收到任何文献資料。至于經費，要不是英国各地交的会費和总委员会委員的个人捐獻，总委员会早就不存在了。

这样一来，日内瓦代表大会通过的条例就成了一紙空文^①。

至于巴塞尔代表大会，它所討論的不是关于現有条例的執行問題，而是关于及时出版通报的問題，并且对这个問題沒有做出任何決議。（見在代表大会监督下于巴塞尔刊印的德文报告³³³）

不过，总委员会认为，通报的原定任务現在完全由国际的各个机关刊物在完成，这些刊物用各种文字出版，并且通过相互交換而得到傳播。如果要让代价很高的通报去做不花代价就已經做得到的事，那是荒唐的。从另一方面說，如果通报发表国际的机关刊物上沒有发表的东西，那只能帮助我們的敌人窺視内幕。

4. 关于把总委员会同英国联合会委员会分开的問題。

在“平等报”創辦以前很久，这个建議就已經在总委员会中由它的一两个英国委員定期地提出过了。但是这个建議总是受到几乎全体一致的反对。

尽管革命的发起可能来自法国，但只有英国可以成为重大經濟革命的杠杆。它是这样一个国家，唯有那里已經沒有农民并且土地所有权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唯有这个国家中的資本主义形式——即劳动大規模地联合在資本主义企业主的統治下——几乎籠罩了整个的生产。唯有这个国家中的絕大多数居民是雇佣工人

^① 手稿上在“一紙空文”之后勾掉了这样一句話：“巴塞尔代表大会正是这样看的。”——編者注

(wages labourers)。唯有这个国家中的阶级斗争和工人阶级在**工联**中的组织达到了一定程度的成熟和普遍性。由于英国在世界市场上占统治地位，因而唯有英国这个国家在经济方面的每个变革会立即在全世界得到反映。如果说英国是一个典型的大地主所有制和资本主义的国家，那末从另一方面说，在英国消灭大地主所有制和资本主义的物质条件也比任何地方都更加成熟。总委员会现在所以处在值得庆幸的地位，是因为无产阶级革命的这个伟大杠杆直接握在它手里。如果把这个杠杆完全交给英国人，那该是多么愚蠢，甚至可以說是多么严重的犯罪行为！

英国人拥有进行社会革命的一切必要的物质前提。他们所缺乏的是总结的精神和革命的热情。只有总委员会能够弥补这个缺陷，从而加速这个国家的以及任何地方的真正的革命运动。我们在这方面已经取得的巨大成绩，得到了统治阶级最聪明的和最有影响的机关报刊，例如“派尔-麦尔新闻”、“星期六评论”、“旁观者”、“双周评论”的证实，更不用说下院和上院中那些不久前还对英国工人领袖有很大影响的所谓激进的议员了。他们公开地责难我们，說我们毒害了而且几乎灭绝了工人阶级中的英国精神，把它推向了革命的社会主义。

实现这个转变的唯一方法，就是像国际协会总委员会那样行动。作为总委员会，我们可以鼓励采取这样的措施（例如成立**土地和劳动同盟**³³⁴），将来当这些措施实现的时候，它们就会像英国工人阶级的自发行动那样出现在公众面前。

如果在总委员会之外成立一个**联合会委员会**，那会产生什么样的直接后果呢？如果联合委员会处于国际总委员会和**工联全国理事会**之间，它就不会享有任何威信。另一方面，总委员会就会放

棄这个偉大的杠杆。如果我们宁願去閑扯，而不願进行严肃的和細微的工作，我們也許会犯这样的錯誤，例如公开地回答“平等报”的問題：为什么**总委员会**能容忍“如此繁重的兼職”。

不能把英国简单地同其他国家等量齐观。应当把它看做是資本的首都。

5. 关于总委员会就爱尔兰大赦所作的決議^① 問題。

如果說英国是大地主所有制和欧洲資本主义的堡垒，那末唯一能使官方英国受严重打击的地方就是爱尔兰。

第一，爱尔兰是英国大地主所有制的支柱。如果大地主所有制在爱尔兰崩潰了，它在英国也必定要崩潰。在爱尔兰发生这样的事可能要容易一百倍，因为那里的經濟斗爭只是集中在土地所有制上，因为在那里这一斗爭同时又是民族斗爭，因为爱尔兰人民比英国人民更富有革命情緒和更加頑强不屈。爱尔兰的大地主所有制仅仅是靠英国軍隊来維持它的地位。一旦这两个国家的强制的合并³³⁵ 停止，社会革命，尽管是古老形式的社会革命，就会在爱尔兰爆发。英国的大地主所有制不仅会失去它的巨大的財富来源，而且会失去作为英国統治爱尔兰的代表者的那种道义力量的最重要来源。另一方面，如果让英国大地主在爱尔兰保持强大的势力，英国无产階級就无法使他們在英国本土受到損害。

第二，英国資產階級不仅利用爱尔兰的貧困，以便通过对爱尔兰貧民采取的强制移民手段来使英国工人階級的状况更加恶化，除此以外，它还把无产階級分成两个敌对的营垒。凯尔特工人的革命热情和盎格魯撒克逊工人的严肃的但是迟緩的性格沒有和諧

① 見本卷第 433—434 頁。——編者注

地結合起來。相反，在所有的英國大工業中心，英國無產者和愛爾蘭無產者之間存在着很深的對立。普通的英國工人憎恨愛爾蘭工人，把他們看做降低工資和 *standard of life*〔生活水平〕的競爭者，他們對愛爾蘭工人抱有民族的和宗教的厭惡，幾乎像美國南部各州的 *poor whites*〔白種貧民〕看待黑奴那樣看待他們。資產階級在英國本土的無產者之間人為地煽起和培植這種對立。資產階級知道，無產者的這種分裂狀態是保存它的勢力的真正秘訣。

在大西洋彼岸也產生了這樣的對立。被牛群和羊群從故鄉排擠出去的愛爾蘭人在美國重逢，他們是那裡的居民中人數眾多而且不斷增長的一部分。他們一致的思想，一致的情感就是憎恨英國。英國政府和美國政府，也就是說這兩個政府所代表的那些階級，正在培植這樣的情感，其目的是使美國和英國之間的隱蔽的鬥爭永遠繼續下去。它們以此來阻撓大西洋兩岸的工人之間的嚴肅而真誠的聯合，從而阻撓他們的共同解放。

愛爾蘭是英國政府維持龐大的常備軍的唯一借口，一旦需要，正像已經發生過的那樣，就把這支在愛爾蘭受過軍閥主義教育的軍隊用來對付英國工人。

最後，目前在英國正重複着在古羅馬到處都能看到的事件。奴役其他民族的民族是在為自身鍛造鐐銬。

因此，國際協會在愛爾蘭問題上的立場是十分明確的。它的主要任務是加速英國的社會革命。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必須在愛爾蘭進行決定性的打擊^①。

總委員會關於愛爾蘭大赦的決議只是其他另一些決議的引

^① 手稿上在“必須在愛爾蘭進行……打擊”之後刪去了下面一句話：“用一切方法促進愛爾蘭人的經濟鬥爭和民族鬥爭。”——編者注

言，那些決議將說到：姑且不談國際上的公道，英國工人階級解放的先決條件是把現存的強制的合併，即對愛爾蘭的奴役，變為平等自由的聯盟——如果這是可能的話，或者完全分離——如果這是必要的話^①。

此外，“平等報”和“進步報”所提出的關於社會運動和政治運動之間的聯繫的理論，或者更確切些說，關於二者之間沒有聯繫的極端無知的理論，據我們所知，從來沒有在任何一次國際代表大會上被承認。它同我們的章程相矛盾。章程中說：

«That the *economical emancipa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es is therefore the great end to which *every political movement ought to be subordinate as a means*»^②。

在1864年巴黎委員會所譯的法譯文中，«*as a means*»（“作為手段”）這幾個字被刪掉了³³⁶。巴黎委員會在答复總委員會的質問時，借口自己的政治地位的困難來為自己辯解。

對章程原文的其他地方也有一些曲解。章程的引言部分的第一段宣稱：«The struggle for the emancipation of the working

① 手稿上在“如果這是必要的話”後面刪去了下面一段話：“關於站在這種立場上的總委員會委員們所面臨的困難，甚至危險，可以根據以下的事實來判斷，即‘蜂房報’在它報道我們的會議情況時不僅刪去了我們的決議，甚至不提及總委員會研究愛爾蘭問題的事實本身，——這樣一來，委員會就不得不採取措施來印發自己的決議，以便把決議分別寄給每一個工聯。現在‘平等報’很容易地說什麼這是‘地方性的政治運動’，說什麼按照它的意見，應當由聯合會委員會本身去處理這些瑣事，而無須‘改善各國現有的政府’。‘平等報’還可以根據同樣的理由，說什麼我們揭露比利時政府進行的屠殺是打算改善比利時政府。”——編者注

② ——“因而工人階級的經濟解放是一切政治運動都應該作為手段服從於它的偉大目標”（見本卷第15頁）。——編者注

classes means... a struggle... for equal rights and duties, and the *abolition of all class rule*»^①.

在巴黎的譯文中談到了“平等的权利和义务”，也就是說重复了近百年来几乎在所有民主主义宣言中都能遇到，而在不同階級的代表人物口中却含有不同意义的一般詞句；但是譯文中刪去了《*the abolition of all class rule*》（“消灭階級”）这一具体要求。

继而在章程的引言部分的第二段中写道：《That the economical subjection of the *man of labour* to the *monopoliser of the means of Labour*, that is *the sources of life* etc.》^②.

在巴黎的譯文中把《*means of labour, that is the sources of life*》^③——这个詞除了包括其余的劳动資料，还包括土地——改成了“資本”。

不过，登載在“左岸”报社 1866 年在布魯塞尔出版的小册子上的法譯文³³⁷恢复了原文的本来面目。

6. 关于李卜克內西和施韦澤的問題。

“平等报”說：“这两派都屬於国际。”这是不正确的。爱森納赫派（承蒙“进步报”和“平等报”把它变成公民李卜克內西派）屬於国际。施韦澤派不屬於它。施韦澤自己曾在他的报纸（“社会民主党人报”）上詳細地闡明过，为什么拉薩尔派的組織不消灭自己本身就不能加入国际³³⁸。他自己并不知道他說出了真理。他的那个拼

① ——“工人階級的解放斗爭……是要爭取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消灭任何階級統治”（見本卷第 15 頁）。——編者注

② ——“劳动者在經濟上受劳动資料即生活源泉的壟断者的支配……”（見本卷第 15 頁）——編者注

③ ——“劳动資料即生活源泉”。——編者注

凑起来的宗派主义組織是同工人階級的历史的、自然形成的組織相矛盾的。

“进步报”和“平等报”要求总委员会公开說出自己對李卜克內西和施韦澤之間的个人分歧的“看法”。既然公民約翰·菲力浦·貝克尔（他同李卜克內西一样都遭到施韦澤的报纸的誹謗）是“平等报”編輯委员会的一員，那末让人感到非常奇怪的是，这家报纸的出版者竟如此消息不灵通。他們應該知道，李卜克內西在“民主周报”上曾經公开地建議施韦澤承认总委员会是他們的分歧的仲裁人³³⁹，而施韦澤也曾經同样公开地拒絕承认总委员会的权威³⁴⁰。

为了結束这场爭吵^①，总委员会从自己方面用尽了一切手段。它委托自己的德国書記同施韦澤通信；通信持續了两年之久，但是，总委员会的一切尝试都由于施韦澤无论如何都固执地把自己的专橫霸权同宗派組織一起保存下来而归于失敗。总委员会要做的事情是，选择一个有利的时机，那时它公开干預这场爭吵将利多弊少。

7. 既然“平等报”編輯部公开提出它的譴責，而这又可能被认为是来自日內瓦的罗曼語区委员会的譴責，因此总委员会将自己的答复抄知同它有通信关系的各委员会。

受总委员会的委托

卡·馬克思写于1870年1月1日

左右

这份文件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馬克思夫人燕妮·馬克思所抄的并經作者校正的手稿副本譯的

① 在萊克抄写的手稿副本上，“爭吵”后面还加了一句：“这场爭吵給德国无产阶级政党投下了暗影”。——編者注

卡·馬克思 訃告³⁴¹

倫敦总委員會北美通訊員、国际的創建人之一、公民罗伯特·肖因患肺結核症不幸于本周逝世。

罗伯特·肖是委員會最热忱的委員之一。他心地純洁，性格剛毅，具有火热的感情和真正的革命精神；他憎恶狹隘、虛荣和貪图私利。他自己是一个貧苦的工人，但他总是尽一切可能来帮助比他更貧苦的工人。他在私人交往方面像孩子一般温順，但在社会生活中却对任何妥协行为深恶痛絕。工联所以能够团結在我們的周圍，主要是由于他的不間断的努力。但他也由于这方面的活动而給自己招来了許多死敌。英国工联是由各种地方性的組織形成的，这些組織在其成立之初都是以維護工資等等作为唯一的宗旨，因此它們全都或多或少地沾染了中世紀行会所特有的那种狹隘性。一部分为数不多的保守派力求不惜任何代价来保存工联成立之初的框子。肖在国际成立时就抱定宗旨要打碎这种自造的桎梏，把工联变成准备无产階級革命的中心。他的努力差不多一直都是卓有成效的，然而，与此同时，他整个一生所經歷的严酷无情的斗争損害了他病弱的身体。他去出席布魯塞尔代表大会的时候（1868年9月），已經是病勢垂危了。而他回来以后，慈善的资产

階級雇主們又把他关在企业的大門之外。他死后妻女貧困不堪，但是英国工人絕不会把他們丢开不管的。

馬克思写于1870年1月8日
左右

載于1870年1月16日“国际报”
第53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譯自“国际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 “德国农民战争”第二版序言³⁴²

这部著作是 1850 年夏天当刚刚完成的反革命还留着直接印象的时候在伦敦写成的；它发表于 1850 年由卡·马克思主编在汉堡出版的“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杂志第 5 期和第 6 期上。我的在德国的一些政治友人要求我把它再版，于是我便来满足他们的愿望，因为可惜的是，这部著作至今还没有失去它的现实意义。

这部著作并不奢望提供独立研究过的材料。相反，关于农民起义和托马斯·闵采尔的全部材料，都是从威美尔曼那里借用的。³⁴³ 他那本书虽然有些缺点，但仍然不失为一部最好的资料汇编。并且，威美尔曼老人热爱自己所研究的对象。那种驱使他在这本书里到处为被压迫阶级辩护的革命本能，不久就使他成为法兰克福的极左派³⁴⁴ 的最优秀代表之一。^①

如果说，尽管如此，威美尔曼所作的论述还是缺乏内在联系，如果说他没有能把这个时代的宗教上政治上的 Kontroverse（争论问题）作为当时阶级斗争的反映表现出来，如果说他在这个阶级斗

① 在“德国农民战争”第三版（1875 年）中，下面还有这样一句话：“诚然，从那时起，他仿佛是有有点衰老了。”——编者注

爭中只看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善良者和凶恶者以及凶恶者的最后胜利，如果說他对于决定斗争的开端与結局的那些社会关系所持的見解带有很大的缺点，那末，这一切正是这本书問世的那个时代特有的錯誤。相反，这本书是德国唯心主义历史著作中值得嘉許的一个例外，就当时來說，它还是写得很富于现实主义精神的。

我的論述打算只是大致地闡明斗争的历史进程，打算說明农民战争的起源，参加这一战争的各种党派的立場，这些党派企图借以弄清自己立場的那些政治的和宗教的理論，以及从当时这些階級的社会生活历史条件中必然产生的斗争結局本身；这就是說，我是打算指明：当时德国的政治制度，反对这一制度的起义，以及当时那个时代的政治的和宗教的理論，并不是当时德国农业、工业、水陆交通、商业和货币流通所达到的发展程度的原因，而是这种发展程度的結果。这个唯一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不是由我，而是由馬克思发现的，这个历史观还見于他在同一个“政治經濟評論”杂志上发表的論述 1848—1849 年法国革命的著作，以及“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³⁴⁵

德国 1525 年革命和 1848—1849 年革命間的类似之处異常明显，以致当时不能完全不談到它。但是，除了各种地方起义都是被同一种諸侯軍相继鎮压下去这一事变进程中的相同点之外，除了城市资产階級在这两种場合的行动相同得往往令人好笑之外，其間的差別也还是十分明显的：

“从 1525 年的革命中得利的是誰呢？諸侯。从 1848 年的革命中得利的是誰呢？大諸侯，奥地利与普魯士。站在 1525 年的小諸侯背后的，是用捐稅鎖鏈把这些小諸侯束縛起来的小市民；站在 1850 年的大諸侯背后，站在奥地利和普魯士背后的，是很快就通

过国债制服了这些大诸侯的现代大资产阶级。而站在大资产阶级背后的是无产阶级。”³⁴⁶

很可惜，应当说这个论点未免把德国资产阶级看得太高了。在奥地利和普鲁士，它都曾经有可能“很快就通过国债制服”君主国，可是，无论何时何地这种可能都没有被利用。

由于1866年战争的结果，资产阶级获得了奥地利作为礼物。但是，资产阶级不善于统治，它软弱无力，庸碌无能。它只会做一件事，即一当工人行动起来，就狂暴地对付他们。它所以还在掌握政权，仅仅是由于匈牙利人需要它。

而在普鲁士呢？固然，国债以惊人的速度增加起来了，财政赤字已成为经常的现象，国家支出一年比一年增多，资产阶级已在议院里占有多数，非经它同意就既不能增加赋税，也不能订借借款，——但是，它对国家的统治何在呢？还在几个月以前，当国家又面临财政赤字的时候，资产阶级的地位是极为有利的。它只要稍许坚持一下，就能取得很大的让步。可是它做了什么呢？它认为，政府允许它献款约900万，并且不只是一年，而是今后每年如此，这就是一个足够大的让步了。

我并不想来苛责议院中的那些可怜的“民族自由党人”³⁴⁷。我知道，他们已被那些站在他们背后的人即资产阶级群众抛弃了。这个群众不愿进行统治。他们还非常清楚地记得1848年。

德国资产阶级为什么表现得这样畏首畏尾，这一点我们留待下面来讲。

上面引用的论断在其他各方面完全得到了证实。从1850年起，各个小邦日益明确地退到后面去了，只是充当着普鲁士和奥地利进行倾轧阴谋的工具；奥地利和普鲁士彼此间发生愈来愈激烈

的爭夺霸权的斗争，以致终于在1866年采取了暴力解决的手段，在这之后，奥地利保留了自己原有的省区，普魯士直接或間接地控制了整个北部地区，而西南部三个邦暂时还被排斥在門外³⁴⁸。

在这全部堂皇的演出中，对德国工人阶级有意义的只有如下几点：

第一，工人因普选权的施行而有机会直接选派自己的代表参加立法議會。

第二，普魯士以吞并另外三个天賜王权而树立了良好的榜样³⁴⁹。现在，甚至民族自由党人也不相信普魯士在这个行动之后仍旧握有它先前自命自封的那样一个完美无缺的天賜王权了。

第三，在德国现在只剩下一个反对革命的严重敌手——普魯士政府了。

第四，现在奥地利的德国人终于必须给自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了：他们究竟愿意作什么人——德国人，还是奥地利人？究竟什么对他们更珍贵些——是德国，还是莱达河彼岸的那些非德属小块地区？本来早就很清楚，他们必须放弃其中的一个，但是这一点一直被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蒙蔽起来了。

至于从那时起已成为“民族自由党”和“人民党”³⁵⁰双方热烈讨论的对象的其他有关1866年的重要争论问题，随后数年的历史已经证明：这两种观点所以如此激烈地互相敌对，也无非是因为它们是同一个局限性的两个相反的极端而已。

在德国的社会关系中，1866年几乎没有改变任何东西。几点资产阶级改革，如统一度量衡，迁徙自由，营业自由等等，——而这一切都是局限于官僚制度所能够接受的范围内，——甚至没有取得其他西欧资产阶级早已得到的东西，并且丝毫也没有触动主要

的禍害——官僚主义的經營权制度³⁵¹。而对于无产阶级說来，通常的警察行动本来也已經把迁徙自由、公民权、廢止身分证等所有法律完全变成一紙空文了。

比1866年的堂皇的演出意义更重大得多的，是从1848年起在德国开始的工商业的高漲，铁路的加速建設，电报和海洋航运业的发展。尽管这些成就还不及当时英国以至法国所达到的成就，但它們对于德国說来却是空前未有的，它們在二十年中带来的成果比以前整整一个世紀还要多。只有到这时，德国才完全和最終被卷入了世界貿易。工业家的資本迅速增加了，因而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也提高了。最能表明工业繁荣的投机事业广泛发展，它已把伯爵和公爵們紧系在它的凱旋車上了。在十五年以前，德国铁路还曾向英国企业主請求援助，而这时德国資本——保佑它在天之灵！——却已經在俄国和羅馬尼亚修筑铁路了。可是为什么资产阶级沒有在政治上也夺得統治，为什么它在政府面前表现得如此懦弱呢？

德国资产阶级的不幸就在于：它按照习惯的德国風度，出世得太迟了。它兴盛的时期，正是欧洲其他国家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已開始衰敗的时期。在英国，资产阶级能把真正自己的代表布莱特送到政府里去，只是由于扩大了选举权，——这种办法的后果是必定会終結整个资产阶级統治的。在法国，资产阶级作为整个阶级来进行統治，只有两年之久，即只是在1849年和1850年，在共和国时期；它只是由于把自己的政治統治让給了路易·波拿巴和軍隊，才得以延长了自己的社会存在。而在欧洲三个最先进国家相互作用已經无限增长的条件，当资产阶级的政治統治在英国和法国已經衰敗了的时候，资产阶级要在德国安安靜靜地确立自己

的政治統治，已經是不可能的了。

与所有其他曾經占統治地位的階級相比，資產階級的特点正是在于：在它的发展中有一个轉折点，經過这个轉折点之后，它的威力手段每进一步的增加，从而首先是它的資本每进一步的增加，只是使它愈来愈沒有能力进行政治統治。“站在大資產階級背后的是无产階級”。資產階級把自己的工业、商业和交通发展到什么程度，它也就使无产階級成长到什么程度。而到了一定时刻（这种时刻不是到处同时到来，也不一定在同一发展阶段上到来），它就会开始觉察到：它那形影不离的同伴——无产階級已开始胜过它了。从这时起，它就丧失进行独占政治統治的能力；它为自己寻找同盟者，斟酌情况或是把自己的統治权分給他們，或是把統治权完全让給他們。

在德国，資產階級的这个轉折点在1848年就已来到了。誠然，那时德国資產階級与其說是害怕德国无产階級，倒不如說是害怕法国无产階級。1848年巴黎的六月战斗已經向它表明什么前途在等着它；当时德国无产階級所表現的十分激憤的状态，足以向它证明：在德国也已撒下可以得到同样收获的种子；从这时起，德国資產階級政治行动的鋒芒就被摧折了。它开始找寻同盟者，不計代价地把自己出卖給他們，——而直到今天它一步也沒有前进。

所有这些同盟者都是本性反动的。这就是拥有自己的軍隊和官僚机构的王权，这就是大的封建貴族，这就是小的土容克地主，最后，这就是神甫。資產階級跟所有这些都締結了合同和協議，只求保全自己寶貴的性命，直到最后它无可典卖时为止。而无产階級愈发展，愈是开始意識到自己是個階級，并作为一个階級行动起来，資產階級就愈是变得畏首畏尾。当普魯士人的拙劣得惊人

的战略在薩多瓦战役中战胜了奥地利人的更加拙劣得惊人的战略时，很难說是誰更轻松地吁一口气，——是在薩多瓦同样被击败了普魯士资产者，还是奥地利资产者。

我們的大资产者在1870年的行动，与1525年中产市民的行动一模一样。至于小资产者、手艺人和小店主，他們是永远不变的。他們千方百計地希望躋身于大资产阶级的行列，他們害怕被抛到无产阶级的行列中去。他們徬徨于恐惧和希望之間，在斗争时会力求保全自己宝贵的性命，而在胜利后去投靠胜利者。这就是他們的本性。

伴随着1848年以后的工业高涨，无产阶级的社会和政治活动也开展起来了。单是目前德国工人在其工会、合作社組織、政治組織和政治集会中，在选举以及所謂国会中所起的作用，就足以表明，最近二十年来在德国已不知不觉地发生了什么样的变革。德国工人获得了很大的荣誉：唯有他們做到了把工人和工人代表派到国会中去，而无论是法国人或英国人到现在为止都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

但是，就連无产阶级也还没有成长到不能再与1525年相比的状态。不得不完全地并且終生地依靠工資过活的阶级，还远沒有构成德国人民的多数。因此，它也不能沒有同盟者。而同盟者只能在小资产阶级、城市流氓无产阶级、小农和农业工人中間去寻找。

关于小资产者，我們已經說过了。他們是极不可靠的；只有当胜利已經取得时他們才在啤酒館中高呼狂叫。然而，在他們中間，也有一些自动加入到工人方面来的优秀的分子。

流氓无产阶级是主要集中于大城市中的、由各个阶级的堕落分子构成的糟粕，他們是一切可能的同盟者中最坏的同盟者。这

帮浪蕩之徒是很容易被收买和非常厚顏无耻的。如果說法国工人們在每次革命中都在牆壁上写着 «Mort aux voleurs!» ——“消灭盜賊!” ——并且把他們枪毙了不少，那末这并不是由于法国工人热中于保护财产，而是由于他們正确地認識到首先必須摆脱这帮家伙。任何一个工人領袖只要利用这些流氓作为自己的近卫軍或依靠他們，就已經足以表明他是运动的叛徒。

小农——大农屬於资产階級——有不同类型：

其中有些是封建的农民，他們还必須为自己的主人服劳役。既然资产階級已經放过了把他們从农奴依附地位解放出来（这曾是资产階級的职责）的机会，所以也就不难令他們相信：他們只有依靠工人階級才能求得解放。

其中有些是佃农。在这方面存在着大部分与爱尔兰相同的关系。地租已增加得如此之高，以致在得到中等收成时，农民也只能勉强維持本人和自己家庭的生活，而在收成不好时，他們就几乎要餓死，无力交納地租，因而陷于完全听任土地所有者摆布的境地。资产階級只有迫不得已时才会为这些人作一点好事。除了工人，他們还能指望誰来拯救自己呢？

还有一些农民是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进行經營。他們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靠抵押借款来維持，因而他們就像佃农依附土地所有者那样依附高利貸者。他們只有很少一点收入，而且这种收入由于收成的好坏不同而极不穩定。他們絕對不能对资产階級寄托什么希望，因为正是资产者、高利貸資本家在榨取他們的脂膏。但是，他們大部分都牢牢抱住自己的财产不放，虽然这个财产实际上不是屬於他們，而是屬於高利貸者的。尽管如此，还是应当說服他們，要他們相信只有在服从人民意志的政府把一切抵押債務变成

对国家的債務，并从而减低利息之后，他們才能从高利貸者压迫下获得解放。而这是只有工人阶级才能做到的。

凡是中等地产和大地产占統治地位的地方，农业工人是农村中人数最多的阶级。德国整个北部和东部地区的情况就是如此，而城市工业工人就在这里找到自己人数最多的天然同盟者。正像資本家与工业工人相对立一样，土地所有者或大租佃者是与农业工人相对立的。那些帮助工业工人的措施，也能帮助农业工人。工业工人只有当他們把资产阶级的資本，即为生产所必需的原料、机器和工具以及生活資料变成社会财产，即变成自己的、由他們集体享用的财产时，他們才能解放自己。同样，农业工人，也只有当首先把作为他們主要劳动对象的土地从大农民和更大的封建主私人占有中夺取过来，而变作由农业工人的合作团体集体耕种的社会财产时，他們才能摆脱可怕的貧困。这里，我們就談到了巴塞尔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的著名決議：为了社会的利益，必須把地产变成集体的、国家的财产。³⁵² 这个決議所指的，主要是这样的国家，那里存在有大地产以及与它相連系的、在大片土地上經營的大規模經濟，而且在这种大地产上存在有一个主人和許多雇佣工人。而这种情况一般說来在德国还占优势，因此巴塞尔代表大会的決議，对于德国也和对于英国一样，正好是极为适时的。农业无产阶级，即农业工人，是为各邦君主軍隊提供新兵最多的阶级。这是目前由于实行普选权而把許多封建主和容克地主送到国会去的阶级。但同时这又是最靠近城市工业工人，与他們生活条件相同，甚至处于比他們更貧困的境地的阶级。这个阶级因零星分散而軟弱无力；但是，政府和貴族十分知道它的潜在力量，因而故意使教育事业雕蔽，好让这个阶级繼續处于愚昧无知的状态。喚起这个阶级

并吸引它参加运动，是德国工人运动首要的最迫切的任务。一旦农业工人群众学会理解自己的切身利益，在德国就不可能再有任何封建的、官僚的或资产阶级的反动政府存在了。

弗·恩格斯写于1870年2月11日
左右

载于1870年10月在莱比锡出版的
弗·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第2版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德国农民战争”
第2版

L'INTERNATIONALE

ORGANE DES SECTIONS BELGES

DE 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PARAISANT LE SAMEDI

卡·馬克思 英国政府和被囚禁的 芬尼亚社社員³⁵³

1870年2月21日于倫敦

一

欧洲报刊对于英国资产阶级寡头政府的丑行保持緘默，那是有各种原因的。首先，英国政府是富有的，而报刊，如你们所知道的，是不被收买的。此外，英国政府是大地主、大陆上的资本家甚至加里波第（见他的著作³⁵⁴）所公认的模范政府；因此，不应当诋毁这个理想的政府。最后，法国的共和主义者們是如此狭隘和自私，他们把自己全部的愤怒都貯藏起来准备对付法兰西帝国。要是告诉他們的同胞說，在到处是兵营的国家里应判处六个月监禁的事，在资产阶级自由的国家里却要判处二十年苦役，那会成为一种玷污言論自由的犯罪行为。下面就从英国报纸上摘引几段有关

如何对待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員的詳細报道。

墨尔凯希，“爱尔兰人民”周报³⁵⁵的助理編輯，以参加芬尼亚社密謀被叛罪，他在达特木尔監獄被套上铁索去拉装满石头的馬車。

奥頓諾凡-罗薩，“爱尔兰人民”的出版人，被关在黑牢里达35天之久，双手日夜被反铐在背后。甚至在吃飯时也不給他去掉鐐铐。至于他的食物，則只有給他放在牢房地上的一点稀湯。

基卡姆，“爱尔兰人民”的編輯之一，他的右手由于生疮已經不能抬动，但仍被迫和同獄的人一起在严寒多雾的11月里坐在碎石堆上用左手砸磚石。晚上他回到牢房里的时候，他的食物只有6盎斯面包和1品脫热水。

奥利里，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年犯人，在三个星期中只靠白水和面包过活，因为他不願放棄異教（显然，獄吏是把不信神称为異教的），不願成为天主教徒、新教徒、长老会教徒甚至战栗教徒，而且也不願皈依典獄长让这个爱尔兰異教徒选择的許多宗教中的任何一种。

馬丁·亨·凱里，被囚禁在米耳班克的瘋人院中。由于被禁止說話以及其他的虐待，他被逼瘋了。

理查·伯克上校的情况也并不好些。他的一位朋友写信說，伯克的智力受到了損害，他丧失了記憶力；他的举止、行为和言談都证明他已經瘋癲。

政治犯們被从一个監獄牵到另一个監獄，好像他們是一群野兽似的。他們被迫和一批最恶劣的流氓住在一起，洗滌这些坏蛋用过的器皿，穿着这些罪犯的衣褲（这些罪犯中許多人都患有最令人厌恶的疾病），并用这些人用过的水洗濯。在芬尼亚社社員到波特兰以前，所有这些罪犯是被允許和探望他們的人談話的。为被

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員設置了一種探望牢房。這種牢房包括用粗鐵柵隔開的三個房間，獄吏在中間的一間，犯人和他的朋友只能隔着兩道鐵柵彼此相望。

在船塢里的一些犯人，把所有的蝸牛都吃光了，而在查塔姆，青蛙被當作一種美味。托馬斯·伯克將軍宣稱，他並不由於看到湯里有一隻死老鼠而感到驚奇。那些被判罪的人說，芬尼亚社社員被押到監獄來的日子，是他們的一個不幸的日子（制度變得嚴格得多了）。

我要對上面這幾段話再補充幾句。

去年，內務大臣普魯斯先生這位大自由派、大警官、威爾士的大礦主、勞工的殘酷剝削者，曾因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員、特別是奧頓諾凡-羅薩所遭到的虐待而受到質問。起初他一概加以否認，但後來被迫承認了。於是，下院愛爾蘭議員穆爾先生要求對這些事實進行調查。但激進內閣斷然拒絕進行這一調查，這個內閣的首腦是半聖人格萊斯頓先生（曾經有人公然把他比做耶穌基督），而約翰·布萊特這個資產階級的老蠱惑家則是它的最有影響的成員之一。

最近，關於虐待的傳聞又起，幾個議員要求普魯斯大臣准許對囚犯進行訪問，以便判明這些傳聞純屬虛構。普魯斯先生拒絕了這一請求，據他說，因為典獄長們擔心這種訪問會在犯人中引起極大的騷動。

在上星期，內務大臣再次受到質問。人們問他，奧頓諾凡-羅薩是否真的在當選為梯培雷里的代表以後受過體刑（即受過鞭笞）；這位大臣先生說，從1868年以來，對奧頓諾凡-羅薩沒有發生

过这种事（因此，这就是承认在两三年中这个政治犯确曾受过鞭笞）。

我現在一并寄上有关芬尼亚社社員迈克尔·泰伯特的情况的一段报道（这些我們将在下期刊載）。他因参加芬尼亚运动而被判苦役，在爱尔兰科克郡斯派克島監獄中服刑。你們可以看到，驗尸官（法院偵查員）本人也承认他是因遭受严刑拷打致死。这次調查是在上周进行的。

在两年中，已有二十多个工人芬尼亚社社員死亡或发狂，这就是这些在善良的大地主們支持下的善良的资产者的博爱仁慈的恩賜。

你們大約知道，对于那些为美丽的法兰西作裝飾的可恶的宣布非常状态的法令，英国报纸曾經假仁假义地表示憤慨。但是，除了几次短时期的中断以外，宣布非常状态的法令却构成了爱尔兰的宪章。从1793年起，英国政府以各种各样的理由作为借口，經常每隔一个时期便在爱尔兰使 Habeas Corpus Bill（保障人身自由的法律）³⁵⁶ 暂时停止生效，而实际上是使一切法令暂时停止生效，只有暴力法令是例外。就这样，成千上万的人在爱尔兰被逮捕，可是并未对他們进行审讯，甚至沒有提出控告，逮捕的唯一理由是有参加芬尼亚运动的嫌疑。英国政府并不满足于剝夺他們的自由，还极端野蛮地拷打他們。下面是一个例子：

一个把芬尼亚社嫌疑分子活活埋葬在其中的監獄，就是都柏林的蒙特乔伊監獄。这个監獄的獄監默里簡直是一只野兽。他以极端野蛮的方式对待犯人，使其中一些人发了瘋。監獄医生奥唐奈是个好人（他在迈克尔·泰伯特死后驗尸时也起了值得称道的作用），他一連几个月写信表示抗議，起初是写給默里本人；由于

默里未予答复，奥唐奈就写信向上級揭发；但默里这个老练的獄吏，把这些信件扣起来了。

最后，奥唐奈就直接向当时的爱尔兰总督美奥勋爵写信。那时执政的是托利党(得比一迪斯累里)。奥唐奈的嘗試的結果又怎样呢？根据議会的命令，发表了有关这一事件的各种文件，而……奥唐奈医生竟被撤职!!! 至于默里，他却保留原职。

接着，格萊斯頓的所謂激进內閣上台了。这就是那位优雅的、殷勤的、寬宏大量的格萊斯頓，那位曾經为受炮彈国王虐待的波埃利奥和其他资产者的遭遇在全欧洲面前洒过如此真誠的热泪的格萊斯頓。³⁵⁷ 这个进步资产阶级的偶像做了些什么呢？他在蛮横地回絕了爱尔兰人对大赦的要求、侮辱了爱尔兰人的同时，不仅批准默里这个穷凶极恶的家伙保留原职，而且为了表示他对这个人十分滿意，竟在原来的看守长职位之外，又給了他一个肥缺！这就是资产阶级博爱的使徒的所作所为！

但是，还得蒙蔽一下公众的眼睛，还得装一下正在替爱尔兰做事情的样子；于是就拿一个整頓土地問題的法律(Land Bill)³⁵⁸来大事宣揚。但所有这一切都无非是一种欺騙，最終目的是給欧洲造成一种錯觉，以大地主和租佃者进行无休止的訴訟的远景来引誘爱尔兰的法官和律师，以国家发給補助金的諾言来博取大地主的欢心，以某些微小的让步来欺騙較富裕的租佃者。

格萊斯頓在他那玩弄辞藻而又混乱不堪的演讲的冗长的开场白中承认，尽管自由主义的英国在过去一百年間恩賜給爱尔兰种种“仁慈的”法律，这个国家还是一直走向毁灭。³⁵⁹ 可是，在天真地、不自觉地透露了这一点之后，同一个格萊斯頓却繼續拷打那些希望終結这种有害而又荒唐的立法的人。

二

下面是一家英国报纸发表的关于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員迈克尔·泰伯特死亡事件的调查结果，泰伯特是在斯派克島監獄中由于受到虐待而致死的。

2月17日，星期四，密得尔頓区驗尸官約翰·穆尔先生在斯派克島監獄对犯人迈克尔·泰伯特死于医院事件进行了调查。

第一个被傳訊的是典獄长彼得·海依。他的证詞如下：

已故的迈克尔·泰伯特是在1866年6月进这个監獄的。我不知道他当时的健康状况如何；他在1月12日被判7年徒刑；不久前他显然病了，因为監獄記事簿上写道，由于医务人员认为他不能經受单独監禁而被移往別处。接着，证人詳述死者曾因違反紀律、特別是对医务人员不敬而屢次受到懲罰。

杰雷迈亚·休伯特·凱利。我記起来了，当迈克尔·泰伯特从蒙特乔伊監獄被解到这里来的时候，已經判明他受不了单独監禁；这一点是經奥唐奈医生签字证明的。但是我看他是健康的，就叫他去干活。我記得，1869年1月31日到2月6日他在医院里；当时他患心臟病，这以后就不再要他去和大家一起干活，而是让他在牢房中干活。3月19日到26日，他因心臟病住在医院里；4月24日到5月5日，因咯血住院；5月19日到6月1日，6月21日到22日，7月22日到8月15日，因心臟病住院；11月9日到12月13日，因全身衰弱住院；最后一次住院是12月20日到1870年2月8日，因水肿病死在那里。最初发现这病的症状是在11月13日，但后来症状又消失了。

我每天都去单独監禁的牢房巡視，有时看到他正在受罰；我的責任就是在我认为犯人已不能忍受时，停止处罰；对他，我这样做了两次。

“您是一个医生，不管他在蒙特乔伊和这里的健康状况如何，您是否想过，五天五夜只給他吃面包和水是对他的一种过严的懲罰呢？”

“我没有想到这一点，死者的胃口很好，我没有想到这些措施会引起使他死亡的水肿病。”

馬丁·奥康奈尔，斯派克島的药剂师。去年7月，证人曾告訴凱利医生，

由于泰伯特患心臟病，不应对他处罰；证人认为，这些处罰危害了犯人的健康，而且在去年他已被认为是殘廢者；如果证人沒有机会在凱利医生不在的情况下去看过单独监禁的牢房，他决想不到能这样处罰殘廢者；对于一个在这种情况下的人，很清楚，五天的单独监禁是会損害他的健康的。

于是，驗尸官坚决反对这样对待犯人。他說，这个犯人曾在医院和单身牢房輪流居住。

法庭作出了以下的决定：

“我們宣告，迈克尔·泰伯特因水肿病于 1870 年 2 月 8 日死于斯派克島監獄；死者年 36 岁，未婚。据奥唐奈医生的意見，泰伯特已不能經受单独监禁，而死者却被屢次处罰，即一連数日被关在单人牢房中，只給他一些面包和水。他自 1866 年 6 月从蒙特乔伊監獄解来斯派克島以后，曾一再遭到这种待遇。对此，我們表示严厉的譴責。我們斥責如此对待犯人。”³⁶⁰

卡·馬克思写于 1870 年 2 月 21 日

原文是法文

載于 1870 年 2 月 27 日和 3 月 6 日

俄文譯自“国际报”

“国际报”第 59 号 and 第 60 号

ГЛАВНЫЙ СОВѢТЪ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ГО ТОВАРИЩЕСТВА РАБОЧИХЪ

Членамъ Комитета Русской Секции въ Женевѣ.

Граждане,

Въ своемъ засѣданіи 22-го Марта Главный Совѣтъ объявилъ, единодушнымъ вътомъ, что ваша программа и статутъ согласны съ общими статутам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го Товарищества Рабочихъ. Онъ послѣднимъ принялъ вашу вѣтвь въ составъ Интернаціонала. Я съ удовольствіемъ принимаю почетную обязанность, которую Вы мнѣ предлагаете, быть вашимъ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мъ при Главномъ Совѣтѣ.

Вы говорите въ вашей программѣ:

... „что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е иго, гнетущее Польшу, есть тормазъ, одинаково препятствующі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 социальной свободѣ обонхъ народовъ — какъ русскаго такъ и польскаго;“

Вы могли бы прибавить, что русскій насильственный захватъ Польши есть пагубная опора и настоящая причина существованія военнаго режима въ Германіи, и вслѣдствіе того, на цѣломъ континентѣ. Поэтому, работая надъ разбитіемъ цѣпей Польши, русскіе социалисты возлагаютъ на себя высокую задачу, заключающуюся въ томъ уничтоженіи военнаго режима, которое существенно необходимо какъ предварительное условіе для общаго освобожденія европейскаго пролетаріата.

Нѣсколько мѣсяцевъ тому назадъ, мнѣ прислали изъ Петербурга сочиненіе Флеровскаго: „Положеніе рабочаго класса въ Россіи.“ Это настоящее открытіе для Европы. Русскій оптимизмъ,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ный на континентѣ даже такъ-называемыми революціонерами, безпощадно разоблаченъ въ этомъ сочиненіи. Достоинство его не пострадаетъ, если я скажу, что оно въ нѣкоторыхъ мѣстахъ не вполне удовлетворяетъ критикѣ съ точки зрѣнія чисто теоретической. Это — трудъ серьезнаго наблюдателя, безстрашнаго труженика, безпристрастнаго критика, мощнаго художника и,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человѣка, возмущенаго противъ гнета во всѣхъ его видахъ, нетерпящаго всевозможныхъ національныхъ гниловъ, и страстно дѣлающаго все страданія и все стремленія производительнаго класса.

Такіе труды какъ Флеровскаго и какъ вашего учителя Чернышевскаго дѣлаютъ дѣйствительную честь Россіи и доказываютъ, что ваша страна тоже начинаетъ участвовать въ общемъ движеніи нашего вѣка.

Привѣтъ и братство.

КАРЛЬ МАРКСЪ.

Лондонъ 24 Марта 1870.

載于 1870 年 4 月 15 日 “人民事业” 报上的卡·馬克思

給日內瓦国际俄国支部委员会委員的信

卡·馬克思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致
日内瓦的俄国支部委员会委员³⁶¹

公民們：

总委员会在3月22日的會議上一致宣布，你們的綱領和章程符合国际工人协会的共同章程。它立即接受了你們支部加入国际。我十分高兴地接受你們要我担任你們在总委员会中的代表这个光荣的任务。

你們在綱領中写道：

“……压迫波兰的帝国桎梏是同样阻碍两国人民——俄国人民和波兰人民——的政治自由和社会自由的障碍。”

你們还可以补充一句，俄国以暴力侵占波兰，是对軍事統治在德国的存在、因而也是在整个大陆的存在的极有害的支持，并且是这种統治存在的真正原因。因此，俄国社会主义者在致力于粉碎束縛着波兰的鎖鏈的同时，也就担負起消除軍事統治的崇高任务，而消除軍事統治乃是欧洲无产階級共同解放的一个十分必要的先决条件。

几个月以前，我接到从彼得堡寄来的一部弗列罗夫斯基的著作“俄国工人階級的状况”。这对于欧洲來說是一个真正的发现。在大陆上甚至被一些所謂革命家散布的俄国乐观主义，在这部著

作里被无情地揭露了。如果我說，从純粹的理論观点来看，这部著作在某些地方还不是完全无可非議的，那也不会降低它的价值。这是一位严肃的观察家、勤劳无畏的劳动者、公正的批評家、大艺术家、而首先是一个憤恨形形色色的压迫、憎恶各种各样的民族頌歌、热情地分担生产者阶级的一切痛苦和希望的人的作品。

弗列罗夫斯基的以及你們的导师車尔尼雪夫斯基的作品，为俄国爭得了真正的荣誉，而且证明你們的国家也开始参加到我們这一世紀的共同运动中来了。

致兄弟般的敬礼

卡尔·馬克思

1870年3月24日于倫敦

載于1870年4月15日“人民事业”报
(日内瓦)第1号

俄文按“人民事业”报刊印

卡·馬克思 机密通知³⁶²

国际成立之后不久，俄国人巴枯宁（虽然我从1843年就知道他，不过对于了解下面所谈情况并非绝对必要的，我都撇开不谈）在伦敦同马克思会面。后者在那里接受他加入协会，巴枯宁答应不懈怠地为协会工作。后来巴枯宁到了意大利，在那里收到马克思寄去的临时章程和对工人阶级的宣言^①，他寄来了“非常热情的”回信，但是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几年以后——在这几年间他杳无音信——他又出现在瑞士。在那里他不接近国际，而接近和平和自由同盟。在这个和平同盟的代表大会（1867年在日内瓦召开）以后，巴枯宁参加了它的执行委员会，但是他在那里遇到了反对者，他们不仅反对他的“独裁的”影响，而且把他当做一个“可疑的俄国人”对他进行监视。国际的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年9月）以后不久，和平同盟在伯尔尼召开了代表大会。这一次巴枯宁以firebrand〔挑拨者〕的姿态出现，而且——我 en passant〔顺便〕提一下——是用乐观主义的俄国佬通常为了掩饰自己的野蛮而向西方文明进攻时所用的那种口吻来痛斥西欧资产阶级。他提出一系列决议案，这些决议案本身是荒谬的，其用意是要使资产阶级的傻

① 見本卷第5—18頁。——編者注

瓜們感到恐怖，而且使巴枯寧先生能够 *éclat* [大叫大嚷地] 退出和平同盟并加入国际。只要說說以下情况就够了：他向伯尔尼代表大会提出的綱領包含着像“階級平等”、“廢除继承权是社会革命的**开始**”这样一些謬論，以及与此类似的无稽之談和一大堆唬人的胡言乱語，总而言之，是一个仅仅为着追求短暫功效的庸俗的即兴作品。巴枯寧在巴黎的朋友（一个俄国人在那里参加“实证論者評論”³⁶³的出版工作）和在倫敦的朋友像宣布 *un événement* [一个事变] 那样向全世界宣布巴枯寧退出和平同盟，并且宣称他的滑稽可笑的綱領——这个由陈腐的老生常談拼凑起来的 *olla podrida* [杂拌]——是某种非常惊人的和独出心裁的东西。

就在那时候，巴枯寧加入了国际的罗曼語区分部（在日内瓦）。他費了几年的时间才下定决心走这一步。但是不消几天工夫，巴枯寧先生就决定要完成国际中的变革并把它变为自己的工具。

巴枯寧背着倫敦总委员会——它在看起来一切都准备好了的时候才得到通知——建立了所謂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这个团体的綱領就是他曾經向和平同盟的伯尔尼代表大会提出的那个綱領。因此，这个团体一开始就自称是宣傳巴枯寧特有的深奥哲理的“宣傳团体”，而巴枯寧本人，社会理論領域中一个最无知的人，在这里突然以一个宗派的**奠基者**的姿态出現。但是，这个“同盟”的理論綱領只不过是一种无耻的把戏。問題的实质在于它的实际組織，也就是說，这个团体应当是一个在日内瓦設有中央委员会的，即受巴枯寧亲自领导的国际性的团体。但同时它又是国际工人协会的“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一方面，它的分部应当有代表出席国际的“应屆代表大会”（在巴塞尔），另一方面，此外还同时举行自己的代表大会，单独地开会，等等。

巴枯宁最初拥有的干部是当时日内瓦的国际罗曼語区联合会委员会中的多数。理智往往被宣傳癖遮盖住的約·菲·貝克尔，被提到首要的地位。在意大利和西班牙巴枯宁也有一些同盟者。

倫敦的总委员会对所有情况都了解。但是，它还是让巴枯宁安安静静地进行活动，直到他不得不通过約·菲·貝克尔把“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章程（和綱領）提交到总委员会来批准。为此做出了一个詳細論述理由的决定，它是完全“根据法律”并且“客观地”做出的，不过在這些“論据”中充滿了諷刺。这个决定归纳起来就是：

1. 总委员会不接納同盟作为一个分部加入国际。
2. 同盟章程中涉及它同国际的关系的所有条文一律宣布廢除和无效。

决定中論述理由的部分明确而坚决地指出，同盟无非是瓦解国际的工具。^①

打击是突如其来的。巴枯宁当时已經把“平等报”——在瑞士的操法語的国际会员的中央机关报——变为自己的机关报，此外，他还在勒-洛克爾创办了自己的小报“进步报”，該报至今还起着这种作用，它的主編是巴枯宁的狂热信徒，一个叫吉約姆的人。

經過好几个星期的考虑，同盟的中央委员会终于把复信寄給总委员会，复信上的签名是一个日内瓦人佩龙。为了表示对正义事业的忠誠，同盟准备牺牲自己独立的組織，但是有一个条件：总委员会必須宣布它承认同盟的“激进的”原則。

总委员会回答說，它的职责不是从理論上去評判各个支部的

① 見本卷第 382—384 頁。——編者注

綱領。它的責任仅仅是注意在其中不要有**某种直接与国际的章程及其精神相抵触的东西**。因此它必須坚持从同盟的綱領中删去关于«égalité des classes»〔“階級平等”〕的荒謬詞句，而代之以«abolition des classes»〔“消灭階級”〕（这点已經做到）。在其余方面，只要他們解散自己的独立的国际性組織，并且把他們所有支部的名单交給总委員會（nota bene〔請注意〕这点还没有做到），他們就可以加入国际。^①

这个事件就到此結束。名义上同盟解散了自己的組織，实际上它在巴枯宁的领导下繼續存在，同时巴枯宁还在国际的日內瓦罗曼語区联合会委員會中发号施令。

除他們旧有的刊物以外，又在巴塞罗纳創辦了“联盟”报，而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以后，又在那不勒斯創辦了“平等”周报³⁶⁴。

当时巴枯宁企图用另一种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把国际变为他私人的工具。他通过我們的日內瓦罗曼語区委員會建議总委員會把“继承权問題”列入巴塞尔代表大会的議程。总委員會同意这一点，为的是給巴枯宁来一个迎头痛击。巴枯宁的如意算盘是：如果巴塞尔代表大会采納巴枯宁在伯尔尼提出的“原則”（？），那末所有的人都会看到，不是巴枯宁轉向了国际，而是国际轉向了巴枯宁。由此得出一个簡單的結論：倫敦的总委員會（它會反对重新抖擻圣西門派的vieillerie〔旧廢物〕，这一点巴枯宁是知道的）应当退休，巴塞尔代表大会将把总委員會迁到日內瓦，也就是說国际将完全受独裁者巴枯宁支配。

为了保证自己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上取得多数，巴枯宁搞了真

^① 見本卷第 393—394 頁。——編者注

正的陰謀。甚至弄了不少偽造的代表資格證，例如代表勒-洛克尔的吉約姆先生等人的代表資格證。巴枯寧自己曾央求那不勒斯和里昂發給他代表資格證。對總委員會散布了各種各樣的誣蔑。他們對一些人說，在總委員會中得勢的是 *élément bourgeois* [資產階級分子]，對另一些人說，這是 *communisme autoritaire* [權威主義的共產主義] 的巢穴，等等。

巴塞爾代表大會的結果盡人皆知。巴枯寧的建議沒有被採納，總委員會仍然留在倫敦。

這次失敗所引起的懊喪——巴枯寧在心靈深處大概以為他自己的各種陰謀詭計的成功是會導致勝利的——在“平等報”和“進步報”上那些充滿惱怒的聲明中流露出來了。同時，這些報紙愈來愈帶上了官方預言家的性質。時而是國際的這個瑞士支部，時而是國際的那個瑞士支部，由於違背巴枯寧的絕對命令參加了政治運動等而被開除。最後，長久以來壓抑着的對總委員會的憤恨公開地爆發了。“進步報”和“平等報”譏笑、攻擊總委員會，說它沒有執行自己的任務，例如沒有執行三個月出版一期通報的任務；說總委員會應當放棄對英國的直接監督，應當建立一個特別的英國中央委員會來專門管理英國的事務；說總委員會關於被捕的芬尼亞社社員所做的決定是越出了自己的職權，因為地方上的政治問題不是它的事情。此外，“進步報”和“平等報”站在施韋澤方面，堅決要求總委員會正式地和 *publiquement* [“公開地”] 對李卜克內西和施韋澤的問題表示意見。施韋澤的法國朋友們在“勞動報”（巴黎出版）上私自販運對他有利的文章，為此“勞動報”受到“進步報”和“平等報”的贊揚；“平等報”號召共同進行反對總委員會的鬥爭。

事情既然發生了這樣的變化，就必須進行干預。現在把總委

員会致日內瓦罗曼語区联合会中央委員會的信逐字逐句地抄录如下。这个文件太长,因此不便于把它譯成德文。

“总委員會致日內瓦瑞士罗曼語区联合会委員會

总委員會在 1870 年 1 月 1 日的非常會議上决定:

1. 在 1869 年 12 月 11 日的‘平等报’上我們讀到这样一段話:

‘毫无疑义,总委員會輕視极其重要的事情…… 我們援引条例的第一条来提醒总委員會注意它的职责,这一条規定:“总委員會必須执行代表大会的決議……” 我們本来可以向总委員會提出大量的問題,这些問題的答案足以构成一份冗长的文件。稍后我們將这样做。而現在……’

总委員會無論在章程或条例中都找不到这样一条規定,即它必須同‘平等报’通信或辯論,或者‘回答’任何报纸提出的‘問題’。

总委員會认为,只有瑞士罗曼語区联合会委員會才是瑞士罗曼語区各支部的代表者。如果联合会委員會通过唯一合法的途徑,即通过自己的書記向我們提出質問或指責,那末总委員會随时都准备回答它。但是,罗曼語区联合会委員會既无权放棄自己的职责,把它轉让給‘平等报’和‘进步报’的編輯部,也无权让这两家报纸篡夺它的职责。

一般地說,如果把总委員會同各个全国性的和地方性的委員會的来往信件公布出来,那就会使协会的总的利益遭到巨大的損害。

的确,如果国际的其他机关报仿效‘进步报’和‘平等报’,那末,总委員會就不得不二者擇其一:或者保持緘默而使自己在社会輿論面前丧失威信,或者違背自己的职责而公开作答。‘平等报’同‘进步报’一起动員‘劳动报’要求总委員會进行解釋。多么像个公共福利同盟!

2. 暫且假定‘平等报’提出的这些問題是来自罗曼語区联合会委员会，因此我們將回答这些問題，但是必須有一个条件，这就是今后不再以这种方式向我們提这类的問題。

3. 关于通报的問題

載入条例的日内瓦代表大会決議規定，各个全国性的委员会應該把有关无产階級运动的文献資料寄給总委员会，以便总委员会‘在其經費許可的情况下，尽量經常地用各种文字出版通报’（*«As often as its means permit, the General Council shall publish a report etc.»*）。

因此，总委员会所承担的责任是同那些沒有实现的条件有連带关系的。甚至連章程上規定的統計調查工作也沒有进行，虽然关于这件事在前后召开的許多次全协会代表大会上都做出了決議，而且总委员会每年都要求进行这项工作。至于經費，要不是英国各地交的会費和总委员会委員的个人捐獻，总委员会早就不存在了。

这样一来，日内瓦代表大会通过的条例就成了一紙空文。

至于巴塞尔代表大会，它所討論的不是关于現有条例的执行問題，而是关于及时出版通报的問題，并且对这个問題沒有做出任何決議。

不过，总委员会认为，原定应当由它出版通报的任务，現在完全由国际的各个机关刊物在完成，这些刊物用各种文字出版，并且通过相互交換而得到傳播。如果要让代价很高的通报去做不花代价就已經做得到的事，那是荒唐的。从另一方面說，如果通报发表国际的机关刊物上沒有发表的东西，那只能帮助我們的敌人窺視内幕。

4. 关于把总委员会同英国联合会委员会分开的問題。

在‘平等报’创办以前很久，这个建議就已經在总委员会中由它的一两个英国委員定期地提出过了。但是这个建議总是受到几乎全体一致的反对。

尽管革命的发起可能来自法国，但是只有英国可以成为重大經濟革命的**杠杆**。它是这样一个国家，唯有那里已經沒有农民并且土地所有权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唯有这个国家中的**資本主义形式**——即劳动大規模地联合在資本主义企业主的統治下——几乎籠罩了整个的生产。唯有这个国家中的絕大多数居民是**雇佣工人** (wages labourers)。唯有这个国家中的**阶级斗争**和工人阶级在**工联**中的組織达到了一定程度的成熟和普遍性。由于英国在世界市場上占統治地位，因而唯有英国这个国家在經濟方面的每个变革会立即在全世界得到反映。如果說英国是一个典型的大地主所有制和資本主义的国家，那末从另一方面說，在英国消灭大地主所有制和資本主义的物质条件也比任何地方都更加成熟。总委员会現在所以处在值得庆幸的地位，是因为**无产阶级革命的这个偉大的杠杆**直接握在它手里。如果把**这个杠杆**完全交給英国人，那該是多么愚蠢，甚至可以說是多么严重的犯罪行为！

英国人拥有进行社会革命的一切必要的物质前提。他們所缺乏的是**总结的精神**和**革命的热情**。只有总委员会能够弥补这个缺陷，从而加速这个国家的以及任何地方的真正的革命运动。我們在这方面已經取得的巨大成績，得到了統治阶级最聪明的和最有影响的机关报刊，例如‘派尔-麦尔新聞’、‘星期六評論’、‘旁观者’、‘双周評論’的证实，更不用說下院和上院中那些不久前还对英国工人領袖有很大影响的所謂激进的議員了。他們公开地責难我們，說我們毒害了而且几乎灭絕了工人阶级中的**英国精神**，把它

推向了革命的社会主义。

实现这个转变的唯一方法，就是像**国际协会总委员会**那样行动。作为总委员会，我们可以鼓励采取这样的措施（例如成立**土地和劳动同盟**），将来，当这些措施实现的时候，它们就会像英国工人阶级的自发行动那样出现在公众面前。

如果在**总委员会**之外成立一个**联合会委员会**，那会产生什么样的直接后果呢？如果联合会委员会处于**国际总委员会**和**工联全国理事会**之间，它就不会享有任何威信。另一方面，**国际总委员会**就会**放棄这个偉大的杠杆**。如果我们宁愿去闲扯，而不愿进行严肃的和細微的工作，我们也许会犯这样的錯誤，例如公开地回答‘平等报’的問題：为什么总委员会能容忍‘如此繁重的兼职’。

不能把英国简单地同其他国家等量齐观。应当把它看做是**資本的首都**。

5. 关于总委员会就爱尔兰大赦所作的決議問題。

如果說英国是大地主所有制和欧洲資本主义的堡垒，那末唯一能使官方英国受严重打击的地方就是**爱尔兰**。

第一，爱尔兰是英国大地主所有制的支柱。如果大地主所有制在爱尔兰崩潰了，它在英国也必定要崩潰。在爱尔兰发生这样的事可能要容易一百倍，因为那里的經濟斗争只是集中在**土地所有制**上，因为在那里这一斗争同时又是**民族斗争**，因为爱尔兰的人民比英国人民更富有革命情緒和更加頑强不屈。爱尔兰的大地主所有制仅仅是靠英国军队来維持它的地位。一旦这两个国家的强制的合并停止，社会革命，尽管是古老形式的社会革命，就会在爱尔兰爆发。英国的大地主所有制不仅会失去它的巨大的財富来源，而且会失去作为英国統治爱尔兰的代表者的那种道义力量的

最重要来源。另一方面，如果让英国大地主在爱尔兰保持强大的势力，英国无产阶级就无法使他们在英国本土受到损害。

第二，英国资产阶级不仅利用爱尔兰的贫困，以便通过对爱尔兰贫民采取的强制移民手段来使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更加恶化，除此以外，它还把无产阶级分成两个敌对的营垒。凯尔特工人的革命热情和盎格魯撒克逊工人的严肃的但是迟缓的性格没有和谐地结合起来。相反，在所有的英国大工业中心，英国无产者和爱尔兰无产者之间存在着很深的对立。普通的英国工人憎恨爱尔兰工人，把他们看做降低工资和 *Standard of life* [生活水平] 的竞争者。他们对爱尔兰工人抱有民族的和宗教的厌恶，几乎像美国南部各州的 *poor whites* [白种贫民] 看待黑奴那样看待他们。资产阶级在英国本土的无产者之间人为地煽起和培植这种对立。资产阶级知道，无产者的这种分裂状态是保存它的势力的真正秘诀。

在大西洋彼岸也产生了这样的对立。被牛群和羊群从故乡排挤出去的爱尔兰人在美国重逢，他们是那里的居民中人数众多而且不断增长的一部分。他们一致的思想、一致的情感就是憎恨英国。英国政府和美国政府，也就是说这两个政府所代表的那些阶级，正在培植这样的情感，其目的是使民族间的斗争永远继续下去，因为这种斗争是大西洋两岸工人间的任何严肃而真诚的联合的障碍，因而也是他们的共同解放的障碍。

爱尔兰是英国政府维持庞大的常备军的唯一借口，一旦需要，正像已经发生过的那样，就把这支在爱尔兰受过军阀主义教育的军队用来对付英国工人。最后，目前在英国正重复着在古罗马到处都能看到的事件。奴役其他民族的民族是在为自身锻造镣铐。

因此，国际协会在爱尔兰问题上的立场是十分明确的。它的

主要任务是加速英国的社会革命。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須在爱尔兰进行决定性的打击。

总委员会关于爱尔兰大赦的決議只是其他一些決議的引言；那些決議將說到：姑且不談国际上的公道，英国工人阶级解放的先决条件是把現存的强制的合并，即对爱尔兰的奴役，变为平等自由的联盟——如果这是可能的話，或者完全分离——如果这是必要的话。

此外，‘平等报’和‘进步报’所提出的关于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之間的联系的理論，或者更确切些說，关于二者之間沒有联系的理論，据我們所知，从来沒有在我們的任何一次代表大会上被承认。它同我們的章程相矛盾。章程中說：

«That the *economical emancipa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es is…the great end to which every political movement ought to be subordinate as a means»^①。

在1864年巴黎委员会所譯的法譯文中，«as a means»（“作为手段”）这几个字被刪掉了。巴黎委员会在答复总委员会的质問时，借口自己的政治地位的困难来为自己辯解。

对章程原文的其他地方也有一些曲解。章程的引言部分的第一段宣称：«The struggle for the emancipa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es means…a struggle… for *equal rights and duties*, and the *abolition of all class rule*»^②。

① “工人阶级的經濟解放是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服从于它的偉大目标”（見本卷第15頁）。——編者注

② “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是……要爭取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消灭任何阶级統治”（見本卷第15頁）。——編者注

在巴黎的譯文中談到了‘平等的权利和义务’，也就是說重复了近百年来几乎在所有民主主义宣言中都能遇到，而在不同階級的代表人物口中却含有不同意义的一般詞句；但是譯文中刪去了‘消灭階級’这一具体要求。

继而在章程的引言部分的第二段中写道：«That the economical subjection of the *man of labour to the monopoliser of the means of labour, that is the sources of life etc.*»^①

在巴黎的譯文中把«*means of labour, that is the sources of life*»〔“劳动資料即生活源泉”〕——这个詞除了包括其余的劳动資料，还包括土地——改成了‘資本’。

1866年在布魯塞尔出版的法譯文恢复了原文的本来面目。

6. 关于李卜克內西和施韦澤的問題。

‘平等报’說：‘这两派都屬於国际。’这是不正确的。爱森納赫派（承蒙“进步报”和“平等报”把它变成公民李卜克內西派）屬於国际。施韦澤派不屬於它。

施韦澤自己曾在他的报纸‘社会民主党人报’上詳細地闡明过，为什么拉薩尔派的組織不消灭自己本身就不可能加入国际。他自己并不知道他說出了真理。他的那个拼凑起来的宗派主义組織是同真正的工人階級組織相矛盾的。

‘进步报’和‘平等报’要求总委员会公开說出自己對李卜克內西和施韦澤之間的个人分歧的‘看法’。既然公民約·菲·貝克尔（他同李卜克內西一样都遭到施韦澤的报纸的誹謗）是‘平等报’編輯委员会的一員，那末让人感到非常奇怪的是，这家报纸的出版者

① “劳动者在經濟上受劳动資料即生活源泉的壟断者的支配……”（見本卷第15頁）——編者注

竟如此消息不灵通。他們應該知道，李卜克內西在‘民主周报’上曾經公开地建議施韦澤承認**总委員會**是他們的分歧的仲裁人，而施韦澤也曾經同样公开地拒絕承認**总委員會**的权威。

为了結束這場爭吵，**总委員會**用尽了一切手段。它委托自己的德国書記同施韦澤通信（过去也这样做过）；但是**总委員會**的一切嘗試都由于施韦澤無論如何都固执地把自己的专橫霸权同宗派組織一起保存下来而归于失敗。

总委員會要做的事情是，選擇一个有利的时机，那时它公开干預這場爭吵将利多于弊。

受总委員會的委托……”

法国各委員會（尽管巴枯宁在里昂和馬賽大力进行陰謀活动，并且把几个急性的青年人拉到了他那边）像比利时**总委員會**（布魯塞尔）一样，宣布它們**完全拥护****总委員會**的这封指示信。

为日内瓦編制副本的工作拖延了一些时候（因为瑞士書記荣克太忙）。因此，副本同日内瓦罗曼語区联合会中央委員會書記培列給**总委員會**的正式信件在途中错过了。

还在收到我們的信以前，日内瓦就爆发了危机。“平等报”的某些編輯起来反对巴枯宁所强加的方針了。巴枯宁和他的信徒（包括六个“平等报”的編輯）想迫使日内瓦的**中央委員會**解除不服从命令者的职务。但是，日内瓦委員會早已因巴枯宁的专橫而感到苦恼，并且对自己因他而卷入同其他瑞士德語区委員會，同**总委員會**等等的磨擦而感到不滿。因此，日内瓦委員會反而批准了对巴枯宁所厌恶的那些“平等报”編輯的任命。于是六个巴枯宁的追隨者退出了編輯部，他們想这样来迫使報紙停刊。

日内瓦的**中央委員會**在給我們的回信中声明，“平等报”攻击

总委员会是違反它的意志的，它从来沒有贊同該报所鼓吹的政策，現在該报的編輯工作是在委员会的严格監督之下，等等。

此后，巴枯宁从日内瓦返回德森。現在他只能——指在瑞士——对“进步报”（勒-洛克尔）这一家报纸发生作用。

不久赫尔岑去世了。巴枯宁自从打算宣布自己是**欧洲工人运动的领导人**的时候起，就背棄了他的老朋友和导师赫尔岑，而在赫尔岑去世以后，却立即对他大肆贊揚起来。为什么？尽管赫尔岑自己是一个很富的人，他每年还从同情他的俄国假社会主义的泛斯拉夫主义派那里得到 25 000 法郎的宣傳費。³⁶⁵ 巴枯宁由于自己的贊歌而获得了这笔錢財，于是——*malgré sa haine de l'héritage* [尽管他憎惡继承制度]——却 *sine beneficio inventarii* [毫无限制地] 开始占有了“赫尔岑的遺產”，既占有金錢的遺產，也占有精神的遺產。

同时在日内瓦成立了一个俄国青年大学生流亡者的侨民团体，他們真正忠于自己的信仰，并且用下面这一点证明了自己的忠誠：他們把同泛斯拉夫主义的斗争作为自己綱領的主要点。

他們在日内瓦出版了“人民事业”杂志。大約在两星期以前他們找向倫敦，寄来了自己的章程和綱領，并請求批准他們所成立的国际俄国支部。他們的請求得到了滿足。

在另外一封給馬克思的信中，他們請求馬克思临时作为他們在总委员会中的代表。这一点也得到了同意。^① 同时他們宣布——似乎是向馬克思表示歉意——不久他們就要撕破巴枯宁的假面具，因为这个人采取两面派政策：在俄国采取一套，在欧洲采

① 見本卷第 463—464 頁。——編者注

取完全另外一套。

因此，这个极端危险的阴谋家的手法，至少在**国际的范围**内，很快就要完蛋了。

卡·马克思写于1870年3月28日
左右

第一次发表于1902年“新时代”
杂志第15期(第2卷)

原文是德文和法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卡·馬克思 总委员会关于“蜂房报”的 決議草案³⁶⁶

鉴于：

(1)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曾經將“蜂房报”作为总委员会的正式的机关报，作为英国报刊中代表工人阶级运动的机关报推荐给在欧洲大陆和在美国的国际各支部，建議它們訂閱該报；

(2) “蜂房报”不仅常常从总委员会的正式报道中删去可能使它的保护人不喜欢的某些決議，而且还用隱瞞的办法系統地歪曲总委员会很多會議的内容；

(3) “蜂房报”，特别是在不久以前更換了所有者³⁶⁷之后，还繼續以工人阶级唯一的机关报自居，但事实上它已經成为一小撮資本家的机关报；这一小撮資本家妄图支配无产阶级运动，并利用它作为达到他們的阶级目的和党派目的的工具；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在1870年4月26日會議上一致决定与“蜂房报”断絕一切联系，并通过报刊将这一決議通知自己在英国、在欧洲大陆和在美国的各个支部。

卡·馬克思于1870年5月3日提出
載于1870年5月11日“人民国家报”
第38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貼在总委员会記錄簿
上的卡·馬克思的手稿譯的

who vintured his assurance of support to, & sympathies with the Association, & Cit. Jany announced the receipt of a letter from a young Belgian professor residing at present in Wales, who desired to become a member of the Association & act as one of its most devoted Champions.

A letter from Cit. Richard of Lyons announced the formation of a new section at Richard, V. Cit. Berlin was travelling to establish new branches. The letter contained a cheque for 6 l. 7 s. 6. of which 10 fr were for the St. Etienne section the rest for Lyons.

Cit. Mara then called the attention of the ~~Committee~~ the circumstances that many members of the Association had been arrested in France & that the government papers had endeavoured to spread it abroad that the Association was implicated in a pretended plot against the emperor & to refute those insinuations he proposed the following:

On the occasion of the last pretended Complot, the French government has not only arrested many members of our Paris and Lyons sections, but continues to insinuate ^{by} that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men's Association is an accomplice of that pretended Complot. According to the tenor of our Statutes, it is certainly the special mission of all our branches in Europe,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Asia, not only as centres for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but also to aid, in these different countries, all political movements tending to the accomplishment of our ultimate end, viz. the universal emancipa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At the same time, those Statutes bind all the sections of our Association to act in the ^{own} right of the cause if our Statutes were not framed on that point, the organization of an Association which identifies itself with the working classes, would exclude from it every form of secret society. If the working classes, who form the great bulk of all nations, who produce all these wealths, and in the name of whom are the ruling powers always pushed to war, conspire, they conspire publicly, in the unconcealed against darkness, in the full consciousness that without these wars there exists no legitimate power. If the other incidents of the Complot denounced by the French government are as false and unfounded as its insinuations against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men's Association, the last Complot will not be by any means its too pretensions of grotesque mystery. Its noisy and violent measures against our French sections are exclusively intended against one single purpose - the manipulation of the public mind.

Cit. Harris seconded the proposal, which was adopted unanimously.

記錄簿中貼有卡·馬克思“关于对法国各支部的成員的迫害”手稿的一頁

卡·馬克思

关于对法国各支部的成員的迫害³⁶⁸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声明

法国政府以最近臆造的阴谋为借口，不仅逮捕了本会巴黎支部和里昂支部的许多成员，而且还在它的报纸上进行诬蔑宣传，声称**国际工人协会**是这一臆造的阴谋的同谋者。

按本会章程的精神，本会在英国、在欧洲大陆和在美国的所有支部的专门任务，毫无疑问是不仅要成为工人阶级的组织中心，而且要支持各国的任何一种有助于达到我们的最终目标——**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的政治运动。然而，与此同时，章程也责成本会所有支部公开进行活动。即使本会章程中没有这项特别规定，同工人阶级合为一体的协会，其性质本身也是与任何形式的秘密团体不相容的。如果说工人阶级，即构成各个民族的大多数、创造各个民族的一切财富、甚至篡夺者的政权也总是力图用它的名义来掩饰自己的统治的阶级，也在进行阴谋活动的話，那末它的阴谋活动也是在公开进行，有如太阳之冲破黑暗，——它充分意识到：除了它以外不可能存在任何合法的政权。

既然法国政府所宣布的阴谋的其余细节也如它对**国际工人协会**的诋毁一样是凭空捏造的无稽之谈，那末最近这次阴谋也一定

会同已經傳为笑柄的前两次阴謀³⁶⁹ 相媲美。为对付本会法国各支部而掀起的叫囂和采取的暴力措施，只是追求一个目的——玩弄全民投票的騙局。

卡·馬克思于1870年5月3日提出
1870年5月4日印成傳单“国际工人
协会总委员会声明”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貼在总委员会
記錄簿上的卡·馬克思
的手稿譯的，并根据傳
单校对过

卡·馬克思

总委员会关于“在倫敦的法国人 联合支部”的決議草案³⁷⁰

鉴于：

最近期間某个自称为“国际工人协会，法国人联合支部”的在倫敦的法国人团体在欧洲报刊上发表的若干呼吁、決議和宣言，被算作是国际工人协会的文件；

国际工人协会此刻正在受到奥地利政府和法国政府的殘酷迫害，它們千方百計地企图利用最不足为凭的理由作为进行这种迫害的借口；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总委员会允許任何一个并不屬於国际的团体盗用它的名义进行活动，那就会使自己承担严重的責任；

总委员会茲声明：所謂的“在倫敦的法国人联合支部”两年以前已不屬於国际，它与本协会的总委员会沒有任何关系^①。

1870年5月10日于倫敦

1870年5月10日提出

載于1870年5月14日“蜂房报”第418号，1870年5月21日“平等报”第21号和1870年5月21日“人民国家报”第41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貼在总委员会記錄簿上的卡·馬克思的手稿譯的

^① 在总委员会批准本決議时，最后一句的末尾作了如下的修改：“不論与在倫敦的总委员会，或与本协会在欧洲大陆的任何一个支部均无任何关系。”——編者注

卡·馬克思
总委员会关于在美因茲
召开代表大会的決議³⁷¹

鉴于：

巴塞尔代表大会規定巴黎为国际工人协会应屆代表大会的集会地点；

法国目前存在的制度使代表大会不能在巴黎举行；

然而为了准备代表大会的召开又必須立即作出决定；

章程第三条責成总委员会在必要时改变代表大会所規定的集会地点；

德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建議总委员会把应屆代表大会的集会地点移至德国，

总委员会在5月17日的會議上一致决定，国际工人协会应屆代表大会于今年9月5日在美因茲召开。

卡·馬克思于1870年5月17日提出

載于1870年5月25日“人民国家报”
第42号，1870年5月28日“平等报”
第22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总委员会記錄簿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 致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³⁷²

曼彻斯特市斯托克波尔特路
摩宁頓街 86 号

1870 年 6 月 14 日于倫敦

亲爱的朋友們：

今天我接到施土姆普弗(美因茲)来信，信中談到：

“李卜克內西委托我写信告訴你：由于国会选举恰好要在这个时候进行，代表大会于 10 月 5 日在这里召开会更好一些。斯图加特代表大会³⁷³ 在上星期一也决定支持这个日期。大概已經委托盖布把这一点告訴你了。”

李卜克內西同国际的其他會員一样，至少是應該了解国际的章程的，章程中写得很清楚：

“第三条 在必要时，总委员会可以改变集会地点，但无权推迟集会時間。”

我在总委员会里支持你們坚决要把代表大会移至德国举行的建議时，当然认为你們把各种情况都考虑到了。根据章程的規定，根本不能談改变集会時間問題。

施土姆普弗的来信中还有一个地方也决不能使人安心。

这个地方写道：

“我剛从市长那里回来。他要求有一个富裕的市民作担保，一旦施韦澤

分子製造毆打事件而可能使供我們代表大會開會用的選帝侯的大理石大廳遭到損失時，市府好得到賠償云云。”

你們提出了美因茲、達姆斯塔德或曼海姆等城市，因而你們對總委員會也就承擔了這樣的責任：代表大會可以在上述任何一個城市中舉行而不致發生使全世界嘲笑國際、特別是德國工人階級的丑事。我希望，在這方面將會採取一切必要的預防措施。

在美因茲及美因茲郊區施韋澤分子和你們的人之間的人數對比如何？

如果丑事不能避免，那就應當事先設法使責任落在肇事人身上。應當在“人民國家報”、“未來報”以及其他我們可以利用的德國報紙上揭穿普魯士警察當局的計劃，揭露它在不能直接阻撓國際代表大會在美因茲召開的情況下企圖利用它的工具——施韋澤組織——來破壞代表大會或阻礙大會安靜地進行工作。一旦在德國做到了這一點，總委員會就將設法在倫敦、巴黎等地發表類似的消息。國際也可以同俾斯麥先生發生衝突，只不過不要像是在“原則鬥爭”的旗幟下進行的自發的“德意志民族工人大毆打”那樣罷了。

希望施土姆普弗同你們一起共同設法使代表們能有價廉的住所。

Salut et fraternité [敬禮和兄弟情誼]

卡爾·馬克思

趁此機會向委員會致熱烈的敬禮。自從福爾斯特的施韋澤分子事先通知市長說他們打算發動毆打而市長對此聽其自然之後，這些老爺們同警察當局的聯繫就已經得到了證實。施土姆普弗也許可以通過美因茲市長質問施韋澤分子，他們是否接到了“毆打”

的任务。顺便说一下，早就应该在各地的报刊上揭露这些人是不折不扣的警察的爪牙，如果他们又企图在什么地方进行“殴打”，那就应该好好地回击他们。当然，在代表大会上这是不能容许的，但是在这以前可以多教训他们几次，让他们吃个够。从附上的剪报（剪报的内容在各报上都有转载）中可以看出，俾斯麦先生在英国报刊上是怎样叙述这件事的。“北德通讯”——这是用韦耳夫基金创办的俾斯麦的机关报。³⁷⁴

致热烈的敬礼

弗·恩格斯

写于1870年6月14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72年6月26日

俄文译自“人民国家报”

“人民国家报”第51号

卡·馬克思
 总委员会关于瑞士罗曼語区
 联合会委员会的決議³⁷⁵

总委员会致罗曼語区联合会委员会

鉴于：

虽然拉紹德封的代表大会的多数代表选出了新的罗曼語区联合会委员会，但是，这个多数只是表面上的多数；

日内瓦的罗曼語区联合会委员会对总委员会、对国际工人协会始终如一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并一贯按照协会章程办事，因此，总委员会没有权利除掉这个委员会的名称，——

总委员会于1870年6月28日的会议上一致决定：設在日内瓦的罗曼語区联合会委员会应当保留自己的名称，而設在拉紹德封的联合会委员会则应当选定任何其他的对自己合适的名称。

受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委托并代表总委员会

瑞士书记 海·荣克

1870年6月29日于倫敦

卡·馬克思写

載于1870年7月24日
 “米拉波报”第53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譯自“米拉波报”

卡·馬克思
日內瓦对建筑工人实行的
同盟歇业³⁷⁶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致欧洲
和美国的男女工人们

工人同志们！

日內瓦的建筑业主經過深思熟虑之后得出結論說，“劳动的絕對自由”是劳动居民幸福的最好条件。为了使自己的工人能享受到这种福气，他們在6月11日决定采用英国发明的一种詭計，宣布对目前仍在他們那里工作的3000余名工人实行同盟歇业。

而对于不久前在瑞士成立的工会，日內瓦建筑业主則憤慨地称之为英国的进口貨。两年前，他們責难他們的工人缺乏爱国主义，因为工人们企图把像限制工作日和固定小时工資这样的外来植物移植到瑞士的土壤中来。他們絲毫不怀疑，这件事是出自恶毒的煽动者之手，因为他們本地的工人当时还处于听天由命的状态，自然只幻想着以每昼夜12—14小时的工作更多地折磨自己，好得到主人认为应当付給的一点报酬。企业主們断言，受騙的工人是按倫敦和巴黎的指示行事的；这完全像瑞士的外交官員习惯于服从圣彼得堡、柏林和巴黎的命令一样。然而，無論是非

难^① 还是威胁，都不能使工人相信：限制每昼夜工作时间为 10 小时和规定固定的小时工资会有损自由公民的尊严。同样，挑唆他们采取某种暴力行动而使企业主能冠冕堂皇地对工会进行镇压的做法也没有得逞。

最后，在 1868 年 5 月，当时的司法和警务部长康佩里奥先生使双方达成了一项协议，按照这个协议，工作日限制为冬季 9 小时，夏季 11 小时，工资每小时为 45 至 50 生丁。这项协议是在部长参加下由企业主和工人签订的。1869 年春季，一些企业主拒绝对夏季 11 小时工作比对冬季 9 小时工作支付更多的工资。于是又重新达成一项协议，规定所有建筑工人的统一工资为每小时 45 生丁。这项协议虽然也明显地涉及到抹灰工和彩画匠，但他们还是不得不继续在原先的条件下工作，因为他们还没有充分组织起来以争取新的条件。这一年 5 月 15 日，他们要求同其他行业有同样的条件，并在老板们断然拒绝后，从第二个星期就开始了罢工。6 月 4 日建筑业主决定，如果抹灰工和彩画匠在 6 月 9 日前不复工，就从 6 月 11 日起对所有建筑工人宣布同盟歇业。这一威胁实现了。但是企业主并不满足于解雇工人，他们还在公开的广告上号召联邦政府用暴力解散工会^②，并且把外国人驱逐出瑞士。³⁷⁷但是，由于瑞士非建筑业工人举行了规模巨大的群众集会进行抗议，他们要恢复“劳动自由”的高尚的和真正自由主义的企图遭到了失败。

日内瓦其他工业部门的工人成立了一个管理被解雇工人事务的委员会。一些同建筑业主签订了修建新房舍合同的房东认为这

① 德文版中，在“无论是非难”这几个字后还增加了“还是劝诱”。——编者注

② 法文版中不是“工会”，而是“国际协会”。——编者注

些合同已被廢除，便建議原先在他們那里工作的工人繼續工作下去，就像什么事情也沒有发生过那样。这些建議立即被採納了。然而有許多单身工人匆忙地离开了日内瓦。而且仍然有 2000 戶左右被剝夺了通常維持生存的手段。因此，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号召文明世界一切正直的男女工人們从道义上和物质上支援日内瓦建筑工人反对資本专橫的正义斗争。

受委员会的委托

执行主席 本·魯克拉夫特

财务委员 約翰·韦斯頓

总書記 格奥尔格·埃卡留斯

1870 年 7 月 5 日于倫敦西中央区
海-霍耳博恩街 256 号

卡·馬克思写
以傳单形式印行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傳单譯的

卡·馬克思
給各支部的机密通知³⁷⁸

(1)总委员会要求各支部就1870—1871年改变总委员会駐在地是否适宜的問題給本支部代表发出正式指示。

(2)如果問題得到肯定的解决，总委员会則建議布魯塞尔作为上述年度总委员会的駐在地。

卡·馬克思写于1870年7月14日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手稿譯的

卡·馬克思

在美因茲召开的国际代表 大会的議程³⁷⁹

1. 关于取消国債的必要性問題。討論賠償权問題。
2. 工人階級的政治活动和社会运动之間的相互关系。
3. 关于把土地所有制变为公有制的实际措施(見注)。
4. 关于把发行銀行变为国家銀行的問題。
5. 在全国範圍內进行合作生产的条件。
6. 关于工人階級必須按照 1866 年日内瓦代表大会的決議进行全面的劳动統計的問題。
7. 由代表大会再次討論关于消除战争的手段問題。

第 3 項注: 比利时总委员会提出如下問題:

“采取实际措施在国际內部成立农业支部以及在农业无产者和其他工业部門的无产者之間建立团結一致的关系。”

国际协会总委员会认为, 这个問題可以包括在第 3 項內。

卡·馬克思写于 1870 年 7 月 14 日

1870 年 7 月 12 日印成傳单“国际工人协会第五次年度代表大会”, 并載于 1870 年 7 月 31 日“自由报”第 162 号和 1870 年 8 月 13 日“人民国家报”第 65 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手稿譯的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遺稿

卡·馬克思

关于爱尔兰問題的未作的 发言的提綱³⁸⁰

一、引言。处决

自从我們上次开会以来，我們所討論的对象芬尼亚运动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运动接受了英国政府所給予的血的洗礼。曼彻斯特的政治处决使我們想起約翰·布朗在哈帕尔斯渡口的遭遇。^①它們揭开了爱尔兰同英国的斗争的一个新时期。整个議会和自由派的报刊要对此負責。格萊斯頓。

目的：保持伪善的外表，似乎这不是政治性的，而只是一种普通的刑事犯罪。在欧洲，处决产生了恰好相反的印象。看来，英国人还想保持长期議会所通过的法令³⁸¹。他們赋予自己一种神圣的权利，可以在爱尔兰国土上反对爱尔兰人，而任何一个爱尔兰人，要在英国反对不列顛政府，就会被宣布为非法。Habeas Corpus Act³⁸² 暂时停止生效。特別戒严。“紀事”周刊所举的事实。由政府組織的“杀人和暴行”。³⁸³ 波拿巴事件³⁸⁴。

① 以下在原稿中删去一句：“不过，奴隶主們至少还把約翰·布朗当做一个叛乱者，而不是当做一个普通的刑事犯。”——編者注

二、問 題

什么是芬尼亚运动？

三、土地問題

人口的縮減

1846 年			
1841 年——	8 222 664	25 年中共縮減	1801 年爱尔兰人口为
1866 年——	5 571 971	2 650 693 人	5 319 867 人
	2 650 693		
1855 年——	6 604 665	11 年中共縮減	
1866 年——	5 571 971	1 032 694 人	
	1 032 694		

不仅人口有所减少，而且同人口的总数比起来，聋哑人、盲人、殘廢人、瘋子和痴子的数量有所增加。

1855 年到 1866 年牲畜总数的增长

在 1855 年到 1866 年这些年中，牲畜总数增长的情况如下：牛增加 178 532 头，羊增加 667 675 只，猪增加 315 918 头。如果我们注意到在同时期中馬减少 20 656 匹，并用 1 匹馬折合 8 只羊計算，那末牲畜增长的总数应为 996 877 头，即接近 100 万头。

这就是說，1 032 694 个爱尔兰人为大約 100 万头牛、猪、羊所排挤了。被排挤的爱尔兰人的情况如何呢？移民統計对这一問題作了回答。

移 民

从 1851 年 5 月 1 日到 1866 年 12 月 31 日移居国外的共計 1 730 189 人。这种移民的性质。

由于农場的合并或扩大（逐出土地）以及同时变耕地为牧场，移民的規模越来越大，并将繼續扩大下去。

从 1851 年到 1861 年农場总数减少了 120 000 个，而面积 15 英亩到 30 英亩的农場却增加了 61 000 个，30 英亩以上的农場則增加了 109 000 个（共計增加 170 000 个）。农場总数的减少几乎完全是 1 英亩以下的到 15 英亩的农場消失的結果。达費林勋爵。^① 大农場数目的增长只是表示，所减少的农場很大一部分成为較大的农場。

这一过程所起的作用

(a) 对人口所起的作用

人民群众的状况恶化了，已接近于危机，像 1846 年那样的危机。当前的相对人口过剩已經像饥荒前一样严重。

从馬鈴薯歉收引起饥荒以来，工資提高不过 20%。而馬鈴薯的价格却几乎提高了 200%；日用必需品的价格則平均上漲了 100%。克利夫·萊斯利教授在 1867 年 2 月 9 日的倫敦“經濟学家”上写道：

“在 21 年中人口减少五分之二以后，目前几乎全島的常規工資每天只有 1 先令；而 1 先令目前所能买的东西并不多于 21 年前用 6 辨士所能买到的。

① 見本卷第 686、693 頁。——編者注

由于一般食品价格的高漲，工人的生活比10年前更坏了。”

(b)对土地所起的作用

(1)播种面积的縮减

粮食作物面积的縮减：	飼料作物面积的縮减：
1861—1866年——470 917 英亩	1861—1866年——128 061 英亩

(2)各种作物每一法定英亩^①的收获量的縮减。小麦的收获量縮减了，而在1847—1865年这一段时期中收获量縮减得更多的是(用确切的百分比来表示)：燕麦縮减16.3%，亚麻47.9%，燕菁36.1%，馬鈴薯50%。有几年收获量的縮减还更严重，而总的来說，从1847年起，收获量是不断縮减的。

自从大規模移民以来，土地因不再施肥而变得貧瘠了，这部分是由于农場瘋狂地扩大，部分是由于在“谷地制”³⁸⁵的条件下，租佃者多半不自己为土地施肥，而让他的雇农去施肥。地租和利潤在收获量减少的情况下也一样能增加。整个产量总的来說可能减少，但是落入大地主和大农場主手中而不归农业工人所有的、轉变为剩余产品的那一部分产品，以及剩余产品的价格，却会增加。

因此，結果是：本地居民逐步被排挤，民族生活的源泉——土地逐步恶化和貧瘠。

扩大的过程

这一过程只是刚刚开始，但是进行得頗为迅速。扩大首先打击的是1英亩以下的到15英亩的那些农場。即使100英亩以下的农場全部消失，那时扩大的过程也还远远不会达到在英国那样

^① 法定英亩是王国法律所規定的英亩，合4 047平方米。——編者注

的程度。1864 年的情况是这样：

全爱尔兰的面积，包括沼澤和荒地，共計 20 319 924 英亩。全部面积的 $\frac{3}{5}$ ，即 12 092 117 英亩，至今仍为 1 英亩以下的到 100 英亩的农場所占有，掌握在 569 844 个租佃者手中； $\frac{2}{5}$ 的面积，即 8 227 807 英亩，則为 100 英亩到 500 英亩以上的农場所占有，掌握在 31 927 个土地所有者手中。这样，要被驅逐的（只算租佃者和他們的家屬）有 2 847 220 人。

这种制度就是 1846 年饥荒以及目前肉类和羊毛价格不断上漲的自然的结果，这种结果更因谷物法的廢除而加速产生³⁸⁶。

爱尔兰的清扫領地使爱尔兰成了英格兰的隔了一条寬闊的海峡的农业区，——这里沒有地主，地主們都和他們的家奴一起住在英格兰。

英国在爱尔兰的統治性质的改变

国家只是大地主的工具。**逐出土地**也被作为一种政治上的惩罚手段。（阿伯康勋爵。英国。苏格兰山区的盖尔人³⁸⁷。）英国原来的政策：以英国移民（伊丽莎白时代）和圓顛党³⁸⁸移民（克倫威尔时代）代替被排挤的爱尔兰人。女王安即位以后的十八世紀的經濟政策只須用英国对它自己的殖民地爱尔兰采用的关税保护办法就可以說明；在这个殖民地的内部，則把**宗教信仰**变成为财产权的法律基础。在实行合并³⁸⁹以后是苛刻的地租和土地中間人的制度，但是爱尔兰人尽管受到极度严重的压迫，却仍然是他們自己的土地的握有者。目前这种制度則是无声无息地、着着实实地进行着的一种歼灭；政府只是大地主（和高利貸者）的工具。

从这一改变了的情况产生了：

1. 芬尼亚运动的特点：社会主义的运动，下层阶级的运动。
2. 运动的非天主教性质。

在解放天主教徒的斗争³⁹⁰及这一斗争的领袖丹尼尔·奥康奈尔在爱尔兰运动中占主导地位以前，起领导作用的一直是神甫。英国人关于教皇政治的可笑的空谈。天主教的上层神甫们反对芬尼亚运动。

3. 没有一个领导人作为代表选入英国议会。奥康奈尔暴力运动的特点。议会中的爱尔兰党的退化。

4. 民族性质。欧洲运动的影响和英国的语言风格。
5. 美国、爱尔兰、英国——三个活动场所；美国的主导作用。
6. 共和运动，因为美国是共和国。

我在这里说明了芬尼亚运动的特征。

四、英国人民

人道和正义的问题，但首先是一个独特的英国问题。

(a) 贵族和教会。军队。(法国，阿尔及利亚。)

(b) 在英格兰的爱尔兰人。对工资的影响等。英国人和爱尔兰人性格的平衡。爱尔兰性格。爱尔兰人的自制。在爱尔兰国民教育方面的尝试。犯罪数字的缩减。

爱尔兰的判罪

受审讯者	判罪者
1852年——17 678	10 454
1866年——4 326	2 418

1855 年以来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受审訊者的数字所以减少，部分是由于 1855 年的刑事法；这一法律使法官在被告同意之下，有权自己判处短期禁閉，而不必将他們的案件移交法庭开庭审判。

北明翰。英国人民的进步。英国报刊的卑鄙无耻。

(c) 对外政策。波兰等。卡斯尔里。帕麦斯顿。

五、挽救的办法

議会的无足輕重的措施是毫无意义的。

改革同盟的錯誤³⁹¹。

破坏合并应成为英国民主党派的一个要求。

卡·馬克思写于 1867 年 11 月 26 日
左右
第一次全文发表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手稿譯的

卡·馬克思
1867年12月16日在倫敦德意志
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所作关于
爱尔兰問題的报告的提綱³⁹²

一

芬尼亚运动的特征是什么？这个运动实际上是在爱尔兰血統的美国人、即住在美国的爱尔兰人中間产生的。他們是发起人和領導者。但是在爱尔兰本土，这个运动扎根在人民群众中，扎根在下层階級中（这里至今仍是它的真正发源地）。这就是芬尼亚运动的特点。在以前所有的爱尔兰运动中，領導人民的不是貴族，就是資产者，而无論在哪一种情况下都有天主教神甫。在起义反对克倫威尔的时候，領導者是英格兰和爱尔兰的氏族領袖和神甫，在对威廉三世作战的时候，領導运动的甚至是英国国王詹姆士二世，在1798年革命的时候，領導者是奥尔斯脫的共和派新教徒（沃尔夫·湯恩、菲茲吉拉德勛爵）³⁹³，最后，在本世紀，領導者是資产者奥康奈尔，他依靠的是天主教神甫，而天主教神甫在过去除1798年以外的历次运动中也都起过領導作用。芬尼亚运动被天主教神甫革出教門。后者直到害怕因此而完全失去在爱尔兰人民群众中的影响时，才停止和芬尼亚运动作斗争。

二

使英国人惊異的是：和过去英国对爱尔兰的压迫相比較，他們认为目前的制度已經是温和的了。那末为什么正是在目前，矛盾表现出这样特別尖銳而不可調和的形式呢？我要指出（这一点，甚至对捍卫爱尔兰民族并拥护爱尔兰与英国分离的權利的那些英国人來說，也是一个秘密），从1846年以来，压迫的形式虽然不那么野蛮了，但实质上却是毁灭性的，而除了或者英国自願給爱尔兰以自由，或者作一場殊死的决战之外，別的出路是沒有的。

三

至于过去的历史，那末在任何一部历史著作中都可以找到这样的事实。因此，我只指出其中几件事实，举出这几件事实，首先对于解釋目前和过去时代的区别，其次对于強調一下能够說明目前称之为爱尔兰人民的那种东西的某些因素，都是必要的。

（a）新教改革以前英国人在爱尔兰

1172年。亨利二世。連爱尔兰的三分之一也未征服：名义上的征服。教皇阿德里安四世（英国人）的礼物。大約經過了400年（伊丽莎白时代）（1576年），另一个教皇，格雷哥里十三，又从英国人手里（从伊丽莎白手里）夺回了这点小小的礼物。³⁹⁴“英格兰佩耳”³⁹⁵。首都——都柏林。一般的英国移民和爱尔兰人的混合，盎格魯諾曼貴族和爱尔兰的首領們的混合。但是，总的來說，征服战

爭进行得就像征服紅种印第安人的战争(在早先时期)一样。1565年以前(伊丽莎白以前),英国沒有派援軍去爱尔兰。

(b) 基督教时代。伊丽莎白。詹姆斯一世。查理一世。克倫威尔。殖民計劃(十六——十七世紀)

伊丽莎白。計劃是消灭爱尔兰人(至少到善农河为止)夺得他們的土地,使英国移民住入这一地区等等。在和伊丽莎白斗争中,仍然信奉天主教的英国血統的爱尔兰人和本地居民一起同英国人作战。英国人公然承认的計劃是:清洗島上的本地居民,使忠君的英国人移居該島。他們只做到了安插土地貴族。自英国王权手中取得沒收来的土地的英国新教徒“冒險家們”(商人、高利貸者),以及应被安置在本地英国人家庭让出的地产上的“貴族企业主”。

詹姆斯一世。奥尔斯脫。(詹姆斯时代的殖民,1609—1612年)。不列顛的企业主必須“在沒收和窃取的土地上安排爱尔兰人”。自1613年起,爱尔兰人开始第一次被认为是英国的臣民,在这以前,他們是“法外之民”和“敌人”,而爱尔兰議會³⁹⁶的权力沒有超出“佩耳”之外。同时对天主教徒实行迫害。

伊丽莎白向曼斯特殖民,詹姆斯一世向奥尔斯脫殖民,但是倫斯特和康諾特尙未被清洗。查理一世企图清洗康諾特。

克倫威尔:爱尔兰的首次民族起义,及其再度被完全征服,部分地再度殖民地化(1641—1660年)。

1641年的爱尔兰革命。1649年8月,克倫威尔在都柏林登陸(在他之后又有艾尔頓、兰伯特、弗利特伍德、亨利·克倫威尔)。

1652年，爱尔兰已再度被完全征服。根据1652年8月12日和1653年9月26日的英国議會法令³⁹⁷瓜分战利品：政府本身、在11年战争中貸款36万英鎊的“冒險家”、軍官和士兵。“毫不容情地鏟除爱尔兰族的亞瑪力人，重新让从未在此地居住过的英国清教徒移民住入这些再次荒蕪了的土地”。流血，破坏，使整个整个的郡荒无人烟，将它们居民移居别处，把許多爱尔兰人卖到西印度群島做奴隶。

克倫威尔通过征服爱尔兰而推翻了英格兰共和国。

从此以后，爱尔兰人对英国人民政党的信任就失去了。

(c) 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威廉三世。第二次爱尔兰起义和有条件投降³⁹⁸。1660—1692年^①

那时，在爱尔兰的英国人比任何时候都多。他们在爱尔兰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从来不多于十一分之三，也不少于十一分之二。

1684年。查理二世开始庇护爱尔兰的天主教界并征募天主教軍。

1685年。詹姆斯二世給爱尔兰的天主教徒完全自由。天主教軍成长起来；对它給以庇护。天主教徒不久就声明必須廢除組織法令，并恢复1641年的土地所有者的权利。詹姆斯征集几个爱尔兰团前往英格兰。

1689年。英国的威廉三世。1689年3月12日，詹姆斯率領爱尔兰士兵在金塞耳登陆。里美黎克向威廉三世投降，1691年。

① 在手稿中下面还有：“(1701)(女王安)”等字。——編者注

无耻地破坏协定的行为在威廉三世时即已发生，而到女王安时更是变本加厉。

(d)爱尔兰被愚弄并受极大的屈辱。

1692年—1776年7月4日

(α)让英格兰和苏格兰的自耕农或租佃农场主“殖民”于这个国家的一切打算都放弃了。企图使德国和法国的新教徒移居。由于英国实行保护关税和重商主义的制度，移居于各城市中的法国新教徒(毛織品制造商)被赶走。

1698年。英爱議會(就像順从的移民所应该做的那样)根据宗主国的命令,对爱尔兰毛織品輸出到別的国家实施禁止性关税。

1698年。就在同一年英国議會决定对爱尔兰产品輸入英格兰和威尔士課以重稅,并完全禁止爱尔兰产品向其他国家輸出。英国給了爱尔兰工业一个致命的打击,使爱尔兰城市变得一片荒凉,迫使居民回到土地上去。

威廉时代的(外来的)在外地主³⁹⁹。对在外地主的怨憤,自1692年开始。

类似的抵制爱尔兰畜牧业的英国法律。

1698年。莫利紐的小册子⁴⁰⁰拥护爱尔兰議會(即英国在爱尔兰的殖民地)脱离英国人而独立。这样就开始了英国在爱尔兰的殖民地和英格兰民族的斗争。同时,也展开了英国在爱尔兰的殖民地和爱尔兰民族之间的斗争。威廉三世反对英国議會和英爱議會破坏里美黎克协定和高尔威协定的无耻的企图。

(β)女王安(1701—1713年;乔治,1776年以前)。

惩治法典⁴⁰¹由英爱議會拟就并經英国議會批准。通过調整

“财产”使爱尔兰天主教徒改信新教这种极可耻的手段。惩治法典的目的：使“财产”从天主教徒手中轉入新教徒手中，或者使“英国国教”变为财产权的法律基础。（教育；个人权利的丧失，天主教徒都不得当兵。）宣傳天主教成为应处以苦役的刑事罪行，从新教改信天主教成为叛国行为。天主教大主教被放逐；如果他在被放逐后重新回来，将被控犯叛国罪而处絞刑，活活地剖膛挖肚，然后砍掉四肢和头顱。企图强迫爱尔兰人民大众改信英国国教。天主教徒参加議員选举的权利被剝夺。

这一惩治法典加强了天主教神甫对爱尔兰人民的权力。

穷人养成了游手好閑的习惯。

在新教統治极盛和天主教衰落时期，新教徒在数量上并没有超过天主教徒。

(e) 1776—1801年。过渡时期

(α) 在談到这一过渡时期以前，让我们先看一看，英国恐怖手段的结果是什么？

英国外来者溶化在爱尔兰人中間并改信天主教。

爱尔兰化了的英国人建立了城市。

不存在英国人移民区（除奥尔斯脫的苏格兰人移居地以外），但是存在着英国的土地占有者。

北美的革命乃是爱尔兰历史中第一个轉折点。

(β) 1777年不列顛軍队在薩腊托加-斯普临斯向美国“暴乱者”投降。不列顛內閣被迫对在爱尔兰的（英国）民族主义者的政党作出让步。

1778年。关于容忍信奉羅馬天主教者的法案（由英愛議會

实行的)。天主教徒仍然沒有权利通过购买或租賃获得自由地产⁴⁰²。

1779年。和大不列顛实行自由貿易。几乎所有加于爱尔兰工业的限制都廢除了。

1782年。进一步使惩治法典中的一部分条款停止生效。准許信奉羅馬天主教者获得自由地产，終身或世襲地占有，而不受限制，并准許他們开办学校。

1783年。英愛議會获得平等权力。

1792年冬—1793年初。法国政府并吞比利时，英国决定对法国开战，此后，惩治法典又有一部分停止生效。爱尔兰人可以获得軍隊中团长的官銜，获得了选举爱尔兰議会的权利，等等。

1798年的起义。拜尔法斯特的共和派(沃尔夫·湯恩、菲茲吉拉德勋爵)。爱尔兰农民尙未成熟。

英愛議會下院对1800年通过的合并法令进行表决。英国血統的爱尔兰人同英国人的斗争由于英国和爱尔兰的立法机构以及关税制度的統一而告結束。殖民地反对非法的合并法令。

1801—1846年

(a) **1801—1831年。**在这段时期中(在战争結束⁴⁰³以后)，在爱尔兰人中兴起了和英国相同的解放天主教徒的运动(1829年)。

从1783年起，規定了爱尔兰在立法方面的独立，此后立即对非爱尔兰生产的各种商品征收稅款，其直接意图是让部分爱尔兰人口可能使自己的剩余劳动力得到部分的利用等。自从合并法令一生效之后，一个自然的結果就是爱尔兰工业逐漸消失。

都柏林

毛紡織厂厂主	1800年—— 91;	1840年—— 12
毛紡織厂中的雇佣工人	1800年——4 918;	1840年——602
梳毛企业厂主	1800年—— 30;	1834年—— 5
梳毛企业中的雇佣工人	1800年—— 230;	1834年—— 66
制毯工場場主	1800年—— 13;	1841年—— 1
制毯工場中的雇佣工人	1800年—— 720;	1841年—— 0
絲織机織工	1800年——2 500;	1840年——250

基尔肯尼

毛毯企业厂主	1800年—— 56;	1822年—— 42
毛毯企业中的雇佣工人	1800年——3 000;	1822年——925

巴布里干

开工的細棉布織机	1799年——2 500;	1841年——226
----------	---------------	------------

威克洛

开工的手織机	1800年——1 000;	1841年—— 0
--------	---------------	-----------

科 克

織带工人	1800年——1 000;	1834年—— 40
細毛織工	1800年——2 000;	1834年—— 90
針織工	1800年—— 300;	1834年—— 28
梳毛工	1800年—— 700;	1834年——110
棉織品織工	1800年——2 000;	1834年——220

如此等等。亚麻工业(奥尔斯脫)决不是一种补偿。

“有 14 000 个工人从事工作的都柏林棉織工业被消灭了; 3 400 台絲織机被消灭了; 有 1 491 个工人从事工作的斜紋布生产被消灭了; 拉德腊姆的法兰絨生产、基尔肯尼的毛毯生产、班登的厚毛布生产、瓦特福德的精梳毛織品生产、休尔河岸卡里克的长毛呢和厚絨布的生产——全都被消灭了。剩下的只有一种唯一的工业部門! …… 这一幸运的部門, 合并法案没有給它带来致命的打击, 优惠的条件、特权和保护还对它进行鼓励, 这一部門就是爱尔兰的棺材生产。”(托·弗·米格尔的发言, 1847 年)

爱尔兰刚刚准备好要在工业上有所发展，就遭到了迎头痛击而重新被变成为一个纯粹的农业国家。

根据 1861 年的最近一次普遍调查：

爱尔兰的农业人口

(包括所有茅舍贫农⁴⁰⁴ 和雇农以及他们的家属)……4 286 019

在 798 个城市中(其中有許多实际上只是市镇)…1 512 948

5 798 967

因而，(在 1861 年) 将近五分之四的居民是纯粹的农业人口，如果加上外省的城市，实际上可能有七分之六。

既然爱尔兰成为一个纯粹的农业国家，因此：“土地，就是生命”（布莱克本法官）。土地成了人们追求的重要目标。人民只有唯一的一种选择：或是不惜任何代价租得土地，或是餓死。盘剥性的地租制度。

“因此，土地所有人有可能强使别人接受他规定的条件，于是每英亩的租金就达到 5 英镑，6 英镑，8 英镑甚至 10 英镑。高得出奇的租金，低得出奇的工资，贪婪而游手好闲的私有者将大规模的农场租给壟断的土地投机者，后者又以五倍的高价分块租给只以马铃薯和白水充饥的、餓得半死的不幸者。”

全民性的饥饿状态。

英国的谷物法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爱尔兰粮食向英格兰输出的这种壟断。在合并法令通过的**头三年**中，平均每年输出谷物约 30 万夸特。

1820 年输出 100 万夸特以上。

1834 年(全年平均数字)为 250 万夸特。

付给在外地主的租金和抵押利息的总数(1834 年)超过 3 000 万美元(约合 700 万英镑)。土地中间人积累了财产，他们不愿意

把这些财产投资于改善土壤；而在压抑工业的制度下，也不可能用来投资于机器等。因此，他們的全部积累都轉到英格兰去投資了。英国政府所公布的一份官方文件证明，英国的有价证券从英格兰轉到爱尔兰，也就是說，爱尔兰資本在英格兰的投資，在 1821 年实施自由貿易以后的 13 年中，已达数百万英鎊；这就是說，为了建立“不列顛的宏偉的企业”，爱尔兰被迫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和廉价的資本。

大量的猪及其輸出。

1831—1841 年。 爱尔兰人口从 7 767 401 人增加到 8 175 238 人

10 年中共增加 407 837

同时期中移民：(每年略多于 40 000 人)..... 450 873

858 710

奥康奈尔。合并取消运动。同輝格党人的利奇菲耳德府邸协定⁴⁰⁵。各个地区的饥荒。关于起义的法令，关于武器的法令，高压法。

四

最近 20 年間(从 1846 年起)。

爱尔兰的清扫領地

以前常常在这一地区或那一地区发生饥荒。目前到来的是普遍的饥荒。

这一新的阶段是由馬鈴薯病害 (1846—1847 年)、饥荒、以及随之而来的大批移民开始的。

有 100 万人以上死亡，其中一部分直接死于飢餓，一部分死于（飢餓所引起的）疾病。从 1847 年到 1855 年的 9 年中，移居国外的有 1 656 044 人。

旧的农业制度的改变最初是拋棄土地的自然結果。人們紛紛逃亡（一些家庭合資把最有為的青年送往国外）。因此，小块租佃的土地自然地合并起来，农业为畜牧业所代替。

但是，很快又产生了另一种情况，由于这种情况，上述这一切就变成了一种有意識、有計劃地实行的制度。

首先，而这也是主要的：爱尔兰灾难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谷物法的廢除。由此，爱尔兰的粮食就丧失了平常年代它在英国市場上享有的壟断地位。粮食的价格下跌了。偿还地租已不可能。同时，在最近 20 年中，肉类、羊毛和其他畜产品的价格却不断上漲。英国毛紡織工业的空前高漲。养猪业在某种程度上是同旧的制度相联系的。目前，开始特別繁殖得多的是羊和牛。爱尔兰現在失去了英国市場，就像过去由于合并法令而失去自己本土的市場一样。

在这方面不断起作用的还有以下一些次要的因素：

其次，英国农业方面的改造；在爱尔兰——則是对这种改造的一种諷刺。

再次，爱尔兰人迫于飢餓而逃亡到英格兰，因此利物浦、曼彻斯特、北明翰和格拉斯哥的所有地窖、貧民窟和习艺所都挤滿了餓得奄奄一息的男人、女人和孩子。議會通过了一項法案（1847—1848 年），根据这一法案，爱尔兰地主必須救济住在他的領地上的貧民（英国的济貧法推广到了爱尔兰）。因此，大半都負債累累的爱尔兰的（特別是英国的）地主，就企图摆脱这些人，清扫自己的領地。

最后，积債地产法令(1853年)：

“地主宣告破产，因为他无法收得地租，但同时却必須为維持穷邻居的生活而付出大量稅款。他的土地由于貸款而担負了很重的抵押和支付义务(这些貸款他是在食物价格高涨的时候得到的)，而他已无力偿付貸款的利息；于是頒布了一項法律，它規定财产可以立即拍卖，拍卖所得分給債权人。”

由于这种情况，在外地主(英国的資本家、保險公司等)以及过去那种土地中間人等等的数目都增加了，后者希望在經濟方面按現代化的方式来經營管理。

排挤租佃者部分是采取双方就廢除租約达成友好的協議的方式。但在更多的情况下却是采取大規模驅逐的方式(由«crowbar brigade»——“撬棍队”强制执行，他們的做法是先把屋頂掀掉)，強制性驅逐的方式。(这也是一种政治惩罚手段。)这从1847年起一直繼續到現在(阿伯康，爱尔兰总督)。非洲式的襲击(非洲小酋长那种襲击)。(人民被逐出土地。城市中挨餓的人口急剧增加。)

“租佃者成批地同时被从茅舍中赶走…… 这一行动是由地产代理人来指揮的。大批的警察和士兵被調来完成这一行动。在警察和軍队的保护之下，‘撬棍队’开进要毁灭的村庄，占領住房…… 早上，太阳升起时还是好好的一座村庄，傍晚，太阳落山时已是一片荒涼了。”(“高尔威报”)1852年(阿伯康)

首先，讓我們看一下，这种制度对爱尔兰的土地起什么作用，那里的条件是同英格兰的条件完全不同的。

1861—1866年播种面积的縮减

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的縮减	飼料作物播种面积的縮减
1861—1865年——428 041 英亩	1861—1865年——107 984 英亩
1866年——42 876 英亩	1866年——20 077 英亩
共計……… 470 917 英亩	共計……… 128 061 英亩

每一法定英亩上各种农作物收获量的减少

1847—1865 年間，收获量的减少以准确的百分比表示是：燕麦——16.3%；亚麻——47.9%；蕪菁——36.1%；馬鈴薯——50%。在某几年中，收获量减少得更多，但总的來說，从 1847 年起，收获量是不断下降的。

每一法定英亩經調查的平均收获量

	小麦 (单位:夸特)	馬鈴薯 (单位:吨)	亚麻 (单位:陌,每陌为 14 磅)
1851 年——	12.5	5.1	38.6
1866 年——	11.3	2.9	24.9

爱尔兰过去輸出过大量小麦，而現在据說只适宜于种植燕麦(oats)了(每一英亩的燕麦收获量也在不断减少)。

事实上：1866 年爱尔兰只輸出了 13 250 夸特小麦，而輸入的却有 48 589 夸特(即几乎达四倍之多)。爱尔兰輸出的燕麦約 100 万夸特(值 1 201 737 英鎊)。

自从大規模移民开始以来，土地就沒有施肥而变得貧瘠了。这部分是由于农場瘋狂地扩大，部分是由于在“谷地制”⁴⁰⁶条件下，租佃者大多只让他的雇农去施肥，而不是自己去做。地租和利潤(在租佃者不是农民的地方)在即使收获量减少的情况下也一样可以增加。总的产量可能减少，但是变成归大地主和(大)农場主所有的剩余产品的那一部分却越来越多。而剩余产品的价格是会上漲的。

因此，使地力(逐漸)耗竭，就像古羅馬人在西西里島所做的那样(在埃及 ditto〔也如此〕)。

我們就要談談牲畜，但是讓我們先來說一說人口。

人口的縮減

1801年——5 319 867 人；1841年——8 222 664 人；1851年——6 515 794 人；1861年——5 764 543 人。如果照这样发展下去，到1871年就会是5 300 000 人，也就是比1801年时还少。但是我在下面就要指出，即使移居国外者所占的百分比不变，1871年的人口数也还要更少一些。

移 民

当然，移民在一定程度上是人口縮減的原因。从1845年到1866年，爱尔兰人移居国外的有1 990 244 人，即将近200万人。（真是聞所未聞！約占1845—1866年間联合王国移民总数的五分之一；总数为4 657 588 人。）从1831年到1841年这一段时期內，移居国外的几乎占这十年間人口增长总数的一半。从1847年起，移居国外的又大大地超过这一数字。

但是，单用移民还不足以說明从1847年以来的人口的縮減。

每年人口自然增长的縮減

在1831—1841年間，这种（每年的）增长为每年1.1%或大約 $1\frac{1}{10}\%$ 。如果1841—1851年間人口数字也按这一比例增长的話，那末到1851年，就應該是9 074 514 人了。但是实际上却只有6 515 794 人。这就是說，相差2 558 720 人。其中移居国外的有1 274 213 人。还差1 284 507 人。有100多万人死于飢餓。但这还不足以抵銷1 284 507 人这一差額。因此，1841—1851年間人口的自然增长显然降低了。

对于 1851 年到 1861 年 10 年間情况的分析证实了这一点。沒有发生饥荒。人口总数从 6 515 794 人减少到 5 764 543 人。减少的绝对数字为 751 251 人。但是在这一段时期中，移居国外的有 1 210 000 人以上。也就是說，10 年間人口的增长約为 460 000 人，因为 751 251 人 + 460 000 人等于 1 211 251 人，即在这一段时期中移居国外的人数。移居国外的人数几乎达到人口增长数的三倍。每年增长的百分比为 0.7% ($\frac{7}{10}\%$)，比 1831—1841 年間的 1.1% 要低得多。

理由很簡單。由出生形成的人口增长，主要取决于 20 岁至 35 岁这一部分人和其他年齡的人們的比例。20 岁至 35 岁这一部分人和联合王国人口的比例約等于 1:3.98 或 25.06%，而在移居国外的人們中，这种比例即使在現在也約等于 1:1.89 或 52.76%。在爱尔兰，这种百分比大概还更高些。

居民体质的恶化

在 1806 年，人口总数为 5 574 107 人，男子比妇女多 50 469 人；而在 1867 年，人口总数为 5 557 196 人，妇女比男子多。同时，居民中的聋哑人、盲人、瘋子、痴子和殘廢人的数字，不仅相对地而且绝对地增加了。以 1851 年和 1861 年相比，可以看出，人口虽然大大减縮，聋哑人的数字比原来的 5 180 人增加 473 人；殘廢人比原来的 4 375 人增加 225 人；盲人比原来的 5 767 人增加 1 092 人；瘋子和痴子比原来的 9 980 人增加 4 118 人这样一个极大的数字——也就是說，到 1861 年，虽然人口减少，瘋子和痴子却达 14 098 人。

工 資

从馬鈴薯引起饥荒以来，工資提高不超过 20%。而馬鈴薯的价格却几乎提高了 200%，日用必需品（食品、煤等）的价格則平均上漲了 100%。

克利夫·萊斯利教授在 1867 年 2 月 9 日的“經濟学家”上写道：

“在 21 年中人口减少五分之二以后，目前几乎全島的常規工資每天只有 1 先令；而目前 1 先令所能买的东西并不多于 21 年前用 6 辨士所能买到的。由于一般食品价格的高漲，工人的生活比 10 年前更坏了。”

各个地区的饥荒，特别是在曼斯特和康諾特。

小店主不断破产。外省城市的衰落等。

过程的結果

在 1855—1866 年这一段时期中，有 1 032 694 个爱尔兰人被 996 877 头牲畜（牛、羊、猪）所排挤。这正是这一时期中牲畜增加的数字。这一时期馬的数量的减少（减少 20 656 匹）由相当的羊的数量来平衡（以 1 匹馬折合 8 只羊計算），因之这一数字已从增长的数字中扣除。

农場的扩大

从 1851 年到 1861 年：农場总数减少了 12 万。（从 15 英亩到 30 英亩以及 30 英亩以上的农場的数目增加了。）因此，縮减首先触及的是 1 英亩到 15 英亩的农場。

在 1861 年，将近 $\frac{3}{5}$ 的土地面积（爱尔兰的总面积为 20 319 924

英亩)，即 1 200 万英亩，掌握在有 1 英亩到 100 英亩土地的 569 844 个租佃者手中。

約有 $\frac{2}{5}$ 的土地(800 万英亩)是以 100 英亩到 500 英亩的地块或以更大的地块出租的(租佃者 31 927 人)。

农場扩大的过程正在以全速进行着：奥尔斯脫(亚麻种植业，租佃者——苏格兰新教徒)。

“泰晤士报”等为这种制度公开向阿伯康总督祝賀。他本人就是一个这样的毁灭者。达費林勋爵：人口过剩等。^①

因此，这是一个生死存亡的問題。

米格尔、亨尼西、“爱尔兰人报”。

爱尔兰犯罪数字的縮减

受审讯者	判罪者
1852 年—— 17 678	10 454
1866 年—— 4 326	2 418

五

合众国和芬尼亚运动

卡·馬克思写于 1867 年 12 月 16 日
左右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德文和英文
俄文是按手稿譯的

① 見本卷第 686、693 頁。——編者注

弗·恩格斯
——
爱尔兰史⁴⁰⁷

弗·恩格斯写于1870年5月—
7月上半月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
文庫”1948年版第10卷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譯的

自然条件

欧洲的西北角有一个国家，它的历史我们将要加以研究；这是一个面积为 1 530 平方德里或 32 500 平方英里的岛屿。而在爱尔兰和欧洲的其余部分之间还有一个三倍大的岛屿，为简便起见，我们通常称它为英格兰；这个岛屿从北、东和东南三面环抱爱尔兰，只在朝向西班牙、法国西部和美洲方面给它留下一个空隙。

把这两个岛屿分隔开来的一条海峡，南部最狭窄处是 50—70 英里，北部有一处是 13 英里宽，另一处是 22 英里宽，所以在北部，爱尔兰的苏格人早在公元五世纪以前就移居到邻岛，并在那里建立了苏格兰国。南部的海峡太宽，爱尔兰人和不列颠人的小船都无法通过，甚至对罗马人的近海航行的平底船来说，也是一种严重的障碍。但是，一到弗里西安人、盎格鲁人、撒克逊人、以及后来的斯堪的那维亚人大胆地坐上龙骨船驶进一望无边的大海时，这个海峡就不再成为障碍了；爱尔兰遭到了斯堪的那维亚人的海盗式的侵袭，并且成了英格兰人的唾手而得的猎物。而当诺曼人在英格兰建立起统一而强大的政权以后，这两个相邻的岛屿中较大的一个岛屿就开始显示出它的作用，——当时这就意味着征服战争。⁴⁰⁸

此后，在进行这一战争时，英格兰取得海上霸权的时期来到了，这就使任何旁来的干预都不可能获得成功。

最后，既然較大的島屿完全成为一个統一的国家，那末这个国家自然也就力图把爱尔兰完全同化。

这种同化如果真的成功，它的进程就应完全归入历史領域。这一进程应由历史来判决，但是要回到过去却已經不可能了。而既然在七个世紀的斗争以后同化并没有成功；既然在征服者对爱尔兰接連不断地进行冲击的每次新的浪潮之后，反而是他們自己被爱尔兰所同化；既然爱尔兰人直到現在也并没有成为英格兰人或者所謂的“西不列顛人”，就像只受了一百年压迫的波兰人并没有成为“西俄罗斯人”那样；既然斗争还没有結束，而且除了消灭被压迫的 race [种族]，也没有可以用別的方式来結束这一斗争的征兆——那末，任何地理上的借口都不能证明征服爱尔兰乃是英国的天职。

为了了解現代爱尔兰的土壤性质，我們必須談談远古的时代，談談形成所謂石炭层的那个时代。①

爱尔兰的中部，由都柏林到高尔威一綫南北两面，是一片辽阔的平原，平均高度为海拔 100—300 英尺。这一平原，或者說，全爱尔兰的主要平面，是由一层极厚的石灰岩构成的。这石灰岩是石炭系的中部（炭质石灰岩，carboniferous limestone），它的上面，無論在英格兰或其他地方，都紧挨着含煤层（真正的煤系，coal measures）。

① 本文中有关地质方面的材料，除另注明出处者外，均引自約·比特·朱克斯“地质学課本”1862年爱丁堡新版（J. Beete Jukes. «The Student's Manual of Geology». New Edition. Edinburgh, 1862）。朱克斯是当地爱尔兰地质研究部門的主席，因此，在他特別有研究的这个領域中，他是第一流的权威。

Nachbarlandungen.

Da die Nordwestküste Englands durch die Insel Schottland
von der Ostküste von Schottland durch die Inseln Orkney und Shetland
mit dem Festlande verbunden ist, so ist die Küste von Schottland
von der Ostküste von England durch die Inseln Orkney und Shetland
mit dem Festlande verbunden ist.

Die Inseln Orkney und Shetland sind durch die Inseln Orkney und Shetland
mit dem Festlande verbunden ist. Die Inseln Orkney und Shetland
sind durch die Inseln Orkney und Shetland mit dem Festlande
verbunden ist. Die Inseln Orkney und Shetland sind durch die
Inseln Orkney und Shetland mit dem Festlande verbunden ist.

Die Inseln Orkney und Shetland sind durch die Inseln Orkney und Shetland
mit dem Festlande verbunden ist. Die Inseln Orkney und Shetland
sind durch die Inseln Orkney und Shetland mit dem Festlande
verbunden ist.

Die Inseln Orkney und Shetland sind durch die Inseln Orkney und Shetland
mit dem Festlande verbunden ist. Die Inseln Orkney und Shetland
sind durch die Inseln Orkney und Shetland mit dem Festlande
verbunden ist.

Die Inseln Orkney und Shetland sind durch die Inseln Orkney und Shetland
mit dem Festlande verbunden ist. Die Inseln Orkney und Shetland
sind durch die Inseln Orkney und Shetland mit dem Festlande
verbunden ist.

Die Inseln Orkney und Shetland sind durch die Inseln Orkney und Shetland
mit dem Festlande verbunden ist. Die Inseln Orkney und Shetland
sind durch die Inseln Orkney und Shetland mit dem Festlande
verbunden ist.

在南部和北部，这一平原均为山脉所环绕。山脉大部分紧贴海岸，几乎完全由出露于石灰岩下面的更古老的岩层（花岗岩，云母片岩，寒武纪、寒武志留纪、上志留纪和泥盆纪的岩层）以及石炭系最下部的泥质页岩和砂岩构成，后者含有大量的铜和铝，并含有少量的金、银、锡、锌、铁、钴、镍和锰。

只有在少数地方，山才是由石灰岩本身构成。一处是在平原中部，在女王郡⁴⁰⁹，高达 600 英尺，另一处在西部，在高尔威湾南岸，高达 1 000 英尺（巴伦山）。

在石灰岩平原南半部的某些地方，可以看到单独的、由含煤层构成的山脊，高度为海拔 700—1 000 英尺，规模相当大。这些山脊位于石灰岩平原的槽状盆地，它们呈坡度十分陡峭的高原耸立在这些盆地中。

“这些彼此相隔很远的石炭系山脉的山坡非常相像，而且组成这些山坡的岩层也完全一样，因此，只能认为它们最初是以连绵不断的带状延伸于整个这个地带，虽然现在它们彼此相距 60—80 英里…… 这种观点由于以下两点更可以证明是正确的：首先，在现存的煤层之间，常常可以看到单独的小丘，它们的顶部也由石炭纪岩层构成；其次，凡是石灰岩平原下沉至现代地面以下的地方，洼处充填的均是石炭系的最下部岩层”（朱克斯“地质学课本”第 286 页）。

一些别的情况（可参看朱克斯“地质学课本”第 286—289 页。这里再多引证就失之于过分详细了）也毫无疑问地说明一个事实：整个爱尔兰中部平原，正如朱克斯所说，是因剥蚀作用而形成的，即在石炭纪岩系以及石灰岩层上部被冲刷以后（厚度至少平均为 2 000—3 000 英尺，也可能为 5 000—6 000 英尺），外表便出露了主要是石灰岩的下部岩层。甚至在纯粹由石灰岩组成、高达 1 000 英尺的巴伦山（克勒尔郡）的最高峰，朱克斯也发现了不大的石炭

系积层(第 513 頁)。

因此,在爱尔兰南部,至今还存在着几条相当大的石炭岩带;但是其中只有极少数的几个地方才有蕴藏量值得开采的煤层。而且这种煤还是无烟煤,就是說,含氢不多,因而,不掺别的混合物往往就不能供工业上使用。

爱尔兰北部也有几个煤层,它們并不太大,但是含有树脂煤,即通常那种含有大量的氢的煤。这里岩层的分布和在南方煤矿区所看到的不大一致。不过即使在此地,也发生了石炭系的冲蚀过程,这从以下的事实可以看得很清楚:在位于这样的一个煤层东南方的石灰岩河谷的表面,向貝耳特貝特和莫希耳的方向,可以看到属于同一层系的、混有砂岩和藍色垆姆的大煤块。在这个地区的冲积土壤中挖井的人,常常遇到巨大的煤块,而且有时数量很多,看来再向下挖就会挖到煤层。(凱恩“爱尔兰的工业資源”1845年都柏林第2版第265頁⁴¹⁰)

可見,爱尔兰的不幸起源于远古的时代;这种厄运从石炭系岩层一形成就开始了。一个国家,煤层被冲蚀,而又紧邻一个煤产丰富的大国,因此好像大自然本身已經作出这样的判决:面对着这一未来的工业强国,它只好长期保持为一个农民国家。这个千百萬年前所作的判决,直到我們的时代才执行。而且,我們后来还看到,英国人还帮助了大自然,差不多每当爱尔兰工业一萌芽,他們就立即橫暴地加以摧毁。

較晚的地层,第二世和第三世的地层⁴¹¹,几乎只有在东北部才能看到;在这方面我們最感兴趣的主要是拜尔法斯特附近含有厚达100英尺的相当純淨的岩盐层的考依波层(朱克斯“地质学課本”第554頁),以及布滿整个安特林郡而同时却为玄武岩层所掩

盖的白垩。总的来说，爱尔兰的地质发展史从石炭纪末直到冰期是中断了。

大家知道，在第三世以后，曾经有一个时期，在欧洲中纬地带，所有平原都为海水所淹没，当时欧洲很冷，由露出水面的山所构成的岛屿间是一片冰川，这些冰川直流入海。冰川中分出来的冰山，带着从山上冲下的大大小小的石块流向大海；每当冰一融化，这些石块以及所有从陆地上带来的东西就都沉入海底。这一过程，在极地国家的沿海一带直到目前还每天在进行着。

在冰期，爱尔兰除山峰以外，也都沉没在海水中。沉没的深度在各个地方大概不一样，但是平均可以认为比目前的水平面低1 000英尺；都柏林以南的花岗岩下沉了大约1 200英尺以上。

就假定爱尔兰只下沉500英尺，那末它也会只剩下由山脉所构成的两组岛屿，它们形成两个半圆形，围绕着一从都柏林到高尔威的宽广的海峡。如果下沉得更深，岛屿的面积就会缩小，数目也会减少，而在下沉2 000英尺时，水面上就会只剩下那些最高的山峰了。^①

在岛屿缓缓下沉时，石灰岩平原和山坡上的各种古代的岩层不可避免地被冲刷掉了，以后在被海水淹没的地带就开始沉积下为冰期所特有的“冲积沙”。陡峭的岛屿的风化物，以及磨蚀成碎屑的岩块（这些岩块是被在河谷中缓慢而沉重地向前移动并且冲刷着河谷表面的那些冰川所剥落的）——泥土、砂砾、大小石块（这

① 在爱尔兰的32 509平方英里的面积中，海拔250英尺以下的占13 243平方英里，251英尺到500英尺的占11 797平方英里，501英尺到1 000英尺的占5 798平方英里，1 001英尺到2 000英尺的占1 589平方英里，2 001英尺以上的占82平方英里。

些块礫，在冰的里边的都被磨光，在冰的面上的則帶有鋒利的稜角)，这一切都被沿岸分裂下的冰山帶入海洋，以后就逐漸沉入海底。这样形成的岩层，由于情况不同，有的是（由泥质頁岩形成的）坩母，有的是（由石英和花崗岩形成的）砂土，有的是（由石灰岩形成的）石灰岩礫石，有的是（由坩母和細碎的石灰岩混合成的）灰泥，有的則是所有这些东西的混合物；但無論在哪一种情况下，这一岩层都含有許多較大的圓形石头或尖角石块，甚至还有很大的漂礫，这种大漂礫，在爱尔兰比在德国北部低地或阿尔卑斯山脉与汝拉山脉之間更为多見。

以后，陆地重新露出海面，这一新形成的表面已具有現代的形状（至少是大致上与此相似）。同时，爱尔兰表面的冲刷过程看来并不劇烈，除了少数地方以外，厚薄不等的一层冲积砂复盖着整个平原地区，沿山坡伸展到所有的谷地，甚至在山坡高处也可以看到它們。在冲积砂中間所看到的石头多半是石灰岩，因此这整个岩层一般就称为石灰岩礫石(limestone gravel)。在整个低地也散布着許多巨大的石灰岩块，几乎每一块平地上都可以看到一块或好几块；自然，在山脉附近，除了石灰岩，还有大量的来源于这些山脉的本地岩石，特别是花崗岩。从高尔威灣北岸起，在东南走向的平原上，直到加耳蒂山区，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花崗岩，而朝馬洛(科克郡)的方向，花崗岩則只能在个别地方看到。

这一国家的北部，也像中部平原一样，复盖着达到同样海拔高度的冲积砂。南部，在橫貫其間的几条近乎平行的山脉之間，我們发现，当地岩层的沉积是相似的，其中多半屬於志留系。这些地层尤其是在靠近基拉尼的弗累斯克河和郎河河谷間可以大量看到。

山坡上和谷地底部的冰川遺迹主要是在爱尔兰西南部，分布

极广，也极明显。就我记忆所及，只有在上哈斯利和瑞典的某几个地方，我才看到过比在基拉尼附近（在黑谷和丹洛狭谷）看到的轮廓更为鲜明的冰川遗迹。

冰期或冰期以后，地面大概有极大的升高，不列颠曾经有一个时期不仅和大陆而且和爱尔兰都有陆地相连。看来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为什么这些国家有同样性质的动物化石群。在爱尔兰绝种的大哺乳动物，和大陆上一样，有毛象、爱尔兰大角鹿、洞熊、变种驯鹿等。的确，地面只要比目前升高不到 240 英尺，爱尔兰和苏格兰就会由一条宽阔的陆地连接起来，只要升高不到 360 英尺，爱尔兰和威尔士也会这样连接起来。^① 爱尔兰沿岸到处都是内有直立的树桩和树根的水底泥炭沼泽，同时，它们和相邻的内地各地区泥炭沼泽的底层完全相同，这证明，在冰期以后，爱尔兰的地面曾经有一个时候比目前要高。

所以，爱尔兰的土壤（我们从农业的角度来看）几乎全是由冰期的“冲积砂”形成的，而在这里，它们由于来源于頁岩和石灰岩，形成一层极为肥沃而疏松的垆母土壤层，它不同于苏格兰、斯堪的那维亚和芬兰的那种由于花岗岩破碎而形成的贫瘠的砂质冲积层，——复盖着德国北部广大地区的冲积层即属于后者。爱尔兰的土壤过去和现在不断获得各种各样的岩石破碎后的产物，这就保证它有相当数量的为植物生活所必需的各种各样的矿物质。如果说在开垦的地层中往往缺乏一种矿物质，即缺乏石灰，那末（且不论地下的硬质石灰岩层）到处都是的许多较大的石灰岩块就可

^① 見 1868 年出版的施梯勒編的地图教本⁴¹² 图 15a。这个图和爱尔兰詳图 (№ 15d) 都很清楚地显示了地面的构造。

以毫不費力地把这种矿物质补充到土壤中去。

著名的英国农学家阿瑟·楊格于上一世紀七十年代在爱尔兰旅行时，竟不知道，他是应该对爱尔兰土地的肥沃，还是应该对农民以原始的方式使用土地更感到惊奇。凡是有好地的地方，多半都是“疏松、干燥、柔软、含砂极多的垆母土壤”。在梯培雷里的“黄金谷”以及其他地方，楊格找到了

“就是我曾经称之为对农业再好不过的土壤的那种略带红色的砂质垆母”。由此往克郎梅尔的方向“到处是厚厚的一层我常提到的那种红色砂质垆母。我在不同的地方研究过这种土壤，发现它非常肥沃；这是我所见到过的最适宜于种燕麦的土壤。”

接着，他写道：

“肥沃的土地从位于山麓的查理維耳一直伸延到梯培雷里（城市），其间经过基耳芬楠，这是一条长 25 英里宽（从阿德帕特里克至离里美黎克 4 英里的地方）16 英里的地带”。——“靠近阿德尔的梅格河上的《Corcasses》的土壤是最富饶的。这是一条长 5 英里宽 2 英里的地带，位于梅格河下游至流入善农河处…… 这块土地在开垦以后最初种上燕麦，每英亩收获量是 20 琵琶桶（每琵琶桶合 14 石，即 196 磅）即 40 普通桶，这还不算是特别的丰收；燕麦一連种植十年到十二年都不会减产；接着种一年豆类，就能使土壤大为改良，这样又可以一連收十年燕麦；豆类带来极好的收成…… 在别处听到过这样的原始方式吗？”

接着，关于里美黎克郡的奥利维尔堡地区，他写道：

“这里最好的土壤是在山脚下；这是一种最好的饱含腐植质的松软的砂质垆母，厚一英尺半到三英尺，颜色为红棕色。这种干燥的土地极适宜于种植燕麦、葫萝卜、白菜，一句话，什么都合适。总的来说，我认为这是我所见到过的最肥沃的土壤，它适宜于种植可以想到的任何一种东西。在这种土地上可以育肥最大的公牛，也同样适宜于养羊，耕作，种植燕麦、小麦、豆类等一切。只要亲自研究了这种土壤，就会相信，这种看来非常贫瘠的土地竟会这样富饶和肥沃。”

在靠近馬洛的黑水河边，

“有一片寬四分之一英里的平原，到处长着茂密的青草。这是我所看过的最好的砂质土壤，顏色为紅棕色；如果加以垦殖，它能带来世界上最好的收成。土壤厚达五英尺，虽然用它可以燒成极好的磚，但它还是一种純淨的砂土。沿河两岸，从发源地直至入海口，風景都很优美，土地极为富饒。”——“这里常常可以看到疏松的砂质垆姆，它是干燥的，但很肥沃，它是这个国家中最适宜于农业和养羊业的土壤。在梯培雷里和罗斯考門，这种土壤特別多。最肥沃的土地是里美黎克、善农河岸、克勒尔郡的牧牛場，即所謂 Corcasses… 在英国常見而在整个西班牙、法国、德国和波兰——从直布罗陀直到彼得堡——更为常見的那种砂土，在爱尔兰，除了沿岸狹窄的砂丘地带以外，是从来看不到的。至于白堊土壤，我在那里也从从来没有看到过，而且沒有听人說起过。”①

楊格对于爱尔兰的土壤作了如下的結論：

“如果要我說明最好的土壤应具有哪些特征，那我就說：这种土壤應該能育肥公牛，同时又能使蕪菁有好的收成。可是，据我所記得的，这种土壤在英格兰非常之少，或者甚至根本没有，相反，这种土壤在爱尔兰却頗不少見。”（第2卷第271頁）——“以一英亩爱尔兰土壤和一英亩英格兰土壤相比，爱尔兰的肯定比英格兰的肥沃。”（第2卷第2部分第3頁）——“如果要我判断这两个王国土壤的优劣，那就得承认，爱尔兰的土壤要好得多。”（第2卷第2部分第12頁）

1808—1810年，英国的一位农学专家爱德华·威克菲尔德也在爱尔兰作了旅行，他把自己观察的結果写成了一部极有价值的著作②。他的筆記做得較好，比楊格的旅行筆記更有系統，也更为

① 阿瑟·楊格“爱尔兰旅行記”三卷集 177…年倫敦版（《A Tour in Ireland》by Arthur Young. 3 vol., London, 177…）。以上几段引自第2卷第28、135、143、154、165頁及同卷第2部分第4頁。

② 爱德华·威克菲尔德“爱尔兰的統計数字和政治情况”，两卷集 1812年倫敦版四开本（《An Account of Ireland, Statistical and Political》. By Edward Wakefield. London, 1812, 2 vol., in 4°）。

詳細；总的來說，这两位作者的意見是吻合的。

威克菲尔德看到，总的來說，爱尔兰各个地区在土质方面，没有什么大的差別。砂土只有沿海才有（内地很少砂土，以致为了改良泥炭土壤和粘土土壤，必須运入大量的海砂）；爱尔兰沒有白堊土壤（正如上面提到的，在安特林，白堊层为玄武岩层所掩盖，后者的風化物构成了特別肥沃的可耕地，而在英格兰，白堊却形成最坏的土壤）；“在牛津郡、在艾塞克斯的某些地区以及在整個上薩福克所看到的那种粘性土壤，我在爱尔兰的任何地方都沒有发现过。”爱尔兰人把所有坩埚土壤都叫做“粘土”（clay）；也可能爱尔兰有真正的粘土，但無論如何决不像英格兰某些地方那样位于上部岩层。石灰岩和石灰岩礫石在爱尔兰几乎到处都可以碰到；“石灰岩是一种有用的东西，很容易把它变成財富的源泉，任何时候都能加以利用。”的确，山和泥炭沼澤大大地縮减了肥沃的土地面积。在北方，肥沃的土地并不多，但是即使在这里，在每一个郡里，也都可以看到一些极其富饒的河谷，甚至在位于最北部的多尼果耳，在最荒涼的山区，威克菲尔德也出乎意料地发现了非常肥沃的地带。在北部，亚麻种得极好，这本身就足以证明那里的土壤是非常肥沃的，因为这种植物在貧瘠的土地上是从来也长不好的。

“爱尔兰的大部分地面长着茂密的青草，它們几乎是直接长在坚硬的石灰岩层上的。我曾經看到一块只有几英寸厚的地，連雨季在上面跑馬也不留蹄印，却能很快把公牛养到 14 公担重。这是爱尔兰的肥沃土壤中的一种，在罗斯考門以及高尔威和克勒尔等地的某些地区到处都可以看到。有些地方有所我看到过的耕地中最为肥沃的坩埚；特别是在整个米斯郡。在这些地方，土壤非常肥沃，似乎大自然有意要补偿当地居民因采用原始耕作方法而遭到的損失。——善农河畔和非格斯河畔又是另一种土壤，但也同样肥沃，虽然那里的土地表面看起来就像沼澤一样。这些地方被称作«Caucasses»（和

楊格不同，威克菲尔德是这样写它們的名称的)；土壤下伏层是一层薄薄的藍色海相淤泥，看来性质也和可耕地一样，因此无论怎么翻耕，即使翻得非常深，也不会对这种土壤有什么損害。——在里美黎克郡和梯培雷里郡又可以看到另外一种肥沃的土壤；这是一种深色的疏松而干燥的砂质垆母，只要鏟除杂草，它就能使谷物一連几年获得丰收。这种土壤对耕作和放牧同样合适，我敢肯定地说，对于这种土壤，很少会有哪一年雨水过多，有哪一个夏季过分干旱。这种土壤之所以肥沃，部分是由于被雨水从山頂冲刷下来的土壤細屑以后在河谷中沉积起来。土壤下伏层包含着石灰，这样，农民并没有化費任何劳动，土壤就已到处从下面施上了最好的肥料。”(第1卷第79、80頁)

如果在較硬的垆母下面紧挨着是一层不太厚的坚实的石灰岩，这样的土地就不适宜于农业，不会有好收成；但是这种土地作为放羊的牧場却非常好，这样它还可以进一步改良，上面盖上一层茂密的青草，其中混杂着白色的三叶草和……^①(第1卷第80頁)。

博弗尔博士^②证明：在西部，特别是在梅沃郡，有許多 *turloughs*，这是一种相当大的平原，虽然上面看不到河流或小溪，但是在冬天的时候，却被水所淹沒；夏季水就流入石灰岩层的地下罅隙中，留下一片极适宜于作牧場的坚实土壤。

威克菲尔德继续写道：“除了 *Caucasses* 区域，在梯培雷里郡、里美黎克郡、罗斯考門郡、郎弗德郡和米斯郡，还有爱尔兰最好的土地。郎弗德的一个农場(格拉納达—基耳)，沒有施任何肥料就一連收获了八次馬鈴薯。在科克郡的某些地方，土地更是特別肥沃。总之，可以说爱尔兰的土壤质地很好，虽然我不能像某些作者那样在评价爱尔兰的土壤时过于夸張，說拿一英

① 恩格斯的手稿中这里留了一个空白，按威克菲尔德原作，这里的詞是：“野茴芹”。——編者注

② 圣博弗尔博士“爱尔兰地图說明”，1792年版第75—76頁(Beaufort, Revd. Dr. *«Memoir of a Map of Ireland»*. 1792, p. 75—76)；威克菲尔德引自第1卷第36頁。

亩爱尔兰土壤同一英亩英国土壤比較，前者要比后者好得多。”（第1卷第81頁）

这一针对楊格的意見，是由于对我们上面所引用的楊格的話作了不正确的理解。楊格并没有說，如果就現在的耕作情况而論，爱尔兰的土壤能比英国的提供更好的收成，因为就耕作情况來說，英国当然比爱尔兰强得多；楊格只是說，爱尔兰土壤的天然肥力比英国的强，而这一点正好是威克菲尔德也不否认的。

1849年，在饥荒⁴¹³以后不久，罗伯特·皮尔爵士^①曾派一位苏格兰农学家凱尔德先生去爱尔兰，以便提出一份如何改良当地农业的报告。这位农学家在不久以后出版的一本論述爱尔兰西部（这里和西北边区一样，是爱尔兰最坏的地区）的著作中写道：

“我在那里看到了这样大片的极好的沃土，感到非常惊奇。这一国家的內地，地势十分平坦，大体上是石质的和干燥的；这里的土壤又干又松。潮湿的气候产生出非常結实的植物，这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这对牧草和飼料作物^②有利，同时也就需要費很大的力量去不断清除莠草。无论是在坚硬的岩石本身或是在土壤下伏层中，到处可以看到大量砂礫状的石灰，这是很有价值的东西。”

凱尔德还证明，整个西米斯郡的地面都是最出色的牧场。关于科里布湖（梅沃郡）以北的地区，他这样写道：

“其中〈指一个500英亩土地的农场〉极大部分是非常好的牛羊牧场；这是一块又干又松的表面呈波浪形的土壤，它整个都位于坚硬的石灰岩层上面。长期以来就密密地生长着青草的田野，质地比苏格兰个别小块土地以外的任何地区都好，至少就我记忆所及是如此。这种土地的最好部分好得不宜

① 手稿中在“爵士”的后面还有“內閣”二字。——編者注

② “飼料作物”（green crops）一詞包括所有人工培养的飼料植物、各种块根植物和馬鈴薯，一句話，除谷物、青草和非野生植物外的一切。

于耕种,但其中大约有一半土地用来耕种还是可以得到好处……在坚硬的地下石灰岩层上,土壤以极高的速度重新形成,这种土壤根本不需要播种就可以重新成为牧场。”^①

最后,我们再来听听一位法国权威作家的话^②:

“爱尔兰两部分中的西北部分占全岛的四分之一,即整个康诺特和相毗连的多尼果耳、克勒尔、克黎各郡。它像威尔士,那些不好的地区甚至像苏格兰山区。此外,这里还有200万公顷的荒地,由于这些荒地的景象看起来很可怕,在爱尔兰就产生了这样一句俗语:‘进康诺特就是入地狱!’^③爱尔兰的另一部分,即大得多的东南部分,包括伦斯特、奥尔斯脱和曼斯特,面积约600万公顷。就土壤的自然肥力而论,它决不差于英格兰本土。不过那里的土壤也并非到处都是相同的,雨量则比英格兰丰富。宽广的泥炭沼泽约占总面积的十分之一;湖泊和山则占十分之一以上。在爱尔兰的800万公顷土地中,已经耕种的只有500万公顷”(第9、10页)。——“甚至英国人自己也承认爱尔兰土壤的质地比较好……在上述的800万公顷土地中,有200万公顷左右是峭壁、湖泊和泥炭沼泽;还有200万公顷则是相当差的土地。其他的地区,即大约全国的一半,则是带有石灰岩底土的非常出色的土壤。还有什么能比这更好的呢?”(第343页)

我们可以看到,所有权威人士都一致证明,爱尔兰的土壤无论在化学成分上或机械构成上,都富有一切肥沃因素。这里没有什么

① 凯尔德“殖民计划,或西部爱尔兰是投资的地方”1850年爱丁堡版(*Caird. «The Plantation Scheme, or the West of Ireland as a Field for Investment»*. Edinburgh, 1850)。上面所引的在第6、17—18、121页。1850—1851年,凯尔德在“泰晤士报”上发表了他的旅行笔记,叙述英格兰几个主要郡的农业情况。

② 莱昂斯·德·拉维涅“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农村经济”(译自法文)1855年爱丁堡版(*Léonce de Lavergne. «Rural Economy of England, Scotland and Ireland»*.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Edinburgh, 1855)。

③ 产生这一俗语的并不是康诺特的晦暗的山岗,而是整个爱尔兰历史中的最阴暗的时期⁴¹⁴,这以后将得到说明。

么极端的東西：既不是密不透水的坚硬粘土，也不是一刻也存不住水分的疏松砂土。但爱尔兰也有别的不足之处。由于爱尔兰的山脉大都位于沿海地区，国内各个河流流域间的分水线多半地势很低。河流不能把全部雨水排送入海，因此在内地，特别是在沿分水线附近，就形成了宽阔的泥炭沼泽。仅中部平原就有 1 576 000 英亩土地完全被这种沼泽所掩盖。这些大都是地面上的凹洼地，通常是过去的湖泊所形成的浅塘，那里逐渐长满了青苔和沼泽植物，并且充满这些植物的遗骸。这些沼泽也像我们德国北部的沼泽一样，只能开采泥炭。在目前的耕作制度下，它们边上的土地只能逐渐地用于耕种。在这些古老的湖泊所形成的水塘的底部，到处都是含石灰（从百分之五到百分之九十）的灰泥，这些石灰来自淡水湖的外壳。因此，每一片这种泥炭沼泽的地下，都有使它适宜于耕种所必需的物质。此外，大多数这种沼泽都有丰富的铁砂。除了这些平原沼泽，还有 1 254 000 英亩的山地沼泽，那是在气候潮湿的条件下把树木砍伐光所造成的；它们成为不列颠群岛的一种特殊装饰。只要平坦的或略微倾斜的山顶的树木被伐光（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上半叶，由于必须保证铁工厂用木炭，这种情况曾经大规模地发生），这些地方由于雨雾的作用就形成一个泥炭复盖层，后来这种泥炭复盖层在适宜的条件下就扩展到了山坡上。穿过英格兰北部、自北而南伸向得比的山脉的所有山岭，都复盖着这样的沼泽；在爱尔兰地图上表明有大群山岭的地方，也可以到处看到许多山地沼泽。但是爱尔兰的泥炭沼泽本身对农业来说决不是一种无可挽回的损失，恰好相反，到一定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某些这样的沼泽，以及那 200 万公顷（500 万英亩）被拉维涅所轻视的“相当糟糕的土地”，在进行适当耕作的情况下将提供多么

好的收成。

爱尔兰的气候是由它的位置所决定的。墨西哥灣暖流和优势的西南風給爱尔兰带来了温暖,使它冬暖夏凉。在西南部,夏季一直延长到十月中旬,根据威克菲尔德的意见(第1卷第221頁),在那里,这是行海水浴的最好的月份。严寒很少見,時間也不长,平原上几乎从不积雪。在面向西南背靠北方的克黎灣和科克灣,整个冬天都和暖如春;在这里和別的一些地方,桃金娘就长在露天(威克菲尔德曾举例說,在一处庄园中,桃金娘树高达16英尺,被当做扫帚用,第1卷第55頁),而月桂、arbutus〔熊果〕及其他常綠植物都高高地长成了大树。还在威克菲尔德的时候,南部的农民就整个冬天都把馬鈴薯放在露天,而且从1740年以来沒有冻坏过一次。不过,大西洋的濃云給爱尔兰带来了最初的傾盆大雨。爱尔兰的平均降雨量最少也有35英寸,这比英格兰的平均量要高得多,但是当然比郎卡郡和柴郡的平均量低,同时也未必比整个英格兰西部的平均量高。不过,爱尔兰的气候肯定比英格兰的惹人喜欢。在英格兰,天空呈鉛灰色,經常是細雨濛濛,整日不停,而在爱尔兰我們看到的,大多是大陆上那种四月的天空。新鮮的海風会急速地突然地把天空刮得濃云密布,但是如果立即形成傾盆大雨,濃云又会同样迅速地为海風所驅散。即使是在深秋多雨的季节,也不像在英格兰那样阴雨連綿。爱尔兰的天气也和爱尔兰的居民一样,性格比較鮮明,往往比較急速而直接地从一个极端轉到另一个极端。爱尔兰的天空頗像爱尔兰女子的面龐,在它上面阴霾和阳光都会意外地突然出现,但是决沒有英格兰的那种灰色的忧郁。

一世紀时的羅馬作家龐波尼烏斯·梅拉(“地理”一书的作者)

給我們留下了关于爱尔兰气候的最早的說明。他写道：

“在不列顛的那边是尤佛納，它在幅度方面和不列顛几乎相同，在其他方面也相类似；它是橢圓形的；它的气候对庄稼成熟不利，然而它却到处长滿了茂密而柔嫩的青草^①，牲口放进去要不了多少時間就可以喂飽，如果不把它們从牧場上帶走，它們就会因过飽而脹死。”⁴¹⁵

«Coeli ad muturanda semina iniqui, verum adeo luxuriosa herbis non laetis modo, sed etiam dulcibus!» 順便指出，这一段的現代英語譯文，在高德文·斯密斯先生的作品中就有。斯密斯先生过去是牛津的历史学教授，目前則是美国科納耳大学的教授。他告訴我們，在爱尔兰很大一部分土地上，小麦似乎很难获得丰收，接着，他写道：

“看来爱尔兰繁荣商业的天然途徑就是以它的牧場的产品——牲畜、油脂等供給英国居民。”^②

据說，爱尔兰的气候已經注定了它只能为英国人提供肉类和油脂，而不能为爱尔兰人生产粮食；因此，爱尔兰人命中注定了要迁居海外，以便在爱尔兰空出地方来飼养牛羊。从梅拉到高德文·斯密斯以及在我們目前（从1846年起⁴¹⁶，爱尔兰地主更是異口同声地叫嚷），有多少人重复过这种論調啊！

可見，搞清楚爱尔兰气候的真实情况，也就意味着解决众所矚目的政治問題。而关于气候，我們感到兴趣的只是它对农业有什

① 恩格斯把这两句由他加了着重号的話用拉丁文引在下面。——編者注

② 高德文·斯密斯“爱尔兰历史和爱尔兰性格”1861年牛津版和倫敦版(Smith, Goldwin. «Irish History and Irish Character». Oxford and London, 1861)。——这本书以“客观态度”作幌子，为英国对爱尔兰的政策作辯护。讀了这本书，你会不知道，究竟是历史学教授的无知，还是自由資产者的伪善更令人感到惊異。这两种特性我們以后都还将遇到。

么意义这一方面。在目前观察还不完善的情况下，测量雨量的自然科学家的观察对我们的目的只具有次要的价值；问题主要不在于降雨量有多少，而在于雨是怎么降的以及什么时候降的。这里，最重要的是农学家们的判断。

阿瑟·杨格认为爱尔兰的气候比英格兰的潮湿得多；他认为这就是爱尔兰土地上青草长得特别茂密的原因。他指出，在收过块根作物之后或在收获期之后未经翻耕的土地上，到第二年夏季，干草仍然能得丰收，这在英格兰是从来不会有的。接着他还提到，爱尔兰的麦粒比其他气候更为干燥的国家的麦粒要轻得多；即使经过最好的耕作，田地上还是长满了青草和杂草，庄稼非常潮湿，很难收割，收获也因此而受到极大的损失（杨格“爱尔兰旅行记”第2卷第100页）。

但是，杨格同时也注意到，爱尔兰的土壤却对这种潮湿气候的影响起一种反作用。那里的土壤到处都是石质的，因而水分很容易渗透。

“难以耕种的多石的坚硬的垆母（loam）在爱尔兰相当多，但这和英格兰那种粘土（clay）却完全不一样。如果在英格兰的粘土（这种土壤在爱尔兰很少见到而且总是混合着大量的石礫）上的降雨量和邻岛的峭壁上同样多的话，那末这土地就不能耕作了。而且，爱尔兰的峭壁上是一片绿色。在峭壁是由石灰岩构成的地方，上面就复盖着长在一层薄薄的腐植土上的草皮，那些草柔软而茂密得简直令人难以想像。”（第2卷第2部分第3—4页）

大家知道，满是裂缝和罅隙的石灰岩地带是很快就能排除多余的水分的。

威克菲尔德用一章的篇幅来非常详细地论述爱尔兰的气候，其中他收集了以前以及当时所做的一切观察。博特博士（在1645

年出版的“爱尔兰自然史”⁴¹⁷中)在描述爱尔兰的冬天时,把它叫做是温和的:一年中严寒不超过三四次,每次也很少超过两三天;都柏林附近的利菲河十年到十二年中也难得结一次冰。三月多半是干燥而晴朗的,但接着就有很多雨水;夏季很少有一连两三天不下雨的,不过到晚秋,天气就又非常好了。夏季很少有过于干旱的时候,造成歉收的从来不是干旱,而往往是雨水过多。平原上下雪不多,因此牲口整年都在露天放牧。但偶尔也有下雪的年份,例如1635年就是,那时人们就得设法为牲口找隐蔽的地方(威克菲尔德“爱尔兰的统计数字和政治情况”第1卷第216页及以下各页)。

上一世纪初,腊蒂博士(在“都柏林郡自然史”中)⁴¹⁸就开始作准确的气象观察;这项工作从1716年到1765年,一共继续了50年。在整个这段时期中,南风、西风的次数和北风、东风的次数的比例是73:37(南风和西风共10878次,北风和东风共6329次)。刮得最多的是西风和西南风,其次是西北风和东南风,刮得最少的是东北风和东风。夏季、秋季和冬季多半刮西风和西南风;东风常常出现在春夏两季,在这两季比在秋冬两季要多一倍;东北风主要是在春天,这时它们也比在秋冬两季多一倍。因此,这里的温度比伦敦均匀,冬季比较温暖,夏季比较凉爽,但是空气比较潮湿。盐、糖、面粉等就是在夏季也会因吸收空气中的水分而受潮,谷物还得在炉子里烤干,这在英格兰的某些地方是从来也不会有(威克菲尔德“爱尔兰的统计数字和政治情况”第1卷第172—181页)。

腊蒂当时只能将爱尔兰的气候和伦敦的气候相比,而伦敦就像整个英格兰东部那样,也确实是比较干燥的。如果他手头有英格兰西部、特别是西北部的材料的话,他就会相信,他对爱尔兰气候所作的叙述——一年四季的风向、潮湿的夏季(在不生炉火的屋

子里糖盐等就发生化学分解)——对英格兰的这一地区也完全合适,所不同的只是这一地区冬季更冷一些。

腊蒂还对一年四季的气象做了记录。在那50年中,有16个寒冷的、迟来的或者说是过分干燥的春天;次数略多于伦敦。夏天有22次是炎热而干燥的,24次是多雨的,4次是多变的;总的来说,气候比伦敦略微潮湿,在那里,干燥的夏季和多雨的夏季次数是一样多的。秋天有16次是晴朗的,12次是多雨的,22次是多变的;气候也是比伦敦略微潮湿而多变。最后,冬天有13次是严寒的,14次是多雨的,23次是温暖的,这就是说,气候比伦敦潮湿得多,也温暖得多。

根据都柏林植物园从1802年到1811年这十年中的雨量测量记录,总降雨量在各个月份的分布情况如下(单位为英寸):12月——27.31;7月——24.15;11月——23.49;8月——22.47;9月——22.27;1月——21.67;10月——20.12;5月——19.50;3月——14.69;4月——13.54;2月——12.32;6月——12.07;每年平均为23.36(威克菲尔德“爱尔兰的统计数字和政治情况”第1卷第191页)。这十年特别干燥;凯恩(“爱尔兰的工业资源”第73页)引用的都柏林六年中年平均降雨量是30.87英寸,而昔蒙兹(“不列颠的雨量”)⁴¹⁹提出的1860年到1862年的平均数字则是29.79英寸。但是,既然爱尔兰的暴雨变幻莫测,带有纯粹局部的性质,那末如果不是经年累月地同时在许多记录站进行测量,这样的测量就没有多大意义,这一点下面的事实就足以说明:在同一个都柏林的三个记录站,对1862年降雨量的记录,一个是24.63英寸,另一个是28.04英寸,还有一个是30.18英寸。据昔蒙兹说,在1860—1862年期间爱尔兰所有各个地区的12个记录站所记录的

降雨量(从 25.45 英寸起到 51.44 英寸不等),平均不到 39 英寸。

帕特逊博士在他的著作中讲到爱尔兰的气候时写道:

“一般都认为我国气候潮湿,造成这种印象的是我国经常出现的暴雨,而不是降雨量本身……有时春天的潮湿天气会使播种延迟一些,但是在我国,春天经常是寒冷的和迟来的,因此,在这里,早种并不总是适宜的。夏秋两季经常出现的暴雨常常使我们的干草和谷物的收割受到威胁,但在这种非常情况下,警惕和勤勉也可能获得英国在‘抢收’(catching harvests)时的那种成绩,而改善耕作的结果也会使农人的辛劳不致白费。”^①

自 1791 年到 1802 年这 12 年中,伦敦德里每年的干燥日子为 113 天到 148 天,平均超过 126 天。拜尔法斯特的平均数字也是这样。在都柏林,这样的日子为 168 天到 205 天,平均为 179 天(帕特逊“爱尔兰气候研究”第 164 页)。

根据威克菲尔德的材料,爱尔兰的收获季节如下:小麦多半在 9 月,也有在 8 月的,但很少在 10 月;大麦通常比小麦收得略晚一些;燕麦则比大麦还要晚一星期左右,即通常在 10 月间。威克菲尔德在长期的研究之后得出结论,认为现有的材料还根本不足以科学地说明爱尔兰的气候,他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表示这样一种意见,即这种气候对种植谷物有严重的困难。相反,他认为,在潮湿的天气收割庄稼所遭到的损失,完全是由于别的原因(这以后还要说明),他非常肯定地说:

“爱尔兰土地肥沃,气候良好,只要耕作制度适宜,这个岛上所生产的粮食数量,不仅足以自给,而且会有大量剩余,在必要时,随时可以用于英国的需要。”(第 2 卷第 61 页)

确实,那时(1812 年)英国在同全欧洲和美国作战⁴²⁰,粮食输

^① 威·帕特逊博士“爱尔兰气候研究”1804 年都柏林版第 164 页(Patterson, W., Dr. «An Essay on the Climate of Ireland». Dublin, 1804, p. 164)。

入极为困难；粮食已成为迫切需要的东西。目前粮食大量地从美国、罗马尼亚、俄国和德国入口，看来，现在全部问题已经是如何获得廉价的肉类。正因为如此，如今爱尔兰的气候也就不适宜于耕作了。

爱尔兰从古以来就种植谷类作物。在比英国人的出现还早得多的时候已经记录下来的最古老的爱尔兰法律中，“一袋小麦”已被作为一定的价值尺度；在氏族首领和其他酋长要求属下必须履行的义务中，经常提到要交纳规定数量的小麦、大麦麵、燕麦粉等。^①英国人入侵以后，在连年的战乱中，粮食的种植缩减了，但从没有完全停止过；1660年到1725年间又有所发展，从1725年到1780年左右重新下降；1780年到1846年，在以种植马铃薯为主的同时，粮食种植也又有所增长，不过从1846年起，谷物和马铃薯的种植就不断为日益发展的畜牧业所排挤。如果爱尔兰的气候不适宜于种植粮食，那末粮食的种植又怎么能够在那里存在千年以上呢？

爱尔兰有些地方，特别是在南部和西部，由于多雨（靠近山区的地方经常下雨），确实不大适宜于种植小麦。在爱尔兰，除了好

^① “古代爱尔兰的法律和规章——古制全书”两卷集1865年和1869年都柏林版，受女王陛下出版局之托刊印，由亚历山大·汤姆出版（伦敦郎曼书店）（《Ancient Laws and Institutes of Ireland—Senchus Mor》. 2 vol., Dublin, printed for Her Majesty's Stationary Office, and published by Alexander Thom (London, Longmans) 1865 and 1869)⁴²¹，见第2卷第239—251页。一袋小麦的价值为1斯克萊派耳（迪那里），合银20—24哩；斯克萊派耳的价值是皮特里博士查明的，见“盎格魯諾曼入侵以前的爱尔兰教会建筑”1845年都柏林版四开本第212—219页（《Ecclesiastical Architecture of Ireland, anterior to the Anglo-Norman Invasion》. Dublin, 1845, 4°, p. 212—219）。

年成以外，也常常一連几年夏季雨水过多（例如 1860 年到 1862 年），这对小麦为害极大。但是小麦并非爱尔兰的主要谷类作物，而威克菲尔德甚至惋惜說，由于缺乏銷售市場，在爱尔兰小麦种得太少了；除了邻居的磨坊以外，并无其他市場；大麦的种植也几乎完全是为了供应（偷稅的）私酒坊。爱尔兰的主要谷类作物过去和現在都是燕麦，自 1810 年以来，燕麦的播种量至少为其他各种谷类作物总数的十倍；而燕麦比小麦和大麦收得晚，因此收割燕麦多半是在 9 月底和 10 月，那时天气大都非常好，尤其在南方是如此。此外，燕麦还特別能經得住雨水。

上面我們已經看到，爱尔兰的气候在总降雨量和季节雨量方面几乎和英格兰西北部的气候完全一样。在坎伯兰、韦斯特默兰和北郎卡郡的山区，降雨量大大超过了我所知道的爱尔兰記錄站中的任何一个站所包括的地区（科尼斯頓 1860—1862 年的平均雨量是 96.03 英寸，温德米尔是 75.02 英寸），可是在那些地方还是可以收割干草和播种燕麦。在南郎卡郡，那几年的降雨量从利物浦的 25.11 英寸起到波尔頓的 59.13 英寸不等，而各处測量的平均数約为 40 英寸；在柴郡，降雨量自 33.02 英寸起至 43.40 英寸不等，各处測量的平均数則是 37 英寸左右。在前面我們已經看到，那几年爱尔兰的降雨量还不到 39 英寸。（以上数字均根据昔蒙茲。）在这两个郡中，各种谷类作物都有种植，其中也包括小麦；在柴郡，在最近一次牛瘟流行以前，的确主要是从事畜牧业和乳脂业，但是在牲畜因瘟疫而大部分死亡之后，气候突然变得对小麦也非常适合了。如果爱尔兰像柴郡一样，发生牛瘟并造成同样可怕的破坏，就不会再宣揚爱尔兰的自然使命是从事畜牧业，那时我們就会重复威克菲尔德书上的話，說爱尔兰命該成为英国的谷仓了。

如果不抱任何成見，沒有被爱尔兰地主和英国资产者的自私自利的叫嚷攪昏头脑，那就应当說，就土壤和气候而論，爱尔兰有些地区較适宜于畜牧业，有些地区較适宜于农业，还有一些地区（它們占絕大部分），就像到处可以遇到的情况那样，既适宜于畜牧业，也适宜于农业。和英国相比，爱尔兰总的來說更适宜于畜牧业；不过要把英国和法国相比，那英国也同样更适宜于畜牧业。但是，难道因此就可以說全英国都應該变成牧场，就可以說，为了要騰出地方来飼养牲畜以便日后把牲畜运到法国去換取絲織品和酒类，英国的所有农业人口，除了少数牧民以外，都得迁到工业城市或美国去？然而，渴望提高地租的爱尔兰地主和力图压低工資的英国资产者，对爱尔兰却正是这样要求的，这一点高德文·斯密斯已說得够清楚了。并且，这种变耕地为牧场所暗示的社会革命，其規模在爱尔兰将比在英国更大得多。在英国，占优势的是大規模的农业，雇农劳动已多半为机器所代替，那种社会革命至多是使100万人迁离故土；但是在爱尔兰，占优势的是小規模的农业，甚至是用铁鍬进行的耕作，那种社会革命就会把400万人逐出故土，根本灭絕爱尔兰人。

我們看到，甚至自然現象本身也成了英国和爱尔兰两国之間爭执的对象。而我們同时也看到，英国統治階級的輿論（大陆上只有它能够为人所知）如何随着时勢和利益的变化而反复无常。今天英国急需有保证地輸入粮食，于是爱尔兰就似乎是天生适于种小麦的；明天英国需要肉类，于是爱尔兰就又只适于作牧场之用了；存在500万爱尔兰人这事实把一切政治經濟学規律都破坏了，必須把他們赶走，讓他們随便滾到什么地方去吧！

古代的爱尔兰

古希腊和古罗马的著作家以及教会的神甫们，关于爱尔兰都讲述得很少。

但是还存在着相当丰富的地方文献，虽然在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时有许多爱尔兰的手稿已经毁于战火。这些文献包括短诗、文法、辞典、年表和其他历史著作以及法律汇编。不过，除去极少数的例外，所有这些至少包括了八世纪至十七世纪这一时期的文献，都只是手写本。用爱尔兰语出版书籍是不久以前才开始的，恰好是在这种语言已开始消亡的时候。因此，原有的丰富材料只有极小的一部分可以被利用。

在年表中最重要的是“提格尔纳赫神甫年表”（该神甫于1088年去世），“奥尔斯脱年表”，特别是“四教长年表”。“四教长年表”是1632—1636年圣芳济派教士迈克尔·奥克莱里领导其他三个seanchaidhes（编年史家）在多尼果耳修道院编成的，他们所根据的材料现在几乎已经完全散失。这部带有批注并附有英译文的年表是奥顿诺凡于1856年据现在还保存着的多尼果耳修道院原手稿出版的。^①以前查理·奥康瑙尔博士出版的书（“四教长年表”第1

^① 由约翰·奥顿诺凡博士出版并附有英译文的“四教长编爱尔兰王国年表”七卷集，1856年都柏林第2版四开本（《Annala Rioghachta Eireann. Annals of the Kingdom of Ireland by the Four Masters》. Edited, with an

部分，“奥尔斯脱年表”等)的原文和译文都是不可靠的。⁴²²

这些年表大都从爱尔兰的神话式的史前史开始，它们的基础是古代民间传说，这些传说曾由九世纪和十世纪的诗人大加修饰，后来又由教士编年史家按年代加以整理。例如，“四教长年表”以创造世界后的第 2242 年作为开始的日期，据说当时挪亚的孙女凯撒尔在洪水之前的 40 天在爱尔兰登岸；别的年表则认为苏格人的祖先，这些最后来到爱尔兰的移民，源出于雅弗的直系血统，并把他们同摩西、埃及人和腓尼基人联系起来，正如我们的中世纪编年史家把日耳曼种族的祖先同特洛伊、亚尼雅士或亚历山大大帝联系起来一样。“四教长”一共只用几页记述了这些无稽之谈（迄今还没有能够把其中唯一有价值的东西，即真正的古代民间传说区分出来）；“奥尔斯脱年表”对这些完全没有记载；而提格尔纳赫则可以在当时来说是惊人的大胆的批判精神，宣称基姆拜特王（约公元前 300 年）以前的苏格人的所有传说都不可靠。但是到了上一世纪末叶，爱尔兰开始了一种新的民族生活，同时对爱尔兰的文献和历史也产生了新的兴趣，于是教士们的这些虚构正好成了最珍贵的材料。由于道地的凯尔特人的热情以及爱尔兰那种特有的天真，信仰这些奇谈曾被宣布为爱尔兰爱国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当然也就为绝顶聪明的英国学术界人士（他们在语言学和历史学批判方面的著作在世界所有其他地方都享有很高的声誉）提供了一种求之不得的借口，好把爱尔兰的一切都当做极端荒谬的东西而加以摒棄。^②

English Translation, by D-r John O'Donovan. 2 edit., Dublin, 1856, 7 vol. in 4°).

② 当时的最天真的作品之一是“艾里编年史，盖尔人、苏格人、伊伯尔人或爱尔兰

同时,从本世纪三十年代起,一种主要以皮特里和奥顿诺凡为代表的、带有更大得多的批判性质的思潮在爱尔兰传播开来。我们已提及的皮特里的研究证明,现有的最古的、从六世纪和七世纪开始的文字记载,和年表的内容完全符合,而奥顿诺凡的意见是,年表记载真正的历史事实从公元二世纪和三世纪就开始了。年表中可靠的记录是在早几个世纪或晚几个世纪开始,对我们来说并没有多大区别,因为,很可惜,就这个时期来说,这些年表对我们的目的几乎是毫无帮助的。其中只是简短而枯燥地记录某人的死亡或即位,记录战争、战役、地震、瘟疫、斯堪的那维亚人的掠夺,而很少涉及人民的社会生活。如果出版了所有爱尔兰的古代成文法规,这些年表就会获得完全不同的意义;有了法律汇编中的一些解释,许多枯燥的记录就会不同了。

但是几乎所有这许多法律汇编也都被搁置一边而迟迟不能问世。经过几个爱尔兰古文献学家的坚持,英国政府才同意于 1852

人的历史,奥康瑙尔译自斯基台语腓尼基方言的原手稿”两卷集 1822 年伦敦版(《The Chronicles of Eri, being the History of the Gaal Sciot Iber, or the Irish People, translated from the original manuscripts in the Phoenician dialect of the Scythian Language by O'Connor》. London, 1822, 2 vol.)。斯基台语腓尼基方言,这当然就是爱尔兰人的凯尔特语,而原手稿则是任意选出的一篇诗体的编年史。这本书的出版者阿瑟·奥康瑙尔是 1798 年的流亡者⁴²³,后来成为英国宪章运动领袖的非格斯·奥康瑙尔就是他的侄子。据说他是古代奥康瑙尔家族,即康诺特诸王的后裔,而且可以说爱尔兰王位追求者。扉页前还有一张他的照片,他有一张爱尔兰人的漂亮而愉快的面庞,和他的侄子非格斯像得出奇;他右手拿着王冠。下面写着“奥康瑙尔——本族的首领,奥康瑙尔——本国被辱人民的领袖:‘战败的,但不是屈服的’”(《O'Connor—cear-rige, head of his race, and O'Connor, chief of the prostrate people of his nation: «Soumis, pas vaincus»》)。

年指定一个委员会来出版古代爱尔兰的法律和规章。但它是怎么办这件事的呢？委员会的成员中有三个勋爵（每逢事关国家开支，就必须有勋爵参加），三个最高级法官，三个新教的牧师，以及皮特里博士和一个军官、爱尔兰地形测绘的领导人。在所有这些先生们中间，只有皮特里博士和两位宗教界人士格雷夫斯博士（现为里美黎克新教主教）和托德博士能够称得上对于交给委员会的事情多少比较内行；但其中两人，皮特里和托德在委员会成立以后就去世了。委员会受命采取步骤，来临摹、翻译并出版古代爱尔兰的法律方面的手稿，同时物色适宜的人选。委员会吸收了两个最最难能可贵的人参加工作，那就是奥顿诺凡博士和奥克里教授。他们临摹了许多手稿，也已经初步翻译出来，但是还没有来得及准备好付印，就都去世了。他们的后继者汉考克博士和奥马洪尼教授接着继续进行这一工作，终于在不久前出版了上述两卷本的“古制全书”。出版人自己承认，委员会成员中只有格雷夫斯和托德二人参加工作，在校样上写了一些意见；军官托马斯·拉科姆爵士为出版者提供了校正地名用的爱尔兰地形测绘原图；皮特里博士不久即去世；其他几位先生的活动只是在18年中勤勤恳恳地领取自己的薪俸罢了。

在英国，特别是在它统治下的爱尔兰，完成国家所委托的事务的方式就是如此。离开营私舞弊^①，事情就办不成。除非同时有大笔款项和一些清闲的肥缺落入某些勋爵和政界红人之手，不然任何社会需要都不可能得到满足。这个不中用的委员会所消耗的钱，

① “营私舞弊”英文为 Jobbery，在英国是指利用职权为个人或亲友谋私利的行为，也指为自己一帮人的利益而利用国家资金进行间接的贿赂。具体的这样的行为即称为 job。爱尔兰的英国殖民地是各种各样营私舞弊的主要发源地。

在德国足够用来出版所有未公布的历史文献，而且会出版得更好。

“古制全书”直到现在还是我们研究古代爱尔兰的主要资料。这是一部古代法规的汇编。据以后写成的序言说，这个汇编是适应正在爱尔兰迅速传播的基督教的需要，根据圣帕特里克的建议并在他的参加之下编成的。参加编辑这个汇编的“委员会”的据说有爱尔兰最高国王莱盖雷（据“四教长年表”，428—458年在位），两位属国国王：科克（曼斯特国王）、戴雷（大概是奥尔斯脱的执政者之一），三位主教：圣帕特里克的、圣贝尼格努斯、圣凯尔涅赫，最后，还有三位法学家：杜布塔赫、菲格斯、罗萨。这个委员会的著作工作所花费的确实比目前的委员会要少，虽然后者只是负责把这个汇编出版。“四教长年表”指出这个汇编的编纂年代是公元438年。

该书正文显然是以远古的多神教的材料作为基础。其中所有最古老的法律公式都是以诗的形式写成，有一定的格律和所谓的叶韵，——这是一种特殊的首韵，更确切地说，是一种只押子音的音韵，它是爱尔兰诗歌中所常见的，并且往往转变为完全押韵。已经确定，古代爱尔兰法律汇编是在十四世纪时从五世纪的语言，即所谓的芬尼方言（*Bérla Feini*）译成当时通用的爱尔兰语言的（序言，第1卷第36页及以下各页），因此，这就说明，为什么“古制全书”里有许多地方诗的格律在不同程度上显得不明白了，但是除了偶然押韵和叶韵十分显著的地方之外，格律也还是常常显现出来，并使全文具有一定的韵律。在大多数场合，只要读译文就可以看出这些诗体的公式。但同时，特别是在汇编的后半部，也可以看到许多地方显然是用散文写的；如果说那些诗体的公式无疑是从远古时代流传下来的，那末这些散文体的增补就显然是汇编的编辑者自己加的了。此外，在九世纪或十世纪编成的、据说是卡舍耳的国

王和主教科馬克所編的辭典中曾經不止一次地引用“古制全書”，所以這些法律無疑是在英國人入侵之前很久就已經記錄下來了。

在這部匯編的各種手抄本（最早的大約是十四世紀初甚至更早些）中，有不少大多數彼此吻合的文字上的注解，以及比較詳細的有關內容方面的注釋。注解中完全保存着古代辭典的精神，其中雙關語代替了詞源的研究和詞的解釋；注釋的價值也各不相同，常有嚴重的曲解，許多地方難以理解，——至少在不熟悉其他的法律匯編的情況下是如此。這些注解和注釋的年代已不可考；但其中大部分大概是寫於英國人入侵之後。不過，由於其中只有很少超出正文內容範圍以外對法律加以發揮的痕跡，而且這種少見的發揮又僅僅表現在更確切地規定細節，所以較大部分純粹是解釋性的注解和注釋無疑可以比較審慎地把它也作為更古時期的史料加以利用。

“古制全書”的內容是：（1）典質法 [Pfändungsrecht]，即大致上包括全部訴訟程序；（2）有關各個不同地區的居民內訌時關於人質的法律；（3）有關 Saerrath 和 Daerrath（見下面）⁴²⁴ 的法律；（4）家法。從這一匯編中我們獲得許多有關當時社會生活的珍貴資料，但是在大量名詞沒有得到解釋，其他手稿尚未公布之前，許多東西還是很不清楚的。

關於愛爾蘭人民在英國人入侵以前的狀況，除了文獻材料，一直保存到今天的古建築物、教堂、圓塔、防禦工事、銘文也向我們提供了資料。

在外國的文獻中，我們可以只提一提斯堪的那維亞史詩和聖貝爾納所記的“聖瑪拉基傳”⁴²⁵ 中有關愛爾蘭的一些地方（其中資料並不多），然後可進而閱讀第一個親自研究愛爾蘭以後記述這個

国家的情况的英国人的作品。

以坎布里亚的吉拉德这一名字聞名的布雷克諾克大助祭司西尔韦斯特尔·杰腊德·巴里是交际花奈斯塔的孙子；奈斯塔是南威尔士王里斯·阿普·都鐸的女儿，英王亨利一世的情妇，是几乎所有最初参加征服爱尔兰的諾曼人領袖的祖先。吉拉德于1185年和約翰（即后来的“无地約翰”）一同去爱尔兰，后来他先后写了“爱尔兰地形”和“被征服的爱尔兰”两书，前者叙述爱尔兰及其居民的情况，后者則极力美化了第一次入侵爱尔兰的历史。現在我們主要来看看他的头一部作品。这本书用极端矯揉造作的拉丁文写成，其中充滿着这位徒驚虛名的作者的那个时代和他所屬的那个 race [种族, 民族] 的最野蛮的迷信和各种的宗教偏見和民族偏見，不过这毕竟还是一部非常重要的书，因为它是一个外国人对于爱尔兰的第一份比較詳尽的证詞。^①

从那时起，盎格魯諾曼人关于爱尔兰的史料自然越来越丰富；但是可以用来研究該島保持独立的那一部分的社会制度的材料，即可以用来追溯上去，对較古的制度做出結論的材料，却仍然異常缺乏。直到十六世紀末爱尔兰首次被逐步地完全征服的时候，我們才有了更詳尽的关于爱尔兰人民实际生活情况的材料，自然，那是被英国人大大加以美化了的。往后，我們就会看到，从第一次入侵以来的四百年間，人民的处境很少改变，而且絕對沒有改善。但

① “坎布里亚的吉拉德文集”，出版者約·謝·布魯尔，1863年倫敦郎曼书店版（《*Giraldi Cambrensis Opera*》ed. J. S. Brewer, London, Longmans, 1863）。⁴²⁶ 吉拉德的历史著作，包括上面提到的两本书，其英譯本（譯得很差）“坎布里亚的吉拉德历史著作集”（《*The Historical Works of Giraldus Cambrensis*》），1863年由倫敦博恩书店出版。

正因为如此，我們常常加以引用的某些比較晚近的著作，即汉美尔、坎皮恩、斯宾塞、戴維斯、坎登、莫里逊等人的作品⁴²⁷，就成为研究与他們相距五百年的那个时期的主要材料，这些材料是对貧乏的原始材料的必要的、极为有用的补充。

爱尔兰的神話式的史前史中談到許多次入侵，那些入侵一次接着一次地发生，而且大多数总是以这个島国被新来的入侵者征服而告結束。最近的三次入侵是：菲尔博耳格人入侵、达南族人入侵、米萊济人或苏格人入侵，而后者似乎来自西班牙。一般的爱尔兰历史文献把菲尔博耳格人 [firbolgs] (fir 爱尔兰語作 fear, 拉丁語作 vir, 哥特語作 vair, 意思是“人”) 徑直称为比利时人，根据需要把达南族人 (tuatha 爱尔兰語的意思是“族”，“地区”，哥特語作 thiuda) 或者称作希腊的丹瑙人，或者称作日耳曼的丹麦人。奥頓諾凡认为傳說，至少是有关上述那些入侵的傳說，是有某些历史事实作为基础的。年表中在公元 10 年下面載有 aithead tuatha (十七世紀一位优秀的古代語言学家林奇把它譯为 plebeiorum hominum gens [平民出身的人]) 的起义；看来，这就是那次把貴族 (saorchlann) 全部歼灭的平民革命。这指明了苏格征服者对較古老的居民的統治。奥頓諾凡从有关达南族人的民間傳說中得出結論說，这个在后来民間迷信傳說中变为山林爱尔菲神的部族，到公元二世紀或三世紀，在某些山区还殘存着。

毫無疑問，在早英国人开始大批迁居爱尔兰以前，爱尔兰人就已经是一个混合的民族了。早在十二世紀时就和現在一样，爱尔兰人中絕大多数人的头发是淺色的。吉拉德 (“爱尔兰地形” 第 3 部分第 26 章) 在写到两个外国人时說，他們的头发很长，而且像爱

尔兰人一样，是淡黄色的。不过，直至目前，特别是在西部，我們还可以看到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黑头发的人。一种类型的人身材高大而匀称，面貌漂亮，头发卷曲，給我們的感覺是，似乎我們在意大利阿尔卑斯山区或倫巴第曾經看到过他們；这种类型的人在西南部最多。另一种类型的人身材短小而結实，头发烏黑、平直而粗硬，臉扁平得和黑人差不多，这种人在康諾特常常可以看到。对于原来是淺色头发的克尔特人中有这种深色头发的人存在这一点，赫胥黎是用伊比利安人（即巴斯克人）血統的混入来解釋的⁴²⁸，而这一解釋看来至少有一部分是正确的。但是，到了可以肯定爱尔兰人在历史上出現的那个时期，他們已成为說克尔特語的单一的民族，而从那时起，除了战俘和买来的奴隶（大多数为盎格魯撒克逊人）以外，在任何地方都再也看不到異族人了。

古代著作家們把爱尔兰人說得可不怎么体面，狄奧多洛斯說，居住在伊里斯島（或伊林島？原文为第四格：Ἰρίω）的不列顛人是吃人的。⁴²⁹ 斯特拉本就說得更为詳細：

“关于这个国家（耶尔訥），我們可以談到的唯一令人置信的一点，就是它的居民比不列顛人更野蛮，因为他們是食人者，而且是可怕的食食者（πολυφάγοι；另一种写法是 ποτηφάγοι——食草者）；吃父母的尸体，并公开和別人的妻子以及自己的母亲和姊妹发生肉体关系，这对他們來說是完全合乎規矩的”。⁴³⁰

爱国的爱尔兰史学界对这种臆造的污蔑十分憤慨。但是近代科学已經肯定证明：吃人，包括吞吃自己的父母，看来是所有民族在发展过程中都經歷过的一个阶段。如果爱尔兰人知道，在整整一千年以后，現代柏林人的祖先对这些現象还持有同样实际的看法，那他們大約就会处之泰然了：

«Aber Weletabi, die in Germania sizzent, tie wir Wilze heizên, die ne scament <schâmen> sih nieht ze chedenne <zu gestehen> daꝛ sie iro parentes mit mêren rehte eꝛen sulîn, danne die wurme» [“我們称之为維耳茨的住在德国的韦累塔比人,认为他們比蛆虫更有权利吃掉他們的父母,而并不感到这是一种耻辱”] (諾特克尔語,雅科布·格林“古代德国法律”第488頁中引用431)。

我們將看到,就是在英国人統治爱尔兰的时期,也不止一次地发生过吃人的事。至于指摘爱尔兰人为傅立叶所說的“显花植物”[Phanerogamie]⁴³²,那末所有的野蛮民族都有这种情况,更不要說多情的克尔特人了。有意思的是,那时候这个島屿就已經有了目前的地方性称呼(伊里斯、伊林和耶尔訥这些名字是同艾雷、艾林相吻合的),而且托勒密已經知道爱尔兰首都都柏林現时的名称,称它为埃布拉納(带有正确的重音的 'Εβλανα)⁴³³在这方面更令人感到奇怪的是,爱尔兰的克尔特人却从古以来对这个城市就有另外一个名称——Atheliath,而 Duibhlinn (“黑色的沼澤”)这一名称他們是用来称呼利菲河的一段河流的。

此外,在**普林尼**的“博物志”(第4卷第16章)中,我們还可以看到这样一段話:

“到那里<海伯尼亚>去的不列顛人是乘坐一种用柳条做的、外包一层縫在一起兽皮的小船。”

以后,索林則直接談到爱尔兰人:

“他們在橫渡海伯尼亚和不列顛之間的海面时乘坐的是用柳条做的、外面包上一层牛皮的小船。”(凱·尤利烏斯·索林“世界志”第25章)

1810年,威克菲尔德发现,在爱尔兰的整个西岸,“除了木制骨架上包馬皮或牛皮的小船以外,沒有别的船只”。这些小船由于地区的不同,形式也有差别,但都非常灵活,因而很少出事故。用

这种船来航海当然是不合适的，因此，在这里，捕鱼只能在海湾中或岛屿之间进行。在克勒尔郡的馬耳倍，威克菲尔德看到过一种长 15 英尺、宽 5 英尺、吃水 2 英尺的小船；包钉一只这样的小船需要两张牛皮，把牛皮带毛的一面翻到里面，外面再涂上一层油；船上可以坐两个划桨的人。这种小船约值 30 先令（威克菲尔德“爱尔兰的统计数字和政治情况”第 2 卷第 97 页）。不用柳条，而改用了木制骨架！经过 1800 年以及在世界上第一个海洋国家对爱尔兰人进行了将近七个世纪的“文化”加工以后，所取得的进步原来就是如此！

而在其他领域中也非常快出现了某些进步的征兆。在三世纪下半叶执政的科马克·乌尔法达王时代，据说他的女婿芬·麦库阿耳大概是按照罗马军团的样子改组了爱尔兰民团（Fianna Eirionn^①），把它划分成轻装部队和常备部队。在以后各个时期，爱尔兰军队（对于它们，我们了解得较详细了）就划分为 kerne（轻）步兵和 galloglas（重）步兵或常备步兵。许多古老的歌曲都歌颂过这位芬的英勇事迹；其中有些一直流传到今天；正是这些歌曲——可能还有一小部分苏格兰盖尔人的传说——构成麦克菲尔逊的“奥辛”（爱尔兰语是奥伊辛，是芬的儿子）的基础，只是其中芬被改成芬加耳，事件的地点也换成了苏格兰。⁴³⁴ 在爱尔兰民间的口头传说中，芬以巨人芬·麦库阿耳的名称继续存在；几乎在爱尔兰的每个地方，人们都把某一件惊人的业绩归之于他。

毫无疑问，基督教在爱尔兰很早就已经出现，至少在东海岸是

① 在整部“古制全书”中，Feini（芬尼）都被用作爱尔兰人民的名称。Feinechus, fenchus（芬尼法律）常用来表示“古制全书”或另一部现在已散失的法律汇编。feine, grad feine 的意思都是平民即自由人的最下层。

如此。否則，就无法解釋为什么远在帕特里齐烏斯以前已經有这么多爱尔兰人在教会历史中起过重大作用。異教徒佩拉吉阿斯通常都被认为是来自班戈尔的威尔士教士；而卡里克費尔格斯附近也存在过古老的爱尔兰班戈爾修道院，或者更正确地說，班霍尔修道院；佩拉吉阿斯正是那个地方的人，这一点有热罗尼莫的話为证，因为他說佩拉吉阿斯“愚蠢并且因喝苏格人的稀粥而变得笨拙”（«scotorum pultibus praegravatus»）。⁴³⁵ 这是第一次提到爱尔兰燕麦稀粥（爱尔兰語是 *lite*，爱尔兰英語是 *stirabout*），这种粥在当时，并且直到出現馬鈴薯时一直是，以后又和馬鈴薯一起是爱尔兰人民的主要食品。佩拉吉阿斯的两位高足——策列斯提烏斯和阿尔宾，也是苏格人，即爱尔兰人；根据格納迪的叙述⁴³⁶，策列斯提烏斯曾經从修道院中給他的父母写过三封长信，可見，在四世紀时，在爱尔兰就已經使用拼音文字了。

在中世紀初期的所有文献中，爱尔兰人被称作苏格人，他們的国家被称作苏格蒂亚；我們在克罗狄安、伊西多尔、貝达的著作中，在腊万納的地理学家的著作中，在爱因哈德的著作中都可以看到这种称呼，甚至阿尔弗勒德大帝还这样写道：“海伯尼亚，我們称它为苏格兰”（«Ighernia the ve Scotland hatadh»）。⁴³⁷ 現在的苏格兰那时有一个外国名称叫做凱利多尼亚，它的当地的名称則是阿里巴，阿里巴尼亚；苏格蒂亚或苏格兰这个名称只是在十一世紀才被移到东边島屿的北端来。大約在三世紀中叶，爱尔兰的苏格人开始大批迁往阿里巴；早在公元 360 年，阿米亚努斯·馬尔塞利努斯就已經知道他們住在那里了。⁴³⁸ 他們通过最近的海路即从安特林迁居到金太尔半島；南尼阿斯就明确地提到过，那时統治着到克莱德河和福思河为止的全部苏格兰低地的不列顛人，西面受到苏

格人的侵襲，北面受到皮克特人的侵襲。⁴³⁹ 古威尔士的历史著作“三組文”⁴⁴⁰ 第7卷記載着，魁迪耳菲希提人[gwyddyl ffichti](見下面)从爱尔兰經諾曼海(Môr Llychlin)漂流到阿里巴尼亚，并在沿海地区定居下来。苏格兰和赫布里底群島之間的海称作諾曼海，这个事实就足以证明，上述的“三組文”是在諾曼人征服赫布里底群島以后編成的。公元500年左右，又有大批苏格人迁入，他們逐漸建立了自己的王国，脱离爱尔兰以及皮克特人而独立，最后在九世紀肯尼思·麦卡尔平时征服了皮克特人，創立了約一百五十年后(大概首先由諾曼人)改称为苏格兰、苏格蒂亚的国家。

古代威尔士文献(南尼阿斯，“三組文”)提到魁迪耳菲希提人或盖尔的皮克特人在五、六世紀时对威尔士的入侵，而且每次都說成是爱尔兰的苏格人的入侵。Gwyddyl 这个詞(gavidheal 的威尔士写法)是爱尔兰人用来称呼自己的名称。至于为什么同时还提到“皮克特人”，則有待于他人的研究了。

在五世紀二十年代中到四十年代末，由于帕特里齐烏斯(爱尔兰語为 Patraic，因为凯尔特人总是按古羅馬人的方式，把«c»讀«k»的音)的活动，基督教沒有經過暴力的震动，就成了爱尔兰的占統治地位的宗教。这时候，与不列顛早就存在的联系也活跃起来了，不列顛的建築師和營造匠到了爱尔兰；他們教会原来只知道用光禿禿的石块堆砌建築物的爱尔兰人使用石灰漿。从七世紀到十二世紀只有教会的建築物使用石灰漿，这就足以证明，这种方法是随着基督教的傳播而引入的，并且也证明，从那时起，宗教界(異族文化的代表)在自己的精神发展过程中是和人民完全隔絕的。在人民的社会生活毫无进步或者进步极慢的时候，在宗教界中文化却很快获得了发展，这种文化，在当时來說是異乎尋常的，它按照

时代的風格常常表现为迫切地促使異教徒改教和建立修道院。科倫巴使不列顛的苏格人和皮克特人改信基督教，加尔（圣加倫修道院的奠基人）和弗里多林使阿勒曼尼人改信基督教，基利恩使居住在美因河的法兰克人改信基督教，佛吉利厄斯使薩尔茨堡的居民改信基督教；这五人都是爱尔兰人；盎格魯撒克逊人改信基督教，主要也是由于爱尔兰傳教士的作用。同时，在整个欧洲，爱尔兰更以學問的发源地見称，这种見解在当时可說是根深蒂固，查理大帝就曾經請爱尔兰教士阿尔宾到帕維亚去任教，以后又由另一爱尔兰人敦加尔代替了他的职位。在当时起过重要作用、但現在已多半被人遺忘的許多爱尔兰学者中間，最卓越的是被称为“中世紀哲学之父”或被艾尔德曼称为“中世紀哲学的 Carolus Magnus [查理大帝]”的約翰·司各特·伊里吉納。黑格尔在論及他时这样說：“他是当时第一个开創真正的哲学的人。”⁴⁴¹ 在九世紀的西欧人中他是唯一懂得希腊文的，他翻譯了被认为是迪奥尼修斯法官的著作，从而重新建立了和古代哲学的最近一代人的联系，和亚历山大里亚新柏拉图学派⁴⁴² 的联系。他的学說在当时來說是特別大胆的；他否定“永恒的詛咒”，甚至对于魔鬼也如此主張，因而十分接近于泛神論；因此，当时正統思想的代表人物对他就不乏恶意的攻击。直到整整两个世紀之后，伊里吉納所奠基的科学才有了坎特伯雷的安瑟倫这样一个继承人。^①

① 伊里吉納的詳細学說和著作見艾尔德曼著“哲学史綱”1869年柏林第2版第1卷第241—247頁（《Grundriss de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2. Aufl., Berlin, 1869, Bd. I, S. 241—247）。从伊里吉納（他絕非什么宗教人物）身上，我們可以看到爱尔兰人所特有的那种灵敏机智。一次，法国国王秃头查理和他隔一張桌子坐着，查理問他，苏格人（scot）和笨蛋（sot）相差多少，伊里吉納答道：“相差一張桌子那么远。”

但是这种較高发展的文化还来不及对人民发生影响，就被諾曼人的强盜式的侵襲所中斷了。这种强盜式的侵襲成为斯堪的那維亞的、特别是丹麦的爱国主义的貿易的主要对象；只是由于开始得太晚，而且出于太小的民族，所以才沒有能够像过去日耳曼人入侵那样，大規模地发展为征服、殖民化和形成国家。諾曼人的侵襲引起了巨大的即使对斯堪的那維亞国家本身也毫无裨益的动乱，和这种动乱比起来，这些侵襲对历史发展的好处是完全不值一提的。

在八世紀末，住在爱尔兰的还絕對不是一个統一的民族。全島的最高王国政权只是表面上存在，而这个表面上存在的最高政权也絕對不是永久性的。各地区国王的数字經常变动，就像他們的屬地經常变动一样；他們之間經常处于內战状态，而各处的更小的首領們也同样忙于私人的傾軋。但是总的來說，在这些內訌中，看来存在着某种規則，使得破坏有一定的范围，从而使国家不致受害太大。但是后来发生了注定不可避免的变化。公元795年（在这个掠夺性民族首次光顾英格兰之后若干年），諾曼人在安特林岸边的腊思林島登陸，并把一切付之一炬；798年，他們又在都柏林上岸，从那时起，年表上几乎每年都用“異教徒”、“異族人”、“海盜”等名称提到他們，而且还总是提到他們在某一处或某几处«losccadh»（纵火）。他們移居于奥克尼群島、設得兰群島和赫布里底群島（南方群島，古斯堪的那維亞史詩中的 Sudhreyjar），并以此作为进攻爱尔兰、英格兰以及未来的苏格兰的基地。九世紀中叶，他們統治了都柏林^①，据吉拉德說，都柏林就是由他們初次改建成一个真正

① 斯諾里所著的“哈拉德史詩”⁴⁴³中說，哈拉德·哈法格爾的儿子托尔吉耳斯和弗羅迪比所有其他諾曼人更早占據都柏林（即至少比我們这里所說的晚50

的城市；他认为建立瓦特福德和里美黎克两城市的也是他们。瓦特福德这一名称本身就是古斯堪的那维亚语 Vedhrafiördhr 按英语方式的改写（改写后已经失去原义），它的原义应是避风港（Wetterförde）或“公羊港”[Widderbucht]。当诺曼人一在爱尔兰住下来以后，当然他们首先就需要攫取设防的港埠；这些港埠的居民在长时期中都是斯堪的那维亚人，不过到十二世纪时，在语言和风俗方面，他们早已被爱尔兰人同化了。爱尔兰首领们相互之间的纠纷，大大有利于诺曼人对这个国家的掠夺，并在这个国家建立他们的移民区，甚至使他们能够在一个时期内征服全岛。大约在公元 1000 年写成的《Krákumál》，即囚禁在诺森伯里亚国王埃拉的蛇塔中的腊格纳·洛德布罗克的所谓死前之歌，表明了斯堪的那维亚人自己如何把爱尔兰当作一个经常给他们提供战利品的国家。⁴⁴⁴ 古代多神教的那种野蛮，在这首歌中似乎最后一次强烈地表现出来了；这首歌以歌颂腊格纳王的功绩为名，实际上则是这整个北方民族不仅在本国，而且在从杜纳阔德到弗兰德的海岸，在苏格兰（它这时已被称为苏格蒂亚，并且可能是第一次被这样称呼）和爱尔兰举行强盗式的进军的简述。说到爱尔兰的有：

“我们挥动利剑，曠野里积尸如坟，
狼兄狼弟兴高采烈，将鲜血开怀痛饮，
铁剑击铜盾；爱尔兰君主马斯太因
不使鸷鹰饥饿，更让恶狼狂吞，
在韦德腊福德给大鸦献上牺牲。

年），这是和所有就当时来说确切可靠的爱尔兰史料相矛盾的。斯诺里的叙述中显然把哈拉德·哈法格尔的儿子托尔吉耳斯和下面将谈到的托尔吉耳斯或土尔格齐混淆起来了。

我們揮動利劍，早晨发起一場游戏——
在林迪賽里同三个国王愉快地比比高低。
只有少数幸运儿活着回去；
鷹隼与餓狼爭肉，豺狼大口吞食人体，
爱尔兰人的鮮血像潮水泛濫海堤。”①

早在九世紀上半叶，諾曼海盜托尔吉耳斯(爱尔兰人称他为土尔格齐)就已經征服了整个爱尔兰，但是在 844 年他死去以后，他的国家也就瓦解，而諾曼人也就被赶了出来。入侵和战斗繼續着，双方互有勝負，最后，到十一世紀初，原来只在曼斯特一部分地区为王的爱尔兰民族英雄布里安·博卢高升为全爱尔兰的統治者，于 1014 年 4 月 23 日(耶穌受难节)在克隆塔尔弗(紧靠都柏林)和入侵爱尔兰的諾曼人进行了一场决战。結果，入侵者的統治被永远摧毁了。

移居在爱尔兰并使倫斯特丧失独立的諾曼人(倫斯特国王迈

① Hiuggu ver með hiörvi, hvern lá thverr of annan;
gladhr varð gera brôðhir getu viðh sôknar laeti,
lét ei örn né ýlgi, sá er Írlandi stýrdhi,
(môt varð málms ok rítar) Marsteinn konungr fasta;
varð í Vedhra firdhi valtafn gefit hrafni.

Hiuggu ver með hiörvi, háðhum sudhr at morni
leik fyrir Lindiseyri viðh lofdhúnga threnna;
fárr átti thvi fagna (féll margr í gyn úlfi,
haukr sleit hold meðh vargi), at hann heill thadhan kaemi;
Ýra blôdh í oegi aerit féll um skaeru.

如上所述，韦德腊福德即瓦特福德；至于能否找到林迪賽里这地方，則不得而知。但是这决非約翰斯頓所譯的倫斯特⁴⁴⁵，詞尾 eyri (沙滩，丹麦文是 öre) 是指一个十分肯定的地方。Valtafn 也可作“鷹的食物”解，而此处也多半可以这样譯；不过由于大鴉是奧丁的神鳥，所以显然这个詞既可以用作这种意思，也可以用作另一种意思。

耳莫尔达于公元 999 年在他們的帮助下登上王位，而且以后也只是在他們的支持下才保住政权)預見到将要发生一場决战，就分头派遣使者到南方群島和奥克尼群島以及丹麦和挪威求援，并且果然获得了大批的援軍。“尼亚耳史詩”⁴⁴⁶ 叙述了西古尔德·劳德里松伯爵如何在奥克尼群島上装备起来，准备进軍，索尔斯太因·西杜哈耳森、紅发赫腊芬以及斯特劳梅的厄尔林如何和他一同出发，他如何率領队伍在复活节前的礼拜天进抵都柏林(Duflin)。

“这时，布罗迪尔也率領他的軍隊来到。他用巫术来預卜战争的結局，得到的回答是：如果星期五开仗，布里安王将要战死，但他会获得胜利；如果早于星期五开仗，所有他的敌人都将战死；于是布罗迪尔就說，不應該在星期五以前开仗。”

关于这次战役有两种傳說，即爱尔兰年表中的說法和斯堪的那維亞“尼亚耳史詩”中的說法。据后者說：

“布里安王率全軍迫近要塞〈都柏林〉；〈諾曼人的〉軍隊星期五开出要塞，于是两軍摆开了陣勢。布罗迪尔居一翼，西格特留格王〈据“因尼斯法耳年表”⁴⁴⁷，他是都柏林的諾曼人之王〉居另一翼。應該說，布里安王并不想在星期五作战，在他的周圍設置了盾甲工事，他的軍隊則摆在前面。烏耳夫·赫雷达在面對布罗迪尔的一翼，另一側翼(面對西格特留格)是奧斯帕克和他的兒子們，中間是克尔提亚耳法德，他面對着軍旗。”

战斗开始后，烏耳夫·赫雷达把布罗迪尔赶进了森林，后者就在那里躲起来；西古尔德伯爵和克尔提亚耳法德进行了激烈的战斗，那时克尔提亚耳法德已經冲到軍旗前面，杀死旗手并接着砍倒第二个打起軍旗的士兵；于是所有的人都不敢再来打旗，西古尔德伯爵把旗帜从旗杆上撕下，藏在自己的衣服里。接着，他被矛枪刺死，他的卫队大概也同时被击潰了。这时，奧斯帕克抄了諾曼人的后路，經過一場激战，粉碎了西格特留格統率的一翼。

“于是所有的队伍都开始逃散。索尔斯太因·西杜哈耳森在别人都逃走的时候仍留在那里系他的鞋带。克尔提亚耳法德问他为什么不像别人那样逃走。索尔斯太因答道：‘咳，今天晚上我反正是到不了家的，我的家在冰岛。’于是克尔提亚耳法德就把他放了。”

这时，躲起来的布罗迪尔看到布里安的军队在追赶逃兵，而留在盾甲工事中的的人已经不多。于是他就从森林中跑出来，冲破工事把国王杀死（那时布里安已 88 岁，当然已不能参加战斗，所以留在营垒里）。

“于是布罗迪尔就高声大叫：‘让人们到处传说吧，布里安是死在布罗迪尔手里的！’”

但是，追击敌人的士兵返回来了，他们包围并活捉了布罗迪尔。

“乌耳夫·赫雷达剖开他的肚子，拖他围着一棵橡树走，把他的肠子拉出来缠在树干上，布罗迪尔直到肠子完全被拉出以后才死去，布罗迪尔的部下也完全被歼灭。”

根据“因尼斯法耳年表”，诺曼军队分成三队。第一队由都柏林的诺曼人和来帮助他们的 1 000 个身披长环甲的挪威人组成；第二队由爱尔兰的伦斯特补充部队组成，由迈耳莫尔达王统率；第三队由来自各岛屿的人和来自斯堪的那维亚的援军组成，统率他们的是运输这些援军的舰队的司令布卢阿代尔和奥克尼群岛的伯爵洛达尔。布里安针对他们也把自己的军队组成三队，不过他们的指挥官的名字和“尼亚耳史诗”上所说的不一样。关于战斗的叙述本身并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四教长年表”的记载倒是更为简洁明了，我们引述如下：

“基督诞生后 1013 年（应为 1014 年，但通常都误为 1013 年）从整个西欧

来的異族人集合起来反对布里安和迈耳沙赫莱恩（布里安屬下的密斯王，人們通常称他为瑪拉基），他們带来1 000个身披环甲的兵士。在克卢安塔尔布（牧牛場，即現在的克隆塔尔弗），正好在受难节那天他們展开了一場古今未有的激烈的、凶猛的、大規模的、殘酷的战斗。在这次战斗中被杀死的有88岁的布里安、他的63岁的儿子穆尔哈德、他的侄子科奈因、他的孙子托伊尔达耳巴赫（接下去还有許多名字）。最后，經過激烈的战斗，由于同異族人和倫斯特人的勇敢搏斗，迈耳沙赫莱恩将（敌人的）队伍从土耳其凱恩赶到Athcliath（都柏林）；在战斗中倫斯特王迈耳莫尔达战死，他是穆尔哈德的儿子，而穆尔哈德則是芬的儿子，……此外，还有无数倫斯特人被杀死。被杀死的还有安兰尼勃的儿子杜勃加耳（通常称他为安拉夫或奥拉夫）和格卢尼艾尔恩的儿子吉拉基阿兰，两名異族的下屬軍事首領（tanaisi），奥克尼群島伯爵（iarla insi h Oirc）洛德尔的儿子齐希弗里特，丹麦人的首領布罗达尔，后者就是杀死布里安的人。1 000名环甲兵都被歼灭，在那里战死的異族人至少有3 000人。”

“尼亚耳史詩”是在那次战争結束近一百年之后在冰島写成的；爱尔兰的年表至少有一部分是根据当时人的叙述。这两种史料彼此并无联系，可是两者不仅在要点上完全符合，而且还互相补充。布罗迪尔和西格特留格究竟是什么人，我們只是从爱尔兰年表中才知道的。西古尔德·劳德里松在这里被写作洛德尔的儿子齐希弗里特，因为齐希弗里特正是古斯堪的那維亞語中西古尔德这一名字按盎格魯撒克逊方式的正确写法，而在爱尔兰，無論在錢币上或年表中，斯堪的那維亞的名字大都不按古斯堪的那維亞方式而是按盎格魯撒克逊方式写的。在“尼亚耳史詩”中，布里安屬下的軍事首領的名字都是按照斯堪的那維亞方式改写的；其中烏耳夫·赫雷达这一名字甚至完全是古斯堪的那維亞式的，不过，要像某些人那样，就此得出結論，說布里安的軍隊中也有諾曼人，那是武断的。奥斯帕克，以及克尔提亚耳法德，大概都是凯尔特人的

名字；后者可能是“四教长年表”中托伊尔达耳巴赫这一名字的变形。关于日期，一种史料說是在复活节前的星期日以后的第一个星期五，另一种史料說是在受难节，两种史料完全相符；关于战争的地点，两种史料也完全一致；虽然“尼亚耳史詩”中曾提到坎塔腊堡（或坎特伯雷）⁴⁴⁸，但明确指出战争是在都柏林大門外进行的。战斗的情况，“四教长年表”中記載得最为确切：諾曼人从他們向布里安军队发动进攻的克隆塔尔弗平原被击退，經過从北面流过都柏林附近的托耳卡河退到都柏林。关于布罗迪尔杀死布里安王，两种史料均有記載，只是斯堪的那維亚的史料說得較為詳尽。

如果考虑到那个时代尚处于不开化状态这一情况，應該說，我們所掌握的关于这次战争的材料已經是足够詳細和可靠了；关于十一世紀的战争，我們还很少能找到敌对双方的如此明确而又彼此吻合的記載。尽管如此，高德文·斯密斯教授先生仍然认为这不过是“虚构的(shadowy)冲突”（上述他的著作第48頁）。的确，在教授先生的头脑中，最明显不过的事实也常常具有“虚构”的性质。

在克隆塔尔弗战败以后，諾曼人的强盗式的侵襲减少了，并且也不那么危險了；都柏林的諾曼人很快就处于邻近的爱尔兰首領的統治之下，而到了第二代或第三代，就和爱尔兰居民融合了。斯堪的那維亚人的侵襲造成了一片荒凉，作为唯一补偿的是，他們給爱尔兰人留下了三四个城市和从事貿易的城市居民的萌芽。

我們越是深入地追溯历史，同出一源的各个民族之間的差異之点，也就越来越消失。一方面这是由于史料本身的性质，——时代越远，史料也越少，只包括最重要之点；另一方面这是由这些民

族本身的发展所决定的。同一个种族的一些分支距他们最初的根源越近，他们相互之间就越接近，共同之处就越多。雅科布·格林在研究德意志民族性格、德意志风俗习惯和法律关系时，一向把从记载基姆布利人进军⁴⁴⁹的罗马史学家到不来梅的亚当和萨克森·格腊马提克所提供的一切证据，从“贝奥伍耳夫”和“希尔德布兰德之歌”到“艾达”⁴⁵⁰和古史诗的一切古代文学作品，从 *Leges barbarorum* ⁴⁵¹ 到古丹麦和古瑞典法律以及日耳曼习惯法记录的一切法律汇编，都看作同样珍贵的史料，是完全有理由的。这一种或那一种特点，可能只有地方性的意义，但是它所反映的那种特征却是整个种族所共同具有的，而史料的年代越是久远，这种地方性的差别就越是少见。

七世纪和八世纪时，斯堪的那维亚和德意志的居民相互间的差别比目前来得小，同样，最初在爱尔兰的凯尔特人和高卢的凯尔特人之间，也一定比现在的爱尔兰人和法国人之间有更多的相同之处。因而我们不必感到惊奇，为什么凯撒当时所说的高卢人的那许多特征，在十二个世纪以后，吉拉德又在爱尔兰人中重新发现，而且直到今天，我们在爱尔兰的民族性格中也仍然可以看到这些特征，尽管他们已经大大地混杂了日耳曼血统……⁴⁵²

弗·恩格斯 “爱尔兰史”的片断

英国人已经做到了使属于各个不同种族的人安于它的统治。对于自己的民族特性和语言非常保守的威尔士人，已经完全和不列颠王国结合在一起了。苏格兰的凯尔特人虽然直到1745年⁴⁵³还具有反抗精神，虽然在这以后他们几乎先后为政府和他们自己的贵族所完全歼灭，他们现在却想也没有想到起义。诺曼底群岛的法国人即使在法国大革命时期也曾进行反抗法国的激烈的战斗。但是甚至被丹麦出卖给英国的黑尔郭兰岛的弗里西安人⁴⁵⁴也安于自己的命运，而只是在经过一个很长的时期之后，萨多瓦的胜利和北德意志联邦的成功才使他们从心底发出同“伟大的祖国”合并的痛苦呼声。只有爱尔兰人，英国人没有把他们制服。原因在于爱尔兰种族的异乎寻常的伸缩性。在极端残暴的镇压以后，在每一次要把他们歼灭的企图以后，经过一个短时期，爱尔兰人又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强地站了起来；他们似乎总是从骑在他们头上压迫他们的异族驻军那里汲取了主要的力量。异族人在第二代，甚至往往在第一代，已经变得比爱尔兰人更像爱尔兰人(Hiberniores ipsis Hibernis)，而后者则愈是掌握了英语而忘掉自己固有的语言，就愈是成为爱尔兰人。

资产阶级把一切都变成商品，对历史学也是如此。资产阶级的本性，它生存的条件，就是要伪造一切商品，因而也要伪造历史。伪造得最符合于资产阶级利益的历史著作，所获得的报酬也最多。馬考萊就是一个例证。他正是由于这种原因而成了不如他机灵的高德文·斯密斯的一个望尘莫及的理想人物；他的那些捏造正是为了这一目的。

杀人成了反抗大地主消灭人民的行为的唯一有效手段；由于这种原因，并且只要这种情况还没有改变，在爱尔兰就无法制止在土地骚动基础上产生的杀人行为。这样做是有用的，因此虽然有各种惩治法，这种行为现在还在继续，而且将来也会继续下去。正如其他社会现象一样，它在数量上时有起伏，而在一定的情况下它甚至会具有传染病的性质，那时它甚至由于一些微不足道的原因也会发生。传染病还可以防止，但是这种疾病本身却无法防止。

弗·恩格斯写于1870年5月—7月
上半月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
文库”1948年版第10卷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弗·恩格斯

爱尔兰歌曲集代序⁴⁵⁵

爱尔兰的民间歌曲一部分产生于古代，另一部分产生于近三四百年间，其中有許多是上一世纪才产生的；创作特别多的是当时最后一批爱尔兰弹唱诗人中的卡罗兰。这些弹唱诗人或竖琴手（他们既是诗人，又是作曲家，又是歌手）以前为数很多，每一个爱尔兰首领在他的城堡中都有自己的弹唱诗人。不少弹唱诗人也作为流浪歌手，飘泊在全国各地，遭受着英国人的迫害；英国人把他们看做民族的、反英格兰的传统的主要代表者，并不是毫无根据的。这些弹唱诗人使人民始终鲜明地记得那些歌唱芬·麦库阿耳（麦克菲尔逊在他的完全根据这些爱尔兰歌曲编成的“奥辛”⁴⁵⁶中，从爱尔兰人那里剽窃了这个人物的名字，易名为芬加耳，并改为苏格兰人）的胜利、古代塔腊王宫的豪华、布里安·博卢国王的英雄事迹的古代歌曲，以及稍后一些的有关于爱尔兰首领同 Sassenach（英国人）作战的歌曲；弹唱诗人在他们的歌曲中也颂扬了他们同时代的为独立而战的爱尔兰首领们的功勋。但是，到十七世纪时，伊丽莎白、詹姆斯一世、奥利弗·克伦威尔和荷兰的威廉使爱尔兰人民完全沦为奴隶，掠夺他们，把他们的土地抢去给英国征服者，使爱尔兰人失去法律的保护，成为一个备受压迫的民族，这时流浪歌手们也像天主教神父们一样遭到了迫害；到本世纪初，他们已经逐渐

絕迹了。他們的名字被遺忘，他們的詩歌只留下一些片斷；他們給自己被奴役的但是沒有被征服的爱尔兰人民留下的最寶貴的遺產，就是他們的歌曲。

所有用爱尔兰文写的詩，每一节都是四行；因此，这种四行一节的格式，虽然往往不大明显，通常还是大多数歌曲、特别是古老的歌曲的基础；此外还常常附有叠句或豎琴彈奏的尾声。目前，在爱尔兰的大部分地区已經只有老年人才懂得爱尔兰語，或者已經誰也不懂得爱尔兰語，但即使在这个时候，有許多这种古老的爱尔兰歌曲，人們还是只知道它們的爱尔兰文名称或者开头的歌詞。大部分比較晚近的歌曲，則已經有了英文名称和英文歌詞了。

这些歌曲大部分充滿着深沉的忧郁，这种忧郁直到今天也还是民族情緒的表現。当統治者的压迫手段日益翻新、日益現代化的时候，难道这个被統治的民族还能有其他的表現嗎？四十年前第一次使用而在近二十年間达到頂点的最新手段，就是把爱尔兰人大批地驅逐出他們的故土，而在爱尔兰，这就等于驅逐出国境。从1841年起，爱尔兰的人口减少了250万，有300万以上的爱尔兰人流亡国外。这一切都是由于来自英格兰的大地主追求利潤和强行勒索而造成的。如果这种情况再繼續三十年，爱尔兰人恐怕只有在美洲才能找得到了。

弗·恩格斯写于1870年7月5日
左右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譯的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附 录

中央委员会告各工人团体书⁴⁵⁷

国际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
倫敦西区希腊街 18 号

茲邀請各工会团体、互助会和其他工人团体以集体方式加入协会；接受入会的唯一条件就是承认协会的原则并繳納入会申請书的費用；申請书(上面打蜡,并裱在帶軸的麻布上)的費用是 5 先令。加入协会的团体**不一定要繳納什么会費**；它們可以根据自己的經費斟酌情况决定是繳納会費或是在它們认为协会的活动应当得到支持的时候随时給协会以支持。

中央委员会願意把充分地闡述了协会的原则和目标的宣言和章程寄給任何一个表示了这种要求的团体；在倫敦地区內还准备派出代表团，代表团将对提出的任何需要了解的細节作进一步的說明。加入协会的团体有权派遣代表 1 名参加中央委员会。个人会员除为会员证繳納 1 辨士以外，規定每年繳納会費 1 先令；会员证同关于协会的全部情况一样，可以从名誉書記或每星期二晚上 8 点至 10 点在希腊街 18 号举行的中央委员会會議上得到。

法国通訊書記 欧·杜邦
德国通訊書記 卡·馬克思
波兰通訊書記 艾·霍尔托普
瑞士通訊書記 海·荣克

美国通訊書記 萊·路易斯
 中央委員會主席 乔·奧哲尔
 名譽財務委員 乔·威·威勒尔
 名譽總書記 威·朗·克里默

願意加入国际工人协会的
 团体的申請書格式

我們，在.....集会的.....成員們声明，我們完全同意国际工人协会的原則和目标，并保证傳播和貫徹这些原則和目标；为了证实我們的誠意，我們現在特請求中央委員會接受我們加入兄弟般的同盟，作为协会的附屬分部。

受.....名會員的委托签字

書記.....

主席.....

186 年.....

起草于 1865 年 6 月

1865 年夏在倫敦印成傳單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傳單譯的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在 1865 年 7 月 25 日中央委员会 全体会议上修改和通过的 常务委员会关于代表大会 和代表会议的报告⁴⁵⁸

鉴于我们的法国和瑞士通讯员们迫切要求中央委员会着手履行在协会成立时交给它的任务——今年在布鲁塞尔召开代表大会，以便讨论欧洲无产者共同关心的问题，常务委员会在全面地研究了这一问题之后，现在将下列建议提交你们批准：

1. 由于目前不可能在布鲁塞尔或伦敦召开代表大会，我们建议不召开代表大会而在伦敦召开代表会议，代表会议的召开日期定于 9 月 25 日，星期一。

2. 在大陆和英国的同情我们事业的报纸上发表如下声明：

“国际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通知：由于下列三个原因，决定延期在布鲁塞尔或任何其他地方召开全协会代表大会：

第一，因为中央委员会确信召开一个人数不多的、由大陆上协会的几个主要分部的代表参加的预备性的代表会议来讨论应向即将举行的代表大会提出的议程是适宜的；

第二，因为工人阶级的精力和注意力在英国已完全被选举改革运动、议会选举和工业展览所吸引，而在法国，又完全被罢工所吸引，以致协会没有能够充分得到发展；

第三，因为比利时議會今年通过了外侨法，这个法律阻碍协会在比利时首都召开代表大会并且排除了在那里召开代表會議的任何可能性。”

3. 代表會議的組成应当是：邀請每个中央理事会派代表 2 人，另外，再由里昂派代表 2 人。代表的旅費由代表所屬的分部負擔，在倫敦的費用則由中央委員會支付。

4. 至于这些經費的来源問題，公民荣克向常务委員會提出了慷慨的建議，他准备負擔瑞士代表的伙食和住宿費用。其他費用，常务委員會建議：

第一，中央委員會委員明年的會費在 9 月即代表會議開幕前繳納；

第二，委托总書記号召已經加入协会的团体的書記們加紧发展个人會員以弥补代表會議的費用；

第三，建議中央委員會委員領取一些會員证来发展會員，先以現金向委員會交付會員证費用，以后随會員的发展再不断偿还自己这笔支出。

5. 委員會建議中央委員會通过如下議程，并将它提交代表會議討論。

需要中央委員會修改和通过的議程如下：

- (1) 有关代表大会的問題。
- (2) 有关协会組織的問題。
- (3) 在协会帮助下在一些国家实现劳資斗争中的統一行动的問題。
- (4) 工会——工会的过去、現在和将来。
- (5) 合作劳动。

(6) 直接税和间接税。

(7) 缩短工作日。

(8) 女工和童工。

(9) 俄国佬对欧洲的威胁以及恢复独立和统一的波兰。

(10) 常备军；它对生产者阶级利益的影响。

6. 代表会议的代表们的预备会议将同常务委员会联合举行，而决定性会议则同中央委员会联合举行。

7. 9月28日举行晚会庆祝下列三件事：第一，协会成立周年纪念；第二，大陆代表的来到；第三，美国联邦制和自由劳动的胜利。

晚会节目包括同志式的茶会、祝词、座谈和舞会。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总委员会记录簿

燕妮·馬克思 1866 年 1 月 29 日 給約·菲·貝克尔的信的摘录⁴⁵⁹

我們从 1 月 29 日的一封倫敦来信中摘引如下一段：

“在死气沉沉的英国，目前正在开展一个对待宗教的极其重要的运动。以赫胥黎(达尔文学派)为首的一些极著名的学者——查理·賴尔、包令、卡本特尔等人在圣馬丁堂給人民作启蒙的、真正勇敢的、充滿自由思想的讲演，而且是在星期日晚上，正好是上帝的羔羊通常在神主的牧場上朝圣完毕的时候。大厅里經常挤滿了人，人民的情緒非常热烈，在第一个星期日的晚上，当我同家里人来到大厅时，就有 2 000 多人不能进入这个已經挤得滿滿的、悶热的場所。神甫让这种如此可怕的事情发生了三次。然而，昨天晚上，大会得到通知，在精神之父提出的反对 Sunday evenings for the people (星期日人民晚会) 的訴訟案結束以前，不应再作任何讲演。大会坚决表示了憤慨，并且立即募集了百余英鎊作为訴訟費用。神甫們干涉这件事是何等的愚蠢啊！使这帮虔誠的信徒感到十分懊丧的是，晚会結束时还有音乐；大家齐声高唱亨德尔、莫扎特、貝多芬、門德尔森和古諾的歌曲，而且这种歌唱受到了英国人的热烈欢迎；在这以前，每逢星期日英国人只許大声唱 «Jesus, Jesus meek and mild» (耶穌，温和慈悲的耶穌) 或者到 Ginpalast (酒館) 去。”

这些事件也許能推动英国的許多自由思想者团体⁴⁶⁰，它們以前一直采取比較矜持的态度，現在可能使它們为了实际运用自己的研究而在人民面前行动起来。

芬尼亚社社員的事业⁴⁶¹引起了英国工人階級的深切同情，这是因为他們反对神甫，同时也因为他們是共和派。这一事实也是时代的象征。^①

燕妮·馬克思写于1866年1月29日

載于1866年2月“先驅”杂志第2期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先驅”杂志，
并根据手稿校对过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① 最后两段是“先驅”杂志編輯部加的。——編者注

給“佛尔維耶回声报”的信⁴⁶²

于倫敦弗利特街包佛里街 18 号

致“佛尔維耶回声报”編輯先生

閣下：

我們信賴您的正义感和您“在工人階級中間傳播真理和普及教育”的願望，因此懇請您将附上的这封信予以发表，这封信的副本已經寄給公民韦^①了。

忠实于您的 荣克

韦先生：

在 1865 年 12 月 16 日“佛尔維耶回声报”第 293 号上登載了一篇文章，其目的似乎是要向劳动者解釋国际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委員所遵循的原則；公民勒·呂貝向委员会介紹了这篇文章（这是根据給他的委托），他认为，这篇文章虽然是匿名发表的，然而出于您的手笔。

在討論了这篇文章之后，中央委员会于 1866 年 1 月 9 日的會議上通过了如下決議：

“要求公民韦論证他所提出的事实，如果拒絕证实或者不能证

① 韦济尼埃。——編者注

实这些事实，就把他开除出国际工人协会。”

由于您的文章同真实情况完全不符合，因此中央委员会认为自己有责任恢复真相；中央委员会意识到自己的使命和托付给自己的权力，不打算以诬蔑还击诬蔑，以伪造的非难对付伪造的非难，不愿意堕落到进行人身攻击的地步，它让被非难者本人来为自己辩护，它不会在任何东西面前止步不前，同时不管虚伪的朋友怎样说，它决不让自己受到任何怀疑。

下面几个地方特别值得注意：

一

“不久，全体法国委员和意大利委员都辞职了，他们退出的理由是托伦先生和弗里布尔先生参加了委员会的工作并且进行阴谋活动。”（“佛尔维耶回声报”第293号）

中央委员会的九个法国委员中只有两人退出，即德努阿尔先生和勒·吕贝先生，而且后者很快又回来了；至于意大利委员，其中有一人（公民沃尔弗）说明了自己退出的理由并不是“托伦先生和弗里布尔先生参加了委员会的工作并且进行阴谋活动”，而是中央委员会通过了由小委员会提出的关于公民勒弗尔的决议^①，可是这个决议在几小时以前他本人还以小委员会委员的身分投票赞成过。

^① 見本卷第90—92頁。——編者注

二

“委员会在沒有他們参加的情况下一直进行工作到今天。”（“佛尔維耶回声报”第 293 号）

退出委员会的两个法国委员之一，前法国书记公民勒·吕貝不久就作为德特弗德支部的代表回来了；因此，“委员会在沒有他参加的情况下进行工作”为时不久。

三

“它(委员会)公布了宣言和临时章程；前者出自一位著名的拉丁族政論家之手，等等。”（“佛尔維耶回声报”第 293 号）

宣言和章程是在意大利委员和两名法国委员退出委员会以前发表的；宣言并不是出自拉丁族的著名政論家之手，而是出自日耳曼族的作家之手；^①还在拉丁族政論家看到宣言以前，宣言就由中央委员会全体委员、其中包括法国委员和意大利委员一致通过了；拉丁族政論家不仅不是宣言的作者，而且如果他事先看到这个文件，他就会因为宣言的反资产阶级倾向而号召意大利委员起来反对它；但是他晚了，只能阻止意大利委员把宣言译成意大利文。显然，您从来没有讀过这个宣言，而拉丁族政論家也不会因为您把他当作这个作品的作者而感激您。

① 前者指朱·馬志尼，后者指卡·馬克思。——編者注

四

“它(委员会)是否力争达到给自己规定的目标——彻底解放劳动者呢?

没有! 它没有这样做, 而是把一年的宝贵时间浪费在召开代表会议和制定应在日内瓦举行的代表大会的议程上面, 等等。”(“佛尔維耶回声报”第293号)

中央委员会只是到1865年才开始工作; 因此, 在代表会议以前是有9个月的时间; 它把这9个月的“宝贵时间”用于建立国际联系和扩大英国国内的联系。在几个月的时间里, 由委员会委员组成的代表团每周都访问了各种不同的工人团体, 建议它们加入协会。这项工作的成果如下: 到代表会议召开时, 国际工人协会在英国有14000名会员; 加入协会的包括鞋匠协会和泥水匠协会这样大规模的組織; 这些规模巨大的工人組織(工联)的最有威信和最著名的活动家都是中央委员会的委员; 创办了报纸, 其名称(“工人辩护士报”)本身就说明了它的任务, 它随时随地都维护着工人阶级的利益。

在英国成立了争取普选权的团体(改革同盟)——这个团体有成千上万的成员; 其执行委员会的书记和大部分委员都是从我们的人中间选举出来的。

在法国有数千名拥护者。

在巴黎有一个强有力的、活动积极而又无可非议的理事会领导着一个拥有2000多名会员的組織; 在里昂、卢昂、南特、卡昂、訥夏托、龐-勒韦克、邦丁、圣丹尼、利济厄、皮托、伯利維尔以及其他地方都有分部。

在瑞士：在日内瓦有一个由优秀人物组成的领导机构，领导着一个拥有 500 名会员的组织；在洛桑、斐维、蒙特勒和纽沙特尔州都有分部。

在比利时，运动一开始就具有最好的征兆；中央委员会有理由认为，西班牙很快也会学比利时的榜样。

五

“不，它（委员会）甚至既没有邀请拥有如此多的工人团体的德国或许许多多的英国团体派一名代表、也没有邀请组织得非常好的意大利团体或法国现存的这些团体派一名代表来参加它于 1865 年 9 月举行的代表会议，因为托伦、弗里布尔之流并不是某个法国工人团体的代表，而只是代表他们自己，他们提不出什么证据来说明他们负有全权代表的责任。他们不仅不是法国工人团体的代表，而且他们参加伦敦召开的代表会议成了妨碍这些团体派出自己的代表的唯一原因。我们可以举出一些这样的团体，它们由于这个原因而拒绝参加代表会议，等等。”（“佛尔维耶回声报”第 293 号）

按照业已确定的原则，只有国际工人协会的支部和加入国际工人协会的团体才能派代表出席代表会议；我们的财政状况使我们不得不把代表的人数限制到最低限度。

从“拥有如此多的工人团体的”德国，能够派遣代表的只有舒尔采-德里奇组织的各消费合作社和拉萨尔派的各个团体即全德工人联合会。前者只是普鲁士自由资产阶级的工具（这一点它的成员是不知道的），舒尔采-德里奇就是普鲁士自由资产阶级的首脑人物之一；至于拉萨尔派的各个团体，它们过去而且直到现在都是处于完全瓦解的状态，其中有一部分同俾斯麦达成了协议，

而另一部分、即當時尚未改組的那一部分則承認曾作為瑞士代表出席代表會議的約·菲·貝克爾的領導。在代表會議期間，貝克爾接到了佐林根工廠工人的委託，於是他也成了日內瓦德國人團體（德意志工人教育協會）的代表，當時倫敦的德國人團體（德意志工人教育協會）派有自己的代表——中央委員會委員出席會議⁴⁶³。

除了工人們在德國建立團體時所遇到的阻礙外，法律也禁止他們加入外國團體；然而仍然有幾個協會的支部在德國的北部和南部建立起來了。

如果考慮到所有這些困難，那末是否應當對於德國並沒有像中央委員會所期望的那么多的代表這一點感到驚訝呢？

中央委員會的英國委員很好地代表了英國人的團體。主席奧哲爾是工聯理事會（英國所有工聯的最高理事會）的書記；總書記克里默是木工執行委員會委員，而改革同盟的書記豪威耳同時又是泥水匠執行委員會的委員；他和泥水匠協會書記柯耳森都是這個協會在中央委員會里的代表；一個人壽保險互助會的理事會的成員威勒爾也是中央委員會委員。

代表鞋匠（有 5 000 名會員）的是奧哲爾、摩爾根和柯普，而肖則代表了彩畫匠，等等。

出席 1865 年意大利工人在那不勒斯舉行的代表大會的公民沃爾弗，以及委員會的其他意大利委員，雖然非常積極地參加了中央委員會的工作，但是他們在意大利卻連一個會員也沒有能夠吸收；中央委員會感到十分遺憾，意大利委員甚至到退出委員會時都沒有得到“組織得非常好的意大利團體”的充分信任，沒有能說服哪怕是一個這樣的團體加入國際協會。

“……或法国現存的这些团体……因为托倫、弗里布尔之流……并不是某个法国工人团体的代表,而只是代表他們自己”。

里昂支部的成員由于經費不足不能派出代表而表示遺憾,但是他們也像卡昂支部和訥夏托支部的成員所做的那樣,寄来了信件,因而也就参加了中央委员会的活动。

托倫、弗里布尔、利穆津和瓦尔兰是由巴黎支部一致投票选出的;这个支部是由各种专业的工人和“劳动信貸”协会的几百个會員組成的。这个协会的領導人員律茲也是支部的成員;他們全都参加了或者可以参加代表的选举。4个巴黎代表之一的利穆津是各合作团体的国际性机关报“联合”报理事会秘书。

克拉里奧耳先生是巴黎印刷工人协会的代表。席利先生、杜美尼尔-馬里尼先生等人应中央委员会的邀請从巴黎来出席了代表會議,他們非常积极地参加了會議的工作。

您所說的由于托倫、弗里布尔之流的参加而妨碍它們不能派遣代表出席代表會議的其他团体是哪些呢?您是否指在法国目前制度下容許存在的唯一团体十二月十日会⁴⁶⁴呢?

关于代表會議的报道在巴黎的所有自由派報紙上都发表了,既沒有引起国际协会会员或法国合作团体成員的任何怨言,也沒有引起他們的任何異議;代表們所持有的代表資格证經過中央委员会的小委员会的审查和批准。

代表會議一开始,巴黎代表就提出了关于他們理事会的活动和关于財政状况的詳尽而精确的报告,为了证实这个报告,他們还把他們的賬簿和全部往来信件交給了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对于巴黎理事会为在法国創建和宣傳国际协会而采取的有效措施只有表示欢迎。

六

“比利时派遣了一位非常称职的代表——公民德·巴普，但他是一个拥有很多团体的国家的唯一代表。”（“佛尔維耶回声报”第 293 号）

比利时只派遣一名代表，而这名代表又恰好代表着最少数的选民，这是极可惋惜的。可是塞扎尔·德·巴普这个人毕竟还是称职地代表了比利时。

七

“从瑞士，或者更确切些說，从日内瓦来了两名代表，两人都不是瑞士人，一位是法国流亡者，一位是巴登流亡者，他們同上述两名似乎是法国的代表一起参加了代表會議；結果有五名或者六名同一种类的人，而只有一名真正认真选出的代表——比利时人。”（“佛尔維耶回声报”第 293 号）

瑞士代表是由国际协会瑞士各支部、成員全是瑞士人的格留特利联盟⁴⁶⁵ 以及德国人团体普遍投票选举的。

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也通过它在瑞士的国际协会組織中的代表参加了选举。瑞士的协会会员由于选举了自己的代表而在国际协会史中占据了光荣的地位。

瑞士代表不是同“两名似乎是法国的代表”、而是同四名巴黎代表一起来参加代表會議的。

出席代表會議的代表之一公民貝克尔在二十多年以前就是瑞士人；比恩市的公民称号是为了感謝他对国际民主事业的效劳而授予他的；他既是工人，同时又是出色的鼓动家、战士、組織家和作

家；他一直把自己多方面的才能貢獻給勞動者的事業；像這樣的偉人居然遭到小人們的攻擊，這是可笑的。顯然，只有那些以自己的正直和無私見稱的人才能評論他們的功績。

八

“我們要問：能不能認為這種成果是令人滿意的呢？”（“佛爾維耶回聲報”第293號）

中央委員會幾乎全是由一些拿慣了錘子和銼刀的工人組成的，他們只是犧牲了個人的利益才把錘子和銼刀換成筆杆；他們拿起筆杆，始終是為了維護或宣傳某種崇高的事業，而決不是為了給波拿巴主義效勞。如果已經取得的成果並不如工人們一般所期望的那樣令人滿意，那末我們深信，他們會考慮到在長時間的、令人疲憊的勞動日之後還必須進行夜間勞動，考慮到他們的弟兄們在不得不經受了怎樣的不安之後才使事情達到目前這樣的狀況。

九

“委員會受到有害的影響，把類似關於必須消除俄國在歐洲的影響這樣的違背協會宗旨的問題列入了日內瓦代表大會的議程。”（“佛爾維耶回聲報”第294號）

中央委員會把關於消除俄國佬（而不是俄國，這完全是兩回事）在歐洲的影響的問題列入了自己的議程，這是受到了什麼有害的影響呢？“消除俄國佬在歐洲的影響”的必要性在我們的宣言中已經原則上得到了承認，這個宣言絕不是在什麼人的有害的影響

下发表的。

还有什么問題是在这种有害的影响下列入議程的呢？

十

“这个重大錯誤已經招致了极其严重的后果：一群波兰人要求讓他們参加委员会，并且他們很快就會在委员会中拥有絕大多数。”（“佛尔維耶回声报”第 294 号）

一群波兰人根本沒有要求讓他們参加中央委员会，他們在中央委员会中也决不是占絕大多数，而是不到二十分之一。

作者声称：“委员会拟定了一个列有十二个問題的議程，并把它提付表决，这十二个問題几乎包括所有最一般的政治經濟学問題，但科学問題一个也沒有提出。”可是过了几行，他連一口气也沒有喘就又承认还是这些問題具有“科学的意义”；怎样同这样的作者进行理智的交談呢？

中央委员会沒有表现出絲毫的偏执，它一向力求采納劳动人民事业的一切真誠朋友的高見；它极力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来宣傳自己的偉大原則和把全世界的工人联合起来。抱着这种目的在瑞士創辦了三家报纸：法文的“国际工人协会报”、“未来呼声报”和德文的“先驅”；在英国創辦了唯一的以民族自决权为依据、认为爱尔兰人有权摆脱英国的枷鎖的英国报纸“工人辯护士报”⁴⁶⁶。

中央委员会不能做自己本身行动的鉴定人。日内瓦代表大会将要决定：委员会是否辜負对它的信任，它是否輕率地背棄了它所承担的崇高使命。

閣下，我仍然是您的順从的僕人

海·荣克

代表国际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

1866年2月15日

載于1866年2月20日“佛尔維耶
回声报”第43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譯自“佛尔維耶回声报”

卡·馬克思关于馬志尼对 国际工人协会的态度 的发言记录⁴⁶⁷

摘自 1866 年 3 月 13 日总委员会會議记录

公民馬克思在他的发言中涉及到上次會議处理問題的情况。他說，沃尔弗少校关于我們的章程似乎是馬志尼写的这一声明是不符合真实情况的。章程是馬克思本人在委员会討論了几个方案（其中也有沃尔弗的方案⁴⁶⁸）之后写的。这几个方案在两个問題上彼此有根本的区别。馬克思談到資本压迫劳动的問題。沃尔弗贊成集中，但是在談到工人团体时，指的只是互助会。馬志尼起草的章程是在那不勒斯举行代表大会以前发表的。

在馬克思写的宣言发表以前，馬志尼未必能看到这个宣言，因为宣言一直在馬克思的口袋里；除非是馬志尼在宣言到了勒·呂貝手里以后，而还没有送給“蜂房报”时看到了这个宣言。

其次，馬志尼給布魯塞尔的封丹寄去了一封信，这封信是写給比利时各团体的，信中預告它們要反对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点；关于这一点，德·巴普曾經在代表會議上声明过。⁴⁶⁹

沃尔弗少校不是委员会委員；他应当把他打算提出控訴这件事书面通知委员会。馬克思以自己的名义并代表其他大陆国家的

书记提出抗議,反对上次會議对問題的处理,并要求把这一点写进記錄中去,因为在日内瓦代表大会上可能还会提出这个問題。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总委员会記錄簿

国际工人协会章程和条例⁴⁷⁰

国际工人协会章程

日内瓦代表大会在 1866 年 9 月 5 日会议上通过

鉴于：

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不是要争取新的阶级特权，而是要争取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消灭任何阶级统治；

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即社会贫困、精神屈辱和政治依附的基础；

因而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服从于它的伟大目标；

在这方面所做的一切努力至今没有收到效果，是由于每个国家里各个不同劳动部门的工人彼此间不够团结，由于各国工人阶级彼此间缺乏亲密的联合；

劳动的解放既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个民族的问题，而是涉及存在有现代社会的一切国家的社会问题，它的解决有赖于这些国家在实践上和理论上的合作；

目前欧洲各个最发达的工业国工人阶级运动的新的高涨，在鼓起新的希望的同时，也郑重地警告不要重犯过去的错误，要求立

刻把各个仍然分散的运动联合起来；

鉴于上述理由，

1866年9月3—8日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代表大会宣布，这个协会以及加入协会的一切团体和个人，承认**真理、正义和道德**是他们对一切人的关系的基础，而不分肤色、信仰或民族。

代表大会认为自己有责任为一切人要求人权和公民权。

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

根据这一切，代表大会最后确定**国际工人协会**的章程如下：

第一条 本协会设立的目的，是要成为追求共同目标即追求工人阶级的互相保护、发展和彻底解放的各国工人团体进行联络和合作的中心。

第二条 本会定名为**国际工人协会**。

第三条 总委员会由参加**国际协会**的各国的工人组成。总委员会从其委员中选出为处理各种事务所必需的负责人员，即主席、总书记、财务委员、各国书记。每年召开一次的代表大会规定下次代表大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确定总委员会驻地，选举总委员会委员，并赋予总委员会以增加新委员的权利。

代表按代表大会确定的时间在规定的地点集会，无须另行通知。在必要时，**总委员会可以改变集会地点**，但不能推迟集会时间。

第四条 总委员会在每年的代表大会上提出关于协会过去一年的活动的公开报告。在紧急情况下，总委员会可以早于规定的期限召开代表大会。

第五条 总委员会同各种工人团体建立联系，它应该使一国工人能经常知悉所有其他各国工人阶级运动的情况；使社会状况

調查工作能同时并在共同领导下进行；使一个团体中提出的但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能在所有的团体中加以讨论，并使协会在由于某种实际建议或国际纠纷而需要它加以干预时能一致行动。在一切适当场合，总委员会应主动向各个全国性团体或地方性团体提出建议。

为了加强同各个支部的联系，总委员会发表定期报告。

第六条 既然每个国家的工人运动的成功只能靠团结和联合的力量来保证，而总委员会的行动愈少分散，它的活动才能愈有成效，所以，国际协会的会员应该竭力使每一个国家中的地方性的分部联合成由中央委员会来代表的全国性组织。但是，不言而喻，在运用这一条时，要考虑每一国家法律的特点；不管是否存在法律造成的障碍，并不排斥地方性团体同总委员会发生直接的联系。

条 例^①

1. 总委员会受权执行代表大会的决议。

(a) 为此，它收集各中央委员会送交给它的一切材料，以及它能够通过这些途径获得的一切材料。

(b) 它负责组织代表大会并在各中央委员会的协助下把代表大会的议程通知每个分部。

2. 总委员会应在经费许可的范围内经常出版通报，报道国际工人协会所关心的一切情况。这种通报主要应该涉及以下问题：工作的供求状况，合作团体，所有国家中工人阶级的状况，等等。

^① 原文为«Règlements spéciaux»。——编者注

3. 上述通报以各种文字出版，并分发给所有同总委员会联系的委员会，然后由各委员会负责发给每个分部一份。

4. 为了使总委员会能够执行这些决议，在 1866—1867 年度作为一种特殊情况向国际工人协会的每个会员征收 30 生丁（3 辨士）会费。

这些会费主要用来支付总委员会的多种费用，如总书记薪金，发表文件及通讯的费用，代表大会的组织工作和其他筹备工作的开支，等等。

5. 在一切条件许可的地方建立中央委员会，其负责人员由该国的各个分部任命，并可以随时由各个分部加以撤换。各中央委员会的负责人员应向总委员会每月至少呈交一次报告，在必要时则应不止一次。

6. 各中央委员会的开支由同它们联系的各个分部负担。

7. 同总委员会联系的各中央委员会，也像总委员会一样，有责任为协会分部给予协会会员的贷款作担保，但申请人的会员证上必须有申请人所属分部书记的签名。

如果申请人向之提出贷款申请的分部没有经费，它有权向开立贷款账的理事会或分部开发期票。

8. 各中央委员会和分部在每个协会会员要求阅读总委员会报告时，应该无偿地向他们提供这些报告。

9. 每个分部，不论其人数多少，均有权派遣一名代表出席代表大会。如果某一分部没有经费派遣代表，它可以同其他分部合派一名代表。

10. 代表的费用由派遣该代表的分部或合派该代表的几个分部负担。

11. 国际工人协会的每个会员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12. 会员在 500 人以上的分部或小组, 每 500 人可以增派一名代表。
13. 在代表大会上每个代表有一票表决权。
14. 每个分部有权根据当地条件和本国法律的特点拟定自己的条例和章程, 但其内容不得与共同章程和条例有任何抵触。
15. 本章程和条例可以由每次代表大会进行修改, 但须有出席代表的三分之二要求修改。

1866 年 9 月 5 日和 8 日通过

1866 年在伦敦印成小册子“国际工人协会。章程和条例”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卡·马克思和保·拉法格的手稿译的, 并根据小册子“国际工人协会。章程和条例”校对过

卡·馬克思在 1867 年 2 月 28 日 倫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 紀念会上的演讲記錄⁴⁷¹

卡尔·馬克思談到雇佣劳动和資本，并且极为清楚地說明了工人怎样創造了資本，別人怎样靠工人亲自劳动的产品而使工人处于奴隶地位，以及資本怎样被系統地利用来給工人更紧地釘上鐐铐。的确，所謂的自由工人有一种感觉，感到他是一个自由的工人，但是事实上他却处于資本的权力之下，因为他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好賺得一点可怜的工資以滿足自己最迫切的生活需要。在大多数的場合下，自由工人的物质状况比奴隶和农奴还差。对工人階級來說，用不着消灭个人的財產，因为它早就被消灭并且一天天地还在被消灭，而真正應該消灭的是资产階級的財產，因为它是全靠欺騙得来的。

至于德国的社会关系，馬克思指出，在这方面德国无产階級是第一个能够成功地采用激进手段的。第一，德国人比別国人更多地摆脱了各种宗教邪說；第二，他們用不着像其他国家的工人一样經過漫长的资产階級运动的阶段；第三，德国的地理位置迫使他們向东方的野蛮势力宣战，因为各种各样的反对西方的反动势力都是在那里即从亚洲来的。所有这一切都将推动工人的政党

走上革命的道路，他們为了彻底解放自己，就必須沿着这条道路前进。

弗·列斯納記錄

原文是德文

載于1867年3月“先驅”
杂志第3期

俄文譯自“先驅”杂志

总委员会关于洛桑代表 大会的呼吁书⁴⁷²

致会员、各附属团体和全体工人

无产者们！

从我們收到的通訊中可以看出，协会的会员仍在繼續努力宣傳国际协会的原則并成立新的分部。这项活动在瑞士进行得特別出色，在那里，我們的大多数分部都积极地从事建立各种工人团体，并使这些团体靠攏我們。

在比利时，自从馬尔希延大屠杀⁴⁷³以后，正在进行值得贊揚的努力来团結比利时全体无产階級，使它受到我們的保护。

但是在其他国家里，却有种种情况妨碍了我們的宣傳工作。

在德国，1848年以前是那样有兴趣研究社会問題，而現在，几乎所有的积极力量都被国内展开的統一运动吸引住了。

在法国，由于工人階級享有的自由有限，我們的原則和我們的协会都沒有像預期的那样快地得到傳播和发展；因为我們本来以为，英国工人团体由于我們的关系而在法国工人最近几次罢工⁴⁷⁴期間給予法国工人团体的帮助，会保证我們得到全体法国工人的支持。現在，当法国的資本家階級和工人階級之間的斗爭进入一个我們称之为英国式的阶段的时候，也就是說斗爭具有了非常明显的性质的时候，工人们应当懂得，要成功地与資本家的力量相对

抗,就必须有一个把工人团体的各种队伍連結在一起的巩固联盟。

在英国,选举改革运动曾經席卷全国,經濟运动暂时被挤到了次要地位。但是現在,当改革运动已經停止,通过对工联的調查⁴⁷⁵已經查明工人階級的人数并证实了工人階級的力量力的时候,我們认为,一切工人团体都会懂得我們这个組織的益处的时刻已經到来。我們协会的作用已經不止一次地在工人階級代表的會議上得到了应有的估价,許多团体已經加入了我們的行列。英国拥有組織强大的无产階級,因而有义务成为我們最可靠的支柱之一。

美国看来在它剛剛經過的流血戰爭中恢复了青春:工人階級已經組織起来,并对在美国执掌政权的資產階級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几个州的立法議會通过了八小时工作日的法律。由于应屆的總統选举,各个政党不得不公开說明自己的行动綱領。激进党借參議院主席威德的口承认必須首先專門研究劳动和資本的問題;它公开主張改造資本主义所有制和土地所有制。由于这个国家的工人階級有相当高的組織性,它一定能够使自己的要求得到实现。

目前,在所有文明国家里工人階級都动起来了;在那些工厂工业最发达的国家,如美国和英国,工人階級有更加团結一致的組織,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之間的斗争也就带有最尖銳的性质。

在資本的权力面前,人失去了他个人的力量;工厂中的工人成了机器的一部分。为了恢复自己的个性,工人不得不团結起来,建立协会以保障自己的工資和生活。到目前为止这些协会还带有地方性质;但是資本却由于新的工业发明而日益强大起来;国家范围内的协会在許多場合都暴露出自己軟弱无力。在研究英国工人階級斗争的时候可以看到,厂主为了对抗自己的工人,不是把外国工人运进来,就是把活儿交到劳力最便宜的国家去。在这种情况下,

工人階級要想比較順利地繼續自己的斗爭，就必須把全國性的協會變為國際性的協會。

希望全體工人注意研究對於問題的這種新的觀點，希望他們相信，團結在我們的旗幟下，就能保住自己的麵包和自己孩子們的麵包。

我們以總委員會的名義號召大家促使將於1867年9月2日在洛桑召開的應屆代表大會成為工人階級的雄壯的示威。

按照第一次代表大會所制定的條例，每個分部有權派遣一名代表參加代表大會。擁有500名會員以上的分部，每超出500名會員可增派代表一名。沒有足夠資金派遣代表的分部，可以和其他分部共同負擔一名受權代表它們的代表的費用。⁴⁷⁶

代表大會將討論以下的問題：

(1) 用什麼**實際手段**把國際協會變成工人階級(女工和男工)擺脫資本壓迫的斗爭的總的中心？

(2) 工人階級如何才能利用本是他們提供給資產階級和政府的貸款來為自己的解放服務？

敬禮和兄弟情誼

通 訊 書 記：

歐·杜邦——法國	卡爾·馬克思——德國
扎比茨基——波蘭	海·榮克——瑞士
彼·福克斯——美國	貝森——比利時
卡特——意大利	保·拉法格——西班牙
漢森——荷蘭和丹麥	

主席 喬·奧哲爾

副主席 格·埃卡留斯

财务委员 威·德尔

财务书记 肖

总书记 彼得·福克斯

于牛津街,城堡街 16 号

起草于 1867 年 7 月中

1867 年 7 月在伦敦印成传单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传单译的

卡·馬克思关于新藍皮书的 統計数字的发言記錄⁴⁷⁷

摘自 1867 年 7 月 23 日总委员会會議記錄

公民馬克思提醒总委员会注意議会的藍皮书——“女王陛下駐外使館秘书关于他們駐在国的工商业情况的报告。1867 年”，并从藍皮书中摘出如下几段：

“1864 年头 11 个月，比利时进口 7 200 吨未加工的生铁，其中 5 300 吨是从大不列顛进口的；1865 年同一时期，生铁进口增加到 18 800 吨，其中 17 000 吨是从大不列顛进口的；1866 年，生铁进口达 29 590 吨，其中 26 200 吨是从大不列顛进口的。另一方面，1864 年头 11 个月，比利时出口的生铁达 24 400 吨，其中 17 200 吨輸入法国，5 900 吨輸入英国，而在 1866 年同一时期，生铁出口沒有超过 14 000 吨，其中 9 600 吨輸入法国，輸入大不列顛的只有 241 吨。比利时出口的鋼軌也从 1864 年头 11 个月的 75 353 吨减少到 1866 年的 62 734 吨。

現在以表格的形式列出 1866 年头 11 个月同 1864 年同一时期相比較的关于比利时从大不列顛进口的各个品种的鋼铁和大不列顛从比利时进口的鋼铁的材料。

比利时从大不列顛进口	头 11 个月	
	1866 年 (单位: 吨)	1864 年 (单位: 吨)
矿石和金屬屑.....	0	1
未加工的铁、錠铁和廢铁	26 211	5 296
加过工的铁(釘子、铁絲等)	1 031	1 777
金屬鑄件.....	41	24
鍛铁.....	255	203
扁鋼、鋼板和鋼絲	3 219	1 227
鍛鋼.....	522	0
共計.....	31 289	8 528

大不列顛从比利时进口	头 11 个月	
	1866 年 (单位:吨)	1864 年 (单位:吨)
矿石和金屬屑·····	1 768	5 555
未加工的铁、錠铁和廢铁 ·····	241	5 920
加过工的铁(釘子、铁絲等) ·····	6 727	9 436
金屬鑄件·····	5	7
鍛铁·····	12	0
扁鋼、鋼板和鋼絲 ·····	50	56
鍛鋼·····	16	5
共計·····	8 817	20 979

簡單总结是: 1864 年(头 11 个月)比利时向英国輸出 20 979 吨铁和鋼, 而 1866 年却只有 8 817 吨, 可是英国向比利时輸出的铁和鋼却从 1864 年的 8 528 吨增加到 1866 年的 31 289 吨。”

馬克思提醒道, 一些資产階級報紙去年大肆叫囂說什么工联的存在引起了极有害的后果; 它們断言什么由于工联的活动而使受到比利时制铁业排挤的英国制铁业丧失了自己的陣地。所有这些大肆叫囂的報紙, 不仅沒有报道过上述藍皮书的内容, 而且連藍皮书的出版也沒有提到过。

載于 1867 年 7 月 27 日“工人报”
第 18 号和 1867 年 7 月 27 日
“蜂房报”第 302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总委员会記錄簿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卡·馬克思关于国际工人协会 如何对待和平和自由同盟 代表大会問題的发言記錄⁴⁷⁸

摘自 1867 年 8 月 13 日总委员会會議記錄

公民馬克思呼請总委员会注意預定在日内瓦举行的和平同盟代表大会。他认为最好是让尽量多的代表以个人的資格出席这次大会；但作为国际协会的代表正式参加大会却不恰当。国际工人协会代表大会本身就是和平的大会，因为各国工人阶级的团结最終应该使各国之间的战争成为不可能。如果和平同盟的日内瓦大会的发起人了解这个问题的实质，他们就会加入国际协会。

目前欧洲大批军队的扩充是由 1848 年革命所引起的。龐大的常备軍是社会現狀的必然結果。現在保持常备軍不是用来进行对外战争，而是用来镇压工人阶级。⁴⁷⁹ 然而并不是随时都有供他们轰击的街垒和供他们枪杀的工人，因此，也有可能为了不致使士兵丧失打仗的本領而发动国际冲突。在这次大会上，不惜以任何代价来維持和平的人无疑将占多数。他们会乐于让俄国独掌对欧洲其余国家进行战争的手段。可是，有俄国这样的强国存在，就足以使其他一切国家有理由来保持自己的军队了。

某些法国激进派完全可能利用这个机会发表一些蔑視本国政府的言論，不过，如果这样的言論是在巴黎发表，那会产生更大的

影响。

那些拒絕参加改变劳資关系事业的人，他們忽視了普遍和平的实际条件。

載于1867年8月17日“蜂房报”
第305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总委员会記錄簿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向 1867 年 洛桑代表大会的报告⁴⁸⁰

一、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 年 9 月) 提交的任务

日内瓦代表大会责成总委员会完成以下任务⁴⁸¹：

(1)代表大会通过相应的决议委托英国代表对瑞士、法国和英国的邮政部门主管人采取必要的步骤，争取降低信件和印刷品的邮费率。

瑞士的部长同意代表团向他提出的各点，但他指出，法国政府反对在这方面进行任何的改革。

在法国，代表们没有得到邮政部门主管人的接见。

在英国，政府只同意接受一份叙述事实的报告。这份报告是总委员会写的，它至今还等待着答复。

(2)用几种文字出版代表大会的材料，并附上信件和报告。

(3)用几种文字出版定期的通报，报道所有能使国际协会感兴趣的问题；提供有关各国劳动问题的各种情报，并编写关于合作社和工人的社会状况的报告。

(4)总委员会还受托对劳动进行统计调查，其中包括对每个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所做的详细的和专门的报告，并包括一切文明国家。

为了使总委员会有可能完成这些任务，代表大会规定每个会员每年捐款 30 生丁，并规定每周付给总书记 2 英镑的报酬；总书记由总委员会任命。

在安排代表回国的工作时，总委员会获悉，在法国边境警察局暗探从茹尔·哥特罗那里抢走了一些重要文件。

总书记曾受托写信给法国内务大臣，要求归还这些文件。由于这封信没有得到答复，又向英国外交大臣提出请求。斯坦利勋爵向英国驻巴黎大使考莱勋爵发出有关此事的指示，要他尽力使这些文件归还原主。

几天以后，文件连同—捆“人民论坛报”归还了我们，显然这捆报纸是从另外一个人那里抢去的。

这一事件使总委员会出版代表大会资料的事推迟了几个月。

这些文件已经转交给小委员会，由它准备正式报告。

但是，由于总委员会无钱支付总书记的报酬，这项工作就落到了总委员会委员的肩上，虽然他们对事业忠心耿耿，足以在完成自己日常工作的同时完成这项工作，可是为此却花了很长时间。

在工作结束后发现，这个报告仅用一种文字印 1 000 份至少也需要 1 000 法郎。

为了完成代表大会的决议，总委员会必须立刻付出 3 000 法郎；而当时只有 22 法郎 90 生丁的存款。

总委员会向加入协会的英国团体发出了捐款的号召。

响应这一号召的只有伦敦的雪茄烟工人以及考文垂和瓦瑞克郡的织带工人。

我们认为有义务指出织带工人执行委员会在完成自己的义务时所表现的巨大热忱，尽管它没有存款，尽管它的大多数会员失业，它仍然向有工作的人进行了专门的募捐。

鉴于在法国以及其他国家已经没有任何可能出版代表大会的报告，总委员会接受了“国际信使”和“工人报”⁴⁸² 的编辑、公民科

勒的建議，把报告用法文和英文刊登在这两份周报上；此外，科勒还答应准备鉛版，把报告印成小册子，并且同总委员会分享全部盈利，虽然他已經預先承担了一切亏损。

当这两种周报刊出了关于出版日内瓦代表大会的資料的广告时，几年以来从未对这类印刷品加以任何阻撓的英国政府，却采取了要公民科勒交两笔共計数千法郎的押金的手段，来阻止这个报告的出版。这项手續使报告的出版拖延到3月9日。后来公民科勒从可靠的方面得知，这一事件是法国政府的干預造成的。

把这一事件同沒收巴黎代表的报告⁴⁸³对照一下，可以清楚地看出，法国政府对国际协会抱什么样的态度。

刊登报告的那几号“国际信使”免費分送給协会的全体通訊員。总委员会不得不放棄把报告譯成德文的工作，因为它沒有任何可能去从事这一工作。

整篇报告的鉛版虽然已經制好，但是由于資金不足，直到現在还未能把它印成小册子，而我們的全体通訊員都坚决要求把它印成小册子。

为了克服这些困难，总委员会的一个委員墊付100法郎出版了1000份印有基本章程和条例的會員证；寄出去的800份會員证被法国警察当局沒收。这项損失使总委员会的处境更加困难，因为各方面已經在要求它偿还1865—1866年欠下的1000多法郎的債務；尽管日内瓦代表大会承担了对这项債務的集体責任，但它並沒有指出偿还債務的任何实际办法。

在这样的情况下，总委员会就沒有任何可能按照代表大会的决定出版什么报告或定期通报。因此不得不放棄1867年的統計調查工作，因为要使这项調查实际上带来好处，就不能把調查局限

于加入协会的团体，而应当包括各地的一切生产部门。总委员会在目前所处的财政状况下，不可能完成这项需要花费很长时间和大量资金的工作。

二、国际工人协会在资本和劳动斗争中的作用

协会在许多国家发生的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各种搏斗中所提供的多次帮助，完全可以证明这样一个组织是必要的。每当工人拒绝接受英国资本家恣意加给他们的条件时，资本家就威胁他们，要用从大陆运来的工人代替他们。运工人进来的可能性曾不止一次地迫使工人让步。由于总委员会的活动，这样的威胁已经不像从前那样公开地进行了。现在，如果发生这类事情，只要稍微暗示一下，就足以使资本家的计谋落空。在加入协会的团体中不论发生罢工或是遇到同盟歇业^①，各国的工人能够立刻得到关于所发生的情况的通知，这样他们就能够预先提防资本家代理人的招募。这一活动并不限于在加入协会的团体内进行，因为协会对于一切请求帮助的团体都给予帮助。

有时资本家也能诱骗某些消息不灵通的工人；但是一旦向他们说明他们的权利和义务，他们就立刻放棄工作。

在资本看来，工人不过是能生产的机器而已；最近对伦敦编筐工人采取的同盟歇业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事情是这样。伦敦的编筐业主向自己的工人宣布，他们必须在三天之内解散自己的团

^① 英国人这样称呼业主们关闭工厂的行动。

体,并且同意降低工資,否則,三天之后工厂的大門就要关闭。被这种蛮横行为激怒了的工人宣布他們拒絕这些条件。这一点业主們已經預料到了;他們的代理人已經到比利时去了一趟,并且从那里带来了工人…… 他們把这些工人赶到倫敦一个区(百蒙得錫区)的铁道大桥的桥拱下面;这些工人必須在这里做工、吃飯和睡觉,为了避免同其他工人有任何接触,不許他們走开一步。但是总委员会終于冲破了业主們建立的防疫綫,并且用軍事的机智潜入比利时工人中。第二天,这些工人一认清自己的义务,他們从倫敦編筐工人协会那里領到对時間消耗的补偿之后,就返回比利时去了。正当他們动身走的时候,又来了一艘載滿工人的輪船,但是这一次我們能够見到了他們,于是他們就乘下一班輪船回祖国去了。在这以后业主們再也沒有能够找到新的工人,結果不得不一切照旧。⁴⁸⁴

由于总委员会向英国的一些团体提出呼吁,巴黎的銅匠在罢工的时候得到了这些团体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支援;另一方面,倫敦的裁縫也得到了大陆工人同样的支援。

总委员会也同样成功地参与了挖土工人、制篩工人、理发师、鍍鋅工人和木刻工人的罢工。

三、英国支部

(一)宣 傳

如果說在英国沒有像去年那样积极地进行宣傳工作,这很容易用下面的情况來說明:政府从来沒有主动采取某种开明的措施;只有在长期的鼓动把人民群众发动起来之后,它才会在他們的压力下让步。这一点可以从选举改革問題和在公园举行群众大会

的权利問題⁴⁸⁵ 得到证明。

英国工人公正地认为选举权問題有巨大的意义；他們付出自己的時間和精力去組織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这些示威游行的道义力量影响着政府，迫使它滿足人民的要求。

在工人以全副精力維護自己的公民权利的时候，总委员会不可能把他們的注意力吸引到他們认为在遙远的将来才能解决的社会問題上去。

在宣傳工作方面本来應該給予我們最大帮助的总委员会的英国委員們，对于我們发起的而应当由他們来领导的这个运动不能袖手旁观。他們的努力贏得了胜利的結局，1867 年将永远載入英国工人階級的史册。

尽管由于上述原因而没有像預期那样积极地进行宣傳，但是宣傳工作一刻也沒有中斷。工人团体加入协会所必需的手續耗費很多時間。工联組織所固有的民主不允許各执行委员会不經過所有分会的預先討論就对任何重大問題作出决定。

要使某一团体加入协会，必須遵循下面的手續。向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請，并論述理由。委员会确定接見代表团的日期。如果問題需要討論，委员会就把它轉交給各个分会去研究，这样就不得不等待一个月、两个月，有时甚至三个月才有結果。由此决不能得出結論說，只有这个团体的委员会才能接受或者拒絕申請；分会往往是在沒有委员会参与的情况下加入国际协会的。

日内瓦代表大会以来，有 20 多个大的工人团体很好地接待了总委员会的代表团；总委员会天天期待着結果。其他一些团体把加入协会的事情延到更适当的时机，只有一个团体拒絕加入，其理由是国际工人协会干預政治問題。

(二) 捐 款

这个问题总委员会研究了很久。当这个问题还在讨论的时候，泥水匠执行委员会加入了协会，并决定每年捐款1英镑。

1865年3月总委员会派代表团参加英国鞋匠代表会议，会议一致通过了北明翰和赫尔的代表提出的下述决议案：

“代表会议赞同国际协会的原则，宣布加入协会，并邀请全体出席的会员用最大的努力宣传协会的原则。”

捐款问题曾经提出过但是没有得到解决。不久总委员会决定，每个加入协会的团体将发给一份入会证明书；入会的团体应交纳5先令^①的入会费；至于各个团体能给总委员会多少金钱上的帮助，则由这些团体自己酌情决定。^②

各个团体捐献的钱，则用于抵偿总委员会在派送出席日内瓦代表大会的代表团方面的开支。

鞋匠委员会为此交纳了5英镑。

为了把这个问题条理化，总委员会建议对每个会员捐款的数额作出统一的规定。

日内瓦代表大会规定每年捐款的数额为30生丁。

这项高额的捐款对于总委员会在代表大会以后派往英国工人团体去的那些代表团来说是一个不可克服的障碍。

因此，总委员会在10月9日的会议上决定把每年的捐款减少到5生丁。鞋匠协会(Amalgamated Cordwainers Association)通知我们，1867年的代表会议废除了1865年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

① 1先令等于1法郎25生丁；1英镑等于25法郎；1辨士等于10生丁。

② 见本卷第579—580页。——编者注

每年捐 5 英鎊的決議。

泥水匠执行委员会在 1867 年也同在 1866 年一样，捐給我們 1 英鎊，但是它还没有通知我們是否整个泥水匠协会都加入了。

鞋匠协会去年有 5 000 名會員，泥水匠协会有 3 000 至 4 000 名會員。

总委员会曾两次向所有加入协会的团体发出关于 1867 年捐款的呼吁。有些团体交納了，其他团体还没有交納；但是，除了鞋匠协会以外，没有一个团体規避自己的义务。

木工和細木工联合会不久前通过了每年向总委员会交納 2 英鎊捐款的决定。目前这个协会的各个分会正在討論是否整个协会都加入国际协会的問題。这个协会拥有 9 000 多名會員，它的分会遍布英国，在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也有它的分会。

現在我們把在英国加入协会的团体名单，以及它們在上次代表大会以后一年內交款的总額列表如下。

不列顛支部交款总額

	1866 年			1867 年		
	英鎊	先令	辨士	英鎊	先令	辨士
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	2	—	—	—	—	—
在倫敦的法国人支部.....	—	—	—	—	4	9
波兰流亡者的中央支部.....	—	—	—	—	4	10
泥水工人执行委员会.....	—	—	—	1	—	—
泥水工人第一分会.....	—	8	—	—	—	—
細木工(联合会).....	10	—	—	1	13	4
細木工(倫敦西头).....	5	—	—	1	7	—
裝訂工人.....	—	8	3	—	17	6
制桶工人.....	6	—	—	—	6	—
鞋匠执行委员会.....	5	—	—	—	—	—

	1866 年			1867 年		
	英鎊	先令	辨士	英鎊	先令	辨士
鞋匠支部(达林敦).....	—	5	—	—	—	—
鞋匠支部(諾定昂).....	—	5	—	—	2	1
雪茄烟工人.....	5	—	—	1	9	—
考文垂的織帶工人.....	—	5	—	1	9	—
制箱工人.....	1	5	4	—	—	—
肯达耳的鞋匠.....	—	5	—	—	1	8
女鞋鞋匠(倫敦西头).....	6	—	—	—	10	—
倫敦的縫紉工人.....	3	—	—	—	—	—
达林敦的裁縫.....	—	5	—	—	1	8
代表大会后加入的团体	入 会 費			捐 款		
倫敦編筐工人.....	—	5	—	—	—	—
郎卡郡的印染业工人.....	—	5	—	2	1	8
倫敦的馬車制造工人.....	—	5	—	—	—	—
在“地球仪”飯店集会的馬車帷幔 制造工人.....	—	5	—	—	1	10 ¹ / ₂
在“王冠”飯店集会的上述工人.....	—	5	—	—	5	—
織工(彈性織品).....	—	5	—	—	5	—
联合起来的挖土工人.....	—	5	—	—	—	—
木器打磨工人.....	—	5	—	—	—	—
風琴工匠.....	—	5	—	—	2	1
画匠和木刻工人.....	—	5	—	—	—	—
木工执行委员会.....	—	—	—	2	—	—
联合起来的制革工人.....	—	—	—	—	—	—
白铁工人.....	—	—	—	—	—	—

为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团的捐款总额

	英 鎊	先 令	辨 士
女鞋鞋匠(倫敦西头).....	4	10	—
倫敦雪茄烟工人.....	1	1	—
織工(彈性織品).....	1	—	—

两年来在捐款总额上的差别可由下面的情况来说明：1866 年捐款用于代表们赴日内瓦的旅费，而今年捐款只用于组织方面的开支。

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去年我们欠下了债，总委员会在现款许可的情况下偿还了一部分。

为什么有些加入协会的团体还没有捐款，而另外一些还没有决定交款来抵偿代表大会的开支，原因是生产的停滞，频繁的罢工和同盟歇业，特别是选举法改革运动；最后，是因为伦敦裁缝的罢工用尽了当时工联的资金。

总委员会从各团体那里收到的许多信件都证明了这种情况，它们由于没有能给予我们经济援助而表示歉意。

四、大陆上的和美国的支部

法 国

总委员会的任务包括同例如像法国那样一些国家的独立分部通信，因为在那里限制性的法律不许可无阻碍地建立活动中心。

前面已经说过，总委员会想把印有国际协会章程和条例的会员证运进法国的一切尝试，都由于法国当局的行为而遭到失败；他们没收了我们的东西，尽管没有任何理由能解释这种犯罪行为。但是，法国当局所制造的障碍决不止于此。我们的通讯员请求允许印发我们的章程和条例也白费力气；他们唯一的答复总是最坚决的拒绝。

里昂委员会在 1866 年召开了数次会议，出席会议的有 500 多名会员，而在日内瓦代表大会以后，它没有得到召开全体会议的

許可。

結果是，里昂的會員在當權人物面前表現的英勇不屈精神，甚至使瞎子也能清楚地看出法國政府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希望工人得到解放。

應當指出這樣一種驚人的情況：這些障礙，這些無理取鬧，一分一秒也沒有阻擋住我們的協會取得勝利。

在維恩(伊澤爾省)本來只有 80 名會員，現在有 500 多名了。

在索恩河岸紐維耳，我們的一個分部成立了一個消費合作社，這樣便吸引了農業工人實際地參加到社會生活中來，而從前人們硬說農業工人不喜歡這樣做。

我們駐卡昂的通訊員報道說，這個城市里的工人聯合會日益鞏固。由於這種團結一致，馬具匠、機械工人、制革工人、鞍匠、鐵匠以及其他部門的工人爭取到了在不降低工資的情況下把工作日縮短一小時。

在菲沃(羅訥河口省)，國際協會擁有大量的礦工會員，他們不久前的罷工引起了很大的震動。

今年 8 月 5 日總委員會获悉在菲沃也組織了委員會。我們把這一勝利歸功於馬賽委員會委員公民瓦瑟爾的勇敢的宣傳，他在今年 7 月 21 日給我們的信中寫道：

“資本和勞動之間正在進行鬥爭，這是一場可悲而又可笑的鬥爭：一邊是一幫官吏和職員到處進行宣傳，企圖引誘工人離開國際協會，另一邊是幾個精力充沛和忠心耿耿的人堅持不渝地反擊我們的敵人的逼攻，並在工人隊伍中傳播獨立和正義的思想。”

他在結尾時補充道：

“任何人力都不能鏟除我們在國內培植起來的解放思想，因為我們的敵

人不得不同两种难以克服的力量作斗争：同权利和意志作斗争。”

最后，工人懂得：**有志者，事竟成**，只有依靠自己本身，才能取得自己彻底的政治解放和社会解放。

现在我们把在上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就有的分部，以及它们在 1866 年和 1867 年交款的总额列表如下。

	交款总额				交款总额		
	英镑	先令	辨士		英镑	先令	辨士
巴黎.....	4	—	—	格朗维耳.....	—	—	—
卡昂.....	1	—	—	阿尔让唐.....	—	—	—
里昂.....	11	12	—	代表大会后新 成立的分部			
波尔多.....	3	9	—				
卢昂.....	—	4	5				
瓜德罗普岛.....	—	—	—	巴黎的装订工人.....	—	14	4
维恩.....	5	7	6	卡斯特尔诺达里.....	—	—	—
索恩河岸纽维耳.....	1	5	3	奥希.....	—	—	—
邦丁.....	—	—	—	奥尔良.....	—	—	—
圣丹尼.....	—	—	—	南特.....	—	—	—
皮托.....	—	—	—	维耳夫朗舍.....	—	—	—
訥夏托.....	—	—	—	马赛.....	—	—	—
利济厄.....	—	—	—	菲沃.....	—	—	—
努瓦尔河岸孔德.....	—	—	—	哈佛尔.....	—	—	—
阿尔库尔-土里.....	—	—	—	阿尔及尔.....	—	—	—

瑞 士

我们从瑞士只收到了中央委员会的书面报告。在那里也像在英国一样，国际协会的工作是吸收工人团体，也尽可能多吸收单个的人。不过应当看到，在瑞士每个工人团体的人数比英国的少。

成立分部的城市有：日内瓦、卡鲁日、洛桑、斐维、蒙特勒、纽沙特尔、拉绍德封、勒-洛克尔、圣克卢阿、圣伊米耶、桑维耳耶、比

恩、穆蒂埃、博庫尔、苏黎世、韦戚康、巴塞尔、伯尔尼、特腊美兰、布律吕和勒-布瓦。

1866 年和 1867 年从这些分部收到的錢

	交 款 总 額		
	英 鎊	先 令	辨 士
日内瓦(罗曼語区支部).....	4	—	—
日内瓦(德語区支部).....	1	7	9
拉紹德封.....	2	4	—
勒-洛克尔	—	17	10

比 利 时

比利时通訊書記对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报告
公民們：

我和比利时的通信是从編筐工人罢工的时候开始的。关于这件事情我曾写給公民**万丹胡亭**一封信，一星期后这封信在“人民論壇报”上刊登出来。⁴⁸⁶我以总委员会的名义通知他关于編筐业主的代理人从倫敦出发去招募比利时編筐工人的事。我在信中告訴他，必須用我們組織的力量去粉碎这个代理人的計劃，而且为了表示团結一致，比利时工人必須拒絕任何招募，以便保证自己的英国弟兄获得胜利。

接着我又告訴公民**万丹胡亭**有几个比利时編筐工人返回祖国了，他們是由于相信了业主們后来并未兌現的諾言而到倫敦来的；我还向他述說了英国編筐工人的兄弟情誼。在信的結尾我着重指出，总委员会的活动对于工人战胜业主起了多大的促进作用。

关于日内瓦代表大会报告的出版問題我曾和公民**布里斯美通**

过信。这次通信没有任何结果，因为我按总委员会的指示向他请求贷款，而这是他所不可能提供的。我最近写的一封有关此事的信没有得到答复；显然，对公民布里斯美（他的忠诚是尽人皆知的）来说，正式拒绝我们是非常难堪的；我认为这就是他沉默的原因。

我把总委员会关于比利时雪茄烟工人的信寄给了公民万丹胡亭，请他加以广泛的宣扬；对总委员会关于沙皇到巴黎的决议⁴⁸⁷，我也是这样处理的。我把总委员会关于伦敦裁缝罢工的决议通知了布鲁塞尔局，决议中建议比利时的裁缝无论如何都不要到伦敦那些发生罢工的工厂中去工作，并希望全体比利时工人发挥团结精神，给予伦敦裁缝以物质支援。

我把总委员会关于洛桑代表大会的通告^①按照郊区圣吉耳 6 号这个地址寄给列日的公民德·维特，并寄给布鲁塞尔的公民万丹胡亭，请求他们以最大的注意力对待这个通告并且尽量广泛地传播它。

总而言之，我完成了总委员会指定我做的一切，而且敢于说我一次也没有收到来自比利时的任何责难。我把收到的几封信附在这个简短的报告后面。至于通信的费用，我认为完全可以把它作为对协会的一点捐助。

敬礼和兄弟情谊

貝 森

德国和意大利

在德国，情况还不正常，而且不甚有利于我们协会的发展。但

① 見本卷第 606—609 頁。——編者注

是，日内瓦的德国人支部的主席公民約·菲·貝克尔却在那里建立了几个分部，目前我們还没有得到有关这些分部的詳細报道。

在意大利，那不勒斯、米兰和热那亚的工人团体已經办理过組織手續；我們同这些团体有通信联系，但是还没有收到它們的任何捐款。

美 国

在美国有两个新的組織加入了国际协会；我們同 *Labour National Union's Committee*（全国劳工同盟的委员会）通信，也同 *International Ironmoulder's Union*（国际鑄工联合会）的主席通信。⁴⁸⁸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美国通訊書記的年度报告
(1866年9月—1867年8月27日)

我担任美国通訊書記这个职务以来的第一个事件是在英国收到了1866年9月份的一期“鑄工国际报”，該报在費拉得尔菲亚出版，出版者W. H. 西耳維斯同时也是国际鑄工联合会的主席。

这一期刊載了上个月在巴尔的摩召开的美国工人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詳細报告。这次代表大会的記錄和決議的摘要刊登在1866年10月份的倫敦“共和国”周报上。从报告中可以看出，巴尔的摩代表大会在得知旧大陆的工人即将在日内瓦举行类似的代表大会之后，便一致决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成立的**全国劳工同盟**的执行委员会有全权派代表参加1867年的欧洲工人代表大会，即洛桑代表大会。

我从这份报上知道，担任**全国劳工同盟**的国际联系書記的是

公民威廉·基卜生，据说他住在康涅狄格州的紐黑文。直到今年 8 月初我才知道，公民基卜生的住址被弄错了，他不是住在紐黑文，而是住在諾里奇（康涅狄格州）。代表大会报告编写者的这个错误在我的活动中几乎成了不可挽回的错误。

但是，我没有想立刻同书记基卜生通信，因为我认为在开始同他通信时最好把关于日内瓦代表大会工作的正式报告寄去。关于这个报告迟迟不能发表的原因，在总委员会的总的报告中已经说过了。

1866 年 12 月初，与总委员会建立了较密切的联系的公民奥尔西尼，把住在纽约的五个欧洲社会主义者的姓名通知我们，并请求我们同他们通信。他还请求发给他们委托书，委托他们在美国进行利于协会的活动。

已经把信连同相应的委托书寄给了奥尔西尼所说的那五个公民；但是不论我还是总委员会都没有收到这些信的任何复信。

这样，我的第一次尝试没有成功。可是奥尔西尼通知总委员会说：在纽约人们开始很关心我们的协会；有名的演说家，马萨诸塞州的废奴主义者温德耳·菲利浦斯曾建议举办一些收费的公开讲演来资助我们的协会，因为他深信，协会的宗旨及其领袖应当得到这样的援助。

奥尔西尼还说，爱尔兰的民主主义者和爱国者詹姆斯·斯提芬斯在纽约加入了我们的协会。

1867 年 3 月，关于日内瓦代表大会工作的报告开始用英文连载在伦敦的“国际信使”上。刊登这份报告的 4 期“国际信使”一出来，也就是在 4 月，我就把这四期寄给了下面四个人：一份按照所设想的住址寄给了书记基卜生，另一份寄给 W. H. 西耳维斯，第

三份寄給在波士頓（馬薩諸塞州）出版的忠于工人利益的日報“呼聲報”的編輯，第四份寄給芝加哥（伊利諾斯州）“工人辯護士報”⁴⁸⁹的編輯，該報是美利堅聯邦西部各州工人的主要機關報。我在寄給書記基卜生的那幾份報中附上一封信，信中指出總委員會非常重視同**全國勞工同盟**的密切接觸和經常聯繫。

這封信沒有回音，我也無法證實報紙是否收到了。這次失敗的原因非常簡單：信和報紙沒有寄到諾里奇，而是寄到了紐黑文。

寄出這些文件只得到了一個好的結果。倫敦報紙“國際信使”的編輯從5月起開始收到芝加哥報紙“工人辯護士報”，這兩家報紙之間建立起了互換報紙的關係。從此“國際信使”的編輯約瑟夫·科勒每周都從芝加哥報紙“工人辯護士報”上摘錄一些東西報道給自己的讀者。

關於日內瓦代表大會工作的報告已于5月1日全文刊登完畢；報告的後一部分我也按照上面所說的四個住址分發出去。

這個報告的摘要轉載在芝加哥報紙“工人辯護士報”上。我無法知道其他兩家報紙中是否有一家刊登了報告的摘要以及它們是否對此表示過意見。

在春天這段時期內，總委員會根據里昂局的書面請求研究了關於大批絲織工人可能從里昂遷到美國去的問題。里昂局告訴我們，許多紡織工人不滿意自己在祖國的命運，他們希望遷到美國去，並且把自己的生產工具也搬到那里去。但是他們想知道，美國的資本家有沒有人願意給他們墊付搬家費和購置最需要的日常用具的費用。總委員會立刻委托我向幾家美國報紙的編輯部和幾個政府人員談談這個問題。我執行了這一指示。信件是由一個去紐約的姓科切克的波蘭人捎到美國去的。這一次又沒有任何回音！

科切克走后我从他那里没有得到任何消息。

6 月間总委员会托我写信給 W. H. 西耳維斯，請求他帮助正在罢工的倫敦裁縫。6 月 11 日我写了信。借此机会我向西耳維斯表示，我由于沒有收到書記基卜生的任何复信而感到煩惱。我請他告訴我**全国劳工同盟**委员会的任何其他委員的姓名和住址。

6 月 25 日西耳維斯在复信中告訴我为什么美国五金工人不可能帮助罢工的倫敦裁縫。他还把住在紐約的**全国劳工同盟**的积极活动家威廉·約·杰塞普的姓名和住址告訴了我。

我一把这封信报告給总委员会，总委员会就委托我赶紧把洛桑代表大会的开会日期通知威廉·杰塞普，并且告訴他总委员会将因在洛桑見到美国代表而感到荣幸。我根据委托于 7 月 19 日写了信。信中讲述了我想和書記基卜生建立联系而毫无效果的情况，同时寄給杰塞普一份关于日内瓦代表大会的正式报告。

我收到了这封信的复信，复信的日期是 8 月 9 日。从这封复信中可以看出，杰塞普对于同大陆的和**大不列顛**的工人建立联系的建議表示滿意。他对于因弄錯書記基卜生的住址而造成的耽擱感到遺憾。他同样感到遺憾的是，在芝加哥召开代表大会的日期（8 月 19 日）同預定的召开洛桑代表大会的日期如此接近，以至于因時間不够而不可能派代表到欧洲来。然而我不久前在芝加哥報紙“工人辯护士报”上讀到的一篇文章中說，关于派代表到洛桑去的問題将是在芝加哥代表大会上提出的首要問題之一。

杰塞普答应，“鉴于它的重要性”，他要向芝加哥代表大会宣讀我 7 月 19 日的信，并且要把刊登关于芝加哥代表大会的精彩报道的報紙寄給总委员会。他希望今后仍和总委员会通信，即使将来改选后他不再担任**全国同盟**副主席也是一样，因为除了这个职务

他还担任紐約工人联合会⁴⁹⁰的通訊書記。他接受我关于互換工人階級的机关报的建議。以上就是我对他那封有趣的亲切的信的内容所作的簡短而不全面的轉述。

本月初公民馬克思把弗·阿·左尔格的一封信交給我，信中說在新澤西州的霍布根成立了我們协会的分部。⁴⁹¹

大約与此同时，倫敦報紙“国际信使”的編輯給我看了一份以小册子形式出版的**全国劳工同盟**执行委员会致美国工人的号召书，号召书中邀請工人派代表参加芝加哥代表大会。在这本小册子的封面上我发现了書記威廉·基卜生亲笔写的姓名和住址，这时我才恍然大悟，过去我所知道的他那个住址是錯誤的。我很惋惜由于这个錯誤而耗費的寶貴時間，只好用一句俗語来安慰自己：“晚知道总比不知道好”。

这就是我所作的各种嘗試的經過，到目前为止几乎没有什么成果。但是我仍然希望在将来事情会有良好的結果。

現在还有两个問題应当談一談。

美国工人为爭取更多空閑時間所作的努力(即大家聞名的“八小时工作日运动”)吸引了日內瓦代表大会的注意。因此我认为不妨非常簡短地、概括地重复一下我所知道的去年一年在这方面获得的成果。鼓动工作开展得很快，而且立即在华盛顿国会上和某些州的立法議会上得到了反应。关于在联邦政府举办的工程中实行八小时工作日的法案，在联邦众議院仅仅遭到半数票的反对。

某些州的立法議会規定，如果没有特殊的合同，工作日不得超出八小时。在紐約州也通过了这样的法律，但是紐約的工人暂时还没有敢于要求它付諸实现。不久以前这个州的工人举行了一次特別代表大会，討論在目前情況下他們所应遵循的策略。結果决

定，各地将在今年 11 月 1 日同时提出实现这一法律的要求，尽可能不降低工资，但是，如果有必要降低，就降低。若从辩论的情况来判断，大多数代表同意降低工资。

在加利福尼亚州还没有通过八小时工作日的法律。但是在今年 7 月以前的 19 个月当中，实际上在那里占优势的是八小时工作制。根据最近来自这个州的消息，业主们宣布同盟歇业来反对这个新制度，这些反动企图的后果是许多企业停工。

很高兴告诉总委员会，从明年 1 月 1 日起，普通信件的邮资将降低一半，也就是从 1 先令降到 6 辨士。我所说的仅仅是联合王国和合众国之间的通信。关于这一点两国政府刚刚签订了合同。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美国书记 彼得·福克斯

五、总 論

上次代表大会之后的一年是在资本和劳动之间不断进行斗争的标志下度过的：在美国、英国、法国、比利时不断地发生罢工、同盟歇业和迫害工人的事情。

资本顽强而残暴地迫害工人，因为它本能地感觉到，劳动占据理当属于它的位置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在美国有一个团体为了维护自己存在的权利不受资本的侵犯，曾花费了 70 000 美元。⁴⁹²

在英国 *Courts of Law* (法庭) 曾通过一项决议：盗用工联的基金可以不受惩罚。成立了一个官方的工联调查委员会，目的是要消灭工联，或者至少是限制它们的活动。

最近伦敦裁缝业主对工人提起的诉讼案件，在巴黎对缝纫工

人的判决，在馬尔希延（比利时）对矿工的屠杀——所有这些事实清楚地表明，社会只是由两个相互敌对的阶级即压迫者和被压迫者构成的，只有全世界工人的团结才能使我们走向彻底的解放。工人的彻底解放也正是国际工人协会所竭力追求的目的。

最后让我们高呼：“全世界的工人们，让我们联合起来！”

代表总委员会：

主 席 奥哲尔

总 书 記 埃卡留斯

财务委员 威·德尔

财务书记 肖

通讯书记：

欧·杜邦（法国）

卡·马克思（德国）

扎比茨基（波兰）

海·荣克（瑞士）

彼·福克斯（美国）

貝森（比利时）

卡特（意大利）

保·拉法格（西班牙）

汉森（丹麦）

起草于 1867 年 8 月下半月

载于小册子“向 1867 年 9 月 2 日至 8 日在洛桑举行的工人代表大会宣读的报告” 1867 年拉紹德封版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小册子“向 1867 年 9 月 2 日至 8 日在洛桑举行的工人代表大会宣读的报告”译的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燕妮·馬克思 1867 年 10 月 5 日左右 給約·菲·貝克尔的信的摘录⁴⁹³

在我們的一位倫敦朋友的來信中，談到了洛桑的工人代表大會和日內瓦的和平代表大會，也談到了馬克思的最近的著作，這裡我們摘錄如下：

“……您簡直不會相信，洛桑代表大會在這裏的整個報界中引起了多么大的轟動。自從‘泰晤士報’帶頭每天刊登關於代表大會的通訊稿件以後，其他各報也開始不僅以短文、而且甚至用長篇的社論來談論工人問題，不再認為這有損它們的尊嚴了。不僅所有的日報談論代表大會，而且所有的周刊也都談論這件事。當然，其中有許多是以傲慢和譏諷的態度來談論代表大會的。然而，任何事情不是除了莊嚴的一面，都還有它喜劇性的一面嗎？那末為什麼我們這個良好的工人代表大會及其愛說話的法國人應當完全例外呢？可是不管怎樣，總的來說，對待代表大會的態度還是十分有禮貌的，人們還是 *au sérieux* [認真地] 來看待它的。甚至屬於約翰·布萊特和曼徹斯特學派的機關報‘曼徹斯特觀察家’⁴⁹⁴ 也在一篇很好的社論中把它說成是一個重要的和具有巨大意義的事件。當人們把它同它的異母兄弟和平代表大會⁴⁹⁵ 作比較時，這種比較總是有利於哥哥的，如果說在人們眼中一個是有威脅性的不可避免的悲劇，另一個就只不過是趣劇和滑稽劇罷了。

如果您已經得到卡尔·馬克思的书⁴⁹⁶，我建議您（要是您也像我一样还没有彻底领会开头几章的辯证的奥妙之处的話）先讀讀有关資本的原始积累和現代殖民学說的几章。我相信，您也会同我一样，从这几章中得到极大的滿足。当然，馬克思沒有医治我們社会的膿血进流的創伤的任何現成的特效药（現在也以社会主义自許的资产階級世界正在大声叫卖这种特效药），沒有任何丸药、药膏或紗布；然而我以为，他从現代社会产生的自然历史过程中得出了实际結果和运用这些結果的方法，直到做出最大胆的結論；这是一件很不簡單的事情——利用統計数字和辯证方法把吃惊的庸夫俗子引导到下述原理的令人头晕的高度：‘暴力是一切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接生婆。它本身也是一种經濟力…… 今天在美国的許多身世不明的資本，仅仅在昨天都还是在英国資本化了的儿童血液…… 如果……貨幣“生来就在一頰带有血痕”，那末新生的資本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渗透着血污…… 資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响了……’⁴⁹⁷ 一直到底。

应当坦率地說，这种朴实得惊人的热情深深地吸引了我，历史对我來說已經像太阳光那样明亮了。”

燕妮·馬克思写于1867年10月5日
左右

載于1867年10月“先驅”杂志
第10期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先驅”杂志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卡·馬克思关于爱尔兰問題的 的报告的記錄

(1867年12月16日在倫敦德意志工人
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所作的报告)⁴⁹⁸

12月16日，卡尔·馬克思在倫敦工人教育协会就爱尔兰的情况作了发言，說明过去若干世紀中英国政府企图把爱尔兰居民英国化的一切尝试都毫无結果。在改革以前就移居爱尔兰的英国人，包括貴族在內，由于和爱尔兰妇女結婚，也变成了爱尔兰人，而他們的后代則起来反对英国。伊丽莎白女王时对爱尔兰人进行殘酷的战争，毀坏庄稼，为了把土地让給英国移民而迫使居民东移西迁，但这一切并没有改变这种情况。那时，gentlemen〔紳士〕和merchant adventurers〔冒險的商人〕在英国人进行殖民的条件下，获得了大块大块的土地。在克倫威尔的时候，这些殖民者的后代就曾和爱尔兰人一起反对英国人。克倫威尔把他們許多人卖到西印度去作奴隶。在复辟王朝时期，爱尔兰受到了各种优待。在威廉三世的时候，掌握政权的是只知道賺錢的階級，而为了迫使爱尔兰人无论如何都将原料卖給英国，爱尔兰的工业也被毀灭。女王安在位时，新兴的貴族利用新教的惩治法⁴⁹⁹获得了行动的自由。爱尔兰議會⁵⁰⁰是压迫的工具。凡是天主教徒，都不能任公职，不許置地产，不能立遺囑，不許接受遺產；担任天主教主教的职务被

认为和叛国同罪。这一切都是掠夺爱尔兰人土地的手段；但奥尔斯脱的英国人后裔仍然有半数以上是天主教徒。人民被赶入天主教的怀抱，天主教也就因此获得了力量。英国政府所唯一做到的，是在爱尔兰培植了贵族。英国人所建立的城市成了爱尔兰的了。因此，在芬尼亚社社員中可以看到那么多的英国名字。

在美国独立战争的时候，对爱尔兰的压迫略有减轻。在法国革命的时候，不得不作进一步的让步。爱尔兰很快就抬起头来，以致英国人感到有被爱尔兰居民所超越的危险。英国政府挑起了爱尔兰人的起义，并且通过收买达到了合并。⁵⁰¹ 合并给刚刚复苏的爱尔兰工业带来了致命的打击。米格尔有一次曾经说：爱尔兰的所有工业部门都被消灭，我们剩下的只有棺材的生产了。拥有一块土地成为生存的必要条件；大土地所有者把土地租给投机者；在土地到农民手里以前，它先得经过四五层租约；因此，土地的价格大大上涨。农民的食物只有马铃薯和水，小麦和肉类都运往英国去了；地租在伦敦、巴黎和佛罗伦萨被挥霍掉。1836年寄给居住国外的土地所有者的款项共达700万英镑。除了产品和地租，连肥料也输出国外；土地贫瘠了。局部的饥荒常常发生，而1846年的马铃薯病害更引起了全面的饥荒。数以百万计的人饿死。马铃薯病害是地力耗竭的结果，是英国统治的产物。

由于谷物法的废除，爱尔兰丧失了在英国市场上的垄断地位，过去那样的地租已经支付不了。高昂的肉价以及残存的小土地所有者的破产，加速把小农逐出土地，把他们的土地变为放羊的牧场。从1860年以来，有50万英亩以上的可耕地停止耕种。每英亩土地的收获量减少了：燕麦减产16%；亚麻减产36%；马铃薯减产50%。目前，给英国市场种植的只有燕麦，而小麦则要输入。

随着地力的耗竭，居民的体质也恶化了。在人口减少的情况下，跛子、盲人、聾哑人、精神病患者的绝对数字却增加了。

110 多万人为 960 万只羊所排挤。这在欧洲是聞所未聞的！俄国人是用俄国人来代替被迁走的波兰人，而不是用羊来代替。只有在蒙古人統治下的中国曾經討論过毁灭城市以便騰出地方来放羊的問題。

因此，爱尔兰問題不单纯是个民族問題，它是一个土地問題，生存問題。不革命，即灭亡，这就是当前的口号。所有爱尔兰人都深信，如果应该有所行动的話，那就得立即动手。英国人应该要求爱尔兰分离，让爱尔兰人自己去解决土地所有制問題。別的一切措施都是无益的。如果这不能在最近的将来实行，那末爱尔兰的移民会引起一場对美国的战争。目前对爱尔兰的統治乃是替英国貴族榨取地租。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埃卡留斯的手抄稿譯的

卡·馬克思关于在 資本主义制度下使用机器的 后果的发言記錄⁵⁰²

摘自 1868 年 7 月 28 日总委员会會議記錄

馬克思揭开了关于“資本家使用机器的影响”問題的辯論。他說，使我們最为惊奇的是，使用机器的結果竟同人們原来认为必然会产生的一切截然相反。劳动時間沒有像所期望的那样縮短，工作日反而延长到 16—18 小时。从前，一个工作日通常是 10 小时；而近百年来，無論在英国还是在大陆，劳动時間都通过立法手段而延长了。近百年来工厂立法的全部实质，就在于依靠法律的力量来强迫工人多工作几小时。

只是到 1833 年，儿童的工作日才被限制为 12 小时；由于过度的劳动，根本沒有发展智力的時間。他們的身体也发育不良；流行病在他們中間逞凶肆虐，这迫使某些統治階級的代表人物也不得不来研究这个問題。老罗伯特·皮尔爵士就是最先注意到这种严重的禍害的人物中的一个，罗伯特·欧文則是第一个在自己的工厂里实行限制工作时数的厂主。十小时工作日法案是第一个把妇女和儿童一天的劳动時間限制为 10 ½ 小时的法律，但是这一法案仅仅在某一类工厂里得到推行。

这算是前进了一步，因为它使工人有了較多的自由時間。至

于說到产品的縮減，則这很快就得到了补偿。由于机器的改进和工人劳动强度的提高，現在在縮短了的一个工作日里較以前冗长的工作日里做出了更多的活。人們重新担負着过度的劳动，于是，很快就产生了把工作日限制为 8 小时的必要性。

使用机器的另一后果，是把妇女和儿童驅入工厂。这样妇女就成了我們的社会生产的积极参加者。从前，妇女和儿童的劳动是在家庭范圍内使用的。我不认为，妇女和儿童参加我們的社会生产是一件坏事。我以为，每个 9 岁以上的儿童应当有一部分時間来从事生产劳动；但是，迫使儿童在現在这种条件下从事劳动，那是太駭人听聞了。

使用机器的又一后果，是完全改变了国内的資本主义关系。从前，存在着富裕的雇主和使用自己的劳动工具的貧穷的工人。他們在一定程度上是自由的人，他們还有可能对自己的雇主实行反抗。对于現代的工厂工人來說，对于妇女和儿童來說，这种自由已經不存在了，他們成了資本的奴隶。

从資本家那里曾經不断发出呼声，希望能有一种什么发明，使他們能够不依賴工人而独立。紡紗机和动力織机給了資本家这种独立，因为生产中的动力握在他們手中了。因此，資本家的权力大大加强了。厂主老爷成了在自己企业范圍内拥有懲罰权的立法者，他們往往为了自己发财致富而任意罰款。封建貴族在对待农奴方面还要受到傳統的約束并服从于一定的法規，厂主老爷却不受任何监督。

有組織的劳动是使用机器的最重要的后果之一，而这迟早又会产生自己的各种后果。对于那些机器同自己的劳动相竞争的工人來說，机器的影响簡直是毀灭性的。無論在英国还是在印度，都

有许许多多使用手織机操作的紡織工人随着动力織机的采用而真正丧失了生命。

我們常常听到有人說，机器所造成的灾难是暂时性的。但是机器生产在不断发展，如果說这种发展在同一時間內把大批人吸收到生产中來，使他們获得工作，那末，从另一方面來說，它又不断地使許多工人失去工作。被排挤出来的人口形成一种經常的过剩；这种人口过剩并不像馬尔薩斯主义者所断言的那样是对国内的产品而言，过剩的是这样的一些人，他們的劳动被生产效率更高的机器所排挤。

在农业中使用机器，造成了不断增长的人口过剩，这些人已經不能找到职业。这些过剩的人口涌向城市，不断給劳动市場以压力，从而使工資下降。倫敦东头的情况就是这种影响的例证之一。⁵⁰³

使用机器的实际后果，在那些未使用机器的劳动部門里表现得最为明显。

最后，可以說，在目前，使用机器一方面导致联合的、有組織的劳动，另一方面則导致至今存在的一切社会关系和家庭关系的破坏。

載于1868年8月1日“蜂房报”
第354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总委员会記錄簿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卡·馬克思关于縮短工作日的发言記錄⁵⁰⁴

摘自 1868 年 8 月 11 日总委员会會議記錄

公民馬克思不能同意米爾納⁵⁰⁵的意見，即工作日的縮短將造成生產的減少，因為在實行限制工作日的部門里，生產工具較之其餘的部門達到了更高的發展水平。工作日的限制引起了機器的更加廣泛的使用，進行小生產愈來愈不可能了，而這正是向社會生產過渡所必需的。問題涉及保健方面的情況已經很清楚了。⁵⁰⁶但是縮短工作日之所以必要，還在於要使工人階級能有更多的時間來發展智力。從法律上限制工作日，這是使工人階級智力發達、體力旺盛和獲得最後解放的第一步。現在，誰也不會否認需要國家來維護婦女和兒童的利益了；而對他們的勞動時間的限制，在大多數場合也會導致男子工作日的縮短。英國首先開始縮短工作日，別的国家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仿效英國的做法。在德國已經展開了認真的鼓動工作，人們期待着倫敦的委員會來領導這個運動。這個問題原則上已為以往歷次代表大會所解決，現在是採取行動的時候了。

載于 1868 年 8 月 22 日“蜂房報”
第 358 號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总委员会記錄簿

俄譯文第一次發表

告倫敦德国工人书⁵⁰⁷

工人們！

今年9月7日將在布魯塞爾召開第三次國際工人代表大會。

這次代表大會將討論擴大、加強和組織工人國際聯合的共同活動的最好方法，以及同工人階級利益密切關連和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最後，必須在宣傳經費方面相互達成協議。

總委員會向代表大會提出下列問題：

1. 縮短和調整工作日；
2. 資本家採用機器的影響；
3. 土地所有制的性質；
4. 工人階級的教育；
5. 建立信貸機構以促進工人階級的社会解放；
6. 建立生產合作社的最好方法。

為了力爭實現這個由於時間和形勢的要求而提出的倡議，我們號召你們不論是作為整個組織或作為個人都要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進行工作。必須以志願捐款的辦法募集足夠的經費，以便倫敦的德國工人能夠派出一名或數名代表。如果在目前這種暴風驟雨的时刻，在數以千計的倫敦德國工人中間沒有足夠的由於理解本階級利益而感到鼓舞的人來保證自己有代表出席布魯塞爾代表大會，那是可耻的。

因此，行動起來吧！各國工人早就應當聯合起來，並且應當懂得：為了有效地進行鬥爭，反對以暴力為基礎的資本家的統治，必須有一個工人階級各種隊伍的強大聯盟。

不應當忘記，在北美合眾國八小時工作日已經被宣布為所有國營企業應當遵守的法律。

我們還想起了卡爾·馬克思於1867年在他的著作“資本論。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序言中所寫的具有深刻歷史意義的話！

“正像十八世紀美國的獨立戰爭給歐洲資產階級敲起了警鐘一樣，十九世紀美國的南北戰爭又給歐洲工人階級敲起了警鐘。”⁵⁰⁸

捐款可於每星期一、三、六晚9時起交到德意志工人教育協會秘書和出納員處。

代表德意志工人教育協會、國際工人協會德國分部：

理事會

西中央區朗-愛克街溫莎堡27號

起草於1868年8月11日左右

原文是德文

載於1868年8月15日“海爾曼”報
第502號

俄文譯自“海爾曼”報，並
根據馬克思的手稿校對過

卡·馬克思关于棉紡織 工业中的竞争对法国工人状况 的影响的发言记录⁵⁰⁹

摘自 1869 年 1 月 5 日总委员会会议记录

大家已经知道，生产棉纱和其他棉纺织品的法国工业家正在组织联盟，目的是要通过按更便宜的价格出售商品的办法来在英国市场上打击英国工业家。法国工业家承认英国工业家拥有比他们更好的机器和更为雄厚的资本，同时他们认为过去能够维持住自己的地盘只是由于法国工人的工资低，因此他们希望用进一步降低工资的办法使自己在生产商品时能够比英国工业家花费得更少些。索特维耳-勒-卢昂市长贝尔太耳先生（这个城市最大的工业家之一）第一个发动了这个对工人阶级的新的十字军征讨，提出要每天减少工资 3 1/2 辨士。由于工人拒绝这些条件，于是就宣布了同盟歇业；现在工人们向国际工人协会请求援助。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总委员会记录簿

总委员会关于巴塞尔代表大会 議程的決議

根据常务委员会的报告通过即将举行的代表大会的議程如下：

- (1) 关于土地所有制的問題；
- (2) 继承权；
- (3) 工人阶级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立即利用信貸；
- (4) 关于普及教育的問題；
- (5) 工会对工人阶级解放的作用。

其次，决定批准代表大会的日程如下：

- (1) 审查代表資格；
- (2) 选举代表大会的負責人員；
- (3) 总委员会的总结报告，以及各分部和支部的总结报告；
- (4) 討論列入代表大会議程的各项問題；
- (5) 决定下一年度总委员会的所在地；
- (6) 选举总委员会委員；
- (7) 决定下次代表大会的时间和地点。

1869年6月22日通过

在倫敦印成傳单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总委员会記錄簿，
并根据傳单校对过

卡·馬克思关于土地所有制的发言記錄⁵¹⁰

摘自 1869 年 7 月 6 日总委员会會議記錄

一

公民馬克思认为：米尔納沒有完全理解爭論的实质。誰也沒有反对把矿井和森林轉为公共财产。大家都承认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所招致的害处。意見分歧仅仅是有关耕地的問題。反对意見来自小农經濟的拥护者。小所有制是爭論的对象。

援引社会必然性，比起要求抽象的权利，是更加有力的論据。抽象的权利曾經被坚决地用来为所有的东西辯护，为形形色色的压迫形式辯护；早就應該摒棄这种鼓动了。問題在于应当用什么形式来实现这种权利。变封建所有制为农民所有制曾經是一种社会必然性。在英国，私有者在农业中已經不再是一种必然性了。

至于說天然权利，那末动物对土地也有天然权利，因为动物离开土地就不能生存。如果把这种天然权利演繹到邏輯的終結，那末，我們就会得出如下的論点：每个人都应当耕种自己所有的一小块土地。

社会权利和社会必然性决定着取得生活資料的方式。由于社会的必然性，在合作制成为势在必行的地方就出現了工厂。由于

誰也不能单独生产出任何东西，于是就使得合作制成为一种社会必然性。

馬克思不反对使決議更富有表达力。

二

小农沒有出席历次代表大会，但在历次大会上都有它自己的思想家参加。蒲魯东主义者十分頑强地坚持个体小所有制的要求，他們也曾經到过布魯塞尔。总委员会对決議負有責任，因为決議是由布魯塞尔委员会⁵¹¹ 草拟的，这些人清楚地預先看到了他們一定会碰到的反对意見。我不反对改写这个決議。公民韦斯頓只談到社会的必然性。我們看到，两种土地所有制都造成了有害的后果。小农——仅仅是名义上的私有者，然而也是最危險的，因为他們直到現在还认为自己是实际上的私有者。在英国，凭議會的一道法令，在两个星期里就可能使土地变为公共財產。在法国，这却要通过土地所有者負債累累和担負重稅才能实现。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总委员会記錄簿

卡·馬克思关于继承权的 的发言记录⁵¹²

摘自 1869 年 7 月 20 日总委员会会议记录

公民馬克思揭开了关于继承权問題的討論。他說，這個問題是日內瓦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提出来的，总委员会同意把它摆出来討論。日內瓦同盟的主要要求是完全廢除继承权。

有两种继承形式。遺囑权，或者是按遺囑继承，起源于羅馬，而且是羅馬的特征。羅馬的家长对于他的家庭經濟範圍內的一切享有絕对的权力。不能把羅馬的家长同現代的家长相比。羅馬家庭的家庭經濟包括奴隶和被保护人在內，家长必須公开保护和維護这些人的大小事务和利益。有过这样一种迷信：家长死了，他的灵魂还留在家里，像家神一样进行监督，使一切安排得当，如果事情办錯了，他就要折磨活人。在羅馬历史的早期，对这种家神要供奉牺牲，为了紀念他和安撫他的灵魂，甚至还要排設血祭。逐渐地形成了一种風俗：通过遺囑继承人与死者的灵魂商議。这就是羅馬人关于灵魂不死的观念。遺囑所表达的死者的意志，通过继承人而永世长存。不过这种遺囑并不一定給继承的人带来什么財產，而只是責成他履行死者的意志，这一点被看作一种宗教义务。随着時間的推移，这些遺囑继承人也开始对財產权提出要求，然而即使到了帝国时代，他們依法得到的也从未超过四分之一。这种

多神教的迷信后来傳到了基督教国家，并且成了現在英国和美国都还存在的遺囑权的基础。

日耳曼的继承权是无須遺囑的家屬占有权。財產似乎是由家庭成員共同占有，支配者是家长。当这个支配者死了以后，財產便轉归所有的子女。日耳曼人不知道有其他的继承权。

羅馬教会推行了羅馬的权利，而封建制度使日耳曼的权利变了样，因为負有兵役重荷的封建財產不能分割。法国革命又恢复了日耳曼的继承权。在英国，我們可以看到許多荒唐的事情：一个人拥有把自己的財產任意遺贈給誰的无限权利，他甚至可以不让自己的后裔继承，从而在死后的长时期內还支配着自己的財產。让資產階級去研究遺囑权的問題吧，因为这可以被用来反对貴族。在普魯士，只能把自己財產的一小部分遺贈給外人。

对于沒有东西可以继承的工人階級來說，這個問題沒有什么意思。

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打算从廢除继承权开始社会革命。試問這項政策会是正确的嗎？

建議并不是新的。圣西門在 1830 年就提出过了。⁵¹³

作为一种經濟措施，这不会带来什么好处。这会激起一种忿怒，这种忿怒一定会遇到几乎不能遏止的反抗，而这种反抗必然会导致反动。这一要求即使在革命的时刻被宣布，一般的觉悟水平也未必能保证支持它。从另一方面來說，如果工人階級拥有足够的权力来廢除继承权，那它也就足够坚强有力来实行剝夺了，因为剝夺会是一种簡單得多和有效得多的措施。

在英国廢除土地继承权会触动同土地、同上院等等有关的世襲职权。非等到 15 000 个勛爵和 15 000 个勛爵夫人都死光了，事

情才会有个結果。相反，假如由工人組成的議會決定將地租納入國庫而不交給大地主，政府就能馬上得到一批資金而不引起任何社會震蕩，可是，廢除繼承權，却會使一切陷於混亂，而且達不到任何目的。

我們努力的方向應該是使任何生產工具都不再成為私人的財產。生產工具的私有制是一種虛偽的幌子，因為私有者不可能親自使用生產工具；但是私有制卻給予私有者支配生產資料的權力，他們就借此強迫別人為他們做工。在半野蠻狀態中這種秩序也許是必要的，但現在已經毫無必要了。一切生產資料都應該公有化，以便保證每個人都既有權利，又有可能來使用自己的勞動力。如果我們能達到這種情況，繼承權也就不需要了。但在此以前，家屬繼承權還不可能廢除。人們為自己的子女儲蓄，他們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保證子女有生活資料。如果子女的生活在雙親死後能夠得到保障，那雙親就不會再去操心給子女留下生活所需的資料了；然而現在還沒有那種條件，廢除繼承權只會引起困難，只會驚動和吓壞人們，而不會帶來任何好處。廢除繼承權不會使社會革命開始，而只會使社會革命完蛋。起點應該是：為生產資料的公有化創造條件。

資產階級痛恨遺囑繼承權；這種繼承權使國家有可能在任何時刻干預私人事務。現在已經有遺產稅，只要把它提高並使它成為像所得稅一樣的累進稅就行了，不過小額遺產不在此例，比方說50英鎊就不予課稅。只是在这个意義上，這個問題才與工人階級有關。

同現存秩序相連的一切都應當改變，但是，如果廢止的僅僅是遺囑，那人們也會採取生前贈送的方法來迴避這種做法，可見，與

其搞得更糟，还不如容忍它在一定条件下存在。首先应该取得改变现存秩序的可能，到那时继承权也就自然会消失。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总委员会记录簿

卡·馬克思关于現代社会中的 普及教育的发言記錄⁵¹⁴

摘自 1869 年 8 月 10 日和 17 日总委员会會議記錄

一

公民馬克思說，這個問題有一种特殊的困难之处。一方面，为了建立正确的教育制度，需要改变社会条件，另一方面，为了改变社会条件，又需要相应的教育制度；因此我們應該从现实情况出发。

以往历次代表大会都討論过应当由国家还是由私人来举办教育的問題。⁵¹⁵ 国家举办的教育常被看做是政府的，其实也不尽然。在馬薩諸塞州每一个市政府都有責任保证所有的儿童受到初等教育。居民在 5 000 人以上的城市應該有中等技术学校，大城市要有更高级的学校。国家分担开支，不过不多。在馬薩諸塞州 $\frac{1}{8}$ 的地方稅用于教育，在紐約州則为 $\frac{1}{5}$ 。掌管学校的委员会是地方性組織，它們委派学校教师和挑选課本。美国的制度的缺点在于地方的性质过重，教育取决于每一州的文化水平。因此就有了要求中央監督的呼声。必須为学校納稅，但孩子們却并不必須上学。財產被課稅，納稅的人也就希望錢花得有用处。

教育可以是国家的，而不是政府的。政府可以委派視察員，視

察員对教学过程本身虽然无权干預，但应当監督法律的遵守，正如同工厂視察員应当監督工厂法的遵守一样。

代表大会應該毫不犹豫地通过決議：教育应当是义务教育。至于說孩子們会因而不能受雇去做工，那末有一点是不用怀疑的：这种情形不会縮减工資，人們也会对这一点习惯。

蒲魯东主义者断言，免費教育是荒謬的，因为国家为教育花了錢。当然，总得有人出錢，但不是由最无力出錢的人出。发言人并不主張在专科学校实行免費教育。

至于人們談得很多的普魯士教育制度，他最后說，那是專門培养优秀士兵的。

二

公民馬克思說，在某些問題上大家意見是一致的。

討論起因于有人建議对日內瓦代表大会決議的正确性加以肯定，這項決議要求把智育同体力劳动、同体育和綜合技术教育結合起来。对这一点沒有任何異議。

无产階級的決議起草人所主張的綜合技术教育，旨在弥补分工所造成的缺陷，因为分工妨碍学徒获得本身业务的牢固知識。人們抓住这一点，并且按照資產階級对綜合技术教育的理解对它做了不正确的解釋。

至于罗女士关于教会經費的建議⁵¹⁶，若是为了使代表大会表示反对教会，那它在政治上是正确的。

公民米尔納的建議⁵¹⁷不值得同学校問題联系起来討論；年輕人应当在日常生活斗争中从成年人那里获得这种教育。发言人不

贊成把沃倫看做聖經，在這個問題上很少人持有相同的意見。我們可以補充一句，學校不可能給予那種教育，這應當從成年人那里去學習。

無論是小學還是中學，都不應該開設那些容許進行政黨的或階級的解釋的課目。只有像自然科學、文法等等這樣的課目才可以在學校里講授。譬如說，文法規則就不會因讲解它的是否是一個信教的托利黨人還是一個自由思想者而有所改變。容許得出相互矛盾的結論的課目應當從學校里刪去；只有成年人才可以在開宗教講座的羅女士那樣的教師的指導下研究它們。^①

關於廢除軍隊的問題⁵¹⁸，布魯塞爾代表大會已經通過決議；不宜再把它提出討論。

第一次發表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總委員會記錄簿

① 在1869年8月21日“蜂房報”第410號關於1869年8月17日總委員會會議的簡要報道中，這段話是這樣寫的：“至於政治經濟學、宗教以及其他類似的課目，無論是在小學還是中學，都不應該開設。這是對成年人的教育，應當由羅女士那樣的教師以舉辦講座的方式來進行。”——編者注

土地和劳动同盟告大不列顛 和爱尔兰男女工人书⁵¹⁹

工人同志們！

三十年前使英国千百万受苦的劳动者产生的那些毫无根据的希望沒有实现。曾經有人对他們說：取消关税限制将会使貧苦工人的命运得到改善，即使不能使他們幸福和滿足，至少也会使他們永远摆脱飢餓。

于是掀起了一个爭取“大圓面包”的强有力的运动⁵²⁰；大地主們憤怒欲狂，財閥們惊慌失措，工厂主們則欢天喜地——他們的願望实现了：保护关税政策遭到了 coup de grâce〔致命的打击〕。接着而来的是一个空前的繁荣时期。托利党人起初威胁說要改变这个政策。可是他們在 1852 年登上了大臣席位后，却並沒有把自己的威胁兌現，反而加入了无限制竞争的拥护者的贊美大合唱。他們本来已經准备在金錢上遭受損失，可是他們十分惊奇地发现，他們每年的租金收入增加了 200 多万英鎊。廢除谷物法以后由如此少的人在如此短的时期內生产出如此多的財富（即滿足人的需要的資料），这在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在二十年的時間內，不列顛和爱尔兰的农产品和工业品（你們自己的劳动果实）每年报关的出口价值从 6 000 万英鎊增长到 18 890 万英鎊。在二十年內，不列顛的地主和地主太太們每年的应納稅的收入，据他們自己承

认,从9 800万英镑增长到14 000万英镑,而大工厂主和大工业家每年的收入则从6 000万英镑增长到11 000万英镑。人的力量还能有比这更大的作为吗?

可惜的是,在这个不列颠家庭中还有遭到遗弃的子女。关于这14 000万英镑在大地主之间如何进行分配的秘密,还没有一个财政大臣曾经透露过,不过关于工业家们的情况,我们还是了解的。工业家中最幸运的人的数目从1846年的16人增加到1866年的133人。其中每个人的平均年收入从74 300英镑增长到100 600英镑。他们攫取了二十年来收入全部增长额的 $\frac{1}{4}$ 。比他们稍差一点的从319人增加到959人,其中每个人的平均年收入从17 700英镑增长到19 300英镑;他们攫取了第二个 $\frac{1}{4}$ 。剩下的半数在346 048个可尊敬的资产者之间进行分配,他们每年的收入从100至10 000英镑不等。而生产这些财富的千百万劳动者——不列颠的灰姑娘们,却半个辨士也没有得到,他们得到的只是拳打脚踢。

在1864年,税收表中D项⁵²¹的应纳税的收入增长了920万英镑。在这个增长额中有4 266 000英镑即将近半数,被占人口总数不到 $\frac{1}{8}$ 的首都所吞没。在这个总额中有3 123 000英镑、即整个大不列颠收入增长额的 $\frac{1}{3}$ 以上,被伦敦西蒂区、即占不列颠人口 $\frac{1}{179}$ 的上等人物所吞没,而拥有多三倍的工人居民的迈尔-恩得和伦敦塔却只得到175 000英镑。西蒂区的房主被金子憋得要死,哈姆雷特塔的房主则被济贫税压得喘不过气来。西蒂区自然是反对济贫税的集中化的,他们所依据的仅仅是地方自治的原则。

到包括1861年在内的十年内,棉纺织工业的工人人数增加了12%;他们的产品增加了103%。铁矿矿工的人数增加了6%,矿

产品增加了 37%。2 万名矿工为 10 个矿主工作。在这十年内，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农业工人人数缩减了 88 147 人，然而在这同一时期，却有数十万英亩的公有地被圈为私有财产，用来扩大贵族的领地。这一过程现在也还在继续。

在十二年内，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按济贫法被课税的租金，从 8 670 万英镑增加到 11 830 万英镑；有劳动能力的成年贫民从 144 500 人增加到 185 600 人。

这不是无可救药的狂妄者的热情幻想所描绘的虚构图景。这是大地主和银行家的、由他们自己的蓝皮书所证实了的自白。不久以前他们的一位专家在上院说过，生活奢侈的有产阶级每年可以从你们的劳动产品中为自己积攒 15 000 万英镑。过了几个星期，皇家外科医学院院长在调查 8 个人早死原因的陪审法庭上，叙述了他在圣潘克拉斯教区的骯髒的习艺所里所见到的景象。

在爱尔兰，享有特权的人数也增加了，他们的收入增多了，而同时却有 $\frac{1}{6}$ 的爱尔兰劳动儿女死于饥饿和由饥饿引起的疾病， $\frac{1}{8}$ 幸存的人则被依法从租种的土地上赶走和抛向街头，他们为了逃避罪恶的篡夺者的迫害而不得不流亡他乡。

这个史无前例的工业繁荣时期把我们成千上万的劳动伙伴——正直的、单纯的、辛勤工作的男人和妇女——送进了习艺所；他们所幻想的牛排变成了稀汤。成千上万的男人、妇女和儿童在本乡到处流浪，无家可归；他们饱受欺凌，横遭排斥；他们充满城市，挤满大道，到处寻求能提供栖身之所和糊口之资的工作而不可得。另外有成千上万比较精明而不太正直的人则由于小小的偷窃行为而坐牢，他们宁尝铁窗风味，也不愿受习艺所的待遇；与此同时，大骗子手们却依然逍遥法外，罪恶的大地主们操纵着法庭，他

們在治安法官會議开庭期間主宰着一切。成千上万年輕力壯的人流亡海外，像逃避鼠疫那樣逃离自己的故乡；年老体弱的人因饥寒交迫而倒毙道旁。大大小小的医院挤滿了寒热病患者和餓得奄奄一息的人，餓死已成為天天發生的常見現象。

總而言之，貧苦工人的苦難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深重，赤貧現象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普遍，而同時，用來滿足人的需要的資料卻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豐富。這首先證明，一切國家權力的道義原則，即“整個社會的福利就是最高法律，它應當成為所有民法的目的和意向”這一原則已經完全被忽視了。那些決定國家命運的人，有的輕率地忽視了自己首要的義務，而為富人的特殊利益服務，以便使富者更富；有的則由於他們的社會地位、他們的教養和他們的階級偏見而不能履行自己對整個社會的義務，不能施行應有的措施；不論是在哪種情況下，他們都是背叛了自己的委託者。

只有在被壓迫者的最低需要得到保證的情況下，階級的統治才能存在。統治階級沒有能使工業工人在它年富力強的时代免于貧困和餓死。統治階級的措施顯然是無能為力的，它們的謊言並沒有兌現。它們答應節約，可是並沒有節約，反而駭人聽聞地增加了國家的開支。它們答應從你們肩上卸下賦稅負擔，可是富人支付的只是增加了的開支的很小一部分，其餘部分則從應歸你們使用的生活必需品中征收，甚至還從你們的當票上征收稅款，用來供養也是從你們的人中間招募而成的常備軍，以便在你們一旦表現出不滿的征兆時就來槍殺你們。它們答應把赤貧現象壓縮到最低限度，而實際上卻只是把貧窮和困苦變成你們通常的命運，——“大圓面包”已化為烏有。它們所實行的每一個措施只是增加了災難，而且他們也提不出更多的東西了——它們的政權是註定要滅

亡的。照这样下去，就意味着把一切人都引向毁灭。办法只有一个。要自己帮助自己！要下定决心：不能再忍受这种恶劣的局面，要按照自己的决定行动起来。这种局面一定要结束。

几个星期以前，有二十来个伦敦工人讨论了这个问题。他们得出结论：目前的社会经济基础造成了现有的一切灾难，除了改革现有的社会政治制度外，其他任何办法都不会有用，而实现这种改革只有劳动群众自己才能做到。他们已把自己的结论表达在一系列决议中，并且把它们提交给他们所召集的工人代表会议来讨论。这些决议在三次会议上进行了讨论，并被一致通过。为了贯彻这些决议，建立了一个新的工人组织，名叫**土地和劳动同盟**。它的由四十多个著名工人代表组成的执行委员会，受委托在代表会议通过的那些最初的决议的基础上制定一个原则纲领作为行动纲领，借助于这个纲领就可以实现根本的改革。

委员会在全面讨论之后通过了以下的纲领：

1. 实行土地国有化。
2. 在国内建立农业移民区。
3. 实行非教会的普遍免费义务教育。
4. 取消私人发行银行。把发行纸币的特殊权利交给国家。
5. 用一种直接的累进税代替所有赋税。
6. 取消国债。
7. 取消常备军。
8. 缩短工作日。
9. 实行普遍的、平等的选举权，并且付给代表薪金。

我们的努力是否能取得胜利将取决于对当权者所施加的压力，为此必须在数量上取得优势，必须联合、组织和在行动上一致。

因此，我們号召你們联合起来，組織起来，把你們的行动一致起来，并且在爱尔兰、苏格兰、威尔士和英格兰到处宣布：“土地归人民”，即归自然界礼物的合法继承人。任何一个合理地組織起来的社会都不会让一小撮私有者去支配作为生活源泉的土地，把它当做任意蹂躪的对象。由全民选举并受到全民信任的政府是能够管理土地以造福整个社会的唯一力量。

你們要力爭使国家調用空閑的土地以移居失业者，从而为土地国有化奠定基础。你們再也不要让一英亩的公有地为了非生产者的私人利益而被圈起来。你們要迫使国家利用軍隊（直到軍隊彻底解散时为止）从事除草、排水和垦荒等农活，而不要让它来修造以毀灭生命为目的的兵营。如果綠色的原野和菜园同狩猎这种高尚的运动不能相容，那就让狩猎爱好者們移居到国外去吧。

你們要使同盟的九条成为工人的綱領，成为考驗議會候选人的試金石；如果你們发觉他們不称职，那就像拋棄伪錢币那样拋棄他們，因为誰不拥护你們，他就是反对你們。

你們的劳动果实正被根据土地法、財政法和其他各式各样的法律从你們手中騙走。你們不得不从留給你們的微不足道的錢財中偿付为了压制你們的前輩而借的債款的利息；你們不得不供养对你們这一代抱着同样目的的常备軍；当你們有工可做时，你們經常被过度的劳动弄得精疲力竭，而且你們在任何情况下都吃得很坏。除了在我們的綱領中所指出的那一系列根本性改革外，永远也不会有任何东西能使你們摆脱你們目前所处的絕境。目标一致和行动一致能克服各种困难。我們人数很多，而我們的敌人人数很少。总之，各种信仰和职业的男女工人們，为了爭取你們自身的

解放，你們要万众一心地要求自己的权利，团结起来，把你們的力量联合在**土地和劳动同盟**的旗帜下面！

财务委員 約翰·韦斯頓

书 記 馬丁·詹·布恩

約·格奧尔格·埃卡留斯

格·埃卡留斯起草于 1869 年 11 月
14 日左右

1869 年以小册子“土地和劳动同盟
告大不列顛和爱尔兰男女工人书”
在倫敦出版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小册子“土地和
劳动同盟告大不列顛和
爱尔兰男女工人书”譯的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卡·馬克思关于不列顛政府 对被囚禁的爱尔兰人的 政策的发言記錄⁵²²

摘自 1869 年 11 月 16 日和 23 日总委员会會議記錄

一

接着，公民馬克思揭开了关于不列顛政府在爱尔兰問題上的立場的討論。他說：

宣布政治大赦一般有两种緣由：（1）政府由于掌握武力和得到輿論支持而足够穩固，而且敌人承认自己失敗，就像在美国那样；（2）冲突的原因是治理不当，而且反对派正在达到自己的目的，就像在奥地利和匈牙利那样。当时爱尔兰的情况也应当是这样。

迪斯累里和格萊斯頓都說过，政府一定給爱尔兰做到別的国家中革命所能做到的。布萊特曾屡次断言，如果情况不急剧改变，爱尔兰随时都可能爆发革命。在竞选期間，格萊斯頓曾为芬尼亞社社員举行起义进行辯护，他說，任何別的民族在那种情况下也都会举行起义。而当他在下院受到攻击的时候，他又反过来宣称，他的慷慨激昂的反对“征服政策”的宣言只意味着“应该按照爱尔兰的观念治理爱尔兰”。为了結束“征服政策”，他作为大臣必須立即

从大赦着手,就像在美国和奥地利那样。可是他什么也沒有做。于是,爱尔兰的自治机关就展开了要求大赦的运动。当带着有 20 万人签名的要求釋放犯人的請願书的代表团准备出发时,他先走在前面,釋放了几个人,以便显得他并不是在爱尔兰的压力下作出让步的。請願书呈上去了,可是,虽然組織这次請願的并不是芬尼亚社社員,他也沒有作任何答复。接着下院中就虐待犯人的事提出了质問。英国政府至少在虐待犯人这方面是不偏不倚的,因为它对爱尔兰人和英国人一視同仁。欧洲沒有一个国家像英国和俄国那样对待政治犯。普魯斯不得不承认事实。穆尔要求进行調查,但遭到拒絕。接着,在里美黎克开始了要求大赦的人民运动。召开了有 3 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通过了要求无条件釋放的請願书。北部各城市都举行了群众大会。接着宣告在都柏林召开有 20 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大会在几星期前就决定于 10 月 10 日举行。各行业团体将举行游行。10 月 8 日,政府公告禁止游行队伍經過某些街道。伊薩克·巴特认为这就是禁止游行。人們向福特斯鳩提出质問,但他不在家,他的秘书伯克則一无所知。于是,人們留下了一封信要求回答。福特斯鳩逃避回答。政府需要一次冲突。人們放棄了游行。事后得悉,当时每一个兵士都发給了 40 发子彈。

以后,格萊斯頓对里美黎克的八月請願书作了含糊其詞的答复⁵²³。他写道,人們的行为是极不相同的。有些人是奉公守法的,有些人則出言不逊,他們竟理直气壮地要求只有出于寬大才能做出的行动。

以一个受雇于群众的公僕而出来教訓群众的大会应如何讲话,那未免太不謙虛了。

格萊斯頓接着又反駁說,犯人們並沒有放棄因他們被捕而中

止的計謀。

格萊斯頓怎么知道他們的計謀，又怎么知道他們沒有放棄这种計謀呢？也許他为了获得口供而严刑拷打过他們吧？他要强迫他們放棄自己的原則，要在精神上侮辱他們。拿破侖在实行大赦时並沒有要求人們放棄共和原則，普魯士也沒有提过这样的条件。

接着格萊斯頓声明說，陰謀至今仍存在于英国和美国。

如果情况真是这样，苏格兰場^①就会立刻揭露它。但这不过是“已持續七百年之久的不滿”而已。爱尔兰人宣称，他們將把无条件的釋放看作和解的一个步驟。格萊斯頓无法消灭在美国的芬尼亚社社員的陰謀，他自己的行为正在助长它；一家报纸称他为陰謀的首脑⁵²⁴。他对报刊不滿；但他并无勇气去追究报刊，因而他想把責任推到犯人身上。他是否要把他們当作人质，好让那些監獄外面的人安分守己呢？他宣称，“当时我們希望能显示最大限度的忍耐”。原来，所謂最大限度就是这样。

当蒙特乔伊監獄因收容大量未經审判的犯人而有人滿之患时，麦克唐奈医生曾就犯人的待遇問題屢次写信給約瑟夫·默里。美奧勋爵后来說，默里隱藏了这些信件。于是，麦克唐奈就向职位更高的獄監上书。結果麦克唐奈被撤职，而默里則受到提拔。

接着格萊斯頓又說，“我們曾建議”釋放次要的犯人，但那些主犯和主謀者不能釋放。

这显然是一个謊言。犯人中有两个美国人，每人被判15年徒刑。政府由于害怕美国而把他們釋放了。凱里于1865年被判5年徒刑，他住在精神病院中；他的家屬想把他接回家去，因为他并

① 倫敦警察局的所在地。——譯者注

无能力推翻政府。

接着格萊斯頓又說，騷擾治安在英国一向被认为是犯法的。但只是在英国是如此。杰弗逊·戴維斯的叛乱被认为是正当的，因为它反对的不是英国人及其政府。⁵²⁵ 格萊斯頓接着說，除了懲罰罪犯，政府不能有别的考虑。

政府为爱尔兰的压迫者效劳。格萊斯頓希望，如果开明的皇上和議會采取了偉大而公正的行动，爱尔兰人就屈膝投降。可是，对爱尔兰人民犯下了罪行的正是他們。爱尔兰問題是这样一个唯一的口号，这个口号使格萊斯頓和布莱特得以成为大臣，得以迫害非国教徒，并且給爱尔兰的追求肥缺者一个机会来证明自己的贩卖行为正确。教会只是征服的借口。借口消失了，但奴役繼續存在。格萊斯頓宣称，政府今后将努力消除引起不滿的各种緣由，但是政府也决心保障生命財產的安全，保卫帝国的完整。

对生命財產的威胁来自英国貴族。加拿大制訂了它自己的法律，这并没有破坏帝国的完整，而爱尔兰人却必須丟开他們自己的事情，让議會来照管，也就是让那个使他們处于目前这种境地的政权来照管。以为釋放犯人会比侮辱整个民族更为危險，那是极端的愚蠢。英国人那种陈旧的征服者的精神表現在这种見解中：我們會賞賜給你們的，但是你們必須請求。

格萊斯頓在給伊薩克·巴特的信中說：

“您提醒我，我过去曾經为外国人辯护。难道这两种情况有相似之处嗎？芬尼亚社社員是依合法的慣例进行审讯的，而且是由以他們的同胞作为陪審員的法庭判罪的。那不勒斯的犯人被捕后沒有受审，而后来当他們受审的时候，則是由特別法庭审讯并由領政府薪餉的法官判决的。”⁵²⁶

如果以乡紳們作为陪審員的法庭审讯偷猎者，那偷猎者的审

訊者也同樣是他的同胞。眾所周知，愛爾蘭的陪審員人選是由大地主們提供的，陪審員的生活費用就取決於他們的判決。壓迫始終是合法的慣例。在英國，法官可以是獨立的，而在愛爾蘭卻從來不是這樣。他們的提升取決於他們如何為政府效勞。檢察官沙利文就被任命為司法檔案保管官。

格萊斯頓在回答都柏林的“護林人古會”時說，他似乎不記得曾經答應過“按照愛爾蘭的觀念治理愛爾蘭”。⁵²⁷ 過後，他又來到市政廳抱怨說，他無力擔當這項任務。

結果，所有維護租佃者權利的群眾大會都取消了，而愛爾蘭人要求釋放犯人。他們已經和教權派斷絕關係，現在則要求愛爾蘭自治。穆爾和巴特表示贊成這一點。他們決心爭取釋放奧頓諾凡-羅薩，把他選為議會的議員。

二

公民莫特斯赫德對格萊斯頓的行為作了一番評論，我的評論會是另外一個樣子，不過這和我們所討論的問題毫無關係。群眾大會上通過的請願書是完全正確的，但是格萊斯頓對支持請願書的那些講話卻吹毛求疵。卡斯爾里並不亞於格萊斯頓；我在今天的“政治紀事報”⁵²⁸ 上看到，他也曾經用格萊斯頓所用的那些字眼來攻擊愛爾蘭人，而科貝特也同我一樣地回答了他。

當開始競選的時候，所有的愛爾蘭人候選人都提出大赦的要求，但是格萊斯頓在愛爾蘭各地方自治機構展開要求大赦的運動以前，並無任何行動。

我沒有談到歐洲事件中的犧牲者，因為不能把匈牙利戰爭和

芬尼亚社社員起义相比。可以把它同 1798 年⁵²⁹ 相比,而那样比,也不会有利于英国人。

我还要重复地說,沒有一个地方比英国对待政治犯更坏的。

公民莫特斯赫德不想告訴我們,对于爱尔兰人他有什么看法;如果他想知道别的民族对英国人作如何想,那就让他讀一讀賴德律-洛兰⁵³⁰ 和其他欧洲作家的著作吧。我一直是为英国人辯护的,現在也是这样。

通过決議并不是为了爭取釋放犯人,爱尔兰人自己也已經不指望这一点了。決議的目的是为了对爱尔兰人表示同情并对政府的措施作出評价;这一決議可能造成英国人和爱尔兰人的团結。当我们大胆地說出我們的意見的时候,格萊斯頓就不得不和反对派“泰晤士报”、“星期六評論”等发生冲突;反之,我們就会支持他来对付那在相反的情况下能推翻他的反对派。在美国內战的时候,他是执政者,因而要对政府的政策負責;而格萊斯頓在北軍处境不好的时候发表了他的声明,这并不会給他的爱国主义增加什么光彩。

公民奥哲尔是对的,他說如果我們想让犯人获得自由,用这种方法是达不到目的的。但是,考虑爱尔兰人民比考虑格萊斯頓更为重要。⁵³¹

第一次全文发表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总委员会記錄簿

燕妮·馬克思关于爱尔兰 問題的文章⁵³²

一

1870年2月27日于倫敦

2月18日“馬賽曲报”轉載了“每日新聞”的一篇文章，这家英国报纸在这篇文章中向法国报刊报道了选举奥頓諾凡-罗薩的情形。鉴于这一报道相当混乱，它那滿篇吞吞吐吐的解釋使人不能正确了解他們希望加以說明的那些事实，因此，盼将我对上述文章的評述惠予披露。

首先，“每日新聞”說奥頓諾凡-罗薩是經有陪審員参加的法庭判決的，但是他沒有加上一句：在爱尔兰，陪審員参加的法庭是由政府的走狗組成的，他們是在不同程度上由政府直接指定的。

其次，玩弄自由主义字眼的“每日新聞”的撰稿人带着神圣的恐惧談到了 treason felony [叛国]，却忘了說，英国刑法典中的这一新范疇，就是专门为了把爱尔兰爱国者算做最低一等的罪犯而发明的。

我們先談奥頓諾凡-罗薩的事件。他是“爱尔兰人民”的編輯之一。他像大多数芬尼亚社社員一样，也以写所謂煽动性文章被判罪。因而，“馬賽曲报”指出罗什弗尔和罗薩的相似之点，那是

对的。

为什么“每日新聞”把有关被判罪的芬尼亚社社員的事告訴法国，而又絕口不談对他們的虐待呢？希望你们能容許我对“每日新聞”慎重地保持緘默的东西作一个补充。

不久之前，奧頓諾凡-罗薩曾被双手反铐，关在一間黑暗的单人牢房里。无论白天黑夜，都不給他取下镣铐，所以他只好躺在地上喝給他当飯吃的稀湯。罗薩把他的情况当着典獄长和另一证人的面告訴了“爱尔兰人报”的編輯皮哥特先生，后者就将此事在他的报上发表，这就促使下院的一位爱尔兰代表穆尔先生要求議會进行調查，以便弄清監獄中发生的情况。政府坚决反对这一要求。有 36 位議員投票贊成穆尔的提案，但是投反对票的有 171 人；这确实可以作为对那些蹂躪了选举法的投票^①的毫不逊色的补充。

而这正是在假善人格萊斯頓組閣的时候发生的！可見，这位偉大的自由主义領袖是把人道和正义看得一文不值的。所以說，存在着一些不戴眼鏡的猶大。

还有一件給英国增光的事。一个六七十岁的被監禁的芬尼亚社社員奧利里，在三个星期中只得到面包和水，原因是，——“馬賽曲报”的讀者們怎么也猜不到，——原因是他被称为“異教徒”并拒絕宣布自己为新教徒、长老会教徒、天主教徒或战栗教徒。他只能在上述的几种宗教和光面包之間进行选择。在这五种禍害中，奧利里（或者像別人称呼他那样，“異教徒奧利里”）選擇了他认为最輕的一种：面包和水。

几天以前，驗尸官（以皇室的名义驗尸的法庭官員）察看了一

① 見本卷第 698—700 頁。——編者注

个死于斯派克島監獄的芬尼亞社社員的尸体，他严詞譴責了对死者的虐待。

上星期六，爱尔兰青年岡訥尔·胡德在受了四年監禁之后出獄。他19岁时曾参加英国軍隊在加拿大为英国服务。1866年，他以写煽动文章的罪名被交付軍事法庭并判处两年苦役。胡德在听到判决时，摘下他的帽子抛入空中并大声高呼：“爱尔兰共和国万岁！”他的这一发自内心的呼声使他付出了极高的代价。他被加判两年徒刑，外加50皮鞭。这一判决是以极端残酷的方式执行的。胡德被綁在犁上，两个壮碩的铁匠揮起了 *cat o'nine tails* [九尾皮鞭]——法語中并没有英語中的皮鞭这个詞。这方面只有俄語和英語才有共同語言。真是难兄难弟。

記者凱里先生至今还被監禁在专关瘋子的監獄中；沉默和其他酷刑已使他变成一具失掉理性的活尸。

芬尼亞社社員伯克上校，不仅在美国軍隊中服务时表現得很出色，同时还是一位出色的作家和画家，而現在他的处境也很悲惨；他已經連最亲近的人都不認識了。在这張爱尔兰受难者的名单上还可以加上許多別的名字。从1866年“爱尔兰人民”报社受到暴徒襲击时起，在仁爱的英国監獄里已有20位芬尼亞社社員死亡或发瘋，这个事实已經足以說明一切了。

燕妮·馬克思写于1870年2月27日

載于1870年3月1日“馬賽曲报”
第71号

署名：燕·威廉斯

原文是法文

俄文譯自“馬賽曲报”

二

3月5日于倫敦

在3月3日的下院會議中，**斯塔克普耳**先生就对待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員的問題对格萊斯頓先生提出了質問。他还說，都柏林的**萊昂斯**医生不久前宣称：

“紀律、不够吃的口粮、个人自由的限制及其他的懲罰只能給犯人的健康造成无法挽救的危害。”

格萊斯頓先生却对犯人所受的待遇表示完全滿意，他給自己的短短的 *speech* [演說] 加上了这样精彩的談諧：

“关于奧頓諾凡-罗薩的健康，我可以滿意地說，奧頓諾凡-罗薩夫人在最近一次會見她丈夫时因他的气色变好而感到非常高兴。”⁵³³

在高貴的會議的所有席位上发出了一片哈哈大笑！最近一次會見！請注意，奧頓諾凡-罗薩夫人不仅已和丈夫离別多年，而且为了养活孩子，她只得在美国到处奔波，讲授英国文学。

还不要忘了，这位格萊斯頓先生(他的談諧总是非常得体的)是“禱告”(«Prayers»)、“福音的傳播”(«Propagation of the Gospel»)、“俗人在教会中的職責”(«The functions of laymen in the church»)以及剛出版的傳道书 «Ecce homo» [“看这个人”] 的作者，人們簡直都要把他当做圣徒了。

但是那些犯人是否也像他們的最高獄吏那样感到极大的滿意呢？請讀一讀下面的奧頓諾凡-罗薩信中的一段。这封信像奇迹

般地被带出了监狱，不过还是经过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耽搁才到了收信人的手中。

罗 薩 的 信

“关于这些英国统治者的伪善，我已经告诉过你们，他们使我不得不爬在地上吃东西；他们使我挨饿，不让我见阳光，给我的是镣铐和圣经。我不因我的统治者惩罚我而诉苦；我会忍受；但我肯定说：我有权将我所受的虐待以及非法扣留我叙述这种情况的书信的经过大白于天下。监狱当局为阻碍我写信而采用的卑鄙手段既可笑又可恶。侮辱人格最甚的手续是一连几个月中每天都把我剥个精光，察看手足和全身。从1867年2月到5月在米耳班克每天都这样做。有一次我拒绝脱衣服。于是就来了五个狱卒，他们残暴地殴打我并扯掉我的衣服。

有一次我给狱外发出一封信；结果是两位警官（治安法官）诺克斯先生和波洛克先生光顾了我。

派两名政府官员来调查英国监狱的真相——这简直是讽刺！这两位先生拒绝记下我想告诉他们的重要的东西。当我一接触到他们所不喜欢的话题时，他们就阻止我发言，并说狱中纪律与他们无关。请问波洛克先生和诺克斯先生，不是这样吗？我曾经被迫在已经有半打英国犯人用过的水中洗澡，当我把这情形告诉你们的时候，你们不是拒绝记下我的申诉吗？

在查塔姆的时候，曾经给了我一些麻絮，要我扯松，并且告诉我，如不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就不给我饭吃。

我提高声音说：‘也许，我把活干完，你们也会同样处罚我吧？在米耳班克时我就遇到过这样的情形。’

狱吏不同意说：‘这怎么可能？’

于是我就告诉他，7月4日我比规定时间早十分钟就干完活，拿起一本书来。一位官员看到了，就指责我偷懒，把我关在黑暗的单人牢房中，两天两夜只给一点面包和水。

有一次我看到我的朋友爱德华·达菲。他脸色非常苍白。过了一些时候以后，我听说达菲病得很厉害而且他希望能看到我（我们在爱尔兰时就是

好朋友)。我請求典獄长准許我去探望他。典獄长断然拒絕了我的要求。那是在 1867 年圣诞节前后。几个星期以后，一个犯人隔着我的牢房的铁栅輕輕地告訴我：‘达菲死了！’

要是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俄国，英国人会編出一套多动人的故事呵！

要是格莱斯頓先生在那不勒斯看到这样的死亡，他又該描述得多么生动！这些甜言蜜語的法利賽人，这些伪君子，嘴上挂的是聖經的詞句，心里藏的是魔鬼！

我还有几句话来悼念約翰·林奇。1866 年 3 月，我放風时在院子里遇到他。我們受着严密的監視，他只能低声地对我說：‘要冻死我了。’这些英国人干了些什么呢？在圣诞节前一天，他們把我們帶到倫敦。當我們进了监狱以后，他們就剝掉我們身上御寒的内衣，讓我們一連几个月在单人牢房里冻得发抖。是的，他們无法否认这一点，他們就是杀死約翰·林奇的凶手；但是在进行調查时，他們却安排好作证的官員，說林奇和达菲受到非常温和的待遇。

我們的奴役者英国人的爱好撒謊已經到了超乎任何人的想像的程度。

如果我死在獄中，我的家人和朋友們請千万別相信这些人所說的任何一句话。但是也不要以为我对用謊言陷害过我的人有私人的怨恨！我控訴的只是必然会采取这种手段的暴政。

我的境遇使我不止一次地想起馬基雅弗利的話：‘暴君們对傳播聖經特別感到兴趣，其目的是让人民群众接受其中的誡令，听任强盜們掠夺他們而不加抵抗。’

只要被奴役的人民恪守教士們所傳播的道德准則和服从准則，暴君們就可以高枕无忧。

如果我的同胞們能讀到这封信的話，我有权要求他們大声疾呼，为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弟兄們主持正义。让这些話促使凝結在他們血管中的血液流动起来吧！

我被脖子上套着绳子拉車。绳子的一端結在长长的車轅上，两个被拘禁的英国人受到囑咐不得让車子失去平衡；但是他們撒了手，車轅一下子翘了起来，绳結散了。如果绳結拉紧的話，我就沒命了。

我坚决认为他們无权使我处于这种情况，使我的生命取决于別人的一举一动。

一綫阳光穿过栅栏和門門射进我的牢房。——这是我对在紐敦納德斯度过的一天的回忆,在那里我遇見過忘却了伪善的橙带党人和綠带会员。

政治苦役犯 奧頓諾凡-罗薩”534

燕妮·馬克思写于1870年3月5日

原文是法文

載于1870年3月9日“馬賽曲报”

俄文譯自“馬賽曲报”

第79号

三

1870年3月16日于倫敦

我在上一篇通訊中轉引的奧頓諾凡-羅薩的那封信，成了上星期最突出的事件。

“泰晤士報”不加評論地轉載了那封信，“每日新聞”發表了評論但沒有登載原信。

這家報紙說：“奧頓諾凡-羅薩先生選擇了他暫時(for a while)應服從的監獄規則作為信的主題，那是很自然的。”

對一個已在監獄中關了5年而且被處終身苦役的人，這“暫時”未免太殘酷了！

奧頓諾凡-羅薩先生所控訴的除了別的，還有這樣一點：“被脖子上套着繩子拉車”，使他的生命取決於他的難友英國苦役犯的行動。

“每日新聞”嚷嚷說：“難道使一個人的生命處於由別人的行動來決定的情況下就是不公平嗎？在火車或輪船上，人的生命難道不也是由別人的行動來決定嗎？”

虔誠的詭辯家在找到這樣的巧妙論據之後，又責備奧頓諾凡-羅薩不愛聖經而愛“愛爾蘭人民”。這樣把 bible [聖經] 和 People [人民] 對比是能使他的讀者大為高興的。

“每日新聞”接着說：“顯然，奧頓諾凡-羅薩先生設想，應該供給因寫煽動文章而判罪的犯人雪茄煙和每天的報紙，首先還得讓他有權和他的朋友們自

由地通信。”

好一个道德高尚的法利赛人！这样，您最后总算承认了，奥頓諾凡-罗薩被判終身苦役是由于写煽动文章，而不是像您第一次对法国报刊的呼吁中阴險地暗示的那样是由于企图暗杀維多利亞女王。

这家无耻的报纸最后說：“总而言之，奥頓諾凡-罗薩所受到的是他应受到的待遇，也就是一个普通的苦役犯应受到的待遇。”

在純粹屬於格萊斯頓的报纸的后面，又来了另一种色彩的玩弄自由主义詞句的报纸“每日电訊”，它一向是以极端狂妄粗魯聞名的。

这家报纸宣称：“如果我们理睬奥頓諾凡-罗薩的文件，那并不是为了无可救药的芬尼亚社社員，而純粹是为了法国的福祉。”

它說：“你們将会知道，几天以前，格萊斯頓先生剛剛在下院中正式駁斥过这一切无耻的謊言。当然，不会有一个思想健全的法国人，不論他屬於哪一个党派或阶级，敢怀疑英国紳士的这一声明。”

万一法国有些政党或个人已經墮落到不相信像格萊斯頓先生这样一位英国紳士的話，那末法国也还是会經不住勒維先生的善意劝告的。此人决非英国紳士，他对你們是这样說的：

“奉劝我們的巴黎邻居們，把在英国虐待政治犯的一切傳聞都当作无耻的謊言。”

如果勒維先生允許的話，我可以給你們另外举个例子，以便說明格萊斯頓內閣的紳士們的話值多少錢。

你們还記得，我的第一封信中提到过一位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員理查·伯克上校，他已被英国政府的人道措施弄到发瘋的地步。“爱尔兰人报”首先发表了这个消息。接着，安德伍德先生写

信給內务大臣普魯斯先生，要求調查对政治犯实行的制度。

普魯斯先生写信回答了他，这封信公布在英国各报上，其中有这样一段話：

“关于現在在沃金監獄的理查·伯克，您寄来的‘爱尔兰人报’的那几段話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奇怪的誹謗，普魯斯先生不得不拒絕對此进行調查。”

普魯斯先生的这一声明的日期是1870年1月11日。紧接着，不久前的一期“爱尔兰人报”发表了这位大臣答复理查·伯克的姐姐巴里夫人的一封信；巴里夫人曾請求普魯斯先生告訴她有关伯克的“令人不安”的状况。在2月24日大臣所作的答复中还附有1月11日的正式证明书，監獄医生和专门看管伯克的獄吏在证明书中都宣称伯克已經发狂。⁵³⁵这就是說，就在普魯斯先生公开把“爱尔兰人报”的話称做毫无根据的謊言的同一天，他的口袋中却藏着說明这些話确实可靠的无可怀疑的官方证明书。順便还提一下，下院的爱尔兰代表穆尔先生将就伯克上校受虐待一事向大臣提出質問。

不久前創刊的“回声报”⁵³⁶采用了比它的同行更为鮮明的自由主义的調子。它有它自己的指导原則。問題就在于这家报纸的价格是1苏，而别的报纸却卖2苏、4苏或6苏。1苏的价格使它一方面不得不发些假民主的宣言，以求不失去它的无产者訂戶，而另一方面又总是有所保留，力图从竞争者那里夺得那些体面的訂戶。

“回声报”在关于奧頓諾凡-罗薩的信的連篇空話中，居然得出了如此出色的假定：“也許被赦免的芬尼亞社社員們自己也会不相信他們同胞的夸大之詞”。似乎基卡姆先生、科斯特洛先生等并没有发表过声明，說他們在獄中也受到罗薩信中所說的完全相同的

折磨！但是，“回声报”在各种支吾搪塞和毫无意思的推托之后，触及到了一个难题。

它宣称：“‘馬賽曲报’的发表将造成一件全世界都知道的丑事。一个大陆上的人的理解力也许太狭窄，以致不能正确地看到某个‘炮弹’^①的暴行和格莱斯頓的严格这两者之间的差别。那倒不如进行一次调查的好”等等。

格莱斯頓的玩弄自由主义词句的周刊“旁观者”所奉行的是这样一种原则：除了枯燥乏味之外，一切风格都是坏的⁵³⁷。因此，它在伦敦被称为七贤者的报纸。先是简单地叙述了奥頓諾凡-罗薩的事，痛骂他一頓对圣经不敬，然后七贤者的报纸就作出了以下的判决：

“芬尼亚社社員奥頓諾凡-罗薩看来只是遭受了通常苦役犯所应受的苦；不过我们承认，这种制度最好改变一下。枪决叛乱者是非常公正的，而且还常常是非常明智的。由于他们是最危险的一种罪犯，剥夺他们的自由，那也是公正的。不过，侮辱他们是不公正也不明智的。”

說得真好，賢明的所罗門！

最后，托利党人即保守党人的主要机关报“旗帜报”也发了言。你们知道，英国的寡头是由土地贵族和金融寡头这两个部分组成的。在他们的家庭纠纷中站在金融寡头一边反对贵族的，被称为自由派，甚至激进派。反之，站在贵族一边反对金融寡头的就被称为托利党。

“旗帜报”說奥頓諾凡-罗薩的信頗像大仲馬写的一篇内容不可靠的小說。

这家报纸問道：“‘馬賽曲报’为什么不加上一句，說格莱斯頓先生、坎特伯雷的大主教和市长每天早晨都参加对奥頓諾凡-罗薩的拷問？”

① 指炮弹国王，即斐迪南二世。——編者注

在下院，一位議員曾經說托利党是一个«stupid party»(愚蠢的政党)。的确，“旗帜报”完全够得上称为愚蠢的政党的主要机关报！

在結束这封信以前，我要預先告訴法国人，別把报上的叫囂和英国无产阶级的呼声混淆起来；这一呼声在英国的报刊上没有得到反应，这对爱尔兰和英国这两个国家来说都是不幸的。

只要举出下面的事实就够了：英国工人阶级已有 20 万以上的男女老幼在海德公园发出响亮的抗議，要求釋放他們的爱尔兰弟兄；倫敦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它的一些委員是英国工人阶级公认的领导人）也尖锐地斥責虐待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員，反对英国政府并捍卫爱尔兰人民的权利。⁵³⁸

又：由于“馬賽曲报”发表了奥頓諾凡-罗薩的信件，格萊斯頓就担心輿論会强迫他对于对政治犯实行的制度作一次議会的公开調查。为了再一次逃避調查（我們知道，他那敗坏的良心已經多少次反对过这样做），这位外交家刚刚对罗薩所說的事实发表了正式的、但是匿名的否认。⁵³⁹

法国人想必明白，这一否认只是獄吏以及警官諾克斯、波洛克等等所提供的证詞的翻版。这些先生知道得很清楚，反正罗薩不能回答他們。对罗薩的監視将比过去更为严密，但是我要回答他們，我要在下一封信中举出那些不取决于獄吏們的善良意願的确定不移的事实。

燕妮·馬克思和卡·馬克思合写于
1870年3月16日

載于1870年3月19日“馬賽曲报”
第89号

署名：燕·威廉斯

原文是法文

俄文譯自“馬賽曲报”

四

1870年3月18日于倫敦

正如我在前一封信中所提到的，下院的爱尔兰代表穆尔先生昨天就虐待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員一事向內閣提出了质問。他援引了理查·伯克以及关在蒙特乔伊監獄(在都柏林)中的其他四个犯人提出的质問，并质問政府是否认为把人逼瘋之后还繼續把他們关在獄中并不碍于政府的声誉。最后，穆尔先生要求进行“全面的、自由的、公开的調查”。

这样，格萊斯頓先生就陷入了窘境。1868年，他曾經十分輕蔑地坚决拒絕了也是这位穆尔先生提出的进行調查的要求。从那时起，他对每隔一定时期就重新提出的进行調查的要求，总是同样加以拒絕。

現在为什么要让步呢？承认害怕拉芒什海峽彼岸的喧囂嗎？哪有的事！至于对“我們的”監獄行政人員提出的控訴，“我們”已要他們对此作出解釋。他們一致答复我們：这一切全是捏造。如此这般以后，我們的大臣的良心自然也就安宁了。但从穆尔先生的解釋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下面是逐字轉述——“这里还不能說有完全的安宁”。

要使“政府的良心感到安宁”(the satisfaction of the minds of the government)，那它必須信任自己的部下；“因此”(therefore)，調查一下獄吏們的声明是否可靠，那将是明智而公正的。⁵⁴⁰

“此人：朝三暮四，
昨夜深有所感，今晨全都忘記；
既厌恶自己，也难討別人欢喜，
剛打定主意，又棄之若敝屣”^①。

最后，他对要求作了让步，但并不是无条件地这样做的。

穆尔先生要求“全面的、自由的、公开的調查”。格萊斯頓先生的回答是他对調查的“方式”負責，而我們已經知道，这不会是“議会的調查”，而只会是皇家委員會的調查。換句話說，在这个格萊斯頓先生作为主要被告的轰动一时的案件中，偵訊人員要由格萊斯頓先生本人挑选和任命。

至于理查·伯克，格萊斯頓先生解釋說，政府在1月9日就已經注意到了他的瘋癲。这就是說，格萊斯頓先生的可尊敬的同行、內务大臣普魯斯先生在1月11日发表的信中說这一事实出于捏造，那是在无耻地撒謊。但格萊斯頓先生接着說，伯克先生精神上的疾病还没有严重到需要把他从苦役監獄中釋放出来的地步。不应忘記，此人曾参与了克勒肯威尔監獄爆炸案⁵⁴¹。是怎么参加的呢？当別人突然想到要炸掉克勒肯威尔監獄把理查·伯克救出来的时候，他被关在这个監獄中。因此，他就参与了人們怀疑是由英国警方策划的这次不明智的陰謀，参与了一旦获得成功就会把他自己埋葬在監獄的瓦礫堆中的陰謀。格萊斯頓先生在結束時說，其实我們已經釋放了在我們英国苦役監獄中的两名发瘋的芬尼亚社社員。穆尔先生打断他道，但是我說的是都柏林蒙特乔伊監獄中的四个精神失常的人。格萊斯頓先生答道，那没有什么关系。无

^① 布瓦洛“諷刺詩集”第八篇。——編者注

論如何，在我們的監獄中已經少了兩個瘋子！

格萊斯頓先生為什麼總是那麼小心翼翼地避而不談蒙特喬伊監獄呢？我們馬上就會明白。這一次，提供事實的不是犯人的來信，而是按議會指示於 1868 年出版的藍皮書⁵⁴²。

在芬尼亞社社員進行武裝襲擊⁵⁴³ 以後，英國政府就在愛爾蘭全境實施了戒嚴法。於是，一切有關人身自由的保證都被廢棄了。因此，凡是“有芬尼亞社嫌疑的”，都可以投入監獄，并由當局隨心所欲地不經偵察和審詢把他們一直關在獄中。都柏林的蒙特喬伊苦役監獄就是關滿了“嫌疑犯”的監獄中的一個，獄監是約瑟夫·默里，醫生是麥克唐奈先生。從按議會命令於 1868 年出版的藍皮書中我們讀到什麼呢？

在幾個月中，麥克唐奈先生曾屢次寫信抗議虐待嫌疑犯，這些信他最初是寄給獄監默里的。由於獄監不作答復，麥克唐奈先生就向典獄長打了三四次報告。在有一封信中，他指出：

（以下我逐字地引述）“有幾個人已經毫無疑義地有瘋癲的跡象。”他還補充說：“我毫不懷疑，他們是由於獄中制度而瘋癲的。如果這些未經法庭判決而只因嫌疑就被關進監獄的犯人中有人自殺，即使不從人道的角度來考慮，也會成為一件極端嚴重的事件。”

麥克唐奈先生寄給典獄長的所有這些信件都被約瑟夫·默里所截獲。最後，麥克唐奈先生就直接寫信給愛爾蘭總督大臣美奧勛爵。其中有這樣一段：

“關於在長時期中加之於嫌疑犯的那種嚴酷的制度，關於那種比對待苦役犯的制度更為嚴酷的單人監禁制度，閣下，您比任何人都了解得更為清楚。”

按議會的命令公布的這些揭露材料的結果又如何呢？麥克唐

奈医生被撤职!!! 默里保留原职。

这一切都是在托利党内閣执政的时候发生的。格萊斯頓先生在靠他那些要英国政府为芬尼亚运动負責的慷慨激昂的宣言，終于推翻了得比勋爵和迪斯累里先生之后，他不仅批准殘暴的默里官居原职，而且为了证明他特別感到滿意，除獄監的职位以外，还給了默里另一个肥缺——«Registrar of habitual criminals» [“慣犯登記官”]！

我在上一封信里曾經談到，倫敦各报刊登的对罗薩信件的匿名回答直接出自內閣。

現在已經肯定，原来这信出于內务大臣普魯斯先生之手。这就是他的“大臣的良心”的一个例证！

普魯斯先生說：“关于罗薩申訴他被迫在其他苦役犯用过的水中洗澡一事，諾克斯和波洛克两委員宣称，在他們仔細調查之后，对这种胡說可以置之不理。”

幸亏警官諾克斯和波洛克的报告是按議会的命令发表的⁵⁴⁴。他們在这报告的第 23 頁上是怎么說的呢？他們說，按獄中的制度，若干苦役犯是依次在一个浴盆中洗澡的，“獄吏如果让奧頓諾凡-罗薩第一个洗，就会侮辱其他的人”。不过，“对这种胡說可以置之不理”。

因此，根据警官諾克斯和波洛克的报告，奧頓諾凡-罗薩說他被迫在一些苦役犯用过的髒水中洗澡，这并非什么胡說——像普魯斯先生所肯定的那样。相反，这些先生們只是认为奧頓諾凡-罗薩对这种恶劣的事情提出申訴是胡說。

格萊斯頓先生在下院的一次會議上宣称准备对虐待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員一事进行調查，就在同一次會議上，他也給爱尔兰提

出了一种新的 Coercion Bill [高压法案], 即关于取消宪法自由及宣布非常状态的法案。

根据理論上的假定, 宪法自由是常規, 而暂时取消宪法自由是例外; 但根据英国在爱尔兰的統治的實踐, 非常状态法是常規, 宪法倒是例外。格萊斯頓以土地暴乱为借口, 在爱尔兰重新宣布戒严状态。他的真正动机是企图扼杀独立的都柏林报纸。今后任何一种爱尔兰报纸的生死都得取决于格萊斯頓先生的裁夺。而且, 这一 Coercion Bill 是不久前格萊斯頓先生制訂的 Land Bill (土地法案) 的必然补充, 后一种法律以帮助农民为借口巩固了爱尔兰的大地主統治。⁵⁴⁵ 只須指出內閣成員、爱尔兰大地主达費林勋爵曾經参与此事, 这一法律的性质也就可想而知了。一年以前, 这位桑格拉都医生剛出版过一部洋洋巨著⁵⁴⁶, 用来证明爱尔兰居民的血还放得不够, 應該再把他們减少三分之一, 这样爱尔兰才能完成它的光荣使命——給地主老爷們創造尽可能多的地租并給英国市場提供尽可能多的肉类和羊毛。

燕妮·馬克思写于 1870 年 3 月 18 日

原文是法文

載于 1870 年 3 月 21 日“馬賽曲报”
第 91 号

俄文譯自“馬賽曲报”

署名: 燕·威廉斯

五

3月22日于倫敦

倫敦有一家在人民中銷路极广的周报——“雷諾新聞”。它对爱尔兰問題是这样写的：

“現在，別的国家认为我們是世界上最伪善的人。我們大言不慚地替自己吹嘘，夸大地宣揚我們的各种制度的优越，这样，当我們的謊言被一一揭穿的时候，別国人嘲笑我們并問怎么会是这样，那是不足为奇的。但这情况并不是英国人民造成的，他們自己也受到迷惑和欺騙；一切罪責都在于統治階級和出賣靈魂的寄生的报刊。”⁵⁴⁷

星期四晚上提出的、对付爱尔兰的 Coercion Bill 是一种卑鄙齷齪、令人憎恨的措施。这一法案扑灭了爱尔兰民族自由的一点最后的余烬，封閉了这个不幸的国家的报刊的口，使它們不能抗議那种使我們的时代蒙受耻辱的政策。政府仇視所有那些不对它的可鄙的 Land Bill 表示高兴的报纸，并且实行报复。Habeas Corpus Act [人身保护法] 将事实上停止生效，因为今后如果有人不能把自己的行为解釋得使当局滿意，他就可能被处六个月监禁甚至終身监禁。

爱尔兰已被操纵在一帮受过良好訓練的奸細的手里，这些人为了好听被叫做“偵探”。

俄罗斯的尼古拉对不幸的波兰人頒布的命令，从来没有比格萊斯頓先生对爱尔兰人的法案更为殘酷的。这一措施足以使格萊

斯頓先生博得有名的达荷美国王的青睞⁵⁴⁸。但是，格萊斯頓竟厚顏无耻到敢于在議會和全国人面前为他的政府特意对爱尔兰实施的寬大政策吹嘘。格萊斯頓在他那星期四的发言的結尾部分，甚至以一种假仁假义的声泪俱下的沉痛語調表示惋惜，这种做作使他足能和圣斯蒂金斯先生相媲美。不过，他硬挤出来的泪水是白費了——爱尔兰人民并不会因此而受騙。

我們要重复地說，这项法律是一项可耻的措施，比起卡斯尔里来决不逊色；这一措施将使所有自由的民族詛咒那些策划它、批准它和支持它的人。最后，这一措施将使格萊斯頓內閣遭到应有的耻辱，并且使它很快垮台（这是我們所真誠希望的）。而蠱惑者大臣布莱特先生怎么能一連两昼夜保持緘默呢？

我們毫不怀疑地說，格萊斯頓已表明自己是在卑鄙的卡斯尔里之后压迫爱尔兰的最凶恶的敌人和最殘酷的統治者。

好像內閣的可耻行为尙未达到极限似的，在星期四晚上，即提出 Coercion Bill 那个晚上，在下院中有人宣布，伯克和其他几个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員已在英国苦役監獄中因不堪折磨而发疯了；但是，即使在这种可怕的事实面前，格萊斯頓和他的帮凶普魯斯还出来大声地肯定說，对待政治犯已經关怀备至。当穆尔先生在下院宣布这一不祥的事实时，他的每一句話都被粗暴的哄笑声所打断。如果这样可恶和令人气愤的場面出現在美国国会，我們这里不知道会发出多么激昂的憤怒的呼声呢！

直至目前为止，“雷諾新聞”、“泰晤士报”、“每日新聞”、“派尔-麦尔”、“电訊报”以及諸如此类的报纸还在瘋狂地为 Coercion Bill 欢呼，特别是为那些用来消灭爱尔兰报刊的措施欢呼。而这样的事居然发生于众所公认的出版界圣地英国！不过，归根到底，对所

有这些初露头角的作家是不能要求过高的。应该承认，这些比妮蘿布們看到在一星期的六天内辛辛苦苦地編造出来的謊言和誣蔑每到星期六都被“爱尔兰人报”所粉碎，决不是愉快的；因此，他們对剛把他們的死敌加上鐐铐的警察报以狂热的掌声，那是非常自然的。这些好汉們至少还不乏自知之明。

普魯斯和麦卡錫·唐宁关于理查·伯克上校曾經进行了一番值得注意的通信⁵⁴⁹。在請您讀这些信件之前，我得順便提一下，唐宁先生是下院的爱尔兰議員。这位醉心功名的律师加入大臣的行列是抱着謀取高官厚祿的高尚目的的。因此，我們这位证人并不是什么可疑的人物。

1870年2月22日

閣下：

如果我們得到的消息是正確的話，原先被囚禁在查塔姆監獄的芬尼亞社社員之一理查·伯克已在他瘋癲的狀況下被移到沃金。1869年3月，我曾經不揣冒昧地請您注意他明顯的病狀，同年7月，前任瓦特福德議員布萊克先生和我曾奉達我們的意見，即加之于他的制度如不改變，將有引起極嚴重後果的危險。但我並未獲得對該信的答復。我之所以向您上書，是出于人道的考慮，希望伯克能獲得釋放，以便他的家人能安心地照顧他，減輕他的痛苦。我手頭就有該犯人于12月3日給他兄弟的一封信；他寫道，經常有人要毒死他；我以為，這就是他患病的一個表現。誠懇地希望，您固有的善心將使您滿足這一請求。

請接受我崇高的敬意

麥卡錫·唐寧

內務部

1870年2月25日

閣下：

理查·伯克被移離查塔姆是由于他产生錯覺，以為監獄中的醫務人員要毒害他或虐待他。同時，他雖然並沒有什麼明顯的疾病，但健康狀況却日益

恶化了。因此我命令将他移至沃金并指派广澤精神病院的迈尔斯医生替他检查；迈尔斯医生认为他的瘋癲将随着健康状况的改善而消失。他的健康状况已經很快有了好轉，一般的观察者已看不出他有痴呆的現象。我非常願意能告訴您，說他有不久就获得釋放的希望，但我做不到这一点。伯克的罪行及試圖釋放他所引起的后果是极严重的，我不能令人作这样的期望。但願科学和良好的待遇能恢复他智力和体力的健康。

亨·奧·普魯斯

1870年2月28日

閣下：

我曾經請求您将伯克交給他的兄弟去照管，您2月25日給我的回信已收悉，我曾希望有机会就这一問題和您在下院交換一下意見，但是星期四和星期五您都很忙，根本无法和您見面。我收到了伯克的朋友們的來信。他們焦急地等待我請求的結果。我還沒有通知他們說我的請求沒有成功。在使他們失望以前，我认为可以就这一問題再一次向您上书。我想，像我这样一个不避对个人的危害而一直譴責芬尼亚运动的人，可以对政府提出无私的友好的忠告。

我毫不怀疑地說，釋放发了瘋的政治犯不会招致輿論的批評，更不会遭到譴責。爱尔兰人会說：“看，政府完全不像我們所想的那樣殘酷。”另一方面，如果伯克留在獄中，就会給民族的报刊提供攻击政府的新材料；人們会把政府說得比那不勒斯的統治者在其最糟的时代更为殘酷。我承认，无法設想信仰温和的人如何去为这样的拒絕行为辯护……

麦卡錫·唐宁

閣下：

很遺憾，我不能請求釋放伯克。

的确，他已經有瘋癲的征候，而如果是尋常的案件，我认为我“可以”向英王請求赦免。但他的案情非同尋常，因为他不仅是怙惡不悛的密謀者，而且还参加了克勒肯威尔的爆炸案（这次爆炸如果成功，将造成更严重的后果），这使他已成为“不宜于赦免的人”（*improper recipient of pardon*）。

亨·奧·普魯斯

真是无耻之尤！普魯斯知道得很清楚，在克勒肯威尔案件的审讯过程中，伯克上校哪怕只有一点点嫌疑，也会和巴雷特一起被絞死；巴雷特被叛处死刑，定罪是根据一个已經妄指过三个人为本案罪犯的伪证人的证詞，而特地从格拉斯哥赶来作证的八位公民的证詞却没有受到注意，他們曾經证明，当爆炸发生时巴雷特是在格拉斯哥。当問題在于絞死人、特别是絞死芬尼亚社社員的时候，英国人是絕不感到难为情的（普魯斯先生可以用事实来证明这一点）。

但是所有这許多暴行并不能摧毀爱尔兰人不屈不撓的精神。他們剛剛以前所未有的声势在都柏林举行了紀念圣帕特里克的民族节日。許多房屋上裝飾着旗帜，上面写着引人注目的大字：“爱尔兰是爱尔兰人的爱尔兰！”“自由！”“政治犯万岁！”，空中則到处飄蕩着民族歌曲和馬賽曲。

燕妮·馬克思写于 1870 年 3 月 22 日

原文是法文

載于 1870 年 3 月 29 日“馬賽曲报”

俄文譯自“馬賽曲报”

第 99 号

署名：燕·威廉斯

六

爱尔兰的土地暴乱

1870年4月2日于倫敦

在爱尔兰，大地主对农民及其家庭的掠夺和歼灭称为财产权，而绝望的农民为反抗残酷的迫害者而举行的起义则叫做土地暴乱。这些土地暴乱（agrarian outrages）虽然为数不多，但经过形形色色按命令行事的英国报刊的无限的夸张和渲染，如你们所知道的那样，已成为在爱尔兰恢复白色恐怖制度的一种借口。另一方面，这种恐怖制度使得土地所有者能够不受惩罚地加强压迫。

如上所述，Land Bill〔土地法案〕是以帮助农民之名，行巩固大地主统治之实。然而，格莱斯頓为了迷惑人心和安慰一下自己的良心，不得不在必须履行某些法律手续的条件下才批准重新延长农业中现存的专制秩序。只须指出下面一点就足以说明一切了：只要大地主能将无法偿付的荒诞的地租强加于随时都可以使之退佃的佃农（tenants at will）身上，或者在根据契约出租土地时强使农民签订自愿被奴役的条约，那末在将来，大地主的专横仍会像过去一样具有法律的效力！

大地主们多么兴高采烈！都柏林的“自由人报”刊载了“革命以来的爱尔兰大地主”一书作者帕·拉弗耳教士的书信，他这样写道：

“我看到了成堆的信件，这是一位大地主、威武的上尉、住在英格兰的‘在

外地主’写給他的佃戶的；在这些信中，他通知他的佃戶，以后他們的地租将提高 25%。这不啻是强迫迁移的警告！而这却是出于一个除了年复一年地消耗掉土地所生产的果实以外、別无贡献的人之手！”⁵⁵⁰

另一方面，“爱尔兰人报”公布了格萊斯頓內閣成員之一、达費林勛爵授意拟訂的新租約⁵⁵¹，Land Bill 就是在他的唆使下搞出来的，Coercion Bill [高压法案]也是他在上院提出的。封建主的厚顏无耻，老练的高利貸者的貪婪盘算，恶訟师的卑鄙阴險，将这三者加起来，才能对这位高貴的达費林所发明的新租約有一个近似的概念！

这样也就不难理解：正是为了实施 Land Bill 的制度，恐怖制度才应运而生。举个例說，我們假定，在爱尔兰的某一个郡中，农民或者拒絕提高地租 25%，或者不願在达費林租約上签字。于是这个郡的大地主們就会(事实上已經时常在这样做了)設法从他們的奴僕或某个警探手中接到几封匿名的恐吓信。这当然就会构成“土地暴乱”了。大地主們就把这一事实报告总督斯宾塞勛爵。斯宾塞勛爵就宣布在这一地区实施 Coercion Act [高压法]，于是还是这些大地主，就以当局的正式代表的資格来对他們的农民执行这一法律！而那些偶一不慎提出抗議的新聞工作者，不仅将因叛乱罪名而受迫害，而且他們印刷所的动产也会不經任何法律程序就被沒收！

这样，为什么你們当局的首脑^①要祝賀格萊斯頓在爱尔兰进行的改革，为什么格萊斯頓要答礼祝賀你們当局在立宪上的让步，看来也就不难理解了。你們讀者中的莎士比亚专家会这样說：“罗

① 拿破侖第三。——編者注

兰为奧利維耶尔!”⁵⁵² 而另一些不熟悉莎士比亚、但是曾經熟讀“总汇通报”的人却会想起你們当局的首脑給已故的帕麦斯顿勋爵的信件;在那封信里有这样的話:“我們决不像小偷那样做!”

現在我再重新来談談政治犯的問題,而我这样做是有根据的。

“馬賽曲报”发表的罗薩的第一封信已經在英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結果就进行了調查。

在合众国,所有报纸都发表了以下的报道:

“‘馬賽曲报’說,奧頓諾凡-罗薩每天都被剝得精光进行搜查,他挨着餓,被关在单人黑牢中,还被套在馬車上拉車子;他的难友們被冻死了。”

“爱尔兰人报”的紐約通訊員这样报道:

“罗什弗尔的‘馬賽曲报’使美国人民看到了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員所受的苦难。我們对‘馬賽曲报’深为感激,希望它将得到热心的报答”。⁵⁵³

德国的报纸也轉載了罗薩的信。

今后英国政府已不能在各方面都緘默的情况下干卑鄙的勾当了。格萊斯顿先生想封住爱尔兰报刊的口,那是枉費心机,他絕對做不到这一点。一个新聞工作者在爱尔兰被投入監獄,千百个新聞工作者会在法国、德国、美国出現。

面对着十九世紀所特具的国际主义精神,格萊斯顿先生那种狹隘而落后的政策能有什么作为呢?

燕妮·馬克思写于1870年4月2日

載于1870年4月12日“馬賽曲报”
第113号

署名:燕·威廉斯

原文是法文

俄文譯自“馬賽曲报”

七

約翰·林奇的死

編輯公民：

茲寄上从一位爱尔兰政治犯的书信中抄下的一段話，这封信是他在澳大利亚流放地写給“爱尔兰人报”的（現在他已获自由）。

我所譯的只是有关約翰·林奇的一节。

約翰·凱西的信

“我現在簡略地公正地談談我們——我的流放难友（共 24 人）和我——被监禁于这所充滿恐怖的监牢，这名叫波特兰監獄的活人坟墓期間所受到的待遇。

首先，我认为應該对我的朋友約翰·林奇表示尊敬而公正的悼念。他于 1865 年 12 月經特別法庭判決，1866 年 4 月死于沃金監獄。

不論陪审員对他的死亡作如何解釋，我可以肯定地說（并能提出证据），他的死亡是由于獄吏的殘酷所促成的。

在寒冷的冬天，24 小时中有 23 小时他被关在冰冷的单人牢房中；穿不暖；睡在光秃秃的木板上，用木柴当枕头，两条共有大約十磅重的破被就是唯一用来抵御严寒的东西；由于獄吏的不可名状的刻毒，我們甚至被迫把自己的衣服挂在单人牢房的門上而不能用来遮盖一下冻僵的身体；吃的是有害健康的東西，而且只有一点点；我們被关在長約 20 英尺寬 6 英尺的关流氓恶棍的囚籠中，每昼夜只有一次三刻钟放風時間；就是铁打的身体也会被这种折磨和痛苦毀掉。像林奇这样柔弱的身体立刻就垮掉，更不足为奇了。

林奇到監獄時曾請求让他留下他的御寒內衣。他的这一請求遭到了粗暴的拒絕。他当时就說：‘如果你們拒絕我的要求，我活不上三个月就会死

的。’啊，我当时真沒有料到一語成讖；我没有想到爱尔兰会这样快地丧失一个最忠誠、最热情、最高貴的儿子，我自己会丧失一位久經考驗的朋友。

3月初，我就注意到我的朋友身患重病；有一次，乘獄吏离开一会的时候，我問他身体怎样。他回答我說，他快死了，他好几次告訴过医生，但是医生对他的申訴根本不加注意。他咳嗽得很厉害，虽然我被关在一間离他极远的单人牢房中，还是白天黑夜都听到空洞洞的走廊中傳來他咳嗽的回声。甚至一个獄吏也这样告訴过我：‘7号牢房中的犯人快完了，一个月以前就該把他送进医院。我在那里很多次看到比他健康一百倍的普通犯人。’

4月里，我有一次从单人牢房中望出去，看到一个面色惨白、两眼无神、双頰深陷的像幽灵一样的人，他在吃力地慢慢向前挪动，一面抓住铁柵以免跌倒。这就是林奇。我起先沒有认出来是他，后来他看我一眼，对我笑笑并指指地下，似乎是要說：‘我快完了。’

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林奇。”

罗薩关于林奇的报道也完全一样，这证明凱西的证詞是确实的。不要忘了，罗薩的信发自英国監獄，凱西的信則写于澳大利亞的罪犯流放地；因此，他們两人是絕對不可能有联系的。可是不久以前，政府仍然肯定說罗薩的話是謊言。普魯斯、波洛克和諾克斯甚至說：“林奇自己还没有提出要求，就已經发給他御寒的内衣了”。

另一方面，正像普魯斯先生坚决否认那样，凱西先生却同样地坚决证明，林奇曾經申訴过：“甚至在他已經不能走动而不得不单独留在牢房內的可怕时刻，他的請求还是遭到拒絕。”

不过，正如洛里埃先生在他那出色的发言中所說的：

“讓我們丢开人的证詞，让不說謊的证人、不会說話的证人来作证吧。”⁵⁵⁴

事实是这样：林奇在进入彭頓維耳監獄时年紀輕輕，充滿生命力和希望，可是三个月之后，这个年輕人就成了一具死尸。

除非格萊斯頓先生、普魯斯先生和他的那一伙警探能证明林奇并没有死,否則,他們发誓賭咒也是白白浪費時間。

燕妮·馬克思写于 1870 年 4 月 17 日
左右

原文是法文

俄文譯自“馬賽曲报”

載于 1870 年 4 月 17 日“馬賽曲报”
第 118 号

署名:燕·威廉斯

八 英国来信

1870年4月19日于倫敦

“不让神甫参加政治！”这是目前在爱尔兰到处都可以听到的呼声。

一个偉大的政党，它从新教教会 *disestablishment*〔同国家分离〕以来，竭尽全力在反抗天主教教会的专制，现在正在一天比一天以惊人的速度成长起来，并且刚刚击溃了教会。

在郎弗德的选举中，教会的候选人格雷維耳-紐金特先生胜过了人民的候选人約翰·馬丁；但是民族主义者对他的当选提出異議，因为它是靠非法的手段取得的，結果，民族主义者战胜了对手。菲茲吉拉德法官取消了紐金特的当选資格，宣称紐金特的代理人即神甫們有罪，因为他们們对选民行贿，使这个国家不是充滿神圣的精神，而是充滿犯罪的精神。据报道，仅仅在12月1日至1月1日这一个月中，可敬的神甫們花在燒酒上的錢就有3500英鎊之多！

“旗帜报”却就郎弗德的选举发表了相当奇特的見解：

«Stupid party»〔“愚蠢的政党”〕的机关报說：“民族主义者蔑視神甫們的恫吓，这值得贊揚…… 他們所获得的偉大胜利，将促使他們提出新的候选人，以对抗格萊斯頓先生和他的同盟軍、教皇至上主义者。”

“泰晤士报”这样写道：

“教会势力所拥有的一切手段，从来自永恒的城市的教皇訓諭起直至农

村神甫的陰謀，都被用来对付芬尼亚运动和民族主义者。不幸的是，这种狂热并不同时具备理智，其結果将导致第二个郎弗德战役。”⁵⁵⁵

“泰晤士报”說得对。郎弗德战役将会重演，接着而来的将是瓦特福德、馬洛和梯培雷里的战役，因为这三个郡的民族主义者也提出請願，要求取消官方代表的当选資格。在梯培雷里，最初当选的是奧頓諾凡-罗薩，但是由于議會宣称他在法律上沒有能力代表梯培雷里，民族主义者只好推选剛从英国苦役監獄获得釋放的芬尼亚爱国志士基卡姆来代替他。現在，投基卡姆票的选民們坚持他們的候选人已通过应有的手續当选，虽然候选人赫倫比他多得四票。

大家應該知道，投赫倫票的四人中有一个是不幸的精神病患者，他是被可敬的神甫拖到票箱前来的；你們知道，神甫們对智力缺乏的人有所偏爱，因为天国是他們的。第二个选民是一具死尸！的确确是死尸。可敬而温和的政党竟然玷污了一位选举前两星期已經过世的人的名字，强使他也投票贊成格萊斯頓的候选人。此外，爱国的选民們还宣称他們有十一張选票由于基卡姆的名字的第一个字母写得不清楚而被作廢，他們的电报被銷毀，当局到处行贿并且采取了一系列卑鄙的恐吓手段。

在梯培雷里所施加的压力甚至在爱尔兰的历史上也是聞所未聞的。法警和警探們，这些强迫迁居执行令的化身，包圍佃农的小屋，恐吓他們的老婆和孩子。用来举行选举的小棚子，被警察、士兵、官吏、地主和神甫团团包圍。

他們用石头痛击那些替基卡姆張貼竞选招貼的人。此外，在选举棚中，高利貸者还坐在那里虎視眈眈地看着他的可怜的債務人投票。但是政府並沒有因此而获得什么好处。1668个小佃农

在投票不保密的情况下，一无所惧，公开地投了基卡姆的票！

这一豪迈的举动使人想起波兰人的英勇斗争。

在郎弗德、馬洛、瓦特福德和梯培雷里等地的激战以后，看誰还敢再說爱尔兰人是宗教迷信的可怜的奴隶吧！

燕妮·馬克思写于1870年4月19日

原文是法文

載于1870年4月24日“馬賽曲报”
第125号

俄文譯自“馬賽曲报”

署名：燕·威廉斯

卡·馬克思关于“蜂房报” 的发言记录⁵⁵⁶

摘自 1870 年 4 月 26 日总委员会会议记录

公民馬克思建議总委员会与“蜂房报”断絕一切联系。

他說，这家报纸常常隐瞒我們的決議，歪曲我們的报道；它們的发表被拖延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不得不伪造日期；甚至报道中提到就有关被囚禁的爱尔兰人的几个問題进行了討論的話也被刪去了。

其次，“蜂房报”的調子違反协会的章程和綱領。該报宣揚与資本家協調，而协会是向資本家的統治权宣战的。

此外，我們在外国的支部对下述的事实表示不滿，即我們既然把我們的报道送給“蜂房报”，这也就是在道义上支持这家报纸，从而使人有理由认为我們贊同該报的政策。對我們來說，即使完全沒有喉舌，也要比利用“蜂房报”更好些。

当在爱尔兰对停止实施宪法保障的法案⁵⁵⁷ 进行討論时，該报沒有說过一句反对政府的話。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总委员会记录簿

卡·馬克思給社会民主工党 委员会的信⁵⁵⁸

(轉 述)

1870年6月27日于倫敦

信中涉及到国际工人协会的一些具体問題，特别是关于代表大会延期的問題。馬克思在这封信中坚决拒絕李卜克內西关于把代表大会延期到10月召开的建議，虽然总委员会本身也十分希望这样延期，因为給代表大会的材料还未准备好。不过法国人本来就因为代表大会将在美因茲召开而感到气愤，他們想哪怕是在佛尔維耶召开也好，巴黎人更是希望代表大会能在巴黎举行。不应当为不满情緒制造借口。馬克思耽心，如果同意李卜克內西关于延期召开代表大会的建議，那末代表大会将是一个少数人——以巴枯宁为首的法国人和罗曼語区的瑞士人——的代表大会。他說：“民族的无謂角逐已經十分根深蒂固，因此，任何理智的論据都不能在一天之內根除它。”

載于1872年在萊比錫出版的
“萊比錫叛国审判案”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1872年版本譯的，
并根据1874年和1894年版
本校对过

卡·馬克思关于罗曼語区联合会的 分裂的发言記錄⁵⁵⁹

摘自 1870 年 6 月 28 日总委员会會議記錄

公民馬克思认为：总委员会能够做的只有一点，即保留日内瓦的委员会的原有名称，因为由现有的全体成員組成的日内瓦委员会从它建立之日起就支持协会。日内瓦委员会在各个方面都履行了自己的职责，虽然它在瑞士的代表大会上的代表比另一方为少，但它代表着人数更多的协会会员。必需同时把关于准许同盟入会的表决通知它們。让新的委员会替自己挑选一个有地区特征的随便什么名称好了。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总委员会記錄簿

注 釋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
生平事业年表

索 引

注 釋

- 1 1864年9月28日在倫敦圣馬丁堂举行了工人的盛大的国际性會議；大会是倫敦各工联的領導人和一个由巴黎来的蒲魯东派工人代表团筹备的，当时居住在倫敦的德国工人、意大利工人和其他国家工人中的代表，以及一些欧洲的小資產階級革命民主主义流亡者也参加了筹备工作。大会通过了成立国际工人协会（后来通称为第一国际）的決議，并选出了临时委员会。卡·馬克思被选入这个委员会，接着又被选入在10月5日临时委员会第一次會議上任命的协会綱領性文件起草委员会。起草委员会的最初几次會議在馬克思缺席的情况下草拟了一个文件，它由两部分組成，一部分是由欧文的信徒韦斯頓起草并經法国小資產階級民主主义者勒·呂貝校閱的作为引言的宣言，另一部分是意大利人魯·沃尔弗譯成英文的、由馬志尼制定的意大利工人团体章程（詳見本卷第588、597—598頁）。馬克思在10月18日的會議上才第一次看到这个文件，并对它提出批評；文件被退回起草委员会作最后的修訂。起草委员会于10月20日把这项工作委托給馬克思，而于10月27日贊同了馬克思写成的两份全新的文献：“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协会临时章程”。1864年11月1日，宣言和章程經已被确认为协会領導机关的临时委员会一致批准。这个以国际总委员会的名称載入史册的机关，在1866年年底以前多半称为中央委员会。

成立宣言最先发表在1864年11月5日“蜂房报”第160号上，随后又于同月和章程一起印成小册子“1864年9月28日在倫敦朗-爱克街圣馬丁堂举行的公开大会上成立的国际工人协会的宣言和临时章程”（«Address and Provisional Rules of the Working Men's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Established September 28, 1864,

at a Public Meeting held at St. Martin's Hall, Long Acre, London)。1864年12月21日和30日，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号和第3号上发表了原作者的德譯文。1866年，宣言譯成法文。宣言的最早的俄譯文于1871年在日内瓦問世。保存下来的成立宣言的两份手抄本，是馬克思夫人燕妮·馬克思和他的女儿燕妮抄写的。

刊載在本卷的宣言以1864年发行的英文小册子的文字为依据。英文原文与原作者的德譯文之間的重要不同之处都附有脚注。

“蜂房报”（《The Bee-Hive Newspaper》）是英国工联的机关报（周报）；从1861年至1876年在倫敦出版，用过如下三种名称：“蜂房”（《The Bee-Hive》）、“蜂房报”（《The Bee-Hive Newspaper》）、“辨士蜂房”（《The Penny Bee-Hive》）；該报受到資產階級激进派和改良派的强烈影响。1864年11月22日在总委员会會議上該报被宣布为国际的机关报。国际工人协会的正式文件和总委员会历次會議的报道都刊登在該报上面。但是刊登在該报上的国际文件常被窜改或删节，为此，馬克思曾一再提出抗議。从1869年起該报实际上已蜕变为資產階級的机关报。1870年4月，总委员会根据馬克思的建議，与“蜂房报”断絕了一切关系，并在报上发表了有关的声明（見本卷第480、701頁）。——第5頁。

- 2 馬克思引自报上报道的財政大臣格萊斯頓于1864年4月7日在下院的講話。——第5頁。
- 3 “勒杀犯”(garroters)是一种行劫的强盜，他們专招受害者的咽喉。六十年代初这种行劫在倫敦常常发生，以致成了議會专门討論的題目。——第5頁。
- 4 藍皮书(Blue Books)是英国議會和外交部发表的資料和外交文件的总称。藍皮书因藍色的封皮而得名，英国从十七世紀开始发表藍皮书，它是英国經濟史和外交史的主要官方資料。

这里提到的藍皮书是指“流放苦役法执行情况調查委员会报告书”1863年倫敦版第1卷(《Report of the Commissioners appointed to inquire into the Operation of the Acts relating to

Transportation and Penal Servitude». Vol. I, London, 1863)。——第6頁。

- 5 指“樞密院卫生視察員 1863 年度第六号报告书”1864 年倫敦版(«Sixth Report of the Medical Officer of the Privy Council, 1863». London, 1864)。——第6頁。

- 6 馬克思在这里引的格萊斯頓在 1863 年 4 月 16 日所說的話，由于德国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布倫坦諾于七十年代掀起反对馬克思的誹謗运动，而为大家所熟知。倫敦各家報紙(“泰晤士报”、“晨星报”、“每日電訊”等)差不多全都在 1863 年 4 月 17 日关于議會會議的报道中刊登了格萊斯頓的這句話，而在汉薩德的半官方出版物議會辯論專輯中却省略了這句話，因为汉薩德版本的文字是經過发言人后来亲自修改过的。这就給了布倫坦諾一个借口，他指責馬克思在科学上不誠实。馬克思在 1872 年 5 月 23 日和 7 月 28 日致“人民国家报”編輯部的两封信中对这种誹謗作了回答(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 2 版第 18 卷)。

馬克思死后，英国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泰勒于 1883 年 11 月重又提出同样的指責。爱琳娜·馬克思于 1884 年 2 月和 3 月在致“今日”(«To-Day»)杂志的两封信中，以及后来恩格斯于 1890 年 6 月在“資本論”德文版第四版的序言中、于 1891 年在小册子“布倫坦諾 contra [反对]馬克思”中都彻底地揭穿了所謂伪造引文的胡說。——第7頁。

- 7 «Sixth Report...», p. 25—27. ——第8頁。

- 8 “童工調查委員會 (1862)。委員會第一号报告书” 1863 年倫敦版第 24 頁 («Children's Employment Commission (1862). First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ers». London, 1863, p. 24)。——第8頁。

- 9 指休·西·特里門希尔“就面包房工人的申訴向女王陛下內务大臣的报告” 1862 年倫敦版 («Report addressed to Her Majesty's Principal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 relative to the Grievances complained of by the Journeymen Bakers», London, 1862)。——第8頁。

- 10 在英国，工人階級爭取用立法手段限制工作日为十小时的斗争是从十八世紀末开始的，从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初起，广大的无产階級群众投入了这一斗争。

1847年6月8日議會通过了只适用于童工和女工的十小时工作日法案。但是实际上許多厂主并没有遵守这项法律。——第11頁。

- 11 指首相帕麦斯頓于1863年6月23日在議會的一次定期會議上討論爱尔兰租佃者权利問題时的讲话。以馬瓜伊尔为首的爱尔兰議員要求采取立法措施，限制大地主对租佃者的橫行霸道。例如，議員們要求让租佃者有权在解除租約时取得对于他們在租种的土地上所耗全部費用的补偿。帕麦斯頓在讲话中把爱尔兰議員的要求叫做“共产主义的教条”、“对社会秩序的基本原則的破坏”。——第13頁。

- 12 指美国內战期間英国工人于1861年底到1862年初为反对英国政府站在南部各蓄奴州一边干預战争所采取的行动。工人的斗争由于所謂的“特倫特号”事件而变得特別激烈，当时，英国資产階級利用北部政府截获和逮捕坐上“特倫特号”輪船赴英的奴隶主代表事件作口实，准备向北部各州开战。英国工人坚决支持北部。在人数众多的群众集会上，工人們抗議反动的資产階級叫囂战争，要求和平解决冲突。英国工人反对干涉的群众性运动，使反动派沒有能够把欧洲拖入支持奴隶主的战争，这一运动大大加强了无产階級国际团結的思想。——第14頁。

- 13 “协会临时章程”是由馬克思在起草“成立宣言”（見注1）的同时写的。在草拟“章程”时，馬克思彻底改写了在1864年10月18日临时委员会會議上被提出的那份文件的引言部分，把章程的条目由40条縮减为10条，改变了根本的組織原則，只把个别形式性质的条款保留下来（如組織名称、关于1865年在布魯塞尔召开代表大会的决定、对于从一地轉至另一地的組織成員給以帮助、等等）。

馬克思所写的“临时章程”在10月27日得到起草委员会的贊同，并在1864年11月1日由临时委员会一致批准。它和“成立宣言”一起于1864年11月在倫敦出版的小册子“国际工人协会的宣言和临时章

程……”(«Address and Provisional Rules of the Working Men's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中以及1864年11月12日“蜂房报”第161号上以英文发表。在1864年底把“临时章程”翻譯成法文时,巴黎支部的蒲魯东主义领导作了許多歪曲,这些歪曲后来被同馬克思敌对的分子利用来反对总委员会(見本卷第441—442、475—476頁)。經過改正的新的法譯文是由沙·龙格在馬克思的指导下譯出的,它和“成立宣言”一起发表于1866年在布魯塞尔出版的小册子“国际工人协会宣言。附临时章程”(«Manifeste de 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suivi du Règlement provisoire»)。德譯文第一次发表在1866年4月和5月“先驅”第4期和第5期上。日內瓦代表大会在9月5日的會議上批准了“章程”(“共同章程”),并給它补充了一个“条例”,“条例”在1866年9月8日的會議上得到批准,后来被称为“組織条例”。

“先驅”(«Der Vorbote»)月刊是瑞士的国际德国人支部的正式机关刊物,1866年至1871年在日內瓦以德文出版;主編是約·菲·貝克尔。該杂志总的說来执行馬克思和总委员会的路綫,有系統地发表国际的文件,报道协会各国支部的活动情况。——第15頁。

- 14 帶有宣言性质的这一段和前面一段,是馬克思在起草委员会其他委員的坚持下加入章程的引言部分的,馬克思在1864年11月4日写給恩格斯的信里曾談到这件事。——第16頁。
- 15 原定于1865年在布魯塞尔召开的国际工人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866年9月3—8日在日內瓦举行。关于代表大会延期召开的决定是总委员会在馬克思的坚决要求下通过的。馬克思认为,国际的各个地方組織在思想上和組織上还不够巩固,因此建議先在倫敦召开一个預备會議(見本卷第581—583頁)。——第16頁。
- 16 “关于接受工人組織加入国际工人协会的条件的決議草案”是馬克思在1864年11月22日的总委员会會議上提出的,決議草案由总委员会一致通过,成为“中央委员会告各工人团体书”(見本卷第579—580頁)的藍本。

決議草案的原文保存在总委員會的記錄簿里。決議发表在 1864 年 11 月 26 日“蜂房报”第 163 号上。第二个決議在报上发表时較为詳細。——第 19 頁。

- 17 致美国总統阿·林肯的公开信是卡·馬克思于 1864 年 11 月 22 日和 29 日之間写成的。11 月 22 日总委員會根据委員迪克和豪威耳的建議决定致函林肯、祝賀他再度当选总統。

起草賀信的工作會委托給本来为制定协会的綱領性文件而选出的委員會(見注 1)。这个委員會在綱領性文件批准之后成为总委員會的常設执行机关,記錄簿里称它为常务委員會(Standing committee)或小委員會(Subcommittee);它由下列人員組成:总委員會主席(直到 1867 年洛桑代表大会廢除这个职位为止)、总書記、財務委員和各国通訊書記。馬克思通过常务委員會領導了总委員會的日常工作,他作为德国通訊書記,是常务委員會的委員。

馬克思起草的公开信得到常务委員會的贊同,1864 年 11 月 29 日經总委員會一致批准,并通过美国駐倫敦公使亚当斯轉交林肯总統。1865 年 1 月 28 日总委員會收到以林肯的名义寄来的回信,該信于 1 月 31 日在总委員會會議上宣讀,并刊登在 1865 年 2 月 6 日的“泰晤士报”上。正如馬克思在 1865 年 2 月写給威·李卜克內西的信中指出的那样,林肯在給他收到的各种团体的賀信的回信中,只有給国际工人协会的回信“不是单纯从形式上证明他已收到了賀信”。

致林肯的公开信首先发表在 1864 年 12 月 23 日的英国报纸“每日新聞”上,随后又发表在 1864 年 12 月 25 日“雷諾新聞”第 750 号和 1865 年 1 月 7 日“蜂房报”第 169 号,以及一些德国报纸上——1864 年 12 月 30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3 号附刊、1865 年 1 月 5 日“柏林改革报”第 4 号和 1865 年 1 月 7 日“海尔曼”周报第 314 号上。

俄譯文是按寄給林肯的有总委員會全体委員亲笔签名的賀信手稿譯的,并根据“蜂房报”校对过。——第 20 頁。

- 18 这里指的是 1776 年 7 月 4 日英国在北美的 13 个殖民地的代表在費拉得尔菲亚召开的大会上所通过的“独立宣言”,宣言宣告北美殖民地脱离英国成立独立的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在这个文献中表述了这

样一些资产阶级民主的原则，如个人自由、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人民主权的原則，等等。当时，当封建专制制度还統治着欧洲的时候，这些原則的宣布給欧洲革命的民主运动、特别是十八世紀末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影响很大。但是美国的资产阶级和大土地所有者从一开始就破坏了宣言中宣布的民主权利，他們把人民群众排除于政治生活之外，并把剥夺了占共和国居民很大部分的黑人的基本人权的奴隶制度保存了下来。——第 20 頁。

- 19 造成棉业危机的原因是，由于美国内战期間北軍舰队封鎖了南部的各个蓄奴州，使得来自美洲的棉花供应中断。棉荒发生在生产过剩危机的前夜，并同它交織在一起。欧洲大部分棉紡織工业陷于瘫痪，这严重地影响到工人的状况。1862 年間，英国 $\frac{3}{5}$ 的紗錠和織布机停工，75% 以上的棉紡織业工人接連两三年陷于全失业或半失业的状态。工人的貧困由于六十年代初期欧洲歉收而益形加重，欧洲的許多城市发生了真正的饥荒。然而，欧洲的无产阶级不顾一切艰难困苦，仍然坚决地援助了美国北部各州。——第 21 頁。

- 20 “观察家报”編輯部只发表了馬克思这封同文件一起寄来的信和它对于馬克思信中所附的声明的“評論”。

“观察家报”（《Der Beobachter》）是一家德国日报，从 1833 年起用該名称在斯图加特出版；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机关报，它的副标题是“施瓦本人民小报”（《Ein Volksblatt aus Schwaben》）。——第 23 頁。

- 21 馬克思致“观察家报”編輯的信是同揭露波拿巴的暗探卡·福格特有关的爭論的繼續。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卡·布林德是匿名傳单“警告”的作者，傳单的目的是反对福格特，1859 年 6 月“人民报”和“总汇报”轉載了这个傳单。但是布林德不願意公开反对福格特，因而他否认傳单是他写的。馬克思在自己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中揭露了布林德的胆怯态度。

发表在 1864 年 11 月 17 日“观察家报”第 268 号上的那篇寄自布萊得弗德的匿名通訊的作者也是卡·布林德，这篇通訊迫使馬克思再

一次痛斥他是好說謊的人，并且揭穿了布林德吹噓自己在美国的影响的謊言。应拉薩尔的朋友索菲亚·哈茨費尔特的請求，馬克思在信中還反击了布林德对拉薩尔的攻击。1864年11月25日馬克思在写信告訴恩格斯关于他准备反对布林德时写道：“因为拉薩尔已經死了，他本人不可能有更大的危害，所以必須——当然是在可能的範圍內，即以不損害自己的声誉为限——保护他来反对这些小資產階級无賴汉。”馬克思在1864年12月22日給哈茨費尔特的信中说：“我按你的意願作了这个声明，而且是費了很大勁才把它最后定下来，因为我并不同意拉薩尔的政治策略。”

馬克思預料到“观察家报”編輯部可能不刊登这封信，他把信的原文寄給哈茨費尔特，要她在其他德国报纸上发表；哈茨費尔特曾把它登在“北极星”报上。

“北极星”（《*Nordstern*》）是德国的一家周报；1860—1866年在汉堡出版；从1863年起帶有拉薩尔主义的傾向。——第24頁。

- 22 指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14卷第395—691頁）。——第24頁。
- 23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14卷第497頁。——第25頁。
- 24 “总汇报”（《*Allgemeine Zeitung*》）是德国保守派的日报，1798年創刊；1810年至1882年在奧格斯堡出版。——第25頁。
- 25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14卷第499—500頁。——第25頁。
- 26 “新德意志报”（《*Neue Deutsche Zeitung*》）是民主派的日报；1848—1850年出版，1849年4月1日以前在达姆斯塔德出版，从4月1日起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在1849年10月1日以前該报的責任編輯是奧·呂宁，从10月1日起該报的編輯有奧·呂宁、格·君特和約·魏德迈。——第25頁。
- 27 “西邮报”（《*Die Westliche Post*》）是一家德文报纸，从1858年起在圣路易斯（美国）出版；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是流亡美国的小資產階級

民主派的机关报。——第 26 頁。

- 28 1864 年 9 月 29 日“新法兰克福报”第 270 号。

“新法兰克福报”(«*Neue Frankfurter Zeitung*»)是德国民主派的报纸。从 1859 年至 1866 年用该名称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第 26 頁。

- 29 1864 年 10 月 8 日“海尔曼”第 2407 号。

“海尔曼”(«*Hermann*»)是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机关报“海尔曼。伦敦德文周报”(«*Hermann. Deutsches Wochenblatt aus London*»)的简称,从 1859 年起在伦敦用德文出版;该报是以凯拉赛人的领袖阿尔米纽斯的名字命名的,自从十七世纪末洛恩施坦的长篇小说“英勇的人民英雄阿尔米纽斯,或海尔曼”问世以后,阿尔米纽斯也不正确地被称为海尔曼。——第 26 頁。

- 30 暗指伊索寓言“年老的狮子”中的馱子。——第 27 頁。

- 31 “論蒲魯东”一文是由于蒲魯东之死,馬克思于 1865 年 1 月 24 日应“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編輯施韦澤的请求而写的。该报在 1865 年 2 月 1 日、3 日和 5 日的第 16—18 号上刊登了这篇文章。馬克思的部分手稿的草稿还保存着。

“社会民主党人报”(«*Social-Demokrat*»)是拉薩尔派的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机关报。从 1864 年 12 月 15 日至 1871 年用该名称在柏林出版;1864 年至 1865 年約·巴·施韦澤担任編輯。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64 年 11 月收到施韦澤寄来的该报的办报綱領,其中沒有包含拉薩尔的口号,当时由于沒有掌握其他机关报来影响德国的工人运动,他们就同意为“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威·李卜克内西是该报的非正式編輯。

这家报纸除了刊登馬克思为“社会民主党人报”写的“論蒲魯东”一文之外,还刊登过馬克思写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恩格斯翻譯的古代丹麦民歌“提德曼老爷”(見本卷第 5—14、37—39 頁)。关于馬克思和恩格斯同“社会民主党人报”編輯部的关系的历史,見馬克思关于不給“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的原因的声明,该文写于 1865 年 3 月 15

日,发表在“柏林改革报”上(見本卷第95—98頁)。

“論蒲魯东”一文曾轉載于卡·馬克思的著作“哲学的貧困”德文第一版和第二版,这两版經過恩格斯校訂,于1885年和1892年出版。1886年,这篇文章第一次用俄文发表在“劳动解放社”出版的“哲学的貧困”上。該文的法譯文是恩格斯在1884年翻譯的,并經過保·拉法格校閱;1896年“哲学的貧困”法文版上所发表的譯文就是以恩格斯的譯文为基础。——第28頁。

- 32 指蒲魯东的著作“論通用文法”(«Essai de grammaire générale»), 載于貝尔紀埃“語言的基本原理”1837年伯桑松版(Bergier. «Les éléments primitifs des langues». Besançon, 1837)。——第28頁。
- 33 比·約·蒲魯东“什么是财产? 或关于法和权力的原理的研究”1840年巴黎版(P. J. Proudhon. «Qu'est-ce que la propriété? ou Recherches sur le principe du droit et du gouvernement». Paris, 1840)。——第28頁。
- 34 托·罗·馬尔薩斯“論人口律和人口对未来社会改良的影响。評葛德文先生、孔多塞先生和其他作者的观点”1798年倫敦版(T. R. Malthus. «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as it affects the future improvement of society, with remarks on the speculations of Mr. Godwin, M. Condorcet, and other writers». London, 1798)。——第29頁。
- 35 指瓦尔維耳的雅·比·布里索的著作“哲学研究。論所有权并論自然界和社会中的盜窃”(«Recherches philosophiques. Sur le droit de propriété et sur le vol, considérés dans la nature et dans la société»); 它載于“立法者、政治活动家和法学家哲学丛书”1782年柏林版、巴黎版、里昂版第6卷(«Bibliothèque philosophique du législateur, du politique, du jurisconsulte». T. VI, Berlin, Paris, Lyon, 1782)。——第30頁。
- 36 比·約·蒲魯东“經濟矛盾的体系, 或貧困的哲学”1846年巴黎版第

- 1—2卷(P. J. Proudhon. «Système des contradictions économiques, ou Philosophie de la misère». T. I—II, Paris, 1846)。——第31頁。
- 37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71—198頁。——第31頁。
- 38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154頁。馬克思同时用法文和德文引证了“哲学的貧困”中的这段話和下面一段話。在經恩格斯校閱的、于1885年和1892年出版的德文版“哲学的貧困”中删除了法文的引证。——第32頁。
- 39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157—159頁。——第33頁。
- 40 指埃蒂耶納·卡貝——和平空想共产主义的著名代表——在十九世紀三十至四十年代法国无产階級政治运动中的作用。卡貝在他出版的“人民报”(«Le Populaire»)和“1841年人民报”(«Le Populaire de 1841»)上除了宣傳自己的空想的計劃外，还批評了七月王朝的制度并促进了民主主义思想的傳播。卡貝在自己的著作、文章、傳单中尖銳地批評資本主义制度。尽管卡貝的观点是空想主义的，他的这些活动却在法国无产階級的政治教育事业中起过显著的作用。——第34頁。
- 41 沙·杜諾瓦耶“論劳动自由，或关于人的力量能够得到最大發揮的条件的簡述”1845年巴黎版第1—3卷(Ch. Dunoyer. «De la liberté du travail, ou Simple exposé des conditions dans lesquelles les forces humaines s'exercent avec le plus de puissance». T. I—III, Paris, 1845)。——第34頁。
- 42 指蒲魯东在1848年7月31日法国国民議会的會議上的演說。演說的全文刊登在“国民議会會議記錄”1849年巴黎版第2卷第770—782頁(«Compte rendu des séances de l'Assemblée Nationale». Vol. II, Paris, 1849, p. 770—782)。蒲魯东在这次演說中提出了一系列帶有小資产階級空想理論气味的建議(如廢除貸款利息等等)，同时說1848年6月23—26日在巴黎对无产階級起义参加者的鎮压是暴力和专橫的表现。对这篇演說的詳細評价見“蒲魯东反对梯也尔的演

- 說”一文(“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355—359頁)。——第34頁。
- 43 指梯也尔在1848年7月26日反对蒲魯东在法国国民議會財政委員會上提出的建議的演說。演說发表在“国民議會會議記錄”1849年巴黎版第2卷第666—671頁。——第34頁。
- 44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70—76頁。——第34頁。
- 45 “无息信貸。弗·巴师夏先生和蒲魯东先生的辯論”1850年巴黎版(«Gratuité du crédit. Discussion entre M. Fr. Bastiat et M. Proudhon». Paris, 1850)。——第35頁。
- 46 指比·約·蒲魯东的著作“稅收理論，窩州政務會議为1860年征文比賽提出的問題”(«Théorie de l'impôt, question mise au concours par le conseil d'État du canton de Vaud en 1860»), 1861年在布魯塞爾和巴黎出版。——第35頁。
- 47 比·約·蒲魯东“从十二月二日政变看社会革命”1852年巴黎版(P. J. Proudhon, «La Révolution sociale démontrée par le coup d'État du 2 Décembre». Paris, 1852)。——第35頁。
- 48 比·約·蒲魯东“1815年的条約已不存在了嗎? 未来的代表大会決議書”1863年巴黎版(P. J. Proudhon, «Si les traités de 1815 ont cessé d'exister? Actes du futur congrès». Paris, 1863)。在这一著作中蒲魯东反对修改1815年維也納會議关于波兰的決議, 反对欧洲民主力量支持波兰的民族解放运动, 从而为俄国沙皇制度的压迫政策辯护。——第35頁。
- 49 “民法論, 或社会的基本原理”1767年倫敦版第1—2卷(«Théorie des lois civiles, ou Principes fondamentaux de la société». Tomes I—II, Londres, 1767)。該书匿名出版。——第36頁。
- 50 恩格斯把古代丹麦民歌“提德曼老爷”翻譯成德文并于1865年1月27日寄給拉薩尔派的報紙“社会民主党人报”发表。

恩格斯的这篇譯文在 1883 年轉載于德国的社会主义工党的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而在 1893 年轉載于亨克尔的“自由书”（K. Henckell. «Buch der Freiheit» Bd. II, Berlin, 1893）。这首民歌的俄譯文是由格·申格利从德文翻譯的。——第 37 頁。

- 51 这篇致“社会民主党人报”編輯部的声明，是馬克思于 1865 年 2 月 6 日写成并送給恩格斯签字的。馬克思和恩格斯把这个声明作为对施韦澤（他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采取向俾斯麦政府献媚的政策并宣傳对拉薩尔的迷信）的最后警告。写这个声明的直接原因是 2 月 1 日該报刊登了巴黎記者莫·赫斯的一篇誣蔑国际的法国會員的短文。最初馬克思和恩格斯想寄給“社会民主党人报”一份更强烈的抗議书，但是他們认为同該报决裂应当不是由于赫斯的短文，而是由于該报的整个政治路綫，于是他們写了这篇声明。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評使該报不得不多少改变一下自己的調子。1865 年 2 月該报第 21 号上刊登了莫·赫斯的一篇短文，他在短文中放棄了自己的誹謗性說法。这就使得馬克思和恩格斯不再坚持发表这篇声明；同时，正如从 1865 年 2 月 13 日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中所看到的，他們决定暂时不再給該报写稿。1865 年 2 月 23 日，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声明同“社会民主党人报”彻底决裂（見本卷第 88 頁）。

寄給施韦澤的这个声明原文沒有被保存下来，声明是按 1865 年 2 月 6 日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中所附的草稿譯的。——第 40 頁。

- 52 暗指拿破侖第三的堂弟約瑟夫·波拿巴（綽号是普隆-普隆），他的官邸設在巴黎的罗亚尔宫。約瑟夫·波拿巴領導了一个波拿巴主义者集团，他們企图通过广泛的社会蠱惑宣傳，并通过伪装成拿破侖第三的政策反对派来使人民群众脫离反对現存制度的斗争。——第 40 頁。
- 53 “联合”（«L'Association»）是法国的一家杂志，是受資产階級共和派影响的合作社工人联合会的机关刊物。1864 年至 1866 年在巴黎和布魯塞尔出版；編輯部固定地設于巴黎。——第 40 頁。
- 54 暗指拿破侖第三，他住的地方是土伊勒里宫。——第 40 頁。
- 55 弗·恩格斯的著作“普魯士軍事問題和德国工人政党”是为了論证在国

內已經形成革命形勢的情況下德國工人階級的策略而寫的。在這本著作中分析了改組普魯士軍隊的問題，這個問題成為六十年代初發生的普魯士政府和議會中自由資產階級多數之間的所謂憲制沖突的原因。1860年2月普魯士議會的資產階級多數拒絕批准陸軍大臣馮·羅昂提出的改組軍隊的提案。但是政府很快就做到了使資產階級批准“維持軍隊的戰鬥準備狀態”的撥款，這意味着實際上開始實行預計的改組。1862年3月當議院的自由主義多數拒絕批准軍事開支並要求成立對議會負責的內閣時，政府解散了議會並指定進行新的選舉。1862年9月底成立了俾斯麥的反革命內閣，這個內閣在同年10月再次解散議會，並着手進行軍事改革，為此所需的費用不經議會批准。沖突直到1866年當普魯士戰勝奧地利以後普魯士資產階級投降俾斯麥的時候才解決。

恩格斯根據馬克思的建議同意為“社會民主黨人報”寫一篇關於普魯士軍事改革的文章。但是該報向俾斯麥政府的獻媚使他不得不放棄自己的打算，同馬克思商量之後，他決定把自己的著作印成小冊子發表。

“普魯士軍事問題和德國工人政黨”這本小冊子於1865年2月底在漢堡出版，它在德國得到了廣泛的反應。許多工人報紙和民主派報紙都刊登了該書出版的廣告。威·李卜克內西在柏林的某些工人聯合會中組織了對這本小冊子的討論。小冊子的某些片斷曾經在不同時期發表在社會民主黨的報刊上：1866年3月25日“社會民主黨人報”第71號、1890年11月30日“社會民主黨人月刊”（《Sozialdemokratische Monatsschrift》）第10—11期、1891年3月1日“柏林人民論壇”（《Berliner Volks-Tribüne》）第1期。——第41頁。

56 1850年普魯士軍隊的動員是由于在德國爭奪霸權的鬥爭使普奧關係尖銳化而引起的。動員所暴露出來的普魯士軍事制度的嚴重缺點和軍隊的惡劣裝備，以及在德國沖突中支持奧地利的俄國的堅決反對，迫使普魯士放棄了軍事行動并向奧地利屈服（奧里繆茨協定）。1859年的動員是由于法國、皮蒙特同奧地利的戰爭引起的。這次動員也暴露出普魯士軍事制度的嚴重缺點。——第46頁。

57 指1830年法國的七月資產階級革命和革命以後在德國各地區——薩

- 克森、不倫瑞克、黑森、巴伐利亚、汉諾威——发生的起义。——第 46 頁。
- 58 根据 1814—1815 年的法律建立的普魯士陸軍包括常備軍（基于团）及其在战时动员时用来补充军队的预备队，还包括第一类和第二类后备軍。早在 1813 年在反对拿破侖军队的斗争中作为民团产生的普魯士后备軍包括年齡較大的预备役軍人，他們在常備軍及其预备队中服役期滿，只是在特別需要时才应征服役。在战争时期，第一类后备軍往往被編入作战部队，第二类后备軍是守备部队的增援部队，在和平时期則被遣散回家。——第 46 頁。
- 59 丹麦战争是 1864 年普魯士和奥地利对丹麦的战争，这场战争是在普魯士领导下統一德国的一个重要阶段。俾斯麦的容克地主政府企图把隶屬丹麦的但居民主要为德国人的什列斯維希和霍尔施坦两个公国并入普魯士，加强普魯士在德国的影响，压服自由資產階級反对派。奥地利参加了这场战争，它同普魯士一样，也企图侵占什列斯維希和霍尔施坦。战争以丹麦的失敗結束。什列斯維希和霍尔施坦被宣布由奥地利和普魯士共管，1866 年普奥战争后并入普魯士。——第 47 頁。
- 60 征兵制是以义务兵役制为基础的补充军队的制度，义务兵役制規定一定年齡的人有服兵役的义务。征兵制与普遍义务兵役制不同之点是它有各种免役的办法，主要是允許贖买和代役。
- 抽簽制是通过抽簽办法实行的义务兵役制。十九世紀时在西欧某些国家应服兵役的人的总数超过需要，于是通过抽簽决定当年应服兵役的人中誰該服現役。其余的或者編入民团，或者——在个别国家中——召集起来进行短期集訓。——第 49 頁。
- 61 “軍事总汇报”（《Allgemeine Militär-Zeitung》）是一家专談軍事問題的德国报纸，德国軍官和現役軍人协会的机关报；从 1826 年至 1902 年在达姆斯塔德和萊比錫出版。在这家报纸上曾发表过弗·恩格斯的沒有署名的文章：“英国志願兵猎兵的檢閱”（1860）和署有姓名第一个字母《F. E.》的文章：“英国的志願兵檢閱”（1862）、“英国的反德兵力”（1864）（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 2 版第 15 卷第 140—147、551—557、601—606 頁）。——第 49 頁。

- 62 “普魯士王国統計局杂志”(«*Zeitschrift des königlich preussischen statistischen Bureaus*»)是每月出版的普魯士官方統計杂志;从1860年至1905年在柏林出版。——第50頁。
- 63 补充兵是普魯士軍隊中对后备应征人員的称呼,他們由于身体稍有缺陷或特殊的家庭情况而允許延期服役;在战争时期他們被編为預备部队来补充軍隊。——第51頁。
- 64 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的法奧軍事制度的特点,是它以正規的基干軍隊为主,实行长时期的兵役,以及采取与普魯士軍事制度不同的征兵制。普魯士軍事制度是根据1814年的法律建立在沒有代役的普遍义务兵役制上。——第56頁。
- 65 指1830年法国政府在阿尔及利亚发动的并延續了40年之久的殖民地掠夺战争,以及1853—1856年的克里木战争和1859年的意大利战争。——第57頁。
- 66 在拿破侖法国于1806—1807年同四国(英国、俄国、普魯士、瑞典)同盟作战时,霍亨洛埃指揮的普魯士基干軍于1806年10月14日在耶拿被拿破侖第一的軍隊击潰。耶拿近郊的失敗,以及同一天在奧埃尔施太特近郊遭到的慘敗,迫使普魯士投降。1807年7月7日簽訂的苛刻的有損普魯士尊嚴的提尔西特和約結束了軍事行动。根据和約的条件,普魯士丧失了将近一半領土,而且实际上降到了拿破侖法国的附屬国的地位。
- 卡茨巴赫是西里西亚的一条河。欧洲国家第六次联合起来同拿破侖法国作战时,普魯士和俄国的軍隊在布呂歇尔的指揮下于1813年8月26日在这里击潰了法国部队。1814年3月同盟国軍隊进入巴黎,拿破侖帝国复灭,战争遂告結束。——第57頁。
- 67 瑞士的后备軍包括在瑞士軍隊——定期集合受訓的非正規軍——中服役期滿的預备役軍人。瑞士后备軍的兵役期限是12年。瑞士的后备軍和普魯士的后备軍一样,在战争时用来加强軍隊,在遇到战争危險时他們被征集入伍。
- 关于普魯士的后备軍——見注58。——第57頁。

- 68 威·弗·帕·納皮尔“1807年至1814年比利牛斯半島和法国南部战争史”1833年倫敦版第3卷第271頁(W. F. P. Napier. «History of the War in the Peninsula and in the South of France, from the year 1807 to the year 1814». Vol. III, London, 1833, p. 271)。——第58頁。
- 69 杜佩尔(丹麦人称为:杜貝尔)是在什列斯維希的丹麦堡垒,在普魯士和奥地利对丹麦作战期間,于1864年4月18日被普魯士軍隊攻陷。
“內部的杜佩尔”(«Düppel im Innern»)一詞是俾斯麦的机关报“北德总汇报”(«Nord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在1864年9月30日的一篇政治評論中用来表示“內部敌人”的用語,后来被广泛引用。——第58頁。
- 70 1849年,当德国西南部发生起义保卫人民群众看做是唯一尚未被破坏的革命成果的帝国宪法时,巴登部队轉到起义人民一边,并形成巴登革命軍的核心。在巴登部队中騎兵团队最不可靠。因此,1849年6月21日起义部队在瓦格霍伊澤尔城下同普魯士人作战时,由于巴登龙騎兵的几个騎兵連的指揮官貝克尔特中校的叛变而潰散。——第60頁。
- 71 指的是普魯士亲王威廉(从1861年即位为国王)在1858年10月开始摄政时宣布的“自由主义的”方針。1858年摄政王解散了曼托伊費尔的內閣,让温和的自由派执掌政权。資產階級报刊高呼这个方針是“新紀元”。可是实际上威廉的政策完全是为了加强普魯士君主政体和容克地主的障地;大失所望的資產者拒絕批准政府提出的軍事改革草案。由此而发生的1862年宪制冲突和1862年9月俾斯麦的执掌政权結束了“新紀元”。——第61頁。
- 72 恩格斯指的是1850年到1858年10月这段时期,当时在普魯士掌权的是极端反动的曼托伊費尔內閣,由于經濟上的成就而心滿意足同时又因无产階級的革命运动而惊慌不安的資產階級,站到了貴族和殘酷地鎮压了1848—1849年革命参加者的反动派方面。在这段时期,普魯士的革命的民主成果——言論、出版、集会、結社自由——遭到破坏;宪法一再修改,变成了一张廢紙;在全国恢复了貴族的等級特权,政权完全

- 掌握在土地貴族和貴族的手中。——第 62 頁。
- 73 省和專區的等級會議（議會）在普魯士于 1823 年成立，主要是由貴族的代表組成；其中城市和村社的代表非常少。會議由國王召集，會議的職權限于研究地方經濟和省的管理問題。1848—1849 年革命時期曾被排擠到次要地位的省和專區的等級會議，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即反動統治時期，又重新獲得了重要地位。——第 62 頁。
- 74 這個觀點是恩格斯根據馬克思的建議表述出來的（見 1865 年 2 月 11 日馬克思給恩格斯的信）。——第 63 頁。
- 75 德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和進步黨的首領之一舒爾采-德里奇宣傳用工人自己的錢創辦儲蓄貸款銀行、消費合作社和生產合作社；這種“貯錢箱”鼓動企圖引誘工人離開反對資本的革命鬥爭。舒爾采-德里奇鼓吹資本家和工人的利益協調一致，斷言通過成立合作社可以在資本主義範圍內改善工人階級的狀況，並且可以使小手工業生產者免于破產。——第 63 頁。
- 76 指 1861 年 6 月組織的德國資產階級進步黨的代表。這個黨的最著名的活動家是：瓦爾德克、微耳和、舒爾采-德里奇、福爾肯貝克、霍韋爾貝克等。進步黨在自己的綱領中提出如下要求：在普魯士領導下統一德國，召集全德議會，成立對眾議院負責的強有力的自由派內閣。由于害怕人民革命，進步黨沒有支持基本的民主要求：普選權，出版、結社、集會自由。1866 年右翼脫離進步黨，成立了一個屈服于俾斯麥政府的民族自由黨。——第 64 頁。
- 77 “十字報”（《Kreuz-Zeitung》）是對德國日報“新普魯士報”（《Neue preußische Zeitung》）的稱呼。該報從 1848 年 6 月起在柏林出版，是反革命的宮廷奸黨和普魯士容克地主的喉舌。“新普魯士報”在報頭上印有十字圖樣。——第 70 頁。
- 78 指 1861—1865 年美國內戰時期南部各蓄奴州的擁護者。——第 71 頁。
- 79 指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中在普魯士實行的一種官僚主義的工業規章制度。曾經為許多工業部門規定了特別許可（經營權）制度，不得到這種

許可，就不能从事工业活动。这种半中世紀式的营业法束縛了資本主义的发展。——第 72 頁。

- 80 普魯士的領導地位 (Preußische Spitze) 是普魯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 1848 年 3 月 20 日的演說中使用的一个詞；他在演說中宣布，“为了拯救德意志”他願意站在“整个祖国的首位 (an die Spitze)”。在爭取德意志統一时期，这一詞用来表示普魯士想在自己的领导下統一国家的意图。

三位一体 是德意志联邦的改組計劃之一，計劃規定除奥地利和普魯士以外組織一个中部各邦的联邦。这个計劃在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特別受到巴伐利亚和薩克森的拥护，其目的是反对奥地利和普魯士的領導权，代表了那些企图保持自己独立的德意志中部各邦的割据傾向。——第 74 頁。

- 81 恩格斯在援引全德工人联合会所提出的这些要求时，按照馬克思的建議 (見馬克思 1865 年 2 月 11 日的信)，把自己的小册子中的这个地方表述得不致被解釋成同意拉薩尔派的口号。——第 77 頁。

- 82 指的是工人为了經濟斗争而进行联合的权利，首先是建立工会組織的权利和罢工的权利。

1865 年 1 月，由于工人起来反对当时通行的工商业条例而在普魯士議会上提出了关于联合权的問題。資產階級議員利用工人运动的高漲，力求首先廢除条例中束縛資本家的那些条目。进步党人舒尔采-德里奇和孚赫曾把关于廢除条例第一八一条的建議提交众議院討論，这一条規定企业家不得为了迫使工人让步而停止生产。为了达到蠱惑性的目的，进步党人也要求廢除第一八二条关于惩治工人煽动罢工的规定。而工人首先要求廢除第一八三条关于必須經警察当局許可才得組織工人团体的規定，以及第一八四条关于禁止罢工的规定。

1865 年 2 月 14 日普魯士議會只廢除了工商业条例的第一八一条和第一八二条，而工人关于联合自由的要求并没有得到滿足。——第 79 頁。

- 83 “希尔德布兰德之歌”是一首歌頌英雄事迹的长詩，是八世紀古日耳曼

史詩中保留下來的一些片斷。——第 84 頁。

- 84 馬克思和恩格斯致“社會民主黨人報”編輯部的關於停止為該報撰稿的聲明是馬克思在 1865 年 2 月 18 日寫的，他把聲明寄給恩格斯，恩格斯完全贊同，並在聲明上簽字，然後又寄給馬克思；1865 年 2 月 23 日馬克思把它寄給“社會民主黨人報”編輯部。

在寫這篇聲明以前，馬克思和恩格斯就確認已經不可能糾正該報的政治路線。能夠證明這一點的，除了 1865 年 2 月 15 日施韋澤致馬克思的信（詳見本卷第 95—98 頁）以外，還有施韋澤的一組文章“俾斯麥內閣”，在這組文章中施韋澤公開支持俾斯麥用“鐵和血”統一德國的政策。1865 年 2 月 18 日馬克思就這件事給恩格斯的信中說：“我認為施韋澤是不可救藥的（他可能和俾斯麥取得了秘密的協議）。”由於這些文章的發表，馬克思和恩格斯也就能夠使自己同該報的決裂具有公開的、尖銳的政治的性質，並使這件事容易為群眾所了解。

馬克思把聲明寄給“社會民主黨人報”，同時採取措施迫使施韋澤不得不把它登出來。他委託李卜克內西，一旦施韋澤拒絕發表這個聲明，就把它發表在“柏林改革報”上。此外，馬克思把聲明的兩份副本寄給卡·濟貝耳，請他在收到信以後兩天就把聲明刊登在“萊茵報”或“杜塞爾多夫日報”上。

由於李卜克內西和濟貝耳的幫助，聲明曾經發表在許多德國報紙上；從 1865 年 3 月 1 日濟貝耳給恩格斯的信中看出，聲明最初發表於：“巴門日報”（《Barmer Zeitung》）、“愛北斐特日報”、“杜塞爾多夫日報”、“萊茵報”；1865 年 3 月 1 日聲明又發表於：“柏林改革報”第 51 號、“新法蘭克福報”第 60 號、“布勒斯勞報”（《Breslauer Zeitung》）第 102 號、“公民報”（《Staatsbürger-Zeitung》）第 60 號；後來又在許多其他德國報紙上發表了這個聲明。

由於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聲明廣泛地發表在德國報刊上，施韋澤不得不在“社會民主黨人報”上發表它，發表的日期是 1865 年 3 月 3 日。編輯部在“聲明”之前寫了幾行編者按語，從中可以看出李卜克內西也拒絕為該報撰稿。不久，格·海爾維格、弗·呂斯托夫和約·菲·貝克爾也作了類似的聲明。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声明在先进的德国工人中得到了广泛的反应；1865年3月它受到柏林印刷工人协会的贊許，李卜克內西在那里作了关于馬克思和恩格斯同該报决裂的报告。“社会民主党人报”失去了很大一部分訂戶，特别是柏林工人中的訂戶。——第88頁。

- 85 指馬克思的“‘萊茵观察家’的共产主义”一文，該文发表在“德意志—布魯塞尔报”上(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207—222頁)。

“德意志—布魯塞尔报”(《*Deutsche-Brüsseler-Zeitung*》)是侨居布魯塞尔的德国政治流亡者創办的；1847年1月創刊，1848年2月停刊。馬克思和恩格斯从1847年9月成了該报的經常撰稿人；在他們的领导下，該报成了形成中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机关报。

“萊茵观察家”(《*Rheinischer Beobachter*》)是一家保守的日报；1844年起在科倫出版；德国1848年三月革命后停刊。——第88頁。

- 86 恩格斯这篇关于小册子“普魯士軍事問題和德国工人政党”的匿名簡介除了发表在“柏林改革报”上，还在略加修改后通过卡·济貝耳、卡·克萊因和威·李卜克內西的介紹刊登在以下德国报纸上：1865年3月3日“杜塞尔多夫日报”第62号、1865年3月3日“萊茵报”第62号、1865年3月3日“愛北斐特日报”第62号、1865年3月7日“上萊茵信使报”第56号、1865年3月9日“鄂斯納布魯克报”(《*Osnabrücker Zeitung*》)第250号、1865年3月11日“新汉諾威通报”(《*Neuer Hannoverische Anzeiger*》)第70号，以及其他报纸。——第89頁。

- 87 这个文件是馬克思由于在1865年3月4日和6日的常务委员会會議上討論在法国的国际組織問題而写的。1864年底，国际工人协会的一个支部就开始在巴黎进行活动，这个支部的創始人是1864年9月28日圣馬丁堂會議的参加者，具有蒲魯东主义情緒的工人托倫和利穆津。支部有固定的会址，1865年1月出版了临时章程的法文譯本(參看本卷第441—442、475—476頁)。同时，曾經参加1864年9月28日會議的准备工作法国律师昂利·勒弗尔，却以国际的奠基人之一和法国工人的代表自居。勒弗尔同总委员会的法国通訊書記勒·呂貝以及在

倫敦的法国小資產階級流亡者的其他代表人物保持友好的联系。

1865年1月24日总委员会第一次被迫着手研究巴黎支部的事情，原因是在1月13日的柏林报纸“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出现了莫·赫斯的文章，文章指责托倫同波拿巴主义者集团有联系（見本卷第40頁）。馬克思委托在巴黎的德国流亡者維·席利进行有关的調查。調查結果表明，这种誹謗性的指责来自几个靠近“联合”杂志的人，勒弗尔是该杂志編輯部的成員。馬克思试图把一部分受資產階級合作社派的影响的法国工人吸引到国际的队伍中来，并且利用“联合”杂志来宣傳国际的思想；由于馬克思的坚决要求，总委员会在1865年2月7日採納了勒弗尔的建議，委派他作为国际在法国的“报刊辯护人”。这个委派引起巴黎支部成員的不滿；2月24日有32个国际會員在巴黎举行會議，會議表示完全信任托倫、弗里布尔和利穆津，并且要求領導职务只能委派工人担任。2月28日托倫和弗里布尔带着这个決議到了倫敦。在总委员会的會議上經過第一次討論后，当天晚上就把关于巴黎支部的問題轉交常务委员会研究。我們沒有得到1865年3月4日和6日常务委员会討論这一問題的會議記錄。这份決議草案保存在馬克思1864年到1865年的筆記簿里。在英文的正文前面用德文写着：“我向常务委员会提出以下決議案。”——第90頁。

- 88 馬克思指望通过吸收1848年革命的老战士、工人政論家比埃尔·万薩德参加巴黎支部（分部）理事会，来使法国的国际會員接受四十年代法国工人运动的革命傳統和社会主义傳統。但是，万薩德借口生病和工作繁忙，沒有接受这一委任。——第90頁。
- 89 1865年3月7日总委员会通过了馬克思起草的这几項決議。決議原文保存在总委员会的記錄簿中以及1865年3月13日馬克思給恩格斯的信件所附的手稿中，手稿中还有席利的个人指示。——第91頁。
- 90 总委员会在1865年2月7日、14日和21日的會議上研究了托倫由于被人指责同波拿巴主义者集团有联系而提出的辞职声明。——第91頁。
- 91 由于总委员会會議上討論的結果，在第二項決議的措詞中“对勒弗尔作

- 了过大的让步”，馬克思在1865年3月13日給海·荣克的信中对此表示遺憾。——第91頁。
- 92 法国代表团在1866年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上也提出了这个蒲魯东主义的要求，但是它受到了尖銳的批評，并且被代表大会所否决。——第91頁。
- 93 指小資产階級社会主义者比·貝律茲1863年在巴黎創立的“劳动信貸”(«Crédit au travail»)銀行，其目的是貸款給生产合作社和消費合作社，并动員工人的儲蓄来开展合作运动。这个銀行存在到1868年。——第92頁。
- 94 馬克思写的“評弗·恩格斯的小册子‘普魯士軍事問題和德国工人政党’”沒有署名刊登在1865年3月18日“海尔曼”报上。——第93頁。
- 95 “关于不給‘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的原因的声明”是馬克思于1865年3月15日写的，写这篇声明的原因是施韦澤在馬克思和恩格斯1865年2月23日发表关于停止为該报撰稿的声明以后掀起了一场反对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运动。在1865年3月8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1号上，施韦澤利用卡·布林德发表在“新法兰克福报”上的文章来歪曲馬克思和恩格斯对拉薩尔的态度，并且捏造他們不再給該报撰稿的原因。馬克思把这个声明同时发送給几家德国报纸。除了刊登在“柏林改革报”上以外，还刊登在1865年3月20日“杜塞尔多夫日报”第79号、1865年3月20日“公民报”第79号、1865年3月25日“海尔曼”报上。——第95頁。
- 96 馬克思指的是1865年2月2日他給李卜克內西的信，这封信我們沒有得到；馬克思在1865年2月3日給恩格斯的信中叙述了这封信的内容。——第97頁。
- 97 这里指的是1865年2月13日馬克思給施韦澤的信，这封信我們沒有得到，但是馬克思在1865年2月18日給恩格斯的信中詳細地援引了这封信。在这封信中馬克思尖銳地批評了施韦澤的政治策略，同时向他說明联合的作用，說明工会是組織工人階級进行反对資产階級的斗

爭的重要工具，是對工人群眾進行政治教育的工具。施韋澤追隨拉薩爾否認罷工和工會在工人階級反對資本的鬥爭中的作用，他提出拉薩爾派關於普選權和生產聯合的要求，把它當作唯一的方法，並認為這是通過和平的、改良的道路達到社會主義的手段。同時，像拉薩爾一樣，施韋澤授意工人要信賴普魯士政府及其大臣俾斯麥的幫助。——第 98 頁。

98 “柏林改革報”（《*Berliner Reform*》）是德國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日報，從 1861 年至 1868 年在柏林出版。1865 年在這家報紙上刊登過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幾篇聲明和文章。——第 99 頁。

99 卡·馬克思的“人類的主席”一文的目的是反對發表在 1865 年 3 月 26 日“社會民主黨人報”第 39 號上的拉薩爾派的全德工人聯合會主席伯恩哈特·貝克爾 1865 年 3 月 22 日在聯合會的漢堡分會會議上的講話；他在这篇講話中誹謗國際工人協會，並且誹謗馬克思、恩格斯和李卜克內西。還在馬克思的這篇文章發表以前，李卜克內西在 1865 年 3 月 27 日柏林分會會議上也揭露了貝克爾，在这次會議上討論了主席問題。

由於聯合會的許多會員對貝克爾的領導愈來愈不滿意，柏林的組織通過了關於開除他的決議，並呼喚全德工人聯合會的全體會員支持它的決議。在聯合會的許多其他分會中也召開過類似的會議。1865 年 6 月，貝克爾不得不暫時把主席的權力讓與副主席弗里茨舍，而在同年 11 月完全放棄這一職權。

從 1865 年 4 月 15 日李卜克內西給馬克思的信中看出，馬克思的這篇文章除了刊登在“柏林改革報”上，還刊登在“萊茵報”上。——第 100 頁。

100 *Asa fétida*（阿魏膠）是一種味道強烈的植物。——第 100 頁。

101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 2 版第 14 卷第 395—691 頁。——第 100 頁。

102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 2 版第 14 卷第 585 頁。——第 100 頁。

103 指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抨擊性著作“流亡中的大人物”（見“馬克

- 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259—380 頁)的手稿。——第 101 頁。
- 104 指卡·馬克思的文章“希尔施的自供”(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9 卷第 44—48 頁),該文发表在美国报纸“紐約刑法报”上。
“紐約刑法报”(«New-Yorker Criminal-Zeitung»)是周报“美文学杂志和紐約刑法报”(«Belletristisches Journal und New-Yorker Criminal-Zeitung»)的簡称,是德国小資产階級流亡者于 1852 年在紐約創办的。从 1853 年 3 月 18 日至 1854 年 3 月 10 日用該名称出版。——第 101 頁。
- 105 馬克思指的是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的职位,拉薩尔在遺囑中把这个职位交給了伯恩哈特·貝克尔。——第 102 頁。
- 106 指馬克思在 1864 年 9 月 12 日、10 月 16 日、11 月 28 日和 12 月 22 日給哈茨費尔特的信。1864 年 10 月 16 日的信已殘缺不全。——第 102 頁。
- 107 指 1865 年 1 月 20 日左右李卜克內西給馬克思的信。——第 103 頁。
- 108 菲·拉薩尔“巴师夏—舒尔采—德里奇先生,經濟的尤利安,或者:資本和劳动”1864 年柏林版(F. Lassalle. «Herr Bastiat-Schulze von Delitzsch, der ökonomische Julian, oder: Kapital und Arbeit». Berlin, 1864)。——第 103 頁。
- 109 指卡·馬克思的著作“政治經濟学批判”(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3 卷第 3—177 頁)。——第 103 頁。
- 110 馬克思指 1859 年 6 月 10 日他由于匿名的抨击性小册子“意大利战争和普魯士的任务。民主派的主張”(«Der italienische Krieg und die Aufgabe Preußens. Eine Stimme aus der Demokratie»)的出版写給拉薩尔的信;在这本小册子中拉薩尔坚持在普魯士领导下統一德国的思想。馬克思在給拉薩尔的信中写道:“关于抨击性的小册子:它絕對不能代表我的观点和我在英国的党内朋友的观点。也許我們会在刊物上談談我們关于它的意見。”——第 104 頁。
- 111 指拉薩尔在 1859 年 6 月中写給馬克思的一封信。見菲·拉薩尔“遺著。书信和著作”1922 年斯图加特—柏林版第 3 卷第 221 頁(F. Las-

salle. «Nachgelassene Briefe und Schriften». Bd. III, Stuttgart—Berlin, 1922, S. 221)。——第104頁。

112 指法国的、波兰的和德国的流亡者 1855 年在倫敦成立的資產階級民主派的国际协会。这个协会存在到 1859 年，它同某些比利时民主主义者，同在美国的德国小資產階級流亡者保有联系；从 1857 年 3 月至 1858 年 3 月出版了自己的机关报“国际协会通报”（«Bulletin de 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第104頁。

113 暗指伯·貝克尔自己在 1865 年 3 月 22 日全德工人联合会汉堡分会上的讲话中所說的一件事。貝克尔抱怨說，他作为哈茨費尔特伯爵夫人的秘书还得执行家庭僕役的职务，为她去买面包和黃油。——第104頁。

114 这篇短文所談到的紀念大会是在 1865 年 3 月 1 日于倫敦圣馬丁堂举行的。在准备和举行紀念 1863—1864 年波兰起义一周年的这次大会方面，总委员会起了很大的作用，它曾在 1865 年 2 月 21 日的专门决定中号召全体会员和同情者支持这一措施。英国資產階級报刊，其中包括倫敦的自由党日报“每日新聞”，只叙述了資產階級激进派（比耳斯、利弗尔逊等人）在会上的发言，对以国际的名义提出的決議和总委员会委员彼·福克斯和格·埃卡留斯的发言却只字不提。1865 年 3 月 4 日“蜂房报”第 177 号刊登了关于大会情况的完整报道。馬克思写这篇短文时会利用过这篇报道，他的这篇短文是写给轉載过英国报纸的歪曲报道的苏黎世报纸“白鷹报”的。

保存下来的这篇短文的手稿，馬克思把它附在 1865 年 4 月 13 日給海·荣克的信里，荣克作为瑞士通訊书记，应当把它附函寄給报纸。短文刊登在 1865 年 4 月 22 日“白鷹报”第 48 号上，稍有改动，署名是海·荣克。——第106頁。

115 1865 年 4 月 14 日美国总统阿伯拉罕·林肯被南部种植場主和紐約銀行家的走狗、演員蒲斯刺杀；原来的副总统安得魯·約翰遜就任美国总统。总委员会在 1865 年 5 月 2 日的会议上通过了一个决定，就这两桩事件給美国人民一封公开信。馬克思在 5 月 9 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宣讀了他写的“国际工人协会致約翰遜总统的公开信”，这封信通过美国

- 公使亚当斯轉交給总统。公开信最初載于 1865 年 5 月 20 日“蜂房报”第 188 号，遂后又載于 1865 年 5 月 21 日“雷諾新聞”第 771 号和 1865 年 6 月 1 日的“紐約每日論壇报”。——第 108 頁。
- 116 南部首領之一斯提芬斯在 1861 年 3 月 19 日所作的为奴隶制辯护的演說中这样称呼奴隶占有制度。——第 108 頁。
- 117 指威廉·西华德于 1858 年 10 月 25 日在罗彻斯特的群众集会上所作的声明，他曾談到“不可制止的冲突”，按他的話說，这冲突必将使美国或者变成“奴隶占有制的国家”，或者变成“自由劳动的国家”。1865 年 4 月 14 日林肯被刺时，西华德和他的儿子都受了重伤。——第 109 頁。
- 118 1861 年 4 月 15 日林肯政府为对付叛乱的南部各州同盟挑起的軍事行动，宣布招募 75 000 名志願軍，计划在三个月里消除冲突；实际上美国內战直到 1865 年才結束。——第 109 頁。
- 119 指 1337—1453 年的英法百年战争和 1618—1648 年的全欧三十年战争，三十年战争的戰場主要是在德国；馬克思所說的二十三年战争是指从 1792 年到 1815 年欧洲同盟历次反对法兰西共和国和拿破侖法国的战争。——第 109 頁。
- 120 这部著作是卡·馬克思于 1865 年 6 月 20 日和 27 日在总委员会會議上用英語作的报告。这篇报告是由委员会委員約翰·韦斯頓 5 月 2 日和 23 日的发言引起的；韦斯頓在发言中企图证明，货币工資水平的普遍提高对工人沒有好处，并由此做出工会“有害”的結論。保存下来的报告稿是馬克思的手稿。报告由馬克思的女儿愛琳娜以“价值、价格和利潤”（«Value, price and profit»）为題于 1898 年首次在倫敦发表，并附有愛·艾威林写的序。手稿中引言和前 6 节沒有标题，由艾威林加上了标题。在收入本卷时，除了总标题以外，这些小标题都保留下来了。——第 111 頁。
- 121 指国民公会于 1793 年 5 月 4 日、9 月 11 日和 29 日以及 1794 年 3 月 20 日通过的各项法令，这些法令規定了固定的最高工資，同时也規定了谷物、面粉和其他日用品的固定的最高价格。——第 122 頁。

- 122 1861年9月，不列顛科学促进协会在曼彻斯特举行第三十一屆年会，当时正在恩格斯那里作客的馬克思，参加了这次會議。协会經濟部主席威·紐馬奇（馬克思把他的姓写錯了）曾在会上发言，他还主持了部的會議，并作了題为“联合王国的立法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健全的征稅原則”的报告。見“不列顛科学促进协会第三十一屆年会报告；1861年9月于曼彻斯特”1862年倫敦版第230頁（《Report of the Thirty-first Meeting of the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held at Manchester in september 1861》. London, 1862, p. 230）。——第122頁。
- 123 馬克思指的是英国經濟学家托馬斯·图克关于工业、貿易和財政的历史的六卷本著作，这部著作曾以下列书名出过单行本：“价格史和貨幣流通状况，1793—1837年”1838年倫敦版第1—2卷（《A History of Prices, and of the State of the Circulation, from 1793 to 1837》. Vol. I—II, London, 1838）、“价格史和貨幣流通状况，1838年、1839年”1840年倫敦版（《A History of Prices, and of the State of the Circulation, in 1838 and 1839》. London, 1840）和“价格史和貨幣流通状况，1839—1847年”1848年倫敦版（《A History of Prices, and of the State of Circulation, from 1839 to 1847 inclusive》. London, 1848），以及托·图克和威·紐馬奇合著的“1848—1856年九年中的价格史和貨幣流通状况”1857年倫敦版第5—6卷（T. Tooke and W. Newmarch. 《A History of Prices, and of the State of the Circulation, during the Nine Years 1848—1856》. Vol. V—VI, London, 1857）。——第122頁。
- 124 見罗·欧文“評工业体系的影响”1817年倫敦版第76頁（R. Owen. 《Observations on the Effect of the Manufacturing System》. London, 1817, p. 76）。該书第一版于1815年問世。——第122頁。
- 125 十九世紀中叶，在資本主义工业狂热地发展和伴随着相对农村人口过剩而按資本主义原則进行农业改組的情况下，发生了大批拆毀英国农业工人的住宅的事件。当时土地所有者繳納济貧稅的数額在很大程

- 度上决定于居住在他的土地上的貧民人数的多少，这种情况在加剧大批拆毀农村住宅方面起了显著的作用。土地所有者自动拆毀那些他們自己用不着的，然而却可以供“过剩的”农村居民居住的处所。（关于这事詳見“資本論”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849—876頁）——第124頁。
- 126 艺术和手工业协会 (Society of Arts) 是資產階級教育性质和慈善性质的团体，于1754年在倫敦成立。文中提到的报告是1864年逝世的約翰·摩尔頓的儿子約翰·查默斯·摩尔頓做的。——第124頁。
- 127 关于廢除谷物法的法案是在1846年6月通过的。英国的所謂旨在限制和禁止谷物輸入的谷物法，是为了維護大土地所有者的利益而实行的。1846年法案的通过，标志着在貿易自由口号下为反对谷物法而斗争的工业資產階級的胜利。——第124頁。
- 128 大·李嘉图“政治經濟学和賦稅原理”1821年倫敦版第26頁 (D. Ricardo. «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London, 1821, p. 26)。該书第一版于1817年在倫敦出版。——第134頁。
- 129 B. Franklin. «A Modest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Necessity of a Paper Currency». In: The Works. Vol. II, Boston, 1836. 这一著作于1729年首次出版。——第137頁。
- 130 亚当·斯密“国民財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814年爱丁堡版第1卷第93頁 (A. Smith.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Vol. I, Edinburgh, 1814, p. 93)。——第142頁。
- 131 托·霍布斯“利維坦：或教会国家和市民国家的实质、形式和权力”英文著作选，1839年倫敦版第3卷第76頁 (Th. Hobbes. «Leviathan: or, the Matter, Form, and Power of a Commonwealth, Ecclesiastical and Civil». In: The English Works. Vol. III, London, 1839, p. 76)。——第144頁。

- 132 指 1793 年到 1815 年英国所进行的反对十八世紀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法国的历次战争。在这几次战争期间英国政府在国内建立了残酷的恐怖制度来对付劳动群众。尤其是在文中指出的那个时期，曾經鎮压了許多起人民的風潮，并且通过了一些禁止工人結社的法律。——第 159 頁。
- 133 卡·馬克思指的是馬尔薩斯的抨击性小册子，題为“关于地租的本质和增长及其調整原則的研究” 1815 年倫敦版（《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Progress of Rent, and the Principles by which it is regulated》. London, 1815）。——第 159 頁。
- 134 指 1770 年在倫敦出版的一本书“試論手工业和商业。兼評賦稅”（《An Essay on Trade and Commerce: containing Observations on Taxes》）。这本匿名的书被认为是 J. 坎宁根的作品。——第 160 頁。
- 135 指 1832 年 2—3 月英国議会对 1831 年中提出的关于把童工和少年工的工作日限制到 10 小时的法案所进行的討論。——第 160 頁。
- 136 札格納特 是印度教的大神毗湿奴的化身。对札格納特的崇拜的特点是宗教仪式上的十分豪华和极端的宗教狂热，这种狂热表现为教徒的自我折磨和自我殘害。在举行傳統的札格納特祭祀的时候，常常有教徒投身于載着毗湿奴——札格納特的神像的車輛下让它軋死。——第 161 頁。
- 137 威·托·桑頓 “人口过剩及其补救办法” 1846 年倫敦版（W. Th. Thornton. 《Over-population and its Remedy》. London, 1846）。——第 165 頁。
- 138 根据英国从十六世紀以来就有的济貧法，在每一个教区里都征收一种特別的济貧稅；教区中无法維持自己和家庭的生活的居民可以通过济貧会得到救济。——第 165 頁。
- 139 大·李嘉图 “政治經濟学和賦稅原理” 1821 年倫敦版第 479 頁（D. Ricardo. 《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London, 1821, p. 479）。——第 167 頁。

140 這一組題為“工人階級同波蘭有什麼關係？”的文章是弗·恩格斯應馬克思的請求於1866年1月底至4月6日之間寫成的；因為當時在總委員會裏圍繞着1865年倫敦代表會議的一項決議，即關於把波蘭獨立的問題列入即將在日內瓦舉行的代表大會的議事日程的決議，展開了一場鬥爭。為了闡明國際在民族問題上的立場，必須一方面批判蒲魯東主義者在民族問題上特有的虛無主義，一方面揭露波拿巴集團為蠱惑人心而提出的所謂“民族原則”的反動本質。

這組文章沒有寫完。文章曾載於1866年3月24日、31日和5月5日“共和國”週報第159、160和165號。

“共和國”(《The Commonwealth》)是英國的一家週報，是國際總委員會的機關報，從1866年2月至1867年7月在倫敦出版。1866年6月以前，馬克思參加了該報編委會，1866年2月至4月格·埃卡留斯任編輯。該報刊載過關於總委員會會議的報道和國際的文件。由於參加該報領導工作的工聯領袖們的妥協政策，該報在選舉改革的鬥爭過程中改變了自己的方針，實際上變成了激進資產階級的機關報。——第170頁。

141 指1848年5月15日巴黎的民眾示威遊行，參加遊行的有15萬人。示威者向應於當天討論波蘭問題的制憲議會走去，闖進了波旁王宮的會議大廳，要求對爭取獨立的波蘭給予軍事援助。由於這些要求遭到拒絕，示威者曾企圖宣布解散制憲議會並成立革命政府，然而他們被用武力驅散了。——第170頁。

142 這裡談的是德國民主派報刊和工人報刊，首先是1848年6月1日至1849年5月19日在科倫出版的、由馬克思編輯的日報“新萊茵報”。民主派中無產階級一翼的戰鬥機關報“新萊茵報”堅決維護波蘭的獨立，把波蘭的解放和推翻俄國的反動沙皇制度聯繫起來，後者在當時是歐洲封建專制反動勢力的主要支柱。——第170頁。

143 指1865年國際倫敦代表會議議程第九項(見本卷第583頁)。

倫敦代表會議於1865年9月25—29日舉行。總委員會委員和各支部領導人參加了會議。

代表會議听取了总委員會的报告，批准了它的財務报告和将要召开的代表大会的議程。馬克思排除了蒲魯东主义者的反对，終於把恢复波兰的独立这一要求列入代表大会議程。由馬克思領導筹备和举行的倫敦代表會議在国际的建立和健全組織的时期起了巨大的作用。——第 171 頁。

- 144 这里談的是 1864 年 3—7 月在“人民論壇报”上連續刊載的、蒲魯东主义者艾·德尼的一組关于波兰問題的文章中的意見，以及 1865 年 12 月載于“佛尔維耶回声报”上的对总委員會的責难（見本卷第 586—596 頁）。

“人民論壇报”(*«La Tribune de Peuple»*)是比利时的民主派报纸；是工人团体“人民协会”的机关报，1861 年至 1868 年在布魯塞尔出版；从 1866 年 1 月起为国际比利时各支部的机关报；德·巴普参加过該报的編輯部。——第 171 頁。

- 145 指“青年欧洲”，它是資產階級革命者、政治流亡者的秘密組織，根据馬志尼的倡議于 1834 年在瑞士成立。“青年欧洲”由下列的民族組織組成：“青年意大利”、“青年波兰”等等，它們的宗旨是为民族統一、民族独立和在欧洲各国建立共和制度而斗争。——第 174 頁。

- 146 恩格斯对于小民族历史命运的一些观点，以及他的下述判断是不确切的，他认为：小民族通常缺乏独立的民族生存的能力，它們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被更大的、更有生命力的民族吞并。恩格斯正确地強調指出了資本主义所特有的集中化和建立大国的趋向，却没有足够地注意到另一趋向——小民族为反对民族压迫爭取独立进行斗争，它們渴望建立自己的国家。正如历史所表明的那样，許多小民族，首先是那些从前包括在奥地利帝国内的各个斯拉夫民族，不仅显示出有独立的民族发展的能力，而且还成为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即社会主义制度的参加者(关于这个問題詳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6、8、11 卷的說明)。——第 177 頁。

- 147 卢西人 是資產階級民族学家和史学家对加里西亚、外喀尔巴阡和布柯維納的乌克兰居民的称呼，流行于十九世紀。他們被用暴力同乌克兰

人民的主要部分分割开来；1941—1945年苏联偉大卫国战争胜利之后，乌克兰人民才最終重新統一了。——第177頁。

148 1385年的波兰立陶宛合并，規定立陶宛大公国合并于波兰，这为波兰与立陶宛的統一奠定了基础。——第179頁。

149 指1605年6月波兰干涉者占領莫斯科；由于人民起义，干涉者的政权于1606年5月被推翻。1610年9月波兰人再次进入莫斯科，夺取了莫斯科大公国的王位。全体俄国人民掀起了反对干涉者的解放斗争。1612年10月莫斯科为米宁和波札尔斯基率領的人民自卫团所解放。——第180頁。

150 “泰晤士报”（《*The Times*》）是英国保守派最大的日报；1785年創刊于倫敦。——第181頁。

151 呼吁书“警告”是卡·馬克思受总委员会的委托针对当时把德国和丹麦的縫紉工人輸入苏格兰破坏工人运动的問題而写的。恩格斯在1866年5月1日写信給馬克思，說有57名德国裁縫被运到爱丁堡，估計还有几批工人要运来。同一天，总委员会會議討論了这个問題，列斯納在会上說，倫敦的企业主也想利用从德国运来的工人。因此倫敦的德国裁縫成立了以列斯納和豪費为首的委员会，决定同总委员会联合行动，以粉碎企业主及其在德国的代理人的計劃。总委员会派出两名代表前往爱丁堡，說服外来工人廢除了合同并返回祖国。

列斯納和豪費应馬克思的請求于5月3日給他寄去了关于爱丁堡事件的詳細材料，以便馬克思为德国报刊写短評。馬克思在5月4日写的“警告”刊登在“上萊茵信使报”、“中德人民报”（《*Mitteldeutsche Volkszeitung*》）、“德国周报”（《*Deutsches Wochenblatt*》）以及其他报纸上。

与此同时，在倫敦发出了列斯納和豪費写的傳单，闡明倫敦德国裁縫委员会的宗旨和任务，并向倫敦的德国工人发出捐款的号召。1866年7月，委员会发出了由列斯納和豪費署名的第二批傳单，这些傳单是給在德国的縫紉工人的。——第184頁。

152 指倫敦裁縫帮工开始罢工后于1866年3月在倫敦成立的工会。这个

工会有一个执行委员会；它同总委员会一道胜利地领导了縫紉工人的罢工斗争；1866年4月该工会加入了国际。裁縫代表劳倫斯参加了国际工人协会日内瓦代表大会的工作。——第184頁。

- 153 告縫紉工人书是根据1866年3月27日总委员会的决定写的，它号召縫紉工人拒絕去英国，因为那里的裁縫正在罢工。这个呼吁书曾发表在国际的許多机关报刊上，其中有1866年4月29日的比利时报纸“人民論壇报”第17号，瑞士的各机关报刊；1866年4月“先驅”第4期和1866年4月8日“国际工人协会报”第5号以及1866年4月15日“左岸”报第15号。

“国际工人协会报”（《*Journal de 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是国际瑞士罗曼語区支部每月出版的机关报，1865年12月至1866年9月在約·菲·貝克尔的参加下在日内瓦出版。

“左岸”（《*La Rive gauche*》）是民主派的周报，1864年10月至1866年8月由一批法国左派共和主义流亡者起初在巴黎后来在布魯塞尔出版；报纸刊载过国际的一些文件；报纸的編輯是沙·龙格。——第184頁。

- 154 这組题为“德国战争短評”的文章是弗·恩格斯专为1866年的普奥战争事件写的。这次战争結束了奥地利和普魯士之間多年的爭雄局面，并預定了德意志在普魯士霸权下的統一。在这次战争中，站在奥地利一方的有德意志的几个邦（汉諾威、薩克森、巴伐利亚等），普魯士則和意大利結成了同盟。軍事行动于6月間和7月間在两条战线上，即在波希米亚（捷克）境内和意大利境内展开。奥軍于7月3日在薩多瓦惨敗之后，奥地利便开始議和，并于8月23日在布拉格簽訂和約。根据和約，奥地利把它对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的权利让給普魯士，偿付了一笔不大的賠款，并把威尼斯地区交給意大利王国；早在1815年由維也納會議建立的、联合着三十多个德意志邦的德意志联邦不复存在了，代之而起的是在普魯士领导下沒有奥地利参加的北德意志联邦。由于这次战争，普魯士吞并了汉諾威王国、黑森—加塞尔选帝侯国、拿騷大公国和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自由市。

“德国战争短評”載于“曼彻斯特卫报”(«*The Manchester Guardian*»)。它是英国资产阶级的报纸，1821年创刊于曼彻斯特，是自由貿易維護者(自由貿易論者)的机关报，以后是自由党的机关报。——第187頁。

155 指四边形要塞区——培斯克拉、曼都亚、維罗那和列尼亚哥，均位于北意大利。1848年革命后，控制四边形要塞区的奥軍按当时的軍事学术的要求改建了这群要塞。——第189頁。

156 見注66。——第191頁。

157 这里指的是1859年奥意法战争期間奥地利軍队所采取的战术(詳見弗·恩格斯的文章“意大利战争”、“馬振塔会战”、“索尔費里諾会战”等篇。“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397—400、427—434、448—451頁)。——第191頁。

158 見注59。——第191頁。

159 見1866年5月25日“泰晤士报”。——第193頁。

160 庫斯托查(在北意大利)会战是于1866年6月24日在維克多-艾曼努尔統率的意大利軍队同阿尔勃萊希特大公統率的奥地利軍队之間发生的一次会战，結果奥軍获胜。——第199頁。

161 1796—1797年波拿巴对意大利远征时期，1796年7月29日和8月5日在洛納托会战和卡斯提奧涅会战(在北意大利)中，法国軍队粉碎了武尔姆澤尔元帅指揮的奥地利軍队。

1859年6月24日的索尔費里諾会战是1859年奥意法战争中的最后一次大会战，在这次会战中法国皮蒙特联軍使奥軍遭到了决定性的失敗。——第200頁。

162 指意大利独立战争期間1848年7月23—25日的庫斯托查会战。在这次会战中拉德茨基指揮的奥地利軍队击败了皮蒙特軍队。——第200頁。

163 指1866年普奥战争初期普魯士軍队占領汉諾威、黑森—加塞尔和薩克

森以及这些德意志小邦的君主逃走一事。——第 206 頁。

164 “科倫日报”(«Kölnische Zeitung»)是一家德国日报,从 1802 年起即以此名在科倫出版。在 1848—1849 年革命时期和在此以后的反动統治时期,該报反映了普魯士自由資產階級怯懦的和背叛的政策。——第 207 頁。

165 指普奧戰爭中 1866 年 7 月 3 日在凱尼格列茨城(現名格拉杰茨—克拉洛維)附近离薩多瓦村不远的地方发生的一次决战。薩多瓦会战以奧軍的大敗而結束。在战斗中奧軍曾有被包圍的危險。但是普軍司令官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错过了时机,使奧軍得以渡过易北河向奧里繆茨退却。这次会战在历史上也叫做凱尼格列茨会战。——第 210 頁。

166 1815 年 6 月 16 日,拿破侖第一在利尼(比利时)战胜了布呂歇尔元帅率領的普魯士軍隊。这是他的最后一次胜利,此后于 1815 年 6 月 18 日紧接着就是滑铁卢的失敗。拿破侖力图彻底击潰普軍,以防止它同威灵頓指揮的同盟国英荷軍隊会合。1815 年 6 月 17 日,拿破侖命令格魯希元帅的軍隊追击普軍。但是格魯希犹豫不决,使普軍得以及时地和英荷軍隊会合;这样就决定了滑铁卢会战的結局。——第 212 頁。

167 “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問題給代表的指示”是卡·馬克思为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們写的,这次代表大会于 1866 年 9 月 3—8 日在日内瓦举行。总委员会曾在 1866 年 7 月 17 日的會議上通过一項決議:詳細制定和討論即将举行的代表大会的議程。7 月 31 日,馬克思在总委员会會議上代表常务委员会就議程問題做了一次报告,稍后馬克思用英文写成指示,并由保·拉法格譯成法文。

出席日内瓦代表大会的共有 60 名代表,他們分別代表总委员会,协会各支部,以及英国、法国、德国和瑞士的工人团体。大会主席是海·荣克。馬克思所写的“指示”作为总委员会的正式报告曾在大会上宣讀。掌握大会三分之一票数的蒲魯东主义者反对这份“指示”,他們在一份專門的意見书中就議程的各点提出了自己的广泛綱領。馬克思提出的“指示”共有 9 点,其中作为大会決議通过的有以下 6 点:关于国际联合行动、縮短工作日、儿童劳动与妇女劳动、合作劳动、工会、常备

軍。关于波兰問題，通过了約·菲·貝克尔的折衷性的決議案。日內瓦代表大会批准了国际工人协会的章程和条例。

总委员会受大会委托正式公布大会的材料，这些材料发表在1867年2月20日和3月13日的英文版“国际信使”，1867年3月9日和16日的法文版“国际信使”以及其他刊物上。

“国际信使”(《*The International Courier*》)是周刊，1864年11月至1867年7月用英文和法文在倫敦出版。法文版的名称是《*Le Courrier international*》。在1867年，它是国际的机关报。

1868年10月，总委员会决定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1866年日內瓦代表大会的重要決議和刚刚举行过的布魯塞尔代表大会的決議。馬克思受委托編輯該书。正如他在单行本序言中所指出的，他在单行本里收进了那些“必須看做是国际的綱領的組成部分”的日內瓦代表大会的一些決議，即根据“指示”第二点、第三点、第五点和第六点所作出的決議。单行本于1869年在倫敦出版，书名是：《*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Resolutions of the Congress of Geneva, 1866, and the Congress of Brussels, 1868*》。——第213頁。

168 馬克思建議的工人階級狀況統計調查大綱为日內瓦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但由于总委员会經費不足和地方組織对这件事注意不够，收集資料并把它整理成附有有关材料的总委员会的报告予以出版的工作，实行起来十分困难。在协会的以后几次代表大会——1867年的洛桑代表大会、1868年的布魯塞尔代表大会和1869年的巴塞尔代表大会——上都提到了实行日內瓦代表大会关于工人統計的決議的必要性，1871年的倫敦代表會議把“指示”第二点的c項全部写入协会的組織条例。——第215頁。

169 在美国，內战结束后，为爭取通过立法手續規定八小时工作日的运动加强了。全国成立了許多为八小时工作日而斗争的联盟。全国劳工同盟参加了这一运动，它在1866年8月于巴尔的摩举行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宣布，八小时工作日的要求是把劳动从資本主义奴役下解放出来的必要条件。——第216頁。

170 这里所談的是英国各工联于1865—1867年間广泛参加爭取第二次选举法改革的一般民主运动。

根据国际总委员会的倡議和在它的直接参加下,于1865年春在倫敦建立了改革同盟,这是领导工人爭取第二次选举法改革的群众性运动的政治中心。总委员会的一些委員,主要是英国各工联的領袖,参加了同盟的领导机关——理事会和执行委员会。同盟所领导的改革运动的綱領和对待资产阶级政党的策略都是在馬克思的直接影响下制訂的,他竭力促使英国工人阶级实行不依賴资产阶级政党的、独立的政策。资产阶级仅仅要求把选举权扩大到某些住房的房主和房客,与此相反,改革同盟按馬克思的主張提出国内所有男性成年居民都有普选权的要求。被国际重新提出的这个宪章派的口号,在英国工人阶级队伍中得到了广泛的反响,并且使同盟获得了前此对政治漠不关心的工联的支持。同盟在英国各大工业城市和各地方都有分支机构。但是由于参加改革同盟领导的、囿于群众运动的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动摇,由于工联机会主义領袖的妥协,同盟未能贯彻总委员会拟定的路綫;英国资产阶级使运动发生了分裂,在1867年进行了一次殘缺不全的改革,这次改革仅仅把选举权給了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上层,而工人阶级的基本群众仍然和原先一样处于政治上无权的地位。——第220頁。

171 在美国内战期間,美国工联积极支援了北部各州与奴隶主斗争;1864年春工联曾起来反对反动的海斯丁斯-福哲尔 罢工法案。——第220頁。

172 1866年7月17日至21日英国工联在設菲尔德举行代表會議;出席會議的有代表20万个有組織的工人的138位代表。主要問題是与同盟歇业作斗争的問題,为這個問題曾專門开过几次会。代表會議号召各工联加入国际工人协会的決議发表于“1866年7月17日及其后四天于設菲尔德举行的联合王国工联代表會議的报道”1866年設菲尔德版(«Report of the Conference of Trades' Delegates of the United Kingdom, held in...Sheffield, on July 17th, 1866, and Four following Days...». Sheffield, 1866)。——第221頁。

173 这是馬克思于 1867 年 1 月 22 日在倫敦劍橋大厅举行的紀念 1863—1864 年波兰起义四周年的大会上所发表的演說。这次會議是国际总委员会和波兰流亡者联合会倫敦支部共同組織的。馬克思积极参加了这次大会和大会的筹备工作。3 月 12 日波兰流亡者联合会倫敦支部向总委员会、向馬克思和其他演讲人致謝，感謝它組織这次大会，感謝他們的发言。

包括馬克思的演說詞在內的會議的詳細报道，載于 1867 年 1 月 31 日和 2 月 10 日波兰文“自由之声”报第 129 号和第 130 号，編輯部还作了按語，說“本报一字不易地刊登了这篇以观察精湛縝密、結論合乎邏輯而見称的演說”。

馬克思演說詞英文手稿的譯文在 1908 年 3 月 15 日还刊登在法国社会主义报纸“社会主义报”第 18 号上，手稿是馬克思的女儿劳拉·拉法格寄給編輯部的。我們没有得到馬克思的这份手稿，据“社会主义报”編輯部說，手稿帶有草稿的性质，沒有注明日期；其中某些段落被馬克思亲自划掉了。核对“社会主义报”刊出的法文演說詞和“自由之声”报刊出的波兰文演說詞表明，馬克思在手稿上划掉的段落并非他在发表演說时省略的，只是次序有变动。已发表的两份演說詞除了某些挪动外，几乎每个字都一样。本卷所收入的馬克思的演說詞是根据馬克思生前发表在“自由之声”报上的文字。

“自由之声”(*Głos Wolny*)是波兰文报纸，1863 年 1 月在倫敦創刊，每月出 3 号；是波兰流亡者中的民主派的机关报；該报編輯是安·扎比茨基。——第 224 頁。

174 摘自拉斐德于 1831 年 1 月 16 日在法国众議院會議上的发言，发言发表在 1831 年 1 月 17 日的“总汇通报”上。——第 224 頁。

175 尼古拉一世的“詔书”載于 1848 年 3 月 15 日“北方蜜蜂”报第 59 号。——第 225 頁。

176 指 1848 年 7 月 6 日涅謝尔罗迭給俄国駐德意志各邦的大使們的通告。馬克思在“俄国的照会”一文中詳細分析了这个通告(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5 卷第 342—349 頁)。——第 225 頁。

- 177 馬克思指的是1867年1月7日“泰晤士報”的社論。——第226頁。
- 178 指“莫斯科新聞”(«Московские ведомости»),它是最老的俄國報紙之一,從1756年至1917年出版,在十九世紀五十至六十年代帶有反動傾向。——第226頁。
- 179 見尼·米·卡拉姆津“俄羅斯國家史”1835年聖彼得堡版第11卷第1章第23頁。——第226頁。
- 180 會議桌上的波蘭——是對根據1814—1815年維也納會議的決定以波蘭王國的正式名稱劃歸俄國的那一部分波蘭領土的稱呼。——第227頁。
- 181 暗指1851年7月17日維·雨果在法國國民議會會議上發言中的話;該發言發表在1851年7月18日“總匯通報”上。——第229頁。
- 182 這份辟謠聲明是馬克思於1867年2月18日寄給路德維希·庫格曼的。馬克思請庫格曼設法把它刊登在漢諾威的自由派報紙“北德報”上或任何其他的地方報上。當時,所以特別需要刊登這個辟謠聲明,還因為再過幾個星期馬克思的確要動身到德國去,去的目的是把“資本論”第一卷的手稿帶給奧·邁斯納,並和他商談該書的出版事宜。

在接到馬克思的聲明之後,“北德報”於1867年2月21日刊登了如下一則簡訊:“據卡爾·馬克思先生從倫敦寄給我們的聲明,英國報紙所傳他打算積極參與在波蘭即將爆發的起義的籌劃並準備為着這個目的周遊大陸各國的消息(見“北德報”第5522號),純係杜撰。”

辟謠聲明的俄文是按庫格曼所抄的馬克思的手稿副本譯的。第一次發表於1901年“新時代”雜誌第3期(第2卷)。——第230頁。

- 183 這一決議草案是馬克思於1867年8月13日總委員會會議上就國際工人協會如何對待和平和自由同盟代表大會的問題作了發言(見本卷第612—613頁)以後提出來的。

和平和自由同盟是1867年在維·雨果、朱·加里波第等人積極參加之下成立的一個資產階級和平主義的組織。同盟的成立大會定於1867年9月9日即國際洛桑代表大會結束以後在日內瓦開幕。總委

員会所一致通过的這項決議草案是对洛桑代表大会的代表，首先是对总委员会的代表提出的。保存在总委员会记录簿中的这份文件是从1867年8月17日“蜂房报”第305号剪下貼上的。——第231頁。

- 184 这篇評論是弗·恩格斯为了粉碎官方資產階級科学想以沉默来抵制卡·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的陰謀而写的若干篇文章中的第一篇。用恩格斯自己在1867年11月5日給馬克思的信中的話來說，这是一篇“最不得罪人的”文章，他之所以这样写，是为了使德国任何自由資產階級的報紙都能够刊登它。通过路·庫格曼的介紹，这篇評論发表在1867年10月30日“未来报”第254号上，沒有署名。恩格斯在同一封信中指出，報紙編輯部是以“压缩和歪曲的形式”发表这篇評論的。

“未来报”(«Die Zukunft»)是德国資產階級民主派報紙，人民党的机关报，从1867年起在科尼斯堡出版，1868年至1871年在柏林出版。在这家報紙上还发表了“資本論”第一卷序言。——第232頁。

- 185 是指法国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学家弗·路·費里埃及其著作“論政府和貿易的相互关系”1805年巴黎版(«Du gouvernement considéré dans ses rapports avec le commerce». Paris, 1805)。——第232頁。

- 186 是指卡·馬克思的著作“政治經濟学批判”，該书大部分篇幅是研究貨幣和貨幣流通問題(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3—177頁)。——第233頁。

- 187 这篇評論是弗·恩格斯为“萊茵报”写的，但該报沒有刊登，該报編輯人之一亨利希·毕尔格尔斯曾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成員，这时已成为自由主义者。評論的全文以手稿的形式保留下来，1927年在“馬克思恩格斯文庫”第2卷(«Marx-Engels-Archiv», Bd. 2)上第一次用原文发表，同年在“馬克思主义年鉴”杂志第4期上用俄文发表。

“萊茵报”(«Rheinische Zeitung»)是德国資產階級的日报，該报用这个名称从1863年至1866年在杜塞尔多夫出版，1867年至1874年在科倫出版。——第236頁。

- 188 是指卡·馬克思的著作“政治經濟学批判”。——第237頁。

- 189 是指1867年8月15日通过的关于把工厂法的作用范围扩大到新的工业部門的法律。——第238頁。
- 190 弗·恩格斯的这篇評論通过卡·济貝耳的介紹发表在1867年11月2日“爱北斐特日报”第302号上,沒有署名。
“爱北斐特日报”(«*Elberfelder Zeitung*»)是德国的一家日报,1834年至1904年在爱北斐特出版。十九世紀六十年代是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机关报。——第241頁。
- 191 是指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威廉·沃尔弗以“西里西亚的十亿”为題从1849年3月22日至4月25日发表在“新莱茵报”第252、255、256、258、264、270—272和281号上的一系列文章。1886年这些文章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內容略有改动,书前有恩格斯写的序言。見W. Wolff. «*Die schlesische Milliarde*». Abdruck aus der «*Neuen Rheinischen Zeitung*». März—April 1849. Mit Einleitung von Friedrich Engels. Hottingen-Zürich, 1886。——第241頁。
- 192 是指卡·馬克思的著作“政治經濟学批判”。——第242頁。
- 193 弗·恩格斯的这篇評論通过卡·济貝耳的介紹于1867年11月16日发表在“杜塞尔多夫日报”第316号上,沒有署名。
“杜塞尔多夫日报”(«*Düsseldorfer Zeitung*»)是德国的一家日报,該报用这个名称从1826年至1926年在杜塞尔多夫出版。十九世紀四十年代至六十年代該报奉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方針。——第243頁。
- 194 卡·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見“資本論”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964—965頁)。此处和本卷以后各处的“資本論”引文,都是根据德文第一版。德文第四版与德文第一版有些不同。——第244頁。
- 195 总委员会致英国內务大臣格桑-哈第的意見书,是馬克思1867年秋所組織的英国工人支援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的广大群众运动中的一个重要的文件。

自五十年代末起，在侨居美国的爱尔兰流亡者中間，后来又 在爱尔兰本土，先后成立了一个芬尼亚社社員的秘密組織——爱尔兰革命（或共和）兄弟会。芬尼亚社社員在客观上反映爱尔兰农民的利益，其社会成分主要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平民知識分子。芬尼亚社社員由于自己的密謀策略及宗派主义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性质的錯誤而脱离爱尔兰广大人民阶层，他們沒有把自己的活动同当时英国的一般民主主义运动、其中包括英国工人爭取选举改革的斗争联系起来。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不止一次強調指出芬尼亚运动的弱点，但对这一运动的革命性质还是給予了高度的評价，并曾极力引导这一运动走上举行群众性发动和同英国工人阶级一致行动的道路。1867年2—3月間，芬尼亚社社員长期准备的武装起义遭到失敗，在各郡分散举行的零星发动遭到鎮压，許多领导人被捕并交法庭审判。9月18日，为了营救两名被捕的芬尼亚社领导人凱利和迪集，在曼彻斯特組織了对囚車的武装襲击。凱利和迪集逃跑成功，但在冲突中有一名警察被击毙。五人当场被捕，他們被控杀害警察并被判处死刑。其中一人（馬瓜伊尔）后来被赦免，另外一人（康当）由死刑改判为終身监禁，其余三人（拉尔金、阿林和奥勃莱恩）于1867年11月23日被处决。判处死刑的事件在爱尔兰和英国引起了广泛的抗議浪潮。总委员会委員、其中包括法国通訊書記杜邦参加了这一运动；杜邦于1867年10月14日在巴黎报纸“法兰西信使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芬尼亚运动的文章。但是声援芬尼亚社社員的行动沒有得到沾染了资产阶级沙文主义观点的总委员会英国委員的支持。关于这一点，奥哲尔和魯克拉夫特在10月23日、30日和11月1日改革同盟委员会討論譴責芬尼亚社社員为叛乱者的決議时所采取的立場就是一个证明。馬克思为了力求制定无产阶级在民族問題上的統一策略并在英国工人中間宣傳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思想，坚持在总委员会中就爱尔兰問題进行公开辯論，辯論时邀請爱尔兰和英国报界的代表出席。1867年11月19日和26日进行了辯論（見本卷第499—505頁）。

由馬克思用英文起草的“在曼彻斯特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員和国际工人协会”这个意見书，为总委员会在1867年11月20日举行的非常會議批准。馬克思夫人燕妮·馬克思手抄的該意見书副本被保存下

来，副本的文字和总委员会记录簿里記載的文字完全相同。由于工联领导人的反对，該意見书沒有以英文发表。該意見书在1867年11月24日的“法兰西信使报”上以法文发表。

“法兰西信使报”(«*Le Courrier français*»)是一家政治性的周报，从1867年6月18日起改为日报；1861—1868年在巴黎出版；从1866年5月20日起蒲魯东主义者奥·韦莫雷耳担任該报編輯。在这一时期，該报实际上是国际在法国的机关报；这家报纸登載过国际的文件和杜邦寄自英国的通訊，也刊登过保·拉法格和劳·拉法格翻譯的卡·馬克思的“資本論”第一卷序言。——第246頁。

196 暗指1863年林肯总统和1865年約翰遜总统对站在南部各州方面参加美国内战的人进行的大赦。——第246頁。

197 “剽窃者”一文是卡·馬克思针对拉薩尔分子霍夫施泰滕于1867年11月24日在全德工人联合会大会上的发言写的，关于这次大会的詳細报道載于1867年11月29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39号附刊。霍夫施泰滕在发言中几乎逐字逐句地引用馬克思“資本論”中的一些段落，歪曲它們的意思，而且既沒有注明书名，也沒有說明作者的名字。

“剽窃者”一文发表在1867年12月12日“未来报”第291号附刊，发表时沒有署名。——第248頁。

198 本文此处和以下各处，以及“資本論”的各篇評論中，圓括号內的頁碼是“資本論”1867年德文第一版第一卷的頁碼。——第249頁。

199 恩格斯在写这篇評論的时候，利用了1867年12月7日卡·馬克思給他的信中的許多地方。这篇評論通过路·庫格曼的介紹于1867年12月27日发表在斯图加特报纸“观察家报”第303号上，沒有署名。——第254頁。

200 这篇評論通过路·庫格曼的介紹发表在1867年12月27日“維尔騰堡工商业报”第306号上，沒有署名。

“維尔騰堡工商业报”(«*Gewerbeblatt aus Württemberg*»)是一家德国周报，是中德工商界的机关报，从1849年起在斯图加特出版。——第257頁。

201 1865年5月16日和1867年7月8日簽訂的新的關稅同盟條約，其目的在於鼓勵貿易自由。——第258頁。

202 弗·恩格斯的這篇評論通過卡·濟貝耳的介紹發表在1868年1月21日“新巴登報”第20號上，沒有署名。

“新巴登報”(《*Neue Badische Landeszeitung*》)是德國資產階級民主派的日報，該報用這個名稱從1867年至1933年在曼海姆出版。——第260頁。

203 弗·恩格斯的這篇評論發表在1868年3月21日和28日“民主週報”第12號和第13號上，沒有署名。這篇評論轉載於1871年4月5日和8日“人民國家報”第28號和第29號上。

“民主週報”(《*Demokratisches Wochenblatt*》)是德國工人的報紙，該報用這個名稱從1868年1月至1869年9月在萊比錫出版，由威·李卜克內西主編。從1868年12月起，該報成為奧·倍倍爾領導的德國工人協會聯合會的機關報。最初該報受到人民黨的小資產階級思想的一定的影響，但是不久由於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努力，該報開始與拉薩爾主義進行鬥爭，宣傳國際的思想，刊登國際的重要文件，在德國社會民主工黨的創建中起了重要的作用。1869年在愛森納赫代表大會上該報被宣布為社會民主工黨的中央機關報，並改名為“人民國家報”(見注286)。——第263頁。

204 “卡·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提綱”是弗·恩格斯在1868年寫的，保存下來的是手稿，內容只包括該書的前三分之二，到“機器和大工業”一節為止。“提綱”第一次用俄文發表在“馬克思恩格斯文庫”1929年版第4卷，1933年用原文出版了蘇共中央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院編的單行本。——第273頁。

205 “資本論”第一版第一卷出版後，馬克思對該書的一些章節又做了重大的修改和補充，對該書的結構也做了一些改變。原來該書包括6章和第一章的附錄，在德文第二版及以後各版中，改成了7篇，共包括25章(參看“資本論”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

在本文中，圓括号中是恩格斯注的“資本論”1867年德文第一版第

- 一卷的頁碼。——第 275 頁。
- 206 指后来出版的“資本論”第三卷，該卷在 1864—1865 年間已經基本上写好。——第 299 頁。
- 207 *Règlement organique* (組織規程)是多瑙河各公国(莫尔达維亞和瓦拉几亞)的第一部宪法。1828—1829 年俄土战争结束后，根据 1829 年俄土两国的阿德里安堡和約，俄軍占領了这些公国。这部宪法是由这些公国的俄国行政当局首脑巴·德·基謝廖夫于 1831 年实施的。根据組織規程，每个公国的立法权交給大土地占有者所选出的議會，而行政权交給土地占有者、僧侶和城市的代表所选出的終身国君。規程巩固了大貴族和上层僧侶的統治地位，保持了原有的封建制度，包括徭役制。农民曾举行許多次起义来回答这部“宪法”。同时，組織規程还規定了資產階級的改革：廢除国内關稅，实行貿易自由，司法和行政分立等。——第 301 頁。
- 208 这个問題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第五章“不变資本使用上的經濟”中作了考查。——第 308 頁。
- 209 指亚当·弗格森、約翰·塔克特、亚当·斯密著作的引文(參看“資本論”1953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1 卷第 436—438 頁)。——第 314 頁。
- 210 魯德分子是指英国十八世紀下半叶至十九世紀初工人运动的参加者。由于无产階級階級覺悟方面的落后和不成熟，运动是一种反对机器的暴动。运动由傳說中的針織工人魯德而得名，据說他是第一个破坏織机来回答主人专橫的人。魯德运动是劳动群众反抗資本主义剝削的自发的表現。——第 321 頁。
- 211 这篇評論是弗·恩格斯于 1868 年 5—6 月間写的，准备在“双周評論”杂志上发表，但被編輯部拒絕。原文手稿被保存下来，第一次用俄文发表在 1926 年“馬克思主义年鉴”杂志第 1 期上。

从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中可以看到，他們曾不止一次地就这篇文章的內容和形式交換意見，馬克思提了一些意見，甚至就某些地方提出了表述方案，并被恩格斯完全采納到原文中去。这篇文章原定用恩

格斯的英国友人賽·穆尔的名字发表。

“双周評論”(《*The Fortnightly Review*》)是英国的一家历史、哲学和文学問題月刊;1865年由一群資產階級激进派創刊;后来奉行資產階級自由主义方針;該杂志用这一名称在倫敦一直出版到1934年。——第326頁。

212 托·图克“通貨原理研究”1844年倫敦第2版第69—70頁(Th. Tooke. «An Inquiry into the Currency Principle». Second edition, London, 1844, pp. 69—70)。——第326頁。

213 这里指所謂“通貨学派”或“通貨原理”的拥护者。这一学派的代表(奧維爾斯頓、托倫斯、阿伯思諾特等人)断言,商品的价值和价格决定于流通領域中的貨幣数量。此外,他們要求紙幣必須有黃金保证,并且根据貴金屬进出口情况調整紙幣的发行。从这种錯誤的理論前提出发,“通貨学派”认为生产过剩經濟危机的决定性原因,是由于他們所宣布的貨幣流通規律遭到破坏,只要遵守这些規律,似乎資本主义的經濟就可以避免这种震蕩。“通貨学派”理論在十九世紀上半叶在英国十分流行。但是英国政府以这种理論作根据的种种嘗試沒有收到任何效果,而只是证明它在科学上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在實踐上是毫不中用的。——第326頁。

214 指杜尔哥“关于財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該文載于“杜尔哥全集”1844年巴黎版第1卷第43頁(Turgot. «Réflexions sur la formation et la distribution des richesses». In: Oeuvres. Tome premier, Paris, 1844, p. 43)。該著作第一版发表于1766年。——第326頁。

215 这里所提到的第一章,在再版时被馬克思改为第一篇,其中包括3章。——第327頁。

216 在国际1867年洛桑代表大会上曾确定1868年度全协会代表大会的地点为布魯塞尔;1868年2月24日总委員會会敦促各支部就代表大会的議程进行准备。但是,1868年5月16日比利时司法大臣茹尔·巴拉

在下院宣布不許代表大会在布魯塞尔召开,并要求議員們將 1835 年的外侨法的有效期延长,根据該法,任何一个外国人都可能受到政治可疑的指控而被驅逐出境。因此,馬克思在 5 月 25 日的总委员会會議上提出不在布魯塞尔召开代表大会的問題。馬克思起草的決議在 6 月 2 日的总委员会會議上被宣讀。

巴拉的演說和接踵而来的延长外侨法的有效期的做法,在比利时引起了广泛的不滿。国际布魯塞尔支部向司法大臣提出抗議,抗議書載于 1868 年 5 月 24 日“人民論壇报”第 5 号。

布魯塞尔支部的领导人德·巴普和万丹胡亭写信給总委员会,建議不要对政府让步,因为这一让步将使国际在比利时的繼續存在受到威胁;总委员会接到这封信后在 6 月 16 日的會議上撤銷了 6 月 2 日的決議,决定应屆代表大会的召开地点仍在布魯塞尔。

这个決議載于总委员会 1868 年 6 月 2 日的記錄,同时也发表于 1868 年 6 月 6 日“蜂房报”第 347 号。——第 351 頁。

- 217** 1868 年 6 月 29 日在倫敦克利夫兰大厅举行的 1848 年巴黎无产階級六月起义紀念大会上,法国小資产階級民主主义者費·皮阿发表了演說,他直接号召采取恐怖行动反对拿破侖第三。布魯塞尔的一家报纸“蟋蟀报”(«Cigale»)在关于那次會議的报道中把費·皮阿說成是国际的领导人之一。这种說法并且被其他报纸一再重复。总委员会考虑到这会在工人的心目中破坏国际的威信,而且会給波拿巴政府提供一个它所求之不得的、迫害国际在法国和比利时的成員的借口,于是在 1868 年 7 月 7 日的會議上根据馬克思的建議作出决定,不承认費·皮阿的演說,并公布了本決議。

決議在报刊上出現之后,倫敦的法国人支部(費·皮阿是它的一个成員)发生了分裂。无产階級分子的代表(欧·杜邦、海·荣克、保·拉法格等人)离开了該支部,以此对皮阿的挑撥性和冒險性的策略表示不贊同。皮阿的一小伙人与国际失去联系,但他們繼續以国际的名义进行活动,并一再支持总委员会里反对馬克思的路綫的各个反无产階級的小集团。1870 年 5 月 10 日总委员会正式与这一小伙人划清了界限(見本卷第 485 頁)。

決議保存在 1868 年 7 月 7 日的总委员会记录中；它最先刊载于 1868 年 7 月 12 日“自由报”第 55 号，后又转载于 1868 年 7 月 19 日“蟋蟀报”第 29 号、1868 年 7 月 26 日“人民论坛报”第 7 号和其他报纸。

“自由报”(«*La Liberté*»)是比利时民主派报纸，1865 年至 1873 年在布鲁塞尔出版；从 1867 年起成为国际工人协会在比利时的机关报之一。

“蟋蟀报”(«*La Cigale*»)是 1867 年 12 月至 1869 年 7 月由法国左派共和党人在布鲁塞尔出版的周报；这家报纸和在伦敦的费·皮阿的那一小伙人有密切的联系。——第 352 页。

- 218 “我对弗·巴师夏的剽窃”一文是卡·马克思针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污蔑而写的，他们说什么马克思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确定价值量是从法国庸俗经济学家巴师夏那里抄襲来的。这些非难见于少数几篇“资本论”书评，其中有一篇匿名的书评发表在尤·孚赫参加出版的杂志“国民经济和文化史季刊”第 5 年度第 20 册(1868 年)上，另外一个匿名作者的书评发表在 1868 年 7 月 4 日“德国中央文学报”第 28 号上。
本文在马克思生前未发表。——第 353 页。

- 219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4 卷第 110 页及以下各页。——第 354 页。

- 220 指 1850 年出版的弗·巴师夏的著作“经济的谐和”(«*Harmonies économiques*»)。——第 354 页。

- 221 这句话出自路德“反高利贷讲道集”一书 1540 年维登堡版第 9 页(«*An die Pfarrherrn wider den Wucher zu predigen*», Wittenberg, 1540, S. 9)。——第 354 页。

- 222 蠢惑者是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在德国对本国知识分子中间的反政府运动的参加者的称呼。这个词是在 1819 年 8 月举行的德意志各邦大臣卡尔斯巴德联席会议通过了一项对付“蠢惑者”的阴谋的专门决议之后流行开来的。——第 354 页。

- 223 指施马尔茨“政治经济学。致德意志某王储书柬”1818 年柏林版第 1

册(«Staatswirthschaftslehre in Briefen an einen deutschen Erbprinzen». Th. I, Berlin, 1818) 及其法譯本 «Économie politique, ouvrage traduit de l'Allemand». T. I, Paris, 1826. ——第 354 頁。

- 224 1867—1868 年間，沙皇政府在波兰采取了一系列的行政手段來廢除波兰的各种設施而強迫推行俄罗斯化。

这份声明在 1868 年 7 月 14 日由馬克思提出而經总委員會批准，它保存在总委員會記錄簿中，并发表于 1868 年 7 月 18 日“蜂房报”第 352 号。——第 356 頁。

- 225 关于在資本主义制度下使用机器的后果的問題，是由总委員會于 1868 年 1 月 28 日提出列入布魯塞尔代表大会議程的。为了筹备代表大会，在总委員會 7 月 28 日和 8 月 4 日的两次會議上对議程里的这一項預先进行了討論。討論是由馬克思发起的，他在发言中闡述了自己在“資本論”第一卷第十三章“机器和大工业”里加以發揮的那些基本思想(卡·馬克思的发言記錄見本卷第 640—642 頁)。

馬克思在 8 月 4 日的會議上对討論进行了總結，并提議以決議的形式說明总委員會的結論。決議由馬克思起草并在总委員會下一次會議即 8 月 11 日的會議上獲得批准。

在布魯塞尔代表大会上，該決議由格·埃卡留斯在 1868 年 9 月 9 日的會議上提出而被納入代表大会所通过的決議的引言部分。弗·列斯納在同一天的會議上发言論证了馬克思在这个問題上的立場，他宣讀了摘自“資本論”的一些引文。——第 357 頁。

- 226 “致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和理事会”这封信，是馬克思于 1868 年 8 月 18 日为答复施韦澤的正式邀請而写的；施韦澤邀請他以貴宾身份出席联合会的大会，在請帖上签名的还有拉薩尔派联合会理事会的一些工人理事。

1868 年 8 月 22—26 日在汉堡举行的大会表明，全德工人联合会中的先进分子在工人运动的經驗的启示下，开始拋棄拉薩尔的教条。大会原則上贊助罢工运动，但又表示反对实际組織罢工。拉薩尔派的領

领导人害怕在渴望建立工会的工人中丧失威信，不得不耍些手腕。当时，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在建立工会方面已经进行了有成效的活动；施韦澤和联合会副主席弗里茨舍为了要走在他们前面，提出了在柏林召开全德各工人工会代表大会的建议。正統的拉薩尔分子拒絕了这一建议，而要施韦澤和弗里茨舍以国会议员身分召开这样的代表大会。大会原则上承认各国工人共同行动的必要性，但实际上联合会的领导继续阻撓联合会加入国际。

馬克思致联合会主席和理事会的信在大会的 1868 年 8 月 24 日秘密会议上宣读，受到鼓掌欢迎。这封信除了发表于“社会民主党人报”以外，还发表于 1868 年 8 月 29 日“民主周报”第 35 号。后来，为纪念馬克思逝世三周年，他的这封信又轉載于 1886 年 3 月 11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11 号。——第 358 頁。

227 指国际总委员会常务委员会(見注 17)。——第 358 頁。

228 这个決議是为筹备布魯塞尔代表大会而在 1868 年 8 月 25 日总委员会会议上批准的，決議保存在这次会议的记录中；此外，決議还載于 1868 年 8 月 29 日“蜂房报”第 359 号(馬克思論证該項決議的发言记录見本卷第 643 頁)。

在布魯塞尔代表大会上，該決議由埃卡留斯提出，得到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的贊同并在 1868 年 9 月 12 日会议上宣读，同时載入会议记录。——第 359 頁。

229 总委员会第四年度报告(第一年度报告是在 1865 年 9 月向国际倫敦代表会议提出的)是馬克思为 1868 年 9 月 6—13 日在布魯塞尔举行的国际第三次全协会代表大会写的。

馬克思直接参加了布魯塞尔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但没有亲自出席这次大会。参加大会的有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瑞士、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的工人代表近 100 名。大会通过了一项极为重要的決議：必須把铁路、地下資源、矿井和矿山、森林以及耕地轉交公共所有。这一決議說明了法国和比利时的蒲魯东主义者大多数已轉到集体主义的立場，它标志着在国际中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对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

胜利。大会还通过了馬克思所提出的关于八小时工作日、关于机器的使用、关于对資產階級和平主义的和平和自由同盟代表大会的态度(見本卷第 231、612—613 頁)等決議；同时还通过了弗·列斯納以德国代表团名义提出的关于建議各国工人学习馬克思的“資本論”并协助把这部著作从德文譯成其他各国文字的決議。

馬克思所起草的总委员会的报告是在 1868 年 9 月 7 日的代表大会的一次會議上宣讀的。这个报告在 1868 年 9 月 9 日“泰晤士报”登載的埃卡留斯通訊稿里第一次发表。本文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一版里发表时就是根据这篇通訊稿；本版所根据的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档案館中所保存的由馬克思夫人燕妮·馬克思手抄的德文稿本；这份稿本比我們过去所得到的英文稿完整一些。和英文稿的一些主要不同之处均在脚注中注明。这个报告用德文发表于 1868 年 9 月“先驅”杂志第 9 期、1868 年 9 月 11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106 号、1868 年 9 月 12 日“民主周报”第 37 号附刊和 1868 年 9 月 12 日“海爾曼”第 506 号。用法文发表于“比利时人民报”特別附刊：《Troisième congrès de 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Compte-rendu officiel》. Bruxelles, 1868, 以及 1868 年 9 月 13 日“自由报”第 64 号。——第 360 頁。

230 1867 年 7 月，亞眠发生了染色工人的罢工，这次罢工得到了其他行业工人的支援。

1867 年 3 月，魯貝織布工人和紡紗工人开始罢工。罢工的起因是，由于采用机器后大批工人被解雇。

1867 年 2 月，巴黎銅器工人开始罢工，他們拒絕按企业主的要求退出互助会。由于总委员会的协助，巴黎工人得到英国工联的援款。罢工以工人的胜利宣告結束，他們保住了自己的組織。

1868 年 3—4 月，日內瓦有 3 000 个建筑工人举行罢工。工人要求把工作日縮短到 10 小时，要求提高工資并把計日工資改为計时工資；除建筑工人外，其他工业部門的工人也参加了罢工。由于瑞士、英国、法国和德国工人的支援，日內瓦工人的罢工取得了胜利。——第 361 頁。

- 231 指的是巴黎支部向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所提出的文件：“日内瓦代表大会。法国代表的报告”1866年布鲁塞尔版（«Congrès de Genève. Mémoire des délégués français». Bruxelles, 1866）。——第361頁。
- 232 1867年12月，国际巴黎支部理事会理事的住宅遭到搜查，随后开始了偵訊，接着就是1868年3月进行的对国际的法国組織的第一次审判。在法国警察搜查时所沒收的信件当中，有一封信是法国通訊書記欧·杜邦于1867年11月23日写給 A. 繆拉的，信中告知协会的法国會員营救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員的运动的情况。法国当局企图利用这封信給国际安上組織芬尼亚社社員进行密謀的罪名。——第361頁。
- 233 按照刑法法典第二九一条和1834年4月10日法令，在法国，成立20人以上的社团，必須經有关当局批准。——第362頁。
- 234 上面所談的沙勒罗瓦矿区事件发生在1868年春天。由于矿主把每周生产减少4天，工資降低10%，工人宣布了罢工，停止了工作，并因而遭到了武装鎮压。
- 比利时支部在国内外广泛展开了支援罢工者的运动。支部組織了許多次抗議大会。在“人民論壇报”、“自由报”等报刊上广泛报道了沙勒罗瓦事件；1868年4月12日发表了告比利时工人及各国工人书；同总委员会保持着經常的联系。总委员会也发出了呼吁书，宣布沙勒罗瓦矿工的事情是整个国际的事情，組織了对罢工者的援助。由于这些事件，国际在比利时的會員人数大大增加。——第362頁。
- 235 1867年11月3日，法国軍隊同教皇的雇佣卫队一起在門塔納附近击败了再次进攻羅馬的加里波第軍隊；加里波第进攻羅馬的目的是要把羅馬从法国占領下解放出来，归入意大利的版图。——第363頁。
- 236 指普魯士1850年3月11日頒布的反动的結社法。——第363頁。
- 237 約·菲·貝克尔所領導的在瑞士的各德国人支部中央委员会从1865年11月起成为許多支部的組織中心，这些支部不仅把在瑞士的德国工人，而且也把德国、奥地利以及有德国工人流亡者居住的国家里的德国

- 工人联合起来了。約·菲·貝克尔所进行的活动,特别是他所办的“先驅”月刊,在德国国内还缺少建立組織的条件的时候,大大地促进了国际的思想在德国工人中間的傳播。——第 363 頁。
- 238** 指 1868 年 8 月 22—26 日在汉堡举行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大会 (見注 226)。會議通过的決議載于 1868 年 9 月 2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102 号。——第 363 頁。
- 239** 倍倍尔领导的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于 1868 年 9 月 5—7 日在紐倫堡举行代表大会。总委员会派格·埃卡留斯为正式代表出席了这次代表大会。代表大会以多数票 (69 对 46) 通过了关于加入国际工人协会的決議,并选出一个由 16 名委員組成的委员会負責实地执行这一決議;这 16 人于 1868 年 9 月 22 日被总委员会批准为国际工人协会在德国的执行委员会。紐倫堡代表大会还通过了关于組織工会的決議。——第 363 頁。
- 240** 彼·福克斯被指定为总委员会出席預定于 1868 年 9 月在維也納举行的奥匈各族工人代表大会的代表。——第 364 頁。
- 241** 瑞士的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紐沙特尔 (諾恩堡) 代表大会是在 1868 年 8 月 9—10 日举行的。——第 364 頁。
- 242** 美国全国劳工同盟于 1866 年 8 月在巴尔的摩举行的代表大会上成立。美国工人运动出色的活动家威·西耳維斯积极地参加了成立同盟的工作。同盟很快就同国际工人协会建立了联系。1867 年 8 月的全国劳工同盟芝加哥代表大会选出特雷維利克为出席国际工人协会最近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但他沒有出席代表大会。1869 年,同盟的代表凱麦隆出席了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的最后几次會議。1870 年 8 月,同盟在自己的辛辛那提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如下的決議:“全国劳工同盟宣布拥护国际工人协会的原則,并希望在最近期間加入上述协会。”但是这一決議并没有实现。全国劳工同盟的领导不久就埋头于空想的金融改革方案,这种改革的目的是消灭銀行制度,并由国家提供低息貸款。1870—1871 年,一些工联脱离了同盟,到 1872 年同盟实际上已不复存在。——第 364 頁。

- 243 席勒协会 是为紀念偉大的德国詩人弗·席勒誕生一百周年于 1859 年 11 月在曼彻斯特成立的，它的目的是要成为曼彻斯特德国侨民的文化生活和社会活动的中心。起初，恩格斯站在一旁对协会的带有普魯士官僚主义烙印的活动抱批判的态度。在席勒协会的章程經過一些修改以后，恩格斯于 1864 年担任协会理事会理事，后来又任协会主席；他在这方面付出了很多時間，对协会的活动有很大影响。1868 年 9 月，在恩格斯离开曼彻斯特期間，理事会曾經決定邀請卡·福格特在协会中作讲演，这件事促使恩格斯写了这封信。理事会秘书戴維逊于 1868 年 10 月 2 日代表理事会請求恩格斯改变辞去协会主席和理事会理事职务的决定，但恩格斯沒有同意。1870 年 4 月，恩格斯重新被选为席勒协会理事会理事，但他此后已不再积极参加协会的活动。——第 366 頁。
- 244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 2 版第 14 卷第 395—691 頁。——第 366 頁。
- 245 指由于建筑席勒协会的新会址而产生的困难。——第 367 頁。
- 246 “論拉薩尔派工人联合会的解散”一文沒有署名发表在 1868 年 10 月 3 日“民主周报”第 40 号上；这是恩格斯在 1868 年 9 月底写的，那时他得悉萊比錫警察当局在 1868 年 9 月 16 日查封了全德工人联合会（該会的中央在萊比錫），并且封閉了联合会在柏林的地方分会。但是，1868 年 10 月 10 日，即查封后过了三个星期，以施韦澤为首的一批拉薩尔分子用同一名称恢复了联合会，并把会址迁到柏林。在刊登在 1868 年 10 月 11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119 号上的新章程中，表示决心严格遵守普魯士的法律，并且只通过和平的、合法的途徑进行活动。为了适应普魯士法律的要求，联合会的領導取消了地方分会。——第 368 頁。
- 247 指全德工人联合会在汉堡召开的大会（見注 226）。——第 371 頁。
- 248 “論拉薩尔派工人联合会的解散”一文的补充沒有署名发表在 1868 年 10 月 10 日“民主周报”第 41 号上；这是恩格斯在 1868 年 10 月初按馬克思的建議写的；馬克思在 1868 年 9 月 25 日的信中會提請他注意

- 1868年什萊茨出版的伯·貝克尔的小冊子“揭露斐迪南·拉薩爾的悲慘逝世的內幕”(«Enthüllungen über das tragische Lebensende Ferdinand Lassalle's». Schleiz, 1868)。——第372頁。
- 249 这里指的是一小批拉薩爾分子，他們在索·哈茨費爾特影响下脫離了全德工人联合会，并于1867年組織了“拉薩爾派全德工人联合会”；該联合会的主席最初是費爾斯特林格，后来是門德；它在工人当中沒有任何威信，在1872年实际上已不存在了。——第372頁。
- 250 这篇短文是馬克思为“民主周报”写的(見1868年10月4日馬克思給恩格斯的信)。短文的第一段看来由報紙編輯部作了一些改动。——第374頁。
- 251 指国际总委员会和英国各工联共同組織的对罢工工人的物质援助。
在巴黎銅匠罢工期間(1867年2—3月)，总委员会在1867年3月13日“国际信使”上发表致英国工人的公开信，号召給罢工者以物质援助。鞋匠、裁縫、紅木工人等工联通过总委员会寄了好几百英鎊到法国去。
由于馬尔希延的比利时矿工和冶金工人被枪杀(1867年2月)，总委员会在1867年3月13日“国际信使”上发表“致大不列顛矿工和冶金工人”的公开信，号召援助遭到殘酷鎮压的受害者。受害者工人的家屬得到了金錢上的帮助。
在日內瓦建筑工人罢工和被大批解雇期間(1868年3—4月，見注230)，总委员会每月都从英国寄去4万法郎的援款。这些寄到日內瓦去的錢是木工和細木工，紡織工人，以及装訂工人等工联寄去的。——第374頁。
- 252 “人民报”(«*Volks-Zeitung*»)——德国民主派日报，从1853年起在柏林出版。——第374頁。
- 253 指工联倫敦理事会，它首次于1860年5月由倫敦各工联代表會議选出。倫敦理事会領導着首都各工联成千上万的群众，对整个英国工人階級都有影响。在六十年代前半期它曾經領導英国工人反对干涉美国、維護波兰和意大利的历次行动，稍后又領導了他們爭取工联合法化

的运动。在倫敦理事会中起领导作用的是已经壮大起来的各个工联的领导人——木工工联的克里默及其后的阿普耳加思，鞋匠工联的奥哲尔，泥水匠工联的柯耳森和豪威尔，机械工工联的阿林。他们当中只有阿林没有参加国际总委员会。

馬克思从国际成立时起就跟工联领袖們的改良主义和行会閉关自守心理作斗争，他力图把广大的英国工人群众引导到协会的队伍里来，設法使工联的基层組織加入协会，并使工联倫敦理事会作为不列顛支部加入协会。关于加入国际的問題，曾經根据总委员会英国委員們的动議在工联倫敦理事会的許多次會議上加以討論；1867年1月14日工联倫敦理事会通过了一項決議，表示贊同国际工人协会的原則，但断然拒絕与协会建立任何組織联系。此后，工联倫敦理事会通过它在总委员会委員中的成員繼續与国际保持接触。——第 375 頁。

254 見注 170。——第 375 頁。

255 指宪章运动的领导人布朗特爾·奧勃萊恩和雷諾等人于 1849 年在倫敦建立的全国改革同盟。同盟的目的是爭取普选权和实行社会改革。1866 年它加入国际并在总委员会领导下开展活动，成为改革同盟的一个分支机构。全国改革同盟的领导人阿尔弗勒德·华尔頓和乔治·米尔納都是国际总委员会的委員、国际多次代表大会的参加者。——第 375 頁。

256 “威塞尔报”(«*Weser-Zeitung*»)是德国資產階級自由派报纸；1844 年至 1930 年在不来梅出版。

“奥格斯堡女人”(«*Augsburgerin*»)是指奥格斯堡的“总汇报”(見注 24)。——第 376 頁。

257 “晨星报”(«*The Morning Star*»),英国日报,自由貿易論者的机关报,1856 年至 1869 年在倫敦出版。

“星期六評論”(«*Saturday Review*»)是英国保守派周刊“政治、文学、科学和艺术星期六評論”(«*Saturday review of politics, literature, science and art*»)的簡称,1855 年至 1938 年在倫敦出版。——第 376 頁。

258 指德国政論家、曾是青年黑格尔分子的埃德加尔·鮑威尔于1863年到普魯士出版局供职一事。——第376頁。

259 这篇文章是卡·馬克思应“外交評論”的出版者科·多·科勒特的請求写的。

“外交評論”(《*The Diplomatic Review*》)是关于对外政策問題的英国杂志,1866年至1877年以这个名称出版,每年4期。杂志的編輯是保守的政論家、当过外交官的戴維·烏尔卡尔特,他从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初起就在自己的杂志“公文集”(《*The Portfolio*》)上,或以小册子的形式发表有关欧洲列强秘密外交的文件,其中包括揭露帕麦斯頓这个长期是英国对外政策的实际领导人的外交活动的文件。

不倦地与統治階級的秘密外交作斗争的馬克思,1853年在一組揭露性的文章“帕麦斯頓勳爵”中,除了利用其他文件,也利用了烏尔卡尔特发表的許多文件。后来馬克思的某些文章也在烏尔卡尔特的杂志“自由新聞”(《*The Free Press*》)上刊載。同时,馬克思也激烈地批評了烏尔卡尔特的反民主观点,并且經常強調自己的无产階級革命者的立場同烏尔卡尔特分子的反动立場的根本区别。

“外交評論”編輯部在发表馬克思这篇文章时加了一个按語,介紹馬克思是“資本論”的作者,并且写了許多对外政策方面的文章。——第377頁。

260 1844年銀行法令是皮尔政府通过的一項法律,它規定英格兰銀行分为两个完全独立的部,各自有其独立的現金儲备;銀行部經營純銀行业务,发行部掌管銀行券的发行。銀行券应当有專門基金作保证,這項基金在任何时候都必須是現金。但是在尖銳的經濟危机期間——在1847年、1857年和1866年春——英国政府都曾被迫使1844年法令暫停生效,扩大了沒有黄金保证的銀行券的数額。

1866年的危机在英国的信貸領域里表現得特別尖銳;1866年5月,当时財政恐慌达到极点,英格兰銀行受到破产的威胁,銀行董事会收到了首相罗素和財政大臣格萊斯頓签署的信,批准1844年法令暫停生效,这样才使貸款业务得以扩大并使国内財政恐慌有所緩和。——第377頁。

- 261 指头两次 1844 年法令暫停生效的事，即 1847 年 10 月 25 日首相罗素和財政大臣伍德給英格蘭銀行董事会的信，以及 1857 年 11 月 12 日首相帕麦斯頓和財政大臣路易斯的信。——第 378 頁。
- 262 指法国、英国、奥地利、俄国、撒丁、普魯士和土耳其的代表在巴黎举行的會議，會議的結果是于 1856 年 3 月 30 日簽訂了結束 1853—1856 年克里木战争的巴黎和約。馬克思暗指率領英国代表团参加會議的克拉倫登由于英法矛盾和法俄亲善已趨明朗而未能充分实现英国外交計劃一事。——第 378 頁。
- 263 馬克思于 1868 年 11 月 23 日写給倫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的这篇声明，是由于协会对 1868 年的拉薩尔派柏林代表大会以及对倍倍尔和李卜克內西在紐倫堡代表大会上建立的工人組織所持的立場引起的。馬克思于 1868 年 11 月 23 日写信給恩格斯說，“从巴黎和德国进口的拉薩尔分子——他們同施韦澤有秘密的来往——利用列斯納由于妻子生病而未能出席的机会，强使对施韦澤投信任票而反对紐倫堡派”。后来列斯納在同协会里的拉薩尔分子的斗争中得到了馬克思的支持。
- 倫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是卡·沙佩尔、約·莫尔和正义者同盟的其他活动家于 1840 年 2 月建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后，在协会里起领导作用的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地方支部。1847 年和 1849—1850 年，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参加了协会的活动。在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派同宗派主义冒险主义少数派（維利希—沙佩尔集团）之間的斗争中，协会中大部分会员站在少数派一边，因此在 1850 年 9 月 17 日馬克思、恩格斯和他們的許多拥护者退出了协会。从五十年代末起，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参加了該协会的活动。国际成立之后，协会（列斯納是协会的领导人之一）就成为国际协会的在倫敦的德国人支部。倫敦教育协会一直存在到 1918 年为英国政府所封閉。——第 380 頁。
- 264 指施韦澤和弗里茨舍得到在漢堡召开的拉薩尔派的联合会大会（見注 226）的同意于 1868 年 9 月 26 日在柏林召开的全德工人代表大会；出

席代表大会的代表 206 名,代表十四万二千多工人(主要是北德意志各城市的)。这次代表大会根本拒絕加入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领导的紐倫堡組織的各个工人协会派遣代表参加。柏林代表大会以后,成立了一些工会,它們是按拉薩尔派的宗派主义組織的式样建立起来的,并且联合成为一个以施韦澤为首的总的联合会。这个組織完全从属于全德工人联合会。

馬克思对施韦澤作了尖銳的批評,因为組織这样的代表大会导致了德国的工人工会的分裂,同时,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章程根本違反工会运动的目的和性质。——第 380 頁。

265 指馬克思于 1868 年 10 月 13 日写給施韦澤的信,該信是对施韦澤 1868 年 9 月 15 日和 10 月 8 日写給馬克思的两封信的答复。——第 381 頁。

266 民主工人联合会是在先进分子影响下的柏林工人联合会发生分裂后于 1868 年 10 月产生的。这个新的联合会加入了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领导的各工人协会的紐倫堡組織,接受它的以第一国际的原則为依据的綱領。几乎联合会的所有會員同时也是国际工人协会的會員。联合会为強調自己的无产階級性质,选举了两名工人——維耳克和克梅雷尔为主席。

民主工人联合会积极同拉薩尔派进行斗争;威·李卜克内西經常在它的會議上发表演說。1869 年,联合会加入了在爱森納赫代表大会上成立的社会民主工党。——第 381 頁。

267 总委员会的通告信“国际工人协会和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是馬克思就总委员会會議討論接納巴枯宁的同盟加入国际的問題于 1868 年 12 月 22 日写的。

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是米·巴枯宁于 1868 年 10 月在日内瓦創立的一个国际性組織。参加同盟临时委员会的除巴枯宁外,还有布罗塞、杜瓦尔、格塔、佩龙、扎哥尔斯基和約·菲·貝克尔。約·菲·貝克尔(此后不久他就同巴枯宁决裂了)于 1868 年 11 月 29 日将同盟的綱領和章程寄給了总委员会。在 1868 年 12 月 15 日的委员会會議上宣讀了这两个文件。馬克思于同一日将这些文件轉寄給恩格斯,請他提出自己

的批評意見。恩格斯于 12 月 18 日滿足了這個要求。12 月 22 日，馬克思考慮了恩格斯的意見之後以通告信的形式寫成的對同盟的答复的草稿，由海·萊克在總委員會會議上宣讀，並在稍加修改之後被通過。

總委員會 1868 年 12 月 22 日的通告信作為機密通知寄發給協會的所有支部，該信于 1872 年在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的總委員會內部通告“所謂國際內部的分裂”（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 2 版第 18 卷）中第一次發表。保存下來的有彼此差異不大的幾種手稿（馬克思的兩個手稿：一個是 1868 年 12 月 22 日寫的，另一個是附在他于 1870 年 8 月 6 日寫給萊克的信里的；還有兩個手抄副本：一個是萊克抄寫的，另一個是杜邦和恩格斯抄寫的）。——第 382 頁。

268 “國際工人協會章程” 1867 年倫敦版（《Rules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London, 1867）。——第 383 頁。

269 反對資產階級和平主義的和平和自由同盟的決議是由國際布魯塞爾代表大會就國際被邀參加 1868 年 9 月在伯爾尼召開的該同盟代表大會一事于 1868 年 9 月 12 日通過的。邀請是同盟根據巴枯寧的倡議發出的。巴枯寧是同盟中央委員會委員，他力圖將國際工人協會置于資產階級的同盟的支配之下。

布魯塞爾代表大會的決議指出，既然已經有國際工人協會存在，這個企圖對國際工人運動實行領導的和平主義的同盟的存在是多余的。建議同盟并入協會，其成員加入協會的各個支部。——第 383 頁。

270 “關於薩克森煤礦工人行業協會的報告”是恩格斯應馬克思的請求，根據魯高、下維爾施尼茨和埃耳斯尼茨等地的薩克森礦工寄來的材料寫成的。薩克森礦工們向總委員會和馬克思本人聲明他們願意加入國際。

1869 年 2 月 23 日，馬克思在總委員會會議上宣讀了這篇由恩格斯用英文寫成的報告。委員會決定發表報告原文和它的德譯文。在 1869 年 2 月 27 日“蜂房報”第 385 號上的一篇關於總委員會會議的報道中曾經扼要地敘述了這篇報告的內容。馬克思曾請求其他的一些英國報

紙如“泰晤士報”、“每日新聞”和“晨星報”刊登這篇文件，但這些報紙都拒絕了。1869年3月初，馬克思親自將恩格斯這篇手稿譯成德文並在1869年3月17日“社會民主黨人報”第33號、1869年3月20日“民主週報”第12號、1869年3月20日和21日“未來報”第67號和第68號上發表；報告的英文原稿沒有保存下來。——第385頁。

271 引自漢澤曼於1847年6月8日在第一屆聯合議會會議上的演說。見“第一屆普魯士議會”1847年柏林版第7部第55頁（《Preußens Erster Reichstag》. Th. 7, Berlin, 1847, S. 55）。——第386頁。

272 暗指普魯士內務大臣羅霍夫於1838年1月15日給埃爾賓城居民的一封信中所說的話，後者對把七位持有反對派情緒的教授驅逐出漢諾威議會一事表示不滿。羅霍夫寫道：“盡忠的臣民對自己的國王和國君應當俯首聽命，而不該依據自己有限的智慧來企圖干預國家元首的事務。”——第390頁。

273 社會主義民主同盟中央局在接到1868年12月22日總委員會關於拒絕接受該同盟作為一個獨立的國際組織加入國際的信件（見本卷第382—384頁）後，於1869年2月27日再次寫信給總委員會，聲明只要總委員會同意它的綱領並接受同盟的各個地方支部加入國際，它就準備解散國際同盟。

這封信是總委員會對同盟第二次來信的答复，由馬克思起草；馬克思寫好後尋求過恩格斯的意見。這封信在1869年3月9日的委員會會議上被一致通過。信的內容會由各國通訊書記秘密通知協會各支部。文件第一次發表於1872年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的總委員會的內部通告“所謂國際內部的分裂”中。該信有幾份彼此稍有出入的手稿被保存了下來（有兩份是馬克思用英文和法文寫的草稿，一份是馬克思用法文寫的完整的手稿，一份是不知道誰用法文抄寫、而由馬克思修改過的副本）。此外，馬克思在1869年3月5日給恩格斯的信中敘述了這個文件的基本內容。本版所根據的是馬克思那篇完整的手稿，並根據1872年發表的文稿校對過。——第393頁。

274 同盟綱領第二條早在1868年9月巴枯寧在伯爾尼舉行的和平和自由

同盟代表大會上宣讀的綱領中就已經有了。由於這封信，這一條於 1869 年 4 月改為：“同盟首先力求實現完全並徹底地消滅階級，力求實現個人（不分男女）在政治、經濟和社會方面的平等。”——第 394 頁。

- 275 在 1869 年 4 月 20 日總委員會會議上宣讀了比利時聯合會委員會的代表金斯的詳細報告，他曾被派到出事地點去查明 1869 年 4 月在塞蘭和弗臘默里（比利時）對罷工者的血腥屠殺的詳細情形。馬克思受委託代表總委員會起草抗議比利時當局獸行的文告。馬克思用英文和法文寫成的告歐洲和美國工人書於 1869 年 5 月 4 日在總委員會會議上宣讀，總委員會並通過了印發呼聲書的決定。英文呼聲書印成傳單《The Belgian Massacres...》，法文呼聲書刊載在許多報紙上；1869 年 5 月 15 日“國際報”第 18 號、1869 年 5 月 16 日“自由報”第 99 號和 1869 年 5 月 22 日“平等報”第 18 號。埃卡留斯翻譯的德文呼聲書刊載在 1869 年 5 月 22 日“民主週報”第 21 號和 1869 年 6 月“先驅”雜誌第 6 期。

“國際報”（《L'Internationale》）是比利時的一家週報，國際比利時支部的機關報；1869 年至 1873 年在德·巴普的直接參加下在布魯塞爾出版。該報經常發表國際的文件。

“平等報”（《L'Égalité》）是瑞士的一家週報，國際羅曼語區聯合會的機關報；1868 年 12 月至 1872 年 12 月在日內瓦用法文出版。——第 395 頁。

- 276 指 1868 年 3 月的沙勒羅瓦（比利時）事件。見本卷第 362—363 頁。——第 395 頁。

- 277 1869 年 5 月 31 日德·巴普寫給馬克思的信里談到，當法文呼聲書在比利時報刊上發表的時候，為了能夠通過檢查，康普、皮爾美和弗蘭德親王的名字都被刪去，而代之以“在比利時身居高位的人士”。——第 396 頁。

- 278 《Les sommations préalables》（事先下令解散）——許多資產階級國家的法律規定：在當局向集結的人群三次下令解散之後，就可以使用武力。——第 396 頁。

- 279 指從 1869 年 2 月延續到 7 月的法國同比利時關於鐵路租讓的談判，談

- 判的起因,是比利时議會通过了一項法令,規定租让权只有經過政府批准才能轉让;這項法律是按紧急程序通过的,矛头針對法国的經濟擴張,因为后者企图把比利时的铁路抓到自己手里。——第 396 頁。
- 280 馬克思指的是 1865 年 10 月英国西印度殖民地牙买加島总督埃尔对黑人起义的血腥鎮压。埃尔的行动引起了英国輿論的极大憤慨,英国政府被迫撤銷他的总督职务。——第 397 頁。
- 281 1830 年比利时資產階級革命和比利时同荷兰分离之后不久,1831 年 1 月倫敦五强會議(英、法、俄、奧、普)議定书宣布比利时为中立国。——第 398 頁。
- 282 “薩格”一詞是对印度的勒杀教派的称呼,該教派的信徒經常进行宗教仪式的杀人勾当,在十九世紀的欧洲文献中这个名詞成为形容职业强盜和杀人犯的流行用語。——第 399 頁。
- 283 引自比利时議員德尔福斯于 1848 年 3 月 1 日在議會上的发言,他的話是針對这样一种意見,即 1848 年法国革命的思想将傳遍全世界。——第 399 頁。
- 284 由于 1869 年春天英美之間有发生战争的危險,馬克思写了总委員會致全国劳工同盟(見注 242)的公开信,并由他在 5 月 11 日的总委員會會議上宣讀。馬克思后来在总委員會向巴塞尔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援引了全国劳工同盟主席西耳維斯的复信(見本卷第 431—432 頁)。这封信的英文稿曾印成傳单《Address to the National Labour Union of the United States》(“致合众国全国劳工同盟的公开信”)并載于 1869 年 5 月 15 日“蜂房报”第 396 号;德文公开信載于 1869 年 5 月 22 日“民主周报”第 21 号和 1869 年 8 月“先驅”杂志第 8 期。——第 401 頁。
- 285 原文是《shoddy aristocrats》;在美国,《shoddy aristocrats》是对那些靠战争大发橫財的人的称呼。——第 402 頁。
- 286 卡·馬克思于 1852 年写成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117—227 頁)第二版于 1869 年

7月在汉堡出版。

資產階級報刊對新版“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竭力保持沉默，而“人民國家報”只是在1870年3月16日才發表了該書第二版出版的消息，同時刊登了一篇序言。這篇序言後來又收入恩格斯編的於1885年出版的該書第三版。1891年1月，法國工人黨機關報“社會主義者報”(《Le Socialiste》)上發表了序言的法譯文；同年，在利爾出版的該書單行本中也載有這篇序言。1894年，這篇序言第一次用俄文發表在日內瓦出版的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一書俄文第一版上。

“人民國家報”(《Der Volksstaat》)是德國社會民主工黨的中央機關報，1869年10月2日至1876年9月29日在萊比錫出版，每周兩次，1873年7月起改為每周三次。該報代表德國工人運動中的革命派的觀點。這家報紙因為發表大膽的革命的言論而經常受到政府和警察的迫害。由於編輯常被逮捕，該報編輯部成員不斷變動，但報紙的總的領導仍然掌握在威·李卜克內西手里。主持“人民國家報”出版工作的奧·倍倍爾在該報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人民國家報”編輯部同馬克思、恩格斯保持着密切的聯繫，馬克思和恩格斯從該報創刊起就是它的撰稿人。馬克思和恩格斯對“人民國家報”評價很高，同時經常幫助編輯部，密切注視它的工作並用自己的批評來糾正報紙的路綫。儘管“人民國家報”有某些缺點和錯誤，它仍不失為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最優秀的工人報刊之一。——第404頁。

287 “革命”(《Die Revolution》)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共產主義者同盟盟員約·魏德邁於1852年在紐約出版的一種共產主義周刊。馬克思和恩格斯同意定期為雜誌撰稿。魏德邁只在1852年1月出版了兩期周刊，此後，由於物質上的困難刊物不得不停辦。1852年5月，魏德邁以“不定期刊物”“革命”(《Revolution》)第1期的形式用單行本出版了馬克思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第404頁。

288 V. Hugo. «Napoléon le Petit». 2 éd., Londres, 1852.

關於蒲魯東的“政變”一書見注47。——第405頁。

- 289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227頁。——第405頁。
- 290 让·巴·阿·沙尔腊斯“1815年滑铁卢战役史”1857年布魯塞尔版(J. B. A. Charras. «Histoire de la campagne de 1815. Waterloo». Bruxelles, 1857)。——第405頁。
- 291 让·沙·列·西蒙·德·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概論”1837年巴黎版第1卷第35頁(J. C. L. Simonde de Sismondi. «Études sur l'économie politique». T. I, Paris, 1837, p. 35)。——第406頁。
- 292 恩格斯曾于1868年7月底为德国一家文艺性报纸“凉亭”(«Die Gartenlaube»)写过一篇馬克思的傳記,但該报編輯部没有加以发表。这篇“卡尔·馬克思”傳略就是在那篇初稿的基础上写成的。1869年7月,恩格斯对那篇初稿进行了加工,寄給“未来报”,发表于該报1866年8月2日第185号。这篇恩格斯所写的第一篇馬克思傳記,以后又被威·李卜克内西刊登于1869年8月21日“民主周报”第34号附刊,但是李卜克内西当时删去了傳記中一个很重要的地方,这个地方談到拉薩尔不是一个有独创見解的思想家,他的許多著作的内容都是从馬克思那里抄襲来的,并且把馬克思的著作庸俗化。——第407頁。
- 293 指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个无产阶级的国际共产主义組織。它是在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于1847年6月初在倫敦成立的。同盟的綱領和組織原則也是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直接参与之下制定的。同盟的第二次代表大会(1847年11月29日—12月8日)一致通过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制定的科学共产主义的原則。馬克思和恩格斯受大会委托起草了一个綱領性文件,即1848年2月发表的“共产党宣言”(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61—504頁)。

由于法国革命爆发,在倫敦的同盟中央委员会于1848年2月底把同盟的領導权移交給了以馬克思为首的布魯塞尔区部委员会。在馬克思被驅逐出布魯塞尔并迁居到巴黎以后,巴黎于3月初成了新的中央委员会的駐在地。恩格斯也当选为中央委員。

1848年3月下半月到4月初,馬克思、恩格斯和数百名德国工人

(他們多半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回国参加已經爆发的德国革命。馬克思和恩格斯在3月底所写成的“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3—5頁)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在这次革命中的政治綱領。当时,馬克思主編的“新萊茵报”已成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的領導中心。

虽然革命的失败打击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但它于1849—1850年进行了改組并且繼續进行活动。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0年3月所写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288—299頁)中,总结了1848—1849年的革命并提出了建立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在“告同盟书”中第一次闡明了不断革命的思想。

1850年夏,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內部在策略問題上的原則性分歧达到了很尖銳的程度。以馬克思和恩格斯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坚决反对維利希—沙佩尔集团所提出的宗派主义、冒險主义的策略,它无视客观規律和德国及欧洲其他各国的现实政治形势而主張立即发动革命。1850年9月中旬,維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分裂活动终于导致了与該集团的分裂。1850年9月15日的會議(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635—641頁)根据馬克思的建議,把中央委员会的职权移交給科倫区部委员会。1851年5月,由于警察的迫害和盟員的被捕,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的活动实际上已經停頓。1852年11月17日,在科倫共产党人案件发生后不久,同盟根据馬克思的建議宣告解散,但是它的盟員还是繼續工作,为未来的革命斗争鍛炼干部。

共产主义者同盟起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它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学校,是无产阶级政党的萌芽、国际工人协会的前身。——第407頁。

294 指卡·馬克思的著作“政治經濟学批判”(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3—177頁)。——第408頁。

295 指普魯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即位之初的一段时期(1840—1857);当时自由资产阶级曾对这位国王寄予莫大的希望。但是这个极其短促的“新紀元”只是給了自由资产阶级一些微不足道的让步。——

第 408 頁。

- 296 指馬克思以“第六屆萊茵省議會的辯論”為題在“萊茵報”上發表的文章（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 卷第 35—96 頁和第 135—181 頁）。

“萊茵政治、商業和工業日報”（*«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 Handel und Gewerbe»*）自 1842 年 1 月 1 日至 1843 年 3 月 31 日在科倫出版。該報是萊茵省一些反對普魯士專制政體的資產階級人士創立的。該報曾吸收幾個黑格爾左派分子撰稿。1842 年 4 月馬克思開始為“萊茵報”撰稿，同年 10 月起成為該報編輯之一。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許多文章發表在該報上。在馬克思擔任編輯期間，該報日益具有明顯的革命民主主義性質。政府對該報實行了特別嚴格的檢查，後來封閉了它。——第 408 頁。

- 297 “德法年鑑”（*«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是在巴黎出版的德文刊物，主編是卡·馬克思和阿·盧格。僅僅在 1844 年 2 月出版了第一期（兩期合刊）。其中刊載有卡·馬克思的著作“論猶太人問題”和“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以及弗·恩格斯的著作“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和“英國狀況。評托馬斯·卡萊爾的‘過去和現在’”（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 卷第 419—421、452—467、596—625、626—655 頁）。這些著作標志着馬克思和恩格斯最終地轉到了唯物主義和共產主義。雜誌停刊的主要原因是馬克思和資產階級激進分子盧格之間存在着原則上的意見分歧。——第 409 頁。

- 298 卡·馬克思“哲學的貧困。答蒲魯東先生的‘貧困的哲學’”（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4 卷第 71—198 頁）。

關於蒲魯東的“貧困的哲學”一書見注 36。——第 409 頁。

- 299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4 卷第 461—504 頁。——第 409 頁。

- 300 “新萊茵報。民主派機關報”（*«Neue Rheinische Zeitung. Organ der Demokratie»*）1848 年 6 月 1 日至 1849 年 5 月 19 日每天在科倫出版，總編輯是馬克思。參加編輯工作的還有恩格斯以及威·沃尔弗、

格·維尔特、斐·沃尔弗、恩·德朗克、斐·弗莱里格拉特和亨·毕尔格尔斯。

民主派无产阶级一翼的战斗机关报“新莱茵报”起了人民群众的教育者的作用，号召他们起来和反革命作斗争。决定报纸对德国和欧洲革命最重要问题的立场的社论通常都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执笔。

该报的坚决的、不妥协的立场，战斗的国际主义精神，它对普鲁士政府以及科伦地方当局的政治上的揭发，——这一切使得“新莱茵报”在创刊后的最初几个月里就受到封建保皇派和自由派资产阶级报刊的攻击，并且受到政府的迫害，而这种迫害在1848年11—12月普鲁士的反革命政变之后更变本加厉了。

尽管遭到种种迫害和警察局的阻挠，“新莱茵报”还是英勇地捍卫了革命民主主义的利益，捍卫了无产阶级的利益。1849年5月，在反革命势力全面进攻的形势下，普鲁士政府借口马克思没有普鲁士国籍而下令把他驱逐出境。马克思的被驱逐和“新莱茵报”其他编辑的被迫害，使该报停刊。1849年5月19日它出版了最后一号。——第410頁。

301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Neue Rheinische Zeitung. Politisch-ökonomische Revue*》）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9年12月创刊、1850年11月停刊的杂志。它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理论和政治的机关刊物，是“新莱茵报”的继续。该杂志从1850年3月到11月底总共出了6期，其中有一期是合刊（5、6两期合刊）。杂志在伦敦编辑，在汉堡印刷。在封面上注明的出版地点还有纽约，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打算在侨居美国的德国流亡者中间发行这个杂志。

杂志的任务是根据对已经过去的这个时期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总结1848—1849年革命，阐明新的历史环境的性质，进一步制定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策略。杂志的大部分文章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他们也约请他们的支持者如威·沃尔弗、约·魏德迈、格·埃卡留斯等人撰稿。在杂志上曾经发表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恩格斯的“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和“德国农民战争”，以及他们的其他一些著作。杂志由于德国警察的迫害和资金缺乏而停办。——第410頁。

302 “紐約每日論壇報”(《*New-York Daily Tribune*》)是一家美國報紙，1841年至1924年出版。在四十至五十年代，該報站在進步的立場上反對奴隸占有制。參加該報工作的有許多著名的美國作家和新聞工作者，受空想社會主義思想影響的查理·德納從四十年代末起是該報編輯之一。馬克思於1851年8月開始為該報撰稿，一直到1862年3月，繼續了10年以上。為“紐約每日論壇報”寫的文章，很大一部分是馬克思恩格斯寫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紐約每日論壇報”上寫的文章，涉及歐洲各國國際和國內政策、工人運動、經濟發展等極其重要的問題。在歐洲的反動時期里，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這個發行很廣的進步報紙以具體材料來揭露資本主義社會的種種病態和這個社會所固有的各種不可調和的矛盾，並且說明資產階級民主的局限性。

到美國國內戰爭開始時，馬克思已停止為該報撰稿。馬克思所以和“紐約每日論壇報”斷絕關係，很重要的原因是編輯部內部主張同各蓄奴州妥協的人勢力加強因而使該報離開了進步立場。——第411頁。

303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14卷第395—691頁。——第411頁。

304 指發表於所謂藍皮書中的、議會英國各工業部門狀況調查委員會的報告。——第412頁。

305 卡·馬克思起草的“總委員會關於繼承權的報告”是總委員會在1869年夏季籌備國際巴塞爾代表大會時關於廢除繼承權問題的討論總結。由於1869年6月米·巴枯寧在日內瓦創建的以“社會主義民主同盟。中央支部”為名的支部的堅持，這個問題被列入了代表大會的議程。這個支部有巴枯寧的許多最親近的擁護者參加，它實際上領導着繼續秘密存在的國際性的社會主義民主同盟，儘管同盟已經正式宣布解散。巴枯寧硬要國際的代表大會辯論繼承權問題，目的在於進行搗亂，使代表大會不能去解決歐洲工人階級所面臨的有關綱領和策略這樣的迫切問題。

在1869年7月20日委員會開會討論這個問題時，馬克思作了內

容丰富的发言,发言记录保存在总委员会记录簿里(見本卷第650—653頁)。1869年8月3日委员会批准了馬克思的报告。在1869年9月11日巴塞尔代表大会的會議上,埃卡留斯宣讀了馬克思的报告,报告全文被轉載于用英文、法文、德文出版的关于代表大会的报告中:“从1869年9月6日至11日在瑞士巴塞尔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第四次年度代表大会的报告”(1869年)倫敦版第26—27頁(«Report of the Fourth Annual 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held at Basle, in Switzerland. From the 6th to the 11th September, 1869». London, [1869], p. 26—27);“国际工人协会。1869年9月在巴塞尔举行的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报告”1869年布魯塞尔版第122—124頁(«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Compte-rendu du IV-e Congrès International, tenu à Bâle en septembre, 1869». Bruxelles, 1869, p. 122—124);“在巴塞尔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记录”第1—7号,1869年9月7—14日,巴塞尔版第77—80頁(«Verhandlungen des IV. Congresses des internationalen Arbeiterbundes in Basel», №№ 1—7, Basel, 7—14 September 1869, S. 77—80);以及1869年10月“先驅”杂志第10期第150—152頁。——第414頁。

306 指圣西門的一批信徒(安凡丹、巴札尔、罗德里格、毕舍等人)在十九世紀二十年末傳布和发展他的学說。1830年,根据巴札尔在巴黎的讲稿出版了“圣西門学說的闡述”一书,其中提出了廢除继承权的要求。見“圣西門学說。第一学年。闡述。1829年”1830年巴黎版第143—169頁(«Doctrine de Saint-Simon. Première année. Exposition. 1829». Paris, 1830, pp. 143—169)。——第415頁。

307 “总委员会向国际工人协会第四次年度代表大会的报告”是馬克思受总委员会的委托在1869年8月底—9月初为1869年9月6—11日在巴塞尔举行的应届代表大会写的。馬克思沒有出席代表大会,但是他最积极地参加了它的准备工作。他在总委员会上討論代表大会議程的某些問題——土地問題(1869年7月6日)、继承权問題(7月20日)和

普及教育問題(8月10日和17日)——时的发言記錄(見本卷第648—656頁)被保存了下來。

巴塞尔代表大会再次討論了土地問題，大多数票贊成廢除土地私有制，变土地私有制为土地公有制；通过了关于在全国範圍和国际範圍內把工会联合起来的決議，以及一系列关于从組織上巩固国际和扩大总委员会权力的決議。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上，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拥护者和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的追随者之間在廢除继承权的問題上发生了第一次公开的爭論(見注305)。

馬克思用英文写的总委员会的报告全文，曾在1869年9月7日代表大会的會議上用德文和法文宣讀，并用德文以单行本发表，題为“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向巴塞尔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报告”1869年巴塞尔版(«Bericht des Generalraths der Internationalen Arbeiter-Association an den IV. allgemeinen Congress in Basel». Basel, 1869)；报告还用英文和法文同代表大会的會議記錄一起发表，即“在瑞士巴塞尔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第四年度代表大会的报告”1869年倫敦版第7—13頁(«Report of the Fourth Annual 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held at Basle, in Switzerland». London, [1869], p. 7—13)和“1869年9月在巴塞尔举行的第四次国际代表大会的报告”1869年布魯塞尔版第9—23頁(«Compte-rendu du IV-e Congrès Internationale, tenu à Bâle, en septembre, 1869». Bruxelles, 1869, p. 9—23)；同时还刊登在許多报纸和杂志上：1869年9月26日和10月3日“国际报”第37号和第38号，1869年12月11、18、25日“进步报”第26、27、28号和1870年1月1、8、15日“进步报”第1、2、3号，1869年9月“先驅”第9期，1869年9月18、22、25日“民主周报”第41、42、43号，以及1869年12月24、31日那不勒斯报纸“平等”周报第8、9号。报告的最早的俄譯文发表在1869年11月“人民事业”杂志第7—10期上。

本版是以德文小册子的最完全的文本为根据，并根据英文版校对过。最主要的不同之点都在脚注中注明。——第417頁。

308 1869年1月9日和13日“总汇报”第9号和第13号。——第419頁。

- 309 «La jeune Suisse» (“青年瑞士”)——这里指的是沙文主义的青年組織“青年日内瓦”(«La jeune Genève»)。——第420頁。
- 310 «Les orgies infernales des casse-têtes» (“殘暴的打手逞凶”)——摘自立法团的議員拉斯拜尔在1869年7月8日的會議上的发言,他在发言中抗議波拿巴警察当局在巴黎选举时的暴行。——第420頁。
- 311 馬克思所叙述的事实曾公布在1869年5月29日“平等报”第19号上。由于日内瓦的建筑工人和印刷工人的罢工,1869年春天罗曼語区联合会委员会和日内瓦的国际支部进行了巨大的工作。罗曼語区联合会委员会向工人发出了一系列的呼吁,这些呼吁刊登在1869年3—4月的“平等报”上,并且印成了傳单;1869年3月17日委员会向国际各支部的呼吁 («Le Comité Fédéral Romand aux Sections Internationales»), 瑞士公民中的国际會員大会的呼吁 “向政务會議和日内瓦人民的呼吁”(«Adresse au Conseil d'État et au Peuple de Genève»)等等;国际會員大会是根据联合会委员会的倡議于1869年4月2日召开的,会上揭露了企业家对国际工人协会的誹謗。
- 在組織罢工方面起了卓越作用的还有加入国际的建筑工人和印刷工人协会的定期出版的通报:“国际工人协会。泥水匠和抹灰工的罢工”(«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Grève des Tailleurs de Pierre et Maçons»), “日内瓦印刷工人协会向輿論的呼吁”(«La Société Typographique de Genève à l'opinion publique»)。——第420頁。
- 312 «Crédit Mobilier» (“动产信用公司”), 全称«Société générale du Crédit Mobilier», 是法国的一家大股份銀行,創辦于1852年。它的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用它所开办的股份公司的有价证券在交易所进行投机。Crédit Mobilier同第二帝国的政府官員有密切的联系。1867年,該銀行破产,1871年停业。馬克思在“紐約每日論壇报”上发表的許多文章中揭示了Crédit Mobilier的真正本质(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23—40、218—227、313—317頁)。——第421頁。

- 313 “国际报”（*«L'Internationale»*）是1863年至1871年在倫敦用法文出版的不大的日报；法国政府的半官方报纸。——第424頁。
- 314 以普魯士为首的北德意志联邦是根据普魯士首相俾斯麦的建議在1867年成立的，它包括19个邦以及北德意志和中德意志的3个自由市。联邦的建立是德意志在普魯士领导下重新統一的一个决定性阶段。——第424頁。
- 315 *«Les chassepots avaient encore fait merveilles»*（“沙斯波式步枪又一次发挥了威力”）——这里指的是沙斯波改进了的枪，1866年用这种枪装备了法国军队。——第426頁。
- 316 “总汇通报”（*«Le Moniteur universel»*）是法国的一家日报，1789年至1901年在巴黎出版；从1799年至1869年是政府的正式机关报。——第426頁。
- 317 *«Vivre en travaillant ou mourir en combattant!»*（“不能劳动而生，勿宁战斗而死！”）——这是1831年起义的里昂織工的口号。——第427頁。
- 318 指奥地利在1866年普奥战争中的失败。——第427頁。
- 319 1869年8月7—9日在爱森納赫举行了德意志、奥地利和瑞士的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全德代表大会，会上成立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大会通过的綱領的第二部分第六点中说：“鉴于劳动解放的任务既不是一个地方的也不是一个民族的，而是涉及存在有现代社会的一切国家的社会任务，社会民主工党把自己当做（既然关于結社的法律允許这样做）国际工人协会的一个支部，并且贊同它的宗旨。”——第427頁。
- 320 在1866年軍事失败后政治危机加剧了的情况下，以及民族解放运动高涨的情况下，奥地利的反动統治集团一方面不得不同匈牙利締結协定建立二元帝国——奥匈帝国，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向资产階級作一系列的政治让步。1867年通过的宪法扩大了代議机构——帝国議会的权力，建立了內閣責任制，实行了普遍义务兵役制和中央集权制；政府成員除了貴族的代表外，也包括了资产階級自由派。——第427頁。

- 321 息斯萊達尼亞的奧地利，或息斯萊達尼亞——奧匈帝國的一部分，包括奧地利本部、捷克、莫拉維亞、加里西亞、布柯維納等地。特蘭斯萊達尼亞就是匈牙利王國，包括特蘭西瓦尼亞、克羅地亞、斯拉窩尼亞等地。（這兩部分的名称来自它們的分界河萊達河。）——第 428 頁。
- 322 全德工人聯合會的應屆大會於 1869 年 3 月 28—31 日在愛北斐特—巴門召開。會上宣布同意國際工人協會的綱領，並且建議聯合會的成員以個人的方式加入國際。——第 429 頁。
- 323 巴塞羅納支部的周刊，後來是國際聯合會的周刊，叫“聯盟”（«La Federacion»），1869 年 8 月至 1873 年用西班牙文出版。
國際荷蘭中央支部的周刊從 1869 年起是“工人報”（«De Werkman»），1868 年至 1874 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第 429 頁。
- 324 騷擾取締令（Riot act）於 1715 年生效，禁止十二人以上的一切“騷擾性集會”。遇到這樣的情況，當局有責任提出特別警告，如果集會者在一小時內不散去，則使用武力。——第 430 頁。
- 325 這項決議是在北明翰召開的英國工聯第二次代表大會上，根據以代表身分出席大會的國際總委員會委員克里默的建議通過的，發表在 1869 年 9 月 4 日“蜂房報”第 412 號上。大會從 1869 年 8 月 23 日開到 28 日，會上通過決議：力爭在聯合王國實行八小時工作制；在下次大會上詳細討論土地問題。——第 431 頁。
- 326 “總委員會關於不列顛政府對被囚禁的愛爾蘭人的政策的決議草案”是在 1869 年 11 月 16 日總委員會討論愛爾蘭問題時由馬克思提出的。
1869 年的夏天和秋天，在愛爾蘭廣泛地展開了爭取赦免被囚禁的芬尼亞社社員的運動（關於芬尼亞社社員見注 195）；在許多次群眾大會（里美黎克和其他城市）上通過了請願書，要求英國政府釋放愛爾蘭革命者。英國政府首腦格萊斯頓拒絕了愛爾蘭人的要求。他在 1869 年 10 月 18 日和 23 日給爭取大赦運動領導人奧謝和巴特的信中作了答復；這些信件載於 1869 年 10 月 23 日和 27 日的“泰晤士報”（馬克思對格萊斯頓答復的評論見本卷第 665—668 頁）。英國政府拒絕赦免被囚

禁的芬尼亚社社員一事，引起了1869年10月24日的倫敦抗議示威游行。倫敦工人参加了游行；馬克思也参加了这次游行。

1869年11月9日，总委员会根据馬克思的提議决定討論不列顛政府对被囚禁的爱尔兰人的态度以及英国工人阶级在爱尔兰問題上的立場。在討論过程中，馬克思曾两次发言（見本卷第664—669頁），結果在1869年11月30日总委员会一致通过了馬克思所提出的決議草案，只有一处根据英国工联改良主义領袖之一奧哲尔的提議作了修改，即删去了決議第一段中“有意地”三字。

決議草案的草稿見于1869年11月18日馬克思給恩格斯的信的手稿，此外草案也見于埃卡留斯所做的总委员会記錄中。決議发表于1869年11月21日“雷諾新聞”、1869年11月27日“人民国家报”第17号、1869年11月28日“国民改革报”、1869年12月11日“平等报”第47号、1869年12月12日“国际报”第48号等。

列宁在他的著作“論民族自决权”中曾經全文引用了这一決議草案（見“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0卷第440頁）。——第433頁。

- 327** 指1862年10月7日格萊斯頓在新堡所做的演說。他在演說中祝賀杰·戴維斯担任分裂出来的南部蓄奴州同盟的总統。这一演說发表于1862年10月9日的“泰晤士报”，在总委员会的这次討論中曾經不止一次地提到这个演說。——第433頁。
- 328** 1868年12月，格萊斯頓的自由党政府替代了以迪斯累里为首的托利党政府。自由党提出的、使他們得以在議會选举中获得胜利的蠱惑性口号之一，就是格萊斯頓关于解决爱尔兰問題的諾言。当竞选正在激烈进行的时候，反对党在下院的會議上批評了托利党在爱尔兰的政策，把它同十一世紀时諾曼底公爵威廉对英格兰的征服政策相比。——第433頁。
- 329** 由于巴枯宁和他的追隨者在1869年11月挑起反对总委员会的运动，卡·馬克思于1870年1月1日左右写成“总委员会致瑞士罗曼語区联合会委员会”这一通告信。巴枯宁曾經企图把总委员会移到日内瓦，从而达到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上控制国际的領導的目的，当这一企图失败

后,他改变了自己的策略,轉而公开向总委员会开火。巴枯宁的一伙追随者在瑞士周报“平等报”編輯部里攫取了多数。这家报纸还在1869年11月6日(第42号)就发表了一篇社論,指責总委员会違反了章程中規定由总委员会出版各国工人状况的通报的条文。11月13日,这家报纸的第43号上又发表了第二篇社論,提議在英国成立一个專門的联合会委员会,据說是为了使总委员会易于完成在领导国际共同事务方面的职能。1869年11月27日該报(第45号)又在社論中鼓吹摒棄政治,还援引了被歪曲的法譯本共同章程。最后,1869年12月11日“平等报”(第47号)刊出了对总委员会反对格萊斯頓的決議(見本卷第433—434頁)的評論,激烈攻击委员会在爱尔兰問題上的立場。“进步报”对总委员会也进行了类似的攻击。

1869年12月14日委员会會議首次討論了“平等报”和“进步报”的攻击問題。馬克思起草的致瑞士罗曼語区联合会委员会的通告信于1870年1月1日經总委员会非常會議批准,并被分发给国际各支部。

同时,罗曼語区联合会委员会于1870年1月初,在未接到通告信以前,就对巴枯宁分子展开了坚决的斗争,結果使同盟分子(佩龙、罗班等)退出“平等报”編輯部。关于这一点詳見本卷第477—478頁。

这份最初不是为了在报刊上发表的文件曾部分地发表在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于1872年写的內部通告“所謂国际內部的分裂”中,它第一次全文发表是用德文刊登在1902年7月12日“新时代”杂志第15期(第2卷)。保存下来的手稿有好几份(两份手稿副本:一份是燕妮·馬克思抄的,經馬克思校正过,另一份是海·荣克抄的。还有一份馬克思的手稿,附在1870年3月28日馬克思給路·庫格曼的信里)。本版所根据的是第一份手稿。——第435頁。

330 “进步报”(«*Le Progrès*»)是巴枯宁派的报纸,它公开反对总委员会;該报从1868年12月至1870年4月在勒-洛克尔用法文出版,主編是吉約姆。——第435頁。

331 “劳动报”(«*Le Travail*»)是法国的一家周报,国际巴黎各支部机关报,1869年10月3日至12月12日在巴黎出版;該报的主要撰稿人之一是法国工人运动著名活动家、裝訂工人欧仁·瓦尔兰。——第436頁。

- 332** 公共福利同盟——1464 年年底在法国出現的封建貴族联盟，它反对国王路易十一所执行的把法兰西联合成一个統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政策。同盟的参加者打着爭取法兰西“共同福利”的旗帜。——第 436 頁。
- 333** “在巴塞尔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記錄”第 1—7 号，1869 年 9 月 7—14 日，第 90 頁（《Verhandlungen des IV. Congresses des internationalen Arbeiterbundes in Basel》，№№ 1—7，7—14. September 1869, S. 90）。——第 437 頁。
- 334** 土地和劳动同盟是 1869 年 10 月在总委员会的参加下在倫敦成立的。参加同盟执行委员会的有十多个总委员会委員。在埃卡留斯根据馬克思的指示起草的綱領中（見本卷第 657—663 頁），除了若干一般民主主义的要求（改革財政稅收制度和国民教育等）以外，还列入了土地国有化、縮短工作日等要求，以及宪章运动的普选权和建立农业移民区的要求。
- 馬克思认为同盟能够在英国工人階級革命化中起作用，把它看做是在英国成立独立的无产階級政党的途徑之一。但是，到 1870 年秋天，資产階級分子的影响已在同盟中加强了，同盟逐漸地同国际失去了联系。——第 438 頁。
- 335** 指英国政府在鎮压 1798 年爱尔兰民族解放起义后强加給爱尔兰的英爱合并。于 1801 年 1 月 1 日生效的合并消灭了爱尔兰自治的最后痕迹，并且廢除了爱尔兰議會。合并使英国在爱尔兰的殖民統治臻于巩固。实行合并的后果之一是取消了十八世紀末爱尔兰議會为維護新生的爱尔兰工业而制定的保护关税政策，这一来爱尔兰的工业便完全雕蔽了。——第 439 頁。
- 336** “工人代表大会。国际工人协会。临时章程”[1864 年巴黎版] 第 1 頁（《Congrès Ouvrier.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Règlement Prévisoire》。[Paris, 1864], p. 1）。——第 441 頁。
- 337** 指 1866 年夏天发表的由沙·龙格譯的“临时章程”法譯文。譯文載于

- “左岸”报社出版的小册子《Manifeste de 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suivi du Règlement provisoire》。Bruxelles, 1866。——第442頁。
- 338** 指刊登在1869年7月16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82号上的編輯部的文章。——第442頁。
- 339** 李卜克內西1869年2月18日的声明刊登在1869年2月20日“民主周报”第8号。——第443頁。
- 340** 关于施韦澤的拒絕的消息发表在1869年2月24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4号。——第443頁。
- 341** 总委员会委員、彩画工人罗伯特·肖于1869年12月31日去世。馬克思于1870年1月4日在总委员会會議上被选入参加将于1月5日举行的葬礼的代表团。在这次會議上总委员会还决定将肖去世的消息告知国际各支部。馬克思当时負責代表总委员会同国际比利时各支部领导人德·巴普通信,他就把这份訃告附在1870年1月8日写给巴普的信中。
訃告載于1870年1月16日“国际报”第53号,編輯部加的标题是:“倫敦来信”。——第444頁。
- 342** 这篇序言是弗·恩格斯于1870年2月11日左右为1870年10月在萊比錫出版的他的著作“德国农民战争”(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383—483頁)德文第二版写的。
序言最初刊載于1870年4月2日和6日“人民国家报”第27号和第28号,以后于同一年載于“德国农民战争”一书的单行本。后来作者又补写了序言的第二部分,序言全文于1875年載入該书第三版。——第446頁。
- 343** 威·威美尔曼“偉大农民战争史”1841—1843年斯图加特版第1—3部(W. Zimmermann. «Allgemeine Geschichte des großen Bauernkrieges». Th. 1—3, Stuttgart, 1841—1843)。——第446頁。

- 344 指 1848—1849 年革命期間設于美因河畔法蘭克福的全德國民議會的極左派；它主要代表小資產階級利益，但是也得到一部分德國工人的支持。——第 446 頁。
- 345 指卡·馬克思的著作“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它包括 1850 年 1 月至 11 月 1 日為“新萊茵報。政治經濟評論”雜誌寫的一系列文章（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7 卷第 9—125 頁）。
“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117—227 頁。——第 447 頁。
- 346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7 卷第 482 頁。——第 448 頁。
- 347 民族自由黨是德國資產階級、而其中主要是普魯士資產階級的政黨，於 1866 年秋在資產階級的進步黨分裂之後成立。民族自由黨放棄了資產階級為了滿足自己的物質利益而爭取政治統治的要求，其主要目標是把德意志各邦統一於普魯士的領導之下；他們的政策反映了德國自由資產階級對俾斯麥的投降。——第 448 頁。
- 348 三個邦指巴伐利亞、巴登、維騰堡。——第 449 頁。
- 349 1866 年普奧戰爭之後，普魯士把漢諾威王國、黑森—加塞爾選帝侯國和拿騷大公國並入了自己的版圖。——第 449 頁。
- 350 德國人民黨成立於 1865 年，由主要是德國南部各邦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以及一部分資產階級民主派組成。與民族自由黨相反，德意志人民黨反對確立普魯士對德國的領導權，堅持既包括普魯士又包括奧地利在內的所謂“大德意志”計劃。這個黨執行反普魯士政策，提出一般民主口號，同時也是德意志某些邦的分立主義傾向的代表者。它宣傳建立聯邦制的德國的思想，反對以集中統一的民主共和國的形式統一德國。
1866 年，以工人為基本核心的薩克森人民黨併入德國人民黨。人民黨的這個左翼，除了反普魯士的情緒和力求共同努力以民主方法解決國家的全民族的統一問題之外，在實質上與原來的德國人民黨毫無共同之點，以後它就朝着社會主義的方向發展。後來該黨的基本部分

离开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于1869年8月参加了社会民主工党的建立。——第449頁。

351 見注79。——第450頁。

352 1869年9月10日,在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上就土地所有制問題通过了由馬克思的拥护者提出的以下的決議:

“(1)社会有权廢除土地的私有制,而把它变成公有制。

(2)必須廢除土地私有制,而把它变成公有制。”——第454頁。

353 “英国政府和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員”一文是馬克思为了在欧洲公众面前揭露格萊斯頓政府对爱尔兰的殖民政策而寄給“国际报”的。1870年3月9日,馬克思在給恩格斯的信中曾經提到这篇文章,說它是一份草稿,是作为私人信件寄給“国际报”編輯德·巴普的。馬克思原以为德·巴普会根据草稿写一篇文章。但是編輯部把馬克思寄来的草稿分成两部分,一字不改地发表于該报1870年2月27日第59号和3月6日第60号。編輯部在第59号上还在括号內作了簡單的說明,并加了如下的一段按語:“我們将在本报最近一期发表关于杀害迈克尔·泰伯特一事的調查結果,以及我們对于这一有关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員的极端重大的事件的看法。不言而喻,我們完全和我們的通訊員一样,对这种虐待极为憤慨。”編輯部在第60号上加了第一段和以下的結尾:

“我們把經過情况綜述如下:泰伯特曾經被关在只有单人牢房的蒙特乔伊監獄。在来到这个監獄几个月之后,奥唐奈医生會要求将泰伯特轉移到不实行单独監禁制度的斯派克島;他的理由是,該犯人的健康状况已使他不能經受单独監禁。

对医生的要求采取了什么态度呢?不錯,在斯派克島監獄中,犯人是关在一起,但对受懲罰的人另有单人牢房;監獄千方百計地不断对泰伯特实行懲罰,因而使他受到致命的单独監禁。当这个不幸的人每次离开病床以后,就只給他吃一点面包和水,而他却是需要很好的照顾才能完全恢复的。医生凱利这个坏蛋用科学的威信来掩飾这种謀杀。請注意典獄长彼得·海依的証詞。証詞中談到,大部分的懲罰是由于該

犯人对医生不敬而引起的；因此，凱利医生不仅沒有对虐待該犯人提出抗議，还为懲罰他提供种种口实。他既是告密者，也是劊子手。

这样，裁決就譴責了彼得·海依和凱利这两个凶手。但事情也就到此为止，它們不仅沒有被查办，而且保住了自己的职位；此外，格萊斯頓很可能还要提拔他們；他們可以一直享受自己犯罪的果实，直到举行人民审判的那一天。在这些罪犯逍遙法外的時候，人民却在准备絞架；可以相信，由于人类的荣誉，海依和凱利絕不会得到善終，人們將把他們私刑处死，以告誡那未来的坏蛋們，——如果反动派能再次得勢的話。

这些卑鄙的坏蛋，从帝王和他們的大臣直至最下賤的劊子手，都在異常漫不經心地制造着將加于他們头上的可怕的报复！那些把自己的欢乐建筑在別人的痛苦上的人应当知道：每一次暴行，每一件卑鄙行为，每一件邪恶的事情，每一滴眼泪，我們都要記下来；我們將給每个人記一本总賬，而已經有不少人負債累累了。那些摧殘和压迫人民还不多的人，趁还来得及的時候，赶快洗手并努力贖罪吧。那一天終將到来，那时再求饒就晚了。人民將毫不容情，因为他們必須为千百万死难者复仇。”——第 456 頁。

354 指加里波第“僧侶的統治，或十九世紀的羅馬”1870年倫敦版(Garibaldi. «The Rule of the Monk, or Rom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ondon, 1870)。——第 456 頁。

355 “爱尔兰人民”(«The Irish Peoples»)是爱尔兰的一家周报，芬尼亚社的主要机关报，1863年至1865年在都柏林出版；以后为英国政府所查禁，編輯部成員遭到逮捕。——第 457 頁。

356 指1679年英国議會通过的 *Habeas Corpus Act* (人身保护法)。根据这一法令，每一个逮捕令必須說明理由，同时被捕者必須于短期內(3天到20天)送交法庭，否則即須予以釋放。*Habeas Corpus Act* 不适用于叛国罪的案件，而且根据議会的決定可以暫時停止生效。——第 459 頁。

357 格萊斯頓在小册子“就那不勒斯政府迫害国事犯一事致阿伯丁伯爵的

两封信” 1851 年倫敦版(«Two Letters to the Earl of Aberdeen on the State Persecutions of the Napolitan Government». London, 1851) 中曾揭露斐迪南二世的那不勒斯政府虐待被囚禁的 1848—1849 年民族解放斗争参加者。——第 460 頁。

358 *Land Bill* (土地法案) 是 1870 年上半年在英国議會中提出討論的对爱尔兰的法案。格萊斯頓在以英国政府的名义提出这一法案时借口是帮助爱尔兰租佃者, 但附有各种保留和限制, 因此这一法案实质上是保全英国大地主在爱尔兰的大地产的基础不受侵犯; 法案为他們保留了提高地租和把租佃者逐出土地的可能性, 而只是規定对租佃者进行的土壤改良工作給予一定的补偿并規定了这方面的法律程序。土地法案于 1870 年 8 月通过。大地主們尽力抵制这一法案的实施并用各种借口进行破坏。法案在很大的程度上促进了爱尔兰大农场經濟的积聚和爱尔兰小租佃者的破产。——第 460 頁。

359 指 1870 年 2 月 15 日格萊斯頓在下院的演讲, 这篇演讲发表于 1870 年 2 月 16 日“泰晤士报”。——第 460 頁。

360 迈克尔·泰伯特死亡一案調查結果公布于 1870 年 2 月 19 日“爱尔兰人报”第 34 号。

“爱尔兰人报”(«*The Irishman*») 是爱尔兰的一家資產階級民族主义傾向的周报, 1858 年至 1885 年先后在拜尔法斯特和都柏林出版; 該报曾經为芬尼亚社社員辯护。——第 462 頁。

361 第一国际俄国支部是由一批俄国政治流亡者于 1870 年春季在瑞士成立的, 这些政治流亡者是一些受过偉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車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的思想熏陶的非貴族出身的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青年。1869 年逝世的国际會員亚·亚·謝尔諾-索洛維也維奇在这个支部的筹建工作中起过重大的作用。1870 年 3 月 12 日, 支部委员会把它的綱領、章程寄給了总委员会, 并且写信給馬克思, 請他担任支部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中的代表。俄国支部的綱領規定支部的任务如下: “1. 利用一切可能的合理手段 (其特殊方式和方法決定于国内状况本身) 在俄国宣傳国际协会的思想和原則; 2. 协助在俄国工人群众

中建立一些国际支部；3. 帮助建立俄国劳动阶级和西欧劳动阶级之间的巩固的和团结一致的联系，并通过互助来促使他们共同的解放目的能够较顺利地实现。”（1870年4月15日“人民事业”创刊号）

在1870年3月22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俄国支部被接受加入国际，马克思承担了该支部在总委员会中的代表的任务。俄国支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巴枯宁分子的分裂活动的斗争中给了他们很大的帮助。俄国支部的成员——尼·吴亭、安·特鲁索夫、叶·巴尔田涅娃、格·巴尔田涅夫、伊·德米特里耶娃和安·科尔文-克鲁科夫斯卡娅积极地参加了瑞士的和国际的工人运动。支部曾经试图同俄国本土的革命运动建立联系。支部实际上在1872年解散了。

马克思的信刊登在1870年4月15日“人民事业”报创刊号上。

“人民事业”（《Народное дело》）是一批俄国革命流亡者于1868年至1870年在日内瓦出版的杂志（从1870年4月起改为报纸）；第一期是巴枯宁主编的，后来，从1868年10月起，编辑部（其中有尼·吴亭等人）同巴枯宁决裂并反对他的观点；从1870年4月起，它是国际工人协会俄国支部的机关报，执行马克思和总委员会的路线，登载国际的文件。——第463页。

- 362** “机密通知”是卡·马克思于1870年3月28日为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委员会而写的。这个文件包括1870年1月1日总委员会的通告信的全文，马克思作为德国通讯书记把它寄给路·库格曼，请求他转交给委员会的委员白拉克和其他委员。

“机密通知”是按马克思1870年3月28日给库格曼的信中所附的手稿刊印的。通知最初用德文第一次全文发表于1902年7月12日“新时代”杂志第15期（第2卷）上。——第465页。

- 363** 这里指的“实证哲学”（《La Philosophie positive》）是法国的一家哲学杂志，宣传奥古斯特·孔德的资产阶级实证哲学；1867年至1883年在巴黎出版。格·威卢博夫是该杂志的创办人和编辑之一。——第466页。

- 364** “平等”周报（《L'Eguaglianza》）是意大利的一家报纸，国际那不勒斯

支部的机关报；1869年11月至1870年1月出版；受巴枯宁派的影响。——第468頁。

365 这里指的是1858年俄国地主巴·亚·巴赫美提耶夫交给赫尔岑的一笔宣傳費（所謂的巴赫美提耶夫基金）。馬克思从1870年3月13日約·菲·貝克尔的信中得知这件事的消息。——第478頁。

366 根据总委员会1864年11月22日的决定，“蜂房报”被宣布为协会的正式机关报，这一点曾在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第一版附录中做过通知。但該报与工联的改良主义領袖和資產階級激进派代表人物有密切联系，事实上仍然站在自由派工联主义的立場上，并对协会采取模稜两可的态度——拖延国际的文件的发表并加以伪造，随意处置关于总委员会會議的报道。正如馬克思在1869年11月1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中所說的，“蜂房报”在对待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方面扮演了特別可耻的角色，它竟拒絕刊載为芬尼亚社社員申辯的決議。在总委员会一再予以警告和国际在各国的會員紛紛提出控訴之后，关于“蜂房报”編輯部的行为的問題于1870年4月26日提交总委员会討論。馬克思作了詳盡的发言，这个发言現在仅有簡短的記錄保存下来（見本卷第701頁）；馬克思受委托就这个問題起草准备在报刊上发表的声明。声明由馬克思于5月3日的总委员会會議上提出并載于1870年5月11日“人民国家报”第38号。決議还刊載在1870年5月“先驅”杂志第5期和国际的其他許多机关报刊上。保存下来的決議原文是貼在1870年5月17日总委员会會議記錄上的馬克思的手稿。——第480頁。

367 自由派資產者賽米尔·摩里于1869年买下了“蜂房报”，成为它的出版人。——第480頁。

368 拿破侖第三的政府为了巩固它搖搖欲墜的地位，定于1870年5月8日举行全民投票。問題是被这样提出的：如果对第二帝国的政策表示不贊同，那也就是反对任何民主改革。国际巴黎联合会和巴黎行业工人协会联合总会于1870年4月24日发表宣言，揭露这一蠱惑性的手腕并号召工人拒絕参加投票。

在全民投票的前夜，巴黎联合会的一些成員被捕。他們被指控为

进行阴谋，准备暗杀拿破仑第三。同时在里昂、卢昂、馬賽及法国其他城市也开始逮捕国际的会员。从1870年6月22日到7月5日，对国际巴黎联合会的成员进行了第三次审判。最后，所谓进行阴谋的指控破产了；被告们被控的罪名是参加国际，而不是参与臆造的阴谋。

馬克思写的这份呼吁书在1870年5月3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通过，附有总委员会委员签名的英文呼吁书印成了传单，同时也发表在1870年5月4日的“每日电讯”和1870年5月7日的“东邮报”上。馬克思亲自翻译的法文呼吁书发表在1870年5月7日“馬賽曲报”第138号、1870年5月8日“自由报”第150号、1870年5月14日“平等报”第20号和其他报纸上；德文呼吁书发表在1870年5月11日“人民国家报”第38号和1870年5月“先驱”杂志第5期上。在本版中呼吁书是按贴在1870年5月3日的总委员会记录上的卡·馬克思的手稿译的。

“每日电讯”（《Daily Telegraph》）是一家英国日报，于1855年在倫敦创刊。

“东邮报”（《The Eastern Post》）是一家工人周报，1868年至1873年在倫敦出版。从1871年2月起为国际总委员会机关报。

“馬賽曲报”（《La Marseillaise》）是一家法国日报，左派共和党人的机关报，1869年12月至1870年9月在巴黎出版；该报经常刊载有关国际的活动和工人运动的材料。——第483页。

369 对国际巴黎理事会的第一次审判发生在1868年3月。第二次审判发生在1868年5月22日至6月19日。——第484页。

370 这份决议是在1870年5月10日总委员会会议上由海·荣克代因病缺席的馬克思提出的。在1868年7月7日总委员会作出决议（见本卷第352页）之后已与国际完全脱离关系的在倫敦的一伙法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費·皮阿的追随者，仍旧自称为在倫敦的法国人支部并用国际工人协会的名义印发文件。1869年間在总委员会里不止一次地提出与这一伙人正式划清界限的问题。1870年春，划清界限更显得特别必要了，因为这时在法国正在准备对国际的会员进行第三次审判，而这个所谓“在倫敦的法国人支部”的一些文件已被用来作为起诉的材料，其中包括1868年10月20日的会议上通过的呼吁书，在那份呼吁书中

国际同費·皮阿领导的秘密共和团体“革命公社”被混为一談。

保存下来的英文的決議是貼在 1870 年 5 月 10 日記錄上的馬克思的手稿；決議还发表于 1870 年 5 月 14 日“蜂房报”第 418 号。

保存下来的还有奥·賽拉叶手抄的法文決議，发表于 1870 年 5 月 14 日“馬賽曲报”第 145 号、1870 年 5 月 15 日“国际报”第 70 号和 1870 年 5 月 21 日“平等报”第 21 号。德文決議載于 1870 年 5 月 21 日“人民国家报”第 41 号。本版所根据的是決議的手稿，并同“蜂房报”校对过。——第 485 頁。

- 371** 关于改变应屆代表大会的集会地点(根据巴塞尔代表大会的决定，应屆代表大会应在巴黎举行)的建議，是馬克思在 1870 年 5 月 17 日的总委员会會議上提出的。这个建議的提出是由于拿破侖第三政府加紧了对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特别是对国际的迫害。

然而由于 1870 年 7 月爆发了普法战争，代表大会也未能在美因茲举行。在 1870 年 8 月 2 日的总委员会會議上，馬克思提出征求地方支部和联合会对延期召开代表大会的意見。在征得各地方組織的同意后，总委员会于 1870 年 8 月 23 日把召开应屆代表大会的时间正式延期“到更适当的时候”。

1870 年 5 月 17 日总委员会批准了馬克思提出的关于在美因茲召开应屆代表大会的決議；該決議載于 1870 年 5 月 25 日“人民国家报”第 42 号，后来又載于 1870 年 6 月“先驅”杂志第 6 期、1870 年 5 月 28 日“平等报”第 22 号和 1870 年 5 月 29 日“米拉波报”第 45 号。決議的英文原文保存在总委员会記錄簿中，同时爱琳娜·馬克思的手抄副本也保存了下来。

“米拉波报”(«*Le Mirabeau*»)是比利时的一家周报，1868 年至 1874 年在佛尔維耶出版；是国际比利时支部的机关报。——第 486 頁。

- 372** 致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的信是 1870 年 6 月 14 日馬克思和恩格斯就即将在 1870 年 9 月召开国际代表大会的問題而写的。在 1870 年 5 月 17 日总委员会决定在美因茲举行应屆代表大会后，施土姆普弗应李卜克內西的委托，于 6 月 11 日写信給馬克思，請求把代表大会的召开日期改到 10 月，因为 9 月德国要进行国会选举。6 月 12 日，社会民主

工党委员会和盖布分别向总委员会和馬克思提出同样的請求。馬克思坚决反对延期召开代表大会；除了这个文件以外，他还在1870年6月27日致社会民主工党的信中闡述了自己对这个問題的意見。（見本卷第702頁）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封信刊登在1872年6月26日“人民国家报”第51号和“萊比錫叛国审判案。关于1872年3月11—26日对李卜克內西、倍倍尔和赫普納图謀叛国提出起訴期間陪审法庭會議的詳細报告”1872年萊比錫版（«Leipziger Hochverrathsprozeß. Ausführlicher Bericht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s Schwurgerichts zu Leipzig in dem Prozeß gegen Liebknecht, Bebel und Hepner wegen Vorbereitung zum Hochverrath vom 11—26. März 1872». Leipzig, 1872）一书。这封信于1874年和1894年进行再版；1894年版是威·李卜克內西受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的委托准备的。——第487頁。

373 德国社会民主工党 斯图加特代表大会 于1870年6月4—7日举行。——第487頁。

374 “北德通訊”（«*North German Correspondence*»）是俾斯麦政府于1869—1870年間在柏林用英文出版的通报。

韦耳夫基金——是由俾斯麦个人掌握用来賄买报刊的一种特別基金。——第489頁。

375 在“平等报”編輯部改組后（見注329），巴枯宁分子力图夺回失去的陣地，他們在保证了自己有形式上的多数票之后出席了1870年4月4—6日在拉紹德封举行的罗曼語区联合会代表大会。当时巴枯宁分子拥有21張代表資格证，代表那些不大的而且有些是虛构的支部，而由于这一原因或那一原因反对巴枯宁的日內瓦各支部和各地方支部却分别只有12張代表資格证和6張代表資格证。代表大会的議事日程列有关于工人階級对政治斗争的态度的問題，巴枯宁分子則与日內瓦各支部相对地提出了完全摒棄政治斗争的說教，还援引了伪造的法文本章程。由于巴枯宁的坚持，代表大会一开头就討論接受新成立的各支部加入

罗曼語区联合会的問題。在是否接受巴枯宁在日内瓦建立的名为“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中央支部”（見注 305）的支部和拉紹德封的巴枯宁派支部的問題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日内瓦俄国支部的领导人之一尼·吳亭曾发言揭露巴枯宁的分裂活动。发生了分裂：日内瓦的代表和其他拥护总委员会的人独立地繼續开会。

同盟的支持者窃取了罗曼語区代表大会的名义，选出了新的联合会委员会，并把它改設在拉紹德封。这样一来，在瑞士罗曼語区就有了两个联合会委员会：一个在日内瓦，一个在拉紹德封。巴枯宁分子着手办“团结报”（«La Solidarité»），該报由詹·吉約姆編輯，在紐沙特尔出版，后来又于 1870 年 4 月 11 日至 1871 年 5 月 12 日在日内瓦出版，它的前身是“进步报”。

1870 年 4 月 12 日总委员会接到有关代表大会上的事件的消息后，委托海·荣克收集补充材料，总委员会于 4 月和 5 月間的一系列會議上听取了关于这些材料的报告。为了答复日内瓦委员会委員們的坚决請求，总委员会于 6 月 28 日通过了馬克思提出的決議案。決議由瑞士通訊書記荣克寄給两个联合会委员会，并且发表在 1870 年 7 月 23 日“团结报”第 16 号和 1870 年 7 月 24 日“米拉波报”第 53 号。——第 490 頁。

- 376** 1870 年 6 月 21 日的总委员会會議專門討論了关于日内瓦对建筑工人实行的同盟歇业問題；在这次會議上馬克思被委托起草告欧洲和美国各工会及国际各支部书。馬克思写的呼吁书在 7 月 5 日的會議上被总委员会批准，并且用英、德、法三种文字印成傳单：«The Look-out of the Building Trades at Geneva. The General Council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to the Working Men and Women of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Die Aussperrung der Bauarbeiter in Genf. Der Generalrath der internationalen Arbeiterassoziation an die Arbeiter und Arbeiterinnen in Europa und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La Grève des corps de métiers en bâtiment à Genève. Appel du Conseil général de l'Association inter-

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aux travailleurs et travailleuses de l'Europe et des États-Unis». 德文稿还刊登在1870年7月13日“人民国家报”第56号、1870年7月16日“人民意志报”第25号和1870年7月“先驅”杂志第7期上。本版以英文傳单为根据，并同德文和法文稿校对过。最重要的不同之处均做了脚注。

“人民意志报”(«*Volkswille*»)是奥地利的一家工人报纸，1870年1月至1874年6月在維也納出版。——第491頁。

377 指1870年6月2日日內瓦州建筑业主联合会會議上通过的、以招貼画形式刊印的呼吁书。呼吁书把在日內瓦組織罢工的全部責任都推在国际身上；企业主們要求当局运用联邦宪法中規定政府有权把“危害瑞士内部和外部安全的外侨”驅逐出境的条文。——第492頁。

378 “給各支部的机密通知”是馬克思为筹备应屆代表大会而写的。在1870年6月28日的总委员会會議上，馬克思建議在各支部討論关于改变总委员会駐在地的問題，理由是必須不要为这个或那个国家的工人造成优越条件；馬克思的建議被通过了。但是它遭到了总委员会委員黑尔斯的反对。总委员会在7月5日和12日重新討論了这个問題，結果黑尔斯的建議被否决。7月14日，馬克思把机密通知轉交給海·荣克，以便把它送往瑞士；由总委员会比利时通訊書記奧·賽拉叶寄給德·巴普的原稿也被保存下来了。各支部反对改变总委员会的駐在地，认为倫敦是国际工人协会領導机关进行活动的最适宜的地方。

本卷所載的通知是按照1870年7月14日馬克思給海·荣克的信中所附的手稿譯的；这个当时并不是为了发表的文件現在是第一次发表。——第494頁。

379 1870年7月12日总委员会批准了馬克思起草的应屆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应于1870年9月5日在美因茲开幕)的議程。在总委员会开会討論这个議程时，馬克思曾几次发言对某些問題进行解釋。总委员会所批准的議程用英文印成傳单，标题是“国际工人协会第五次年度代表大会”(«*The Fifth Annual 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馬克思在1870年7月14日給

荣克的信中列出了議程的全文，并建議保留他所提出的問題的排列次序。本版中所載的議程是根据比傳单更为完整的这份手稿。

美因茲代表大會的議程还分別用法文和德文登載在1870年7月30日“團結報”第17号、1870年7月31日“自由報”第162号、1870年8月13日“人民國家報”第65号和1870年7月“先驅”杂志第7期上。——第495頁。

- 380** “关于爱尔兰問題的未作的发言的提綱”是馬克思为1867年11月26日总委員會討論爱尔兰問題时准备的发言提綱。11月19日开始的在总委員會上对爱尔兰問題的討論(見注195)，根据馬克思的提議，改在下一次会议上举行。馬克思准备在下次會議上发言。但是在會議前不久，在11月23日，三名被判罪的芬尼亚社社員在曼彻斯特被处决。馬克思认为，在处决使群情激憤的情况下，这篇准备好的发言已經不适用了；于是他改让彼·福克斯发言，而且他认为，在这样一个严重的时刻，由总委員會的英国委員出面对爱尔兰人表示同情并譴責英国政府的血腥行为更为合适。以后，馬克思在准备于倫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中就爱尔兰問題作报告(1867年12月16日馬克思所作的报告的提綱見本卷第506—522頁，这一报告的記錄見本卷第637—639頁)时，利用了未作的发言的提綱和准备时收集的材料。

1936年莫斯科出版的普·凱尔仁策夫所著“爱尔兰为独立而斗争”一书中曾經从关于爱尔兰問題的未作的发言的提綱中做了一些摘录。——第499頁。

- 381** 指长期議会在1652年8月12日，即在英国資產階級革命时期，在1641—1652年爱尔兰争取民族解放的起义为英国鎮压以后所通过的爱尔兰組織法令。法令从法律上巩固了英国殖民者在爱尔兰建立的血腥的暴力和恐怖的統治制度，并且准許英国資產階級和“新兴的”資產階級化的貴族大批地掠夺爱尔兰土地。根据这一法令，大多数的爱尔兰本地居民都犯有“暴乱罪”。“罪犯”中甚至包括那些虽然并没有直接参加起义但是没有对英国表示应有的“忠誠”的爱尔兰人。被宣布为“罪犯”的人按参加起义的情节分成几类，分別受到殘酷的鎮压：判处死刑、驅逐出境、财产充公。1653年9月26日，对爱尔兰組織法令又补充

了一項新的法令，這一法令規定將財產被充公的愛爾蘭人強迫移至荒涼的康諾特省和克勒爾郡，並規定一種制度將充公的愛爾蘭人的土地分配給議會的債權人、英國軍隊的軍官和士兵。這兩個法令都鞏固並擴大了英國大地主勢力在愛爾蘭的經濟基礎。——第 499 頁。

382 *Habeas Corpus Act*——見注 356。——第 499 頁。

383 1867 年 11 月 19 日，英國女王向議會致詞時曾經用這幾個字評價芬尼亞運動，馬克思也就借用這幾個字形容英國政府對愛爾蘭芬尼亞社社員的血腥政策。

“紀事”周刊（《*The Chronicle*》）是英國的天主教派的周刊，1867—1868 年在倫敦出版。——第 499 頁。

384 1840 年，路易·波拿巴在布倫發動沒有成功的政變時，槍傷了一個政府軍的軍官。恩格斯在 1867 年 11 月 24 日致馬克思的信中談到這一事件，他指出，英國統治階級因同樣的行為（而且是莫須有的罪名）把芬尼亞社社員送上絞架，而同時對戴上了皇冠的罪犯——拿破侖第三却奴顏婢膝，卑躬屈節。——第 499 頁。

385 “谷地制”是愛爾蘭特有的土地使用制度。在這種制度下，較大的租佃者——通常是投機中間人——將土地劃成半英畝或一英畝的小塊，以極苛刻的條件轉租給最貧困的租佃者或雇農。十八世紀通過一項法令，規定出租的小塊土地種植谷類作物，“谷地制”（corn-acre）即由此得名。——第 502 頁。

386 1846 年，谷物法的廢除引起了谷物價格的下跌（由於英國對愛爾蘭糧食的需求減少），同時在愛爾蘭對羊毛及其他畜產品的需求卻增加了；這促使大地主和富有的農場主轉而經營大規模的畜牧業，結果，在十九世紀中葉導致了把愛爾蘭小租佃者大規模地逐出土地（“清地”）。——第 503 頁。

387 馬克思在分析“清地”給愛爾蘭農民造成的災難時，在這裡提到了一個類似的過程，即十八世紀到十九世紀初英國和蘇格蘭貴族用暴力奪取蘇格蘭山地居民（蓋爾人）的土地。馬克思對這一過程的評述見“選

- 举。——財政困难。——薩特倫德公爵夫人和奴隶制”（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569—576頁），以及“資本論”第1卷第24章（“資本論”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921—925頁）。——第503頁。
- 388** 圓顛党是十七世紀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時對議會派的稱呼，因為他們按清教徒的習慣剪短髮，而不是像騎士党（王党）那樣留長髮。——第503頁。
- 389** 見注335。——第503頁。
- 390** 解放天主教徒的鬥爭是十九世紀前幾十年中爭取取消對天主教徒政治權利的限制的运动（天主教徒中大多數是愛爾蘭人）。在愛爾蘭，領導這一运动的是以奧康奈爾為首的自由資產階級，他們用解放天主教徒的口號來吸引農民群眾。這一运动於1829年即告結束，那時天主教徒獲得了擔任某些政府職位和選入議會的權利；同時選舉的財產資格限制卻提高了四倍。英國統治階級企圖用這種手腕來拉攏愛爾蘭資產階級和信天主教的土地占有者的上層人物，從而分裂愛爾蘭的民族运动。——第504頁。
- 391** 指改革同盟（見注170）拒絕支援愛爾蘭人的民族解放运动。在1867年11月1日的改革同盟委員會會議上通過了資產階級激進派提出的決議，對芬尼亞运动進行指摘。國際工人協會總委員會在1867年11月討論愛爾蘭問題時，對改革同盟委員會的這一決議進行了嚴厲的譴責。——第505頁。
- 392** 現在發表的這一提綱是馬克思在1867年12月16日倫敦德意志工人共產主義教育協會會議上就愛爾蘭問題所作的報告的基礎。出席這次會議的還有倫敦許多別的工人團體的代表以及國際總委員會的一些成員。報告時間是一小時半，報告引起了會議參加者的極大興趣。馬克思被邀請就同一題目在倫敦其他的德國工人團體中作報告。儘管這個提綱相當詳細，但它還只是一個最初的草稿，沒有包含馬克思所作報告的全部內容。——第506頁。

393 指爱尔兰的三次最大的民族解放起义。第一次起义(1641—1652年)发生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是爱尔兰农民和被剥夺的贵族对英国专制政体实行殖民政策(英国资产阶级和“新兴的”、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在革命的年代继续执行这种政策)的回答。参加起义的有受到没收领地的威胁的英格兰爱尔兰氏族贵族(征服爱尔兰并和爱尔兰氏族贵族通婚的英国封建主的后裔),以及很大一部分天主教神甫。大多数的起义领导人是从这些人中产生的。在克伦威尔指挥下的英格兰共和国军队对起义的镇压加强了因对爱尔兰进行殖民掠夺而致富的“新兴的”贵族的地位,并促使君主政体1660年在英国复辟。

第二次起义(1689—1691年)的起因是英国1688年的政变(“光荣革命”),这次政变确立了以奥伦治王朝的威廉三世为首的资产阶级贵族的立宪君主政体。被从英国放逐的斯图亚特王朝的詹姆斯二世企图利用爱尔兰的运动夺回王位,曾经正式领导起义。但是詹姆斯派的英国反动分子和爱尔兰起义者的目的是不同的。在爱尔兰起义者的压力之下,詹姆斯二世不得不暂时承认爱尔兰议会的独立以及废除认可没收爱尔兰土地的殖民主义法令。长期的武装斗争最后以起义者的失败而告结束。

殖民压迫、英国政府破坏爱尔兰爱国组织的挑衅性恐怖政策、殖民当局和英国大地主招募的反动匪帮的胡作非为,引起了第三次起义(1798年5—6月)。这次起义是因受美洲英国殖民地的独立战争和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而加强起来的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的最高潮。领导这次起义的是资产阶级爱国团体爱尔兰人联合会(1791年沃尔夫·汤恩在拜尔法斯特创立)中革命的一派,他们的代表人物力图宣布爱尔兰为独立的共和国。爱尔兰人联合会的领导同起义者的基本群众农民联系极差,在起义前夜,它的组织者大部被捕,加以运动带有分散性和很大程度上带有自发性,这就决定了运动的失败。法国登陆部队企图在爱尔兰登陆帮助起义者,结果也遭到了失败。英国政府在残酷地镇压了起义之后,于1801年实行了殖民主义的英爱合并(见注335)。——第506页。

394 1155年左右,罗马教皇阿德里安四世颁布了一个训谕,赏赐英王亨利

二世以爱尔兰最高統治者的称号，并且准許在整頓宗教事务的借口下征服这一国家，其交换条件是英王答应使爱尔兰教会服从羅馬教皇。亨利二世就利用这一“賞賜”，于 1171 年发动了对爱尔兰的远征。

1576 年，由于信奉新教的英国和天主教国家之間的矛盾趋于尖銳化，羅馬教皇格雷哥里十三宣布剝夺伊丽莎白女王的爱尔兰王位。——第 507 頁。

395 佩耳 (Pale, 原义为“栅栏”)是中世紀英国在爱尔兰的殖民区的名称，这种殖民区是十二世紀时英格兰諾曼封建主征服爱尔兰島东南部以后建立的。征服者在殖民区的四周筑起了圍栅 (上述名称即由此而来)，并利用它作为基地，对爱尔兰未被征服部分的居民不断发动战争，最后终于在十六至十七世紀征服了爱尔兰全国。——第 507 頁。

396 指十三世紀末首次召集的英愛議會，最初由英国在爱尔兰的殖民区 (佩耳)的大封建主和上层教士的代表組成。随着英国人的势力扩大到爱尔兰全島，議會成为英国駐爱尔兰总督屬下的英格兰貴族和英格兰爱尔兰貴族的代表机构；議会的权力受到极大限制。根据 1495 年頒布的法律，只有在皇家樞密院的准許之下，議會才能召开并通过法令。由反动分子組成的、实际上并无主动立法权的英愛議會，在长时期中只是英国殖民当局的工具。直到十八世紀八十年代，在民族解放运动高漲的影响下，英国政府才不得不同意扩大爱尔兰議会的权力；不过，自 1801 年实行英愛合并后，爱尔兰議會就被根本取消了。——第 508 頁。

397 見注 381。——第 509 頁。

398 指里美黎克投降；投降协定于 1691 年 10 月由爱尔兰起义者和英国司令部的代表簽訂并經英王威廉三世批准。根据协定，起义軍在保持荣誉的条件下投降；士兵和軍官有权就职国外或加入威廉三世的軍隊；允許包括天主教徒在內的爱尔兰居民获得大赦，保留财产，并享有选举权及信仰自由等。里美黎克协定簽訂几个月之前，高尔威等城市起义的守軍投降时，也簽訂过类似的协定。这些协定中所規定的条件很快就为英国殖民者所破坏。——第 509 頁。

- 399 指在爱尔兰置有地产、但經常住在英格兰的大地主；这些不在当地的大地主的地产由殘酷剝削农民的土地代理人管理，或者租給投机中間人，这些中間人再把土地划成小块轉租給佃农。——第 510 頁。
- 400 威·莫利紐“英国議会法令束縛下的爱尔兰的状况” 1698 年都柏林版 (W. Molyneux. «The Case of Ireland's Being Bound by Acts of Parliament in England Stated». Dublin, 1698)。——第 510 頁。
- 401 惩治法典 (Penal Code 或 Penal Laws) 是十七世紀末起特別是在十八世紀上半叶时英国殖民者以反对天主教阴谋和英国国教的敌人作借口，为爱尔兰頒布的一系列法律。这些法律实际上剝夺了本地爱尔兰人的一切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因为他們大多数人是天主教徒。这些法律限制爱尔兰天主教徒享有继承、接受和轉让财产之权，并且广泛采取因极小的一点过失就沒收他們的财产的做法，因而成为剝夺还保有土地的爱尔兰所有者的工具。惩治法典为信奉天主教的农民規定了苛刻的租佃条件，更便于英国的大地主和土地中間人奴役他們。这一法典也企图消灭爱尔兰的民族傳統：封閉爱尔兰本民族的学校，对教师、爱尔兰天主教教士規定严厉的惩罚措施，等等。直至十八世紀末叶，由于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漲，惩治法典的很大一部分才被廢除。——第 510 頁。
- 402 自由地产 是小地产的一种，这种名称起源于中世紀的英国。自由地产的所有者向貴族繳納少量固定的貨幣地租，有权自由支配自己的土地。——第 512 頁。
- 403 指 1815 年英国对拿破侖法国的战争的結束。——第 512 頁。
- 404 茅舍貧农 是农民的一种，起源于中世紀时少地或无地的农民。由于在爱尔兰很难得到土地，他們不得不以极苛刻的条件租佃土地，为了获得一小块土地和一間小屋(茅舍)而替大地主或富有的土地租佃者从事力不胜任的劳动。茅舍貧农的地位接近于农村雇佣工人。——第 514 頁。
- 405 合并取消运动 是以取消 1801 年的英爱合并 (Repeal of Union) 为口

号的运动；十九世紀二十年代以后，这一运动在爱尔兰获得极大的发展。但是，领导这一运动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奥康奈尔等人）却只是把取消合并的鼓动当做是爱尔兰资产阶级从英国政府取得一些微小让步的一种手段。1835年，奥康奈尔和辉格党的领袖们订立了利奇菲耳德府邸协定（谈判在伦敦的利奇菲耳德勋爵府邸中举行，故名），根据这一协定，辉格党允许给爱尔兰有产阶级一些特惠，奥康奈尔则答应在议会中支持辉格党人并促使爱尔兰的群众运动结束，作为交换条件。根据这一勾结，奥康奈尔及其追随者停止了取消合并的鼓动，但是在爱尔兰人民不满情绪高涨的影响下，他们不得不在1840年建立了合并取消派协会，但是力图使这个协会和英国统治阶级妥协。协会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末期解散。——第515頁。

406 見注385。——第518頁。

407 本卷所发表的“爱尔兰史”的一些章节是恩格斯准备就这个题目写作的长篇历史著作的一部分，1869年的后几个月和1870年上半年他曾从事这一著作的写作。恩格斯写作的意图，是以爱尔兰历史为例，揭露英国殖民统治的制度和办法，指出它不仅对被压迫民族而且对压迫民族的历史命运造成恶果，批判英国资产阶级史学家、经济学家、地理学家著作中以种族主义沙文主义态度对爱尔兰的历史和现实所作的歪曲。

1869年夏天，恩格斯就想写一部爱尔兰的历史。他于这一年的9月在爱尔兰作了一次旅行，以便进一步熟悉这个国家。为了从事这一著作，恩格斯研究了大量的文献和各种历史资料，其中有古代和中世纪著作家的著作，年表，古代法律汇编，各种法令，民间传说，古代文学作品，游记以及许多历史、考古、经济、地理和地质方面的著作。现在保存下来的、恩格斯所开列的关于爱尔兰历史的书目计达150种以上。在他这时期所做的15本笔记中，大部分是为本书准备的材料，此外还有札记、单页片断、剪报等。为了研究爱尔兰的史料，恩格斯还不得不学习古爱尔兰语。爱尔兰年表和古斯堪的那维亚史诗的某些片断就是由恩格斯自己译成德文的。在研究爱尔兰历史时，马克思经常给恩格斯帮助，他认为恩格斯的著作很有意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爱尔兰历史的最重要问题上的观点，是在共同讨论的过程中形成的。

1870年5月，恩格斯根据他研究中所积累的材料，正式动笔写作。下面就是现在保存下来的他所拟定的写作提纲：

- “1. 自然条件
2. 古代的爱尔兰
3. 英国的征服
 - (1) 最初的入侵
 - (2) “佩耳”和爱尔兰本区[Irishry]
 - (3) 征服和剥夺。152…—1691
4. 英国的统治
 - (1) 惩治法典。1691—1780
 - (2) 起义和合并。1780—1801
 - (3) 爱尔兰并入联合王国
 - (a) 小农时期。1801—1846
 - (b) 灭绝时期。1846—1870”

恩格斯只写完了第一章即“自然条件”。第二章即“古代的爱尔兰”没有写完，后两章恩格斯没有能够动手写作，虽然这一著作每一章节的材料，他基本上都已经搜集齐全（前两章及一部分准备材料最初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文库”1948年俄文版第10卷）。1870年7月开始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所造成的情况使恩格斯不得不中断他的写作。普法战争、巴黎公社、同巴枯宁派的斗争以及国际的浩繁的实际工作，这一切都妨碍了恩格斯完成他的著作。但是恩格斯在以后的理论活动和政治活动中却运用了他的科学研究的成果。例如在1884年著述“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有关的部分时，恩格斯就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靠了他在研究古代爱尔兰凯尔特人社会制度时所作出的一些科学结论。——第523页。

- 408 1066年诺曼底公爵征服者威廉征服了英格兰之后，在十一世纪至十二世纪期间，英格兰形成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十二世纪时普兰塔日奈家族的亨利二世实施的改革，大大巩固了国王的权力。爱尔兰成了英格兰君主国力图征服的对象之一。由于1169—1171年进军的结果，盎格鲁诺曼贵族在爱尔兰的东南部建立了以后得名为“佩耳”的殖民地

- (見注 395)。——第 525 頁。
- 409 指爱尔兰中部的萊伊舍(利克斯)郡。在都鐸王朝將爱尔兰封建主的土地沒收以后,为了对英国女王瑪丽·都鐸表示尊敬,該郡于 1557 年改名为女王郡。——第 529 頁。
- 410 R. Kane. «The Industrial Resources of Ireland». Second Edition, Dublin, 1845, p. 265. ——第 530 頁。
- 411 按現代的術語是:中生代和新生代的地层。——第 530 頁。
- 412 A. Stieler. «Hand-Atlas». Gotha, 1863. ——第 533 頁。
- 413 指爱尔兰 1846—1847 年的飢荒。——第 538 頁。
- 414 指英格兰資產階級共和国軍隊鎮压 1641—1652 年爱尔兰的解放起義之后殘酷迫害和大規模剝奪爱尔兰人的时期。根据 1652 年和 1653 年英国議會通过的法令(見注 381),一部分被宣布“犯有暴乱罪”的爱尔兰土地所有者应迁至荒涼的康諾特省和多沼澤的南方克勒尔郡。迁居是在处死的威胁下强制执行的。——第 539 頁。
- 415 龐波尼烏斯·梅拉“地理”第 3 卷第 6 章。——第 542 頁。
- 416 指 1846 年谷物法的廢除(見注 386)。——第 542 頁。
- 417 G. Boate. «Ireland's Natural History». London, 1652. 据威克菲尔德的意見,这书是 1645 年左右写成的。——第 544 頁。
- 418 約·腊蒂“都柏林郡自然史概論”两卷集 1772 年都柏林版(J. Ruddy. «An Essay towards a Natural History of the County Dublin». Dublin, 1772, 2 vol.). ——第 544 頁。
- 419 G. Symons. «British Rainfall». London, 1866. ——第 545 頁。
- 420 指英国参加对拿破侖法国及其欧洲从屬国的战争(1812 年,英国联合俄国、西班牙、葡萄牙对拿破侖作战),以及 1812 年开始的英美战争;这次英美战争是由于英国統治階級执行不承认美利坚合众国的国家主权的政策并企图在美国重建殖民統治引起的。——第 546 頁。

421 1873年,即在恩格斯写本文以后,該书出版了第3卷(包含“古制全书”結尾部分)。

恩格斯最先对这一部古代爱尔兰法律文献作出了正确的評价,他认为这部文献可以作为研究古代爱尔兰人的社会制度的史料。——第547頁。

422 恩格斯指的是“爱尔兰古代編年史家”文集(《Rerum Hibernicarum Scriptores Veteres》),該文集于1814年、1825—1826年由查·奥康瑞尔分四卷在白金汉出版。

該书首次发表了“四教长年表”的一部分,“提格尔納赫年表”(写于十一世紀至十五世紀,包含从三世紀末起的史实),“奥尔斯脫年表”(由十五世紀至十七世紀的一些編年史家編成,包含从五世紀中叶起的史实)以及恩格斯在下面談到的“因尼斯法耳年表”(写作年代一般认为开始于1215年,史实的叙述直到1318年)等等。——第551頁。

423 指1798年的爱尔兰起义,阿瑟·奥康瑞尔是这次起义的参加者(見注393)。——第552頁。

424 *Saerrath* 和 *Daerrath* 是古代爱尔兰的两种經營制度,經營者通常是普通的公社社員,他們主要使用氏族或部落首領以及其他氏族貴族的牲畜,后来也使用土地。这些經營制度使經營者丧失部分人身自由(在 *Daerrath* 的形式下較为严重,在 *Saerrath* 的形式下較輕一些)并为所有者服繁重的徭役。这种从屬形式是在古爱尔兰社会中氏族关系瓦解并开始形成封建社会时期的特征;那时土地总的来說还保持公有,牲畜和农具則已成为私有财产,而且出現了土地私有的萌芽。在爱尔兰,这种关系由布雷亨(古习惯法的保管者和解釋者)法規加以調整,并在古爱尔兰法律汇编“古制全书”中有所反映。

恩格斯所說的“見下面”是指本章中的一节,这一节后来沒有写成。——第555頁。

425 S. Bernard. «Vita S. Malachiae». ——第555頁。

426 坎布里亚的吉拉德的关于爱尔兰的著作《Topographia Hibernica》和《Expugnatio Hibernica》(恩格斯的手稿中作《Hibernia Expu-

gnata》，載于恩格斯所提到的《Giraldi Cambrensis Opera》第五卷，这一文集是約·謝·布魯尔开始出版的。第五卷由 J. F. 迪莫克于 1867 年出版。——第 556 頁。

427 指以下各种著作：梅·汉美尔“爱尔兰編年史”（M. Hanmer. «The Chronicle of Ireland»）、艾·坎皮恩“爱尔兰史”（E. Campion. «History of Ireland»）、艾·斯宾塞“爱尔兰現狀一瞥”（E. Spencer. «A View of the State of Ireland»）——上述著作均見“古代的爱尔兰史著作。斯宾塞、坎皮恩、汉美尔和馬耳博罗文集”1809 年都柏林版第 1—2 卷（«Ancient Irish Histories. The Works of Spencer, Campion, Hanmer and Marleburrough». Vol. I—II, Dublin, 1809）、約·戴維斯“史学論文集”1786 年倫敦版（J. Davies. «Historical Tracts». London, 1786）、威·坎登“不列顛”1637 年倫敦版（W. Camden. «Britannia». London, 1637）、費·莫里逊。“游記。十年間游历德国、波希米亚、瑞士、尼德兰、丹麦、波兰、意大利、土耳其、法国、英国、苏格兰、爱尔兰等十二个国家記实”1617 年倫敦版（F. Moryson. «An Itinerary containing Ten Years Travels through the Twelve Dominions of Germany, Bohmerland, Switzerland, Netherland, Denmark, Poland, Italy, Turkey, France, England, Scotland and Ireland». London, 1617）。——第 557 頁。

428 1870 年 1 月 9 日，赫胥黎在曼彻斯特以“英国人的祖先”为題作公开讲演时做了这样的解釋。1870 年 1 月 12 日，“曼彻斯特观察家时报”詳細地报道了这一讲演。——第 558 頁。

429 西西里的狄奥多洛斯“史学丛书”第 5 卷。——第 558 頁。

430 斯特拉本“地理学”，K. 克尔歇尔譯，1835 年杜宾根版第 7 卷（Strabo. «Geographie», übersetzt von K. Kärcher. Buch 7, Tübingen, 1835）。——第 558 頁。

431 J. Grimm. «Deutsche Rechtsalterthümer». Göttingen, 1828, S. 488. ——第 559 頁。

- 432 沙·傅立叶“經濟的和协会的新世界,或按情欲分类的引人入胜的和合乎自然的劳动方式的发现”(Ch. Fourier. «Le nouveau monde industriel et sociétaire ou invention du procédé d'industrie attrayante et naturelle distribuée en series passionnées»). 該书第一版于1829年在巴黎出版。恩格斯所說的地方見該版第399頁。——第559頁。
- 433 托勒密“地理学”第2卷第2章。——第559頁。
- 434 指苏格兰詩人麦克菲尔逊所写的所謂“奥辛詩集”,1760—1765年他把这詩集作为傳說中的凯尔特彈唱詩人奥辛的作品出版。麦克菲尔逊是以后来在苏格兰經過加工的古爱尔兰史詩作为这些詩歌的基础的。——第560頁。
- 435 圣尤西比阿斯·热罗尼莫“耶利米书注釋”第6卷序(S. Eusebius Hieronymus. «Commentariorum in Jeremiam Prophetam libri sex.» Prologus)。——第561頁。
- 436 格納迪“偉人录”(Gennadius. «Illustrium virorum catalogus»)。——第561頁。
- 437 指以下的著作:克罗狄安“霍諾里·奥古斯都第四执政时代頌”(Claudianus. «De IV consulatu Honorii Augusti panegiricus»), 塞維尔的伊西多尔“詞源学”二十卷集(Isidorus Hispalensis. «Etymologiarum libri XX»), 貝达大师“教会史”五卷集(Beda Venerabilis. «Historiae Ecclesiasticae libri quinque»), 腊万納的匿名作者“地理学”五卷集(Anonymus Ravennatis. «De Geographiae libri V»), 爱金哈特“查理大帝生平业绩史”(Eginhart. «Vita et gesta Karoli Magni»), 阿尔弗勒德大帝“史学家奥罗修斯著作盎格魯撒克遜文譯本”(Alfred the Great. «Anglo-Saxon Version of the Historian Orosius»)。恩格斯所引用的上述著作中的摘录大約是根据卡·措伊斯“日耳曼人和邻近各部落”(K. Zeuß. «Die Deutschen und die Nachbarstämme»)一书。見該书1837年慕尼黑版第568—569頁。——第561頁。

- 438 阿米亚努斯·馬尔塞列努斯“历史”三十一卷集第20卷(Ammianus Marcellinus. «Rerum gestarum libri XXXI», liber XX)。——第561頁。
- 439 南尼阿斯“不列颠人的历史”，附加恩的英譯，1819年倫敦版第15节(Nennius. «Historia Brittonum»; with an English Version by Gunn. London, 1819, § 15)。——第562頁。
- 440 “三組文”是中世紀的威尔士的一种著作，按威尔士古凯尔特人詩歌的独特的傳統形式写成，其特点是在作品中列举三个人、三种事物或三种現象。“三組文”按內容分历史的、神学的、法学的、詩歌的和論人为善的。最早的“三組文”的写作年代不迟于十世紀，这些作品的現存手抄本則是十二世紀至十五世紀的。——第562頁。
- 441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3卷；見“黑格尔全集”1836年柏林版第15卷第160頁(G. W. F. Hegel. «Vorlesungen über di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Bd. 3. In: Werke, Bd. XV, Berlin, 1836, S. 160)。——第563頁。
- 442 亚历山大里亚新柏拉图学派是公元三世紀时出現于亚历山大里亚(埃及)的古代哲学中的一个反动的神秘主义流派，它反映了羅馬帝国衰亡时期奴隶主貴族的思想体系。新柏拉图主义的根源是柏拉图的客观唯心主义以及亚里士多德学說的唯心主义的一面，后者在新柏拉图派的哲学中被发展到承认神的原初存在的地步。在公元五世紀时，一个不知名的新柏拉图学派信徒曾經以雅典第一个基督教主教迪奥尼修斯法官的名义出版了他的著作，企图把基督教教义和新柏拉图主义結合起来。——第563頁。
- 443 叙述哈法格尔王朝奠基人挪威国王哈拉德生平事迹的“哈拉德史詩”是十三世紀初中世紀冰島詩人和編年史家斯諾里·斯土魯森所写的。这一史詩是他所著“地球”一书中的一部分，其中叙述了从远古到十二世紀挪威帝王的历史。——第564頁。
- 444 «Krákumál»(“克腊卡之歌”)是中世紀斯堪的那維亚的詩作之一，以

- 被俘的丹麦海盗腊格納·洛德布罗克(九世紀)临死前叙述他的战迹的形式写成。根据傳說，这歌是腊格納的妻子克腊卡唱給她的孩子們听的，她鼓励孩子們为他們被諾森伯里亚国王埃拉杀死的父亲复仇。恩格斯所引用的歌詞系根据弗·爱·克·迪特里希“古斯堪的那維亚文学讀本”1864年萊比錫版第73—80頁(F. E. Ch. Dietrich. «Altnordisches Lesebuch». Leipzig, 1864, S. 73—80)。——第565頁。
- 445 詹·琼斯頓“洛德布罗克哀歌；或洛德布罗克死前之歌”1782年倫敦版(J. Johnstone. «Lodbrokar-Quida; or the Death Song of Lodbroke». London, 1782)。——第566頁。
- 446 “尼亞耳史詩”是一篇傳播极广的冰島氏族时代的史詩；根据最近的研究，这是在十三世紀末按口头傳說和更古老的文献資料記錄下来的。这一史詩的主要內容是叙述豪丁(冰島氏族貴族)岡納尔和邦德(自由的公社社員)尼亞耳的生平和死亡；尼亞耳是岡納尔的友人，他聪明而爱好和平，是研究和解釋古代風俗习惯和法規的专家。“尼亞耳史詩”中包含两段历史插曲，即十世紀和十一世紀之交基督教傳入冰島的历史，以及諾曼人和爱尔兰国王布里安·博卢作战的叙述；如恩格斯所指出，后者是研究十一世紀爱尔兰历史中重大事件之一——爱尔兰人在1014年战胜諾曼侵略者——的可靠的史料。恩格斯所引用的这一段“尼亞耳史詩”譯文見弗·爱·克·迪特里希“古斯堪的那維亚文学讀本”1864年萊比錫版第103—108頁(F. E. Ch. Dietrich. «Altnordisches Lesebuch». Leipzig, 1864, S. 103—108)。“尼亞耳史詩”的俄譯文第一次发表于“冰島史詩集”1956年莫斯科版。——第567頁。
- 447 因尼斯法耳年表——見注422。——第567頁。
- 448 根据最近的研究，“尼亞耳史詩”中提及的地点音譯应作坎卡腊堡，或金科腊，即国王布里安在曼斯特的住处。——第570頁。
- 449 指公元前113—101年日耳曼族基姆布利人对南高卢和北意大利的入侵。公元前101年，基姆布利人为羅馬統帅馬利烏斯在韦尔切利(北意大利)战役中击潰。关于羅馬人和基姆布利人的战争，普卢塔克(在馬

- 利烏斯傳記中)、塔西陀(在“日耳曼”中)以及別的古史學家都有所記述。——第 571 頁。
- 450 “貝奧武夫”是敘述傳奇英雄貝奧武夫事迹的史詩，是現存古代盎格魯撒克遜詩歌中最出色的作品。這一史詩大概產生於八世紀；它是以前六世紀上半葉日耳曼部落的民間傳說為基礎的。
- “希爾德布蘭德之歌”——見注 83。
- “艾達”是一部斯堪的那維亞各民族的神話和英雄傳說與歌曲的集子；保存下來的有兩種形式，一種是十三世紀時的手稿，1643 年為冰島主教斯魏因森所發現（即所謂“老艾達”），另一種是十三世紀初詩人和編年史家斯諾里·斯土魯森所編的古北歐歌唱詩人詩歌論集（即所謂“小艾達”）。“艾達”中的詩歌反映了氏族制度解體和民族遷徙時期斯堪的那維亞社會的狀況。從中可以看到古代日耳曼人的民間創作中的一些形象和情節。——第 571 頁。
- 451 *Leges barbarorum*（野蠻人法典）是五世紀至九世紀間編成的各日耳曼部落的習慣法的記錄。——第 571 頁。
- 452 恩格斯的手稿到此中斷。從現存的他的愛爾蘭史第二章的寫作計劃中可以看出，恩格斯原來準備在這一章（“古代的愛爾蘭”）中還要闡述古愛爾蘭人的氏族制、土地所有制和法律等問題（見“馬克思恩格斯文庫”1948 年俄文版第 10 卷第 100 頁）。原計劃中的這一重要部分未能實現。——第 571 頁。
- 453 指 1745 年的蘇格蘭山民為反抗英格蘭愛爾蘭土地貴族和資產階級的壓迫和強占土地而舉行的起義。山民的不滿情緒被一部分蘇格蘭山地貴族所利用，他們希望保存封建家長式的氏族制，支持已被推翻的斯圖亞特王朝的代表奪取英國王位（起義者宣稱要使斯圖亞特王朝詹姆士二世的孫子查理-愛德華登王位）。由於起義遭到鎮壓，蘇格蘭山地的氏族制度被破壞，蘇格蘭農民從土地上被趕走的進程也加劇了。——第 572 頁。
- 454 自古以來住着日耳曼族弗里西安人的黑爾郭蘭島（北海）於十八世紀時轉歸丹麥統治。1807 年（在 1807—1814 年英丹戰爭時期），該島為英國

所占；1814年，根据基尔和約，丹麦人將該島割让給英国；1815年的維也納和約又追认了基尔和約。以后，到1890年，英国用黑尔郭兰島向德国交换了桑給巴尔島。——第572頁。

455 “爱尔兰歌曲集代序”是恩格斯应馬克思的大女儿燕妮的請求写作的。这篇短文本来是为准备出版的歌曲集“爱尔兰竖琴”(«Erins-Harfe», 按詩人托馬斯·穆尔所著“爱尔兰旋律”譜成)写的。1870年7月17日，燕妮·馬克思將恩格斯的这篇短文寄給汉諾威的庫格曼博士，請他轉給这本集子的出版人和編者約·里謝。但是，根据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所保存的1870年在汉諾威出版的“爱尔兰竖琴”看来，序言中未采用恩格斯的短文。1955年这篇短文第一次发表于意大利杂志“工人运动”(«Movimento Operaio»)第2期，以后，1957年又发表于法国杂志“思想”(«La Pensée»)第75期；在本卷中这篇短文第一次以俄文发表。——第574頁。

456 見注434。——第574頁。

457 告各工人团体书是总委员会在国际建立时期发表的，这时总委员会正在爭取各工人团体、首先是英国工联加入国际。在1865年6月6日的总委员会會議上，常务委员会受委托草拟号召加入协会的告各工人团体书。号召书于1865年夏季印成傳单，內容是：“国际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倫敦西区希腊街18号。茲邀請各工会团体、互助会和其他工人团体……加入……”(«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Central Council, 18, Greek Street, London, W. Trade, Friendly, or any Working Men's Societies are invited to join...»)。号召书是以总委员会根据馬克思的建議通过的关于接受工人組織加入国际工人协会的条件的決議为基础的(見本卷第19頁)。——第579頁。

458 常务委员会根据6月13日总委员会决定起草的关于代表大会和代表會議的报告是彼·福克斯在1865年7月25日的委员会會議上宣讀的。报告是馬克思积极活动的結果，他成功地說服了总委员会委員們于1865年在倫敦召开預备性的代表會議，而不在布魯塞尔召开临时章

程所規定的代表大会（見注 143）。馬克思认为，国际的各个地方性支部还不够巩固，召开代表大会还为时过早。

在总委员会會議就这个报告进行討論的过程中，特別认真地討論了即将召开的代表會議的議程。討論結果，常务委员会提出的議程經稍加补充后被通过了，补充的是：根据克里默和埃卡留斯的建議，把巴黎支部提出討論的关于常备軍問題作为第十項列入議程。在总委员会記錄簿中，議程是同报告正文貼在一起的。

倫敦代表會議的議程曾經轉載在总委员会于 1865 年在倫敦印发的下列两种傳单上：“国际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倫敦西区希腊街 18 号。将要在 9 月 25 日和接連的几天內召开协会各主要分部的代表會議……”（«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Central Council:—18, Greek Street, London, W. On the 25th September and following days a Conference of Delegates from the principal branches of the Association... will be held...». London, 1865）和“国际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倫敦西区希腊街 18 号。将要在 9 月 25 日和接連的三天內召开协会各主要分部的代表會議……”（«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Central Council, 18, Greek Street, London, W. On the 25th of September and three following days a Conference of Delegates from the principal branches of the Association... will be held...». London, 1865）。議程还刊登在 1865 年 8 月 12 日“蜂房报”第 200 号上，关于代表會議的通知刊登在 1865 年 9 月 2、9、16 和 23 日“工人辯护士报”第 130、131、132 和 133 号上。

“工人辯护士报”（«*The Workman's Advocate*»）是在倫敦出版的英国工人周报；它是 1865 年 9 月由“矿工和工人辯护士报”（«*The Miner and Workman's Advocate*»）改組成的，是国际总委员会的正式机关报；馬克思同总委员会其他委員一起参加了該报的理事会。1866 年 2 月，由于編輯部內改良分子的势力加强，該报再度进行改組并更名为“共和国”周报（見注 140）。——第 581 頁。

636 頁)是馬克思夫人燕妮·馬克思在 1866 年 1 月 29 日和 1867 年 10 月 5 日左右寫給在瑞士的國際德國人支部領導人約·非·貝克爾的兩封信的摘錄。

1866 年 1 月 29 日的一封信是燕妮在馬克思患病時寫的。當時“先驅”雜誌剛開始出版，馬克思極力要支持它，為此他請求李卜克內西、庫格曼以及其他朋友和戰友們供給雜誌材料。對照一下刊登在“先驅”雜誌上的短文和該信的手稿，可以看出編輯部在登載這封信的摘錄時并未作重大的改動，只是由編輯部加添了最後的兩段。——第 584 頁。

460 指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無神論團體在英國積極開展的活動。查·布萊德洛和其他聚集在“國民改革報”周圍並且在工人中間進行資產階級改良主義宣傳的資產階級激進派對運動起了很大的影響。——第 585 頁。

461 見注 195。——第 585 頁。

462 “給‘佛爾維耶回聲報’的信”是萊克根據總委員會的決定寫的，並且由馬克思校閱過。萊克在 1866 年 1 月 15 日和 26 日給馬克思的信件證明瞭這一點。

這封信是總委員會對 1865 年 12 月 16 日和 18 日的比利時資產階級民主派報紙“佛爾維耶回聲報”第 293 號和第 294 號上發表的一篇匿名文章的答復，這篇文章誣蔑性地歪曲了總委員會的活動和 1865 年倫敦代表會議的工作。文章的作者是法國小資產階級共和派、流亡在比利時的比·韋濟尼埃，他是倫敦的法國人支部中敵視馬克思和總委員會的小資產階級分子的傳聲筒。總委員會在 1865 年 12 月 26 日、1866 年 1 月 2 日和 9 日討論了韋濟尼埃的文章；馬克思出席了這幾次會議，積極地參加了討論並且堅決主張，如果韋濟尼埃不能以事實來證實他的責難，就把他開除出國際。——第 586 頁。

463 作為總委員會委員，同時又作為倫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協會會員的馬克思、埃卡留斯、列斯納、沙佩爾等人，參加了 1865 年倫敦代表會議的工作。——第 591 頁。

464 十二月十日會是 1849 年成立的波拿巴派的團體。它的成員多半是游民。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這一著作中對十二月十日

会作了詳尽的評述（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173—176 頁）。——第 592 頁。

465 格留特利联盟 是瑞士小資产階級改良主义組織，它是作为手工业者和工人的教育协会于 1838 年建立的。“格留特利”这一名称是強調該組織的瑞士的民族性：据傳說，1307 年瑞士有三个州的代表在格留特利（或留特利）草地集会，締結了联盟，共同反对奥地利的統治。——第 593 頁。

466 “国际工人协会报”——見注 153。

“未来呼声报”（《*La Voix de l'Avenir*》）是 1865 年至 1868 年在拉紹德封出版的周报；从 1867 年起是国际瑞士罗曼語区各支部的正式机关报；它受到了蒲魯东主义的影响。

“先驅”——見注 13。

“工人辯護士报”——見注 458。——第 595 頁。

467 馬克思在 1866 年 3 月 13 日會議上的发言反映出馬克思在总委員會中反对資产階級民主派企图歪曲国际作为无产階級階級組織的真正性质的一个斗争情节。1865 年春季退出总委員會的馬志尼分子魯·沃尔弗出席了 1866 年 3 月 6 日的委員會會議并且在馬克思缺席的情况下批評了总委員會給“佛尔維耶回声报”的信（見本卷第 586—596 頁），說什麼信中似乎有涉及馬志尼的不正确的論断。在具有机会主义情緒的英国委員的影响下，委員會通过了一項決議，向馬志尼和沃尔弗本人表示道歉。3 月 10 日在馬克思家里召开了欧洲大陆国家的通訊書記（杜邦、荣克、龙格、博勃欽斯基）會議，會議决定馬克思在总委員會下次會議上提出抗議。

馬克思在 1866 年 3 月 13 日會議上的发言原稿保存在总委員會記錄簿里。——第 597 頁。

468 魯·沃尔弗在 1864 年 10 月 8 日国际工人协会綱領性文件起草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提出的章程是馬志尼为了要联合各意大利工人团体而起草的。从資产階級民主派立場写成的这个草案是 1864 年 7 月在“工人协作社报”（《*Il Giornale delle Assoziazioni operaie*》）发表的、

并且在1864年10月底在那不勒斯举行的意大利工人团体代表大会上通过的“意大利工人团体联合条例”的基础。——第597頁。

469 指国际工人协会倫敦代表會議(見注143)。在代表會議的記錄中,德·巴普的这个声明没有得到反映。——第597頁。

470 这份由馬克思和拉法格于1866年秋天以法文出版的国际工人协会章程和条例,与日内瓦代表大会在1866年9月5日和8日會議上批准的这两个文件的原文稍有出入。日内瓦代表大会之后,在被法国当局沒收的代表大会材料尚未发还总委员会期間,国际的法国各支部紛紛要求把章程和条例寄給它們。因此,1866年10月16日总委员会通过決議,决定在倫敦以法文出版这些文件。小册子于1866年11月底出版,书名为:“国际工人协会。章程和条例”1866年倫敦版(«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Statuts et règlement». Londres, 1866)。在出版的1000册中,运往法国的800册在边境上被扣留,因此,这个版本沒有流傳开来。此后不久,日内瓦代表大会的材料发还給了总委员会,当时总委员会正在着手准备在英文版和法文版的“国际信使”上以英文和法文正式公布代表大会的記錄和它所批准的文件。1867年在倫敦出版了章程和条例的单行本(«Rules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London, 1867)。

由馬克思开始而由拉法格繼續完成的章程和条例的法譯文手稿被保存下来,这个譯文的文字同在倫敦以法文出版的那本小册子是一致的。在本卷中,章程和条例是按这份手稿譯的,并根据鉛印的小册子校对过。——第599頁。

471 1867年2月28日馬克思在倫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見注263)成立二十七周年紀念会上作了演讲。和德国工人一起参加庆祝会的还有国际在倫敦的法国會員和英国工人运动的代表。在会上演讲的除馬克思以外还有总委员会委員彼·福克斯、格·埃卡留斯和其他演讲人。

包括馬克思的演讲記錄在內的會議报道是由弗·列斯納写的,并由他寄給約·菲·貝克尔在“先驅”杂志上发表,报道載于該杂志1867

年3月第3期。——第604頁。

- 472 “总委员会关于洛桑代表大会的呼吁书”是按照馬克思校訂过的法文本刊印的。最初用英文写的呼吁书是1867年6月4日由总委员会指定的委员会写的，并在7月9日的会议上通过。在这次会议上拉法格受托把呼吁书譯成法文。决定把呼吁书首先譯成法文的原因是，巴黎各支部的蒲魯东主义的领导背着总委员会制定了自己的代表大会議程。

法文的呼吁书同英文本有很大的不同，它在倫敦以傳单的形式印发，标题是：“国际协会总委员会致会员、各附属团体和全体工人的呼吁书”（«Adresse du Conseil Général de 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Aux membres et aux sociétés affiliées et à tous les travailleurs»），并在1867年8月31日“人民論壇报”第8号和其他許多报纸上轉載。約·菲·貝克尔把法文的呼吁书譯成德文，并把它收入1867年夏在日内瓦印发的傳单，这个傳单的标题是：“邀請参加9月2—8日在洛桑召开的国际工人协会第二次代表大会”（«Einladung zum zweiten Kongreß der Internationalen Arbeiter Association am 2.—8. September in Lausanne»），后来又轉登在1867年8月“先驅”第8期上。——第606頁。

- 473 指1867年2月在馬尔希延枪杀比利时的矿工和冶金工人。——第606頁。
- 474 指1867年2—3月間发生的巴黎銅匠和裁縫的罢工。——第606頁。
- 475 皇家英国工联調查委员会是于1867年2月任命的。由于工联的积极性日益增长而引起的調查，旨在宣布工联为非法，或者至少限制它們的活动。为了对付政府的这个措施，工联在全国举行了群众大会和會議，并于1867年3月5—8日在倫敦召开了全国代表會議。皇家委员会的調查結果并没有能够对工联提起控訴。——第607頁。
- 476 指条例第六、七、八条（見«Rules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London, 1867）。——第608頁。

477 馬克思的这份发言記錄,是从1867年7月27日“工人报”第18号上剪下来保存在总委员会記錄簿里的,上面还附有在核实記錄时所提出的修改。馬克思所做的摘录取自議会藍皮书:«Reports by Her Majesty's Secretaries of Embassy and Legation, on the Manufactures, Commerce, etc., of the Countries in which they reside». London, 1867, № 5, pp. 594—595 (“女王陛下駐外使館秘書关于他們駐在国的工商业等情况的报告”1867年倫敦版第5号第594—595頁)。这份議会藍皮书中的数字錯誤保留未动。报纸印錯的数字根据藍皮书原文作了訂正(关于藍皮书見注4)。——第610頁。

478 关于国际工人协会如何对待和平和自由同盟代表大会問題的发言,是馬克思在1867年8月13日总委员会會議上作的。发言結束时,馬克思提出了一項決議草案(見本卷第231頁)。

正如馬克思在1867年9月4日写信告訴恩格斯的那样,他的发言引起了很多議論,使得和平和自由同盟的活动家們不得不給自己預定于1867年9月9日在日内瓦举行的成立大会提出更民主的綱領。馬克思在同一封信中說,他的发言历时半小时,但是担任書記兼記錄員的埃卡留斯在會議报道中只記了几句話。报道載于1867年8月17日“蜂房报”第305号。埃卡留斯的手稿我們沒有得到。在总委员会記錄簿中所保存的馬克思的发言記錄是从这份“蜂房报”剪下来的。馬克思的发言曾經更簡略地在1867年8月25日“自由报”第8号和1867年9月2日“法兰西信使报”上发表过。——第612頁。

479 在恩格斯所写的“普魯士軍事問題和德国工人政党”(見本卷第41—87頁)以及他的題为“战争短評”的一組文章(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中“如何击败普軍”一文)中有詳尽的闡述。馬克思主义奠基人关于十九世紀常备基干軍的作用的观点。——第612頁。

480 总委员会向1867年洛桑代表大会的报告包括总的叙述和关于各个国家的报告,它在8月20日总委员会的會議上被通过,并在9月3日的會議上由吉約姆用法語、埃卡留斯用德語向代表大会宣讀。它被載入1868年4月問世的“向1867年9月2日至8日在洛桑举行的工人代表

大会宣讀的报告”1867年拉紹德封版(«Rapports lus au congrès ouvrier réuni du 2 au 8 septembre 1867 à Lausanne». Chaux-de-Fonds, 1867)一书中。报告中有关美国的部分是彼·福克斯写的,他的手稿还保存着,附在总委员会的記錄簿中。

国际的洛桑代表大会是在1867年9月2—8日举行的。馬克思因忙于“資本論”第一卷的付印工作沒有出席代表大会。代表大会听取了总委员会的报告以及各个地方的报告,这些报告证明国际的組織在一些国家中已經巩固起来。蒲魯东主义者不顾总委员会的反对强使代表大会接受了他們的議程:再次討論了合作問題、妇女劳动問題、教育問題以及許多枝节問題,这些問題轉移了代表大会的注意力,使它不能专心討論总委员会提出的議程上所拟定的真正迫切的問題。蒲魯东主义者得以通过几項自己的決議案。然而他們未能夺取国际的領導。代表大会重新选出原先的委員組成总委员会,并决定总委员会的駐在地仍設在倫敦。——第614頁。

481 日内瓦代表大会关于这些問題的決議刊登在1867年3月27日、4月17日和5月1日“国际信使”第12、15和17期上。

“国际信使”(«*The International Courier*»)——見注167。——第614頁。

482 “工人报”(«*The Working Man*»)是在流亡倫敦的法国民主义主义者約瑟夫·科勒的参加下,于1861—1867年在倫敦出版的报纸,出版曾一度中断。——第615頁。

483 見注231。——第616頁。

484 这里所說的事件发生在1866年10月至11月。——第618頁。

485 在英国的选举改革运动(見注170)过程中,倫敦的工人不得不为在首都的公园举行群众大会的权利而斗争。尽管政府禁止預定在1866年7月23日在海德公园召开群众大会,群众大会还是召开了,而且事情弄到参加大会的人同警察发生了冲突。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內务大臣同意改革同盟使用倫敦的公园举行群众大会。然而在筹备預定7月30日在海德公园举行的第二次群众大会时,改革同盟委员会由于害怕

- 群众的革命积极性的高漲，通过決議一概不在露天举行群众大会。
——第 619 頁。
- 486 比利时通訊書記貝森的信刊登在 1866 年 11 月 4 日“人民論壇报”第 44 号上。——第 626 頁。
- 487 指的是 1867 年 6 月 18 日总委员会通过的決議，总委员会在決議中欢迎巴黎人民群众在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到巴黎时所采取的行动，并且贊揚他們表示同俄国沙皇制度压迫下的波兰人團結一致的示威。決議发表在 1867 年 7 月 22 日“共和国”周报第 224 号上。——第 627 頁。
- 488 全国劳工同盟——見注 242。
国际鑄工联合会——是美国工人的一个大的工会，在西耳維斯的領導下于 1859 年开始組織而于 1863 年最后組成，主席是西耳維斯。联合会把全国範圍內的地方鑄工联合会联合起来，并且在英屬哥倫比亞和加拿大都有它的組織；它为地方联合会的集中活动而斗争，有組織地領導罢工运动，对于全国其他工会的巩固有巨大的影响。——第 628 頁。
- 489 “工人辯護士报”（《*The Workingman's Advocate*》）是 1864 年至 1877 年在芝加哥出版的工人周报；它报道工会运动問題，公布国际的文件，是全国劳工同盟的机关报。——第 630 頁。
- 490 紐約工人联合会 是紐約各工会的一个联合組織，成立于 1863 年，任务是團結紐約工人向企业主作斗争，保证对罢工者的支援，并且在解决工人和企业主的冲突时起中介作用。——第 632 頁。
- 491 在总委员会記錄簿中所附的彼·福克斯的手稿上接着指出，馬克思除了把弗·阿·左尔格 1867 年 7 月 10 日的信交給福克斯以外，还交給他加入了协会的紐約共产主义者俱乐部的一份章程。
紐約共产主义者俱乐部 是根据德国革命流亡者弗·康姆和阿·康普的倡議于 1857 年成立的。馬克思的战友約·魏德迈、弗·阿·左尔格、海·迈耶尔、奧·福格特在它的活动中起过一定的作用。——第 632 頁。

- 492 这里指的是国际鑄工联合会,正如在1867年7月9日的总委员会會議上宣讀的它的领导人西耳維斯的一封信中所說的,1866—1867年它花費了很大一笔錢帮助罢工的工人。——第633頁。
- 493 燕妮·馬克思的这第二封信(第一封信見本卷第584—585頁)的手稿沒有保存下来。根据1867年10月5日她給約·菲·貝克尔的信和1867年10月7日他的复信判断,这封信是在1867年10月5日左右写的。——第635頁。
- 494 指在1848年由“曼彻斯特时报”(«Manchester Times»)和“曼彻斯特观察家”合并后在曼彻斯特出版的英国自由派报纸“观察家时报”(«Examiner and Times»);它以不同的名称出版到1894年。在五十至六十年代,該报的主編和出版人是約翰·布萊特。
- 曼彻斯特学派是十九世紀上半叶在經濟政策中反映工业資產階級利益的一个派別。这一派的拥护者即自由貿易派,主張貿易自由和国家不干涉經濟生活。自由貿易派的宣傳中心是曼彻斯特,在曼彻斯特領導这一运动的是1838年組織反谷物法同盟的两个紡織厂厂主科布頓和布萊特。在六十年代,自由貿易派組成了自由党的左翼。——第635頁。
- 495 指1867年9月在日內瓦举行的資產階級和平主义的和平和自由同盟的代表大会。——第635頁。
- 496 指1867年9月在漢堡出版的卡·馬克思的“資本論”第一卷。——第636頁。
- 497 參看“資本論”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949、955、961、964頁。——第636頁。
- 498 馬克思于1867年12月16日所作关于爱尔兰問題的報告是由埃卡留斯記錄下来的(馬克思本人所写的報告提綱見本卷第506—522頁),这一記錄原拟在“先驅”杂志上发表,为此弗·列斯納把它寄給了在瑞士的約·菲·貝克尔,但后来沒有发表。——第637頁。
- 499 見注401。——第637頁。

- 500 見注 396。——第 637 頁。
- 501 关于 1798 年的起义,見注 393。——第 638 頁。
- 502 关于在資本主义制度下使用机器的后果的发言是馬克思在 1868 年 7 月 28 日总委员会會議上作的(見注 225)。这篇由总委员会書記格·埃卡留斯作的記錄,保存在总委员会記錄簿里,它是从 1868 年 8 月 1 日“蜂房报”第 354 号剪下貼入的。——第 640 頁。
- 503 指 1866 年的危机以后倫敦特别是它的东部(东头)赤貧現象的加剧。——第 642 頁。
- 504 关于縮短工作日的发言是馬克思在 1868 年 8 月 11 日总委员会會議上討論这个問題时作的,这个問題当时已列入布魯塞尔代表大会的議程。
发言記錄保存在总委员会記錄簿里,它是从 1868 年 8 月 22 日“蜂房报”第 358 号剪下貼入的,在剪貼时書記作了一些訂正。——第 643 頁。
- 505 在記錄里米尔納的名字被誤写为埃卡留斯。实际上是米尔納反对埃卡留斯的意見,断言工作日的縮短虽然是件合乎願望的事,但它会造成生产的减少。——第 643 頁。
- 506 馬克思指的是埃卡留斯在这次會議上的发言中就过长的工作日对工人健康的危害問題所作的詳尽論证。——第 643 頁。
- 507 “告倫敦德国工人书”是弗·列斯納写的;他把它寄給馬克思审閱。馬克思在 1868 年 8 月 11 日把它还给列斯納,并且写信告訴他:“由于有些字写錯了,我在下面把它整个重新抄了一遍。”被保存下来的馬克思的手稿同发表在 1868 年 8 月 15 日倫敦“海尔曼”报第 502 号上的“告倫敦德国工人书”完全相同。——第 644 頁。
- 508 参看“資本論”1953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1 卷第 4 頁。——第 645 頁。
- 509 馬克思在 1869 年 1 月 5 日的总委员会會議上的发言是他代表常务委员会所作的报告。常务委员会在 1869 年 1 月 2 日的會議上討論了卢昂支部請求帮助卢昂的因同盟歇业而被解雇的工人的来信,并且把这

个問題提交总委员会研究处理。总委员会根据馬克思的报告通过了一项決議，抗議法国企业主的行为，并号召英国工人支援卢昂工人。

由萊克作的这个記錄被保存在总委员会的記錄簿里。刊登在1869年1月16日“蜂房报”第379号上的关于总委员会會議的报道中也談到了发言的簡要內容。——第646頁。

510 馬克思在1869年7月6日总委员会會議上討論巴塞爾代表大會議程（見本卷第647頁）时就土地所有制問題作了两次发言。尽管布魯塞爾代表大會已經以多数票通过了有利于土地所有制公有化的決議，但是关于土地所有制的問題由于以蒲魯东主义者托倫为首的一小伙土地小私有制拥护者的要求，而被再次列入应屆代表大會的議程。

馬克思的第一次发言是回答工人米爾納的。米爾納在力求論证布魯塞爾代表大會的決議的正确性时，却发言維護人对土地的天然权利。

馬克思的第二次发言是回答以客人身分出席會議的法国无政府主义者埃·萊克留的发言的。萊克留声称，农民沒有出席国际的历次代表大会，不值得为他們操心。

討論的結果，总委员会以多数票肯定了布魯塞爾代表大會通过的关于土地所有制的決議是正确的。

馬克思的两次发言都保存在总委员会記錄簿里，記錄人是埃卡留斯。馬克思两次发言的大意，見1869年7月10日“蜂房报”第404号关于1869年7月6日总委员会會議的报道。——第648頁。

511 这里指的是在布魯塞爾代表大會上为准备土地所有制問題而选出的專門委员会。委员会向代表大會就土地問題提出了两份报告——奥布里（卢昂支部）的报告和德·巴普（布魯塞爾支部）的报告。委员会向代表大會报告：委员会在关于矿山、煤矿、运河、铁路等所有权公有化的問題上是意見一致的。但在耕地問題上委员会並沒有取得一致的意見。委员会里以比利时代表德·巴普为首的多数提出了有利于全部土地公有化的決議案，并由代表大會所通过；以法国代表、蒲魯东主义者托倫为首的少数，則維護农民对土地的小私有制。——第649頁。

512 关于继承权的发言是馬克思在1869年7月20日总委员会會議上討論

巴塞爾代表大會議程(見本卷第 647 頁)時作的。馬克思的發言保存在總委員會記錄簿里,記錄人是埃卡留斯。

發言的大意,見 1869 年 7 月 24 日“蜂房報”第 406 號關於總委員會會議的報道。——第 650 頁。

513 埃卡留斯的記錄有錯誤。這裡指的是聖西門的信徒,而不是已于 1825 年逝世的聖西門(參看本卷第 415 頁)。——第 651 頁。

514 關於現代社會中的普及教育的發言是馬克思在 1869 年 8 月 10 日總委員會會議上討論巴塞爾代表大會議程(見本卷第 647 頁)時作的。在 8 月 17 日總委員會會議結束這個問題的討論時,馬克思又作了總結發言。馬克思的兩次發言都保存在總委員會記錄簿里,記錄人是埃卡留斯。第一次發言的大意,見 1869 年 8 月 14 日“蜂房報”第 409 號關於 1869 年 8 月 10 日總委員會會議的報道;總結發言的大意,見 1869 年 8 月 21 日“蜂房報”第 410 號。——第 654 頁。

515 關於普及教育的問題在國際工人協會的前三次代表大會——1866 年的日內瓦代表大會、1867 年的洛桑代表大會和 1868 年的布魯塞爾代表大會——上都曾經討論過。——第 654 頁。

516 哈里埃特·羅在 1869 年 8 月 17 日總委員會會議上提出的建議,在於使教會的財產和收入轉用於普及教育。——第 655 頁。

517 英國工人米爾納在 1869 年 8 月 10 日和 17 日的總委員會會議上提出了從無產階級利益的观点看來是不能接受的建議;他建議當時的資產階級學校給學生講授政治經濟學方面的知識;這個建議實際上會加強占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對正在成長的一代的思想影響。米爾納尤其強調必須給學生講授關於“勞動價值”和關於分配的概念。同時,他還援引了鼓吹過“公平交換”理論的英國空想社會主義者沃倫。——第 655 頁。

518 因為有人在總委員會會議的討論過程中建議用取消常備軍的維持費來增加普及教育的經費,所以馬克思在這裡談到了廢除常備軍的問題。——第 656 頁。

- 519 这个告大不列顛和爱尔兰男女工人书是 1869 年 10 月成立的土地和劳动同盟(見注 334)的宣言,它是 1869 年 11 月 14 日左右由参加該文件起草委员会的埃卡留斯起草的。該文件原文經馬克思校閱过,这一点在同盟的綱領中得到了反映。——第 657 頁。
- 520 指反谷物法同盟拥护者所开展的运动。他們通过煽动性的宣傳要工人們相信:随着貿易自由的实行,他們的实际工資将要提高,工人們将得到比从前多一倍的大圓面包(«big loaf»)。现实生活揭穿了这些諾言的全部欺騙性。由于谷物法的廢除(見注 386)而得到巩固的英国工业資本加紧了对工人階級的切身利益的进攻。——第 657 頁。
- 521 D 項是納稅人的一个种类,包括从商业中获得收入的人和自由职业者。——第 658 頁。
- 522 这两篇关于不列顛政府对被囚禁的爱尔兰人的政策的发言是馬克思于 1869 年 11 月 16 日和 23 日在总委员会的會議上作的。在 1869 年 11 月 9 日的总委员会會議上,根据馬克思的提議,决定就不列顛政府对被囚禁的爱尔兰人的态度以及英国工人階級在爱尔兰問題上的立場展开討論。馬克思以这里发表的第一篇发言揭开了討論,并就这一問題提出了一个決議草案(見本卷第 433—434 頁)。在 11 月 23 日會議上进行的特別激烈的辯論中,英国人莫特斯赫德发言反对馬克思提出的決議案,他企图为格萊斯頓政府在爱尔兰的殖民政策辯护;奧哲尔支持他的意見。馬克思的第二次发言就是对总委员会中这些英国委員的发言的回答。埃卡留斯对这两次发言的記錄均收在总委员会記錄簿中。1869 年 11 月 21 日的“雷諾新聞”和 1869 年 11 月 28 日的“国民改革报”对 11 月 16 日的总委员会的會議作了报道,11 月 28 日的“雷諾新聞”和 1869 年 12 月 5 日的“国民改革报”对 11 月 23 日的會議也作了报道。在那些报道中,馬克思的发言都报道得很簡短,而且不确切。——第 664 頁。
- 523 指格萊斯頓对要求赦免被囚禁的爱尔兰人的請願书的答复,这些請願书是在爱尔兰的群众大会上通过的,其中包括 1869 年 8 月 1 日在里美黎克举行的有成千上万人参加的大会。格萊斯頓在給爱尔兰活动家奧

謝和巴特的信中作了答复(見注 326)。——第 665 頁。

524 首脑 (Head Centre) 是芬尼亚社內部对芬尼亚社秘密組織領導人的称呼。这里馬克思引用了“紐約爱尔兰人民报”(«New-York Irish People»)的話,該报在一篇文章中指出,格萊斯頓拒絕赦免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員,只会加强芬尼亚运动。引文根据 1869 年 11 月 13 日“爱尔兰人报”第 20 号。——第 666 頁。

525 見注 327。——第 667 頁。

526 見 1869 年 10 月 27 日“泰晤士报”。——第 667 頁。

527 1869 年 10 月 30 日“爱尔兰人报”第 18 号报道說,格萊斯頓在答复参加爭取赦免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員运动的护林人古会都柏林分会的信中,否认了他在选举前关于改善爱尔兰状况的諾言。

护林人古会 是英国的一个互助协会,1745 年成立,是皇家护林人的一个团体,1834 年采用护林人古会这一名称。——第 668 頁。

528 “政治紀事报”(«*Political Register*»)是英国資產階級激进派的周刊“科貝特氏政治紀事周报”(«*Cobbett's Weekly Political Register*»)的簡称,1802 年至 1835 年在倫敦出版。——第 668 頁。

529 指 1798 年英国当局空前殘酷地鎮压爱尔兰爭取民族解放的起义(見注 393)。馬克思在这里把英国討伐者的恐怖行为和 1849 年鎮压匈牙利革命时的种种迫害相比。——第 669 頁。

530 指賴德律-罗兰“英国的沒落”1850 年倫敦版 (Ledru-Rollin. «*The Decline of England*». London, 1850)。——第 669 頁。

531 与馬克思的竭力揭露英国政府的殖民政策的态度相反,奧哲尔要求把馬克思提出的決議草案中对格萊斯頓政策的估計改用温和的措詞。奧哲尔提出的理由是:否則就无法使被囚禁者获得釋放。他提醒道,格萊斯頓在答复請願书时就會对一些請願书的激烈語气表示不滿。在 1869 年 11 月 28 日的“雷諾新聞”上发表的馬克思的发言記錄中,最后的一句話为:“問題在于,是爭取爱尔兰人的信任,还是使決議变得可以为格

萊斯頓所接受，这两者哪个更为重要。”——第 669 頁。

532 这几篇有关爱尔兰問題的文章是馬克思的女儿燕妮于 1870 年 2 月 27 日至 4 月 19 日为“馬賽曲报”(見注 368)写的。在內容上，这几篇文章是同馬克思的文章“英国政府和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員”(見本卷第 456—462 頁)相联系的。

馬克思认为燕妮为“馬賽曲报”写的这几篇文章有很大意义，第三篇文章是他們父女二人合写的。这几篇文章(除第二篇外)在报上发表时署名为燕·威廉斯。馬克思为保密起見，曾用阿·威廉斯为笔名写过几封信，燕·威廉斯就是这一笔名的变体。——第 670 頁。

533 格萊斯頓的演說載于 1870 年 3 月 4 日“泰晤士报”。——第 673 頁。

534 奧頓諾凡-羅薩的信載于 1870 年 2 月 5 日“爱尔兰人报”第 32 号。奧頓諾凡-羅薩在他的信的結尾中提到的橙帶党人是大地主和新教教士所組織的反动团体的成員，綠帶會員是爱尔兰天主教农民秘密組織的成員。——第 676 頁。

535 有关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員理查·伯克上校的报道見于 1870 年 1 月 1 日“爱尔兰人报”第 27 号。1870 年 1 月 1 日安德伍德致內务大臣普魯斯的信載于 1870 年 1 月 8 日“爱尔兰人报”第 28 号。以普魯斯的名义給安德伍德的复信載于 1870 年 1 月 22 日“爱尔兰人报”第 30 号，給伯克的姐姐巴里的复信載于 1870 年 3 月 12 日該报第 37 号。——第 679 頁。

536 “回声报”(《The Echo》)是資產階級自由派的報紙，1868 年至 1907 年在倫敦出版。——第 679 頁。

537 这是伏尔泰的一句名言的改写，伏尔泰的原話是：“除了枯燥乏味之外，一切風格都是好的”。——第 680 頁。

538 指 1869 年 10 月 24 日倫敦工人举行的示威游行。关于总委員會在爭取赦免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員的运动中的作用，見注 326。——第 681 頁。

- 539 匿名文章的作者普魯斯企图否认奥頓諾凡-罗薩所引述的事实,这篇匿名文章发表于1870年3月16日“泰晤士报”。——第681頁。
- 540 穆尔在下院的发言和1870年3月17日格萊斯頓的答辯发表于1870年3月18日“泰晤士报”。——第682頁。
- 541 倫敦克勒肯威尔監獄的爆炸是一些芬尼亚社社員为营救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員于1867年12月进行的。——第683頁。
- 542 燕·馬克思在这里引用了“爱尔兰人报”关于1868年出版的藍皮书的报道,該藍皮书为:“应爱尔兰政府請求解来英国監獄的某些国事犯待遇調查委员会报告”1867年版(«Report of Commission on the Treatment of certain Treason-Felony Convicts in English Prison, who have been transferred thereto at the request of the Irish Government», 1867)。——第684頁。
- 543 指1867年2—3月間芬尼亚社社員的起义尝试。——第684頁。
- 544 指“英国監獄的国事犯待遇調查委员会委員报告”1867年倫敦版(«Report of Commissioners on the Treatment of the Treason-Felony Convicts in the English Convict Prisons». London, 1867)。——第685頁。
- 545 *Coercion Bill* (高压法)是1870年3月17日格萊斯頓向下院提出并經下院通过的;它規定在爱尔兰停止实施宪法保障,在爱尔兰实行特別戒严并授予英国当局特別全权以鎮压爱尔兰的民族解放运动。
Land Bill——見注358。——第686頁。
- 546 指弗·坦·汉·布萊克伍德的著作“密耳先生的爱尔兰綏靖計劃探討”1868年倫敦版(F. T. H. Blackwood. «Mr. Mill's Plan for the Pacification of Ireland Examined». London, 1868)。——第686頁。
- 547 引自1870年3月20日“雷諾新聞”上署名为“格拉古”的一篇文章。
“雷諾新聞”(«Reynolds's Newspaper»)是英国激进派的报纸,

- 1850年起在倫敦出版。——第687頁。
- 548 非洲的专制国家达荷美以靠特务密探制度維持严酷的国内秩序著称。——第688頁。
- 549 內务大臣普魯斯和麦卡錫·唐宁关于理查·伯克的通信发表于1870年3月19日“爱尔兰人报”第38号。——第689頁。
- 550 拉弗耳的信发表于1870年3月29日“自由人报”。
“自由人报”(《*Freeman's Journal*》)是爱尔兰的资产阶级日报,1763年至1924年在都柏林出版。
指帕·拉弗耳的著作“革命以来的爱尔兰大地主”1870年都柏林版(P. Lavelle. 《*The Irish Landlord since the Revolution*》. Dublin, 1870)。——第693頁。
- 551 租約的新条款发表于1870年3月12日“爱尔兰人报”第37号。——第693頁。
- 552 这是莎士比亚史剧“亨利六世”第一部第一幕第二場中一句話的改写。——第694頁。
- 553 美国报上的話以及紐約通訊員的报道引自1870年4月2日“爱尔兰人报”第40号。——第694頁。
- 554 指洛里埃律师于1870年3月25日在亲王比埃尔·波拿巴杀害新聞記者維克多·努瓦尔一案审讯时的发言,这次发言載于1870年3月27日法国报纸“馬賽曲报”第97号。——第696頁。
- 555 引自1870年4月8日“泰晤士报”。——第699頁。
- 556 馬克思在1870年4月26日总委员会會議上所作的关于“蜂房报”的发言,目的是論证他所提出的決議案(見本卷第480頁)。——第701頁。
- 557 見注545。——第701頁。
- 558 卡·馬克思在1870年6月27日写給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的信的內容是在1872年威·李卜克內西、奧·倍倍尔和阿·赫普納被控叛国

的萊比錫審訊時由庭長轉述的。這封信在1871年也被提出作為審訊社會民主工黨不倫瑞克委員會的控告材料。我們沒有該信的原稿。現在發表的是摘自“萊比錫叛國審判案……”1872年萊比錫版（《Leipziger Hochverrathsprozeß...》. Leipzig, 1872）一書；在威·李卜克內西應社會民主工黨委員會的委託於1874年和1894年出版的該書中，也都載有這封信。據萊比錫法庭庭長說，這封信的署名是：“代表國際工人協會總委員會：德國書記卡爾·馬克思。”——第702頁。

- 559** 關於羅曼語區聯合會的分裂的發言是馬克思在1870年6月28日總委員會會議上作的，目的是為了論證他所提出的決議案（見本卷第490頁）。保存下來的是埃卡留斯所作的記錄。——第703頁。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

(1864年9月—1870年7月)

1864

- 9月中** 馬克思接受組織委員會的邀請，將作為德國工人的代表參加定於9月28日在聖馬丁堂舉行的國際工人會議。馬克思推薦前共產主義者同盟盟員約·格·埃卡留斯為德國工人的發言人，並幫助他準備發言。
- 9月中—12月** 馬克思緊張寫作“資本論”。
- 9月28日** 馬克思出席在聖馬丁堂舉行的國際工人會議。在這次會議上通過了成立國際工人協會(國際)的決議。馬克思當選為協會臨時委員會委員。
- 10月4日** 馬克思在給佐林根工人卡·克林格斯的回信中說，儘管他沒有可能接受關於在拉薩爾死後由他擔任全德工人聯合會主席職務的建議，但可以利用正式提名他為這一職務的候選人一事作為一次反對普魯士政府剝奪馬克思國籍的政治示威，並以此表示支持國際工人協會。
- 10月5日** 馬克思由臨時委員會選入國際工人協會綱領性文件起草委員會。
- 10月6—17日** 馬克思患病，因而不能參加綱領性文件的起草工作。
- 10月下半月** 恩格斯在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旅行之後回到曼徹斯特，繼續研究德國哲學和古代日耳曼人的歷史。

- 10月18日** 馬克思在临时委员会會議上反对起草委员会在他患病期間根据馬志尼主义和欧文主义的思想所草拟的綱領和章程，并使委员会作出将文件退回起草委员会加以修改的决定。
- 10月20日** 在馬克思的住所举行了国际綱領性文件起草委员会會議。
- 10月21日和27日之間** 馬克思重新起草国际工人协会的綱領性文件——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这些文件得到起草委员会的贊同。
- 11月1日** 馬克思在临时委员会會議上宣讀了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这两个文件被一致通过。临时委员会按章程被确定为协会的領導机关（即总委员会；在1866年年底以前多半被称为中央委员会）。馬克思在其中担任德国通訊書記职务。
- 11月2日** 恩格斯在給馬克思的信中叙述了旅途观感，轉述了他对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的自然和居民的观察。
- 11月3日** 馬克思会見了闊別16年的米·亚·巴枯宁，并同他討論了有关1863—1864年波兰起义、国际工人协会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問題。
- 11月4日** 馬克思写信給恩格斯，信中詳尽地叙述了国际創立的情况和制定新的无产階級組織的綱領性文件的經過。
- 11月7日** 恩格斯在給馬克思的回信中对国际工人协会的創立表示滿意。
- 恩格斯出席曼彻斯特德国政治流亡者的席勒协会理事会會議。他在1864年7月被选为理事会的主席。
- 11月8日** 总委员会根据馬克思的建議作出决定，鉴于某些报纸歪曲地登載关于总委员会各次會議的报道，所以决定通过总委员会書記把这些报道寄出发表。

- 11月9日** 恩格斯把一份发表在“曼彻斯特卫报”上的资产阶级救济贫苦工厂工人委员会的报告书寄给马克思，并指明资产阶级对工人的“救济”是企业主用来使自己更加发财的一种手段。
- 11月14日左右—24日左右** 马克思和恩格斯被邀请为全德工人联合会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该报计划在柏林出版，编辑是约·巴·施韦泽和约·巴·霍夫施泰滕。马克思和恩格斯互相通信讨论了为该报撰稿的问题，并在弄清办报纲领中没有典型的拉萨尔派的论点后，表示同意撰稿。他们指望利用该报在德国宣传科学共产主义的思想和建立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
- 11月15日和22日** 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参加讨论了关于接纳工人组织以集体形式加入国际的条件，并提出决议草案，该草案被一致通过。决议发表于11月26日的英国工联机关报“蜂房报”上。该报也被宣布为国际工人协会的机关报。
- 11月18日** 马克思为写作“资本论”要求恩格斯寄给他关于曼彻斯特“棉荒”和它对棉纺织工业工人状况的影响的官方材料。
- 11月22日和29日之間** 马克思起草总委员会就阿·林肯再度当选美国总统致阿·林肯的公开信。公开信在12月23日的英国自由资产阶级报纸“每日新闻”、1865年1月7日的“蜂房报”和其他报纸上发表。
- 11月24日左右** 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以单行本出版，共1 000册。
- 11月24日** 马克思把刚刚出版的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寄给恩格斯。
- 恩格斯在给他纽约的朋友、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

- 員、德国社会主义者約·魏德迈的信中，分析了南北战争的进程，并強調指出它对美国今后发展的巨大意义。
- 11月28日** 馬克思寄給斯图加特“观察家报”編輯部一項声明，抨击了小资产階級政論家卡·布林德。12月3日該报編輯部只登載了馬克思附上的信，以及編輯部的“評論”。这封信在12月10日的汉堡“北极星”报上发表。
- 11月底—12月初** 馬克思写信給他在各国的拥护者約·魏德迈、路·庫格曼等人，告知有关国际創立的情况，并給他們寄去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
- 12月2日** 馬克思請恩格斯为股份基金捐款，这项基金是总委员会为取得“蜂房报”的股份以便能影响該报方向而筹划的。
- 12月6日** 馬克思在总委员会执行机关常务委员会會議上批評了彼·福克斯根据资产階級民主主义的精神，并仅以国际的英国會員的名义所草拟的致波兰人民的呼吁书，他指出福克斯把法国統治階級对波兰的傳統政策理想化，并揭露出沙皇俄国、普魯士和奥地利政府在波兰問題上所采取的政策反动实质。
- 12月10日** 馬克思在給恩格斯的信中，向他报道有关国际的状况，滿意地提到过去从未参預政治运动的倫敦泥水匠工联（會員超过3000人）也加入了国际。
- 12月13日** 馬克思在总委员会为討論福克斯草拟的呼吁书所召开的會議上就波兰問題发了言。
- 1864年12月18日左右—1865年1月** 馬克思在給約·巴·施韦澤和威·李卜克內西的一系列信件中，尖銳地批評了“社会民主党人报”对拉薩尔的迷信和該报編輯部对俾斯麦政府的献媚行为。

12月22日 馬克思写信給德国社会主义者詩人卡·济貝耳，請他建議克林格斯將全德工人联合会加入国际的問題列入联合会下屆大会的議程。

1865

1月3日 馬克思在总委員會會議上再次就福克斯草拟的致波兰人民呼吁书展开了辯論。

約1月7—14日 馬克思在曼彻斯特恩格斯处。他們討論了有关国际工人协会和德国工人运动的問題，会見了前宪章派首領厄·琼斯。

1月16日 馬克思在給施韦澤的信中对“社会民主党人报”发表小資產階級政論家莫·赫斯的一篇通訊提出抗議，因为这篇通訊誣蔑国际巴黎支部的某些成員，指控他們为波拿巴主义者。

1月24日 馬克思应“社会民主党人报”編輯部的請求，撰写論蒲魯东的文章。这篇文章尖銳地批判了蒲魯东的反动的小資產階級意識形态，同样也抨击了拉薩尔的机会主义。文章于2月1日、3日和5日在該报发表。

馬克思为了抗击資產階級分子钻入总委員會，并力求巩固它的无產階級核心，提議委員會委員的候选人至迟得在选举前一星期提出，同时候选人必須已經是协会的成員；馬克思还建議，委員會的新委員的选举要在候选人缺席的情况下进行。馬克思的提議被一致通过。

1月25日 馬克思在給恩格斯的信中向他报道有关国际的状况，并建議他为“社会民主党人报”写一篇論述普魯士軍事改革的文章。

1月27日左右 恩格斯把一首反封建的古代丹麦民歌“提德曼老爷”譯

成德文，并連同自己的評論一并寄給“社会民主党人报”，目的在于喚起該报去反对封建貴族。恩格斯的这篇通訊稿于2月5日登載出来。

1月27日

恩格斯从馬克思寄来的李卜克內西的信中知悉，拉薩尔曾答应俾斯麦，在实行普选制的条件下全德工人联合会支持普魯士在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的侵略政策。恩格斯在給馬克思的回信中評定拉薩尔的这种諾言是对德国工人階級利益的背叛。恩格斯还告訴馬克思說，他打算在論述普魯士軍事改革的文章中既要反对政府，也要反对資产階級反对派。

1月31日

馬克思在总委員會會議上，参加討論关于国际工人协会对英国选举法改革运动的态度問題。馬克思发言表示贊同协会参加改革同盟的成立大会，但必須有下述条件：答应給全体男性居民以普选权，并且让总委員會提議的候选人参加領導机关。

1月底—2月11日

恩格斯写“普魯士軍事問題和德国工人政党”一文。由于文章篇幅大，以及不願意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登載，所以恩格斯决定以单行本发表。单行本于2月底在汉堡出版。

2月

馬克思在給居留曼彻斯特的琼斯的若干信件中，拟定了英国无产階級爭取改革选举法的斗争策略。

2月—3月中

馬克思除了在总委員會里积极工作之外，还緊張地、經常在夜間写作“資本論”。

2月6日

馬克思就“社会民主党人报”发表赫斯再次誹謗国际的文章写給該报編輯部一篇声明。声明上也有恩格斯的签名，它是作为最后警告寄給編輯部的。但是他們认为，同該报决裂，應該是由于它的政治策略，而不是由于赫斯的文章，而且他們还注意到赫斯放棄了自己的

指責，因此決定不再堅持發表這篇聲明。

恩格斯參加席勒協會理事會會議。

約2月7日

馬克思在倫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協會紀念會上發表演說，批判了拉薩爾派指靠資產階級國家援助工人生產合作社的觀點。2月19日“社會民主黨人報”登載了一篇關於紀念會的報道，其中歪曲了演說的內容。

2月10日左右

馬克思參加為紀念1863—1864年波蘭起義一周年而組織支持波蘭民族解放運動倫敦群眾大會的籌備委員會會議。

2月13日

馬克思寫信給施韋澤，信中詳盡地談到了工會這一工人階級的組織在同資產階級進行鬥爭中的作用，並強調指出，在普魯士爭取聯合權是反對反動君主制的一般民主鬥爭的一個部分。

2月下半月—3月初

馬克思忙於國際巴黎理事會的事情，因為在巴黎支部內部發生了記者昂·勒弗爾同工人蒲魯東分子 E. E. 弗里布爾、昂·路·托倫等人之間的衝突。

2月18日

由於“社會民主黨人報”繼續實行向俾斯麥政府獻媚的政策，馬克思以本人和恩格斯的姓名寫了一篇聲明。聲明指明拉薩爾主義是“普魯士王國政府的社會主義”，並通知說，他們拒絕再為該報撰稿。馬克思將聲明寄給恩格斯簽名後，於2月23日寄往該報編輯部要求發表。聲明在3月3日的“社會民主黨人報”及德國人的其他報紙上發表。

2月27日

恩格斯寫了一篇有關小冊子“普魯士軍事問題和德國工人政黨”即將出版的簡介，並將其寄給他在德國的擁護者以便在德國報刊上發表。簡介登載於3月3日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報紙“柏林改革報”以及德國的其他報紙上，沒有署名。

- 2月底** 馬克思忙于紀念波兰起义大会的組織工作。針對英国資產階級激进派借口紀念大会不适宜而要大会延期举行的企图，馬克思代表总委员会发表声明說，工人階級有自己本階級的对外政策，决不能視資產階級认为适时与否来行事。
- 2月底—3月上半月** 馬克思忙于改革同盟的事情，国际总委员会的代表在其领导机关里爭得了多数。
- 3月1日** 馬克思出席了在圣馬丁堂举行的紀念 1863—1864 年波兰起义一周年大会。
- 3月6日** 恩格斯参加席勒协会理事会會議。
- 3月7日** 总委员会會議通过了馬克思草拟的決議草案。草案指出了消除国际巴黎理事会內部冲突的途徑。
- 3月10日** 恩格斯在給魏德迈的信中詳尽地分析了美国內战各个战綫上的軍事行动的进程。
- 3月13日左右** 馬克思为恩格斯的小册子“普魯士軍事問題和德国工人政党”写了书评，发表于 3 月 18 日的倫敦德文周报“海尔曼”上。
- 3月15日** 馬克思关于同拉薩尔派报纸“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关系写了声明。声明揭示了他和恩格斯为該报撰稿的經過和同它决裂的原因。声明发表在 3 月 19 日的“柏林改革报”以及其他报纸上。
- 3月19日—4月8日** 馬克思到住在扎耳特博默耳（荷兰）的親屬家去了一趟。
- 3月23日左右** 在馬克思外出期間，汉堡出版商奧·卡·迈斯納寄到倫敦一封商談出版“資本論”事宜的信。
- 3月28日** 馬克思写給“柏林改革报”編輯部一篇声明，駁斥施韦澤企图歪曲馬克思和恩格斯同“社会民主党人报”决裂

- 的經過。声明于4月1日在該报发表。
- 3月29日** 恩格斯在給德国資產階級新康德主义哲学家弗·阿·朗格的信中，批駁了資產階級經濟学家关于經濟規律永恒性和超历史性的論点，并特別指出，人口規律是由本社会中占統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的。
- 4月8日** 馬克思写“人类的主席”一文，目的在抨击拉薩尔派的全德工人联合会的主席伯·貝克尔。文章发表在4月13日的“柏林改革报”上。
- 1865年4月11日—
1866年1月16日** 馬克思受总委员会的委托临时担任比利时通訊書記。
- 4月12日** 馬克思出席倫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大会。他在講話中揭露了全德工人联合会拉薩尔派領導的机会主义。
恩格斯在給馬克思的信中。詳尽地报道了英国和其他国家棉业危机的发展情况。
- 4月13日** 馬克思写信給海·荣克，請他以瑞士通訊書記的身分把对載于苏黎世“白鷹报”上的关于1865年3月1日倫敦紀念波兰起义大会的报告的更正寄給該报編輯部，因为这篇报道对于以国际工人协会名义提出、并由大会一致通过的決議只字不提。馬克思随信附上更正的全文，由荣克签名，于4月22日在該报发表。
- 4月25日** 馬克思在总委员会會議上作关于萊比錫印刷工人罢工情况的报告。他和彼·福克斯及威·朗·克里默一起被选入派往倫敦印刷工人那里去的代表团，去鼓动他們給萊比錫的罢工工人以物质援助。
- 5月2日和9日之間** 馬克思草拟国际工人协会就林肯被刺致美国总统安·約翰遜的公开信。公开信經总委员会一致通过，于5月20日发表在“蜂房报”及其他报纸上。
- 5月20日** 馬克思在給恩格斯的信中，批評了約·韦斯頓提交給

- 总委员会的关于工資的报告，报告企图证明工人爭取提高工資的斗争是毫无意义的，并否定工联在无产阶级运动中的积极作用。
- 6月20日和27日** 馬克思在总委员会會議上作关于工資、价格和利潤的报告。报告駁斥了韦斯頓的錯誤观点，通俗地表述了他的剩余价值学說的实质。
- 6月24日** 馬克思在信里告知恩格斯，他已說服总委员会委員在倫敦召开国际的預备性代表會議，而不召开預定在布魯塞尔召开的代表大会，因为他认为召开代表大会为时过早。
- 7月25日** 总委员会會議批准了常务委员会在馬克思领导下草拟的关于召开倫敦代表會議的报告。
- 7月31日** 馬克思告訴恩格斯他写作“資本論”的情况。他說，还需要写3章才能完成这部三卷本的著作的理論部分，此外，他还要写第四卷，专门讲述政治經濟学史。
- 8月** 馬克思由于緊張写作“資本論”疲劳过度而患病。他在患病期間讀了天文学方面的一些书籍。
- 8月底** 馬克思当选为国际工人协会机关报“工人辯护士报”的理事会理事。
- 8月底—9月中** 恩格斯到德国、瑞士和意大利旅行。
- 9月12日** 馬克思在总委员会會議上在討論有关組織即将举行的国际代表會議的問題时作了发言。
- 9月中** 馬克思筹备倫敦代表會議，建議李卜克內西亲自参加这次會議或者提交一份关于德国工人运动的书面报告；請琼斯在倫敦代表會議期間举行的庆祝国际成立一周年的晚会上发表讲话。
- 9月19日** 馬克思在总委员会會議上被选入新的常务委员会。

- 9月25—29日 馬克思参加国际倫敦代表會議。他出席了代表會議的各次會議，就各項最重要的問題作了多次发言，并使會議通过了他为即将举行的代表大会所提出的議事日程。馬克思被选入为准备在“工人辯护士报”上报道有关国际的情况而成立的一个委员会。
- 10月17日 馬克思在总委员会會議上支持波兰民主主义流亡者的代表所提出的紀念 1830 年波兰起义的建議，并建議将集会的筹备工作交給常务委员会。
- 10月20日—11月2日左右 馬克思在曼彻斯特恩格斯处。
- 11月15日 馬克思收到柏林工人泰·梅茨內尔、齐·迈耶尔和奧·福格特的来信，他們請求馬克思到德国去，因为他亲自到德国会有助于德国工人階級优秀力量的困結。
- 11月20日 馬克思写信給恩格斯，請他寄去有关曼彻斯特棉紡織工业工人状况的实际資料，因为他写作“資本論”必需这些資料。
- 12月 馬克思作为“工人辯护士报”理事会理事同該报理事会中的資產階級分子进行斗争。
馬克思为深入研究地租問題在英国博物館研讀有关农业，尤其是农业化学的著作，他讀了尤·李比希和克·弗·申拜因的著作。
- 1865年12月—1866年1月 馬克思收到在瑞士的德国人支部领导人約·菲·貝克尔的信，信中說“先知”杂志将于 1866 年 1 月出版；馬克思請恩格斯、李卜克內西和庫格曼給該杂志寄去通訊稿。
- 12月26日 馬克思在总委员会會議上参加討論了比·韦济尼埃在比利时資產階級民主主义报纸“佛尔維耶回声报”上匿名发表的一篇文章，該文誣蔑并歪曲总委员会的活动

和倫敦代表會議的工作。馬克思駁斥了文章里所引用的那些論點。

12月底 馬克思初步写完“資本論”的手稿本。

1866

1月 馬克思开始准备“資本論”的付印工作。

1月初 恩格斯研究自然科学的一些問題，对分子理論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讀了英国物理学家約·丁鐸尔的著作“热能是一种运动”。

1月5日 馬克思告知恩格斯說，在倫敦的法国人支部的小資產階級分子和布魯塞尔的蒲魯东主义者，对总委员会采取反对立場。他請恩格斯在报刊上著文論证无产階級在波兰問題上的立場。

1月9日 馬克思在总委员会會議上的发言中駁斥了韦济尼埃的文章中的論點，并建議要韦济尼埃对他引用的那些事实提出证明，否則将把他开除出国际。总委员会採納了馬克思的建議。

1月22日 馬克思出席紀念1863—1864年波兰起义两周年的大会，他支持以国际工人协会名义提出的对波兰人民解放斗争表示同情的決議案。

1月26日 恩格斯向馬克思詢求有关俄国廢除农奴制的条件和俄国农民經濟状况的文献。

1月27日 馬克思会晤荣克，并审定他受总委员会委托所写的对“佛尔維耶回声报”上韦济尼埃的文章的反駁。这篇反駁由荣克签名于2月20日在同一家报纸上刊登出来。

1月底—3月初 馬克思由于緊張写作“資本論”而患重病。随着健康的恢复，他又繼續第一卷的手稿工作；从历史角度对工作

日一章进行了加工。

1月底—4月6日

恩格斯为了揭露蒲魯东主义者在民族問題上的虛无主义,写了一組关于波兰問題的文章,論证了无产階級对待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的立場。文章发表在3月24日、31日和5月5日的国际机关报“共和国”周报上,标题是“工人階級同波兰有什么关系?”

2月初

馬克思在患病期間同总委员会委員經常通信,力爭使埃卡留斯被委派为“共和国”周报編輯,并成立包括馬克思在內的总委员会委員占多数的編輯部監察委员会。

2月13日左右

馬克思依照恩格斯的建議,决定首先发表“資本論”第一卷。

2月14日和18日之間

恩格斯住倫敦馬克思处。

3月上半月

馬克思为捍卫国际的无产階級性质而同資产階級影响进行斗争。这种影响是由馬志尼分子(如魯·沃尔弗等)、小資产階級民主主义者(如在倫敦的法国人支部成員)和英国工联改良派領袖(如乔·奥哲尔、威·朗·克里默等人)組成的反对派帶到总委员会里来的。

3月10日

在馬克思的住所举行了大陆国家的总委员会通訊書記會議。会上作出反击馬志尼主义者沃尔弗的决定,因为他在3月6日的总委员会會議上企图抗議“佛尔維耶回声报”上荣克的文章和宣称朱·馬志尼是国际的章程的作者。會議委托馬克思揭发沃尔弗和他在总委员会里的拥护者。

3月12日

馬克思出席“共和国”周报股東會議,力爭让埃卡留斯仍任編輯职务。

3月13日

馬克思在总委员会會議上发表演說,駁斥沃尔弗在3月6日的會議上所作的声明。

- 3月15日—4月10日左右** 馬克思在馬尔吉特治疗和休养。
- 3月底—4月1日** 恩格斯在威尔士休假。
- 4月6日** 馬克思在給恩格斯的信中說他准备前往巴黎，好去說服国际的法国會員相信，由于国际工人协会对召开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特別是在英国的准备工作沒有做好，原定于5月在日内瓦召开的代表大会有必要延期举行。
- 4月10日** 馬克思在长時間的患病和治疗以后，重新参加总委员会的工作。他出席了总委员会討論有关日内瓦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其他一些問題的會議。
- 4月17日** 馬克思在总委员会會議上参加因馬志尼主义者沃尔弗的发言而展开的辯論，沃尔弗企图再次攻击“佛尔維耶回声报”上柴克的文章。
- 5月1日** 馬克思在总委员会里发言支持将日内瓦代表大会由5月延至9月召开的決議。
- 恩格斯在信中告知馬克思說，英国企业主把一批德国縫紉工人运到爱丁堡，利用他們充当罢工破坏者，因此他請求总委员会采取措施，反对繼續把大批德国工人运到英国。
- 5月4日** 馬克思代表总委员会草拟呼吁书。呼吁书警告德国工人提防英国企业主招雇他們并利用他們充当罢工破坏者的任何企图。該呼吁书登載在5月15日“上萊茵信使报”及其他德国报纸上，标题是“警告”。
- 5月8日** 馬克思在总委员会會議上，在討論包括同筹备日内瓦代表大会有关的財政問題时作了两次发言。
- 5月14日左右** 馬克思在长時間的間断以后，尽管健康状况仍然不佳，又重新着手“資本論”第一卷手稿付印的准备工作。

- 5月15日** 馬克思在总委员会會議上，就福克斯对恩格斯的的文章“工人階級同波兰有什么关系？”的批評作了答复，并捍卫了恩格斯的論点，即波兰貴族的政策促使了外国对波兰的瓜分。
- 5月25日** 恩格斯应馬克思的請求，向他报道曼彻斯特和利物浦两地紡織工业的經濟危机的发展情况。
- 6月9日** 鉴于“共和国”周报理事会里資產階級分子的影响日益增长，馬克思退出理事会。
- 6月19日和7月5日之間** 恩格斯就奥地利同普魯士爆发战争写“德国战争短評”。文章登載在6月20日、25日和28日及7月3日和6日的“曼彻斯特卫报”上。
- 6月19日和26日** 馬克思在总委员会會議上参加关于普奥战争問題的討論。討論变成了有关民族問題的辯論。馬克思在第一次會議上的发言中批判了蒲魯东主义者在民族問題上的观点。
- 7月上半月** 馬克思研究風行于英国和法国的資產階級实证論創始人奧·孔德的哲学。孔德的观点已为工联改良派领导人接受，从而能够影响英国工人階級。
- 7月3日** 馬克思在总委员会里支持荣克的发言，因为他捍卫无产階級和国际工人协会在普奥战争时期的革命策略。
- 7月17日** 在辯論关于普奥战争問題期間，馬克思在总委员会里就无产階級在这次战争中的立場发表了演說。
- 7月24日** 馬克思参加总委员会对有关举行日内瓦代表大会的各项問題，其中包括代表大会的議程的討論，并支持总委员会仍設在倫敦的提議。
- 7月底** 馬克思为写作“資本論”而研究剛剛发表的有关英国工业中的童工劳动以及英国无产階級居住条件的官方

报告。

- 7月31日** 馬克思在总委员会會議上代表常务委员会作关于日内瓦代表大会議程的报告。
- 8月—11月初** 馬克思在物质上遇到了极大困难。他几次写信給荷兰的亲戚請求帮助,但始終沒有回信。像往常一样,恩格斯帮助了馬克思。
- 8月底** 馬克思为即将举行的日内瓦代表大会起草“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問題給代表的指示”。
- 8月31日** 馬克思写信給約·菲·貝克尔,对日内瓦代表大会的組織工作作了指示。他建議不要选举改良主义者奥哲尔为代表大会的主席,并且強調指出奥哲尔和改革同盟里的其他工联領袖所起的妥协作用,他們已走上同資產階級激进派妥协而損害工人利益的道路。
- 9月3—8日** 日内瓦代表大会討論了馬克思起草的“临时中央委员会給代表的指示”,并按照“指示”通过了各項主要決議。日内瓦代表大会批准了以馬克思草拟的临时章程为基础的國際的章程。指示和章程連同关于代表大会的概况报道分別用英文、法文和德文在國際的各个机关报上发表。
- 9月8日** 英国代表威·朗·克里默和詹·卡特在日内瓦代表大会上回击了蒲魯东分子代表对知識分子的攻訐,強調指出馬克思在創立國際中的杰出作用,认为馬克思是把自己的整个一生都献給工人階級事业的人物。馬克思由代表大会选入总委员会。
- 9月下半月** 馬克思閱讀了在巴尔的摩召开的美国工人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他对會議的工作成果,特别是代表大会发出的为爭取八小时工作日(这是國際提出的基本要求之一)而斗争的号召給予很高評價。

- 9月25日 馬克思在总委员会會議上重新当选为德国通訊書記。
- 10月9日 总委员会根据馬克思的建議决定向法国外交部递交抗議书,抗議法国当局沒收日內瓦代表大会的文件。
馬克思在給庫格曼的信中对日內瓦代表大会的工作作了评价,他着重指出代表大会在法国、英国和美国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說明蒲魯东主义者是无产阶级的任何革命运动和政治运动的敌人,并指出蒲魯东的小资产阶级空想主义給工人运动带来的巨大危害。
- 10月13日 馬克思在給庫格曼的信中叙述了“資本論”的总的结构,他說这部著作打算分四卷:“(一)資本的生产过程;(二)資本的流通过程;(三)整个过程的形式;(四)学說史。”
- 1866年11月—1867年3月中 馬克思帮助埃卡留斯撰写一組揭露英国资产阶级經濟学家和实证論哲学家約·斯·穆勒的文章。穆勒的观点对英国无产阶级上层分子有影响。这一組文章在“共和国”周报上发表,标题是“向工人駁斥約翰·斯图亚特·穆勒的一些政治經濟学論点”。
- 11月中 馬克思給汉堡出版家迈斯納寄去“資本論”第一卷手稿的第一部分。
- 11月20日 在总委员会會議上馬克思被选入参加工联倫敦理事会會議的代表团。馬克思在会上提議紀念1863—1864年波兰起义。
- 11月27日 在总委员会討論关于法国政府沒收日內瓦代表大会文件一事时,馬克思揭露了拿破侖第三的政策的对工人的实质。
- 12月18日 馬克思在总委员会會議上报告說,登載在各种资产阶级报纸上的許多文章已經不得不承认,国际工人协会是这一世紀的重大現象。

1867

- 1月上半月** 馬克思繼續寫作“資本論”，包括補充關於資本主義積累的一般規律的一章，為此，他讀了恩格斯寄去的英國歷史學家兼經濟學家詹·愛·托·羅杰斯的著作“英國的農業史和價格史”。
- 1—2月** 馬克思在物質上異常困難，家里受到被攆出住宅和沒收財產的威脅。恩格斯幫助了馬克思。
- 1月22日** 馬克思作為國際工人協會的代表，出席倫敦紀念1863—1864年波蘭起義三周年大會。他發表了演說並提出一項決議案。馬克思的演說和決議案發表在2月10日的倫敦波蘭民主主義流亡者的報紙“自由之聲”上。
- 1月29日** 恩格斯寄給馬克思有關曼徹斯特棉紡織業工人的狀況和鬥爭的新材料。
- 2月18日** 馬克思通過庫格曼寄給漢諾威自由派的報紙“北德報”一篇短文，駁斥了該報散布的謠言，說什麼馬克思打算去大陸準備波蘭起義。該報於2月21日公布了由編輯部改寫的馬克思的辟謠聲明。
- 2月28日** 馬克思在倫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協會紀念會上發表演說，闡述了僱傭勞動和資本的問題，以及德國社會關係的問題。這篇演說由總委員會委員弗·列斯納記錄下來，登載在3月號的“先驅”雜誌上。
- 3月5日** 馬克思在總委員會會議上被選入總委員會的代表團，代表團將前往倫敦工聯，去爭取他們從物質上支援正在罷工的巴黎銅器工人。
- 4月2日** 馬克思在信中告訴恩格斯他已寫完“資本論”第一卷，並打算親自將手稿送到漢堡出版商那里。

- 4月4日 恩格斯在給馬克思的信中表达了他对“資本論”第一卷写完的欢乐心情,同时給馬克思寄去到汉堡的路費。
- 4月10日 馬克思由倫敦前往汉堡。
- 4月12日—4月16日左右 馬克思住在汉堡,同迈斯納商談关于出版“資本論”第一卷的一些問題。
- 4月下半月—6月 馬克思和恩格斯采取各种办法通过报刊来报道“資本論”第一卷即将出版的消息,并采取步驟,以便能把該书譯成英文和法文。
- 4月17日左右—5月15日 馬克思在汉諾威庫格曼家做客。
- 4月29日 萊比錫奧·維干德印刷所开始印刷“資本論”第一卷。
- 5月5日 馬克思收到印刷所送来的“資本論”第一卷的第一印張校样。
- 5月16—17日 馬克思由汉諾威回倫敦途中为了同迈斯納进一步商談,在汉堡逗留。
- 5月19日 馬克思回到倫敦。
- 5月下半月 馬克思收到布魯塞尔的国际会員阿·万丹胡亭的回信,信中报告了沙勒罗瓦煤矿区矿工暴动的原因。
- 約5月21日—6月2日 馬克思住曼彻斯特恩格斯处。
- 6月上半月 恩格斯对化学的最新学說感到兴趣,他讀了德国化学家奥·威·霍夫曼的著作“現代化学通論”。
- 6月 馬克思和恩格斯密切注意被囚禁的爱尔兰芬尼亚社社員——爱尔兰反对英国統治的民族解放运动参加者——审判案的进程。
- 6月3日 馬克思把“資本論”的五个印張校样寄給恩格斯校閱,并請他指出在对价值形式的叙述中有哪些地方需要在

- 附录中作通俗說明。
- 6月4日** 馬克思被选入起草总委员会关于即将召开的洛桑代表大会的呼吁书的委员会。
- 6月16日** 恩格斯在給馬克思的信中，叙述了自己讀完“資本論”第一卷第一批校样后的意見，以及对在第一卷附录中叙述有关价值形式問題的想法。
- 6月17—22日** 馬克思按照恩格斯的意見写作“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章的附录“价值形式”。
- 6月24日** 恩格斯写信給馬克思，推荐国际会员英国法学家賽·穆尔担任“資本論”第一卷的英文翻譯，同时答应自己負責照管翻譯工作。
- 7月5日** 恩格斯动身去瑞士、丹麦和德国旅行。他在旅行期間写了旅行日記，簡要地記下了自己的观感；他还到汉諾威訪問了庫格曼。
- 7月9日** 馬克思参加总委员会討論了在他参与下草拟的关于洛桑代表大会的呼吁书，說明了呼吁书提到的代表大会的第一項議程。
- 7月中** 馬克思校审关于洛桑代表大会的呼吁书的譯文。呼吁书用法文和德文印成傳单，同时还在8月31日的国际比利时支部机关报“人民論壇报”和其他报纸上登載。
- 7月16日** 馬克思由总委员会选入出席工联倫敦理事会年会的代表团。
- 7月23日左右** 馬克思收到工人运动活动家阿·弗·左尔格从美国寄来的信，信中說他打算在霍布根建立国际支部。左尔格請馬克思寄去国际的成立宣言和章程，并告訴他加入协会的条件。
- 7月23日** 馬克思在总委员会會議上，根据剛剛出版的議會藍皮

- 书所引用的官方統計資料，駁斥了資產階級报刊說什麼工联的活动将导致英国制铁业萎縮的声明。馬克思发言的記錄于7月27日在英国“工人报”和“蜂房报”上发表。馬克思还提出了旨在反对巴黎理事会的蒲魯东主义者的建議，即只有总委员会有权修改国际代表大会的議程。馬克思的建議被採納了。
- 7月25日** 馬克思写完“資本論”第一卷的序言，并把它寄給汉堡出版商。
- 8月初** 恩格斯回到曼彻斯特。
- 8月13日** 馬克思在总委员会會議上发言，并提出反对国际正式参加定于9月在日内瓦举行的資產階級和平主义者的和平和自由同盟代表大会的決議案。馬克思在发言中着重指出，国际是爭取和平的真正战士，因为“各国工人階級的团結最終應該使各国之間的战争成为不可能”。同时馬克思认为最好是国际的代表以个人身分参加代表大会。馬克思的提議被一致通过。馬克思的发言記錄和決議发表在1867年8月17日的“蜂房报”上。
- 8月16日** 馬克思看完“資本論”第一卷最后一个印張的校样。他在給恩格斯的信中衷心感謝恩格斯在他写作这部著作期間所給予的无私帮助。
- 8月20日** 总委员会會議批准了由馬克思签名的将提交給洛桑代表大会的报告。
- 8月24日左右** 馬克思繼續写作“資本論”第二卷。他考察了有关固定資本周轉的問題。
- 8月26—27日** 恩格斯应馬克思的請求，研究有关固定資本的补偿和折旧資金的利用的問題。他收集了曼彻斯特一些工厂的实际資料并把自己对这一問題所作的詳細統計材料

- 寄給馬克思。
- 8月27日** 馬克思在总委員會會議上对某些英国委員的批評意見作了答复，这些委員认为委員會很少注意討論一般性問題。馬克思強調指出委員會的實踐活動的意義，反对将国际变成辯論的俱樂部。
- 9月4日左右** 馬克思寄給已成為国际机关報的巴黎左派共和黨人報紙“法蘭西信使報”一篇短評。短評引用了普魯士中央統計檔案館館長奧·許布納爾关于全国劳动群眾貧窮狀況的一份報表。短評于9月6日在該報發表，但內容受到一些歪曲。
- 9月6日** 馬克思由洛桑代表大會選入总委員會。
- 9月7—12日** 馬克思收到列斯納和埃卡留斯寄來的关于国际洛桑代表大會和日內瓦和平和自由同盟代表大會的進程的報告。
- 9月13日** 馬克思和保·拉法格到曼徹斯特恩格斯處作客數日。
- 9月14日** 馬克思的主要經濟學著作“資本論”第一卷出版。
- 9月24日** 馬克思在总委員會會議上重新當選為德国通訊書記。馬克思在总委員會里同工聯的改良派首領們鬥爭，終於使會議作出決定：撤銷工聯倫敦理事會成員奧哲爾直到當時一直擔任的总委員會主席的職務。
- 10月12日** 恩格斯寫了兩篇書評，目的是在普及和宣傳“資本論”的思想，也是為了打破資產階級報界對“資本論”第一卷的出版蓄意保持的沉默。其中一篇登載在10月30日的德国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報紙“未來報”的附刊上；另一篇是為德国資產階級的“萊茵報”寫的，該報未予發表。
- 10月中** 馬克思十分重視李卜克內西在北德意志聯邦國會中的

- 活动，在給李卜克內西的許多信件中为他的发言提出很多建議和指示。由于李卜克內西打算要求国会成立德国工人状况調查委员会，馬克思寄給他有关議会專門委员会职权的一些官方文件，以便使他熟悉在英国是怎样安排这种事情的。
- 10月22日** 恩格斯写“資本論”第一卷的书評，书評于11月2日在德国自由資產階級報紙“爱北斐特日报”上发表。
- 11月2日** 馬克思在給恩格斯的信中談到他对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的前途的意見，同时論证了爱尔兰同英国分离的权利。
- 11月3日和8日之間** 恩格斯写“資本論”第一卷的书評，书評于11月17日在德国自由資產階級報紙“杜塞尔多夫日报”上发表。
- 11月8日** 恩格斯在給庫格曼的信中叙述了他对英国政治形势的看法，并強調指出了英国工人对爱尔兰人反对英国統治的解放斗争的同情正日益增漲。
- 11月14日和26日**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互相往来的信件中，就工人約·狄慈根給馬克思的信中所談到的哲学观点交換了意見，对于这位自学成功的哲学家的世界观給予很高評价。
- 11月20日** 馬克思在总委员会特別會議上宣讀了他起草的就判处芬尼亚运动参加者以死刑一事的意見书。意見书被一致通过，并以“在曼彻斯特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員和国际工人协会”为題在11月24日“法兰西信使报”上发表。
- 11月26日左右** 馬克思准备参加总委员会的下次會議，为将要作的关于爱尔兰問題的发言拟定提綱。
- 11月26日** 在总委员会會議討論爱尔兰問題时，馬克思决定放棄发言，而把自己的发言內容轉述給福克斯，因为他认

为，在 11 月 23 日三名芬尼亚社社員在曼彻斯特被处决以后，由英国人来对英国政府的镇压提出抗議，在政治上要更加合适些。

11月30日

馬克思在給恩格斯的信中确定了英国无产阶级在爱尔兰問題上的策略，同时着重指出策略的主要点应该是爭取消除英国对爱尔兰的殖民統治并給予爱尔兰以民族独立。

12月6日

馬克思給“未来报”寄去“剽窃者”一文，旨在抨击拉薩尔分子霍夫施泰滕，因为他在全德工人联合会大会上的演說中盜用了“資本論”的各个部分，歪曲其內容，而不提它的出处。該文登載在 12 月 12 日的“未来报”附刊上，沒有署名。

12月12—13日

恩格斯写了两篇“資本論”第一卷的书評，书評发表于 12 月 27 日的“观察家报”和德国工商界的机关报“維尔騰堡工商业报”上。

12月16日

馬克思在倫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上作了关于爱尔兰問題的報告。他在報告中詳尽地闡述了英国奴役爱尔兰的历史，并論证了国际对于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所采取的立場。

1867年12月下半
月—1868年4月底

馬克思不顾极其不良的健康状况，繼續写作“資本論”。他研究了若干統計材料、議會藍皮书，讀了約·摩尔頓、卡·尼·弗腊斯和約·亨·杜能关于农业的一些著作。

1868

1月上半月

恩格斯写“資本論”第一卷书評。书評于 1 月 21 日发表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报纸“新巴登报”上。

- 1月底—3月** 恩格斯抽出很多時間去做席勒协会理事会的工作。
- 2月上半月**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通信中就德国小資產階級哲学家和經濟学家欧·杜林的“貶低凱里的功績的人”、“資本与劳动”等著作交換意見。
- 3月2日和13日之間** 恩格斯为德国工人的报纸“民主周报”写“資本論”第一卷书評。书評于3月21日和28日发表。
- 3月13日左右** 恩格斯在致李卜克內西的信中，为他在国会中发言批評新营业規章一事提供意見。
- 3月中** 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德国历史学家格·路·毛勒的“公社的、农戶的、乡村的和城市的結構史緒論”，以及他的其他著作，对它們給予很高的評价。
- 4月** 恩格斯写“資本論”第一卷提綱。
- 4月1—5日** 恩格斯在倫敦，适逢馬克思的女儿劳拉和拉法格結婚。
- 4月11—20日**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通信中討論有关日内瓦对建筑工人实行同盟歇业的事情。
- 4月底** 馬克思研究利潤率和剩余价值率之間的关系問題。他在給恩格斯的几封信中把自己研究这个問題的結論以及“資本論”后两卷的計劃告訴了恩格斯，并且特別詳細地叙述了第三卷的內容。
- 5月5日** 馬克思在因病长期休息之后出席了总委员会會議。
- 5月12日** 馬克思在总委员会會議上建議公布对比利时政府的正式揭露，揭发它对沙勒罗瓦罢工的煤矿工人施行血腥鎮压；总委员会一致通过馬克思的建議。
- 5月20日** 馬克思在倫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作工資問題的演讲。

- 5月22日左右—7月1日 恩格斯为英国自由資產階級杂志“双周評論”写“資本論”第一卷书評。书評未发表。
- 5月25日和29日之間 馬克思写关于改变原定在布魯塞尔召开的代表大会的地点的決議草案，改变地点的原因是比利时延长外侨法的有效期限以及比利时政府迫害协会会员；草案于6月2日在馬克思缺席的情况下为总委员会通过，并发表在6月6日的“蜂房报”上。但是，考虑到比利时支部的意見，他們认为不在布魯塞尔举行代表大会是对政府的让步，馬克思于6月16日收回自己的建議。
- 5月29日—6月15日左右 馬克思同女儿爱琳娜在曼彻斯特恩格斯的家里作客。
- 6月26日左右 馬克思給德国社会主义者威·艾希霍夫寄去詳細的指示和資料，供他写有关国际工人协会的小册子。
- 7月4日 馬克思在致齐·迈耶尔的信中請他寄給有关美国土地关系和农业情况的資料，这些資料是在“資本論”中詳細分析地租問題所必需的。
- 7月7日 馬克思在总委员会會議上建議，要对法国小資產階級民主主义者、流亡者費·皮阿以法国人支部的名义在倫敦发表的那些挑撥性和冒險性的講話表示異議。馬克思写的決議为总委员会通过，并刊载在几家比利时报纸上：7月12日的“自由报”、7月19日的“蟋蟀报”（«La Cigale»）和7月26日的“人民論壇报”上。
- 7月11日左右 馬克思写“我对弗·巴师夏的剽窃”一文，文中駁斥了德国庸俗經濟学家尤·孚赫的誣蔑，后者在他写的“資本論”第一卷书評中非难馬克思从巴师夏那里抄襲了价值量的定义。馬克思的文章未发表。
- 7月14日 馬克思在总委员会會議上发表声明，譴責不列顛政府的行为；它取消了流亡者补助金預算案項目中“流亡

者”一詞前面的“波兰的”这一形容詞。馬克思的声明被总委员会当作決議通过，并发表在7月18日的“蜂房报”上。

7月18日和30日之間 馬克思閱讀并修改艾希霍夫論述国际的著作的校样；这一著作以单行本的形式于8月出版。

7月28日 在总委员会會議討論布魯塞尔代表大会的議事日程时，馬克思作关于在資本主义制度下使用机器的后果的发言。馬克思的发言記錄发表在8月1日的“蜂房报”上。

7月29—31日 恩格斯为萊比錫的一家文艺性报纸“凉亭”(«Die Gartenlaube»)写一篇关于馬克思生平的短文，并将該文寄給庫格曼。文章未发表。

8月11日 在总委员会會議上討論布魯塞尔代表大会議事日程的过程中，馬克思提出关于在資本主义制度下使用机器的后果的決議草案，并且作了关于縮短工作日的发言。決議草案被总委员会通过。馬克思的发言記錄发表在8月22日的“蜂房报”上。

馬克思把經他校閱过的为行将在布魯塞尔召开的代表大会而发的“告倫敦的德国工人书”寄給列斯納，該文件以倫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名义发表在8月15日的“海尔曼”报上。

8月18日 全德工人联合会理事会邀請馬克思以貴宾身分出席該联合会在汉堡举行的大会，馬克思在复信中說，由于筹备布魯塞尔代表大会，在总委员会里工作繁重，因而不能接受这一邀請；他贊成把关于无产階級爭取政治自由、爭取縮短工作日和爭取工人階級的国际合作的問題列入大会的議事日程。馬克思对邀請的复信发表在8月28日的“社会民主党人报”和8月29日的“民主周报”上。

- 8月21日—8月24日左右** 馬克思在兰茲格特休息。
- 8月25日** 馬克思写的关于縮短工作日的決議草案在总委员会會議上通过。決議发表在8月29日的“蜂房报”上。
- 約8月25日—9月1日** 馬克思写总委员会向布魯塞尔代表大会作的总结报告；总委员会于9月1日一致批准总结报告，并将它用英文发表在9月9日的“泰晤士报”上，用德文发表在9月号的“先驅”杂志上，用法文发表在“比利时人民报”附刊上。
- 8月29日** 恩格斯在曼彻斯特参加了琼斯組織的工人群众大会。
- 9月初** 恩格斯陪他从德国来的母亲在奥斯坦德住了几天。旅行期間他在倫敦会見馬克思。
- 9月6—13日** 在布魯塞尔举行的国际代表大会上宣讀和討論馬克思写的总委员会总结报告；代表大会根据馬克思提出的、并由总委员会批准的草案通过了关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使用机器的后果的決議和关于縮短工作日的決議。馬克思再度被代表大会选入总委员会。
- 9月10日** 在接到列斯納寄来的关于布魯塞尔代表大会进行情况的詳細报道后，馬克思写信給他和埃卡留斯，信中指示总委员会的代表們对待蒲魯东主义者所应遵循的策略；他还建議在代表大会上通过一項決議来揭露挑撥法国和德国进行战争的人。
- 9月11日** 在布魯塞尔代表大会上德国代表們提出一項決議案，建議所有国家的工人都来学习馬克思的“資本論”，使它翻譯成各种文字，他們还指出“資本論”的作者的不可估量的功績，因为他破天荒第一次对资本主义作了科学的分析。
- 9月16日** 馬克思和恩格斯得出結論，认为必須出版一本供工人

閱讀的“資本論”通俗小冊子，这一意图沒有实现。

恩格斯声明退出席勒协会理事会，因为該协会邀請卡·福格特作演讲，而早在1859—1860年馬克思就揭发了卡·福格特是路易·波拿巴的領津貼的暗探。

9月19日—10月12日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通信中討論了与德国工人运动发展有关的問題，并且制訂了对待全德工人联合会和它的领导人施韦澤的策略。

9月22日 在总委员会會議上馬克思参加討論布魯塞尔代表大會的总结。

9月23日 馬克思在給李卜克內西的信中指出他在对待拉薩尔派的全德工人联合会时所应当遵循的策略。

9月29日 馬克思在总委员会會議上再度当选为德国通訊書記。

9月底—10月初 鉴于警察当局取締設在萊比錫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和关闭該联合会在柏林的地方分会，恩格斯写了兩篇題为“論拉薩尔派工人联合会的解散”的文章。文章发表在10月3日和10日的“民主周报”上。

9月底—11月初 馬克思和恩格斯密切地注視着在西班牙展开的革命事件。

10月初—11月初 馬克思和恩格斯閱讀約·狄慈根的“人脑活动的本质”一书手稿，手稿是狄慈根寄給馬克思的。

10月4日 馬克思写一篇关于国际工人协会和英国工人組織的关系的短文，文中指出工联和英国工人的其他一些組織都积极参加协会的活动；这篇短文揭穿了德国报纸的誹謗，它們否认英国工人組織与协会有联系。該文刊登在10月17日的“民主周报”上。

馬克思接到俄国民粹主义者尼·弗·丹尼尔遜的信，信中說，出版家H. П. 波利亚科夫有意用俄文出版

“資本論”。

- 10月6日** 馬克思在总委员会會議上参加討論由于提名奥哲尔为議會选举候选人而发出告选民书的問題。馬克思想考到提出一个工人、总委员会委員当候选人对国际的事业有利，因而支持荣克关于写这样一份告选民书的建議。馬克思受委托起草告选民书，告选民书在10月13日为总委员会通过。
- 10月7日** 馬克思在給丹尼尔遜的复信中把写“資本論”时的工作情形告訴他，并应对方的請求为俄文版第一卷寄去作者自我介紹。
- 10月13日** 馬克思在致信施韦澤答复对方請求他劝說李卜克內西停止反对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斗争时声称：作为德国通訊書記，他在施韦澤和李卜克內西的关系上只应当起公正的評判人的作用。馬克思在批判拉薩尔派的改良主义观点和有害的策略时強調說，他保留公开批判他們的观点的权利，当他认为为了工人运动的利益必須公开批判他們时，他将这样做。
- 10月14日** 馬克思以总委员会代表的身分出席工联代表會議。这次會議是为了討論有关工联的新法案而召开的。
- 10月中** 恩格斯閱讀查·达尔文的著作“家畜和农作物的变異”第一卷。
- 10月下半月** 馬克思和总委员会的委員們討論关于所謂在倫敦的法国人支部的活动問題，这个支部在皮阿的影响下变成小資产階級分子进行反总委员会的阴谋活动的工具。总委员会授权馬克思，必要时得公开地、通过报刊声明跟这个已与国际失去任何联系的集团断絕关系。
- 11月初** 馬克思研究有关地租和土地关系的文献，他非常注意

- 村社,以及在不同的时代村社在某些民族(其中包括斯拉夫各民族,特别是俄罗斯民族)的社会经济制度中的地位 and 作用。德国流亡者、政论家西·路·波克罕帮助他翻译俄文资料。
- 11月3日** 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被委托校订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决议的英译文。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和日内瓦代表大会的决议一起刊载在11月21日和12月12日的“蜂房报”上。
- 11月9日** 馬克思为英国保守派杂志“外交评论”写篇短文,题为“1866年格莱斯頓先生给英格兰银行的信是怎样使俄国得到了六百万英镑的公债”;该文于12月2日发表。
- 11月14日** 馬克思請恩格斯寄给他关于銀行在实业业务上的作用的实际材料,这是他在“資本論”中闡明这一問題所必需的材料。
- 11月23日** 馬克思給倫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寄去一封信,信中声明:鉴于协会对拉薩尔派的妥协态度,他退出协会。
- 11月底** 馬克思接到俄国革命家亚·亚·謝尔諾-索洛維也維奇从日内瓦寄来的信,建議他給国际工人协会法国支部的机关报“平等报”撰稿,該报定于1869年1月1日在日内瓦創刊;馬克思由于工作繁忙,沒有同意作固定撰稿人。
- 12月1日** 总委员会委托馬克思保管国际工人协会的文献档案。
- 12月中** 馬克思和恩格斯閱讀并在通信中討論法国历史家欧·太諾的两本书:“一八五一年十二月的巴黎”和“一八五一年十二月的外省”,这两本书揭露了路易·波拿巴政变史的若干新的詳細情节。
- 12月15日** 总委员会根据馬克思的建議拒絕了巴枯宁在日内瓦建

立的国际性团体即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請求，同盟請求把它当作独立的組織接受它加入国际。

12月18日

应馬克思的請求，恩格斯把自己对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綱領性文件的批評意見寄給馬克思，并坚决表示反对接受这一組織到国际队伍中来。

12月22日

总委員會在會議上一致贊同馬克思写的关于拒絕巴枯宁的同盟加入国际的決議草案。決議中強調，接受国际性的組織加入国际会使国际陷于瓦解。決議寄到日內瓦，同时也寄給其他国家中的国际支部。

1869

1—2月

为了写“資本論”，馬克思翻閱了1868年度的英国杂志“金融市場評論”(《Money Market Review》)和“經濟学家”，并做了大量摘录。

1月2日

在常务委員會會議上馬克思参加討論卢昂支部领导人艾·奥布里的吁請援助卢昂罢工工人的信。常务委員會委托馬克思就這個問題在总委員會會議上作报告。

1月5日

馬克思在总委員會會議上作关于卢昂的棉紡織工业的厂主宣布同盟歇业的报告；他強調說，法国厂主降低工資，力图更便宜地生产自己的商品，以便在竞争中击败英国厂主。馬克思支持給卢昂工人以物质援助的建議。

1月底

馬克思准备重版自己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他重新通讀和校訂单行本的全文，然后把它寄給在汉堡的迈斯納。

2月2日

在总委員會會議討論巴塞尔染色工人和織帶工人所遇到的同盟歇业問題时，馬克思建議向英国各工联提出給巴塞尔工人以物质援助的号召。

- 約2月4—7日** 恩格斯在倫敦馬克思處。
- 2月中** 馬克思接到德·巴普的通知，說未能为馬克思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的法文譯稿找到出版者。
- 2月13日左右—8月** 馬克思在因病休息了几个星期以后重新从事“資本論”的写作；他研究有关信貸問題和銀行流通問題的文献，閱讀約·萊·福斯特、F. E. 費勒和 K. G. 奧德曼的著作，并做了大量摘录。
- 2月16日** 总委员会根据馬克思的建議通过決議，把行将召开的巴塞尔代表大会的三項議程——关于土地所有制問題、关于信貸問題和关于普及教育問題預先通知各支部。
- 2月17日和21日之間** 由于从魯高来的德国矿工向总委员会呼吁，恩格斯应馬克思的請求用英文写了“关于薩克森煤矿工人行业协会的报告”，报告揭露了矿主們的殘暴，并指出工人联合会的当前任务。恩格斯的报告于2月23日总委员会會議上由馬克思宣讀，并获批准。报告由馬克思譯成德文，发表在3月17日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上，3月20日的“民主周报”附刊上和3月20—21日的“未来报”上。
- 3—4月** 尽管馬克思的健康情况很坏，但他在从事国际协会的繁重的組織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同时，仍繼續致力于“資本論”的写作。
- 3月初** 馬克思准备到巴黎去看望生病的女儿劳拉，但由于法国警察当局知道了他的意图，他不得不把这次旅行推迟。
- 3月4日** 恩格斯知道李卜克內西打算在“民主周报”上轉載“德国农民战争”后，写信給馬克思說，他认为把它出单行

本更合适。恩格斯建議該报轉載他的著作“普魯士軍事問題和德国工人政党”的最后一章。

3月5日

馬克思將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寫給总委員會的信以及他給同盟的復信的草稿寄給恩格斯，让他知道这事；復信认为，只有在解散同盟的組織并把它綱領中的“各階級平等”的要求改为“消灭階級”的要求的条件下，它的支部才可以加入国际。

3月9日

馬克思寫給同盟中央局的復信在总委員會會議上通过。这封復信作为通告信分發給国际各支部，使它們知道这事。

3月底—4月初

恩格斯学荷兰—弗里西安語。

3月底—4月上半月

馬克思和恩格斯密切注視德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尤其注意李卜克內西和倍倍尔领导的組織与以施韦澤为首的組織之間发生的尖銳斗争。

4月10日

馬克思在讀了英国基督教社会主义創始人之一約·馬·拉德勞在“双周評論”上发表的一篇評論拉薩尔的文章后，給該文作者寄去一本“資本論”第一卷；在附函中他要拉德勞注意“資本論”序言的注釋，其中指明这样一个事实：拉薩尔在大量抄襲馬克思的著作的同时，还歪曲馬克思的观点，而在馬克思那里却与拉薩尔的政治策略毫无共同之点。

4月13日

馬克思在总委員會會議上报告北德意志联邦国会中工人議員的活动，指出倍倍尔在发言中公开声明自己隶属于国际。馬克思要总委員會注意所謂的在倫敦的法国人支部損害国际工人协会名誉的活动；实际上这个支部是在国际之外。

4月27日

鉴于比利时罢工工人遭到殘酷鎮压，馬克思在总委員會會議上提出建議，不要局限于写呼吁书(他已經受总

- 委員會的委托起草呼吁书)，而要組織广泛的抗議运动。
- 5月初** 为了繼續写“資本論”，馬克思閱讀有关英国农业中使用童工的官方报告。
馬克思接到齐·迈耶尔寄来的詳細报道美国工人运动的情况的信。
馬克思接到移居美国的前宪章派領袖乔·哈尼的信，請馬克思寄給他一册“資本論”，他准备为它在紐約找到譯者和出版者。
- 5月4日** 馬克思在总委員會會議上宣讀他写的題为“比利时的屠杀”的呼吁书，它得到总委員會的一致贊同。呼吁书用英文印成傳单；馬克思譯的法文呼吁书刊載在5月15日的“国际报”（比利时支部的机关报）上、5月16日的“自由报”上和5月22日的“平等报”上；德文呼吁书发表在5月22日的“民主周报”上。
- 5月10日** 恩格斯寄錢給馬克思作为帮助蒙难的比利时矿工的家屬的基金；他們是在比利时政府进行鎮压的时候遇难的。
- 5月11日** 馬克思在总委員會會議上发言，揭露美国共和党領袖們的反英备战活动。总委員會一致通过馬克思提出的、号召为保卫和平而斗争的“致合众国全国劳工同盟的公开信”。該文件用英文印成傳单，同时也发表在5月15日的“蜂房报”上、5月22日的“民主周报”上，以及8月号的“先驅”杂志上。
- 5月14日左右—6月23日** 馬克思看他自己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的再版校样并写序言；該版于1869年7月底問世。
- 5月25日—6月14日** 馬克思帶小女儿爱琳娜在曼彻斯特恩格斯家里作客。
- 6月22日** 馬克思在总委員會會議上說，他收到一封萊比錫裝訂

- 工人联合会寄来的信，請求帮助他們与其他国家的裝訂工人建立联系。
- 6月23日** 馬克思参加在倫敦埃克塞特会堂举行的人数众多的工联群众集会，这次集会是为支持扩大工联权利的法案而組織的。
- 約7—8月**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受到警察当局的監視：馬克思写給恩格斯的信件最初是个別地，后来几乎全部都遭到暗中檢查。
- 7月1日** 恩格斯不再在曼彻斯特营业所里做事了，从此他把自己完全献給党的、学术的和政論的活动。
- 7月2日左右** 馬克思接到李卜克內西請他去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爱森納赫代表大会的信。馬克思謝絕了邀請，他給李卜克內西指出了独立的德国工人政党（它不同于小資产階級的人民党和拉薩尔派的宗派組織）所必須依据的一些原則。同时馬克思还建議实现德国各工人协会的紐倫堡代表大会关于加入国际的決議。
- 7月6日** 在总委员会會議上討論行将召开的巴塞尔代表大会的議程时，馬克思就土地所有制問題作了两次发言，他强调向土地集体所有制过渡是經濟的必然性。
- 7月6—12日** 馬克思佯称姓威廉斯，待在巴黎看望劳拉和保尔·拉法格。
- 7月20日** 为了給巴塞尔代表大会做准备，馬克思在总委员会會議上开展关于廢除继承权問題的辯論，并且表示，無論是从理論上还是从策略上考虑，他都反对巴枯宁的这一口号。
- 7月27日** 馬克思在致倍倍尔的信中批判約·菲·貝克尔提出的按語言原則建立国际的建議，并要他防止在爱森納赫代表大会上对这个問題可能作出的錯誤決定。

- 7月28日左右** 恩格斯对他在1868年7月底写成的介绍馬克思生平的文章进行加工。馬克思生平簡介发表在8月2日的“未来报”上和8月21日的“民主周报”附刊上。
- 8月3日** 馬克思在总委员会會議上宣讀他准备的关于继承权問題的報告。馬克思的報告被批准并以总委员会的名义提交巴塞尔代表大会。
- 8月9日和19日** 馬克思收到李卜克內西拍来的关于在爱森納赫成立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电报，并收到他的一封关于爱森納赫代表大会决定加入国际工人协会的信。
- 8月10日和17日** 由于为巴塞尔代表大会做准备，馬克思作关于在資本主义制度下普及教育問題的演讲和总结发言。他闡明了实行国家义务和免費的小学教育的必要性，以及智育同体力劳动和綜合技术教育相結合的必要性，他反对在小学中讲授宗教。
- 8月13日** 馬克思坚持推荐荣克出席木工和細木工統一工联的會議，會議上将討論出席巴塞尔代表大会的代表候选人。
- 8月18日** 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指出工人階級經濟斗争中的无产阶级团结对于克服民族偏見的意义；他在談到这点时援引了波兰革命家、总委员会委員安·扎比茨基报道的消息：波茲南的波兰建筑工人的罢工由于柏林工人的援助而胜利結束。
- 8月19日左右—9月初** 恩格斯到德国去，在住在恩格耳斯基尔亨的亲屬那里度过了几天。
- 8月底—9月初** 馬克思受总委员会委托用英文和德文写“总委员会向国际工人协会第四次年度代表大会的報告”。
- 9月4日和6日** 馬克思把他写的总委员会的总结報告和关于教育問題的決議以及关于继承权問題的決議寄給巴塞尔代表大会。

- 9月6—23日** 恩格斯偕同他的妻子莉希·白恩士，还有爱琳娜·馬克思在爱尔兰旅行。他訪問了都柏林、基拉尼和科克，到处看到黷武主义的强霸势力，看到爱尔兰居民的减少和貧困状况，这是英国在爱尔兰的殖民政策的結果。
- 9月7—11日** 在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上宣讀馬克思写的总委员会总结报告和关于继承权的报告。馬克思再度全票当选为总委员会委員。
- 約9月8—9日** 馬克思接到列斯納寄来的关于巴塞尔代表大会进程的詳細报道。
- 9月10日左右—
9月17日** 馬克思偕同女儿燕妮到汉諾威去看望庫格曼；途中他們曾在布魯治和列日逗留，在亚琛的亲戚家里住了一天，造訪了科倫，順路到济克堡去看狄慈根，从那里到波恩、美因茲，在德国社会主义者保·施土姆普弗家里住了一天，然后到維斯巴登，从那里去汉諾威。
- 9月18日左右—
10月7日** 馬克思同女儿燕妮在汉諾威庫格曼家里休息。
- 9月27日** 恩格斯在致馬克思的信中把他在爱尔兰旅行的印象告訴对方，并請馬克思与迈斯納商談他已动笔写的那本爱尔兰史的出版問題。
- 9月30日** 馬克思接見以 J. 哈曼为首的拉薩尔派五金工人工会代表团，他在談話中強調作为“社会主义的学校”的工会的意义。11月27日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机关报“人民国家报”歪曲地发表了这次談話的报道。
- 約9月底** 恩格斯准备再版自己的著作“德国农民战争”，該书第二版于1870年10月在萊比錫出版。
- 10—12月** 恩格斯写他立意要写的“爱尔兰史”。恩格斯在研讀大量历史文献的同时还研究了古爱尔兰文的第一手材

- 料，力图使被资产阶级学者们歪曲了的爱尔兰人民的历史恢复真面目。
- 10月3日** 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委員威·白拉克、列·邦霍尔斯特和賽·施皮尔在汉諾威拜訪馬克思。
- 10月8—9日** 馬克思在漢堡，在那里与迈斯納会面。
- 10月11日** 馬克思回倫敦。
- 10月12日** 恩格斯到倫敦去看馬克思。
- 10月18日** 馬克思接到翻譯家沙·凱累尔从巴黎寄来的“資本論”第一卷第二章的法文譯稿，他通讀譯稿并提出自己的意見，然后通过拉法格把它寄回巴黎。
- 10月19日** 馬克思在总委员会會議上报告德国工人运动順利发展的情况。
- 10月20日左右** 馬克思收到丹尼尔遜从彼得堡寄来的恩·弗列罗夫斯基所著“俄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一书。
- 10月24日** 馬克思参加在海德公园举行的人数众多的倫敦工人示威大会，大会的口号是：釋放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員。
- 10月26日** 馬克思在总委员会會議上发言，指出英国资产阶级报刊隱瞞和歪曲关于英国工人争取爱尔兰解放的运动的新闻。总委员会委托以馬克思为首的专门委员会起草关于爱尔兰問題的決議。
- 10月30日** 鉴于德国资产阶级报刊掀起反对巴塞尔代表大会关于把土地变为公有的決議的运动，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尖銳地批評李卜克內西和“人民国家报”所采取的犹豫不决和动搖不定的立場；“人民国家报”向小资产阶级的人民党让步，沒有广泛宣傳巴塞尔代表大会的各项決議，并且不止一次地断言：土地国有化的要求对

- 英国十分迫切,但与德国却无关。馬克思強調說,在德国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埋葬大土地所有制。
- 10月底** 馬克思为了要閱讀弗列罗夫斯基的“俄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一书和了解尼·加·車尔尼雪夫斯基的經濟著作,开始学俄文。
- 約1869年11月—
1870年1月9日** 馬克思讀亞·伊·赫尔岑的“往事与回忆”一书的第一部分——“監獄与流放”。
- 11月** 恩格斯应馬克思(这期間他正在研究地租問題)的請求閱讀美国庸俗經濟学家亨·查·凱里的“社会科学原理”一书,特別注意他的地租理論。恩格斯把自己讀后的意見写信告訴馬克思。
- 11月1日** 恩格斯讀了邦霍尔斯特致馬克思的信(信中請求对于在德国农民中間进行的宣傳工作提出建議)之后,写信給馬克思,談到巴塞尔代表大会的各项決議对社会民主工党在农民問題上制定正确的策略的巨大意义,并在具体分析的基础上表述了对不同类型的农民加以区别对待的必要性。
- 11月9日** 在总委员会會議上宣讀因病缺席的馬克思的一封信,該信建議討論英国政府和英国工人在爱尔兰問題上的立場;总委员会决定把馬克思提出的問題列入下次會議的議程。
- 11月14日左右** 馬克思校閱一封公开信,內容是总委员会創建的英国工人組織——土地和劳动同盟的綱領。
- 11月16、23和30日** 馬克思出席总委员会为了爱尔兰問題而举行的几次會議,他揭开了辯論,并在自己的发言中揭露格萊斯頓政府对待被囚禁的爱尔兰人的政策;他还提出一項支持要求赦免爱尔兰革命者的运动的決議草案。他在討論过程中曾两次发言尖銳地批評总委员会的英国委員、

- 工联改良派領袖托·詹·莫特斯赫德和奥哲尔的立場,因为他們为格萊斯頓的政策辯解。決議被通过,并分发给国际各支部,同时也分发给英国各工联。決議发表于11月21日的“雷諾新聞”、11月27日的“人民国家报”、12月12日的“国际报”和其他报纸。
- 12月3日** 馬克思在致工联主义領袖、总委员会委員罗·阿普耳加思的信中闡明国际历次代表大会关于把土地变为公有的決議。
- 12月10日** 馬克思通知恩格斯說,凱累尔为了准备馬克思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法譯文,中断了“資本論”第一卷的法文翻譯工作。
- 12月14日** 在总委员会會議上討論日內瓦报纸“平等报”(巴枯宁派在該报編輯部中占多数)对总委员会的攻击时,馬克思正式宣布:李卜克內西是国际工人协会的會員,而巴枯宁分子所袒护的施韦澤并未加入协会,并且不承认总委员会在他与李卜克內西的冲突中作为仲裁人。
- 12月17日左右** 关于总委员会对巴枯宁的同盟的破坏活动預先采取措施一事,馬克思寄給德·巴普一份詳細报道,让他通知国际的比利时联合会委员会。
- 12月底—1870年1月初** 恩格斯在巴門的亲戚家里作客,在去德国时会順路到倫敦看望馬克思。

1870

- 1—4月** 恩格斯繼續写“爱尔兰史”,研究古爱尔兰法律,閱讀爱·威克菲尔德、約·帕·普兰德加斯特、約·尼·墨菲等人的著作。
- 1月1日左右** 馬克思受总委员会委托写給瑞士罗曼語区联合会委員

- 会一封通告信，信中駁斥了巴枯宁派在“平等报”上对总委员会提出的誹謗性指控。馬克思闡明爱尔兰人民民族解放斗争的国际意义，以及这一斗争与英国的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的关系。通告信被批准，并分发给国际各支部。
- 1月6日** 恩格斯从德国回到曼彻斯特。
- 1月8日左右** 馬克思写信給德·巴普，詳細报道国际的活动情况，寄給他一份1月1日的通告信，并将英国工人、工联活动家、总委员会委員罗·肖去世的消息告訴他；馬克思作为总委员会代表团的一員参加了他的葬礼。馬克思的信中談到肖的那一部分发表在1月16日的“国际报”上。
- 1月15日左右** 馬克思收到汉諾威机械工人联合会寄来的信，請求协助他們与英国机械工人建立联系；由于馬克思生病，荣克按他的委托把这事通知总委员会委員們，在总委员会會議上通过了关于采取措施使英国机械工人和德国机械工人建立联系的决定。
- 1月中—3月初** 馬克思患病。
- 1月23日** 常务委员会例会在馬克思的住所举行。
- 1月24日** 馬克思在致德·巴普的信中詳細說明巴枯宁派在国际中的分裂活动。由于写“資本論”，馬克思还請对方介紹他一些关于比利时的农业和土地所有制的著作。
- 2月8日** 恩格斯給生产合作社的組織者、佐林根的工人以物质支持。
- 2月11日左右** 恩格斯为自己的著作“德国农民战争”德文第二版写序言，他在序言中揭示了作为无产阶级的同盟軍的农民的作用，并指出无产阶级在农民問題上的策略。恩

- 格斯將馬克思看過並且贊同的序言寄給李卜克內西。序言首次發表在4月2日和6日的“人民國家報”上。
- 2月21日** 馬克思寄給“國際報”一些揭露英國政府殘酷對待愛爾蘭民族解放運動的參加者的材料。這些材料以文章的形式於2月27日和3月6日刊登出來，題為“英國政府和被囚禁的芬尼亞社社員”。
- 2月27日—4月19日** 在馬克思的參與下，他的大女兒燕妮為法國左派共和黨的報紙“馬賽曲報”寫了一組專論愛爾蘭問題並揭露英國獄吏殘酷對待被囚禁的芬尼亞社社員的文章。從3月1日起到4月24日止這組文章在報上連載。
- 3—6月** 恩格斯密切注視由於格萊斯頓政府提出對愛爾蘭的高壓法案和土地法案而在下院和上院引起的關於愛爾蘭問題的辯論。
- 3月10日左右** 馬克思重新執筆寫作“資本論”。
- 3月15日** 馬克思在因病長時間休息之後參加總委員會會議，會上討論接納巴黎的實證主義無產者哲學小組加入國際工人協會的問題。
- 3月16日** 馬克思為自己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第二版寫的序言發表在“人民國家報”上。
- 3月24日** 馬克思通知不久前在日內瓦建立的俄國支部說，總委員會已決定接受它加入國際，他自己也同意擔任俄國支部駐總委員會的代表；馬克思特別提到車爾尼雪夫斯基和弗列羅夫斯基的著作對俄國社會主義運動發展的意義。馬克思的復信於1870年4月15日發表在俄國支部的機關報“人民事業”上。
- 馬克思提醒德國社會民主工黨委員會，必須按國際工人協會章程的規定每3個月寄給總委員會一份工人運動情況的工作報告。

- 3月28日** 馬克思以德国通訊書記的身分通过庫格曼給社会民主工党不倫瑞克委員會寄去一份“机密通知”，内容有1870年1月1日的通告信“总委員會致瑞士罗曼語区联合会委員會”，以及关于巴枯宁派在“国际”中的破坏活动的詳細通报和总委員會对此所采取的措施。
- 4月9日** 馬克思在写給在美国的国际德国人支部的领导人齐·迈耶尔和奥·福格特的信中闡明国际在爱尔兰問題上的立場，并指示他們必須在美国工人中正确說明这一立場。
- 4月12日** 馬克思出席总委員會會議，会上討論了法国克列索矿工罢工参加者受到殘酷鎮压的問題；总委員會委托馬克思和欧·杜邦为这次罢工事件起草一份呼吁书。
- 約4月19—27日** 馬克思两次去探望患重病的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卡·沙佩尔。沙佩尔死后，馬克思向恩格斯征詢材料为死者写悼文。
- 4月26日** 馬克思在总委員會會議上发言，建議国际工人协会与业已变为資產階級報紙的“蜂房报”断絕关系。建議被一致通过，总委員會委托馬克思就這個問題写一份決議。馬克思写的決議以声明的形式发表在5月11日的“人民国家报”上，随后又发表在国际的其他許多机关刊物上。
- 4月28日** 恩格斯在致白拉克的信中指出德国工人在国会中有一批自己的代表这一事实的意义，并指出今后必須把尽可能多的工人議員选入国会。恩格斯的信发表在5月14日的“人民国家报”上。
- 4月29日** 馬克思收到从日内瓦寄来的“共产党宣言”的最早的俄文譯本，它是“钟声”印刷厂出版的。馬克思寄了一册給恩格斯。

- 5月—7月上半月** 恩格斯写“爱尔兰史”。他原来计划写四章，但只来得及写完第一章以及第二章的一部分。普法战争爆发，巴黎公社，以及国际中浩繁的实际工作使恩格斯未能完成他的著作。
- 5月3日** 在总委员会会议上批准马克思提出的关于国际工人协会法国支部成员遭受迫害的呼吁书。呼吁书用英文印成单张的传单，并于5月4日发表在英国自由党的报纸“每日电讯报”上；作者译的法译文刊载在5月7日的“马赛曲报”上，以及其他的机关报刊上。
- 5月4日左右** 马克思坚决劝告李卜克内西在“人民国家报”上对巴枯宁及其追随者采取更明确的态度。
- 5月10日** 马克思起草总委员会关于所谓的在伦敦的法国人支部的决议草案，草案中否认这个以国际的名义进行活动的小资产阶级流亡者集团。由于马克思生病，决议草案由荣克在总委员会会议上宣读，并获一致批准。决议公布在5月14日的“蜂房报”上、5月21日的“平等报”上、5月21日的“人民国家报”上以及其他报纸上。
- 5月10—15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通信中讨论行将召开的国际代表大会的地点问题。
- 5月17日** 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表示赞成采纳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提出的关于在美因兹召开应届国际工人协会代表大会的建议，并就这一问题提出决议案。获一致通过的决议刊载在5月25日的“人民国家报”上和5月28日的“平等报”上，以及其他的机关报刊上。
- 5月19日** 恩格斯在致马克思的信中评价法国统治集团为了巩固摇摇欲坠的第二帝国制度而进行的全民投票的结果时，大大赞扬了法国工人的行动，因为他们积极地表达了对波拿巴政体的不满。

- 5月23日左右 馬克思收到左尔格寄来的关于美国工人状况的統計材料。
- 5月23日—6月23日左右 馬克思帶女儿爱琳娜在曼彻斯特恩格斯家里作客。
- 6月14日 馬克思和恩格斯就行将在美因茲召开的国际工人协会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致函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信中預告对方防范拉薩尔派破坏代表大会的工作的企图。該信发表在1872年6月26日的“人民国家报”上。
- 6月27日 馬克思致函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坚决反对李卜克内西提出的关于延期召开应于1870年9月举行的国际代表大会的建議。
- 6月28日 馬克思在总委员会會議上发言，談瑞士罗曼語区联合会的分裂，并建議作出一項決議，支持原先的联合会委员会反对巴枯宁派的斗争。決議获一致通过，并发表在7月23日的“团结报”(«La Solidarité»)上和7月24日的“米拉波”报上。
- 7月3—4日 由巴黎来的俄国革命家格·亚·洛帕廷，带着拉法格的介紹信，曾两次拜訪馬克思；他向馬克思报告俄国的革命运动，并告訴他車尔尼雪夫斯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的事。
- 7月5日左右 恩格斯应馬克思的女儿燕妮的請求为爱尔兰歌曲集“爱尔兰竖琴”写一篇序言性的短文。
- 7月5日 馬克思受总委员会委托起草告欧洲和美国工人书，号召他們支持与企业主作斗争的日内瓦建筑工人。該文件以“日内瓦对建筑工人实行的同盟歇业”为題用英、德、法文印成单張的傳单。
- 7月14日 馬克思根据总委员会的决定写“給各支部的机密通

知”，征詢各支部对迁移总委员会駐在地的意見。通知分发给各支部，各支部表示贊成总委员会仍旧設在倫敦。

馬克思把将在美因茲召开的代表大会的議程寄給柴克。議程于7月間用英文印成单張傳单，并公布在7月31日的“自由报”、8月13日的“人民国家报”，以及国际的其他机关报上。

人名索引

二 画

丁特尔(Dinter, J. G.)——德国矿工, 茨威考矿工联合会领导人。——第 390 頁。

三 画

土尔格齐——見托尔吉耳斯。

大仲馬, 亚历山大(Dumas, Alexandre (père) 1803—1870)——著名的法国作家。——第 680 頁。

万薩德, 比埃尔·德尼(Vinçard, Pierre-Denis 1820—1882)——法国工人政論家, 1848 年革命的参加者, 参加了卢森堡委员会; 合作运动的积极活动家, 写有許多关于工人阶级状况的著作, 国际会员。——第 90、91 頁。

万丹胡亭, 阿尔丰斯(Vandenhouten, Alphonse)——比利时工人运动活动家, 职业是彩画工人, 国际比利时支部創建人之一(1865), 国际比利时联合会委员会委員, 对外联络書記和沙勒罗瓦煤田各城的通訊員。——第 626、627 頁。

四 画

尤尔, 安得魯(Ure, Andrew 1778—1857)——英国化学家, 庸俗經濟学家, 写有許多工业經濟学方面的著作。——

第 11、121、307 頁。

毛奇, 赫尔穆特·卡尔·伯恩哈特(Moltke, Helmut Karl Bernhard 1800—1891)——普魯士將軍, 1871 年起为元帅, 反动的軍事活动家和著作家, 普魯士軍国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思想家之一; 曾任普魯士总參謀长(1857—1871)和帝国总參謀长(1871—1888)。——第 190 頁。

方塔納, 朱澤培(Fontana, Giuseppe P.)——意大利 1848 年革命的参加者, 后流亡国外, 受馬志尼影响的倫敦意大利工人組織——共进会的领导人之一, 国际总委员会委員(1864 年 10 月—1865 年), 意大利通訊書記(1865)。——第 22 頁。

扎比茨基, 安东尼(Zabicki, Antoni 1810 左右—1871)——波兰民族解放运动活动家, 职业为排字工人; 1831 年后从波兰流亡国外, 匈牙利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1851 年起侨居英国, 倫敦民主派兄弟会领导人之一, 1863 年起出版“自由之声报”, 波兰全国委员会書記, 国际总委员会委員(1866—1871), 波兰通訊書記(1866—1871)。——第 247、400、403、608、634 頁。

无地約翰(John Lackland 1167 左右—1216)——英国国王(1199—1216)。——第 556 頁。

孔狄亚克, 埃蒂耶納·博諾 (Condillac, Étienne-Bonnot de 1715—1780)——法国經濟学家和自然神論哲学家, 感觉論者; 他认为, 物的价值是由它的有用性决定的。——第 291、331 頁。

不来梅的亚当 (Adam von Bremen 約死于 1085 年)——中世紀的編年史家, “汉堡大主教傳”的作者。——第 571 頁。

比耳斯, 艾德蒙 (Beales, Edmond 1803—1881)——英国法学家, 資产階級激进派; 英国波兰独立全国同盟主席, 英国奴隶解放协会会员, 美国内战期間支持北部; 1865—1869 年为改革同盟主席。——第 106 頁。

比斯康普, 埃拉尔特 (Biskamp, Elard)——德國民主主义者, 新聞工作者, 曾参加德国 1848—1849 年革命, 革命失敗后流亡国外, 曾参加倫敦的德国流亡者办的刊物“人民报”編輯部, 該报在馬克思直接参与下出版。——第 376 頁。

文克海姆, 貝拉 (Wenckheim, Béla 1811—1879)——匈牙利国家活动家, 自由党人, 曾任內务大臣 (1867—1869)。——第 428 頁。

文迪施格雷茨, 阿尔弗勒德 (Windischgrätz, Alfred 1787—1862)——公爵, 奧地利元帅; 1848 年指揮鎮压布拉格和維也納起义; 1848—1849 年率領奧地利軍隊, 鎮压匈牙利革命。——第 227 頁。

韦斯顿, 約翰 (Weston, John)——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职业是木匠, 后为厂主; 欧文主义者, 1864 年 9 月 28 日圣馬丁堂會議的参加者, 国际总委员会委員 (1864—1872), 积极参加总委员会的工作, 1865 年倫敦代表會議代表, 不列

顛联合会委员会委員, 曾参加改革同盟执行委员会, 土地和劳动同盟的领导人之一。——第 22、110、113—117、120、121、124—126、128—133、167、246、375、403、493、649、663 頁。

韦济尼埃, 比埃尔 (Vésinier, Pierre 1826—1902)——法国小資产階級政論家, 流亡者, 在倫敦的法国人支部組織者之一, 曾参加 1865 年国际倫敦代表會議的工作, 因誹謗总委员会, 根据布鲁塞尔代表大会 (1868) 的決議被开除出国际; 巴黎公社委員, 公社失敗后在倫敦出版“联盟报”, 为世界联盟委员会委員, 該組織反对馬克思和国际总委员会。——第 586、588、592、596 頁。

巴拉, 茹尔 (Bara, Jules 1835—1900)——比利时国家活动家, 自由党人, 曾任司法大臣 (1865—1870、1878—1884)。——第 362 頁。

巴頓, 約翰 (Barton, John 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英国經濟学家, 資产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学的代表人物。——第 168 頁。

巴特, 伊薩克 (Butt, Isaac 1813—1879)——爱尔兰律师和政治活动家, 自由党人, 議會議員; 六十年代为被囚禁的爱尔兰芬尼亚社社員的辯护人; 七十年代是爱尔兰自治运动 (Home-Rule) 的組織者之一。——第 433、665、667 頁。

巴雷特, 迈克尔 (Barrett, Michael 死于 1868 年)——爱尔兰芬尼亚社社員, 工人, 被英国当局处死。——第 691 頁。

巴克萊, 詹姆斯 (Buckley, James)——英国工联主义者, 国际总委员会委員 (1864 年 11 月—1869 年) 和改革同盟盟員。——第 22、110、375、403 頁。

巴师夏, 弗雷德里克 (Bastiat, Frédéric

1801—1850)——法国庸俗經濟学家, 資產階級社会階級利益調和論的鼓吹者。——第 35、103、233、353、354 頁。

巴枯宁, 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維奇 (Бакунин, 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14—1876)——俄国革命家和政論家, 德国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民粹主义者, 无政府主义思想家之一, 在国际中是馬克思主义的凶恶敌人; 由于进行分裂活动, 在 1872 年的海牙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出国际。——第 465—469、477、478、702 頁。

五 画

包令, 約翰 (Bowring, John 1792—1872)——英国政治活动家, 語言学家和文学家, 边沁的信徒, 自由貿易派; 五十年代是英国在远东实施殖民政策的高级官員。——第 584 頁。

古諾, 沙尔·弗朗斯瓦 (Gounod, Charles-François 1818—1893)——杰出的法国作曲家。——第 584 頁。

左尔格, 弗里德里希·阿道夫 (Sorge, Friedrich Adolf 1828—1906)——国际和美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卓越活动家, 1848 年革命的参加者, 国际的积极会员之一, 美国各支部的組織者, 海牙代表大会 (1872) 代表, 紐約总委员会委員和总書記 (1872—1874), 馬克思主义的积极宣傳家;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 632 頁。

叶卡特林娜二世 (Екатерина II 1729—1796)——俄国女皇 (1762—1796)。——第 181、227 頁。

兰伯特, 約翰 (Lambert, John 1619—1683)——十七世紀英国資產階級革命时期議會軍的將軍, 参加了跟王党軍

队作战的历次重要战役和出征苏格兰, 1652 年被任命为爱尔兰总督。——第 508 頁。

兰盖, 西蒙·尼古拉·昂利 (Linguet, Simon-Nicolas-Henri 1736—1794)——法国律师, 政論家, 历史学家和經濟学家, 反对重农学派, 对資產階級的自由和所有制給以深刻的批判。——第 36 頁。

卢梭, 让·雅克 (Rousseau, Jean-Jacques 1712—1778)——杰出的法国启蒙运动者, 民主主义者, 小資產階級思想家。——第 35、36、181 頁。

卢格, 阿尔諾德 (Ruge, Arnold 1802—1880)——德国政論家, 青年黑格尔分子, 資產階級激进派, 1848 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議會議員, 屬於左派; 五十年代是在英国的德国小資產階級流亡者領袖之一; 1866 年后为民族自由党人。——第 409 頁。

圣西門, 昂利 (Saint-Simon, Henri 1760—1825)——偉大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第 29、263、415、651 頁。

圣貝尔納——見克萊沃的貝尔納。

圣热罗尼莫 (Hieronymus, Sophronius Eusebius (St. Jerome) 340 左右—420)——神学家, 生在达尔馬威亚, 曾把聖經譯成拉丁文。——第 561 頁。

尼祿 (Nero 37—68)——羅馬皇帝 (54—68)。——第 9 頁。

尼古拉一世 (Николай I 1796—1855)——俄国皇帝 (1825—1855)。——第 224、225、687 頁。

瓦瑟尔 (Vasseur, T. 1838 左右—1868)——法国白铁工人, 国际馬賽和菲沃支部的組織者, 总委员会馬賽通訊員, 1867 年国际洛桑代表大会代表。——

- 第 624 頁。
- 瓦尔兰, 路易·欧仁 (Varlin, Louis-Eugène 1839—1871) ——卓越的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装订工人, 左派蒲鲁东主义者, 在法国的国际领导人之一, 国际伦敦代表会议 (1865)、日内瓦代表大会 (1866) 和巴塞尔代表大会 (1869) 代表, 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 巴黎公社委员; 1871 年 5 月 28 日被凡尔赛分子枪杀。——第 592 頁。
- 瓦耳蒂耶 (Valltier, A.)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1865), 法国人。——第 110 頁。
- 汉森 (Hansen, N. P.)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1864 年 12 月—1867 年), 国际伦敦代表会议 (1865) 的参加者, 丹麦通讯书记 (1866), 丹麦和荷兰通讯书记 (1867); 丹麦人。——第 22、110、608、634 頁。
- 汉泽曼, 大卫 (Hansemann, David 1790—1864) ——德国大资本家, 莱茵省自由资产阶级领袖之一; 1848 年 3—9 月任普鲁士财政大臣, 实施反动派妥协的贩卖政策。——第 386 頁。
- 汉考克, 尤·纳尔逊 (Hancock, U. Nelson) ——爱尔兰法学家, 同奥马洪尼出版了两卷法律汇编“古制全书”。——第 553 頁。
- 汉美尔, 梅雷迪思 (Hanmer, Meredith 1543—1604) ——英国神甫和历史学家, “爱尔兰编年史”一书的作者。——第 557 頁。
- 加尔 (Gallus (Gall) 約 550—645) ——基督教传教士, 生在爱尔兰。——第 563 頁。
- 加德纳, 罗伯特 (Gardner, Robert) ——英国厂主, 1844 年将开设在普雷斯頓的各企业的工作日从 12 小时减到 11 小时。——第 320 頁。
- 加里波第, 朱泽培 (Garibaldi, Giuseppe 1807—1882) ——意大利革命家, 民主主义者, 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 1848 年在对奥战争中率领志愿军团站在皮蒙特军方面奋勇作战; 1849 年 4—7 月是罗马共和国保卫战的主要组织者, 五十至六十年代领导意大利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和全国统一的斗争。——第 203、456 頁。
- 加布倫茨, 路德維希·卡尔·威廉 (Gablentz, Ludwig Karl Wilhelm 1814—1874) ——奥地利将军, 曾参加镇压 1848—1849 年意大利和匈牙利革命, 1859 年奥意法战争和 1866 年普奥战争的参加者。——第 209 頁。
- 皮琴 (Pidgeon, W.) ——英国工联主义者, 面包工人, 曾参加 1864 年 9 月 28 日圣马丁堂会议,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1864) 和改革同盟盟员。——第 22 頁。
- 皮尔, 罗伯特 (Peel, Robert 1788—1850) ——英国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温和派 (人称皮尔派, 即因他而得名) 的领袖, 曾任内务大臣 (1822—1827 和 1828—1830), 首相 (1834—1835 和 1841—1846); 在自由党人的支持下废除了谷物法 (1846)。——第 377—379、538、640 頁。
- 皮尔美, 埃多尔 (Pirmez, Eudore 1830—1890) ——比利时国家活动家, 自由党人, 议会议员 (1857—1890), 曾任内务大臣 (1868—1870), 国家银行行长。——第 396 頁。
- 皮阿, 费里克斯 (Pyat, Félix 1810—1889) ——法国政论家, 剧作家和政治活动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参加

- 过 1848 年革命, 1849 年起侨居瑞士、比利时和英国, 反对独立的工人运动; 有许多年利用在伦敦的法国人支部誹謗馬克思和国际; 巴黎公社委員。——第 352 頁。
- 皮哥特, 理查 (Pigott, Richard 1828 左右—1889) ——爱尔兰资产阶级政論家, “爱尔兰人报” 的出版者 (1865—1879), 芬尼亚社的拥护者, 八十年代投靠英国政府。——第 671 頁。
- 皮特里, 乔治 (Petrie, George 1789—1866) ——爱尔兰学者, 考古学家, 爱尔兰皇家学会会员, 写有许多古爱尔兰建筑学方面的著作, 1852 年起为政府古爱尔兰法律編譯出版委员会委員。——第 547、553 頁。
- 卡托 (小卡托) (馬可·波尔齐烏斯·卡托) (Marcus Porcius Cato Minor 公元前 95—46) ——罗马国家活动家, 貴族共和派領袖。——第 26 頁。
- 卡貝, 埃蒂耶納 (Cabet, Étienne 1788—1856) ——法国政論家, 空想的和平共产主义的卓越代表人物, “伊加利亚旅行記” 一书的作者。——第 34 頁。
- 卡特, 詹姆士 (Carter, James) ——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职业是理发师, 改革同盟盟員, 国际总委员会委員 (1864 年 10 月—1867 年) 和意大利通訊書記 (1866—1867); 国际倫敦代表會議 (1865)、日内瓦代表大会 (1866) 和洛桑代表大会 (1867) 的参加者。——第 22、110、608、634 頁。
- 卡罗兰或奧卡罗兰, 托尔洛 (Carolan or O'Carolan, Turlogh 1670—1738) ——爱尔兰彈唱詩人, 作有许多民歌。——第 574 頁。
- 卡本特尔, 威廉·本杰明 (Carpenter, William Benjamin 1813—1885) ——英国自然科学家和生理学家。——第 584 頁。
- 卡拉姆津, 尼古拉·米哈伊洛維奇 (Карамзин, Николай Михайлович 1766—1826) ——俄国杰出的历史学家和作家, 亚历山大一世的御用历史編纂家。——第 226 頁。
- 卡斯尔里子爵, 罗伯特·斯图亚特 (Castlereagh, Robert Stewart, Viscount 1769—1822) ——英国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人, 1798 年殘酷地鎮压了爱尔兰起义, 曾任爱尔兰事务大臣 (1799—1801), 陸軍和殖民大臣 (1805—1806、1807—1809), 外交大臣 (1812—1822)。——第 505、668、688 頁。
- 弗兰德亲王——見菲力浦亲王。
- 弗列罗夫斯基, 恩·(Флеровский, Н.) ——見別尔維, 瓦西里·瓦西里也維奇。
- 弗利斯, 爱德华 (Flies, Eduard 1802—1886) ——普魯士將軍, 1866 年普奧战争时任騎兵旅旅长, 后为騎兵师师长。——第 207 頁。
- 弗利特伍德, 查理 (Fleetwood, Charles 死于 1692 年) ——十七世紀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議会軍的將軍, 1652 年起任爱尔兰英軍总司令, 爱尔兰总督 (1654—1657)。——第 508 頁。
- 弗里多林 (Fridolin 六世紀) ——爱尔兰傳教士, 在上萊茵阿勒曼尼人中間傳布基督教。——第 563 頁。
- 弗里布尔 (Fribourg, E. E.) ——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职业是雕刻工, 后为商人; 右派蒲魯东主义者, 国际巴黎支部的領導人之一, 倫敦代表會議 (1865) 和日内瓦代表大会 (1866) 代表, 1871 年

- 出版敌視国际和巴黎公社的“国际工人协会”一书。——第 90、92、587、590、592 頁。
- 弗里芒特, 約翰·查理 (Frémont, John Charles 1813—1890)——美国旅行家和政治活动家, 屬于共和党左翼; 1856 年大选的总统候选人; 美国内战时为密苏里州和西弗吉尼亚州的北軍指揮官。——第 25 頁。
- 弗里德里希-威廉 (Friedrich-Wilhelm 1831—1888)——普魯士王儲, 1888 年为普魯士国王和德国皇帝, 称弗里德里希三世; 1866 年普奧战争时任普魯士第二軍团司令。——第 190、204、208、209 頁。
-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 (Friedrich-Wilhelm III 1770—1840)——普魯士国王 (1797—1840)。——第 190 頁。
-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 (Friedrich-Wilhelm IV 1795—1861)——普魯士国王 (1840—1861)。——第 408 頁。
- 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 (Friedrich-Karl, Prinz 1828—1885)——普魯士將軍, 后为元帅, 在 1864 年丹麦战争中为普軍司令, 后为联軍司令; 1866 年普奧战争中任普魯士第一軍团司令。——第 191、205、208、209 頁。
- 布恩, 馬丁·詹姆斯 (Boon, Martin James)——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职业是机械工; 奧勃萊恩的社会改良主义观点的信徒, 国际总委员会委員 (1869—1872), 土地和劳动同盟書記, 不列顛联合会委员会委員 (1872)。——第 403、663 頁。
- 布瓦洛, 尼古拉 (Boileau, Nicolas 1636—1711)——著名的法国詩人和古典主义理論家。——第 683 頁。
- 布林德, 卡尔 (Blind, Karl 1826—1907)——德国新聞工作者, 小資产階級民主主义者, 1848—1849 年巴登革命运动的参加者; 五十年代为倫敦德国小資产階級流亡者的領袖之一, 六十年代起是民族自由党人。——第 23—27 頁。
- 布阿吉尔貝尔, 比埃尔 (Boisguillebert, Pierre 1646—1714)——法国經濟学家, 重农学派的先驅, 法国資产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学的創始人。——第 286 頁。
- 布賴特施韦特, 奧托·路德維希 (Breitschwert, Otto Ludwig 1836—1890) (笔名路·奧托 L. Otto)——德国新聞工作者, 国际总委员会委員 (1864)。——第 22 頁。
- 布罗达尔——見布罗迪尔。
- 布罗迪尔 (Brodhir 死于 1014 年)——諾曼海盜, 在 1014 年克隆塔尔弗会战中杀死了爱尔兰国王布里安·博卢。——第 567—570 頁。
- 布卢阿代尔——見布罗迪尔。
- 布魯尔, 約翰·謝倫 (Brewer, John Sherren 1810—1879)——英国历史学家和語文学家, 倫敦皇家学院教授。——第 556 頁。
- 布朗, 約翰 (Brown, John 1800—1859)——美国农民, 廢奴运动革命派著名活动家之一; 堪薩斯反奴隶主武装斗争 (1854—1856) 的积极参加者; 1859 年打算在弗吉尼亚州发动黑奴起义, 被送交法院, 后被处死。——第 499 頁。
- 布朗納, 爱德华 (Bronner, Eduard)——德国医生, 小資产階級民主主义者, 1849 年巴登制宪議会议員, 后侨居英国。——第 24 頁。
- 布里安·博卢 (Brian Boru (Boromhe)

926—1014) ——爱尔兰国王(1001—1014), 1014年在克隆塔爾弗會戰中取得了對諾曼人的最後勝利。——第566—570、574頁。

布里索, 雅克·比埃爾(Brissot, Jacques-Pierre 1754—1793) ——十八世紀末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的著名活動家, 革命初期是雅各賓俱樂部的會員, 後為吉倫特派的首領和理論家。——第30頁。

布里斯美, 德吉烈(Brismée, Désiré 1823—1888) ——比利時民主運動和工人運動活動家, 職業是印刷工人, 蒲魯東主義者, 後為巴枯寧主義者, 國際比利時支部創始人之一(1865), 1869年起為比利時總委員會委員, 國際布魯塞爾代表大會(1868)代表, 巴塞爾代表大會(1869)副主席, 海牙代表大會(1872)代表, 後為比利時工人黨執行委員會委員。——第627頁。

布萊特, 約翰(Bright, John 1811—1889) ——英國廠主, 資產階級政治活動家, 自由貿易派首領和反谷物法同盟創始人之一; 自六十年代初起為自由黨左翼首領; 歷任自由黨內閣各部大臣。——第450、458、635、664、667、688頁。

布萊克(Blake, J. A.) ——英國政治活動家, 議會議員, 自由黨人。——第689頁。

布萊克本, 弗蘭西斯(Blackburne, Francis 1782—1867) ——愛爾蘭法學家和國家活動家, 擔任英國愛爾蘭司法行政機構中的重要職務。——第514頁。

布萊克莫爾(Blackmore or Blockmoor) ——1864年9月28日聖馬丁堂會議的參加者, 國際總委員會委員(1864—1865)。——第22頁。

六 画

喬治三世(George III 1738—1820) ——英國國王(1760—1820)。——第510頁。

朱克斯, 約瑟夫·比特(Jukes, Joseph Beete 1811—1869) ——英國地質學家, 1850—1869年間領導在愛爾蘭進行的地質調查。——第526、529、530頁。

列斯納, 弗里德里希(Leßner, Friedrich 1825—1910) ——德國和國際工人運動的著名活動家, 職業是裁縫; 共產主義者同盟盟員, 1848—1849年革命的參加者, 1856年起僑居倫敦, 倫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協會會員, 國際總委員會委員(1864年11月—1872年), 國際倫敦代表會議(1865)、洛桑代表大會(1867)、布魯塞爾代表大會(1868)、巴塞爾代表大會(1869)和海牙代表大會(1872)的參加者, 不列顛聯合會委員會委員; 在國際里為馬克思路線積極鬥爭, 後為英國獨立工黨的創始人之一;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戰友。——第22、110、403頁。

伏爾泰, 弗朗斯瓦·瑪麗(Voltaire, François-Marie 1694—1778) (真姓為阿魯埃 Arouet) ——法國自然神論哲學家, 諷刺作家, 歷史學家, 十八世紀資產階級啟蒙運動的著名代表人物, 反對專制制度和天主教。——第36、181、339頁。

吉約姆, 詹姆斯(Guillaume, James 1844—1916) ——瑞士教師, 無政府主義者, 巴枯寧的擁護者, 國際會員, 國際日內瓦代表大會(1866)、洛桑代表大會(1867)、巴塞爾代表大會(1869)和海牙

- 代表大会(1872)的参加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組織者之一,“进步报”、“团结报”和“汝拉联合会简报”的編輯;由于进行分裂活动在海牙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出国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年代里是社会沙文主义者。——第467、469頁。
- 华金,爱德华·威廉(Watkin, Edward William 1819—1901)——英国工业家,議會議員,自由党人。——第378頁。
- 华尔頓,阿尔弗勒德·阿·(Walton, Alfred A. 生于1816年)——英国民主运动活动家,建筑师,改革同盟盟員,全国改革同盟主席,国际总委员会委員(1867—1870),洛桑代表大会(1867)代表。——第375頁。
- 米尔納,乔治(Milner, George)——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爱尔兰人,奥勃莱恩的社会改良主义观点的信徒;全国改革同盟、土地和劳动同盟盟員,国际总委员会委員(1868—1872),1871年倫敦代表會議代表,1872年秋起为不列顛联合会委员会委員。——第375、403、643、648、655頁。
- 米格尔,托馬斯·弗兰西斯(Meagher, Thomas Francis 1823—1867)——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活动家,爱尔兰同盟創始人之一(1847);1848年由于参加起义准备工作被捕,被判处終身苦役,1852年逃到美国;美国内战时期(1861—1865)为爱尔兰志願兵旅长,站在北軍方面作战。——第513、522、638頁。
- 安(Ann 1665—1714)——英国女王(1702—1714)。——第503、509、510、637頁。
- 安德伍德,托馬斯·納尔逊(Underwood, Thomas Nelson)——爱尔兰社会活动家,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員的辯护人。——第678頁。
- 考布,卡尔(Kaub, Karl)——侨居倫敦的德国工人,1865年后侨居巴黎;倫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会员,国际总委员会委員(1864年11月—1865年),1865年倫敦代表會議的参加者。——第22、110頁。
- 考萊伯爵,亨利·理查·查理·威尔斯里(Cowley, Henry Richard Charles Wellesley, Earl 1804—1884)——英国外交家,駐巴黎大使(1852—1867)。——第615頁。
- 艾尔頓,亨利(Ireton, Henry 1611—1651)——十七世紀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著名活动家,独立派思想家之一,議会軍的將軍,曾参加奥·克倫威尔对爱尔兰的討伐(1649—1650),后继克倫威尔为总司令和爱尔兰总督(1650—1651)。——第508頁。
- 艾尔德曼,約翰·爱德华(Erdmann, Johann Eduard 1805—1892)——德国哲学家,右派黑格尔分子。——第563頁。
- 达菲,爱德华(Duffy, Edward 1840—1868)——爱尔兰革命兄弟会領袖之一,西爱尔兰芬尼亚运动的組織者,1867年被判15年苦役,死于獄中。——第674、675頁。
- 达尔文,查理·罗伯特(Darwin, Charles Robert 1809—1882)——偉大的英国自然科学家,科学的生物进化学的奠基人。——第244、255、584頁。
- 达費林侯爵,弗雷德里克·坦普尔·汉密尔顿·坦普尔·布莱克伍德(Dufferin, Frederick Temple Hamilton-Tem-

- ple-Blackwood, Marquess of 1826—1902) ——英国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 自由党人, 曾参加格萊斯頓內閣 (1868—1872), 爱尔兰大地主。——第 501、522、686、693 頁。
- 迈斯納, 奧托·卡尔 (Meissner, Otto Karl 1819—1902) ——汉堡出版商, 曾出版“資本論”及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許多其他著作。——第 89、93、232、236、241、243、254、257、260、411 頁。
- 迈耳莫尔达 (Maolmordha (Maelmordha) 死于 1014 年) ——倫斯特国王 (999—1014)。——第 566—569 頁。
- 迈耳沙赫萊恩二世 (Maelseachlainn II 949—1022) ——爱尔兰国王 (980—1002 和 1014—1022)。——第 569 頁。
- 伊索 (Æsop 公元前六世紀) ——半傳說中的古希腊寓言作家。——第 27、292 頁。
- 伊万三世 (Иван III 1440—1505) ——莫斯科大公 (1462—1505)。——第 180 頁。
- 伊丽莎白 (Elizabeth 1533—1603) ——英国女王 (1558—1603)。——第 503、507、508、574、637 頁。
- 伊里吉納, 約翰·司各特 (Erigena, Johannes Scotus 約 810—877) ——中世紀哲学家、神学家和翻譯家, 爱尔兰人。——第 563 頁。
- 亚历山大大帝 ——見馬其頓王亚历山大。
- 亚历山大, 黑森—达姆斯塔德亲王 (Alexander, Prinz von Hessen-Darmstadt 1823—1888) ——奥地利將軍, 曾参加 1859 年奧意法战争, 在 1866 年普奧战争中指揮几个小邦的联軍。——第 198、207 頁。
- 亚历山大一世 (Александр I 1777—1825) ——俄国皇帝 (1801—1825)。——第 227 頁。
- 亚历山大二世 (Александр II 1818—1881) ——俄国皇帝 (1855—1881)。——第 627 頁。
- 托德, 詹姆士·亨梭恩 (Todd, James Henthorn 1805—1869) ——爱尔兰学者, 語文学家; 1852 年起为政府古爱尔兰法律編譯出版委员会委員, 爱尔兰皇家学会会长 (1856—1860)。——第 553 頁。
- 托尔吉耳斯 (Thorgils 約死于 844 年) ——諾曼海盜。——第 565、566 頁。
- 托勒密, 克罗狄烏斯 (Ptolemaeus, Claudius 二世紀) ——古希腊数学家、天文学家和地理学家, 宇宙的地球中心說的創立者。——第 559 頁。
- 托倫, 昂利·路易 (Tolain, Henry-Louis 1828—1897) ——法国雕刻工, 右派蒲魯东主义者, 国际巴黎支部领导人之一, 国际倫敦代表會議 (1865)、日内瓦代表大会 (1866)、洛桑代表大会 (1867)、布魯塞尔代表大会 (1868) 和巴塞尔代表大会 (1869) 的代表; 1870 年 9 月 4 日后为国民議會議員, 在巴黎公社时期投向凡尔賽分子, 1871 年被开除出国际。——第 90、91、587、590、592 頁。
- 托倫斯, 罗伯特 (Torrens, Robert 1780—1864) ——英国资产階級經濟学家, “货币流通”学派的拥护者。——第 291 頁。
- 西尼耳, 納騷·威廉 (Senior, Nassau William 1790—1864) ——英国资产階級庸俗經濟学家, 資本主义制度的辯护人, 反对縮短工作日。——第 11、121、122、300、307、340 頁。

西耳維斯, 威廉 (Sylvis, William 1828—1869)——著名的美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职业是鑄工, 国际鑄工联合会創始人之一(1859)和主席(1863—1869); 曾参加美国内战(1861—1865), 站在北軍方面; 美国全国劳工同盟創始人之一(1866)和主席(1868—1869); 贊成加入国际。——第 431、628—631 頁。

西斯蒙第, 让·沙尔·列奥納尔·西蒙·德 (Sismondi, Jean-Charles-Léonard Simonde de 1773—1842)——瑞士經濟学家, 批評資本主义的小資产階級批評家, 經濟浪漫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第 168、233、406 頁。

西古尔德·劳德里松 (Sigurd Laudrisson 十一世紀)——奧克尼群島的統治者。——第 567—569 頁。

西格特留格 (Sigtrugg 死于 1042 年)——都柏林諾曼人的国王。——第 567—569 頁。

西西里的狄奥多洛斯 (Diodorus Siculus of Sicily 公元前 80 左右—29)——古希腊历史学家, “史学丛书”的作者。——第 558 頁。

西华德, 威廉·亨利 (Seward, William Henry 1801—1872)——美国国家活动家, 共和党右翼領袖, 参議員, 紐約州州长 (1839—1843), 1860 年大选的总统候选人, 曾任美国国务卿 (1861—1869)。——第 109 頁。

西华德, 弗雷德里克·威廉 (Seward, Frederick William 1830—1915)——美国新聞工作者和外交家, 威廉·亨利·西华德之子。——第 109 頁。

七 画

肖, 罗伯特 (Shaw, Robert 死于 1869 年)

——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职业是彩画匠, 1864 年 9 月 28 日圣馬丁堂會議的参加者, 国际总委员会委員 (1864—1869), 积极参加了总委员会的工作, 在工联基层組織中宣傳国际的思想; 总委员会财务委員 (1867—1868), 美国通訊書記 (1867—1869), 国际倫敦代表會議 (1865) 和布魯塞尔代表大会 (1868) 的参加者。——第 22、110、246、365、375、400、403、444、445、591、609、634 頁。

里斯-阿普-都鐸 (Rhys ap Tudor 死于 1093 年)——南威尔士国王 (1078—1093)。——第 556 頁。

秃头查理二世 (Charles II, le Chauve 823—877)——法兰西国王 (840—877)。——第 563 頁。

狄德罗, 德尼 (Diderot, Denis 1713—1784)——杰出的法国哲学家, 机械唯物主义的代 表, 无神論者, 法国革命資产階級的思想家之一, 启蒙运动者, 百科全书派領袖。——第 181 頁。

希尔施, 麦克斯 (Hirsch, Max 1832—1905)——德国經濟学家, 資产階級进步党的著名活动家, 1868 年同弗·敦克尔一起創建了改良主义工会, 一直存在到 1933 年, 人称希尔施—敦克尔工会; 1869—1893 年期間为国会議員。——第 374、376 頁。

別尔維, 瓦西里·瓦西里也維奇 (Берви, Васил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1829—1918) (笔名恩·弗列罗夫斯基 Н. Флеровский)——俄国經濟学家和社会学家, 启蒙运动民主主义者, 民粹派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 “俄国工人階級的状况”一书作者。——第 463、464 頁。

佛吉利厄斯 (Virgilius 死于 785 年)——爱尔兰傳教士, 薩尔茨堡主教。——第

- 563 頁。
- 車尔尼雪夫斯基, 尼古拉·加甫利洛維奇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Николай Гаврилович 1828—1889)——偉大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 杰出的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先驅之一。——第 464 頁。
- 吕宁, 奥托 (Lüning, Otto 1818—1868)——德国医生和政論家, 四十年代中“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 1848—1850 年为“新德意志报”发行人; 1866 年后为民族自由党人。——第 25 頁。
- 呂斯托夫, 弗里德里希·威廉 (Rüstow, Friedrich Wilhelm 1821—1878)——德国軍官和軍事著作家, 民主主义者, 侨居瑞士; 1860 年为加里波第的参謀长, 拉薩尔的朋友。——第 95 頁。
- 劳, 卡尔·亨利希 (Rau, Karl Heinrich 1792—1870)——德国資產階級經濟学家, 在个别問題上贊同斯密和李嘉图的观点。——第 232、242 頁。
- 劳麦, 弗里德里希 (Raumer, Friedrich 1781—1873)——德国反动的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第 36 頁。
- 利姆堡 (Limburg, W.)——德国工人, 职业是鞋匠, 倫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会员, 国际总委员会委員 (1868—1869)。——第 403 頁。
- 利穆津, 沙尔 (Limousin, Charles M.)——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职业是印刷工人, 后为新聞工作者, “联合会”杂志管理委员会秘书, 参加“工人論壇”編輯部, 1865 年国际倫敦代表會議代表, 1870 年为巴黎联合会委员会委員, 合作运动的参加者和許多杂志的发行人。——第 90、592 頁。
- 利弗尔逊, 蒙台居 (Leverson, Montagu)——英国人, 1865 年 3 月 1 日在倫敦举行的波兰群众集会的参加者。——第 106 頁。
- 李嘉图, 大卫 (Ricardo, David 1772—1823)——英国經濟学家, 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学最聞名的代表人物之一。——第 32、103、134、168、232、233、237、255 頁。
- 李斯特, 弗里德里希 (List, Friedrich 1789—1846)——德国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学家, 宣傳极端的保护关税政策。——第 232 頁。
- 李卜克内西, 威廉 (Liebknecht, Wilhelm 1826—1900)——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 第一国际会员, 德国工人运动中反对拉薩尔主义、捍卫国际的原則的积极战士; 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 (1869) 代表; 1867 年起为国会議員; 德国社会民主党創建人和領袖之一, “人民国家报”編輯 (1869—1876); 在个别問題上采取調和主义的立場, 1870—1871 年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时期反对普魯士容克和資產階級的掠夺計劃, 并声援巴黎公社;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 102、372、380、442、443、469、476、487、702 頁。
- 伯克, 理查 (Burke, Richard 死于 1870 年)——爱尔兰芬尼亚社社員, 北美軍隊軍官, 爱尔兰 1867 年起义的組織者之一, 1867 年被捕, 死于獄中。——第 457、672、678、679、682、683、688—691 頁。
- 伯克, 托馬斯 (Burke, Thomas F. 生于 1840 年)——爱尔兰芬尼亚社社員, 將軍, 曾参加美国内战, 站在南部方面, 爱尔兰 1867 年起义的組織者之一, 1867

- 年4月被判处无期徒刑。——第458頁。
- 伯克, 托馬斯·亨利 (Burke, Thomas Henry 1829—1882) ——英国国家活动家, 六十年代为爱尔兰事务大臣的私人秘书(1869—1882)。——第665頁。
- 麦克唐奈 (M'Donnell) ——都柏林監獄醫, 因抗議对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員的殘酷待遇被免职。——第459—462、666、684頁。
- 麦克菲尔逊, 詹姆士 (Macpherson, James 1736—1796) ——苏格兰詩人, 写有长詩“芬加耳”(1762)和“泰莫腊”(1763)。——第560、574頁。
- 麦克庫洛赫, 約翰·雷姆賽 (MacCulloch, John Ramsay 1789—1864) ——英国資產階級經濟學家, 李嘉图經濟學說的庸俗化者, 資本主義制度的狂热辯護人。——第307頁。
- 沙佩尔, 卡尔 (Schapper, Karl 1812—1870) ——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 正义者同盟領導人之一, 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員會委員, 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 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为冒險主义宗派集团的領袖之一; 1856年起重新同馬克思接近, 国际总委員會委員(1865), 1865年倫敦代表會議的参加者。——第110頁。
- 沙利文, 爱德华 (Sullivan, Edward 1822—1885) ——爱尔兰国家活动家, 法学家, 1865年对芬尼亚社社員提出訴訟, 爱尔兰首席檢察官(1868—1870), 爱尔兰司法档案保管官, 爱尔兰大法官(1883—1885)。——第668頁。
- 沙尔腊斯, 让·巴蒂斯特·阿道夫 (Charas, Jean-Baptiste-Adolphe 1810—1865) ——法国軍事和政治活动家, 温和的資產階級共和主义者; 曾参加鎮压1848年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 第二共和国时期为制宪議會和立法議會議員, 反对路易·波拿巴; 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被逐出法国。——第405頁。
- 亨尼西, 約翰·波普 (Hennessy, John Pope 1834—1891) ——爱尔兰政治活动家, 議會議員, 保守党人, 六十年代初曾在議會提出在爱尔兰实行一系列細小改良的提案。——第522頁。
- 亨德尔, 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 (Händel, Georg Friedrich 1685—1759) ——偉大的德国作曲家。——第584頁。
- 亨利一世 (Henry I 1068—1135) ——英国国王(1100—1135)。——第556頁。
- 亨利七世 (Henry VII 1457—1509) ——英国国王(1485—1509)。——第302頁。
- 坎登, 威廉 (Camden, William 1551—1623) ——英国历史学家。——第557頁。
- 坎皮恩, 艾德蒙 (Campion, Edmund 1540—1581) ——英国天主教傳教士, “爱尔兰史”的作者。——第557頁。
- 坎特伯雷的安瑟倫 (Anselm of Canterbury 1033—1109) ——中世紀神学家, 早期經院哲学的代表人物。——第563頁。
- 坎布里亚的吉拉德 (西尔韦斯特尔·杰腊德·巴里) (Giraldus Cambrensis (Silvestre Gerald Barry) 1146—1220) ——英国中世紀著作家, 1185年軍事征伐爱尔兰的参加者, 写有关于爱尔兰的著作。——第556—557、564、571頁。
- 杜邦, 欧仁 (Dupont, Eugène 1831左右

- 1881) ——国际工人运动著名活动家, 法国工人, 乐器匠, 1848年巴黎六月起义的参加者; 1862年起住在倫敦, 国际总委员会委員 (1864年11月—1872年), 法国通訊書記 (1865—1871), 倫敦代表會議 (1865) 和日内瓦代表大会 (1866) 的参加者, 洛桑代表大会 (1867) 的主席, 布魯塞爾代表大会 (1868)、倫敦代表會議 (1871) 和海牙代表大会 (1872) 的代表; 在国际中执行馬克思的路綫; 1870年迁居曼彻斯特, 并組織了国际支部, 1872年参加国际不列顛联合会委员会, 1874年迁居美国。——第21、110、247、400、403、579、608、634頁。
- 杜兰多, 扎科莫 (Durando, Giacomo 1807—1894) ——意大利將軍, 1866年普奧戰爭中任意大利軍軍长。——第201頁。
- 杜尔哥, 安·罗伯尔·雅克 (Turgot, Anne-Robert-Jacques 1727—1781) ——法国經濟学家和国家活动家; 重农学派的最大代表人物; 財政总稽核 (1774—1776)。——第326頁。
- 杜布塔赫 (Dubthach 五世紀) ——爱尔兰宮廷詩人和法律家, 法律汇编“古制全书”的編纂者之一。——第554頁。
- 杜諾瓦耶, 沙尔 (Dunoyer, Charles 1786—1862) ——法国庸俗經濟学家和资产階級政治活动家。——第34頁。
- 杜美尼尔-馬里尼, 茹尔 (Dumesnil-Marigny, Jules) ——法国资产階級經濟学家和政論家; 国际會員 (1865), 1865年倫敦代表會議的参加者。——第592頁。
- 沃邦, 塞巴斯提安·勒·普雷特尔 (Vauban, Sébastien le Prêtre 1633—1707) ——法国元帅, 軍事工程师, 写有許多筑城学和圍攻方面的著作, 以及經濟学著作“王国什一稅”。——第286頁。
- 沃尔弗 (Wolff) ——国际总委员会委員 (1864—1865)。——第22頁。
- 沃尔弗, 魯伊治 (Wolff, Luigi) ——意大利少校, 馬志尼的拥护者, 倫敦意大利工人組織——共进会的會員, 曾参加1864年9月28日圣馬丁堂會議, 国际总委员会委員 (1864—1865), 1865年倫敦代表會議的参加者, 1871年被揭露为波拿巴的警探。——第22、587、591、597頁。
- 沃倫 (Warren, J.) ——英国工人, 国际总委员会委員 (1869), 曾加入改革同盟。——第403頁。
- 沃倫, 約瑟亚 (Warren, Josiah 1799左右—1874) ——美国空想社会主义者, 欧文的信徒; 宣傳劳动价值公平交換論。——第656頁。
- 沃尔利, 威廉 (Worley, William) ——英国印刷工人, 英国波兰独立全国同盟盟員, 1864年9月28日圣馬丁堂會議的参加者, 国际总委员会委員 (1864—1867), 曾加入改革同盟。——第22、110頁。
- 貝森, 亚历山大 (Besson, Alexandre) ——在倫敦的法国侨民, 职业为鉗工, 国际总委员会委員 (1866—1868), 比利时通訊書記, 在倫敦的法国人支部领导人之一, 加入費·皮阿集团。——第247、608、626、627、634頁。
- 貝尔納 (Bernard, P.) ——比利时彩画工人, 国际总委员会委員, 比利时通訊書記 (1868—1869)。——第400、403頁。
- 貝姆, 約瑟夫 (Bem, Joseph 1795—1850)

- 波兰將軍，民族解放运动活动家，1830—1831年起义的参加者；1848年参加維也納革命斗争；匈牙利革命軍领导人之一；后在土耳其軍隊中服务。——第225頁。
- 貝律茲，让·比埃尔 (Beluze, Jean-Pierre 1821—1908) ——法国小資產階級社会主义者，职业是紅木工，卡貝的学生和信徒，“劳动信贷”銀行經理 (1862—1868)，合作运动机关报“联合”杂志的创办人之一，国际會員，后来脱离了工人运动。——第92、592頁。
- 貝多芬，路德維希·万 (Beethoven, Ludwig van 1770—1827) ——偉大的德国作曲家。——第584頁。
- 貝尼格努斯 (Benignus 死于468年) ——爱尔兰教士，法律汇编“古制全书”的編纂者之一。——第554頁。
- 貝达大师 (Bæda the Venerable 673左右—735) ——盎格魯撒克遜僧侶学者，历史学家。——第561頁。
- 貝奈德克，路德維希 (Benedek, Ludwig 1804—1881) ——奥地利將軍，曾参加鎮压1846年加里西亚农民起义以及1848—1849年意大利和匈牙利的民族解放运动；在1859年奥意法战争中任軍长，1860年是奥軍參謀长，匈牙利文武总督，1866年普奥战争时期任奥軍总司令。——第191、193、198、202、204、205、207、208—210頁。
- 貝克尔，約翰·菲力浦 (Becker, Johann Philipp 1809—1886) ——国际工人运动和德国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职业是制刷工，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在瑞士的国际德国人支部組織者，国际倫敦代表會議 (1865) 和国际各次代表大会代表，“先驅”杂志的編輯 (1866—1871)；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
友。——第103、443、467、476、591、593、628、635、636頁。
- 貝克尔，伯恩哈特 (Becker, Bernhard 1826—1882) ——德国政論家，拉薩尔分子，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 (1864—1865)，1872年为国际海牙代表大会代表。——第100—104、372頁。
- 克里默，威廉·朗达耳 (Cremer, William Randall 1838—1908) ——英国工联主义运动和資產階級和平主义运动活动家，改良主义者；木工和細木工联合协会的創建人和领导人之一，工联倫敦理事會理事，英国波兰独立全国同盟、土地和劳动同盟盟員；1864年9月28日圣馬丁堂會議的参加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員 (1864—1866) 和总書記，国际倫敦代表會議 (1865) 和日内瓦代表大会 (1866) 的参加者，曾参加改革同盟执行委员会；反对革命策略，在争取选举法改革斗争时期同資產階級进行勾結，后来是自由党議會議員。——第22、110、580、591頁。
- 克利莫什 (Klimosch, H.) ——国际总委员会委員 (1865)。——第110頁。
- 克林格斯，卡尔 (Klings, Karl) ——德国五金工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后为全德工人联合会會員；1865年侨居美国，积极参加国际芝加哥支部的活动。——第103頁。
- 克罗狄安，克罗狄烏斯 (Claudianus (Claudius) 四世紀) ——古羅馬詩人，希腊人。——第561頁。
- 克萊沃的貝尔納 (Bernard de Clairvaux 1091左右—1153) ——法国神学家，狂热的天主教信徒。——第555頁。
- 克倫威尔，亨利 (Cromwell, Henry 1628

—1674)——英国議會軍將軍，1650年参加了奧·克倫威尔对爱尔兰进行的討伐，1654年任爱尔兰軍隊司令，总督(1657—1658)，爱尔兰总督(1658—1659)，奧·克倫威尔的儿子。——第508頁。

克倫威尔，奧利弗(Cromwell, Oliver 1599—1658)——十七世紀英国資產階級革命时期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化的貴族領袖；1649年起为爱尔兰軍总司令和爱尔兰总督，1653年起为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护国公。——第503、506—509、574、637頁。

克拉姆-加拉斯，愛德华(Clam-Gallas, Eduard 1805—1891)——奥地利將軍，原系匈牙利人，1848—1849年参加鎮压意大利的革命民族解放运动，在1859年的奧意法战争和1866年的普奧战争中任軍长。——第208頁。

克拉普卡，迪約尔吉(Klapka, György 1820—1892)——匈牙利將軍，1848—1849年革命时期曾指揮匈牙利的一支軍隊；1849年6—9月是科莫恩要塞卫戍司令；1849年流亡国外；五十年代同波拿巴集团有联系，1867年大赦后回到匈牙利。——第100頁。

克拉倫登伯爵，乔治·威廉·弗雷德里克·韦利尔斯(Clarendon, George William Frederick Villiers, Earl of 1800—1870)——英国国家活动家，輝格党人，后为自由党人；曾任爱尔兰总督(1847—1852)，殘酷地鎮压了1848年爱尔兰起义；外交大臣(1853—1858、1865—1866和1868—1870)。——第378頁。

克拉里奧耳(Clariol or Clarion)——1865年参加国际倫敦代表會議的巴黎

印刷工人协会的代表。——第592頁。

八 画

弥勒，安东(Müller, Anton)——瑞士钟表工人，国际总委员会委員(1869)。——第403頁。

雨果，維克多(Hugo, Victor 1802—1885)——偉大的法国作家。——第405頁。

佩龙，沙尔·欧仁(Perron, Charles-Eugène 1837—1919)——瑞士工人运动活动家，珠琅彩繪工，后为制图家；巴枯宁主义者，国际洛桑代表大会(1867)和布魯塞尔代表大会(1868)代表，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中央局委員，“平等报”編輯(1869)，“团结报”編輯和汝拉联合会领导人之一；后来脱离工人运动。——第467頁。

奈阿斯，約翰·德·(Nieass, John D.)——英国泥水匠，工联倫敦理事会理事和英国波兰独立全国同盟盟員，1864年9月28日圣馬丁堂會議的参加者，曾参加国际总委员会(1864—1865)，改革同盟盟員。——第22、110頁。

杰塞普，威廉(Jessup, William J.)——美国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是造船木工，1866年起为美国全国劳工同盟副主席，1867年起为該同盟紐約州通訊書記，紐約工人联合会领导人之一；贊成加入国际。——第631頁。

肯尼思·麦卡尔平(Kenneth MacAlpin 死于860年)——苏格兰王朝的奠基人，他在九世紀中叶統一了苏格兰人部落和皮克特人部落。——第562頁。

昔蒙茲，乔治·詹姆士(Symons, George James 1838—1900)——英国气象学家。——第545、548頁。

- 舍尔比利埃, 安都昂·埃利澤 (Cherbuliez, Antoine-Elisée 1797—1869)——瑞士經濟學家, 西斯蒙第的信徒, 他把西斯蒙第的理論和李嘉圖理論的某些成分結合在一起。——第 168 頁。
- 門德, 弗里茨 (Mende, Fritz 死于 1879 年)——前全德工人聯合會會員, 哈茨費爾特建立的“拉薩爾派全德工人聯合會”主席 (1869—1872), 北德意志聯邦國會議員 (1869)。——第 372 頁。
- 門德爾森-巴托爾迪, 費里克斯 (Mendelssohn-Bartholdy, Felix 1809—1847)——德國作曲家和音樂家, 社會活動家。——第 584 頁。
- 彼得一世 (Петр I 1672—1725)——1682 年起為俄國沙皇, 1721 年起為全俄皇帝。——第 35、227 頁。
- 彼得遜, 彼得 (Petersen, Peter)——國際總委員會委員 (1864 年 11 月—1865 年)。——第 22、110 頁。
- 圖克, 托馬斯 (Tooke, Thomas 1774—1858)——英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 追隨古典學派, 抨擊了李嘉圖的貨幣論。——第 122、142、326 頁。
- 圖爾, 伊什特萬 (Türr, István 1825—1908)——流亡土耳其的匈牙利軍官, 曾參加克里木戰爭, 站在聯軍方面; 參加過切爾克斯人反對俄國的戰爭。——第 100 頁。
- 圖爾奈森, 愛德華 (Thurneysen, Eduard 1824—1890)——瑞士政治活動家, 法學家, 1869 年為巴塞爾大會議議員。——第 418 頁。
- 林奇, 約翰 (Lynch, John 約 1599—1673)——愛爾蘭教士, 寫有和翻譯過許多愛爾蘭史方面的著作。——第 557 頁。
- 林奇, 約翰 (Lynch, John 1832—1866)——愛爾蘭芬尼亞社社員, 科克的芬尼亞社組織的領導人; 1866 年 1 月被判十年苦役, 1866 年死於沃金獄中。——第 675、695—697 頁。
- 林肯, 阿伯拉罕 (Lincoln, Abraham 1809—1865)——傑出的美國國家活動家, 共和黨創建人之一, 美國總統 (1861—1865); 美國內戰時期在人民群眾的壓力下, 於 1862 年打消了與奴隸主妥協的企圖轉而實行資產階級民主改革和用革命的方法進行戰爭; 1865 年 4 月被奴隸主的奸細刺殺。——第 20、21、108、109、402 頁。
- 帕麥斯頓子爵, 亨利·約翰·坦普爾 (Palmerston, Henry John Temple, Viscount 1784—1865)——英國國家活動家, 初為托利黨人, 1830 年起為輝格黨領袖之一, 依靠該黨右派; 曾任外交大臣 (1830—1834、1835—1841 和 1846—1851), 內務大臣 (1852—1855) 和首相 (1855—1858 和 1859—1865)。——第 13、170、505、694 頁。
- 帕斯凱維奇, 伊萬·費多羅維奇 (Паскевич, Иван Федорович 1782—1856)——公爵, 俄國元帥, 1831 年夏天起為鎮壓 1830—1831 年波蘭起義的俄軍總司令, 1832 年起為波蘭王國總督, 1849 年為參加鎮壓匈牙利革命的俄軍總司令。——第 224 頁。
- 帕特遜, 威廉 (Patterson, William)——愛爾蘭醫學家, “愛爾蘭氣候研究”一書的作者。——第 546 頁。
- 帕特里克或帕特里齊烏斯 (Patrick or Patricius 約 373—463)——愛爾蘭基督教傳教士, 愛爾蘭天主教會的創始人和第一個主教。——第 554、561、562、

- 691 頁。
- 波洛克, 乔治 (Pollock, George D.)——英国軍医, 1867 年向議會提呈关于英国監獄中的政治犯待遇报告的專門委员会委員。——第 674、681、685、696 頁。
- 波克罕, 西吉茲蒙特·路德維希 (Borkheim, Sigismund Ludwig 1825—1885)——德国新聞記者, 民主主义者, 1849 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参加者, 起义失敗后逃离德国; 1851 年起是倫敦商人, 同馬克思和恩格斯保持友誼关系。——第 102 頁。
- 波特尔, 乔治 (Potter, George 1832—1893)——英国工联改良派領袖之一, 职业是木工, 工联倫敦理事会理事和建筑工人联合会的領袖之一, “蜂房报”的創办人和发行人, 在報紙上一貫实行同自由資產階級妥协的政策。——第 375、480 頁。
- 波埃利奧, 卡洛 (Poerio, Carlo 1803—1867)——意大利政治活动家, 自由主义者, 民族解放运动的参加者; 1848 年任那不勒斯的警務长官和教育大臣, 1849—1859 年被关在意大利各監獄里, 1861—1867 年为議會副議長。——第 460 頁。
- 波茨措-迪-博尔哥, 卡尔·奧西波維奇 (Поццо-ди-Борго, Карл Осипович 1764—1842)——伯爵, 俄国外交家, 原系科西嘉人; 1814—1821 年是駐巴黎公使, 1821—1835 年为駐巴黎大使, 后来是駐倫敦大使 (1835—1839)。——第 226 頁。
- 波拿巴——見拿破侖第一。
- 波拿巴——見拿破侖第三。
- 阿德里安四世 (尼古拉斯·布雷克斯比尔) (Adrian IV (Nicholas Brakspere) 死于 1159 年)——羅馬教皇 (1154—1159), 英国人。——第 507 頁。
- 阿伯康公爵, 詹姆士, 汉密尔頓 (Abercorn, James Hamilton, Duke of 1811—1885)——爱尔兰总督 (1866—1868 和 1874—1876)。——第 503、517、522 頁。
- 阿普耳加思, 罗伯特 (Applegarth, Robert 1833—1925)——英国工联主义运动改良派領袖之一, 职业是紅木工, 木工和細木工联合协会总書記 (1862—1871), 工联倫敦理事会理事; 国际总委员会委員 (1865、1868—1872), 国际巴塞爾代表大会 (1869) 代表, 改革同盟的領袖之一; 1871 年拒絕在总委员会的宣言“法兰西內战”上签名, 后来脱离了工人运动。——第 375、403、655、656 頁。
- 阿耳多夫兰迪 (Aldovrandi, P.)——受馬志尼影响的倫敦意大利工人組織——共进会的會員; 国际总委员会委員 (1864 年 10 月—1865 年)。——第 21 頁。
- 阿米亚努斯·馬尔塞利努斯 (Ammianus Marcellinus 約 332—400)——羅馬历史学家。——第 561 頁。
- 阿尔宾 (Albinus 四世紀)——爱尔兰修道士, 傳教士。——第 561 頁。
- 阿尔宾 (Albinus 八世紀下半叶)——爱尔兰修道士, 查理大帝曾聘他到帕維亞讲学。——第 563 頁。
- 阿尔弗勒德大帝 (Alfred the Great 849—901)——盎格魯撒克遜国王 (871—901), 曾促进文化傳布。——第 561 頁。
- 罗, 哈里埃特 (Law, Harriet 1832—1897)——著名的英国无神論运动女活

- 动家,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7—1872)和国际曼彻斯特支部成员(1872)。——第375、403、655、656页。
- 罗素,约翰(Russell, John 1792—1878)——英国国家活动家,辉格党领袖,曾任首相(1846—1852和1865—1866),外交大臣(1852—1853和1859—1865)。——第377页。
- 罗昂,阿尔勃莱希特(Roon, Albrecht 1803—1879)——普鲁士国家活动家和军事活动家,1873年起为元帅,普鲁士军閥代表人物之一,陆军大臣(1859—1873)和海军大臣(1861—1871),曾改编普鲁士军队。——第50、55、60页。
- 罗雪尔,威廉(Roscher, Wilhelm 1817—1894)——德国庸俗经济学家,政治经济学中旧历史学派的创始人。——第232、242页。
- 罗霍夫,古斯塔夫·阿道夫(Rochow, Gustav Adolf 1792—1847)——反动的普鲁士容克的代表人物,曾任普鲁士内务大臣(1834—1842)。——第390页。
- 罗赫纳,格奥尔格(Lochner, Georg 约生于1824年)——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是细木工,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和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会员,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年11月—1872年),1865年和1871年国际伦敦代表会议代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22、110页。
- 罗什弗尔,昂利(Rochefort, Henri 1830—1913)——法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左派共和党人,“灯笼”杂志(1868—1869)和“马赛曲报”(1869—1870)发行人;1870年9月4日革命后参加国防政府,八十年代末起为保皇党人。——第670、694页。
- 罗伯斯比尔,马克西米利安(Robespierre, Maximilien 1758—1794)——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杰出活动家,雅各宾党人的领袖,革命政府的首脑(1793—1794)。——第122页。
- 罗斯(Ross, J.)——英国鞋匠,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9)。——第403页。
- 罗斯,乔治(Rose, George 1744—1818)——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财政大臣(1782—1783和1784—1801),历任国家要职。——第165页。
- 罗萨——见奥顿诺凡-罗萨。
- 罗萨(Rossa 五世纪)——爱尔兰法律汇编“古制全书”编纂者之一。——第554页。
- 拉马,多美尼科(Lama, Domenico)——受马志尼影响的伦敦意大利工人组织——共进会的主席,1864年9月28日圣马丁堂会议的参加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65)。——第21页。
- 拉法格,保尔(Lafargue, Paul 1842—1911)——国际工人运动著名活动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国际总委员会委员,西班牙通讯书记(1866—1869);曾参加建立国际在法国的支部(1869—1870),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支部(1871—1872);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法国工人党的创建人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生和战友。——第247、403、608、634页。
- 拉姆赛,乔治(Ramsay, George 1800—1871)——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后代表人物之一。——第168页。
- 拉弗耳,帕特里克(Lavelle, Patrick)——爱尔兰教士,芬尼亚社社员的同情者,

“革命后的爱尔兰大地主”一书作者。
——第 692 頁。

拉斐德, 瑪丽·約瑟夫·保尔 (Lafayette, Marie-Joseph-Paul 1757—1834) ——法国將軍, 十八世紀末法国資產階級革命和 1830 年資產階級七月革命时期大資產階級的領袖之一。——第 224 頁。

拉維涅, 路易·加布里埃尔·萊昂斯·吉洛·德 (Lavergne, Louis-Gabriel-Léonce Guilhaud de 1809—1880) ——法国資產階級經濟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保皇党人, 写有許多农业經濟方面的著作。——第 539、540 頁。

拉科姆, 托馬斯·埃斯丘 (Larcom, Thomas Aiskew 1801—1879) ——爱尔兰政府官員, 后升少將, 1826 年起在爱尔兰的英国国家制图局供职, 研究古代爱尔兰史料, 1853 年起为爱尔兰事务副大臣。——第 553 頁。

拉德茨基, 約瑟夫 (Radetzky, Joseph 1766—1858) ——伯爵, 奥地利元帥, 1831 年起为意大利北部奧軍指揮官; 1848—1849 年殘酷地鎮压了意大利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 1850—1857 年 2 月为倫巴第一威尼斯王国的总督。——第 200、227 頁。

拉斯拜尔, 弗朗斯瓦 (Raspail, François 1794—1878) ——著名的法国学者, 自然科学家, 政論家和社会主义者, 接近革命无产阶级, 曾参加 1830 年和 1848 年革命, 制宪議會議員, 1855 年后轉到資產階級民主派的立場。——第 420 頁。

拉普拉斯, 比埃尔·西蒙 (Laplace, Pierre-Simon 1749—1827) ——杰出的法国天文学家、数学家和物理学家, 他的关于太阳系起源的假說有力地动

搖了宗教观念創世說。——第 244 頁。
拉薩西, 德 (Lassassie, F.de) ——在倫敦的法国侨民, 职业是理发师, 国际总委员会委員 (1865—1868), 1865 年倫敦代表會議的参加者。——第 110 頁。

拉薩尔, 斐迪南 (Lassalle, Ferdinand 1825—1864) ——德国小資產階級政論家, 律師, 1848—1849 年曾参加萊茵省的民主运动; 六十年代初参加工人运动, 是全德工人联合会 (1863) 創建人之一; 支持在反革命普魯士的霸权下“自上”統一德国的政策, 在德国工人运动中創立了机会主义的派別。——第 26、27、96、99、102、103、104、232、255、256、369、371、372、407、408 頁。

九 画

欧文, 罗伯特 (Owen, Robert 1771—1858) ——偉大的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第 12、122、263、640 頁。

美奥 (Mayo) ——見納斯, 理查·薩斯威尔·伯克, 美奥伯爵。

封丹, 萊昂 (Fontaine, Léon) ——比利时新聞工作者, 民主运动的参加者, 1862—1865 年是赫尔岑的“钟声”法文版发行人; 1865 年为国际总委员会比利时临时通訊書記, 国际布魯塞尔代表大會的代表 (1868)。——第 597 頁。

胡德, 岡訥尔 (Hood, Günner) ——爱尔兰芬尼亚社社員, 1866 年被軍事法庭判处四年苦役。——第 672 頁。

荣克, 海尔曼 (Jung, Hermann 1830—1901) ——著名的国际工人运动和瑞士工人运动活动家, 职业是钟表匠, 侨居倫敦; 国际总委员会委員和瑞士通訊書記 (1864 年 11 月—1872 年), 总委员会财务委員 (1871—1872), 国际倫敦代表

- 會議(1865)副主席、日內瓦代表大會(1866)、布魯塞爾代表大會(1868)和巴塞爾代表大會(1869)以及倫敦代表會議(1871)主席,不列顛聯合會委員會委員;1872年海牙代表大會以前在國際里執行馬克思的路綫,後來成為英國工聯的改良派領袖之一。——第21、107、110、247、400、403、477、490、579、582、586、596、608、634頁。
- 齊貝耳, 卡尔(Siebel, Karl 1836—1868)——德國詩人;曾協助傳播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和宣傳“資本論”第一卷;是恩格斯的遠親。——第103頁。
- 約翰遜, 安得魯(Johnson, Andrew 1808—1875)——美國國家活動家,屬於民主黨,田納西州州長(1853—1857和1862—1865),參議員(1858—1862);美國內戰時期是北軍的擁護者,美國副總統(1864)和總統(1865—1869),實行和南部種植場主妥協的政策。——第108、109頁。
- 約翰斯頓, 詹姆斯(Johnstone, James 死於1798年)——古斯堪的那維亞文學作品的搜集家和出版者,生在蘇格蘭。——第566頁。
- 保羅一世(Павел I 1754—1801)——俄國皇帝(1796—1801)。——第227頁。
- 南尼阿斯(Nennius 八世紀)——中世紀威爾士歷史學家,“不列顛人的歷史”一書的作者。——第562頁。
- 若昂納爾, 茹爾(Johannard, Jules 1843—1888)——法國工人運動活動家,石印工人,國際總委員會委員(1868—1869、1871—1872)和意大利通訊書記(1868—1869),1870年在聖丹尼建立國際支部;巴黎公社委員,追隨布朗基派,公社被鎮壓後流亡倫敦,海牙代表大會(1872)代表。——第400、403頁。
- 耶拉契奇, 約西普(Јелачић, Josip 1801—1859)——伯爵,奧地利將軍,克羅地亞、達爾馬威亞和斯拉窩尼亞總督(1848—1859),曾積極參加鎮壓匈牙利和奧地利的1848—1849年革命。——第227頁。
- 洛里埃, 克列芒(Laurier, Clément 1832—1878)——法國律師和政治活動家,共和主義者;1870年9月4日革命後在國防政府供職,後為保皇派。——第696頁。
- 洛貝爾圖斯, 約翰·卡尔(Rodbertus, Johann Karl 1805—1875)——德國經濟學家,資產階級化的普魯士容克的思想家;1848—1849年革命時期是溫和自由派政治活動家,普魯士國民議會中間派左翼的領袖;後來成為普魯士“國家社會主義”反動思想的鼓吹者。——第232頁。
- 哈拉德一世·哈法格爾(Harald I Haarfagr 約850—933)——挪威國王(872—930)。——第565頁。
- 哈特威耳, 羅伯特(Hartwell, Robert)——英國工人運動和民主運動活動家,職業是印刷工人,前憲章主義者,“蜂房報”編輯之一,1864年9月28日聖馬丁堂會議的參加者,國際總委員會委員(1864—1865),曾參加改革同盟執行委員會,倫敦工人協會書記。——第22頁。
- 哈茨費爾特伯爵夫人, 索菲婭(Hatzfeldt, Sophie, Gräfin von 1805—1881)——拉薩爾的朋友和信徒。——第96、102、372頁。
- 迪克, 亞歷山大(Dick, Alexander)——英國工聯主義者,曾加入麵包工人聯合

- 会，国际总委员会委員（1864年11月—1865年），1865年因迁居新西兰，被委任为国际新西兰通訊書記。——第22頁。
- 迪奧尼修斯法官(Dionysius the Areopagite 一世紀)——雅典第一个主教，雅典最高法院成員。——第563頁。
- 迪斯累里，本杰明，1876年起为貝肯斯菲尔德伯爵(Disraeli, Benjamin, Earl of Beaconsfield 1804—1881)——英国国家活动家和作家，托利党領袖之一，十九世紀下半叶为保守党領袖；曾任財政大臣(1852、1858—1859和1866—1868)，首相(1868和1874—1880)。——第460、664、685頁。
- 柯恩，詹姆斯(Cohn, James)——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倫敦雪茄烟工人协会主席，国际总委员会委員(1867—1871)，丹麦通訊書記(1870—1871)，国际布魯塞尔代表大会(1868)和倫敦代表會議(1871)的代表。——第375、403頁。
- 柯普，詹姆斯(Cope, James)——英国工联主义运动活动家，曾参加倫敦鞋匠协会委员会、工联倫敦理事会，国际总委员会委員(1865—1867)，倫敦代表會議(1865)的参加者。——第591頁。
- 柯普兰(Copeland)——英国无神論运动活动家，国际总委员会委員(1868—1869)。——第375頁。
- 柯耳森，爱得文(Coulson, Edwin)——英国工联主义运动活动家，泥水匠协会倫敦分会書記，工联倫敦理事会理事，国际总委员会委員(1865—1866)，曾参加改革同盟执行委员会。——第110、591頁。
- 施梯勒，阿道夫(Stieler, Adolf 1775—1836)——德国制图家。——第533頁。
- 施韦澤，約翰·巴普提斯特(Schweitzer, Johann Baptist 1833—1875)——德国拉薩尔派著名代表人物之一，1864—1867年为“社会民主党人报”編輯；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1867—1871)；支持俾斯麦所奉行的在普魯士霸权下“自上”統一德国的政策，阻撓德国工人加入国际，反对社会民主工党，1872年他同普魯士当局的勾結被揭露，因而被开除出联合会。——第28、31、36、95、99、380、381、442、443、469、476、477頁。
- 施佩耶尔，卡尔(Speyer, Karl 生于1845年)——細木工，六十年代为倫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書記，1872年起为倫敦国际总委员会委員，后为美国国际总委员会委員。——第380、381頁。
- 施馬尔茨，泰奧多尔·安东·亨利希(Schmalz, Theodor Anton Heinrich 1760—1831)——德国法学家和經濟学家，重农学派的追随者，极端的反动分子。——第354頁。
- 施土姆普弗，保尔(Stumpf, Paul 1827左右—1913)——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是机械工人；1847年为布魯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会员，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国际會員，国际洛桑代表大会(1867)代表，德国社会民主党黨員。——第487、488頁。
- 查理一世(Charles I 1600—1649)——英国国王(1625—1649)，十七世紀英国資產階級革命时期被处死。——第508頁。
- 查理二世(Charles II 1630—1685)——英国国王(1660—1685)。——第509頁。
- 查理十世(Charles X 1757—1836)——

- 法国国王(1824—1830)。——第224頁。
- 查理大帝(Charlemagne 742左右—814)——法兰克国王(768—800),皇帝(800—814)。——第563頁。
- 查耳迪尼,恩利科(Cialdini, Enrico 1811—1892)——意大利將軍, 1848—1849年民族解放战争、克里木战争和1859年奥意法战争的参加者; 1866年普奥战争时任軍长。——第199、202頁。
- 威德,本杰明·富兰克林(Wade, Benjamin Franklin 1800—1878)——美国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属于共和党左翼, 参議院議長(1867—1869)。——第607頁。
- 威勒尔,乔治·威廉(Wheeler, George William)——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1864年9月28日圣馬丁堂會議的参加者, 国际总委员会委員(1864—1867), 总委员会财务委員(1864—1865、1865—1867), 国际倫敦代表會議(1865)的参加者, 改革同盟执行委员会委員。——第21、110、580、591頁。
- 威卢博夫,格里哥里·尼古拉也維奇(Вырубов, Григорий Николаевич 1843—1913)——俄国結晶学家和实证主义哲学家, 1864年起侨居巴黎, “实证哲学”杂志创办人和发行人之一, 和平和自由同盟盟員。——第466頁。
- 威克菲尔德,爱德华(Wakefield, Edward 1774—1854)——英国资产阶级統計学家和农学家, “爱尔兰統計数字和政治情况”一书的作者。——第535—538、541、543—548、559、560頁。
- 威斯特华倫,斐迪南·馮(Westphalen, Ferdinand von 1799—1876)——普魯士反动国家活动家, 曾任內务大臣(1850—1858), 馬克思夫人燕妮·馬克思的異母兄。——第409頁。
- 威斯特华倫,路德維希·馮(Westphalen, Ludwig von 1770—1842)——特利尔的樞密顧問, 馬克思夫人燕妮的父亲。——第409頁。
- 威廉一世(Wilhelm I 1797—1888)——普魯士亲王, 摄政王(1858—1861), 普魯士国王(1861—1888), 德国皇帝(1871—1888)。——第190、204頁。
- 威廉斯,燕·(Williams, J.)——見馬克思,燕妮。
- 威廉斯,查理·欧文(Williams, Charles Owen)——英国工联主义者, 职业是抹灰工, 国际总委员会委員(1868—1869)。——第375頁。
- 科克(Corc 五世紀)——曼斯特国王, 据爱尔兰編年史說, 他参加了法律汇編“古制全书”的編纂工作。——第554頁。
- 科勒,約瑟夫(Collet, Joseph)——法国新聞工作者, 共和主义者, 侨居倫敦, “国际信使”編輯, 国际总委员会委員(1866—1867)。——第615、616、630頁。
- 科倫巴(Columba 521左右—597)——爱尔兰傳教士, 苏格兰基督教牧师。——第563頁。
- 科貝特,威廉(Cobbett, William 1762—1835)——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論家, 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著名代表人物, 曾为英国政治制度的民主化而进行斗争。——第668頁。
- 科苏特,拉約什(路德維希)(Kossuth, Lajos (Ludwig) 1802—1894)——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領袖, 在1848—1849年革命中領導资产阶级民主派,

匈牙利革命政府首腦；革命失敗後逃離匈牙利，五十年代曾向波拿巴主義者集團求援。——第100頁。

科納耳，埃茲拉 (Cornell, Ezra 1807—1874) ——美國資本家和慈善家，伊薩卡 (美國) 科納耳大學的創辦人。——第542頁。

科拉切克，阿道夫 (Kolatschek, Adolph 1821—1889) ——奧地利新聞工作者和政治活動家，1848—1849年為法蘭克福國民議會議員，屬於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德國月刊” (1850—1851) 和“時代呼聲” (1858—1862) 兩雜誌的出版者，1862年創辦“信使報”。——第102頁。

科斯特洛，奧加斯丁 (Costello, Augustin) ——愛爾蘭芬尼亞社社員，美國軍官，1867年到愛爾蘭參加起義，被捕並判處十二年苦役。——第679頁。

科馬克·烏爾法達 (Cormac Ulfadha 三世紀) ——愛爾蘭國王。——第560頁。

科馬克·麥魁倫奈恩 (Cormac MacCuilennain) ——卡舍耳國王和主教 (901—908)。——第555頁。

十 画

席利，維克多 (Schily, Victor 1810—1875) ——德國民主主義者，職業是律師，1849年巴登—普法爾茨起義的參加者；後僑居法國，國際會員，當總委員會為國際在巴黎的鞏固進行鬥爭時幫助總委員會，1865年倫敦代表會議的參加者。——第90、92、103、592頁。

桑頓，威廉·托馬斯 (Thornton, William Thomas 1813—1880) ——英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約翰·斯圖亞特·穆勒的追隨者。——第164頁。

唐寧，麥卡錫 (Downing, MacCarthy)

——愛爾蘭政治活動家，自由黨人，議會議員。——第689、690頁。

泰伯特，邁克爾 (Terbert, Michael) ——愛爾蘭芬尼亞社社員，1866年被判處七年苦役，1870年死於獄中。——第459—462頁。

俾斯麥公爵，奧托·馮·申豪森 (Bismark, Otto, von Schönhausen, Fürst von 1815—1898) ——普魯士和德國國家活動家和外交家，普魯士容克的代表；曾任駐彼得堡大使 (1859—1862) 和駐巴黎大使 (1862)，普魯士首相 (1862—1871)，德意志帝國首相 (1871—1890)；以反革命的方法實現了德國的統一；工人運動的死敵，曾制定反社會黨人非常法 (1878)。——第68、81、191、256、369、424、488、489、590頁。

倍倍爾，奧古斯特 (Bebel, August 1840—1913) ——國際工人運動和德國工人運動的傑出活動家，職業是旋工；1867年起領導德國工人協會聯合會，第一國際會員，1867年起為國會議員，德國社會民主黨創始人和領袖之一，曾進行反對拉薩爾派的鬥爭，普法戰爭時期採取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立場，支持巴黎公社；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的朋友和戰友，第二國際的活動家，在九十年代和二十世紀初反對改良主義和修正主義，但是也犯過一系列中派性質的錯誤，特別是在他活動的後期。——第380頁。

熱拉爾，巴爾塔扎爾 (Gérard, Balthasar 1558—1584) ——狂熱的天主教徒，1584年刺殺了十六世紀尼德蘭資產階級革命著名活動家奧倫治的威廉親王。——第108頁。

哥特羅，茹爾 (Gottraux, Jules) ——英國籍的瑞士人，國際會員。——第615頁。

- 烏尔卡尔特, 戴維 (Urquhart, David 1805—1877) —— 英国外交家, 反动的政論家和政治活动家, 亲土耳其分子; 三十年代在土耳其执行外交任务, 議會議員 (1847—1852), “自由新聞” (1866年起改名为“外交評論”) 杂志的创办人和編輯 (1855—1877)。——第 125 頁。
- 庫克基亚里, 多美尼科 (Cucchiari, Domenico 1806—1900) —— 意大利將軍, 1859 年奧意法战争的参加者, 1866 年普奥战争时任軍长。——第 201 頁。
- 特里門希尔, 休·西摩尔 (Tremenheere, Hugh Seymour 1804—1893) —— 英国官員和政論家, 曾屢次参加政府的工人劳动条件調查委员会。——第 8 頁。
- 索林 (凱尤斯·尤利烏斯·索林) (Caius Julius Solinus 三世紀上半叶) —— 古羅馬的作家。——第 559 頁。
- 索魯斯特里 (Solustri, F.) —— 受馬志尼影响的倫敦意大利工人組織——共進会的領導人之一, 国际总委员会委員 (1864 年 11 月—1865 年)。——第 21 頁。
- 海特男爵, 奧古斯特 (Heydt, August, Freiherr von der 1801—1874) —— 普魯士資產階級国家活动家; 貿易、工业和公共工程大臣 (1848 年 12 月—1862 年)。——第 252 頁。
- 海尔維格, 格奥尔格 (Herwegh, Georg 1817—1875) —— 著名的德国詩人, 小資產階級民主主义者, 六十年代附和拉薩尔。——第 95 頁。
- 納斯, 理查·薩斯威尔·伯克, 美奧伯爵 (Naas, Richard Southwell Burke, Earl of Mayo 1822—1872) —— 英国国家活动家, 保守党人, 曾任爱尔兰事务大臣 (1852、1858—1859、1866—1868), 印度总督 (1869—1872)。——第 460、666、684 頁。
- 納皮尔, 威廉·弗兰西斯·帕特里克 (Napier, William Francis Patrick 1785—1860) —— 英国將軍和軍事史学家; 1808—1814 年比利牛斯半島战争的参加者。——第 58 頁。
- 茹弗魯瓦, 昂利 (Jouffroy, Henri) —— 普魯士樞密顧問, 原系法国人, 写有和翻譯了許多政治經濟学和法学方面的著作 (十九世紀二十至四十年代)。——第 354 頁。
- 茹尔登, 古斯达夫 (Jourdain, Gustav) —— 法国小資產階級民主主义者, 1848 年革命后流亡倫敦, 参加費·皮阿集团; 国际总委员会委員 (1864)。——第 21 頁。
- 拿破侖第一·波拿巴 (Napoléon I Bonaparte 1769—1821) —— 法国皇帝 (1804—1814 和 1815)。——第 36、190、227、405、666 頁。
- 拿破侖第三 (路易-拿破侖·波拿巴) (Napoléon III Louis Bonaparte 1808—1873) —— 拿破侖第一的侄子, 第二共和国總統 (1848—1851), 法国皇帝 (1852—1870)。——第 35、36、79、97、175、177、367、389、397、405、411、421、450、499、693 頁。
- 爱德华三世 (Edward III 1312—1377) —— 英国国王 (1327—1377)。——第 302、345 頁。
- 爱因哈德 (爱金哈特) (Einhard (Eginhart) 770 左右—840) —— 法兰克历史編纂学家, 查理大帝傳記的作者。——第 561 頁。
- 爱尔維修, 克劳德·阿德里安 (Helvétius, Claude-Adrien 1715—1771) —— 杰

- 出的法国哲学家，机械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无神論者，法国的革命資產階級的思想家之一。——第34頁。
- 班迪亚，亞諾什 (Bangya, János 1817—1868) ——匈牙利新聞記者和軍官，匈牙利1848—1849年革命的參加者；革命失敗後成為科蘇特的國外密使，同時也是秘密警探；後來改名穆罕默德-貝伊到土耳其軍隊中供職，在切爾克斯人反俄戰爭時期作為土耳其間諜在高加索進行活動(1855—1858)。——第100頁。
- 班尼亞加蒂 (Bagnagatti, G.) ——受馬志尼影響的倫敦意大利工人組織——共進會的書記；國際總委員會委員(1864年11月—1865年)。——第21頁。
- 涅姆契克，愛德華·理查·尤利烏斯 (Niemtzik, Eduard Richard Julius 1838—1897) ——斯洛伐克工人運動的積極活動家，布拉的斯拉發(普勒斯堡)國際工人聯合會“前進”的組織者之一(1869)。——第428頁。
- 涅謝爾羅迭，卡爾·瓦西里也維奇 (Несельроде, Карл Васильевич 1780—1862) ——伯爵，俄國國家活動家和外交家，外交大臣(1816—1856)。——第225頁。
- 恩斯特 (Ernst 1824—1899) ——奧地利大公，將軍，1866年普奧戰爭時任軍長。——第210頁。
- 恩格斯，弗里德里希 (Engles, Friedrich 1820—1895) (傳記材料)。——第39、88、89、93、95—98、104、366—368、372、373、446—448、489頁。
- 紐曼，威廉 (Newman, William) ——見紐馬奇，威廉。
- 紐曼，弗蘭西斯·威廉 (Newman, Francis William 1805—1897) ——英國語文學家和政論家，資產階級激進主義者，寫有許多宗教、政治和社會問題方面的著作。——第122、291頁。
- 紐馬奇，威廉 (Newmarch, William 1820—1882) ——英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和統計學家。——第662頁。
- 埃拉 (Ælla 死於867年) ——諾森伯里亞國王(862左右—867)。——第565頁。
- 埃爾，愛德華·約翰 (Eyre, Edward John 1815—1901) ——英國殖民官，牙買加總督(1864—1866)，曾鎮壓1865年的黑人起義。——第397頁。
- 埃卡留斯，約翰·格奧爾格 (Eccarius, Johann Georg 1818—1889) ——著名的國際工人運動和德國工人運動活動家，工人政論家，職業是裁縫；僑居倫敦，正義者同盟盟員，後為共產主義者同盟盟員，倫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協會的領導人之一，1864年9月28日聖馬丁堂會議的參加者，國際總委員會委員(1864—1872)，總委員會總書記(1867—1871)，美國通訊書記(1870—1872)，國際歷次代表大會和代表會議的代表；後來成為英國工聯的改良派領袖之一。——第22、106、110、247、365、400、403、432、493、609、634、663頁。
- 埃德爾斯海姆，列奧波德-威廉，1868年起稱埃德爾斯海姆-杜拉伊 (Edelsheim, Leopold Wilhelm, Edelsheim-Gyulai 1826—1893) ——奧地利將軍，1866年普奧戰爭時任騎兵師師長。——第205、209頁。
- 格桑-哈第，格桑 (Gathorne-Hardy, Gathorne 1814—1906) ——英國國家活動家，保守黨人，曾任內務大臣

- (1867—1868)。——第246頁。
- 格林, 雅科布 (Grimm, Jacob 1785—1863) ——杰出的德国語文学家, 德国民間創作搜集家, 柏林大学教授。——第559、571頁。
- 格納迪 (Gennadius 五世紀) ——高卢作家。——第561頁。
- 格律恩, 卡尔 (Grün, Karl 1817—1887) ——德国小资产阶级政論家, 四十年代中为“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第31頁。
- 格罗斯密斯, 約翰 (Grossmith, John) ——英国民主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参加者, 国际总委员会委員 (1864年11月—1865年)。——第22頁。
- 格萊斯頓, 威廉·尤尔特 (Gladstone, William Ewart 1809—1898) ——英国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人, 后为皮尔分子, 十九世紀下半叶为自由党領袖之一, 曾任財政大臣 (1852—1855 和 1859—1866) 和首相 (1868—1874、1880—1885、1886、1892—1894)。——第5、7、377、378、433、458—460、499、664—669、671、673、675、678—681、682—688、692—694、697、698頁。
- 格雷, 罗吉尔·毛· (Gray, Roger Maurer) ——英国泥水匠, “蜂房报”股份公司董事会董事长, 1864年9月28日圣馬丁堂會議的参加者, 国际总委员会委員 (1864—1865), 改革同盟盟員。——第21頁。
- 格雷夫斯, 查理 (Graves, Charles 1812—1899) ——爱尔兰学者, 数学家, 1852—1899年是政府古爱尔兰法律編譯出版委员会委員, 1866年起为里美黎克主教。——第553頁。
- 格雷維耳-紐金特, 雷金納德 (Greville-Nugent, Reginald) ——爱尔兰軍官, 自由党人。——第698頁。
- 格雷哥里十三 (Gregory XIII 1502—1585) ——羅馬教皇 (1572—1585)。——第507頁。
- 馬丁, 約翰 (Martin, John 1812—1875) ——爱尔兰政治活动家, 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民族解放运动的参加者, 民族同盟的創始人之一 (1864), 爱尔兰自治同盟的名譽書記, 議會議員 (1871—1875)。——第698頁。
- 馬志尼, 朱澤培 (Mazzini, Giuseppe 1805—1872) ——意大利革命家,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領袖之一; 1849年为羅馬共和国临时政府首脑, 1850年是倫敦欧洲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組織者之一; 1864年成立国际时企图置国际于自己影响之下。——第27、588、597頁。
- 馬瓜伊尔, 托馬斯 (Maguire, Thomas) ——爱尔兰水手, 1867年被控图謀組織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員越獄而被非法逮捕, 被判处絞刑; 不久获釋。——第246頁。
- 馬考萊, 托馬斯·巴賓頓 (Macaulay, Thomas Babington 1800—1859) ——英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輝格党人, 議會議員。——第573頁。
- 馬尔薩斯, 托馬斯·罗伯特 (Malthus, Thomas Robert 1766—1834) ——英国教士, 經濟学家, 资产阶级化的地主貴族的思想家, 资本主义制度的辯护人, 宣傳仇視人类的人口論。——第29、159頁。
- 馬基雅弗利, 尼古洛 (Machiavelli, Niccolò 1469—1527) ——意大利政治活动家, 历史学家和作家, 资本主义关系

产生时期意大利資產階級的思想家之一。——第424、675頁。

馬其頓王亚历山大 (Alexander the Great 公元前356—323)——古代著名的統帥和国家活动家。——第551頁。

馬克思, 卡尔 (Marx, Karl 1818—1883) (傳記材料)。——第22、23、25—34、36、88、95—105、110、113、121、185、230、232、233、236—244、247、248、252—258、260—264、267—271、299—328、336、340、341、343、345、353、354、358、366、372、380、381、400、403—413、446、447、463—465、478、487、488、579、588、597、604、608、610—612、632、634—637、640、643、645、646、648—650、654、655、664、668、669、701—703頁。

馬克思, 燕妮 (Marx, Jenny 1814—1881) (父姓是馮·威斯特華倫 geb. von Westphalen) ——卡尔·馬克思的妻子, 他的忠实朋友和助手。——第409、635、636頁。

馬克思, 燕妮 (Marx, Jenny 1844—1883) ——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 卡尔·馬克思的大女儿, 1872年起为沙·龙格的妻子。——第670頁。

十一画

培列, 昂利 (Perret, Henri) ——瑞士工人运动活动家, 雕刻工, 在瑞士的国际领导人之一, 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盟員 (1868—1869), 罗曼語区联合会委员会总書記 (1868—1873), “平等报”編輯, 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 (1866)、巴塞尔代表大会 (1869) 和倫敦代表會議 (1871) 的代表; 1869年和巴枯宁派断絕关系, 但在国际海牙代表大会后采取調和主义立場。——第477頁。

梯也尔, 阿道夫 (Thiers, Adolphe 1797—1877) ——法国資產階級历史学家和国家活动家, 曾任內务大臣 (1832、1834), 首相 (1836、1840), 共和国總統 (1871—1873), 鎮压巴黎公社的劊子手。——第34頁。

盖布, 奥古斯特 (Geib, August 1842—1879)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汉堡的书商; 全德工人联合会會員; 1869年爱森納赫代表大会的参加者和社会民主工党的創始人之一, 党的财务委員 (1872—1878), 德意志帝国国會議員 (1874—1877)。——第253、487頁。

荷兰的威廉——見奥倫治的威廉三世。

莎士比亚, 威廉 (Shakspeare, William 1564—1616) ——偉大的英国作家。——第693、694頁。

威美尔曼, 威廉 (Zimmermann, William 1807—1878) ——德国历史学家, 小資產階級民主主义者, 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 法兰克福国民議會議員, 屬於左派; 1841—1843年出版的“德国农民战争史”的作者。——第446頁。

累布欽斯基 (Rybczinsky, F.) ——在倫敦的波兰侨民, 国际总委员会委員 (1864)。——第21頁。

得比伯爵, 爱德华·乔治·杰弗里·史密斯·斯坦利 (Derby, Edward George Geoffrey Smith Stanley, Earl of 1799—1869) ——英国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領袖, 后为保守党領袖之一; 首相 (1852、1858—1859、1866—1868)。——第460、685頁。

異教徒佩拉吉阿斯 (Pelagius Heretic 約360—420) ——中世紀不列顛神学家, 因宣揚人的自由意志的教义被宣布为異教徒。——第561頁。

梅拉·龐波尼烏斯 (Mela Pomponius 一世紀) —— 羅馬地理學家, “地理”三卷集的作者。——第 541、542 頁。

梅涅尼·阿格利巴 (Menenius Agrippa 死于公元前 493 年) —— 古羅馬的貴族。——第 117 頁。

朗敏, 威廉 (Ramming, Wilhelm 1815—1876) —— 奧地利將軍, 曾參加鎮壓匈牙利和意大利的 1848—1849 年革命, 1859 年奧意法戰爭的參加者, 1866 年普奧戰爭時任軍長。——第 207—209 頁。

朗梅德, 約翰 (Longmaid, John) —— 英國工人運動活動家, 1864 年 9 月 28 日聖馬丁堂會議的參加者, 國際總委員會委員 (1864—1865), 曾參加改革同盟執行委員會。——第 22、110 頁。

曼托伊費爾, 奧托·泰奧多爾 (Manteuffel, Otto Theodor 1805—1882) —— 男爵, 普魯士國家活動家, 貴族官僚的代表, 曾任內務大臣 (1848—1850), 首相兼外交大臣 (1850—1858)。——第 62、64、65、73、81、252 頁。

曼托伊費爾, 愛得文·漢斯·卡爾 (Manteuffel, Edwin Hans Karl 1809—1885) —— 普魯士將軍, 後為元帥; 1866 年普奧戰爭時任美因河軍團司令。——第 207 頁。

康德, 伊曼努爾 (Kant, Immanuel 1724—1804) —— 杰出的德國哲學家, 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德國唯心主義的創始人。——第 29、31 頁。

康佩里奧, 菲力浦 (Camperio, Philipp 1810—1882) —— 瑞士國家活動家, 原系意大利人, 法學家, 大會議議員 (1847—1870), 日內瓦政務會議主席兼司法和警務部部長 (1868)。——第 492 頁。

勒·呂貝, 維克多·普· (Le Lubez, Victor-P. 約生于 1834 年) —— 在倫敦的法國僑民, 和法英兩國的資產階級共和主義激進派有聯繫; 曾參加 1864 年 9 月 28 日聖馬丁堂會議, 國際總委員會委員 (1864—1866), 法國通訊書記 (1864—1865), 1865 年倫敦代表會議的參加者, 由於進行陰謀活動和誹謗被日內瓦代表大會 (1866) 開除出總委員會。——第 21、106、586—588、597 頁。

勒魯 (Le Roux) —— 在倫敦的法國僑民, 國際總委員會委員 (1864 年 10 月—1865 年)。——第 21 頁。

勒維, 約瑟夫·莫澤斯 (Levy, Joseph Moses 1812—1888) —— “每日電訊”的創辦人之一和發行人。——第 678 頁。

勒弗爾, 昂利 (Lefort, Henri 1835—1917) —— 法國新聞工作者, 資產階級共和黨人, 曾參加“聯合”雜誌編輯部; 參加了 1864 年 9 月 28 日聖馬丁堂會議的準備工作, 1865 年 3 月拒絕參加國際的一切活動。——第 90—92、587 頁。

基佐, 弗朗斯瓦·比埃爾·吉約姆 (Gizot, François-Pierre-Guillaume 1787—1874) —— 法國資產階級歷史學家和國家活動家, 1840 年至 1848 年二月革命期間實際上操縱了法國的內政和外交, 代表大金融資產階級的利益。——第 409 頁。

基利恩 (Kilian 死于 697 年) —— 愛爾蘭傳教士, 東法蘭克尼亞基督教牧師, 維爾茨堡第一個主教。——第 563 頁。

基卜生, 威廉 (Gibson, William) —— 美國全國勞工同盟盟員, 同盟的國際聯絡書記。——第 629—632 頁。

基卡姆, 查理·約瑟夫(Kickham, Charles Joseph 1826—1882) —— 爱尔兰新聞工作者, 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民族解放运动的参加者, 芬尼亚社社員, “爱尔兰人民”周报編輯之一(1865), 1865年被捕, 被判处十四年苦役, 1869年获釋。——第457、679、699、700頁。

基姆拜特(Cimbaoth 公元前三世紀) —— 編年史中所提到的古代奧爾斯脫的执政。——第551頁。

基謝廖夫, 巴維尔·德米特利也維奇(Киселев, Павел Дмитриевич 1788—1872) —— 伯爵, 俄国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 將軍, 1829—1834年是俄国駐莫尔达維亞和瓦拉几亞行政首腦, 1835年起一直为有关农民問題的各个秘密委員會的委員; 1837年起任国家产业大臣; 主張实行温和的改良措施。——第343頁。

莫里索(Morisot) —— 国际总委員會委員(1864)。——第21頁。

莫里斯, 捷維(Maurice, Zévy) —— 国际总委員會委員(1866—1872), 匈牙利通訊書記(1870—1871)。——第375頁。

莫里逊, 費恩斯(Moryson, Fynes 1566—1630) —— 英国旅行家, “游記”的作者, 书中有一章記叙了爱尔兰。——第557頁。

莫利紐, 威廉(Molyneux, William 1656—1698) —— 爱尔兰哲学家, 曾研究数学和天文学。——第510頁。

莫罗佐·德拉·罗卡, 恩利科(Morozzo della Rocca, Enrico 1807—1897) —— 意大利將軍, 陸軍和海軍大臣(1849), 1859年奧意法战争时任意大利总參謀长, 1866年普奧战争时任意軍軍长。——第201頁。

莫扎特, 沃尔弗干格·亞馬多(Mozart, Wolfgang Amadeus 1756—1791) —— 偉大的奧地利作曲家。——第584頁。

莫特斯赫德, 托馬斯(Mottershead, Thomas J.) —— 英国織布工人, 总委員會委員(1869—1872), 丹麦通訊書記(1871—1872), 1871年倫敦代表會議和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 在总委員會和不列顛联合会委員會中反对馬克思的路綫。——第668、669頁。

十二画

斐迪南二世(Ferdinand II 1810—1859) —— 那不勒斯国王(1830—1859), 由于1848年炮击墨西拿而得到“炮彈国王”的諱号。——第460、680頁。

腊蒂, 約翰(Rutty, John 1698—1775) —— 爱尔兰医生和气象学家, 写有許多医学和气象学方面的著作。——第544、545頁。

閔采尔, 托馬斯(Münzer, Thomas 1490左右—1525) —— 偉大的德国革命家, 宗教改革时期和1525年农民战争时期为农民平民陣營的領袖和思想家, 宣傳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的思想。——第446頁。

舒尔采-德里奇, 海尔曼(Schulze-De-litsch, Hermann 1808—1883) —— 德国政治活动家和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学家, 主張在普魯士的霸权下統一德国, 民族联盟党的創始人之一; 六十年代是进步党領袖之一, 他企图用組織合作社的办法来使工人脫离革命斗争。——第63、103、232、374、590頁。

惠特洛克(Whitlock, J.) —— 英国工联主义者, 1864年9月28日圣馬丁堂会

- 議的參加者，國際總委員會委員(1864—1865)，總委員會財務書記，改革同盟盟員。——第22、110頁。
- 富蘭克林，本杰明(Franklin, Benjamin 1706—1790)——杰出的美國政治活動家和外交家，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北美獨立戰爭的參加者，大學者，物理學家和經濟學家。——第137頁。
- 策列斯提烏斯(Cölestius (Cälestius) 四世紀中至五世紀初)——愛爾蘭傳教的修道士。——第561頁。
- 傅立叶，沙爾(Fourier, Charles 1772—1837)——偉大的法國空想社會主義者。——第29、242、263、559頁。
- 提格爾納赫·奧布萊恩(Tigernach (Tighearnach O'Braien) 死于1088年)——愛爾蘭的修道院院長和編年史家。——第551頁。
- 琼斯，理查(Jones, Richard 1790—1855)——英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他的著作反映了政治經濟學古典學派的衰落和瓦解，同時他却在許多政治經濟學問題上超過了李嘉圖。——第168頁。
- 敦加爾(Dungal 約死于827年)——愛爾蘭僧侶，學者和詩人，820年左右受聘到帕維亞講學。——第563頁。
- 敦克尔，弗兰茨(Duncker, Franz 1822—1888)——德國出版商，資產階級進步黨著名活動家，1868年同麥·希爾施一起創建了改良主義工會，一直存在到1933年，人稱希爾施—敦克尔工會。——第233、242、374頁。
- 湯姆，亞歷山大(Thom, Alexander 1801—1879)——愛爾蘭出版商。——第547頁。
- 湯恩，提奧博德·沃爾夫(Tone, Theobald Wolfe 1763—1798)——杰出的愛爾蘭資產階級革命民主主義者，“愛爾蘭人聯合會”的創始人和領導人，愛爾蘭1798年起義的組織者之一。——第506、512頁。
- 黑爾斯，約翰(Hales, John 生于1839年)——英國工聯主義運動活動家，職業是織工，國際總委員會委員(1866—1872)和書記；曾參加改革同盟以及土地和勞動同盟，國際倫敦代表會議(1871)和海牙代表大會(1872)代表；從1872年初起領導不列顛聯合會委員會中的改良派，反對馬克思，企圖奪取國際在英國的組織的領導權。——第375、403頁。
- 黑格爾，喬治·威廉·弗里德里希(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1770—1831)——德國古典哲學最大的代表，客觀唯心主義者，極全面地發展了唯心主義辯證法。——第29、409、563頁。
- 黑爾瓦爾特·馮·比滕費爾德，卡爾·艾伯哈特(Herwarth von Bittenfeld, Karl Eberhard 1796—1884)——普魯士將軍，1871年起為元帥；1864年丹麥戰爭的參加者，1866年普奧戰爭時任易北河軍團司令。——第205、208、209頁。
- 萊蓋雷(Laeghaire (Loeghaire) 死于458年)——愛爾蘭國王(428—458)。——第554頁。
- 萊昂斯，羅伯特·斯賓塞·戴爾(Lyons, Robert Spenser Dyer 1826—1886)——愛爾蘭醫生，自由黨人，1870年為政府對英國監獄中的愛爾蘭政治犯待遇調查委員會委員。——第673頁。
- 萊斯利，托馬斯·愛德華·克利夫(Leslie, Thomas Edward Cliffe 1827左右

- 1882) ——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第 501、521 頁。
- 費格勒(Voegele, A.)——1859 年是倫敦霍林格爾的印刷所排字工人。——第 25 頁。
- 費里埃, 弗朗斯瓦·路易·奧古斯特(Ferrier, François-Louis-Auguste 1777—1861)——法國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家, 國家官員, 重商主義的追隨者。——第 232 頁。
- 費爾巴哈, 路德維希(F Feuerbach, Ludwig 1804—1872)——馬克思以前最杰出的唯物主義哲學家, 德國古典哲學代表人物之一。——第 29、228 頁。
- 費爾斯特林格, 艾米爾(Försterling, Emil 1827—1872)——前全德工人聯合會會員, 職業是銅匠, 哈茨費爾特建立的“拉薩爾派全德工人聯合會”主席(1867—1868), 北德意志聯邦國會議員(1867—1870)。——第 372 頁。
- 普芬德, 卡爾(Pfänder, Karl 1818—1876)——德國工人運動活動家, 畫家, 1845 年起僑居倫敦, 倫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協會會員, 共產主義者同盟中央委員會委員, 國際總委員會委員(1864 年 11 月—1867 年和 1870—1872),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的朋友和戰友。——第 22、110 頁。
- 普魯斯, 亨利·奧斯丁(Bruce, Henry Austin 1815—1895)——英國國家活動家, 自由黨人, 曾任內務大臣(1868—1873)。——第 430、458、665、679、683—685、689—691、696、697 頁。
- 普耳茨, 路德維希(Pulz, Ludwig 生于 1823 年)——奧地利將軍, 1866 年普奧戰爭時任騎兵旅旅長。——第 201 頁。
- 普林尼(凱尤斯·普林尼·塞孔德)(Caius Plinius Secundus 23—79)——羅馬博物學家, “博物志”三十七卷集的作者。——第 559 頁。
- 普蘭塔日奈家的亨利二世(Henry II Plantagenet 1133—1189)——英國國王(1154—1189)。——第 507 頁。
- 凱西, 約翰(Casey, John)——愛爾蘭芬尼亞社社員, 1866 年被捕並被判處五年苦役。——第 695、696 頁。
- 凱撒(凱尤斯·尤利烏斯·凱撒)(Caius Julius Caesar 公元前 100 左右—44)——著名的羅馬統帥和國家活動家。——第 571 頁。
- 凱里, 馬丁·亨利(Carey, Martin Henley)——愛爾蘭新聞工作者, 芬尼亞社社員, 1865 年被判處五年苦役。——第 457、666、672 頁。
- 凱恩, 羅伯特·約翰(Kane, Robert John 1809—1890)——愛爾蘭學者, 化學和物理教授, 也研究愛爾蘭經濟問題。——第 530、545 頁。
- 凱爾德, 詹姆士(Caird, James 1816—1892)——蘇格蘭農學家, 自由黨人, 議會議員, 寫有許多關於英格蘭和愛爾蘭土地問題的著作。——第 538、539 頁。
- 凱爾涅赫(Cairnech 五世紀)——愛爾蘭基督教傳教士, 法律匯編“古制全書”的編纂者之一。——第 554 頁。
- 菲格斯(Fergus 五世紀)——愛爾蘭詩人, 法律匯編“古制全書”的編纂者之一。——第 554 頁。
- 菲力浦二世(Felipe II 1527—1598)——西班牙國王(1556—1598)。——第 108 頁。
- 菲力浦親王(Philippe, prince 1837—1905)——弗蘭德伯爵, 比利時國王列奧波特一世之子。——第 396 頁。

- 菲力浦斯, 温德耳 (Phillips, Wendell 1811—1884)——美国著名的社会和政治活动家, 卓越的演说家, 废奴运动革命派领袖之一, 赞成用革命的斗争方法来反对南部奴隶主; 七十年代参加了工人运动, 主张在美国建立独立的工人政党, 1871年加入国际。——第 629 页。
- 菲兹吉拉德, 约翰·戴维 (Fitzgerald, John David 1816—1889)——爱尔兰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自由党人, 议会议员; 屡任英国管理爱尔兰机构中的高级司法官。——第 698 页。
- 菲兹吉拉德, 爱德华 (Fitzgerald, Edward 1763—1798)——爱尔兰资产阶级革命家, “爱尔兰人联合会”的组织者之一, 曾领导 1798 年爱尔兰起义的准备工作。——第 506、512 页。
- 博特, 杰腊德 (Boate, Jerrard 1604—1650)——英国医生, 荷兰人, “爱尔兰自然史”一书作者。——第 543 页。
- 博恩, 亨利·乔治 (Bohn, Henry George 1796—1884)——英国出版商。——第 556 页。
- 博凯, 让·巴蒂斯特 (Bocquet, Jean-Baptist)——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共和主义者, 曾参加法国 1848 年革命, 后流亡伦敦, 赫尔岑的朋友; 1864 年 9 月 28 日圣马丁堂会议的参加者,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1864—1865)。——第 21 页。
- 博勒特, 亨利希 (Bolleter, Heinrich)——在伦敦的德国侨民, 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会员,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1864 年 11 月—1865 年); 1865 年伦敦代表会议的参加者。——第 22、110 页。
- 博弗尔, 丹尼尔·奥加斯特斯 (Beaufort, Daniel Augustus 1739—1821)——爱尔兰地理学家和教士, 原系法国人, “爱尔兰地图说明”一书的作者。——第 537 页。
- 博尔达日 (Bordage, P.)——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1864 年 10 月—1866 年), 1865 年伦敦代表会议的参加者, 曾加入伦敦法国人支部。——第 21、110 页。
- 斯奈德, 雅科布 (Snider, Jacob 死于 1866 年)——美国发明家, 发明了后装针发膛枪。——第 430 页。
- 斯诺里·斯土鲁桑 (Snorri Sturluson 1178 左右—1241)——杰出的冰岛中世纪的歌唱诗人和编年史家。——第 564、565 页。
- 斯提芬斯, 詹姆斯 (Stephens, James 1825—1901)——爱尔兰小资产阶级革命家, 芬尼亚社组织——爱尔兰革命兄弟会的领导人; 1866 年流亡美国。——第 629 页。
- 斯塔克普耳, 威廉 (Stacpoole, William)——爱尔兰军官, 自由党人, 议会议员 (1860—1880)。——第 673 页。
- 斯宾塞, 约翰·波因茨 (Spencer, John Poyntz 1835—1910)——伯爵, 英国国家活动家, 自由党人, 爱尔兰总督 (1868—1874 和 1882—1885); 海軍首席大臣 (1892—1895)。——第 693 页。
- 斯宾塞, 艾德蒙 (Spencer, Edmund 1552 左右—1599)——英国诗人, 爱尔兰总督的秘书 (1580—1582); “爱尔兰现状一瞥”一书的作者。——第 557 页。
- 斯坦利, 爱德华·亨利, 1869 年起为得比伯爵 (Stanley, Edward Henry, Earl of Derby 1826—1893)——英国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人, 六十至七十年代是保守党人, 后为自由党人; 曾任殖民大

- 臣(1858、1882—1885), 印度事務大臣(1858—1859), 外交大臣(1866—1868、1874—1878), 愛德華·得比之子。——第360、615頁。
- 斯坦斯比(Stainsby, J. D.) ——英國工聯主義者; 職業是裁縫; 1864年9月28日聖馬丁堂會議的參加者, 國際總委員會委員(1864—1868), 曾參加改革同盟執行委員會和工人代表同盟執行委員會。——第22、110頁。
- 斯特拉本(Strabon 約公元前63—公元20) ——古希臘最著名的地理學家和歷史學家。——第558頁。
- 斯特普尼, 考威爾·威廉·弗雷德里克(Stepney, Cowell William Frederick 1820—1872) ——英國工人運動活動家, 改革同盟盟員, 國際總委員會委員(1866—1872)和財務委員(1868—1870), 國際布魯塞爾代表大會(1868)、巴塞爾代表大會(1869)和倫敦代表會議(1871)代表, 不列顛聯合會委員會委員(1872)。——第375、400、403、432頁。
- 斯圖亞特王朝(Stuarts) ——1371年起統治蘇格蘭和英國(1603—1649、1660—1714)的王朝。——第509頁。
- 斯圖亞特, 詹姆士(Steuart, James 1712—1780) ——英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 重商主義的最后代表人物之一, 貨幣數量論的反对者。——第326頁。
- 斯密, 亞當(Smith, Adam 1723—1790) ——英國經濟學家, 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最杰出代表人物之一。——第103、134、142、167、255頁。
- 斯密斯, 高德文(Smith, Goldwin 1823—1910) ——英國資產階級歷史學家, 經濟學家和政論家; 自由黨人; 英國在愛爾蘭的殖民主義政策的辯護士; 1868年遷居美國; 1871年起住在加拿大。——第524、549、570、573頁。
- 斯密斯, 愛德華(Smith, Edward 1818左右—1874) ——英國醫生, 樞密院衛生顧問和調查工人區居民飲食狀況的醫務專使。——第6頁。

十三画

- 瑟美列, 貝爾塔蘭(Szemere, Bertalan 1812—1869) ——匈牙利政治活動家和政論家; 曾任內務大臣(1848)和革命政府首腦(1849); 革命失敗后逃離匈牙利。——第101頁。
- 楊格, 阿瑟(Young, Arthur 1741—1820) ——英國農學家和資產階級經濟學家, 貨幣數量論的擁護者。——第534—538、543頁。
- 雷克, 喬治(Lake, George) ——英國工聯主義者, 職業是細木工, 國際總委員會委員(1864)和改革同盟盟員。——第22頁。
- 塔朗迪埃, 比埃爾·德奧多·阿爾弗勒德(Talandier, Pierre-Théodore-Alfred 1822—1890) ——法國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 記者, 法國1848年革命的參加者; 1851年政變后流亡倫敦, 亞·伊·赫爾岑的朋友, 國際總委員會委員(1864); 法國議會議員(1876—1880、1881—1885)。——第21頁。
- 蒙塔朗貝爾, 沙爾(Montalembert, Charles 1810—1870) ——法國政治活動家和政論家, 第二共和國時期是制憲議會和立法議會議員, 奧爾良黨人, 天主教黨的首領; 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變時期支持路易·波拿巴, 但不久成為反对派。——第229頁。

- 塞塔奇 (Setacci, C.) —— 受馬志尼影响的倫敦意大利工人組織——共進會的領導人之一；國際總委員會委員 (1864年10月—1865年)。——第21頁。
- 塞維爾的伊西多爾 (Isidorus de Sevilla 570左右—636) —— 西班牙主教，天主教著作家。——第561頁。
- 詹克斯 (Janks, A.) —— 國際總委員會委員 (1865)。——第110頁。
- 詹姆斯一世 (James I 1566—1625) —— 英國國王 (1603—1625)。——第508、574頁。
- 詹姆斯二世 (James II 1633—1701) —— 英國國王 (1685—1688)。——第506、509頁。
- 福格特，卡爾 (Vogt, Karl 1817—1895) —— 德國自然科學家，庸俗的唯物主義者，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1848—1849年為法蘭克福國民議會議員，屬於左派；1849年6月為帝國攝政之一，1849年逃離德國，五十至六十年代是路易·波拿巴領津貼的密探，對無產階級革命家進行誣蔑性攻擊的積極參加者之一。——第24、25、100、366、411頁。
- 福克斯，彼得 (Fox, Peter 死於1869年) (真名彼得·福克斯·安得列 Peter Fox André) —— 英國民主運動和工人運動活動家，新聞工作者，實證論者；英國波蘭獨立全國同盟領導人之一，1864年9月28日聖馬丁堂會議的參加者，國際總委員會委員 (1864—1869)，1865年起為總委員會報刊的正式通訊員，1866年9—11月為總委員會總書記，美國通訊書記 (1866—1867)；“共和國”週報的編輯之一 (1866)，改革同盟執行委員會委員。——第22、106、110、608、628—633頁。
- 福特斯克-帕金森，契切斯特·賽米爾 (Fortescue-Parkinson, Chichester Samuel 1823—1898) —— 英國國家活動家，自由黨人，議會議員 (1847—1874)，曾任愛爾蘭事務大臣 (1865—1866和1868—1870)，屢任許多國家要職。——第665頁。
- 路易十四 (Louis XIV 1638—1715) —— 法國國王 (1643—1715)。——第286頁。
- 路易-拿破侖 —— 見拿破侖第三。
- 路易-菲利浦 (Louis-Philippe 1773—1850) —— 奧爾良公爵，法國國王 (1830—1848)。——第9頁。
- 路易斯，萊昂 (Lewis, Leon) —— 美國新聞記者，1865年在倫敦被選為總委員會委員和美國通訊書記。——第580頁。
- 路易斯，喬治·康瓦爾 (Lewis, George Cornewell 1806—1863) —— 英國國家活動家，輝格黨人，財政部秘書長 (1850—1852)，1852年至1855年為“愛丁堡評論”雜誌出版者和編輯，財政大臣 (1855—1858)，內務大臣 (1859—1861) 和陸軍大臣 (1861—1863)。——第377頁。
- 奧托，路· —— 見布賴特施韋特，奧托·路德維希。
- 奧謝，亨利 (O'Shea, Henry) —— 愛爾蘭社會活動家，1869年為被囚禁的芬尼亞社社員進行辯護。——第433頁。
- 奧唐奈 —— 見麥克唐奈。
- 奧利里 —— 見墨菲。
- 奧斯本，約翰 (Osborne, John) —— 英國工聯主義者，抹灰工，1864年9月28日聖馬丁堂會議的參加者，國際總委員

- 会委員(1864—1867), 积极参加改革同盟、土地和劳动同盟和工人代表同盟的活动。——第 22、110 頁。
- 奥哲尔, 乔治 (Odger, George 1820—1877) ——英国工联改良派領袖之一, 职业是鞋匠, 曾参加建立工联倫敦理事会, 1862—1872 年为理事会書記, 英国波兰独立全国同盟、土地和劳动同盟和工人代表同盟盟員, 1864 年 9 月 28 日圣馬丁堂會議的参加者, 国际总委员会委員 (1864—1871) 和主席 (1864—1867), 倫敦代表會議 (1865) 和日内瓦代表大会 (1866) 的参加者, 曾参加改革同盟执行委员会, 在爭取英国选举改革的斗争期間与资产阶级有勾結; 1871 年拒絕在总委员会的宣言“法兰西内战”上签名并退出总委员会。——第 22、110、375、403、580、591、608、634、669 頁。
- 奥尔西尼, 切扎雷 (Orsini, Cesare) ——意大利政治流亡者, 国际总委员会委員 (1866—1867), 曾在美国宣傳国际的思想。——第 629 頁。
- 奥勃萊恩, 詹姆斯 (O'Brien, James 1802—1864) (笔名布朗特爾 Bronterre) ——英国政論家, 著名的宪章运动活动家, 三十年代为“貧民卫报”(《The Poor Man's Guardian》) 編輯; 許多社会改革草案的起草人; 1848—1849 年革命后脱离群众性的宪章运动, 1849 年創立全国改革同盟。——第 375 頁。
- 奥馬洪尼, 塔杰烏斯 (O'Mahony, Thaddeus) ——爱尔兰語文学家, 曾与汉考克一起出版了两卷法律汇编“古制全书”。——第 553 頁。
- 奥倫治的威廉三世 (William III of Orange 1650—1702) ——尼德兰总
- 督 (1672—1702), 英国国王 (1689—1702)。——第 506、509、510、574、637 頁。
- 奥克里, 尤金 (O'Curry, Eugene 1796—1862) ——爱尔兰历史学家, 古代手抄本的研究者; 1852 年起任政府古爱尔兰法律編譯出版委员会委員, 写有研究古代爱尔兰手抄本的著作。——第 553 頁。
- 奥克莱里, 迈克尔 (O'Clery, Michael 1575—1643) ——爱尔兰神甫, 編年史家。——第 550 頁。
- 奥頓諾凡, 約翰 (O'Donovan, John 1809—1861) ——爱尔兰語文学家和历史学家, 爱尔兰资产阶级历史編纂学批判派的代表; 1852 年起任政府古爱尔兰法律編譯出版委员会委員。——第 550、552、553、557 頁。
- 奥頓諾凡-罗薩 (O'Donovan Rossa) ——耶·奥頓諾凡-罗薩之妻, 1865—1866 年組織募捐救济爱尔兰政治犯的家屬, 起草了告爱尔兰妇女书, 根据总委员会的决定, 該呼吁书发表在 1866 年 1 月 6 日“工人辯护士报”上。——第 673 頁。
- 奥頓諾凡-罗薩, 耶利米 (O'Donovan Rossa, Jeremiah 1831—1915) ——爱尔兰芬尼亚社的創始人和領袖人之一, “爱尔兰人民报”的发行人 (1863—1865), 1865 年被捕, 被判处无期徒刑, 1870 年获赦, 不久就流亡美国, 在那里領導芬尼亚社; 八十年代脱离政治生活。——第 457、458、668、670、671、673—681、685、694、696、699 頁。
- 奥康瑞尔, 查理 (O'Connor, Charles 1764—1828) ——爱尔兰教士和古物收藏家, 第一版爱尔兰編年史的編譯者。——第 550 頁。

奥康瑙尔, 阿瑟(O'Connor, Arthur 1763—1852)——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活动家, 1797—1798年为“爱尔兰人联合会”的领导人之一和该组织的机关报“新闻报”主编; 于1798年起义前夕被捕, 1803年流亡法国。——第551、552页。

奥康瑙尔, 菲格斯(O'Connor, Feargus 1794—1855)——宪章运动的领袖之一, “北极星报”的创办人和编辑; 1848年后成为改良主义者。——第551、552页。

奥康奈尔, 丹尼尔(O'Connell, Daniel 1775—1847)——爱尔兰律师和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 民族解放运动右翼自由派的领袖。——第504、506、515页。

十四画

马拉基(Malachias 1094左右—1148)——爱尔兰大主教。——第555页。

魁奈, 弗朗斯瓦(Quesnay, François 1694—1774)——法国最杰出的经济学家, 重农学派的创始人; 职业是医生。——第307页。

蒲斯, 约翰·威尔克斯(Booth, John Wilkes 1839—1865)——美国伶人, 美国内战时期拥护南军, 刺杀了美国总统阿·林肯。——第108页。

蒲鲁东, 比埃尔·约瑟夫(Proudhon, Pierre-Joseph 1809—1865)——法国政论家, 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 小资产阶级思想家, 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之一。——第28—36、97、171、242、354、405、409页。

豪费, 阿尔伯特·弗·(Haufe, Albert F.)——住在伦敦的德国裁缝,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6)。——第185页。

豪威耳, 乔治(Howell, George 1833—1910)——英国工联改良派领袖之一, 职业是泥水匠, 前宪章主义者, 工联伦敦理事会书记(1861—1862), 1864年9月28日圣马丁堂会议的参加者,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年10月—1869年), 1865年国际伦敦代表会议的参加者, 改革同盟和工联不列颠代表大会委员会书记(1871—1875)。——第22、110、375、591页。

维耶, 约翰·弗里德里希(Wiehe, Johann Friedrich)——排字工人; 1859年在伦敦霍林格尔的印刷所工作。——第25页。

维尔特, 麦克斯(Wirth, Max 1822—1900)——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和政论家。——第242页。

维克多-艾曼努尔二世(Viktor Emanuel II 1820—1878)——撒丁国王(1849—1861), 意大利国王(1861—1878)。——第199、201页。

维多利亚(Victoria 1819—1901)——英国女王(1837—1901)。——第678页。

赫斯, 莫泽斯(Heß, Moses 1812—1875)——德国小资产阶级政论家, 四十年代中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六十年代是拉萨尔分子; 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和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的参加者。——第40页。

赫伦, 丹尼斯·考耳菲尔德(Heron, Denis Caulfield 1824—1881)——爱尔兰法学家和经济学家, 议会议员(1870)。——第699页。

赫胥黎, 托马斯·亨利(Huxley, Thomas Henry 1825—1895)——英国学者, 自

然科学家，查·达尔文的亲密战友及其学說的普及者，在哲学方面是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第 558、584 頁。

赫尔岑，亚历山大·伊万諾維奇(Герцен, 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1812—1870)——偉大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唯物主义哲学家，政論家和作家；1847 年侨居国外，在国外建立了俄国自由印刷所，并出版“北极星”文集和“钟声”报。——第 478 頁。

十五 画

魯艾，欧仁(Rouher, Eugène 1814—1884)——法国国家活动家，波拿巴主义者，曾任司法部长(1849—1852 年断續地)；1855—1863 年任商业、农业和公共工程大臣，1863—1869 年任国务大臣。——第 361 頁。

魯克拉夫特，本杰明(Lucraft, Benjamin 1809—1897)——英国工联改良派領袖之一，职业是木器匠，1864 年 9 月 28 日圣馬丁堂會議的参加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員(1864—1871)，国际布魯塞尔代表大会(1868)和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代表，改革同盟执行委员会委員，1871 年拒絕在总委员会的宣言“法兰西内战”上签名并退出国际。——第 22、110、375、403、493 頁。

摩尔根(Morgen, W.)——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是鞋匠，国际总委员会委員(1864 年 10 月—1868 年)和改革同盟盟員。——第 19、99、540 頁。

摩尔頓，約翰·查默斯(Morton, John Chalmers 1821—1888)——英国农学家，写有許多农业問題方面的著作，“农业报”編輯(1844—1888)。——第 124 頁。

墨菲(Murphy)(綽号奧利里 O'Leary)——爱尔兰芬尼亚社社員，1864 年由于在爱尔兰王国軍隊中进行鼓动宣傳而被捕，被判处十年苦役。——第 457、671 頁。

墨尔凱希，但尼斯·道林(Mulcahy, Denis Dowling 生于 1840 年)——爱尔兰新聞工作者和医生，芬尼亚社克郎梅尔組織的領袖，爱尔兰革命兄弟会的領袖之一，“爱尔兰人民报”的助理編輯(1863—1865)，1865 年被判处十年苦役，1871 年获赦。——第 457 頁。

德·維特(De Witte, J.)——比利时彩画工人，1867 年建立的国际列日支部临时委员会委員。——第 627 頁。

德·巴普，塞扎尔(De Paepe, César 1842—1890)——比利时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印刷工人，后为医生，国际比利时支部創建人之一，比利时联合会委员会委員，国际倫敦代表會議(1865)、洛桑代表大会(1867)、布魯塞尔代表大会(1868)、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和倫敦代表會議(1871)代表，1872 年海牙代表大会以后曾一度支持巴枯宁派；比利时工人党創建人之一(1885)。——第 593、597 頁。

德拉·罗卡——見莫罗措·德拉·罗卡，恩利科。

德尔，威廉(Dell, William)——英国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活动家，裱糊工，英国波兰独立全国同盟盟員，1864 年 9 月 28 日圣馬丁堂會議的参加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員(1864—1869)和财务委員(1865、1866—1867)，1865 年倫敦代表會議的参加者；改革同盟的領袖人之一。——第 22、110、375、609、634 頁。

德朗克, 恩斯特(Dronke, Ernst 1822—1891)——德国政論家, 起初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 后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和“新萊茵报”編輯之一; 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拥护馬克思和恩格斯; 1851年流亡英国; 后来脫离政治活动而經商。——第100頁。

德金德兰(Derkinderen)——国际总委员会委員(1866—1867), 荷兰通訊書記(1867)。——第247頁。

德努阿尔, 茹尔(Denoual, Jules)——法国小資产階級民主主义者, 1864年9月28日圣馬丁堂會議的参加者, 国际总委员会委員(1864—1865)。——第21、587頁。

德斯杜特·德·特拉西伯爵, 安都昂·路易·克劳德(Destutt de Tracy, Antoine-Louis-Claude, comte 1754—1836)——法国庸俗經濟学家, 感觉論哲学家; 君主立宪的拥护者。——第308頁。

十六画

默里, 帕特里克·約瑟夫(Murray, Patrick Joseph)——都柏林苦役監獄典獄长。——第459、460、684、685頁。

穆尔, 乔治·亨利(Moore, George Henry 1811—1870)——爱尔兰政治活动家, 保障租佃者权利运动的領袖之一, 議會議員(1847—1857、1868—1870); 曾为被囚禁的爱尔兰芬尼亚社社員进行辯护。——第458、665、668、671、679、682、683、688頁。

鮑威尔, 埃德加尔(Bauer, Edgar 1820—1886)——德国政論家, 青年黑格尔分子; 1848—1849年革命后流亡英国; 1859年为倫敦“新时代”編輯; 1861年

大赦后为普魯士官員。——第376頁。
賴尔, 查理(Lyell, Charles 1797—1875)——著名的英国学者, 地质学家。——第584頁。

賴德律-洛兰, 亚历山大·奥古斯特(Ledru-Rollin, Alexandre-Auguste 1807—1874)——法国政論家和政治活动家, 小資产階級民主派領袖之一, “改革报”編輯, 1848年是临时政府成員, 制宪議會和立法議會議員, 在議會中領導山岳党, 1849年6月13日示威游行后流亡英国。——第669頁。

諾克斯, 亚历山大·安得魯(Knox, Alexander Andrew 1818—1891)——英国新聞工作者和治安法官, 1867年向議會提呈关于英国監獄中的政治犯待遇报告的專門委员会委員。——第674、681、685、696頁。

諾特克尔, 拉貝奧(Notker, Labeo 952左右—1022)——德国修道士, 曾在圣加倫修道院讲道。——第559頁。

霍布斯, 托馬斯(Hobbes, Thomas 1588—1679)——杰出的英国哲学家, 机械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 他的社会政治观点具有鮮明的反民主的傾向。——第144頁。

霍尔托普, 艾米尔(Holtorp, Emil)——在倫敦的波兰侨民, 国际总委员会委員(1864年10月—1866年), 波兰通訊書記(1864—1865), 国际倫敦代表會議(1865)的参加者, 1866年参加馬志尼創建的国际共和主义者委员会。——第21、110、579頁。

霍亨索倫王朝(Hohenzollern)——勃兰登堡选帝侯世家(1415—1701), 普魯士王朝(1701—1918)和德意志皇朝(1871—1918)。——第228—229頁。

霍林格尔, 菲德利奧(Hollinger, Fidelio)
——倫敦一家印刷所老板。——第 25 頁。

霍夫施泰滕, 約翰·巴普提斯特(Hofstetten, Johann Baptist 死于 1887 年)
——巴伐利亚軍官, 拉薩尔分子; “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发行人和編輯之一(1864—1867)。——第 248、251、253 頁。

十七 画

賽德, 罗伯特·亨利(Side, Robert Henry)——国际总委员会委員(1864 年 11 月—1866 年)。——第 22 頁。

戴雷(Daire 五世紀)——奧爾斯脫执政者之一, 曾参加爱尔兰法律汇编“古制全书”的編纂工作。——第 554 頁。

戴維逊(Davisson, A. N.)——曼彻斯特席勒协会秘书。——第 366 頁。

戴維斯, 約翰(Davis, John 1569—1626)
——英国国家活动家, 詩人, 写有許多爱尔兰历史方面的著作, 爱尔兰首席檢察官(1609—1619); 拥护爱尔兰英国殖民地化。——第 557 頁。

戴維斯, 杰弗逊(Davis, Jefferson 1808—1889)——美国政治活动家, 大种植場主奴隶主, 屬于民主党, 南部奴隶主

叛乱策划者之一; 美国对墨西哥战争(1846—1848)的积极参加者; 曾任美国陸軍部长(1853—1857), 南部同盟总统(1861—1865)。——第 108、667 頁。

十八 画

魏德迈, 約瑟夫(Weydemeyer, Joseph 1818—1866)——德国和美国工人运动的卓越活动家; 1846—1847 年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 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下, 轉到科学共产主义立場上,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 德国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新德意志报”的主編之一(1849—1850); 革命失敗后流亡美国, 曾参加內战, 站在北部方面; 他为馬克思主义在美国的宣傳奠定了基础;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 25、26、404 頁。

薩克森·格腊馬提克(Saxo Grammaticus 十二世紀中—十三世紀初)——丹麦編年史家, “丹麦史”的作者。——第 571 頁。

薩耳瓦特拉, 納尔契佐(Salvatella, Narciso)——受馬志尼影响的倫敦意大利工人組織——共进会的會員, 国际总委员会委員(1865)。——第 110 頁。

文学作品和神話中的人物

四 画

比妮羅布——古希腊神話中国王奧德賽的妻子, 二十年信守外出同特洛伊人作战的丈夫; 为了摆脱糾纏不休的求婚者, 她約言为公公織好长袍后就嫁給他

們中的某一个人; 同时, 她每夜把白天織就的都拆散了。——第 689 頁。

五 画

札格納特——古印度神話中毗湿奴神的化身之一。——第 161 頁。

六 画

米迦勒——据圣经传说，为天使长之一。
——第 418 页。

西维拉——古代走四方的“女预言家”之一；她的占语被编成所谓的“西维拉占语集”，这个集子在古代罗马的宗教生活中起重大作用。——第 241 页。

亚尼雅士——古希腊罗马神话中的特洛伊主要捍卫者之一，相传为罗马人的始祖。——第 551 页。

七 画

希尔德布兰德——古代日耳曼英雄事迹叙事诗“希尔德布兰德之歌”中的主人公。——第 84、571 页。

八 画

罗兰——法国民间叙事诗“罗兰之歌”中的主人公，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亨利六世”中曾提到他。——第 692—693 页。

所罗门——古犹太王；在中世纪的文学中，特别在东方的文学中以英明公正的君主著称。——第 680 页。

芬·麦库阿耳——爱尔兰叙事诗中的英雄，相传他改组了爱尔兰的军队。——第 560、574 页。

九 画

保罗——据圣经传说，是基督教使徒之一。——第 419 页。

十 画

挪亚——据圣经传说，为“洪水”后重新繁衍的人类的始祖。——第 551 页。

桑格拉都——列萨日的小说“山梯良那的吉尔·布拉斯奇遇记”中的人物，医生，

医治一切疾病只用两个药方：喝水和放血。——第 686 页。

息息法斯——希腊神话中科林斯王，因欺骗了众神，被罚推滚一巨石到山上，而每当推到山顶，巨石则自动滚落山下，他就这样永远不停地推滚巨石。成语“息息法斯的劳动”（即吃力而徒劳的工作）源出于此。——第 108、284 页。

十一 画

基督（耶稣基督）——传说中的基督教创始人。——第 458 页。

十二 画

雅弗——据圣经传说，为“洪水”后重新繁衍的人类一种族的始祖，挪亚的儿子。——第 551 页。

斯嘉本——莫里哀的喜剧“斯嘉本的诡计”中的人物。——第 27 页。

斯蒂金斯——狄更斯的小说“匹克威克外传”中的人物，伪善的化身。——第 688 页。

腊格纳·洛德布罗克——丹麦海盗，斯堪的那维亚叙事诗中的传奇人物。——第 565 页。

莱喀古士——传说中的古斯拜达立法者，相传为公元前九世纪到八世纪时候的人。——第 390 页。

十三 画

奥丁——古斯堪的那维亚神话中最高神。——第 566 页。

奥利维耶尔——法国民间叙事诗“罗兰之歌”中的主人公之一，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亨利六世”中曾提到他。——第 694 页。

十五画

撒母耳——据聖經傳說，是古犹太先知。

——第 406 頁。

摩西——据聖經傳說，摩西是从埃及法老的迫害下解救了古犹太人的先知（“出

埃及記”）。——第 551 頁。

摩洛赫——古腓尼基和迦太基宗教中的太阳神，祭祀摩洛赫时用活人作祭品；后来，摩洛赫这一名字成了殘忍和吞噬一切的暴力的化身。——第 11 頁。

期 刊 索 引

二 画

- “十字报”(«Kreuz-Zeitung»)——見“新普魯士报”。
- “人民报”(«Volks-Zeitung»)——柏林出版。——第374頁。
- “人民事业”(«Народное дело»)——日內瓦出版。——第464、478頁。
- “人民国家报”(«Der Volksstaat»)——萊比錫出版。——第434、480、485、486、489、495頁。
- “人民論壇报”(«La Tribune du Peuples»)——布魯塞爾出版。——第352、615、626頁。

三 画

- “上萊茵信使报”(«Oberrheinischer Courier»)——第185頁。
- “工人报”(«The Working Man»)——倫敦出版。——第611、615頁。
- “工人报”(«De Werkman»)——阿姆斯特丹出版。——第429頁。
- “工人辯護士报”(«The Workman's Advocate»)——倫敦出版。——第589、595頁。
- “工人辯護士报”(«The Workingman's Advocate»)——芝加哥出版。——第630、631頁。

四 画

- “双周評論”(«The Fortnightly Review»)

——倫敦出版。——第322、326、438、472頁。

- “比利时人民报”(«Le Peuple Belge»)——布魯塞爾出版。——第365頁。

五 画

- “左岸”(«La Rive gauche»)——巴黎、布魯塞爾出版。——第442頁。
- “白鷹报”(«Der Weiße Adler»)——蘇黎世出版。——第107頁。
- “電訊”(«Telegraph»)——見“每日電訊”。
- “外交評論”(«The Diplomatic Review»)——倫敦出版。——第379頁。
- “民主周报”(«Demokratisches Wochenblatt»)——萊比錫出版。——第263、271、371、373、376、392、400、443、477頁。
- “平等报”(«L'Egalité»)——日內瓦出版。——第435—439、441—443、467—473、475—477、485、486頁。
- “平等”(«L'Eguaglianza»)——那不勒斯出版。——第468頁。
- “未来报”(«Die Zukunft»)——科尼斯堡、柏林出版。——第232、235、253、413、488頁。
- “未来呼声报”(«La Voix de l'Avenir»)——拉紹德封出版。——第595頁。
- “北极星”(«Nordstern»)——漢堡出版。——第27頁。
- “北德报”(«Zeitung für Norddeutschland»)

——汉諾威出版。——第230頁。

“北德通訊”(《*North German Correspondence*》)——柏林出版。——第489頁。

六 画

“先驅”(《*Der Vorbote*》)——日內瓦出版。
——第223、365、585、595、605、636頁。

“西郵報”(《*Die Westliche Post*》)——圣
路易出版。——第26頁。

“回声報”(《*The Echo*》)——倫敦出版。
——第679、680頁。

“共和国”(《*The Commonwealth*》)——倫
敦出版。——第170、174、183、628頁。

“米拉波報”(《*Le Mirabeau*》)——佛爾維
耶出版。——第490頁。

“觀察家報”(《*Der Beobachter*》)——斯圖
加特出版。——第23、24、254、256頁。

“觀察家時報”(《*Examiner and Times*》)
——曼徹斯特出版。——第635頁。

“自由報”(《*La Liberté*》)——布魯塞爾出
版。——第352、495頁。

“自由之聲”(《*Głos Wolny*》)——倫敦出
版。——第229頁。

“自由人報”(《*Freeman's Journal*》)——
都柏林出版。——第692頁。

七 画

“勞動報”(《*Le Travail*》)——巴黎出版。
——第436、469、470頁。

“進步報”(《*Le Progrès*》)——勒-洛克尔
出版。——第435、436、441—443、467
—470、475—478頁。

“杜塞尔多夫日報”(《*Düsseldorfer Zei-
tung*》)——第243、245頁。

“佛爾維耶回声報”(《*L'Echo de Verriers*》)
——第586—590、593—596頁。

“每日電訊”(《*Daily Telegraph*》)——倫
敦出版。——第678、688頁。

“每日新聞”(《*The Daily News*》)——倫敦
出版。——第107、670、671、677、688
頁。

“社會主義報”(《*Le Socialisme*》)——巴
黎出版。——第229頁。

“社會民主黨人報”(《*Social-Demokrat*》)
——柏林出版。——第14、36、39、40、
88、95—98、99、100、103、248、358、442、
476頁。

八 画

“呼聲報”(《*Voice*》)——波士頓出版。
——第630頁。

“實證哲學”(《*La Philosophie positive*》)
——巴黎出版。——第466頁。

“實證論者評論”(《*Revue Positiviste*》)
——見“實證哲學”。

“法蘭西信使報”(《*Le Courier français*》)
——巴黎出版。——第247頁。

“國際報”(《*L'International*》)——倫敦
出版。——第424頁。

“國際報”(《*L'Internationales*》)——布魯
塞爾出版。——第400、421、434、445、
462頁。

“國際信使”(《*Le Courier international*》)
——倫敦出版。——第223、615、616
頁。

“國際信使”(《*The International Courier*》)
——倫敦出版。——第223、630、632
頁。

“國際工人協會報”(《*Journal de l'Asso-
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日內瓦出版。——第595頁。

“國民經濟和文化史季刊”(《*Vierteljahr-
schrift für Volkswirtschaft und Kultur-*

geschichte)——柏林出版。——第353頁。

九 画

- “革命”(《Die Revolution》)——紐約出版。——第404頁。
- “紀事”(《The Chronicle》)——倫敦出版。——第499頁。
- “信使報”(《Botschafter》)——維也納出版。——第101、102頁。
- “威塞尔报”(《Weser-Zeitung》)——柏林出版。——第376頁。
- “星期六評論”(《Saturday Review》)——倫敦出版。——第376、438、472、669頁。
- “軍事总汇报”(《Allgemeine Militär-Zeitung》)——达姆斯塔德出版。——第49、54頁。
- “政治紀事報”(《Political Register》)——見“科貝特氏政治紀事周報”。
- “柏林改革報”(《Berliner Reform》)——第89、98、99、105頁。
- “派尔-麦尔新聞”(《The Pall Mall Gazette》)——倫敦出版。——第438、472、688頁。
- “美文学杂志和紐約刑法報”(《Belletristisches Journal und New-Yorker Criminal-Zeitung》)——紐約出版。——第101頁。
- “总汇报”(《Allgemeine Zeitung》)——奧格斯堡出版。——第25、376、419頁。
- “总汇通报”(《Le Moniteur universel》)——巴黎出版。——第426、694頁。
- “科倫日報”(《Kölnische Zeitung》)——第207頁。
- “科貝特氏政治紀事周報”(《Cobbett's Weekly Political Register》)——倫敦出版。——第668頁。

十 画

- “旁观者”(《The Spectator》)——倫敦出版。——第438、472、680頁。
- “馬賽曲報”(《La Marseillaise》)——巴黎出版。——第670—672、676、680、681、686、691、694、697、700頁。
- “泰晤士報”(《The Times》)——倫敦出版。——第181、193、197、226—228、365、374、376、378、522、539、635、669、677、688、698、699頁。
- “海尔曼。倫敦德文周報”(《Hermann. Deutsches Wochenblatt aus London》)——倫敦出版。——第26、94、101、645頁。
- “紐約刑法報”(《New-Yorker Criminal-Zeitung》)——見“美文学杂志和紐約刑法報”。
- “紐約每日論壇報”(《New-York Daily Tribune》)——第411頁。
- “爱尔兰人報”(《The Irishman》)——都柏林出版。——第522、671、678、679、689、693—695頁。
- “爱尔兰人民”(《The Irish People》)——都柏林出版。——第457、670、672、677頁。
- “爱北斐特日報”(《Elberfelder Zeitung》)——第241、242頁。

十一 画

- “晨星報”(《The Morning Star》)——倫敦出版。——第376頁。
- “莫斯科新聞”(《Московские ведомости》)——第226頁。
- “曼彻斯特卫报”(《The Manchester Guardian》)——第187頁。
- “曼彻斯特观察家”(《Manchester Examiner》)——見“观察家时报”。

“普魯士王國統計局雜誌”(《*Zeitschrift des königlich preussischen statistischen Bureaus*》)——柏林出版。——第50頁。

十二画

“聯盟”(《*La Federacion*》)——巴塞羅納出版。——第429、468頁。

“聯合”(《*L'Association*》)——巴黎和布魯塞爾出版。——第40、592頁。

“萊茵觀察家”(《*Rheinischer Beobachter*》)——科倫出版。——第88頁。

“萊茵政治、商業和工業日報”(《*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 Handel und Gewerbe*》)——科倫出版。——第408頁。

“萊茵報。萊茵省和威斯特伐里亞民主派機關報”(《*Rheinische Zeitung. Organ der Demokratie in Rheinland und Westphalen*》)——杜塞爾多夫、科倫出版。——第236頁。

十三画

“蜂房報”(《*The Bee-Hive Newspaper*》)——倫敦出版。——第19、22、110、231、351、352、359、375、441、480、485、597、611、613、642、643、701頁。

“雷諾新聞”(《*Reynolds's Newspaper*》)——倫敦出版。——第434、687、688頁。

“經濟學家”(《*The Economist*》)——倫敦出版。——第501、521頁。

“奧格斯堡女人”(《*Augsburgerin*》)——見“總匯報”。

“新時代”(《*Die Neue Zeit*》)——斯圖加特出版。——第230、479頁。

“新巴登報”(《*Neue Badische Landeszeitung*》)——曼海姆出版。——第260、262頁。

“新德意志報”(《*Neue Deutsche Zeitung*》)

——美因河畔法蘭克福出版。——第25頁。

“新普魯士報”(《*Neue Preussische Zeitung*》)——柏林出版。——第70頁。

“新法蘭克福報”(《*Neue Frankfurter Zeitung*》)——美因河畔法蘭克福出版。——第26、95頁。

“新萊茵報。民主派機關報”(《*Neue Rheinische Zeitung. Organ der Demokratie*》)——科倫出版。——第89、241、410頁。

“新萊茵報。政治經濟評論”(《*Neue Rheinische Zeitung. Politisch-ökonomische Revue*》)——倫敦—漢堡出版。——第410、446、447頁。

十四画

“旗幟報”(《*The Standard*》)——倫敦出版。——第680、698頁。

“維爾騰堡工商業報”(《*Gewerbeblatt aus Württemberg*》)——斯圖加特出版。——第257、259頁。

十五画

“德法年鑑”(《*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巴黎出版。——第409頁。

“德國中央文學報”(《*Literarisches Centralblatt für Deutschland*》)——萊比錫出版。——第353頁。

“德意志—布魯塞爾報”(《*Deutsche-Brüsseler-Zeitung*》)——第88頁。

“鑄工國際報”(《*Ironmoulders' International Journal*》)——費拉得爾菲亞出版。——第628頁。

十六画

“辨士蜂房”(《*The Penny Bee-Hive*》)——見“蜂房報”。

地名索引*

三 画

- 女王郡(萊伊舍)——爱尔兰的郡。——第 529 頁。
- 大西洋——第 14、21、227、401、440、474、541 頁。
- 小俄罗斯——見乌克兰。
- 下維尔施尼茨——薩克森的城市。——第 385、386、387、390 頁。
- 上哈斯利——瑞士的一个居民点。——第 533 頁。
- 上捷耳克——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的一个居民点。——第 206 頁。
- 土尔瑙(土尔諾夫)——捷克的城市。——第 209 頁。
- 土里-阿尔庫尔——法国的城市。——第 625 頁。
- 土耳凱恩——見托耳卡。

四 画

- 中国——第 639 頁。
- 戈伊托——意大利的一个居民点。——第 201 頁。
- 牙买加島——第 184、397 頁。
- 不列顛群島——第 540 頁。
- 厄尔士山脉——第 385 頁。

- 扎耳特博默耳——第 99 頁。
- 牛津——第 340、542 頁。
- 牛津郡——英国的郡。——第 6、7、536 頁。
- 比恩(俾尔)——瑞士的城市。——第 593、625—626 頁。
- 比利牛斯半島——第 58 頁。
- 丹洛——爱尔兰的狭谷。——第 533 頁。
- 丹涅維尔克——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的工事垒墙。——第 206 頁。
- 韦威康——瑞士的城市。——第 626 頁。
- 韦斯特默尔兰——英国的郡。——第 548 頁。
- 什列斯維希——見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
- 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第 70、103、182、189、198、206 頁。
- 日内瓦——第 103、359—361、364、382、419—421、436、443、463、465、466、468—471、477、478、490—493、495、590、591、593、594—599、612、614、616、619、620、623、625—632、635、655 頁。
- 日内瓦州——第 421 頁。
- 日德兰半島——第 39 頁。
- 巴門——第 369、429 頁。
- 巴登——第 419 頁。

* 括弧中是现代地图上的名称,在正文中看不出所在地点的地名,則加有簡短的說明。——編者注

巴黎——第 30、31、40、57、90、91、98、101、103、354、360、361、378、409、410、421—423、451、466、469、486、488、491、589、592、593、612、615、618、625、627、633、638、702 頁。
皮托郊区——第 589、625 頁。
圣丹尼郊区——第 589、625 頁。
巴倫山——在爱尔兰。——第 529 頁。
巴布里干——爱尔兰的城市。——第 513 頁。
巴尔的摩——第 628 頁。
巴伐利亚——第 207、260 頁。
巴塞尔——第 417—420、427、437、466、468、469、471、486、626、647 頁。
巴塞罗纳——第 429、468 頁。

五 画

印度——第 322、641 頁。
立陶宛——第 179 頁。
白俄罗斯——第 182 頁。
瓜德罗普島——第 625 頁。
汉堡——第 253、358、363、381 頁。
汉諾威——第 184 頁。
东头——見倫敦。
北明翰——第 312、430、505、516、620 頁。
北德平原——第 532 頁。
卢昂——第 422、423、426、589、625 頁。
卢瓦尔省——在法国。——第 423、425 頁。
皮托——見巴黎。
皮蒙特——第 66 頁。
弗兰德——第 565 頁。
弗里斯克河——在爱尔兰。——第 532 頁。
弗腊默里——法国的城市。——第 369、397、429 頁。
瓦登堡(伐烏布日伊赫)——第 197 頁。

瓦列卓(明乔河岸瓦列卓)——意大利的一个居民点。——第 200、201 頁。
瓦瑞克郡——英国的郡。——第 615 頁。
瓦特福德——第 513、565、699 頁。
瓦特福德——爱尔兰的郡。——第 689、699、670 頁。
瓦拉几亚——見多瑙河各公国。
加耳蒂山脉——在爱尔兰。——第 532 頁。
加拿大——第 667、672 頁。
加尔各答——第 226 頁。
加尔达湖——在意大利。——第 199、200 頁。
加里西亚——第 182 頁。
加利福尼亚——第 633 頁。
卡昂——法国的城市。——第 589、592、624、625 頁。
卡舍耳——爱尔兰的城市，曼斯特的古都。——第 554 頁。
卡魯日——瑞士的城市。——第 625 頁。
卡斯提奥涅——意大利的城市。——第 200 頁。
卡斯特尔諾达里——法国的城市。——第 625 頁。
卡茨巴赫(卡查瓦)河——在西里西亚。——第 57 頁。
卡里克費尔格斯——爱尔兰的城市。——第 561 頁。
布隆(布尔諾)——第 428 頁。
布律呂——瑞士的一个居民点。——第 626 頁。
布拉格——第 194 頁。
布列塔尼——法国的历史区。——第 176 頁。
布勒斯劳(弗罗茨拉夫)——第 195、196、205 頁。
布魯塞尔——第 357—359、361、363、

364、374、375、382、383、398、399、409、
421、422、444、465、494、581、597、627、
644、649、656 頁。
布索兰哥——意大利的一个居民点。——
第 200 頁。
布萊得弗德——英国的城市。——第 24
頁。
圣加倫——瑞士的城市。——第 563 頁。
圣亚田——第 424—426 頁。
圣丹尼——見巴黎。
圣克卢阿——第 625 頁。
圣伊米耶——第 625 頁。
圣彼得堡(列宁格勒)——第 14、224、
379、463、491、535 頁。
圣路易斯——第 25、26、404 頁。
圣朱斯蒂納——意大利的一个居民点。
——第 200 頁。

六 画

列日——第 627 頁。
冰島——第 568、569 頁。
吉欽(伊欽)——捷克的城市。——第 204
—206、209 頁。
匈牙利——第 174、175、177、196、225、
227、428、664 頁。
安特林——爱尔兰的郡。——第 530、
536、561、564 頁。
考文垂——第 615、622 頁。
汝拉山脉——第 532 頁。
休尔河岸卡里克——爱尔兰的城市。——
第 513 頁。
华沙——第 224、227 頁。
华盛顿——第 632 頁。
米兰——第 200、628 頁。
米斯——爱尔兰的郡和历史区。——第
536—538、569 頁。
亚眠——第 360—361、422 頁。

亚尔薩斯——第 176 頁。
艾佩耳(烏皮策)——捷克的城市。——
第 209 頁。
艾塞克斯——英国的郡。——第 536 頁。
托尔高——第 197 頁。
托耳卡河——在爱尔兰。——第 569、570
頁。
多尼果耳——爱尔兰的郡。——第 536、
539、550 頁。
多瑙河——第 196 頁。
多瑙河各公国——第 177、301、342 頁。
伊万城——第 227 頁。
伊澤尔——法国的省。——第 624 頁。
伊澤尔(伊澤腊)河——在捷克。——第
195、205 頁。
伊利諾斯——美国的州。——第 630 頁。
达林敦——英国的城市。——第 622 頁。
达荷美——第 688 頁。
达特木尔——英国的台地。——第 457
頁。
达尔訥塔耳——法国的城市。——第 423
頁。
达姆斯塔德——第 488 頁。
西头——見倫敦。
西印度——第 509、637 頁。
西米斯——爱尔兰的郡。——第 538 頁。
西西里島——第 518 頁。
西里西亚——第 195、197 頁。

七 画

邦丁——法国的城市。——第 589、625
頁。
沃金——英国的一个居民点。——第
679、689、695 頁。
佐林根——第 103、591 頁。
芝加哥——第 630—632 頁。
那不勒斯——第 429、468、469、591、597、

628、667、675 頁。
 沙勒罗瓦——比利时煤田。——第 362、398 頁。
 希尔什堡（耶累尼亚-古腊）——西里西亚的城市。——第 195、197 頁。
 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第 180、226、228 頁。
 努瓦尔河岸孔德——第 625 頁。
 貝耳特貝特——爱尔兰的一个居民点。——第 530 頁。
 坎伯兰——英国的郡。——第 548 頁。
 坎特伯雷——第 570 頁。
 佛罗倫薩——第 638 頁。
 佛尔維耶——第 702 頁。
 杜佩尔（杜貝尔）——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的一个居民点。——第 58、70 頁。
 杜納閔德（道加夫格里瓦）——第 565 頁。
 伯克郡——英国的郡。——第 6 頁。
 伯尔尼——第 428、465、466、468、626 頁。
 伯利維尔——第 589 頁。
 苏黎世——第 626 頁。
 苏格兰——第 6、7、123、126、175、184、503、533、538、560—562、564、565、621、662 頁。
 苏格兰低地——第 561 頁。
 苏台德山脉——第 195 頁。
 利尼——比利时的一个居民点。——第 212 頁。
 利菲河——在爱尔兰。——第 544、559 頁。
 利济厄——法国的城市。——第 589、625 頁。
 利物浦——第 516、548 頁。
 利斯伍德——英国的一个居民点。——第 429 頁。
 里昂——第 285、423、425、426、427、469、477、582、589、592、623—625、630 頁。

里沃利——意大利的一个居民点。——第 200 頁。
 里夫-德-紀埃——法国的城市。——第 425 頁。
 里卡馬里——法国的一个居民点。——第 424、426、430 頁。
 里美黎克——第 509、510、534、535、565、665 頁。
 里美黎克——爱尔兰的郡。——第 534、535、537、553 頁。
 克黎——爱尔兰的郡。——第 539、541 頁。
 克里木——第 57 頁。
 克萊德河——在苏格兰。——第 561 頁。
 克郎梅尔——爱尔兰的城市。——第 534 頁。
 克隆塔尔弗——爱尔兰的一个居民点。——第 566、569、570 頁。
 克勒尔——爱尔兰的郡。——第 529、535、536、539、560 頁。
 克勒肯威尔——見倫敦。

八 画

松姆——法国的省。——第 422 頁。
 奈塞（尼斯）河——第 197 頁。
 肯达耳——英国的城市。——第 622 頁。
 易北河（拉巴河）——第 194、195、197、198 頁。
 門塔納——意大利的一个居民点。——第 363 頁。
 彼得堡——見圣彼得堡。
 直布罗陀——第 535 頁。
 佩耳——爱尔兰的历史区。——第 507、508 頁。
 佩斯——匈牙利首都，今布达佩斯左岸部分。——第 428 頁。
 明乔河——在意大利。——第 199—202

頁。
 明兴格雷茨(慕尼霍沃-格勒迪施特)——捷克的都市。——第 209 頁。
 帕維亞——第 563 頁。
 帕尔杜比策——捷克的都市。——第 195、197 頁。
 金塞耳——爱尔兰的都市。——第 509 頁。
 金太尔半島——第 561 頁。
 拉德腊姆——爱尔兰的都市。——第 513 頁。
 拉施塔特——第 189 頁。
 拉紹德封——第 490、625、626 頁。
 拉芒什海峽——第 9、10、126、361、422、682 頁。
 拉提博尔(拉威布日)——西里西亞的都市。——第 197 頁。
 羅馬——第 419 頁。
 羅馬尼亞——第 300、547 頁。
 罗陀斯——第 292、333 頁。
 罗斯考門——爱尔兰的郡。——第 535—537 頁。
 罗訥河口省——在法国。——第 624 頁。
 阿迪杰河——在意大利。——第 200 頁。
 阿姆斯特丹——第 429 頁。
 阿德尔——爱尔兰的一个居民点。——第 534 頁。
 阿德帕特里克——爱尔兰的一个居民点。——第 534 頁。
 阿尔让唐——法国的都市。——第 625 頁。
 阿尔及利亚, 阿尔及尔——第 57、504、625 頁。
 阿尔卑斯山脉——第 199、532、558 頁。
 阿尔庫尔-土里——見土里-阿尔庫尔。
 波河——在意大利。——第 199、202 頁。
 波恩——第 408 頁。

波兰——第 14、106、170—175、177—183、222、224—230、350、463、505、535、583 頁。
 波茲南——第 195、225 頁。
 波特兰——第 457、695 頁。
 波茨坦——第 55 頁。
 波士頓——第 630 頁。
 波尔多——第 625 頁。
 波尔頓——第 548 頁。
 波累澤拉——意大利的都市。——第 199 頁。
 波希米亚(捷克)——第 189、194—197、199、204、205、208、209、211 頁。
 波罗的海沿岸——第 179 頁。

九 画

柏林——第 55、103、194—195、224、380、381、408、491 頁。
 耶拿——第 57、191、211 頁。
 拜尔法斯特——第 512、530、546 頁。
 哈佛尔——第 625 頁。
 哈帕尔斯渡口——美国的一个居民点。——第 499 頁。
 南特——第 589、625 頁。
 南方群島——見赫布里底群島。
 查塔姆——英国的都市。——第 458、674、689 頁。
 查理維耳——爱尔兰的都市。——第 534 頁。
 美因茲——第 189、486—488、495、702 頁。
 美因河——第 207、563 頁。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第 25、26、189、198、446 頁。
 洛桑——第 382、590、606、608、614、625—628、631、635 頁。
 洛包——第 195—197 頁。

洛納托——第 200 頁。
 威爾士——第 7、8、129、430、458、505、
 510、533、539、556、561、572、621、659、
 662 頁。
 威尼斯——第 182 頁。
 威克洛山——在愛爾蘭。——第 513 頁。
 威斯基爾欣(格拉尼策)——捷克的一個
 居民點。——第 197 頁。
 科倫——第 88、408、410 頁。
 科克——第 513 頁。
 科克——愛爾蘭的郡。——第 459、532、
 537、541 頁。
 科里布湖——在愛爾蘭。——第 538 頁。
 科莫恩(科馬諾)——第 100 頁。
 科布倫茨——第 198 頁。
 科尼斯堡——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的
 一個居民點。——第 206 頁。
 科尼斯頓——英國的城市。——第 548
 頁。

十 画

柴郡——英國的郡。——第 6、541、548 頁。
 熱那亞——第 628 頁。
 茨威考——第 390 頁。
 烏克蘭——第 180、182 頁。
 納霍特——捷克的都市。——第 209 頁。
 桑維耳耶——瑞士的都市。——第 625
 頁。
 班登——愛爾蘭的都市。——第 513 頁。
 班戈爾——威爾士的一個居民點。——
 第 561 頁。
 庫斯托查——第 199—201、204、210 頁。
 庫爾黑森——見黑森—加塞爾。
 愛丁堡——第 184 頁。
 愛爾蘭——第 7、222、227、361、439—
 441、453、458—460、473—475、499、
 500、503、504、506—520、521、522、525、

526、529—544、545—554、555—567、
 569、571—573、575、621、637—639、
 657、659、662、664—668、670、674、681、
 684—688、690—694、696—701 頁。
 愛森納赫——第 198、427、429 頁。
 埃及——第 226—228、518 頁。
 埃耳伯夫——法國的城市。——第 423
 頁。
 埃耳斯尼茨——第 387 頁。
 郎河——在愛爾蘭。——第 532 頁。
 郎卡郡——英國的郡。——第 6、128、
 161、541、548、622 頁。
 郎弗德——第 698、699 頁。
 郎弗德——愛爾蘭的郡。——第 537、
 698、699、700 頁。
 高加索——第 14、227 頁。
 高爾威——愛爾蘭的郡。——第 536 頁。
 高爾威——第 526、531 頁。
 高爾威灣——第 529、532 頁。
 倫敦——第 5、7、16、17、19、23、25—28、
 40、88、90、95、98、100、101、105—107、
 109、184、185、197、213、224、230、351、
 358、361、364、374、375、376、378、380、
 384、393、400、403、406、409—411、419、
 421—424、432、446、456、464—469、
 478、485、487、488、490、491、493、545、
 579、581、582、586、590、615、617、618、
 621—623、626、627、631、633、635、638、
 644、670、673、675、677、680、681、682、
 687、692、698、702 頁。
 德特弗德郊区——第 588 頁。
 東頭——第 642 頁。
 克勒肯威爾區——第 683、690 頁。
 西頭——第 621、622 頁。
 倫巴第——第 200、558 頁。
 倫斯特——愛爾蘭的歷史區。——第
 508、539、566、569 頁。

倫敦德里——爱尔兰的城市。——第 546 頁。

馬賽——第 427、477、624、625 頁。

馬洛——爱尔兰的城市。——第 532、535、699、700 頁。

馬耳倍(米耳敦-馬耳倍)——爱尔兰的一个居民点。——第 560 頁。

馬薩諸塞——美国的州。——第 629、630、654 頁。

馬尔希廷(馬尔希廷-奧蓬)——第 606、634 頁。

特利尔——第 408、409 頁。

特洛伊——小亚細亚的古代城市。——第 551 頁。

特魯包(莫拉維亞-特热博伐)——莫拉維亞的城市。——第 197 頁。

特腊美兰——瑞士的一个居民点。——第 626 頁。

特劳特瑙(特魯特諾夫)——捷克的城市。——第 195、209 頁。

格洛高(格沃古夫)——西里西亞的城市。——第 195 頁。

格尔利茨——西里西亞的城市。——第 197 頁。

格朗維耳——法国的城市。——第 625 頁。

格拉茨(克洛茨科)——西里西亞的城市。——第 208、210 頁。

格拉斯哥——第 516、691 頁。

格拉納达-基耳——爱尔兰的一个居民点。——第 537 頁。

索納——意大利的一个居民点。——第 200、201 頁。

索尔費里諾——意大利的一个居民点。——第 200—202 頁。

索美塞特郡——英国的郡。——第 6—7 頁。

索馬康帕尼亞——意大利的一个居民点。——第 200、201 頁。

索恩河岸紐維耳——第 624、625 頁。

索特維耳-勒-卢昂——法国的城市。——第 422、423、646 頁。

紐約——第 365、404、629—632 頁。

紐約州——美国的州。——第 632、654 頁。

紐黑文——美国的城市。——第 629、630 頁。

紐倫堡——第 363、380、381 頁。

紐沙特尔——第 364、625 頁。

紐沙特尔——瑞士的州。——第 590 頁。

紐敦納德斯——爱尔兰的城市。——第 676 頁。

十一画

得比——第 540 頁。

明登——第 198 頁。

理森山(克尔科諾舍山)——第 195、196、204、208 頁。

都柏林——第 459、507、508、513、526、531、544、545、559、564、566、567、569、570、665、668、673、682—684、691 頁。

訥夏托——法国的城市。——第 589、592、625 頁。

培斯克拉——意大利的城市。——第 201 頁。

密苏里——美国的州。——第 26 頁。

密得尔頓——爱尔兰的一个居民点。——第 461 頁。

勒-布瓦——第 626 頁。

勒-洛克尔——第 467、469、478、625 頁。

康諾特——爱尔兰的历史区。——第 508、521、539、552、558 頁。

康涅狄格——美国的州。——第 629 頁。

設菲尔德——第 220 頁。

設得兰群島——第 564 頁。

梯培雷里——第 534、535、699 頁。
 梯培雷里——爱尔兰的郡。——第 458、534、535、537、699、700 頁。
 梅格河——在爱尔兰。——第 534 頁。
 梅沃郡——爱尔兰的郡。——第 537、538 頁。
 梅克倫堡——第 184 頁。
 基拉尼——爱尔兰的城市。——第 532、533 頁。
 基耳芬楠——爱尔兰的一个居民点。——第 534 頁。
 基尔肯尼——爱尔兰的城市。——第 513 頁。
 基尔希堡——第 386、390 頁。
 曼島——第 177 頁。
 曼都亚——第 200 頁。
 曼海姆——第 488 頁。
 曼斯特——爱尔兰的历史区。——第 508、521、539、554 頁。
 曼彻斯特——第 40、88、122、246、340、366、487、499、516 頁。
 莫希耳——爱尔兰的一个居民点。——第 530 頁。
 莫斯科——第 180 頁。
 莫德林(諾沃格奧尔基也夫斯克)——波兰的要塞。——第 227 頁。
 莫拉維亚——第 195、197、427 頁。
 莫尔达瓦河(維尔塔发河)——第 194 頁。

十二画

斐維——瑞士的城市。——第 590、625 頁。
 善农河——在爱尔兰。——第 508、534—536 頁。
 登比郡——威尔士的郡。——第 429 頁。
 腊思林島——第 564 頁。
 温德米尔——英国的城市。——第 548 頁。

普勒斯堡(布拉的斯拉发)——第 428 頁。
 費拉得尔菲亚——第 431、628 頁。
 博庫尔——瑞士的一个居民点。——第 626 頁。
 博里納日——比利时的煤田。——第 396、399、421 頁。
 提昂涅河——在意大利。——第 200、201 頁。
 提契諾河——在意大利。——第 200 頁。
 提尔西特——第 57 頁。
 菲沃——法国的一个居民点。——第 624、625 頁。
 菲格斯河——在爱尔兰。——第 536 頁。
 菲尔米尼——法国的一个居民点。——第 425 頁。
 萊茵河——第 224、410 頁。
 萊达河——第 449 頁。
 萊比錫——第 194 頁。
 斯派克島——第 459、461、462、672 頁。
 斯泰福郡——英国的郡。——第 8 頁。
 斯图加特——第 24、487 頁。
 斯堪的那維亚——第 175、568、571 頁。
 黑谷——爱尔兰的一个地方。——第 533 頁。
 黑海——第 227 頁。
 黑水河——在爱尔兰。——第 535 頁。
 黑尔郭兰島——第 572 頁。
 黑森——第 198 頁。
 黑森—加塞尔(庫尔黑森)——第 376 頁。

十三画

塞兰——比利时的城市。——第 396、399、421、429 頁。
 塔腊——古爱尔兰的首都。——第 574 頁。
 滑铁卢——第 212 頁。
 福思河——在苏格兰。——第 561 頁。

福尔斯特——第 488 頁。
 蒙塞耳——第 425 頁。
 蒙特勒——第 590、625 頁。
 新澤西——美国的州。——第 632 頁。
 新拉納克(拉納克)——第 122 頁。
 奧希——法国的城市。——第 625 頁。
 奥尔良——第 625 頁。
 奥尔斯脱——爱尔兰的历史区。——第 508、511、513、522、539、638 頁。
 奥尔胡斯——丹麦的城市。——第 39 頁。
 奥里繆茨(奧洛摩茨)——第 195—197、210 頁。
 奥克尼群島——第 564、567—569 頁。
 奧利維尔堡——爱尔兰的一个地方。——第 534 頁。
 奥埃尔施太特——第 191 頁。

十四画

寥拉赫——瑞士的一个居民点。——第 419 頁。
 赫尔(哈尔)——第 620 頁。
 赫布里底群島——第 562、564、567 頁。
 維恩——法国的城市。——第 624、625 頁。
 維也納——第 102、194—196、210、225、227、363、364、427、428 頁。
 維罗那——第 200—202 頁。
 維斯拉河——第 227 頁。
 維茨拉尔——第 189、198 頁。
 維耳夫朗舍——法国的城市。——第 625 頁。

十五画

蔡茨——第 197 頁。
 墨西哥灣流——第 541 頁。
 蓬特拉哥斯庫罗——意大利的一个居民点。——第 199 頁。
 魯貝——第 361 頁。

魯高——第 386 頁。
 德森(提契諾)——瑞士的州。——第 478 頁。
 德涅泊河——第 180 頁。
 德特弗德——見倫敦。

十六画

穆蒂埃——瑞士的城市。——第 626 頁。
 謀耳德——英国的城市。——第 429、430 頁。
 賴兴堡(利貝雷茨)——捷克的城市。——第 195、208 頁。
 霍布根——美国的城市。——第 632 頁。
 霍尔施坦——見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
 諾尔——法国的省。——第 303 頁。
 諾里奇——美国的城市。——第 629、630 頁。
 諾定昂——第 622 頁。
 諾恩堡——見紐沙特尔。
 諾曼底群島——第 572 頁。
 諾曼海(小明奇海峽和北明奇海峽)——第 562 頁。

十八画

薩克森——第 54、189、385 頁。
 薩多瓦——捷克的一个居民点。——第 451、452、572 頁。
 薩福克——英国的郡。——第 536 頁。
 薩尔茨堡——第 198、563 頁。
 薩利昂策——意大利的一个居民点。——第 201 頁。
 薩腊托加-斯普临斯——美国的城市。——第 511 頁。

十九画

龐-勒韦克——法国的一个居民点。——第 589 頁。

譯 后 記

本卷包括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64 年 9 月到 1870 年 7 月这一时期所写的著作。

本卷是根据“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第十六卷（1960 年出版）翻譯或校訂的。有些著作在譯校过程中参考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原来所用文字以及有关的中譯文。其中“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协会临时章程”、“工資、价格和利潤”、“‘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二版序言”、“‘德国农民战争’第二版序言”等文章，是在“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中文版的基础上校訂的。“卡·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提綱”以及关于“資本論”第一卷的九篇书評，是在 1957 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資本論’第一卷提綱”一书（章汉夫、許滌新、谷鷹等譯校）譯文的基础上校訂的。“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一文，在譯校过程中参考了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的“馬克思恩格斯关于殖民地及民族問題的論著”一书中的譯文。

参加本卷譯校工作的有屈洪、張启荣、楊启潏、齐淑文、胡尧之、楊冠森、吳惕安、荣敬本、張钟朴、陈国雄、王錫君、周亮勳、薛中平、吳劍平等。参加資料工作的有楊冠森、馮如馥、陈瑞林、陈家英。

本卷中“爱尔兰史”一文內“自然条件”一章的譯稿，承地质部蔡文彦等同志校閱过，特在这里志謝。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編譯局